



总编 杨迈军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利奥·梅拉梅德

逃向期货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美] 利奥·梅拉梅德 (Leo Melamed) 著
鲍勃·塔玛金 (Bob Tamarkin)

陈晗 张晓刚 杨柯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Leo Melamed, Bob Tamarkin.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Copyright © 1996 by Leo Melamed and Bob Tamarki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John Wiley & Sons 公司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全球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底贴有 John Wiley & Son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10-40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奥·梅拉梅德:逃向期货/(美)梅拉梅德(Melamed, L.), (美)塔玛金(Tamarkin, B.)著;陈晗,张晓刚,杨柯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6

(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ISBN 978-7-111-34719-4

I. 利… II. ①梅… ②塔… ③陈… ④张… ⑤杨… III. ①梅拉梅德, L. - 自传
②期货市场 - 史料 - 美国 IV. ①K837.125.34 ②F83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8539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蒋桂霞 版式设计:刘永青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0mm × 242mm · 25.25印张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34719-4

定价:58.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 88379210; 88361066

购书热线:(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中文版序言

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在世纪之交曾说过：“地中海代表过去，大西洋代表现在，而太平洋代表未来。”

尽管这句话说得早，但说得却不错。我们已经迈入了21世纪，未来也已经到来。在邓小平先生的带领下，开始于1978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中国已经由中央计划型经济体制转变为一个逐步运用市场经济规则的国家。如此一来，中国又进一步巩固了其领先的世界地位。

然而，持续的增长必然伴随一些烦恼。中国的市场距离完全的市场经济还有一定差距。今天，富国和穷国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能否自由、有效地利用资源。自由而高效的资本市场能够确保合理的资源配置。经济体制越有效率，资源配置也越有效率。高效的市场可以极大地提高市场的流动性。而一个流动的市场能够反映真实的价格水平，提高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如此一来，可以增强资本市场的实力、降低资本成本，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本，并最终使整个社会受益。

发展良好的期货及其衍生品市场在一个流动的市场的培育上，能够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衍生品工具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经济“安全网”，将业务的内在风险加以归类，把风

IV

险分解为几个基本组成部分，再将它们转嫁给那些能够并愿意管理这些风险的交易商。因此，无论是在集中的期货和期权交易所还是在特定的 OTC 市场中，金融衍生品都好比是一个巨大的保险公司，较其他方式更快速、准确、低成本地调整金融市场的风险。这一过程增强了资本市场的实力，促进了国民生产力的增长，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金融期货和衍生品最初诞生于 1972 年 5 月 16 日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逃向期货》讲述的就是美国金融期货和衍生品的发展过程。20 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将它的产生誉为是“过去 20 年中金融领域最重要的创新”。

这些金融工具提供了 3 个重要的经济功能：（1）风险管理；（2）价格发现；（3）交易效率。

风险管理经常被提到，但也经常被误解。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已有的”利润——而不是创造“新的”利润。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目的和它的功能。风险管理过程包括构建金融合约，创造利润（或损失）来抵消价格变动产生的损失（或利润）。这样，大多数金融机构都能够通过运用衍生品交易，以各种方式来降低风险、提高利润水平。

第二个功能是价格发现机制。这代表了一种获取和传播价格信息的能力。如果缺少价格信息，投资者、消费者和生产者就无法制定出合理的决策。这将会妨碍他们有效地利用资本。而衍生品则很好地扮演了提供价格信息的角色，它们能够帮助市场中的交易者决定价值水平。衍生品的运用范围越广，价格信息传播的范围也就越广。

第三，可以提高交易效率。交易效率是市场流动性的产物。流动性不足将会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这会阻碍交易，延缓资本积累。衍生品交易则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大大地提高市场流动性。最终结果是，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业务效率，融资成本降低，并扩大了投资的资本数量。

当然，在谈到市场效率的时候也不能忘记投机者所扮演的角色。所有的分析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有竞争力的投机者在提高价格有效性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投机活动带来了更高的交易水平和更小的买卖价差，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交易量越大，价差越小，市场价格就越接近其真实水平。更多的投资者就会相信市场价格反映了真实准确的信息，他们也就更愿意在进行投资时加上一个比较低

的风险溢价。因此，哪里的投机活动频繁，哪里的资本成本就越低，资本配置也就更有效。换言之，正如亚当·斯密很久以前所说的，投机者通过进行投机活动使整个经济受益。

但是，凡事小心，才会秩序井然：利用复杂的衍生品工具进行交易是需要相关知识的。从事商业活动有 4 种内在风险——无论是否运用衍生品工具，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它们是：（1）信用风险：由于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2）市场风险：金融资产或商品价格的反向波动而导致损失；（3）法律风险：由于法院或监管机构的相关措施而导致合约失效；（4）操作风险：由于监控不足、步骤不完善、人为失误或系统出错而产生的风险。只有先充分了解了这些风险，我们才能更好地在衍生品市场中建立头寸。

在这样一个全球金融环境中——充满了持续变换的市场风险、及时快速的信息流动和复杂精妙的科学技术，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工具。而对于那些代表着未来的新兴市场来说，这些工具更是培育自由、有效的资本市场所必备的。

利奥·梅拉梅德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前言

这不是一本关于我生平的自传，虽然书中涉及许多我的生活。首先，怀着对时间应有的崇敬，我相信自己尚有充足的时光来从事一些其他的使命。其次，就像题目所说的那样，本书写的是我向期货市场的“投奔”历程。虽然开头部分花了一些篇幅记述了我童年、青年时期的个人生活，但全书的重心——是啊，绝大部分——却是对我和期货市场之间的“恋爱史”的记录。也许有人会说，我的生活消耗在工作当中，生活和工作是合二为一、不分彼此的。我却要申明，这两者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不错，我认为几乎所有人至少有两种生活：私人生活和公开生活。近年来，我们的这两种生活越来越多地混同起来，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每个人有更多的情况为人知晓、被人记录、向人汇报。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两种生活的区分还是存在的，我也是这样。如果您相信，《逃向期货》是关于我在期货市场中公开生活的故事。

虽然恐怕是多此一举，但我仍然必须说明，本书所记录的一切仅凭一个人是无法做到的。在建立现代期货市场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了交易所内外数千名个人的帮助。但我却不能将这所有人中哪怕是一部分人的名字在本书或其他什么地

方写下来。在现今这个世界中，许多在社会中取得高位，尤其在政府中官位显赫的人，当有一天在书写他们的成就时，我怀疑他们是否会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有写日记的习惯，或是用其他方式记载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没有这样的日记或是记录。说实话，在本人从事期货市场领导工作期间，大多数时候我根本没有动过将来某一天动笔写自传的念头。因此，本书所述多是来自于记忆。哦，当然，随处都有正式记录、介绍册子、书籍和大量的报刊文章，但这些东西都无法以任何形式将那些在这 25 个年头里与我打过交道的人一一确认出来。我可以叫出一些人的名字，但对于那些我无意中遗漏未提的人们，请接受我深深的歉意。

同样，我无疑会错过一些有趣的故事和遭遇。部分原因是，出版商给我的时间空间颇为有限。正如每一个电影导演会告诉您的那样，许多东西都留在了剪辑室的地板上面。而且一人觉得值得回忆的事情对于另外一人来说不一定有意义。不过，关于那些我还记得的事件，那些对我来说、对这个故事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我相信我写到了点子上。至于我如果真正遗漏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再次致以诚挚的歉意。有可能的话，我在续集中再加以弥补吧。

然而，我必须单独列出一个人，对他公开表示我的感谢。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朋友、尊敬的导师、杰出的教师、经济学思想的指路明灯：米尔顿·弗里德曼。我禁不住重提我在《利奥·梅拉梅德论市场》中的陈述：

没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支持，没有他知识的指引，没有他协助我们开启机会之门，没有他长期地、毫不动摇地信任我们的事业，我无法具备实现我目前成就的勇气和意志。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没有我的妻子贝蒂、我的孩子艾戴尔、乔丹和戴维的全力支持，我便丧失了建立事业的基础。我的家人，特别是贝蒂，懂得他们所起作用的重要，尽管我是唯一获得殊荣的人。但有一点值得肯定，没有他们的热爱和理解，没有他们愿意牺牲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任由我去无定时，没有他们对我梦想和斗争的不渝支持，我就不能成就今天的事业。虽然世人常常不能充分嘉许这种支持的价值，我却完全清楚其分量并对他们做出的牺牲永怀感激。

相同地，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我也永远感谢艾莉桑·玻丝娜在我完成本书创作中所提供的协助。她对此事的投入、娴熟的组织以及她的专业技巧都是本书能

够付梓所不可或缺的。更不用说，鲍勃·塔玛金，我的私人朋友兼文学指导，他的专业才能对这一过程举足轻重。塔玛金花了六年大好时光撰写 **Merc** 的正史，因此其对资料的掌握和对全盘事情的了解程度是无可替代的。最后我也要感谢麦尔斯·汤普森公司、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南希·玛尔克斯·兰德公司、出版开发公司，谢谢它们出版此书时的专业劳动。

本书力图记录的是全球市场中一段最为激动人心、革命性的阶段。这段历史代表了期货市场那几乎不为人所理解的嬗变。我在 1983 年名为《期货的未来》中试图这样解释：

我们的市场，自久远以来就是农业独特专有的领地，然而这个市场一夜之间竟仿佛变为一整套金融业运行的系统；我们的市场，100 多年来一直严格地局限在有形的、可储藏的产品领域，突然间抛掉了所有的这些基础要求，迎来了牲畜、外汇、政府债券和股票指数；我们的市场，公认的势力范围不能越过证券领域半步，却堂而皇之地推出相应产品，将传承已久的界定一概抹杀；我们的市场，出生时就决定了其实物交割的命运，却打破了基因密码，生成了无需实物交割的产品；我们的市场，昨天还为人所不屑、不敬，今天却已然成为金融家族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是啊，在过去的 20 年间，金融期货的辉煌成就在整个商业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说明一个合乎潮流的观点本身富有多么巨大的力量。统计数字虽然不足为据，但仍可显示出变化的戏剧性。在 1971 年金融期货诞生的前夕，美国期货市场上的交易量为 1406 万张合约，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外国交易市场有如此规模。而 20 年之后，即 1991 年，美国期货交易所的期货和选择权的交易总量为 3.25 亿张，上涨超过 21 倍，这着实让人吃惊。而其中农业合约量仅占区区 19%。同年，国外日益蓬勃的金融交易市场成交量达到 2.3 亿张合约，数量也同样可观。

我命中有幸参与了本书所述及的这段历史。

利奥·梅拉梅德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1996 年 3 月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前 言

1 第一部分

西伯利亚的特快

第 1 章 和平与战争	3
第 2 章 逃离入侵者	11
第 3 章 使命	17
第 4 章 杉原门前的站立	23
第 5 章 别列斯多克综合征	32
第 6 章 再见日本，你好美国	43
第 7 章 芝加哥情结	51
第 8 章 法律和混沌	66

79 第二部分 市场之美

第 9 章 革命	81
第 10 章 进入交易池	96
第 11 章 利奥理事长	108
第 12 章 按照常规	119
第 13 章 第一块里程碑	134
第 14 章 不合常规的主意	144
第 15 章 IMM 狂热	153
第 16 章 我们是谁	160
第 17 章 新艺术十字军骑士	171
第 18 章 联储来了	181

193 第三部分 未来与从前不一样

第 19 章 酸性试验	195
第 20 章 宏伟的设计	206
第 21 章 权力和领导艺术	214
第 22 章 Merc 前往华盛顿	224
第 23 章 马不停蹄的交易	237
第 24 章 终极合约	248
第 25 章 难题的最后一部分	257
第 26 章 成年	262
第 27 章 重渡太平洋	268

281 第四部分

机器、市场和心灵

第 28 章	GLOBEX	283
第 29 章	预警	291
第 30 章	黑色星期一	298
第 31 章	自由落体	311
第 32 章	意外之果	320
第 33 章	联储又来了	331
第 34 章	永别了，武器	347
第 35 章	斗争	358
第 36 章	白宫来电	368
尾声	起床号	377

第一部分

西伯利亚的特快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 章

和平与战争

在西伯利亚某处一辆呼啸的列车上，我上了有关战略的第一课。那时我八岁，正朝父亲肩头那边瞧着。父亲让我这么做的。他全神贯注地下着一盘棋。对手是个陷入沉思的老头，他双肩拱起，长而白的手指不断捋着唇上浓密的灰色胡须。慢慢地，老头一边嘀咕着一边从座位上朝前挪了挪，好像劲头上来了。

“将！”他用意第绪语突然叫道，他的“卒”顶住了父亲的“王”。时间仿佛永远停滞住了一样，父亲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他后来告诉我，他正在三种计策中权衡着。

我记不起父亲是如何反攻的，或是谁最后赢得了胜利。然而，触动我的是两人的镇静和走每一步棋时的深思熟虑。他们好像没有听到车轮震动着薄弱的车身发出的那种铿锵节拍。雪霰“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并化成了水流缓缓地流淌下去，不过这对两人并没有什么打扰。

回首 1940 年年末的那一情景，一切几乎不太真实。两个男人下着棋，悠闲地思考着每一步棋着，仿佛占有了世上所有的时间，又无处可去，似乎除了这局棋赛就

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了。然而事实上，时间很快就逝去。我们是一车的难民，为了生存要逃脱纳粹的追捕。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啊，我们就仿佛是别人棋盘上的“卒子”。

那场席卷欧洲的灾难将所有一切都颠覆了。什么种族、语言、观念和意识形态，全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并将我们这样的家庭送上流亡的生涯。我们还算幸运，家庭的主要成员——母亲、父亲和我仍然在一起，虽然有时饥寒，身体却依然健康。我不知道留在柏利斯托克的祖母们、我亲爱的玻波尔姑姑，还有我的朋友们，他们能不能侥幸逃出战争这头野兽的蹂躏呢？

在我们沿着西伯利亚的脊梁——5 800 英里长的西伯利亚铁路^①前进时，这段旅途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在这样一片完全未经涉足的莽原上，几千英里之内都看不到任何人踪兽迹，这辆除了汽笛不响什么都响的列车简直不值一提。在这一带寒冷的边远地区却蕴涵着一种美，一种粗犷的美。熊、老虎、黑貂、驯鹿、还有狼，自由自在地穿行在地球上含量最丰富的几处自然资源宝藏之间。人们用“聚宝盆”来形容西伯利亚，这儿有全世界 1/5 的黄金和白银，1/3 的铁矿和木材，还有数不清的天然气、石油和煤矿蕴藏。它又是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最大一片区域，400 万平方英里，相当于整个美国的面积：满是沼泽的平原、茂密的森林、荒僻的高原还有峰峦嶙峋的山脉，这一切真叫人眼花缭乱，混淆了时空的界限。

因为缺少道路，这辆跑在孤零零铁道上的列车，就是一种全能的运输工具，像是西伯利亚运输系统的载重骡马，又像是那时装满孩童和叮叮咣咣的家什、送着成群结队逃难的人们穿过欧洲乡间的牛车一样。虽然难民们惊慌失措，拉车的牛却始终不知道时间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紧迫。我们的机务长，好像同样不在意我们内心的煎熬。或许是为了省油，或许是因为天气，或许是路滑，列车速度不紧不慢，车轮的节奏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没有任何小路可走。确实是这样，因为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经常在指定的中转站（在乌姆斯、新西伯利亚或是伊尔库茨克）孤独地呆上个把小时，等待我们西行的同胞们经过，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我们的旅途直至西伯利亚的最东端——海参崴港。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扛着铁锹、推着轮车，在斯大林建设苏联工业化的号召下建成了一座座钢铁厂。当战争爆发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他们的工厂从易沦陷区迁往西伯利亚。也就是在这块地方，一些罪犯和政治犯被流放在矿区和劳动营中劳作；还是在这块地方，数百万人在战争前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死去，没有人知道。

然而我不希望跑到故事前面去。回忆总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旦回忆开始，思绪奔腾而来。不过回忆也有神奇的力量。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点停下来，重新回想一遍，将那些陈旧的形象赋予崭新的意义。关于回忆还有一点，它是一道安全阀。

① 始建于 1891 年，连接莫斯科与海参崴以及其他亚洲港口之用。

通过回忆你幸存下来。

每个人迟早会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生命艰难的时刻——有伤痛，有失败，有不公。我们都愿意相信随着生命的继续所有这些都将遗忘，但你永远不能真正地将这段个人历史遗忘，因为正是这段历史塑造了你，并在你的阅历中留下了婆婆的印记。

将近一年半之后我才登上那辆西伯利亚的列车，这一年半时间以来我的家人都在跟盖世太保或克格勃捉迷藏。或许我太小，或许父母庇护得太好，所以不能完全意识到被逮住的后果。不过我还是感觉到了我们的逃亡。虽然那段时光有时让人觉得像是一场辉煌的冒险，但一直伴随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在逃脱一种非常邪恶的东西，它好像是一个巫师，近得连口中喘息的热气都已经撩上了我们的脖颈。

我是伊萨克·梅拉姆多维奇和菲格尔·梅拉姆多维奇的独生子。父母都是意第绪语学校的教师。母亲在格罗瑟学校教一年级，这个学校是别列斯多克第一所政府批准的、可以用意第绪语教授所有课程的教区学校。学校正式的名字叫格罗瑟人民学校，是按创建人即第一任校长的名字取的。我父亲在高年级教数学，而且写了三本该专业的书。这些书成了波兰意第绪学校的标准数学教材。这些学校还是世俗化的，并不进行宗教方面的教育。对于当时在整个东欧新兴发展起来的现代犹太社会群体来讲，这些学校是宣传自己文化的窗口，并且使他们引以为豪。在那里提供全套课程的教育，为此也受到波兰政府的嘉奖。这便意味着，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甚至大学，这可算是凤毛麟角了，因为犹太人几乎难以获准进入高等学府。

我的父母一般早上天刚蒙蒙亮便离开家，傍晚回来。那段时间里，通常是外祖母看管我，但有时候，父亲的妹妹玻波尔姑姑会过来照料一下，那可尤其让我高兴。她当时二十出头，可算是个美人儿。外祖母叫伊特科·凯尔拉·巴拉金，我则叫她“巴巴”。我们一块儿住在别列斯多克第七法斯托夫斯卡大街的一所房子里。别列斯多克位于波兰东北部，以出产纺织品和制成品而出名，毗邻俄罗斯，大约是在波兰首都华沙和立陶宛首府维尔诺（今维尔纽斯）的中点上。别列斯多克斯是一个政治皮球。1310年建市，1795年归附普鲁士，1807年属于俄罗斯，1921年则并入波兰的版图。

然而，真正让别列斯多克闻名于世的不是纺织匠，而是它的那些面包师傅。在过去的几年里，别列斯多克由于美食而著称，尤其在美国，那儿的面包屋、熟食铺和食品店都出售“别列”包，一种摊平的早餐面包卷，这便是别列斯多克师傅们的创造。与更为流行的“包兄”百吉包不同的是，“别列”包中间没有孔，这样便腾出更多的地方涂抹奶酪。作为生活在这个出产“别列”饼的城市的孩子，我热爱“别列”包，吃的时候喜欢加上青鱼肉或青鱼尾。我还喜欢外祖母亲手做的“查拉”包，一种抹上蛋清的麻花状松软面包条。

在厨房的中央，摆着一个大肚炉子，看上去像是一尊无头的黑菩萨。它烧的是煤炭和木块，用量非常大。一大早，天还没亮，外祖母就会起来生火准备早餐。木块

燃着了，好似起了一场微型的森林大火，先是噼噼啪啪地响着，然后腾起黄色的焰苗，火光透过炉子前面的通风口，使黑暗的屋子里产生出奇特的光影效果。这架炉子担负着双重任务，在漫长的冬季，它要给我们取暖，还要为我们烧饭。不过我们还算幸运，在餐厅的显著位置，还有一座时髦的白砖壁炉。说它时髦，因为壁炉的烟囱用砖砌在墙里。有时，在那个神秘的炉门里面会用小火煨上一大罐杂烩汤，那个炉门我被警告过不要乱碰。杂烩汤是一种浓稠的肉汤，里面有牛肉、土豆、洋葱、胡萝卜、青豆，放上调味料，加上水煮。这可是真的煮。“巴巴”会从前一天晚上一直煮到第二天中午，她是那么小心翼翼，整个时间里绝不许汤料泼出一点，那汤绝对称得上是“玛纳”。

教师的生活相对来说是舒适的，在社区里也享有一定的声誉。父亲是犹太城委会数位委员中的一名。我们住的小木屋是母亲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她父亲在我出生之前便去世了。这是一所带走廊的平房，有一间卧室，一间有坐卧长椅的大餐厅，一间厨房，一个阁楼（外祖母的睡房，这在犹太人家中可是少有的奢侈）以及一间室内浴室。父亲（我当时相信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亲手排设了浴室里的管道，并非常自豪地向我演示如何拉下链子，水是如何从头顶上的箱子里喷涌而出的种种过程。

作为一个还未上学的孩子，我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自由行事。街道上的孩子大多比我大，整天待在学校里。而我却经常游荡在外头，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我自己创造游戏，或是将母亲头天晚上讲的故事表演出来。有时，那张坐卧长椅会变成一艘海上的行船，我呢，则在船上和一群海盗搏斗。有时，我又成了一名探险者，在我和邻居之间的狭小空地里偷偷摸摸地走来走去。

最终，上学的日子到了。1939年8月，在我们即将被混乱的战争扫地出门的时候，我上了一年级。我刚满七岁，非常希望在一天中可以看见父母亲。不过他们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向我解释说，到他们任教的学校去上课，这不好。他们不想让学生、家长或是同事们认为我有优势，或认为我是“老师的宠宝宝”。所以，令人难受的是，我进了另一家意第绪语学校。分离是痛苦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离开了父母和我的“巴巴”。我感到害怕，在某种程度上，我还觉得是被遗弃了。在我与新教师见面时，面对她向我伸出的手，我竟然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扇了它一巴掌。母亲当时尴尬得无地自容，我真是令她气得不行。

1939年有近350万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波兰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犹太散居点。他们都是波兰已繁衍千年的犹太文化的传人。别列斯多克160万居民里，有4万左右是犹太人。我们混杂在一起，当然犹太人通常住在特定的犹太社区中。没有歧视性的所谓“犹太区”，但却存在对犹太人的排斥情绪。这种情绪在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声名狼藉，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小孩子，也可以经常听到：“犹犹，滚到耶路撒冷去。”我还能记得当时听到这种侮辱时的困惑。耶路撒冷在哪儿？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不过这还是可以忍受的。不管怎样，父亲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别列斯多克城委会的委员——波兰正在努力进入一个“启蒙时代”。

别列斯多克城南大约 100 英里开外，就是卢布林城——因那儿的《塔穆德经》和犹太神秘哲学研究学者而驰名全欧的“犹太人的牛津”，16 世纪第一所犹太高等学校在此建成。1939 年，240 万人口的卢布林城号称有 4 万犹太人。战后，任何一个城市中剩下的犹太人都出不了一个“祈祷班”，即由十名犹太男性组成的进行犹太法定祈祷的团体。波兰历来都是邻居们的受气包。“波兰”的词源是“波兰涅”，意为“平原上的人们”，指的是那些于基督诞生前便定居在欧洲的斯拉夫人。波兰边境少有山川，因此不断成为邻国扩张版图野心的牺牲品。1795 年，它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从地图上消失。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重生。后来，即 1939 年，波兰又遭德国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由此点燃。它再一次被蹂躏，起初是德国人，接下来又是苏联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将由波兰管制的属于东德的 5 万多平方英里的领土和 10 万平方英里的波兰东部土地同时归入苏联）。在波兰停止存在的阶段中，罗马天主教堂成为波兰国的象征，维护着波兰的语言和文化。

同样，通过犹太教会堂、拉比和学者们的努力，犹太社团和文化能够保持完好。不过，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犹太世俗化运动逐渐波及欧洲的 20 世纪初。我的父母亲都是改革派犹太人，他们已然摆脱了父辈们传统行事方法的束缚，成为新一代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世界公民。这些具有尘世观念的犹太人本身就有权利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他们的理想世界观里，种族和宗教差异不再重要，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记得母亲唱过的歌中，有一首便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弗里德里希·冯·席勒作词的那一段——《四海皆兄弟》。（这首颂扬平等的丰碑之作竟是出自一位德国诗人的笔下，这真是讽刺）。不错，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都将此观念奉为真理。直到后来的生活中，在屡次受挫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父母教导的那样。

这样，正统的做派和宗教的形式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被尘世的观念替代了，与犹太的道德观、历史、文学、文化、节日，特别是意第绪语言缠绕在一起。我父母可谓是热情的意第绪语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政府按照国联签署的条约承认意第绪语的存在，并给予犹太人在初级教育中运用这种语言的权利，这也就保证了犹太人的民事和政治上的平等以及文化上的自治。

虽然和非犹太族人一起时我们说波兰语，意第绪语依然是我所学的第一种语言。无论是在家里、上学时或是街上，我们都说意第绪语。不过，那是一种书面化的意第绪语，即纯正，语法完美——不管怎样，我父母毕竟是排位最高的意第绪语教师（直到我成年以后，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意第绪语也有骂人的脏话）。父母是东欧犹太人的后裔，那儿的犹太人成百年来穷困潦倒、受尽迫害，还要遭到沙皇、哥萨克人

和一帮地方官僚们的种种凌辱，组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竟好像成了他们打发时间的最好方法。尽管他们贫穷，尽管他们受到暴力对待，尽管他们被迫生活在所谓“栅栏”的指定区域里，他们依然信奉上帝，上帝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伟大的、唤起希望的弥赛亚。“对于他们来说，《圣经》是活生生的现实，”历史学家欧文·豪和肯尼斯·李勃这样说道，“它代表着承诺，它是智慧的源泉，它是行动的导向。”

在这一点上，父亲与他的祖先开始有了不同。虽然他还是坚定地相信犹太文化的价值核心是学习，但他对于弥赛亚式的希望已经兴味索然。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因此并不能感受到履行仪式时带给精神上的那种愉悦。而我的母亲，尽管她绝对不碰教规禁食的食物，可她还是波兰犹太人中较早改革的女性之一。事实上，与当时多数同龄妇女不同的是，菲格尔·梅拉姆多维奇在家中平等地分担家务，在外面则是教师互助会中的一名专业成员，她对于改革思想的执著与热衷丝毫不逊色于她的丈夫。在他们这一帮人中，有些偶尔会聚集在我们的餐桌旁，男女的权利看上去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大家都认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抒发自己想法的权利，这不，他们一边喝着茶，吃着“巴巴”烘烤的蜂蜜蛋糕，一边讨论着波兰犹太人新时代的到来。欧洲生活文化中的一件怪事便是妇女当众提及丈夫时应该叫他的姓。所以，当母亲说到父亲时，她会称他为“梅拉姆多维奇”。名字是用在私下谈话里的，母亲用父亲的中间名字叫他：莫伊舍。

我不能肯定究竟父亲是在几岁时摒弃了犹太教，因为他在犹太儿童宗教学校中度过了他的幼年时光（实际上，他有相当深厚的犹太教知识）。我猜大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时欧洲许多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从宗教转向了科学和人文主义。他们在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中挣扎：一方面他们继承了哈希德派中的传统主义，另一方面又为现代主义这一横扫东欧犹太社会的尘世化进步思潮所吸引，这是18世纪哲学家摩西斯·门德尔松和戏剧家哥特赫尔德·莱辛的思想遗产。这两位现代犹太思想的先哲共同缔造了犹太改革思想的观念，并且发公开谴责犹太分裂主义的先声。摩西斯·门德尔松，这个来自德国德骚“犹太区”的小驼子，作曲家费列克斯·门德尔松（出生时即受礼为基督徒）的祖父，勇敢地担当起了把犹太教推广出“犹太区”并将它领向新启蒙时代的使命。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犹太教的信条不会与一个非犹太世界中的生活起任何冲突。门德尔松的革命性思想发展成了现代犹太尘世化运动，这一运动的副产品便是大批世界性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科学家的涌现——人数之多，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微小比重是完全不成比例的。20世纪早期，这场世俗化运动虽然还处于幼年阶段，但对于欧洲犹太人中的年轻一代已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像我父母及其同龄人吞入了它的汹涌潮流，将他们卷离了父辈们的传统。父亲于1923年11月26日毕业于德列日大学，修完了现代学、数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课程。

这样，父亲最欣赏的作家（晚些时候也成了我的）是用意第绪语写作的埃佐克

L. 佩雷兹也就没什么令人惊奇的了。佩雷兹是意第绪语文学巨匠之一，与笔名为蒙德尔·莫车尔·斯夫利姆（书商蒙德尔）的沙洛姆·雅各布·阿卜拉莫维茨和笔名为绍勒姆·阿莱西姆（和平与你同在）的萨拉蒙·拉宾诺维奇齐名。佩雷兹是所谓的“启蒙者”，对犹太历史和民间传说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却在传统教义和蓬勃而起、越来越为新兴犹太大众接受的世俗文化运动中发现了共通之处。事实上，佩雷兹给古旧的宗教理念和仪式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并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实际运用。与佩雷兹一样，对于神圣的玄学和正统的天地概念，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观念，父亲都已不再相信。相反，父亲信奉的是比《十诫》中信条要求更高的道德观。其实，父亲的道德观就包含在佩雷兹的短篇小说《若非更高》中。道德观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人存在的内在需要，如人类之间的平等一样。

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数学家，从行业角度来讲是一名教师，而从性格本质来说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在所有这些头衔之上，还要加上“顽固不化”。只要认准了一种立场，在写作或是做人哲学中处处都会流露出这种态度。他身材矮小，发际渐退，但却腰板笔直，在整个一生中，他都是一个不昧良心、独立行事的人。有时候，这条人生道路也会拐上几个奇怪的圈子，就像纳粹挺进别列斯多克前不久发生的事情那样。

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起了全线进攻，由此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别列斯多克对于第三帝国来说，几乎算不上什么军事威胁，可德国的轰炸机还是飞到了这个手无寸铁的城市上空。它们的炸弹随机地落在了那些“该你倒霉”的目标之上。其中之一是市政厅，这座19世纪早期的大厦便这样化为灰烬。“闪电”部队的兵临城下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市长匆忙召集城委会会议，父亲正是其中的一名委员。当时只有一个问题：城市委员会的大厅已经不见了。而城里主要的犹太教会堂格罗伊瑟堂却依然完好无损，因此市长询问拉比是否可以在那儿召开城委会。拉比答应了，但条件是所有的委员们必须戴上犹太圆顶小帽，这符合犹太教中关于进入犹太教会堂的条规，以示对上帝的尊敬。市长和所有的委员们一致同意，只有一个人唱了反调，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恰好是少数犹太委员之一，却说如果戴了帽子便拒绝进入会堂。按照他的原则，他不会认同任何形式的宗教，而戴上帽子就是重演一种仪式。真是不折不扣的梅拉姆多维奇。

虽然他抵制了那次会议，但他还是同意了一起逃亡的计划。市长和全体城委委员——别列斯多克市的政治中坚，竟企图在纳粹到来之前和其他一些有头有脸的市民们一块儿离开这座城市。这些市政官员们听说纳粹会利用别列斯多克的知名人士作为人质。如果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人质就要负责。在他们天真的想法中，留下来的家属们将会是安全的。但我们不知道的是，纳粹会阴谋将犹太人从小镇和村庄中撵出来，强迫他们长途跋涉到大城市，最终在那儿集中，从而与波兰人隔离开来。在一些城市中，犹太人被限制生活在犹太区中，别列斯多克以及华沙、卢布林、克

拉考、威尔诺还有罗兹就是其中主要的几个，后来600万犹太人像牛群一样被运送到死亡营，在那里他们被屠杀殆尽。这可比世界听说达乔、布亨瓦尔德、奥斯维兹—比尔克瑙、迈达内克、贝尔根—贝尔森或是忒瑞布林卡要早得多。到1939年9月底，德国和俄国便准备瓜分波兰了。虽然当时斯大林正指望与希特勒签署互不侵犯协定，俄国还是和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达成协议，获准建立军事基地。作为回报，俄国将那时仍是波兰领土的维尔诺返还给立陶宛。距离波兰边界不远的维尔诺历史上就是立陶宛的首都。欧洲地缘政治的鬼把戏当时可真是频频上演啊。

当然，我对父亲的出逃计划一无所知，直到城委会后好几天之后。那时已经半夜，天上没有月亮。母亲叫醒了我，给我穿好衣服。

“我们要跟你爸爸说再见了。”她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拉着我的手走出家门，来到别列斯多克空荡荡的大街上，四周一片漆黑。尽管我看不到任何战争的迹象，可我还是可以听见周围建筑物不断回响着高射炮射击的声音。

在一个空空的停车场上，我们遇上一群人，他们在一辆帆布顶棚的大卡车旁来回走着。城委委员的孩子、妻子和家属们在那儿与他们道别。我看见了父亲，便跑上去。妈妈眼里含着泪，所有人眼里都含着泪。父母亲拥抱了片刻，然后父亲和其他委员排队登上卡车，开走了。没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我记不得当晚父亲到底说了些什么，不过他在道别时用了一种试图让人放心的语调。是政治让他离开的，或许也能把他带回来。可20世纪30年代的事是不会如此流转的。安全和自尊这样一些标准已不再重要。欧洲是在政治发展的推动下昌盛起来，这不假，可倚靠战争机器——坦克、飞机和机械化军队的强权政治却像当年从亚洲突袭而来的蒙古游牧骑兵那样横扫了这片土地。

我还未听过炸弹爆炸声音之前，战争在我脑海里更多的只是一种虚张声势，而不是纳粹的万十字标记。我幻想战争可能是在别列斯多克大街上的一场斗剑。勇敢的别列斯多克人对阵野蛮人，从一条街道打到另一条街道。战争可能只会大街上进行。旁边小街上的生活，比如说我生活的这条街道，还会一如既往。

这种幼稚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推翻了。突然之间，整个世界变得喧嚣可怕。教堂的钟响着，防空警报响着，流言纷纷，炸弹爆炸声和炮火声响彻街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面孔上流露出的恐惧——纳粹那摧毁一切的战争机器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纷扰着人们的心。

随后看来，我对战争的幻想虽然幼稚，但也并非差得太远。不幸的是，波兰军事装备还只是19世纪的一些老古董，就像我们在城里的房子一样。淌着泥泞，冒着冷雨，挥舞着长矛大刀，波兰骑兵就这样向德国的坦克发动着冲锋。27天后波兰便沦陷了。

现在我们只能等待着征服者的到来和命运的裁决了。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2章

逃离入侵者

我在理发店里等着理发。理发师把我放到一张儿童专用的椅子上，这样高度正好。然后他给我裹上白色的罩衣，笑了。突然，街上有人喊道：“关上门窗，客人来了。”一个男人跑过理发店的窗前，尖叫着：“关上门窗，客人来了。”

母亲拽上我的手，将我从椅子上拖了出来。她飞快地替我穿上大衣。九月的气候已经有些寒冷，匆忙离开时我的大衣还来不及扣上。街上许多人在奔跑，在拉窗帘，在关窗户，在关门。整个城市潜伏起来。

“快，莱勃尔。”母亲一边催促，一边拉我的手。我从未见过她走得这么快。虽然她再没说话，可我能够感觉出她的焦虑。但我想不出我们究竟是奔向什么东西或是逃离什么东西。到达目的地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因为我们去的不是自己的住宅而是父亲位于城郊的房子。这个两层楼结构的砖石建筑是父亲从小长大的地方，祖母、外祖母和玻波尔姑姑也都住在那里。轰炸开始前，也就在他离开别列斯多克的前几天，父亲将我们搬过来。他以为在轰炸中砖石房子会安全些，另外我们也能够呆在一起。人越多越安全，他曾对母亲这样说过。

在我们到家之前，玻波尔姑姑和两位祖母就已经在焦急地等着我们。所有的门和窗全部关得严严实实。父亲已经用油漆把楼上大多数窗户都涂成了黑色，因此在灯火管制期间任何光亮都透不出去。像别列斯多克的所有人一样，我们也藏了起来。

德国人是列队正步进入别列斯多克的。关于他们来到的消息像未经抑制的病毒一样散布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全城笼罩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之下。波兰人无论从武器装备上和人数上都很容易被超过，因此这几乎算不上什么较量。胜利者现在开始清点战利品了，波兰军队完全做不出任何抵抗。

因为住在城郊，我们最早目睹了他们的到来。透过一扇微开的百叶窗，我们可以瞥到这些抵达的入侵者。坦克车最早开了过来，老远你就能听见它们雷鸣般的轰响。这些多得不可计数的家伙，像一个个怪异的机器人缓缓驶入别列斯多克。当经过我们房子时，它们发出了一种古怪尖利的噪声。奇怪的是，后面竟跟着五个骑马的人。我就这样充满好奇地透过百叶窗看着。他们身穿军官制服，其中一个抬起他的手，好像在向那一长列卡车队伍发布着命令，车上的数千名士兵，沉默而阴郁。

我们被迫用另一种方式来审视这个世界。虽然表面上还有少许的人道，但并没持续多久。随即而来的就是命令。在外行走禁止将手插在口袋里。街上禁止聚集。所有人必须遵守六点钟开始的宵禁。如有违反，就地处决。

父亲房子的街对面是一座公墓，高高的树木中间，一排排的墓碑整齐洁净。姑姑曾经告诉我，有些坟墓的年代像那些树木一样悠久。对于死者来说，这儿就是终点。而对于活着的人，这却是进城的一条捷径，可以节省整整十分钟的路程。白天，这儿人来人往；宵禁后，便几乎空无一人，但我偶尔可以瞧见有些个胆大的家伙小心地穿行于墓碑之间，神色匆匆。通常在晚饭后，近黄昏的时候，我会坐在楼上起居室的窗前。我曾用钥匙偷偷地在上了漆的窗玻璃上刮了个洞。透过那个小洞我往外望着。我什么事都不做，只是边看边想着事情。世事开始变得丑陋，敌人的残暴显现出来。

这都发生在我的眼前。一天傍晚，我无意中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快速地转入那条公墓里进城的小路。因为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所以她走得飞快。她低着头，好像这样可以让她不被别人发现。突然，我看见她身后不远处来了两个德国士兵。当他们赶上她时，他们抱住她，将她摔到地上。他们大笑着。其中一个揪住了她的胳膊，并用手堵住她的嘴，可还是给她叫了出来。另一个压在了她的身上。这些年来，这幕景象不断地闪现在我的记忆里。虽然一直到十岁左右我才明白所看到的東西，可我却永远忘不了那件事情。它不时地浮现出来，现在还是如此，就像一场反复来临的噩梦。我想我记得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暴力——我听到了那姑娘的尖叫。这是我所目睹的唯一一次强奸行为。

德国人到来后不久，我们搬回了自己的家。轰炸已经结束，所以没有再住在市郊的理由了。另外，母亲担心我们的空房子会引来抢夺的人。还算好，我们回来了，

因为之后不久他们就来找父亲了——正如他所预料到的那样，他会作为人质被抓起来。在当时，任何不服从他们命令的人都会被定罪而枪毙。一旦他们进入了我家，这场战争就成了一种私人的事情。我看见了他们的靴子——噼啪作响的黑色靴子，但我不记得看见他们的脸。可能我太害怕，没敢抬头看。还有他们严厉的咆哮声。几个人在房间四处转来转去，翻查着抽屉和橱柜。有一个看见了父亲的衣服便开始叫嚷起来。他在哪儿？他们叱问道。他们的语言与意第绪语有些相似。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叫喊，也没有听到任何人对我母亲这样嚷过。她尽可能保持镇静，虽然我看见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她的恐惧传染了我，我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盖世太保走后，我们总害怕他们会再来。那天晚饭桌上一片沉默。从此以后，所有人开始小声说话。母亲和外祖母之间也基本没有了交谈。

他们的忧惧感染了我。我还在等带剑的武士，这有多傻啊！根本不会有什么斗剑。别列斯多克的武士们在哪儿呢？我不禁要问。难道他们都和父亲一起离开了吗？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能再见到父亲吗？他在哪儿？母亲说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父亲也会与我们联系上的。可她眼中的惊慌证明她说的都是谎话。我觉得害怕了。

虽然母亲又回到学校去教书，她还是不准我离开家门一步。每天我都和我的“巴巴”待在家里。有时过来一个朋友，我们便扮大兵玩儿。孩子们中间的谣言和故事也在传来传去，说谁家的亲戚和邻居被侵略者抓到哪个地方干活儿去了。米戎，那个开杂货铺的，被拖出小店，打断了手，就因为两个德国兵说他的面包要价太高。罗切尔·维斯伯格被抓走了之后就音讯全无。哥德尔伯格家则被一把火烧成了平地。

又过了两个星期，至今波兰的犹太教会堂全部被付之一炬。针对犹太人进行的残酷的暴力活动变得经常。虽然街上凄凉得可怕，但别列斯多克的情况还没有发展成疯狂的种族清洗，原因之一是别列斯多克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战前协定的一部分。条顿骑士、普鲁士人、德国人、苏联人还是波兰人，谁统治都没区别。只要是对犹太人，他们都一样。而不管犹太人遭受到何种苦难的境遇，当地人根本没有丝毫的怜悯。例如在1934年，波兰政府公开食言，取消了1919年做出的使少数民族得到民事和政治平等权利的保证。当时，犹太人占到波兰总人口的10%。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加频繁。犹太人进大学和专业学校在人数上有严格的限制。这种歧视性的法规和限制性的做法成为经济上的桎梏，而到了1935年，随着老革命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波兰总理马绍尔·皮尔苏德斯基的去世，情况变得愈加糟糕。到1938年，一连串反民族法规在全国通过，竟包括取消侨居海外的犹太人公民资格的规定。

所有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诺都被扔到了九霄云外。反民族情绪是转移革命运动的现成的避雷针。不过，犹太人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宗教、教育和文化传统，他们甚至试图组织政治性社团。20世纪30年代晚期，犹太人在城市选举中不再支持复国主义者，他们投向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同盟党”。这样一来，后者在1938年和

1939 年中，获得了包括别列斯多克在内的多个大城市中选举的压倒性胜利。父亲就是这样进入了城市委员会，他就是一名同盟党人。父亲常说，不管用哪个名字，专制国家总是会偷走一个人的思想。在他看来，对知识分子自由的妥协或许是不存在的。

作为一个孩子，我还不能领会反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我所知道的是，我们过得还可以，父母是受人尊敬的教师，还有一个与我们平行的世界存在，在那儿非犹太人都不讲意第绪语。父亲常常对我解释说，人们做事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可政治领袖又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些规矩。母亲也同意这种观点。有时，父亲、母亲还有他们的朋友们，会对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波兰为何会首当其冲这些问题而激烈争论。

历史、地理和政治是父亲最喜爱的学科。他懂得非常多，这也让我对什么事情都有个了解。父母亲一直在解释着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父亲说，孩子们应该了解历史和政治上的事情，因为它们总是在不停地重演。孩子们必须一直明白周围发生的事情，这样他们就能有所准备。几岁开始学习都不算早，他这样说道。不过教育孩子还是母亲的事儿。我们的关系更亲密，因为她是个容易叫人亲近的人。她不但聪明、具有洞察力，而且有那种常人所说的第六感觉。我还没问，她就知道我要问什么，并且总是可以加以回答。后来，无论我再怎么当心，她总还是能知道哪一天我交易得非常差劲。

这样，即使还是一个孩子，我就已经明白历史和政治中的一些东西可以唤起大人们心中的热情。虽然我生性腼腆，可我喜欢待在大人们身边，而且学会了仔细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当然我不可能完全听懂其中的意思，但等我六岁的时候，我的耳朵已经可以辨别出谈话中感情的跌宕起伏。只要谈到政治，他们说话的分贝一定是高高的。之后，父母会向我解释一番。

不过，如果必须学习一门课程，千万别忘了政治，即使幼年时也是如此。而在纳粹疯狂地将战火烧到孩子们身上之前，我和我的同学却完全没有受到这一方面的教育。战事肆虐的欧洲让父母迷惘，同样，我们也发现自己面对着的是多变和不定，以及扭曲了的行为准则。整个世界不知不觉地就吞下了希特勒放下的诱饵，并且正在付出代价，犹太人被有组织地灭绝：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孩子。

活下来需要脑子和运气，还有时间。可到 1939 年 9 月，欧洲波兰的犹太人的命运却被压缩成只有区区几天。当波兰拒绝放弃但泽港，德国便发动进攻，战争从此爆发。德国人从西线打了过来。17 天之后，苏联派出的部队从东边进入。又过了两天，德、苏军队在布莱斯特·利托夫斯克附近相遇，波兰就像一块太妃糖一样被分开了。这让犹太人四散奔逃，有大约 30 万人逃到了苏占波兰，别列斯多克也包括在内。

就在几周里，别列斯多克从波兰人手上转到了德国人手上，又转到了苏联人手上。别列斯多克人绞着自己的手，颓唐至极。那些曾经长期治理过这座城市的长者

们，现在的境况正如托尔斯泰对历史的描写：最有权力的将军经常不如手下的步兵自由多少，因为他们虽然企图竭力去操纵一些事件或摆布一些力量，可到头来却成了这些东西的囚徒。

刺鼻的浓烟逐渐消散，露出坍塌了一地的石块和砖瓦。敌人冲锋时子弹的呼啸声、机关枪的哒哒声还有郊外迫击炮的轰鸣声，当这些声音一同散去之后，一种奇怪的寂静降临在别列斯多克，仿佛这座衰老的城市停下来用力喘息似的，或许是苟延残喘吧。别列斯多克易主的时候到了。

母亲带我去目睹了这场奇怪的仪式。我们与数千人一起，排列在别列斯多克的主要大道两旁，大道被中间那条经过精心修剪、长着五彩斑斓的花朵的绿地划分成两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场面：德国军队沿着道路的一侧，迈着正步走出城去，过了一会儿，苏联军队从另一侧凯旋似地开进城来。尽管当时明显地有一种节日的气氛，可人们还是无声无息地注视着纳粹离开。看到仇敌撤走，没有人敢公开表示一下自己的高兴。不过，随着苏军士兵的出现，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欢呼声，突然间，红旗在四处飘展开来，欢迎这些正在到来的“解放者”。现在回顾那个场面，别列斯多克人的心态实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波兰人好像总是希望苏联人占上风，因为这样他们生还的概率大些。毕竟苏联人从前占领过波兰。同德国人相比，他们还算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前景总让人心里七上八下的。

即使和父亲一起逃走的别列斯多克的精英们对新来的征服者也抱有一定的信心。为苏联军队殿后的竟是那些城委会委员和其他城市的显贵们，这真让他们的家属高兴，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可父亲却没有回来，只有他和另一位密友不在回归团内，这实在让母亲伤心。他为什么没能和其他人一道回来？难道他不想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其他人都知道和苏联军队一同回来，除了父亲？

他怎么样了？没人知道。回来的人告诉母亲说，他是个顽固的笨蛋，他拒绝回来将注定他一辈子要担惊受怕、躲躲藏藏。他们就一直说着这些东西，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事情的变化有多奇怪！一个星期不到，所有跟着苏联人回到别列斯多克的人全给GPU——可怕的克格勃的前身抓了起来，并随即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我们从此就再没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苏联人与之前的德国人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他们并不想进入别列斯多克的社会等级制度之中。实际上，回到别列斯多克的城委委员和其他人，自己让自己栽了进去。虽然事实让人痛苦，可一切都清楚了。父亲是对的。他不可以回到别列斯多克来。如果他留在波兰，等待着他的不是纳粹的一颗子弹便是西伯利亚的流放。他现在真正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了。

他们就像德国人一样地来找他。这些不是士兵，也不穿皮靴。他们着便装，可话语依旧严厉。母亲可以与他们讲话，因为她的俄语非常流利。不！她不知道父亲在

哪儿，也不知道他何时会回来。是！她一听到他的下落便会立即通知他们。想得美！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难道他转入地下成了一名游击队员？母亲怀疑。他还安全吗？发生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你总是往坏处想？”我的玻波尔姑姑经常说，“你用不着担心。”她对我母亲说。父亲非常聪明，又精明，不可能被抓住，她坚持说道。不管怎么说，他难道还能像其他委员那样被抓起来吗？

这没用。“那些回来的人们又怎样呢？”我母亲反问玻波尔，“他们也是聪明的人哪。”母亲经常朝最坏的地方想。对她来说，危险无处不在。特别对于犹太人。

一个逃亡的犹太人，能够摆脱企图将他毁灭的敌人的几率有多大呢？而在一个战乱纷纷的世界中你又能往哪儿逃？很显然，如果我父亲仍然活着的话，他最需要的是时间——能够想出问题的时间。想出一个计划来。甚至斯大林也通过互不侵犯协定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希特勒并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否则他将在东面受到苏联人的威胁，这也为他赢得了时间。

如果父亲和我们联系上就好了。又一次，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等待和恐慌之中。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3章

使 命

苏联人接管别列斯多克已有两周了，父亲依然没有任何消息。一种不安的情绪钻进人心，生活的历程，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铺展了开来。虽然母亲勇敢地将她的绝望遮掩起来，不让我发觉，可她太容易感情用事，什么都藏不住。在我面前，整个白天都是微笑和闲聊。可一到晚上，背着我，情绪便沉静下来，传来了喃喃的低语和问题。父亲怎样才能与我们联系啊？母亲对着玻波尔姑姑，问得出了声。我们没有电话，通信完全停止，出入别列斯多克也受到了限制。战争改变了以往一切显得正常的事情，俄国士兵和秘密警察们监视着火车和车站。即使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压抑的气氛也是非常明显的。“巴巴”用她安慰的神情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可我们做不到。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反正已经入夜，就在那时门上传来一声重重的敲击。原来是切卡·伦敦，她住在几条街区之外，是父母的老朋友，时不时会来串串门。她是街坊中少数拥有电话的一位，匆忙聊了几句之后，母亲便和切卡冲出了家门。我透过窗子瞧着，树顶那一轮弯月让我看得见她们，直到她俩消失在黑暗之中。

父亲和我们联络了。他打电话给伦敦太太，让她来喊母亲。一个小时不到，母亲回来了，她带给我们这样一个消息：父亲是安全的。她和他讲了话。还有，不出所料，他有一个计划。他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一个决定，他不能回到别列斯多克来。而现在，不用说，他已经被当成了一个从苏联统治下逃脱的犯人。这些年来，他的种种观点已经广泛地出现在《别列斯多克时报》（本市的犹太人报纸）所刊登的由他署名的演讲和文章中。

父亲生于1904年1月2日，是金坡和菲格尔·梅拉姆多维奇的儿子。金坡是一个木匠，早年便从一个脚手架上跌落身亡。他们生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父亲的弟弟在十岁左右就死了。父亲是在一个典型的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时代起，他的左手肘关节就不能活动，这是一场严重天花的后遗症。但这一残疾几乎不易察觉，也没有妨碍他异常灵活地使用他的双手。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灵巧和匠人般的技能。自从成为中东欧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斯弗塞”的成员之后，艾萨克·莫伊舍·梅拉姆多维奇的生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斯弗塞”成员又促使他最终加入意第绪社会主义党。这个党派也就是他毕生的理想，为他指明了存在的目的和方向。虽然从外表看来，他矮小、脆弱，可内里他却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并且体现出银行家一样的特点——“利滚利”的长远眼光。他又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具有不止一点的戏剧天赋。他的嗓音坚定雄浑，决不会给他的观点造成任何怀疑。像他这样一个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事方面都如此独立的人，现在或任何时候的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回想当初，我似乎看到了一个英雄姿态的男人，一个感到枷锁即将落下而拼命反抗、维护自己信仰的男人。他不想成为东方或西方野蛮人的附属物。他判断准确，镇定自若。没有谁，不管是德国人还是苏联人，更不用说那些政委或司令官了，他们谁也别想操纵他或是他家人的生活。毕竟，他独立、思想解放，一名知识分子，一个无神论者，并且还是一个社会党人。

社会党，这个犹太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一个犹太劳工的社会主义组织。在19世纪晚期，它在沙皇以反闪族手段统治俄国时发展起来。反闪族主义在波兰也有深厚的根源，经常迫使犹太人从乡村前往中心城市。虽然许多人被重新安置，更多的人放弃了原来的宗教生活，他们却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犹太身份。而社会党运动便成为一座联系过去和将来的桥梁，并且它还让我的父母走到了一起。

作为社会党人，父亲和母亲倾向于国际社会主义。他们支持工会，也支持具有自我价值感的犹太工人阶级。他们召集工人开会，会上他们和同事们进行争论，这样做能够驱散弥漫在犹太人群中的消极情绪。他们信仰的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世俗化的、建立在意第绪语这种群众语言之上的现代犹太文化。而当父母亲全身心地为犹太国生存而奔忙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那种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历史故园的信仰，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一场乌托邦似的梦幻，这种梦幻不能提供任何的实际办法来解决全世界犹太人面临的问题。在社会党人眼中，犹太人必须保持所在国中

的公民身份，也必须参加到为争取工人阶级权利的广泛斗争中去，无论他们的种族、道德观念或是宗教信仰。非但不要迁回巴勒斯坦，他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中和谐、平等地生活。

虽然我直到多年以后才了解了整个社会党运动的内容，我却能体会到父母心中那种强烈的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夹在他们当中，笔挺挺地站在别列斯多克社会党运动大会上，聆听着大会的开幕曲——社会党国歌——这首对忠诚的赞歌时的情形。母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并同父亲齐声高唱，当他们动情地唱到决不放弃为工人阶级而战时，我可以听出他们嗓音中激动的哽咽。站在那种场合，耳朵被这一大群人发出的分贝震得嗡嗡作响，我便明白有什么事正在发生着，这是一桩大事，一桩让人敬畏、永垂不朽的大事。

由于我是独生子，他们去哪儿都把我带上，在这样一个成年人的世界中我成长得很快。他们带我参加社会党人大会仅仅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对我进行灌输。我是准备接过火炬、继续前进的下一代，我正在准备着加入斯弗塞。唉，命运总不像人想的那样。

我同母亲更加亲近，尽管父亲生活中所做的每件事情都给我留有影响。不过，他不是那种在他进家门时你可以跑上去、钻进他的臂弯、和他拥抱的人。父亲并不刻意需要和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只不过在这种事情上，他的态度会回复到旧传统上去：养育孩子更多的是母亲的责任；而父亲扮演的角色是训导员和教师。他总是一个真正的梅拉梅德，而我，则是个小学生，我可以从他的头脑中获得思想，但我别想用双手拥抱这个人。所以，我回忆不起和他有过多少那种有些父子之间敞开心扉的深谈。他让母亲承担起慈爱和呵护的责任。而在那一方面，母亲是完全胜任的。

我的母亲查伊·菲格尔·巴拉金，生于1902年4月16日，她的父母亲都不是职业人士。她的父亲纳赫曼莱普（我的名字就是跟他起的）死于1917年。他是一个拥有自己店铺的谷物商。我的母亲曾经讲过，在传闻哥萨克前来屠杀犹太人时，他是如何用成袋的谷物作掩护来保卫他的家人。她是三姐妹中最年幼的一个。另外两个，萨拉和贝尔莎，在我母亲年纪还小的时候就移居到美国去了。当然，在我们结束噩梦般的旅程之后，她们伸开双手，欢迎我们安全到达布鲁克林，三姐妹重新团聚了。

母亲自从十几岁时便确定了教书的志向。她成功地进入同类学校中最具盛名的维尔诺教师学院，并在1926年5月28日以优异成绩毕业。在那儿父母亲第一次相遇了。四年后的1930年，他们在别列斯多克结婚。从青年时代起，母亲便是欧洲争取妇女平等和权力运动的坚定一员，并因此成为社会党人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社会党也支持同样的一套理论。像父亲一样，菲格尔·巴拉金抛弃了她父母旧式的宗教观念，但她却仍然热衷于波兰的意第绪文化运动，并沉浸在犹太文学和世俗学科的研究中。虽然母亲是个具备解放思想的女性，聪慧，受过良好教育，而且直言不讳，可她的性格还是最温良的，对他人的感情极为敏感，并能明察秋毫，这使她成为众

人热爱的教师。直到今天，已长大成人的男男女女碰到我还会说，他们热爱我的母亲——他们的老师。对我或是我的孩子来说，感觉也是一样。与母亲谈话，总是非常容易，如果有害怕和需要，也可以告诉她。老师什么都理解。

诚然，父亲和我之间也有强大的感情纽带。从他那里，我继承了对意第绪语的热爱，还有他对理想、责任和承诺的执著。父亲也遗传给我对盐渍食品的永不知足的喜爱，特别是腌鲱鱼和酸泡菜。泡菜实际上是父亲家族的喜悦，他的伯父便是一个腌泡菜的，自己的一小块地就位于别列斯多克城外。父亲有时带我到那儿去，而他的伯父（我也叫伯父）经常带我在一个小湖泊上划着船，检查他那些腌黄瓜。装满泡菜、盐、莳萝和其他调味品的木桶就放在富含盐分的湖水中，直到腌好上市的那一天。我们经常划到那些木桶旁边，打开桶盖，“伯父”和我会尝上一口，看看离腌成还差多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个泡菜行家。

不过我对父亲的爱主要还是建立在尊敬和崇拜之上。他是一个绝对值得尊重的人，而且，虽然他不会制造偶像崇拜，但在我眼中，他就是一个偶像。他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我不仅把他看做父亲，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重要的人，一个有理想的人。他把毕生都献给了这个世界，献给了社会，献给了犹太民族和意第绪语。这就是“使命”。他自信，对自己、家庭和朋友诚实，他给我的忠告言简意赅：为更崇高的利益而活，绝不背离使命，或是背弃朋友。最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个犹太人。父亲具有迁移到美国的社会党人身上的特质，就像学者欧文·豪后来归结的那样：热忱、好斗，还有深奥的信念。不过，在社会党主义之前，深厚博大的意第绪文化和其语言本身，那种蕴藏在意第绪文学、歌谣、民间传说、故事与诗歌中的语言，就已成为父亲的初恋。

由于它所有的小特点和在心理上引起的微妙感觉，意第绪作为犹太人共有的语言能够立刻将他们联系起来，无论他们是波兰人、苏联人、拉脱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立陶宛人、德国人，还是纽约东区人。几乎没有什么语言可以仅仅用一个字就能让人莞尔，或使人蹙眉，但意第绪语却可以。学者们统计，有史以来只有4 000个意第绪词语印成了文字。汤姆索亚可能还有意第绪口音呢！直到今天，不算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时期，你不管到世界的那一个角落总能够发现一些人正在用意第绪语交流着。

意第绪语，这门“母亲的语言”，已经成为了大众的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有1 100万人用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是《圣经》的语言。在美国，意第绪语曾经可以激起由阶级怨恨所导致的一些政治反应。许多德国犹太人认为意第绪语是一门“低等”的语言，一种阻碍犹太人与其他种族进行融合的本土主义。一些第二、第三代的美国犹太人甚至会把哈西德派犹太人的大批移入看做一件丢脸的事情。留着佩耶斯式的连鬓胡子，穿着黑色的长袖袍子，带着经文护符匣，他们会被当做一群说着意第绪语、修行希伯来古老宗教的中世纪古董。但是波兰、立陶宛和苏联的

社会党人原来就是参与1905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语言也是意第绪语。他们拒绝使用希伯来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支持为推进世俗主义而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他们大多数都是不可知论者。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可以代表全人类的眼光。我的父母希望我能肩负起这一使命，并将意第绪语言发扬光大。几年后，这种使命感在芝加哥得到了加强。那时我十岁，被带去听一场讲座，演讲者是世界最优秀的文豪和最著名的社会党人之一。讲座是在芝加哥的犹太聚居区——西区的工人俱乐部劳动讲堂里举行的。演讲者是莎洛美·门德尔松，有500多人聚集起来聆听这位伟人的演讲。众所周知，他是伟大的摩西斯·门德尔松的真正传人。人群中有许多人是社会党人，不过很大程度上还是代表了芝加哥中操意第绪语的各界知识分子。那儿有教师、医生、律师、演员、艺术家、作家、大学生、劳工、下里巴人、中庸之辈、阳春白雪——那些生活在意第绪语中、尊崇它的文学、信仰它的使命的人们。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演讲者的身上，好像是门德尔松施了什么魔咒一样。当然，意第绪语用门德尔松嘹亮的嗓音说来，那种雄浑的声气使他的演讲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获得永恒的唯一途径，”他充满诗意地说道，同时将手指向了天空，“是将你的生命与超越永恒的东西联系起来。”他停顿了片刻。那种“东西”是什么？我想知道。“那种东西，”他回答道，“是一种理想”。

我看得见周围的脑袋，包括父母的，都在赞许地摇晃着。如果一个人和一种理想、一个信念、一场运动、一项使命联系起来，并且投身于它，门德尔松解释道，这种理想内在的不朽性便会将这个人带向永恒的境地。当然，美国民主之父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者们为什么就不应该呢？

可能是父亲实现使命的恒心将我们带到了美国。1939年深秋的9月，逃亡的机会之门紧紧地关闭了，看上去我们不可能逃出欧洲这个犹太人的牢笼了。当时父亲的使命便是拯救整个家庭，而他的首要原则是不让我们分开。在一个向种族屠杀发展的阶段当中，人们凭借个人的聪明苟且偷生，为了领先他人被迫计划好每一步，即便事态恶化，心里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直觉变得比智慧更加重要。抉择变得艰难，做个决定也非快不可。为了生存，谁知要作出什么样的“浮士德”交易来？数年之后，大屠杀的疯狂不禁使人想起佩雷兹《无边喜乐》中上帝为拯救哈希德拉比而将整个世界出卖给撒旦的故事来。好像是这样的：在短暂的疯狂时间里，撒旦在失去一切之前尽其所能加以蹂躏。后来，留存下来的犹太人变得比以前愈加强大，并且更为坚定地将传统和文化发扬下去。

父亲来电话之后的一天，他透露的消息成了尽人皆知的事情。立陶宛和波兰的边境在父亲告诉我们的当晚就予以关闭。苏联人准备把维尔诺交还给立陶宛人。时间再也浪费不得了。如果我们想团聚，母亲和我必须在当天离开别列斯多克到维尔诺去。之后边境就关闭了。立陶宛就是父亲的避难所。我们疯了似的收拾一通，但只

是带了少许东西，因为母亲确信我们过几天便会回来的。

两个祖母和姑姑把我们送到车站，大家道了再见，然后我们就上了夜间的火车，那是出别列斯多克的最后一辆列车。我们快成了在黑暗中运动自如的夜行动物。这很奇怪：黑暗，曾经是使一个孩子害怕的东西，现在竟然代表了安全。对于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更加害怕的还是白天。我们正从黑暗跑向黑暗，我们的世界正在被颠覆过来，而我们不得不去适应，在阴影的遮掩下，穿过黑黢黢的巷子，沿着没有灯光的小街，走到那幽暗的路上去。

火车站的景象简直就像一个疯人院，人们扛着沉重不堪的箱子和口袋，推挤着，叫嚷着。他们都到哪儿去呢？小镇来的犹太人逃到大城市去，而都市来的犹太人又逃到乡间。事实上，一旦纳粹的死亡战车加速驶来，大多数人最终都将待在集中营中，面对着同样的命运。

列车超员，一些人被迫坐在他们的行李或箱子上。我们算是幸运的，有椅子坐，而我更荣幸地坐在了窗户旁。通常只有几个小时的旅程，那次却走了整个晚上。那时已没有正常的事情了。列车开得像蜗牛爬，还不时地停下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停车我都会醒过来，并朝窗外望望，虽然在那片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什么。我能感觉到，每次停车对于大人来说都是一次灵魂的折磨，因为没人能确定这车是不是还能再开起来。时不时，司机会拉响汽笛，用刺耳的汽笛声赶走挡道的东西；其他时候，听得见叫骂的声音；一两次，有枪声似的声音传来，但多数时间，停车时四下都是静悄悄的。

我们是在早晨到的。维尔诺车站的景象与我们离开时的别列斯多克车站一模一样。真的，甚至不能确定我们是不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直到我突然看见了父亲。在车窗前奔来跑去，往里张望的人海中间，那是他的脸。他带着他那顶帽子，刹那间我觉得我们的视线相遇了。我冲着母亲喊起来，可列车还在开，所以当我能够指出他来的时候，他却已经在人流中消失了。那是一幕在当时欧洲大陆上不断重复的场景。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4章

杉原门前的站立

父亲在斯特拉祖纳大街给我们租了一间阁楼，在一幢老房子的二楼，而那条大街是维尔诺具有历史意义的犹太街区的中心。周围是拥挤的街道，但充满了商业的活力。我们住在城市肉店的集中地上。匆匆的顾客，拉车的马发出清脆的蹄声，还有吱吱嘎嘎的排着黑烟的送货卡车，车上挂满了新宰好的牛体，所有的一切都带着一种忙乱的节奏。在店窗里挂着大片的鲜肉、成串的香肠、弯着脖子的鹅和鸡。从周一开始，鲜肉上的血流不断地流到下水道里，直到星期五下午人流减缓，大家都开始准备过安息日了。

之前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斯特拉祖纳大街的景象。它让我着迷。我们住所的唯一特点就是有一个可以俯瞰街道的小阳台。阳台有铁栏杆，阳台的大小刚好容一个人站上去。我经常站在那里，看着下面忙碌的顾客拎着买肉的袋子，看着众多的肉铺，看着屠夫围着血迹斑斑的围裙，用毛茸茸的胳膊以手术刀般的精确挥舞着切肉刀，并用意第绪语和顾客们抱怨着。没有切肉机，取而代之的是屠夫的锐利目光和稳健手法，他们可以把肉块切成厚薄相同、非常完美的肉片。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立陶宛——欧洲最后一座抗拒基督教的堡垒，被波兰人、俄国人和德国人抢来抢去，其疆界曾从巴尔干横亘至黑海，而这一辉煌已成明日黄花。利用1918年的俄国革命，它又重获独立，直至被苏联军队在1940年6月接管。一年后，立陶宛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而到1944年它又重被苏联人统治。

维尔诺的犹太人口将近8万人，比别列斯多克多得多。在立陶宛全境，有15.5万多名犹太人，大约占总人口的8%。近3/4的犹太人从事零售业或工业，10%的为职业人士，还有10%参与种植业。犹太社团活动积极，随处可见。将近150年之中，维尔诺就是东欧犹太文化生活的中心，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1568年。该城由于希伯来语和宗教方面的研究而闻名，在那里著成的《米什那》（犹太法典阐释）至今还在使用。在19世纪，维尔诺成为犹太启蒙运动的中心，后来又是希伯来和意第绪文学的繁荣之地，聚集了意第绪和希伯来世俗学校，以及许多犹太报纸。正是在1925年的维尔诺，麦克斯·维恩里希博士以及历史学家艾利尤·胡切里·柯瓦尔，还有其他几个学者建立了意第绪语言研究学院，也就是众所周知的YIVO（Yiddish Visnshaftlicher Institute）。该学院（自1940年起设立在纽约城）从此便是意第绪语的权威研究机构、东欧犹太历史和文化的堡垒、犹太历史和语言学文献中心、犹太艺术和民族史的宝库，也是犹太学者的图书馆，还是一个学术出版社。

我们于1939年9月底抵达维尔诺的时候，虽然还有反犹太活动，就像整个欧洲所发生的那样，但维尔诺的犹太社会生活始终在发展壮大。不过，到1941年年中，事情便发生了变化。维尔诺和别列斯多克注定将陷落到纳粹手中。全部的犹太人将被成群地赶到犹太人区去，并最终在那里结束生命。战争结束时，波兰和立陶宛90%的犹太人被屠杀。在维尔诺仅仅有6000名犹太人幸免于难。

我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但只是一个短暂的片刻。我的家人又团聚了。不久之后，我们的朋友曼氏夫妇，便来串门了。他们住在附近。他们像我父母一样都是意第绪语教师；两位女性都曾经在维尔诺教师学院就读。曼先生瘦瘦高高，面颊清癯。相比之下，曼太太明显矮胖了许多。曼氏夫妇有一个女儿与我一样大，叫艾丝塔。艾丝塔高矮和我差不多，苗条，留着齐耳的深亚麻色头发，还有一双迷人的蓝色眼睛。我以前从未和一个姑娘交过朋友，比较害羞，可艾丝塔很容易亲近。在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她整个脸庞上洋溢出的笑容让我觉得我受到了欢迎。我到的时候简直是两手空空，艾丝塔一开始就和我分享她所有的东西，我们成了分不开的朋友。

在大约一周以后，父母告诉我，因为父亲在这儿非常安全，因此他们决定最好就在维尔诺留下来。他们可以在一所意第绪语学校里找份教书的兼职，而我则尽快开始念书。这意味着按照立陶宛的教育制度，我就要上一年级了。这种想法吓坏了我，直到听说艾丝塔会和我同班。她像牧羊人一般，把我带到了一年级的课堂上。课程是用立陶宛语教授的，立陶宛语是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印欧语言，近似于古代梵文（至今我还有一本草草写满立陶宛语的笔记本，是当时上课留下来的）。它是我一生

中的第三种语言，也是命运把我们带到世界各地的众多语言中的一种。再一次，我们的生活恢复了秩序。我上了学，幼小的耳朵开始适应立陶宛语，并可以在课堂里用它来交流。我们生活的地方，我的社交圈也开始扩大。此街区所有建筑的后墙都面向一个宽阔的庭院，它成了邻里孩子们的天堂，所有的孩子下了课就聚集在这里，他们玩耍，打架。朋友们也经常在那儿碰头，聊天、散步或是争论一些事情。在这个庭院里，我知道了关于性、爱还有生活的一些东西。在这儿我开始成熟，我甚至参加了第一次生日聚会，是为我的一个同学举办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不过我仍然保存着这次宴会的一张黑白照片。十来个孩子围坐在桌子旁，天真地开怀大笑，享受着那一时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年轻的女孩玛莎·波恩斯坦，像我一样，成为幸运地逃脱牢笼的人们中的一员。然而，她的父亲摩尔德查，也就是闻名政界的玛忒维，却没有这样幸运。这名活跃的社会党人，在1940年的最后时刻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玛莎和她的母亲泽尔达波恩斯坦，与梅拉姆多维奇一家走的是同一条通向自由的路线，她们在我们之后两个月到了日本，然后取道加拿大在1941年8月到达美国。玛莎（现在的玛莎里昂）和我已是多年的好友。成年后，她成了纽约《先驱报》的记者，我们便经常见面。直到今天，她是一个周刊专栏的执笔，跟踪犹太人群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该专栏办得非常成功，大受欢迎。她从未遗漏过有关我的事迹的报道。

在随后的6个月中，生活渐渐地按部就班起来。而正当我认为事情又开始正常的时候，命运干涉了。战争的阴云开始向维尔诺移近，城市赖以生存的物资供应出现紧张，同样紧张的还有居民们的神经。关于德国人在西部对犹太人和其他国民所作所为的谣言传到了维尔诺，使得立陶宛犹太人惊慌失措，因为出逃的路线有限：往北是已经被德国人的潜艇和巡逻机占领的波罗的海，向东则是幅员辽阔的苏联。

自1940年7月斯大林改变了主意，维尔诺的转变也就开始了。他希望将维尔诺从立陶宛拿回来，而当他将这个打算付诸实施后，他把整个立陶宛都拿了回来，并带上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现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归了苏联人，可在抓住数千名犹太和非犹太政治嫌疑犯并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和苏联腹地的劳动营这一事情上，他们却颇费了一点儿时间。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自然名列其中。

一夜之间，我们的世界改变了。苏联的重新出现就像给这个城市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幕布。斯特拉斯祖纳大街从此不再喧嚣，商店的货品屈指可数。泡菜桶和鲱鱼罐空空如也，挥发殆尽的腌渍汤汁在容器的内侧留下了一层白色的盐末。没有肉，也没有卖肉的。往日那些刺鼻的气味已经被抛弃和遗忘的氛围所取代。在1940年夏季的几周中，排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购买如面包、牛奶等生活必需品的长长的队伍四处蜿蜒。如果你起得不够早，等得不够长，你可能什么都买不到。

父亲再次转入地下。他加入了科夫诺（考纳斯）外森林里的游击队，大约在维

尔诺西北 80 英里，我们则留在那个二楼的住所里，俯瞰着寂寥的斯特拉斯祖纳大街。我们的小阳台成了个信号站。母亲在铁栏杆上挂一条毛巾，父亲便明白一切安全，可以上门。没有毛巾表示有危险，躲远些，这说明突然有人不请自来或是当局正在盘问母亲关于父亲的下落。父亲说，什么人都不能相信。不管怎么说，这套原始的信号系统起到了作用。

我记得父亲离开的那个晚上。他拉着我的手，向我解释他为什么要走，还有为什么要打开我的床垫。我说我明白，这让他吃了一惊。有一次，在我们搬到这里之后，父母以为我不在房间里。我看着父亲在我睡的床垫上割了深深的一个口子，在那儿我看见他藏了一些像纸币一样的东西。我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情。起初当我睡在床上的时候，我能意识到身下的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就把它给忘了。现在父亲告诉我，他需要一部分放在那儿的钱。那不多，他说，不过是我们用来逃脱厄运的所有积蓄了。因此，他解释道，他把钱潜藏在了那里，因为强盗或警察最不可能注意的就是我的床。钱还在那里。

虽然我周围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个人的情况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我继续每天上学，所有的课程还是一样，所有的孩子还是一样。艾丝塔和我几乎形影不离。不过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不同。学校里的一切都变成俄语的了。我再一次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我的第四门语言，而我还不满八岁。过去我们经常唱的一首意第绪歌曲是这样的：“一、二、三、四，我们是小小儿童。”突然之间，歌词变成了：“一、二、三、四，我们是斯大林的儿童。”

就像当时世界其他的一切所呈现的那样，立陶宛脆弱的独立在 1940 年夏季轰然崩塌。在它的领导人和莫斯科紧急谈判之后，7 月 14 日，立陶宛投票通过成为苏联第 14 个共和国的决议。接下来是对反对者的逮捕。美国拒绝承认新政权，甚至冻结了立陶宛的财产，并允许驻华盛顿的旧使馆继续存在。不过那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立陶宛的总统跑了，还有 1.2 万名的犹太人和其他战争难民也想出逃。我们便是其中几个。

关键是弄到过境签证。逃入和逃出波兰的路线已经被割断了。这意味着没有可能再返回别列斯多克与祖母们、姑姑和其他亲戚见面了。自从父母与他们联络后已经有几个月了。现在唯一的路线是通过苏联的内地到达东部港口海参崴。我想象不出有多远，但在无意中听到父母关于未来的讨论后，我知道那就像到月球一样遥远。不过父母告诉我在海参崴有船横渡大洋，开往日本、中国、澳大利亚、美国。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到达那儿的机会是多么微乎其微。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张过境签证，一张只允许一个难民离开苏联，借道日本前往其他地方的纸片（可笑的是，两年以后，好莱坞的神话制造者们在嘉宝的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里将这种过境签证或他们所谓的“过境证”，作为突出戏剧效果的道具使用）。

7 月底，为了一张过境签证，在科夫诺的街道上上演着任何编剧都想象不出的戏

剧。父亲虽然扮演着他的独角戏，可在与命运之手抗争的时候，他总是逐字逐句地并且时时刻刻向妻子和儿子描述着他的恐惧和危险、他的成功和遭遇。

一连几周，每一天父亲都会偷偷摸进科夫诺，然后混在成百名犹太人中间来到日本领事馆门前。我几年后才知道，领馆内外同样的疲惫。那是个不顾一切的景象：婴儿们蜷缩在母亲的臂弯里；年幼的孩子紧张地跟住前面的队伍；脸色阴郁的男人们胳膊无力地搭在领馆周围齐胸高的栅栏上。那是失望的一群人，不过他们并没有敌意。

像其他人一样，艾萨克·莫伊舍·梅拉姆多维奇希望能钻个官僚主义的空子，从而争取到自由。可能他害怕得过了头——或是昏昏沉沉，因此并不觉得气愤。甚至具有哲学思维的父亲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命要浪费在排队获得一张能判生死的纸片上。

人群在早晨5点开始汇聚。不到一小时，安静的大街便被拥挤的人体挤得水泄不通，就像维尔诺和父亲那个晚上离开时的别列斯多克的火车站。现在仅有的希望落在了日本驻立陶宛总领事——40岁、说话温和的杉原千亩身上。当杉原一天早上从领馆窗帘后往外望去，看到下面这一群人时，他怔住了，并唤醒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让他们躲到壁橱里去。他害怕人群可能会冲击领馆，但不久便意识到不存在什么危险。那是欧洲当时典型的人群，里面的人看上去像是要祈祷。虽然我没有看到当时的情景，可根据数年后记载以及杉原自己的回忆，我知道人群中的一些人试图翻过栅栏，另一些看见了杉原的人则双手合十，做出祈祷的姿势，仿佛他们正在注视着一位神圣。他们没有露出任何自怜和感伤的表情，因为他们不能够垮掉。不过当他们沿街排着队，在日本领事馆外等上几天时，他们逃亡心情之迫切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看着如此多条生命危在旦夕，杉原明白一定要做些什么了，不过他还是比较为难：良知和职责之间的抉择。在一个职责优先于良知的世界里，杉原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从1940年7月31日开始，在接下去的28天里，他不顾政府的授命，向犹太人签发过境证明。我的父亲，随着其他的申请者，来到杉原面前请求签证。他从没告诉我说了一些什么。不过，父亲后来解释道，讲了什么不重要，因为杉原根本不会逐个询问。申请的激动不已，分析的还是冷静如常。不用告诉杉原大祸已经临头了。看着申请者布满血丝的眼睛，听着他们沙哑的嗓音，读着东京来的电报，他对这一点很清楚。

没有任何吵闹和争执。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对于杉原来说那就够了，因为他对所有在欧洲的犹太人的命运明明白白。若没能取得签证，父亲只有一个选择：参加游击队。父亲打算趁打游击的时候，带着他的家人在立陶宛的荒野里逃亡，而不是把我们撇在后面，或是被纳粹赶到犹太区里关起来，只等死神上门。我尽量想象出父亲背枪的样子——不算太不自然，因为他是一名社会党人。社会党人的领袖是列

昂·费纳尔，这位犹太社会主义运动的地下领导人，组织了犹太抵抗运动以及 1943 年 4 月华沙犹太人区反抗到底的大起义。由社会党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社团成员领导的相同的暴动遍及波兰城市。在别列斯多克，由墨尔德·蔡塔嫩堡姆、阿德·克鲁雷克和丹尼尔·莫什科维奇领导的犹太区暴动在 1943 年 8 月达到高潮。

战后，我记得父亲和菲格勒派尔·特尔弥德兹蔡奇（现在的弗拉德卡·米德）心情激动的相逢。地点是我们在芝加哥西海顿街 3210 号的寓所。弗拉德卡是她的波兰语化名，她那时将武器偷运到华沙的犹太人战斗组织，帮助犹太人从犹太区逃跑，还担当信使和抵抗运动的组织人，17 岁已经享有“地下运动英雄”的美誉了。在与弗拉德卡的会面中，我的母亲——菲格尔·梅拉姆多维奇私下告诉我，弗拉德卡是她心中的女英雄。她们的命运多么相似啊。弗拉德卡现在和她丈夫本杰明·米德生活在纽约，本杰明是美国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创建人之一，也是犹太大屠杀幸存者联合会的主席。

杉原身上的压力很大。犹太难民从荷兰荣誉领事长茨瓦滕蒂亚克那里听说了获得日本过境签证的可能性。茨瓦滕蒂亚克是另外一个唯一愿意帮助犹太人的外国外交官。他甚至在 1940 年德国占领荷兰后依然签发到荷兰属地（如库拉索岛）的签证。不过除非借道日本，否则你到不了库拉索。

好几次杉原拍电报给他的政府，要求派发签证的批准。每一次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关于前次要求之过境签证，建议绝对不要发给任何不具有离开日本保证并持有确切目的地签证的旅客，没有例外，不再作进一步的回复。外务省，东京。

原因非常明显。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三国同盟协定正在商谈之中，而日本外交部不希望做出任何让德国人不高兴的事来，帮助犹太人是禁忌。同盟协定最终于 1940 年 9 月 27 日签署。

杉原处在苦闷之中。他说服了他在领事馆里的家人，包括妻子由纪子、妹妹菊池节子（孩子们的保姆）以及他的 3 个儿子：博基（5 岁）、千秋（3 岁）、春树（3 个月）。他的家人一致同意，希望他能够帮助犹太人。他扪心自问了一番，然后下了决心。他告诉妻子：“我可能不得不违抗政府了，但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是在违抗上帝。”他对政府命令的藐视在日本外交部圈子里被称为“立陶宛事件”。

不过首先他必须从苏联人那儿取得让难民们通过苏联的许可。苏联政府已经指示他关上领事馆的大门。但除非难民们获准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前往海参崴，否则他们永远到不了日本。杉原亲自去为犹太人谈判。他讲的俄语近乎完美，这一点打动了苏联人。但真正让他们做出有利决定的是，他们意识到可以向犹太难民索要双份过路费，然后将多出来的部分放入自己的腰包。

第二天早上，黎明时分，杉原向等在外面的犹太人群发表讲话：“我会给你们每一个人发放签证，直到最后一名，因此请耐心等待。”当话语传过人群时，那真是奇妙的一刻。人们欢乐起来，他们互相拥抱亲吻，还有一些人感恩地望向天空。然后

以一种匆忙而又从容的方式，在家人和职员甚至一些挤上前来的犹太人的帮助下，杉原开始发放签证，简直是整日整夜地写着。他体重下降，疲惫不堪，不过他仍然不停地在签发着那些证件。

签出去的证件有多少，这不清楚。但杉原每天力争签出三百张。凭一张过境签证就能举家出行了。因此，历史学家们后来称颂，他在1940年8月那些疯狂的日子里拯救了6000多条犹太人的生命。拿到签证的包括米雷·耶西瓦（Mirer Yeshiva）的全部学生，该组织今天在纽约和以色列都有分支机构。这些难民从日本移入了世界的许多地方，幸运的则到了美国。命运使然，其中的两个家庭——梅拉姆多维奇一家以及罗谢尔和贝蕾克·齐隆卡还有他们当时3岁的女儿茱丽，来到了芝加哥。齐隆卡一家在索斯诺维克——离奥斯维辛40英里的波兰小镇——虎口脱险，逃离了德国人。在得到了杉原的签证之后，他们沿着相同的路线到了海参崴。直到他们成为美国居民，儿子山姆出生之后，齐隆卡夫妇才将名字改成了蔡尔。山姆·蔡尔今天是最负盛名的房地产巨头之一，也可能是美国最大的私人房地产业主。

甚至在他关闭了领事馆，搬到旅馆里等待将全家送到德国去的火车时，杉原继续发放着签证。当他乘坐的火车缓缓驶出车站时，杉原还是设法从打开的窗户里向难民们递出更多的签证。不幸的是，这还是不够。站台上那几百个没有拿到签证的人看着他们最后一线希望渐行渐远之后，还能记得他在向他们鞠躬时所说的话。“请原谅我吧，”他说，“我不能再写了。我会为你们的安全祈祷的。”

战争结束40年后，杉原告诉一个记者，他是出于人道做这一切的。而对于他违抗命令，他的政府会如何处置他呢？撤了他的职，并将他召回日本。他明白，这只是拯救生命而付出的小小代价。但他没有（起码没有立即）被驱逐出政府。战争期间，他仍然以外交官的身份驻扎在包括柏林在内的许多地方。1985年1月18日，以色列的雅德·瓦西姆（Yad Vashem）纪念馆将一枚勋章颁发给杉原，并命名他为大屠杀期间拯救犹太人的“正直的英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也授予他同等的殊荣。获此盛誉的非犹太精英还有劳尔·瓦伦伯格和奥斯卡·辛德勒。

我们在1940年8月31日拿到了日本的过境签证。得到这张过境签证的成本是1美元的所谓行政费用，也就是今天一张彩票的价钱。但逃脱的概率也和任何中彩的机会一样大。签证并不是通向自由的保证，它是一张单程票，拿着它，你颤颤巍巍地走在一条钢丝绳上，下面没有任何防护网。这样，父母就必须决定是不是要用仅有的一种可能方法试试看——作为有签证的难民到日本去，从此逃出纳粹的手掌心。可这么做的危险也不是闹着玩儿的，在维尔诺的难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苏联人的签证是到西伯利亚的单程护照。”如果在那乱世的稀里糊涂中，某一个审查梅拉姆·多维奇申请的布尔什维克官僚并没有想起这个申请人就是艾萨克·梅拉姆多维奇，也没有看出我们其实是从别列斯多克过来的，不是从德国而是从苏联人的手中往外逃的话，此人可能会赐个批准。父亲当时将他的脑袋刮了个干干净净，试图改

变他在苏联申请表照片上的相貌。一旦事情败露，父亲和他的家人就会被当做政治犯给抓起来，不是投入西伯利亚的劳动营，便是被关到不久之后德国人接管的维尔诺监狱里去。反复斟酌之后，其间父母甚至询问了我的意见，我们同意赌上一把。没有其他选择了。

父亲又一次藏到了科夫诺的郊区，而母亲和我则留在维尔诺等待我们的命运。每个星期五苏联外交部都会宣布获准离开者的名单。心中怀着恐惧和希望，每周母亲也都会拉着我的手到苏联外交部去看贴着的名单。每周我们失望地离开，下个周五仍然回来。整个过程持续了4个半月。当我们的名字终于出现的时候，快乐是无法言表的。最终我们获得了机会。不过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毕竟自由离我们还有一段路，这段路漫长而且变化莫测。

开始我们必须坐火车从维尔诺到莫斯科，冒着在莫斯科可能再次被抓的危险，然后将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越过那令人心寒的边疆。经过6 000英里的旅途到达海参崴后，还要应付更多的检查机关，还要回答更多的问题，诸如我们是谁，我们到哪儿去，为什么等？在旅程中的任何一个节点，父亲都有可能被截住，也可能被逮捕。这条路上，我们可真是度日如年。

在对抗天、地、人以及任何要把我们整垮的无情的敌人时，我们所依靠的，是隐没在这片祖国的土地中、就像拿破仑入侵时的那些苏联将军们。而当希特勒撕毁与斯大林的条约，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时，他们又这样做了一次。

就在德国入侵苏联数天后，按照纳粹的命令，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有乌克兰人便开始屠杀犹太人。在科夫诺，一万名立陶宛犹太人——犹太总人口的1/3，集合在一起，并被遣送到那座俯瞰科夫诺群山的堡垒中，然后被德国行刑队开枪打死。直到1941年7月中旬，维尔诺将近半数的犹太人2万人左右灰飞烟灭。他们之中有艾丝塔和她的家人。这仅仅是个开始。

在获得离开苏联签证的几天之后，父亲冒险回到维尔诺，为的是安排我们的启程，要定一些计划。我离开别列斯多克的时候，由于过于仓促而几乎没有告别的时间。另外，母亲告诉大伙儿，那不过是暂时的分别。但我们明白，这次可是永远的离开。不过，因为不可能往别列斯多克打电话，我们留话给在维尔诺的所有人，让他们捎去我们良好的祝愿和爱意。我们也向我们在维尔诺的朋友们道别，尤其是曼氏一家。我还记得告诉艾丝塔我相信我们会重逢——长大以后。而德国人却让艾丝塔永远也不能长大成人。

我们的世界像解体的星系那样飞散开去，现在我们是叛逃者、移民，与欧洲再无私人瓜葛，而如果我们成功抵达日本，我们就注定湮灭在一种新奇的文化中，寂寞地度过余生。

在登上去莫斯科的火车后，我们成了一帮即兴表演的演员，没有剧本，还要时不时地扮演不同的自己。我们像演员那样善于模仿，根据情况的不同而藏到适合的外

表之后。虽然，在每次转机到来之际，总有一线希望，似乎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但仅此而已，机会总像烛光那样跳了一下后便被掐灭了。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表演。整个世界就像一座灯光熄灭的倾斜舞台，演员们滑入黑暗和疑惑中，他们互相碰撞着，试图找到哪位导演能够加入进来，重新开始这出戏的表演。在逃亡中人是孤独的。虽然我从未有过自己想象中孤儿会有的那种感觉，有几次我还是觉得自己好似在宇宙里孑然一身，尽管父母一直就在近旁——就像跌入了一场梦境，忘记了我身在何处。不过这种孤单的感觉总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每次经历过后，都伴随着天真的失落，由此便会产生一种变换感。时代的脉动传遍我的全身，我也获得了一种力量，在那一段历史上的黑暗时期，我还不能理解这种力量；而当整个世界似乎注定要走向地狱，这样一个时代也是无人可以理解的。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5 章

别列斯多克综合征

战争还没打到莫斯科。当我跳下火车，步出车站的时候，我想我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街道上满是莫斯科人，车流朝各个方向移动。那儿有塔楼、回旋的塔尖、金色的穹顶、花园、广场、紧身军装上的大片红色和旗帜。也到处都是士兵，就像我在别列斯多克看到的，沿大街正步行进的士兵们一模一样。

在我周围沉淀着厚厚的历史，但我并没有意识到。对于尼古拉斯二世、亚历山大、托尔斯泰、柴科夫斯基、红军卫兵、布尔什维克或约翰·里德——那位左翼作家以及唯一一名埋葬在克里姆林宫的美国人，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当然，父母竭尽全力解释所有的一切，但要了解的太多了。而在我们默默地走过那个躺在他而建的寝陵里活生生、全身制服的经过防腐处理的身体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谁。那些寝陵的卫兵们，站得笔直、满脸严肃、紧闭双唇，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玩过的铅兵们。父亲费了很大力气介绍 1917 年的十月革命以及列宁其人，另外也不忘申明他反对列宁的观点。不过他尊敬列宁，因为列宁有他的理想。他有他的抱负——一个使命，在他生命终止之后很久，这种使命仍然存在。

那些话几乎没有被听到心里去。我东张西望，忙得不行。父亲介绍说，历史上莫斯科历经暴乱、瘟疫、起义、围城，还有外族的占领。他向我讲到了蒙古鞑靼以及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不过我还是更着迷于我眼前的东西。这座城市的景象和声音俘获了我的双眼和心灵，使我像个第一次一头扎进迪士尼乐园的孩子。莫斯科可真雄伟：庞然的木门、成块的石头、长长的柱子和高高的天花板、巨大的铜钟，还有那门大炮，我可以把身子塞进它的炮膛，还有那些令人敬畏的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它们给这个8岁的小难民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那以后，我经常会在夜里梦见那些红墙。可又有谁会想象得出，在将近50年之后我又会回到莫斯科——这次是作为自由市场的征服者，受到约瑟夫·斯大林继承者们的招待，而地点就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那些围墙里面。

1940年12月底，我们等待着向东去往海参崴并可能是通向自由的西伯利亚列车。而那被迫在莫斯科停留的三天里，我们多多少少地参观了这座城市。不过，安排游览的苏联国内旅行社监视着我们的行踪，父亲认为他们是格鲁乌（国家政治保安局）。我们住在莫斯科诺芙雅宾馆。虽然之后我知道那最多是家三星级的宾馆（现在的五星级宾馆），但它的镜子、吊灯、铺着地毯的大厅和大厅里那些垫得厚厚的靠背椅，对我来说它就是座宫殿。最吸引我的还是在宾馆那间所谓的舞厅里的歌舞表演，父亲为庆祝我们自由在望请大家看了一晚上。演出的特色是一些穿着暴露的女吉普赛，她们在舞台上蹦来跳去，表演肚皮舞。但当然，我们并不是那些外出买些旅途纪念品的游客。我们是难民，只能小心行事。母亲的焦虑一直没有停过，父亲也担心被秘密警察逮捕，而这在任何一个街角都有可能发生。对于我来说，莫斯科是一个转变；对于父母来说，它还是一个潜在的陷阱。我怀着儿童的好奇心，轻松来去，可父亲却带着一个逃亡者特有的疑心病。当我们假装悠闲地像其他游客那样沿着大街散步的时候，我们从没忘记危险就在我们附近。

离开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收拾了包袱，小心翼翼地前往火车站。离得越近，出现的士兵就越多。虽然苏联还未和德国开战，可它已经击败了北方的小邻国芬兰。斯大林还抢了希特勒的风头，在零下60度的温度中向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发动了一场闪电战式的轰炸。但仍然没有像我在别列斯多克所看到的战争迹象。莫斯科人同平常一样做事，建筑物还是毫发无损地高高伫立在那儿。

我们在1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离开莫斯科。我记得列车员喊着话，我想是“全部上车”，行道员摇着信号灯，列车先长吁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提速，并发出轰鸣声。雪覆盖了乡间的土地，几分钟之内车窗结满了霜花。机车能量巨大，拖着一串摇摇晃晃的木制车厢在狭窄的轨道上呼啸而过。我们自己有一间小包房，可以在里面睡觉。这儿有一列餐车，每餐供应两次。我们只买得起包晚饭的车票。在不同的车站，父亲会下车买牛奶面包或其他填肚子的东西当早饭和中饭吃。

莫斯科到海参崴按计划需要开10天时间，实际上却花了两周。每过一英里，心

里都会一沉，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那片经过的世界了。不过，我们还是不可能知道身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令人发指的事情。母亲经常告诉我，她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没有把我的“巴巴”一起带上。不过在当时有谁知道我们的命运如何，谁又能想到她们的命运会怎样呢？当然，传言是有的。有关纳粹暴行的故事的传播速度快得像西伯利亚的风寒。但欧洲还没有变成后来那个犹太人屠宰场。在1943年年底，纳粹的宣传头子海恩里希·希姆莱，给盖世太保的头子海恩里希·穆勒写了封信，信中强调了焚毁所有尸体的重要性，这样便无法找到任何大屠杀的证据。

我们是幸运的，凭一张过境签证、一丝惊慌的希望和一点残留的自尊踏上了逃亡之路。起初，这条路没有特别之处，列车会在每一个乡村小站停靠。可越深入西伯利亚——当地人称之为“沉睡之土”，车停得越少。西伯利亚人知道那些莫斯科人不屑于知道的东西——在绵延的空间里有欢乐，这种欢乐使你不在乎与永久性冰冻、自然和空旷作战。

西伯利亚，能够把一名旅客的身心全部冻结。它的广袤和荒凉，加上冬季白昼的短暂，使人忘却了时间——就像人类的祖先，他们生活在“没有时间的现在”，所以几乎没有过去或是将来的感觉。实质上，我们的列车好似一部时间机器，把我们送回到人类的过去。显然，西伯利亚迫使我们在当时生存下来，尽管我们这些逃亡的犹太人正在高速穿过从乌拉尔山脉到太平洋的八个时区。从海参崴，我们将横渡日本海到达日本，然后从那儿去这个世界的偏远角落。我的家人满心向往的地方是美国。其他人则希望去加拿大，或南美洲，或澳大利亚或任何愿意收留他们的国家。

列车上的许多时间里，我都在眺望那白雪皑皑的景色，我的脸紧贴在车窗上，那就像嵌在镜框里的一幅画。那些在秋天发出橙色光芒的白桦树现在不见了，而我确定当我们穿过巍峨的乌拉尔山脉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伯力和其他我叫不出来的城市进发时，那儿的云是紫色的。当我们经过鄂木斯克而继续穿越冰冻的荒原的时候，梅拉姆多维奇一家，还有这次西伯利亚特快上的其他逃难亲戚们，安静地迎接了新年的到来，并默默地祝福明天会更好。

晚上的每一次停靠，我都会被列车停稳时的摇晃和喷气声吵醒。我会从我的铺位上向车站上望去，可以看到一些裹得像木乃伊那样以抵御严寒的人们。西伯利亚人，或像他们自称的“西博尔亚基”，真是一帮辛勤耐劳的家伙。他们自己种蔬菜，在树林里摘浆果，在雪地里钓鱼。苏联的爱国主义作家们对西伯利亚人的生活方式大为赞颂，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与自然有紧密的联系。

当我不瞭望景色的时候，我的注意力便转到父亲和其他旅客的棋赛上，但要小心在下完一盘棋之前不要用问题打断他的思路。在到达日本之前，我竟然会下棋了，这着实让父亲吃了一惊。在其他时间，他会教我一些东西，多数是数学。作为一名数学教师，他认为做些实际的练习能让我学得更快些。举例来说，他教我如何将华氏温度减去32，再乘5除以9换算成摄氏温度。他会画出图、线来说明一个观点。我

们一起算出来，在零下 40 度时华氏和摄氏温度会重合。

就是用这种练习父亲使我做好了到达比罗彼得臣的准备。比罗彼得臣就在西伯利亚的中部，满洲里以北大约 300 英里的地方。有传闻说，它的温度低到呼出的气立刻就能变成冰柱。常常有冻伤的危险，在这样的温度下一阵急风能够将眼皮冻在脸上。

这座比罗和彼得臣河交汇的冰雪之城是俄国政府送给犹太居民的一份礼物。他们得知，在这里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零下天堂。这是真的，一群犹太诗人、作家、记者和教授被流放到比罗彼得臣。许多人觉得，比起在劳动营（西伯利亚的同义词）的冰窟里了结自生，来到此地已是一个好得多的选择。

列车将到比罗彼得臣站时，父母已经把我包得像在沿途车站的那些木乃伊一样。除了厚重的大衣、一顶帽子还有靴子以外，我的脸和鼻子则用围巾裹了起来，只在嘴巴这里留了个小小的开口。一小群我们不认识的犹太人在等着迎接我们。他们已经听说一车的犹太移民要打这儿过，他们希望知道亲戚们的境遇，还有战争的情况。那天晚上的气温是摄氏零下 40 度——而且还在下降。（我能肯定的是，呼啸的狂风让人感觉更加寒冷，不过那时谁又知道寒冷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管温度有多低，反正是冷得出奇。当我们踏上站台，那突如其来钻进每寸肌肤的冷风让我呆住了。传言是真的，我亲眼看到了，我呼出的气息变成了小小的冰粒。

我们在车站里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那真是一次苦涩而又甜蜜的重逢啊。我们和同胞们——大家同是一国人民，同是犹太民族——聚在了一起，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大家像过节一样。大伙儿笑着，抽着香烟，喝着滚烫的茶水。比罗彼得臣这儿很久没有听到消息了，任何关于我们被驱逐出的那个现实世界的消息。我记不得头上被大人们友善地拍了多少下。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一阵忧伤清晰地掠过我的心头，他们可能就像在别列斯多克和维尔诺的家人和朋友们那样给留在我们身后了。不过在比罗彼得臣，他们反抗的敌人是寒冷。这儿并不是一个适合梦想者的地方。或许也是吧。如果不试着靠做梦来缓解愁肠的话，又如何才能捱过这儿漫长的寒冬呢？回到车上，觉得像是回到了热带。我猜在比罗彼得臣零下 20 度应该是个暖洋洋的天气吧。我再也没有忘记过那一晚的寒冷，而以后当我每每感到寒冷，总会想到比罗彼得臣。

我们到海参崴时是一个寒冷、刮着大风的早晨。海参崴由一群俄国水手于 19 世纪建立，城市位于俯瞰海湾的群山之上。海参崴的生活以它的港口为中心，这是俄国东部最大的港口。伟大的俄国剧作家契诃夫曾在那儿的一家博物馆工作过。那里的街道也像我在莫斯科看到的一样繁闹。而今天，海参崴的世界股票交易所——号称拥有全俄罗斯最为先进的交易大厅，那个大厅曾用来保存苏联共产党的地方志。

我们拖着三个手提箱，里面装着全部家当，还有几个小包裹。冰冷的寒风扯开了衣服。我们三个步行了一列火车的长度，来到海参崴的候船大厅。我们一家和其他

的难民们排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里，等着在码头尽处那间庞大、充满臭气的仓库里接受检查。那个地方混乱极了。不过难民们已经习惯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等待是没有尽头的，人们坐在他们的行李上、地板上。移民官搜查着每个包裹，好像里面有黄金似的。不过事实确实如此。移居官在寻找值钱的东西，并借口为了安全——他们自己的——而把它们没收。一旦移民们听到了搜查的风声，他们的创造力便显现出来。

约瑟夫和劳拉·布茹姆伯格夫妇，我家的密友，也是社会党员，他们来请父母帮忙。他们刚满13岁的儿子阿米科有一块金表。布茹姆伯格夫妇断定如果他被搜身的话，那块表一定会被发现并被没收。不过，他们觉得小孩是不会被检查的。父母是否同意让我戴上那块表呢？父亲答应了。最坏的结果也就是那块表被拿走而已。阿米科飞快地将他那块表戴在我的手腕上，拍了拍我的头，然后和他的父母坐回到包裹上去。布茹姆伯格一家的行李被里里外外地搜了一番，而几个小时里我却骄傲地戴着那块手表。那个时刻对我来说真是不同寻常，因为我成了布茹姆伯格密谋的一分子——这是一个8岁儿童的巨大胜利。布茹姆伯格一家成了我们毕生的朋友。阿米科就职于美国国务院，并理所应当地成为苏联事务的专家。

我们仍然在苏联的土地上，而将一块手表丢给一个贪污的官僚对父母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可担心的事情。直到当时，我们还在被抓捕的名单上，而且绳索随时都会落在我们的脖子上。父亲想趁着当时的混乱逃过当局的检查。由于海参崴对于日本大陆的战略地位，当时弥漫着恐惧的气氛，同时也充斥着虚假的宣传。日本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和满洲里。而且，苏日关系自从日本1905年击败俄国人后便一直摩擦不断。所以，到处都是苏联的秘密警察，这并不让人诧异。管制是严格的。就在我们前面几英尺的地方，是父亲的一位在别列斯多克的政治伙伴。这位朋友也在逃犯的名单上，他被认了出来，警察简直就是把他拖了出去。母亲的脸上满是害怕，她以为，灾难快要向我们袭来了。跑了这么远却被苏联警察给抓住，这确实是场噩梦。

不过我们顺利地通过了询问和调查。不知为什么，父亲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上。也没有从我们这儿拿走什么东西，可见我们确实没什么值得拿的。凌晨一点过后，我们才得以走上跳板，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天空是黑的，大海是黑的，拍打着船舷的海浪剧烈地摇动着船身。海风冰冷刺骨，母亲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条胳膊挽着一个行李箱和一个包袱。我也扛着些东西，但再也记不得是什么了。父亲在我们身后拽着另外的行李，一言不发。在船舱里有种特别的气味，这毕竟是艘日本人的帆船。船虽然小，但因为黑暗我并没意识到它有多小。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几点离开的。我想做的就只是睡觉。我们全部躺在这艘日本船里的稻草垫子上，还有十几个其他的旅客。这将是我们的卧室。

父亲说，这是艘木头的老爷船。一艘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装载货物的木头老爷船

载人。接下去的三天里，它吱吱嘎嘎地走着，一切都在摇晃着。我们现在任由大海的摆布，就像我们曾经任由寒冷的摆布一样。无情的波涛蹿得比船首高出许多，打湿了每一寸甲板。我醒过来，看到许多乘客都在往桶里呕吐，发出的臭气简直让人窒息。母亲把我带到狭窄的甲板上透气，那儿有更多的脑袋伸出栏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有晕船。

我们头晕眼花地抵达了京都以北的一座小港——敦贺。但渡海的痛苦已经被彻底的欢乐所取代。突然之间，我们自由了。我们逃过了德国人，也逃过了苏联人。我们历经了西伯利亚和大海而生存了下来。在维尔诺、莫斯科、火车上、还有海参崴，我在父母身上感受到的那种恐惧已经消散在这咸咸的空气当中。相反，现在却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惊讶。这儿有像欧洲那样白雪覆盖的山峦，但也只有这一种相似之处。我有些不知所措了，真的是一个陌生之地的陌生人——就像一个在右手天地里的左撇子。人们戴着草帽，用可笑的扫把在各处铲雪。他们看上去非常矮，说的话对于我那习惯欧洲意第绪语系的耳朵来说简直是格格不入。建筑物也非常奇怪，与东欧的那些高大富丽、石制、带廊柱的楼房截然不同。多数日本的建筑装饰更加精致，可规模却小得多，是用木头建成的，并有纸糊的墙壁、木质的走廊和精巧的花园。与一切都显得巨大的苏联相反，这个和加州一样大小的群岛让人觉得局促和脆弱。不过比起我长期以来的经历，那儿更有秩序，也更加安静。不管军队如何，日本人民对西方来的陌生人还是非常友善的，这真了不起。他们对我们关心备至，和善有加。当我们走下跳板的时候，我听到围观的人说着一些我觉得奇怪的语言。“日本男孩儿，日本男孩儿。”他们用我不懂的话在说笑着。后来有人向母亲解释说，他们错以为我是一个日本男孩子了。

适应一种制度的节奏需要时间，不管这个制度是一种交易手段、一个组织还是一种外国文化。但到了1941年1月——离日本攻击珍珠港不到一年，时间让我们适应起来，对脚踏和推拿等按摩方法已经不觉得太奇怪了。当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日本正在积极备战，准备进攻美国，从而成为敌人。我们只觉得日本是一个避难所，而不是一座监狱。毕竟，我们能够逃脱厄运，都是杉原的恩赐。奇怪的是，日本人看犹太人的眼光，和法西斯主义不一样：犹太人具有金融方面的实力，因此可以成为同盟。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日本曾经打算在日统满洲里为犹太人建立避难地，以换取财政方面的支持来开发这个地区。不过，由于并未得到实施，因此该计划是否存在依然值得怀疑。可是，在其他国家向犹太难民关上大门的时候，日本仍然允许他们可以在中国上海定居。

这个国家的自然军国主义，宣扬以佛教禅宗思想为重心的无欲无求的平静状态来达到参透哲学真谛的开悟境界，对于这一点父亲却觉得很难认同。我们和这样一个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希望得到内心的平和与简朴的美丽，对于他们来说，一座砂石庭院的至朴至素都含有一种神秘的关系，在那儿茶道专家可以表演古老的茶艺，

在那儿诗人可以吟诵传统的俳句与和歌，在那儿竖立着没有祭坛的神龛，充满令人遐想的空间。但是几个世纪以来，这块日升之地同样也是一块武士和独裁将军们的土地。到了20世纪，日本的文化创造了一个具有强烈集体主义思想的国家：与其独自发光，不如参与到团队的胜利中去。也是由于这样一种思想的存在，战败的日本在战后数十年中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日本有限公司”。

直到现在，父亲走的每一步都可谓是明智之举。如果他是一个商品交易员的话，他将会占尽先机的。在压力和关键时刻，他具有一种超常的判断力，一种第六感觉，从而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无论在德国人抓我们之前离开别列斯多克，拒绝和苏联军队一起回去，让母亲和我乘坐最后一班列车偷逃出别列斯多克，还是设法从杉原大使那儿获得签证，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到达日本，面临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又一个关键岔道的时候，他又一次显露了这种能力。必须决定在哪里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可以选择的城市有东京、横滨和神户。每个城市都设有美国领事馆，但问题是你必须申请地居住。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着呢。对于哪一个美国领事馆、哪一个签证官更有可能签发签证，那些比我们先到日本的新朋友们各持己见。第一个问题是逃亡犹太人永远摆脱不掉的问题——谁更反对犹太人。也有传闻说有些外国领事馆喜欢个人而不是家庭。然后是所有问题中最关键的：一旦到了美国，是工作还是不工作？一种说法是，如果说你要找工作，这很好，因为你不用给国家增加负担。另一方面，有人会说，如果你要找工作，这会很糟糕，因为你会抢了一个美国公民的饭碗。因此，你选择哪一种讲法，自然应该到哪个美国领馆去申请签证。

父亲最终决定，说他和母亲会去寻找工作。他揣测，作为犹太教师他们不可能抢谁的饭碗。当然，由于犹太难民大批涌入美国，他并不知道对于他这种教师是否有更大的需求量；或者在美国是否有一套可行的犹太教育制度。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申请突出了两人的教育背景，从而说明一旦到达彼岸他们便能立刻对社会派上用场。他们是教师，父亲决定利用这一点。我们还听说不同的国家有其入境配额限制，美国也准备向犹太难民关上接纳的大门。各种说法满天飞，诸如美国拒绝了一条船的犹太难民入境，并且把他们遣返回了欧洲，等等。形势绝对不利于我们。不过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而父亲也不可能由此而束手束脚。

很明显，应该选择神户住下来，因为那儿对于难民来说最便宜。东京在那时就已经算贵了，犹太劳动委员会这个在日本帮助难民的机构也只能提供有限的资金。不过父亲觉得通过东京的领事馆我们的胜算会大一些。由于在那儿住不起，经决定母亲和我住在神户，父亲就在两地间来回跑。他要搬到东京去，离神户有七个小时火车的车程。在东京他和其他两个朋友合租，以获得居住身份并从而能够在那儿申请签证。周末他会乘他称之为“难民特快”的列车回到神户。他并不孤单。许多人都用这一招儿申请签证。就像在科夫诺，成千上万名犹太人面临的那一场看似随机的淘汰过程一样。这并不需要什么先来后到，而且政治避难的要求也起不上什么作用。

我们入住的公寓在一座木框架建筑的二楼，只有一间小卧室。我们不知道在这儿要待多久，没准儿是一辈子。神户有 100 万人口，其出口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40%，是日本主要的港口。神户的橡胶厂和钢铁厂 24 小时吐出浓烟，使得城市上空那一层厚厚的灰色云幕久散不去。不过神户也有田园风景，像西南一带的垂水区。那儿的农民在山坡上开垦梯田，养牛，并用稻草按摩牛身以便让它们的肉质更加精瘦。离市中心几分钟路程便是海滩和山峦，后者被称做日本的阿尔卑斯山。日本人对他们的山峦甚为崇敬，并常常到山上朝圣，不过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还很少有去爬山运动的。

到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改变——迅速的改变。仅仅 18 个月的时间，我就从波兰到了立陶宛和苏联，最后又来到了日本。在那段时间里，我上了两个不同的学校，我那漂泊者的词汇表里又加上了立陶宛语和三脚猫的俄语。现在我又要进入一所用日语授课的国际学校。又一所学校，第五种语言要应付。父母也必须去应付。

按之后的情况发展看来，我们第一场语言斗争来自英语而不是日语。父母陪着我办理入学手续。教师不是日本人，她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我觉得是名贵格会会员。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当然还有英语，以及一丁点儿其他的语言。在几分钟的见面中，父母和这位教师建立了他们的巴贝尔塔。他们所在行的语言中竟没有一种可以让他们自由交流的。当老师说让父母在“中午”下课后来接我时，父母竟然没有听懂，这不禁叫人有些想不通了。

开始母亲以为老师说的是“月亮”，她明白这个单词在英文指的是地球的行星。但很明显，月亮出来时才下课是不可能的。后来才搞清楚，老师说的是“中午”。父亲觉得他知道答案了，“中午”是意第绪语单词表里的一个字母，但开始时父母并没猜出老师的用意何在。然后父亲开始数数，意第绪的“中午”是第 15 个字母。她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他想到，“我们下午三点钟来接他。”

她可真不容易。第一天下课后这位老师同我一起等了 3 个小时，直到父母最终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当他们试图改正错误时，父母和老师之间戏剧性的对话又开始了。我能够听出他们语音中的无奈。绍勒姆·阿莱西姆的故事没错。双方嚷嚷完了，老师指了指手表，任何疑惑都一扫而光。手势和符号当天救了我们大家。

可计算一天的课时有多长却算不得什么烦心的事，我头发的长度才真正让我痛苦。为了遵守日本学校的校规，我的发卷儿剃到只剩下贴着头皮的那 1/4 英寸。可当时父母却非常高兴我进入了这样一所学校，即使这意味着我可能要变成彻底的光头。父母的观点是，为了有机会让我和同龄的孩子们在一起互相影响，这三千发丝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而已。他们是对的。自从我上次和同龄人在一起学习，自从我最后一次听到孩子们的嬉笑喧哗声，至今已将近有 3 个月的时间了。和大人一起经过了这样一段令人紧张的时光首先让我和新同学们打起交道来不那么自然，我很容易腼腆，但我却迅速地适应起来，虽然语言方面还有障碍。他们并不是你通常的那帮住

在隔壁的小伙伴们，这是一个班的外国人，谁都是在漂泊之中。由于我们是世界公民，我们都有一种与自己的年龄不相称的老成。他们的父亲不是外交使团的成员，就是商界人士，或是和我们一样的难民，他们来自欧洲、印度、非洲、南美以及中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家庭要在日本长期停留。对于我家来说，日本是往别处去的中转站。要待多长时间，谁都说不上来。父亲说，这要看回答得是否正确，书面功夫是否做到了家。

同时，生活变得按部就班起来。刹那间，日本将我们那恐怖和冰冷的周遭世界变成了一方温暖湛蓝的天地。没有人跟踪我们，没有人在抓捕我们；相反，友好的人们，鲜艳的和服，木屐，简直是目不暇接啊。那儿有源于古老的宗教习俗和佛教典礼而成为引人入胜的歌舞伎和文乐木偶戏的日本表演艺术。那儿也有攀登富士山的奇妙之旅，你会看见这座火山顶上升腾而起的神秘烟雾。也就是在这座山顶上，我第一次看见了一尊慈眉善目地端坐于神龛中的真正的菩萨。那儿有银座，商店云集，行人们摩肩接踵，满眼都是彩虹颜色的和服；丽人们着宽大的腰带，或短小的羽织上衣，抑或是靛青的蜡染轻便和服。看着这些却无动于衷，那才叫难呢。

一次，父亲对周围这种新文化热情突发，一反常态，坚持要求共享一顿日本料理。在外国食品方面固执己见、不尚试验的父亲，这次却走进了一家陌生的餐馆，在一份奇怪的菜单上点菜，这与他的秉性有违。但是，他却这么做了。他向那个只会讲日语、笑眯眯的侍者，对着那张日本菜单上配图的几个料理比划着。母亲脱了鞋坐在榻榻米上，双唇紧闭，使劲憋住了才没有笑出来。腌黄瓜和卷心菜是熟悉的口味，一些生鱼片的味道让我想起了父亲的鲱鱼。我们竟然吃完了包着紫菜的饭团。直到开始嚼一种富有弹性的小东西时，父亲黝黑的面孔竟变成了白色，我们这次美食历险随即宣告结束。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鱿鱼。母亲一点儿都没碰。从那以后，我们开始在家里开伙。那儿有许多三文鱼和金枪鱼。由于日本人的主食是米饭和鱼，我们也入乡随俗，只要有鳞鱼。即使在日本，母亲都能够始终如一地不吃犹太教所戒除的食品。比如说，只有反刍和偶蹄类的动物是教规允许的食品，还有带鳞和带鳍的鱼类。贝壳类的水产品和爬行动物是绝对忌食的。父亲对这种只吃教规允许食品的规矩深恶痛绝。可让父亲有苦说不出的，母亲做到了令行禁止，连她的母亲甚至她母亲的母亲，等等，全部都是这个样子。

虽然父亲发誓在能看懂菜单之前决不外出用餐，对于探索日本文化，父亲的胃口却大得很，这一次我们可谓是浸淫其中了。有一次，父亲拉着我的手，向母亲道了再见，我们两人便直奔公共浴室而去。日本的洗浴传统来源于日本神道教仪式，但对于日本大众来说，洗澡已不再具有任何宗教含义了。在办公室或农田里辛苦一天之后，他们习惯于以洗澡来清洁身体，放松神经。我并不是十分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因为在公寓里我们有一个澡盆，不过不像这儿这么大，这么深，又这么拥挤。我还记得蒸汽从水面升起的景象。开始时觉得水非常烫，不像我们从海参崴

渡海时，站在甲板上所溅到的冰冷海水。有人告诉我们，这水是从几处温泉流过来的。两人的身上只有一层肥皂泡，权且可以遮遮羞。我们跳进一个微型的浴池，里面早就有一大家子人在等着了：父亲、母亲、孩子、堂亲表亲一大堆。可我们后面又跳进来一家子。我们在同一池水里洗啊泡啊，互相看着笑着，热热闹闹地过了一小时。父亲承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共浴，但就像他后来同母亲说的那样，这的确是一种跨越语言障碍的奇妙方法。

我相信，日本人是地球上最有礼貌的民族之一。一天清晨，我们在去拜访一位朋友时迷了路。父亲对一位过路人打起了手语，向这位日本先生指指信封上的地址，问怎么走。看出我们听不懂日语，这个人不管自己正在上班途中，在接下去的一个小时里他一直陪着我们，一直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为止。

但是也有令人不愉快的时候。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床边看着下面的人们，突然，我下方的土地开始摇晃起来，四周的墙壁也动起来。这还不算什么地震，几乎没有任何损坏。不过这可把母亲吓坏了，她一把抱起我，冲出了房子。等到我们跑到门外，地面已经平静下来。家具移动了位置，我们少许的盘子、罐子从壁橱震开的门里掉了出来。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损失了。虽是虚惊一场，可另一个威胁却让人担心。我们听说了关于1923年地震引起的大火毁灭东京城的故事，看起来我们得适应这些经常发生的震动。当然，我们在神户的遭遇只是家常便饭而已，50年后，也就是1995年，那场里氏7.2级的地震让这座城市蒙受了灭顶之灾。不管怎么说，作为难民的我们，对土地的颠簸已经习以为常。而且，与自然母亲打交道总比与那些手里攥着你的生杀大权的官僚们打交道容易多了。

3月底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父亲沮丧地回到了神户。他告诉母亲，去美国的可能性非常渺茫，许多申请都被拒之门外，而犹太代表处的人也让他再考虑一下其他的选择。或许，他建议，我们应该去上海住下来，那儿的犹太人似乎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生活得不错。我们明白我们必须朝前走，但并没有像在立陶宛时那种孤注一掷的紧迫感。虽然我们根本想不到9个月之后即将发生袭击珍珠港的事件，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却时常谈起美国和日本之间逐渐紧张起来的政治局势。这些讨论让父亲同样有种不祥的感觉：像我们这样被激流冲来冲去、失去控制的人们，只能在战争中苟且偷生，我们的努力已经不太重要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这些激流却出人意料地调转了方向。消息说，我们得在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到达东京大使馆，这是获得去美国签证的先兆。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可我们现在在神户。如果我们错过了规定的时间，谁知道将会是什么结果。美国政府甚至可能知道我们并不是东京居民。在我们匆匆赶往火车站时，父亲心急如焚。我们坐上了去东京的夜车，并且不管是坐在三等车厢里，一路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我们吃了些母亲买来的水果，剩下的便只有看同车的旅客美美地吃着从各个站点小贩那儿买来的装在小盒子里的米饭、生鱼片和什锦蔬菜。我们抵达

Leo Melamed 利奥·梅拉梅德
Escape to the Futures 逃向期货

东京时刚过两点，我感觉到心在怦怦地跳着，就像我刚爬过了一座山。我能想象出父母的心脏跳动和肾上腺素的分泌。我们坐着出租车在拥挤的交通中绕来绕去，最后到达大使馆（就在现在的大仓宾馆对面）时整整迟到了一小时。我记得当时母亲不停看表，并每隔 5 分钟报一次时间。

我们拿到了签证。虽然父母尽力地克制，但他们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即使母亲已经想到了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们可能要面临的种种灾难。直到今天，母亲的忧虑还伴随着我，我把它从波兰带到了美国，并进而影响到了我的职业和私人生活。我称之为别列斯多克综合征：当心啊——灾难就潜伏在不远的地方！但在东京的那一天，我们又一次击败了命运。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6 章

再见日本，你好美国

对父母和我来说，隧道另一头的灯光总在摇曳着，但从来没有熄灭过。还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旅途，才能渡过太平洋，然后在一个有新文化、新语言的新国家里定居下来。可那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情，还要过很久才需要应付。当务之急是财务问题。在战争临近时我们关心的是经济，而非军事。

乘“平安丸”号轮船离开横滨还有几天。但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在当时，美国的移民法规定，每个人境家庭必须拥有至少 50 美元的资产。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一家属于赤贫状态，并且长期如此。50 美元可是一大笔钱啊。除我们以外，那些数以万计、准备离开日本到其他国家去的犹太难民们面临着同种境遇。像我们一样，大多数家庭不名一文，需要某种形式的资助。

我的外汇黑市买卖的第一次体验即将到来，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帮助新到者和全球难民的犹太劳动委员会已经为我们预订了船票并支付了费用，在那儿工作的员工们还想出一个办法来绕过货币限制，也可以为委员会的小金库里添砖加瓦。日本居民手里不得持有任何外国货币，但只要有一张有效的签证，一位旅行

者在离开的前一天便可将手中的日元兑换成美元。美元是一种值钱的货币，比方说，当官方汇率是 500 日元换 1 美元的话，黑市价可能会是 900 日元换 1 美元。

办法是这样的：在离境的前一天，一名委员会员工陪旅客到银行去，在银行里旅客拿出签证以证明自己目前正在当地中转，然后从委员会的账户里提出价值 50 美元的日元，再换成美元交给旅客。上船之后，旅客向船上的会计出示那 50 美元，后者则会将此记录在册，并说明旅客和他的家庭并没有身无分文。这桩事情便如此这般办妥了。然后，旅客会将钱塞给那个上船来祝愿他一路平安的“朋友”。这位朋友实际上是委员会安插在那里的，他唯一的任务也就是将那 50 美元拿回来，并在黑市上以两倍于官方牌价的汇率换成日元。这种官方市场和黑市之间的货币买卖帮助这个机构——还有在日本驻留的成千上万名难民支撑下来。

刚一登上“平安丸”，父亲便飞快地朝会计办公室挤过去，后面跟着犹太劳动委员会的人。但哪儿也找不到那位会计，可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让访客们下船的哨子声就已经响了起来。委员会的人便向父亲要钱了。“我不能把钱给你，”父亲请求着，“他们会来找我，并把我从船上扔下去的。”父亲绝不想功亏一篑，他跑到一位船员身边，要求知道船长室怎么走。父亲坚持说，这是件紧急的事情。他找到船长时，后者正准备进入驾驶舱指挥开船。当时，哨子吹得越来越频繁，尖利的声音从四处传来，在父亲和委员会代表听起来，这声音显得更加狂乱。父亲找到了船长，把那 50 美元往他面前一放，证明自己不是一无所有一至少在那个时候。自然，船长绝对搞不明白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旦上了路，会计不是就能轻而易举地把这种事给解决掉吗？但父亲和委员会的那个人非常清楚，这是一桩交易，也是拯救犹太人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参与这个计划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让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地实施。父亲明白这一点。当然，我还太小，丝毫不能理解发生的这一切，直到后来有人解释给我听。当时我所目睹的就是一个人疯了似的奔过来奔过去，这个人恰好是我的父亲。那也是船长所看见的。父亲的执拗，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位过于认真的移民想要按照法律规定从而开始新生的一种表达而已。船长亲自将那 50 美元记录到账册里面。父亲大大地感谢了他一番，然后将钱塞到委员会来的那个人手中，后者便在开船几分钟前下了船，直奔黑市而去。我们也出发了。

“平安丸”虽说不是“伊丽莎白二世”号，可它也不是像“邦提”号（美国影片《叛舰喋血记》中发生起义的帆船名）那样的旧帆船。一般人看来，它还是可以算得上一艘高级的客轮。母亲和我共用一个舱室，父亲则和另外一个人合用一间。我们的目的地是美国，入境港是西雅图。父亲告诉我，这段航程很长，就像横穿西伯利亚一样。站在甲板上远眺壮丽的太平洋时，他由一名父亲变成了导师，试着教我认识那些发生在这个让我迅速成长起来的世界中的事情。父亲知识面之广总是让我惊讶不已。阅读乃关键所在，他当时总是这样强调。但不幸的是，我们身边再也找不到意第绪语书籍，这已有很长时间了。所以父亲便成了我早年旅行时的知识来

源，动不动我就会找他问个究竟。他是满足我那孩童好奇心的“应答机”，将我的逃亡之行变成了发现之旅。

他先从地理开始。他解释说，我们位于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海洋上；地球的大部分覆盖着水，而大部分水又是咸水，我们现在便是在这种水上航行。我曾看见过最深的湖，现在又是最深的海洋。潮汐、天气类型、洋流——他试图将这一切塞进一个正在像地球那样旋转的脑袋中。对于我这个地理知识飞速增长的9岁儿童来说，时空概念未免难于理解。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向我解释何为国际日界线，我们怎样能够将同一天过上两次。与父亲曾经教我的有关温度的概念一样，时间之谜也值得人们思考。

时间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一样东西。大自然用时间来避免每件事情同时发生，或许这么说的那个人是对的。我不知道。对于我们身后日本的那些佛道人士来说，时间只是一个自身在循环往复的圆环。一些人用它来疗伤，可另一些人的伤痛却因它而延长。它能够产生智慧，或者正如一位哲学家诙谐的思辨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最好的老师，可不幸的是它把所有的学生杀了个精光。想比它更聪明，或比它更长久，或赶上它的步伐（除非你以光速运动），都是不可能的。时间——还有时机的选择——是我们在摆脱大屠杀的这场赛跑中的关键因素。两年的逃亡为我们赢得了一生的时间，虽然直到25年后，当自己的生命和分秒必争的期货交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效率和速度的意义。

在航行的第二天，我遇到一个和我同龄的少年，名字我已记不得了。虽然我们的语言不同，通过孩子们的一些游戏我们却可以顺畅地交流。这样，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一起在轮船上探险、创造各种游戏，一起眺望大海。他是印度人，说印度语，而我说的却是意第绪语或波兰语。我们互相取笑彼此发出的奇怪声音，这让我们觉得在旅行之中找到了知音，并很快成了朋友。我们搞到了一张棋盘，我便试着教他下棋（可笑的是，象棋是他祖国的发明）。在海上的两星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虽然我们不是度假的游客，但我们还是非常轻松。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都要到美国去，船上的每个人都已经摆脱了逃亡的阴影。大人们的情绪是高涨的，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不见了，而我又有了一个新朋友。奇怪的是，这是次没有风暴的旅程，船开得又平又稳，连咸咸的空气也沁人心脾。长期以来，我第一次听到父母笑出声来。笑的什么，并不重要。我们正往一个新世界而去。

我们于1941年4月18日抵达西雅图港。克里斯多弗·哥伦布和他在“圣玛丽亚”号上的水手们在他们发现东方时都做了些什么，我没有把握，但他们一定是跳上跳下，拍手大叫，高兴得就像“平安丸”上的旅客们看见美国海岸线出现在视野里一样。尽管，父母解释说，我们从“错误”的一边进入了这个新世界。历史上，欧洲的移民是从亚特兰大登陆，在埃利斯岛接受入境检查后进入美国的。

这对我来说却不重要。现在我们将成为那些重要的移民统计数字的一部分了。我

们是新旧世界的交汇，我们急切地想要成为希望之梦的一部分，那种梦对我们意味着自由而并非财富。我们已经到达了这片资本主义之地，但我们却没有资本，并历经了世界上最为残酷的境遇。我并不在乎我们来自于世界上“错误”的一边。来到这儿我很高兴，我痴迷于我所看到的一切，而能具有这次冒险的经历更让我激动不已。我再一次觉得像是肖勒姆·阿莱希姆《领唱者之子》中的摩托尔抵达美国时，我和他一样的好奇和自豪，满脑子都是他们的朋友派恩经常脱口而出的那些词语——哥伦布、民主、自由！“这片自由之地啊，”他挥舞着双手称赞着美利坚，“在这儿人人平等，再没有贫富之别，万岁哥伦布、万岁莎士比亚、万岁乔治·华盛顿。”

我是真正来到了这里吗？这片“牛奶和蜜糖的土地”！现在我们该旧门换新符了。父母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他们的教书生涯了。而对于我来说，虽然那时我还没有意识甚或是还没有打算过，无论是追寻自己的梦想还是不务正业，新世界中充满这样的机会。我也没有思考过太过深邃的某些东西：父母已经拯救了我的生命。

年纪轻轻便踏上了逃亡之旅，我相信，这使我能够应付生活的变幻无常。生活的本质中蕴含着一种节奏和韵律，而我刚刚开始领悟到其中的表现方式。的确，从别列斯多克到芝加哥，这段旅程漫长且不时充满危险，可在一个孩子看来，这却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就像植物的种子从地层深处某个地方成长起来，并直到后来开出花朵一样的冒险。早年的生活经历让我知道如何冒险、如何在边缘生存、如何适应变化、如何了解别人，还有学会了如何绕过障碍。有些人活了一辈子，总是试图在熟悉的领域中找到捷径。我们的足迹遍布了世界3/4的土地，跨洲越洋，却从没有计算过两地之间最近的距离，也没有被以英里或公里注明这些距离的图标所吓倒。我们不会被参数给捆住手脚，不管这些参数是书面上的还是头脑中的。

现在我们要前往最终的目的地：与母亲的两个姐妹以及她的那些外甥和表兄妹们会合。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家人，也是我们的担保人，并会负担我们去纽约的火车票费用。另一次漫长的旅行等待着我，又要穿过一个大洲。不过，父母向我保证说，再也没有像横越西伯利亚那样长的旅途了。可这次也够长了，4天走了4000英里。“北太平洋”号上的这段旅程让我们三人大为感慨。美洲大陆的幅员辽阔深深地震撼了我们的神经，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简直是无话可说。车上的人不一样，那么自信，那么高兴。他们眼神中没有丝毫的恐惧，而在往日的旅行中我们已经习惯看见同路旅客们眼中的这种表情了。列车也不一样：比西伯利亚的那辆更大也更快。甚至铁轨也不同，苏联铁轨之间的距离要更宽。父亲解释说，苏联统治者们知道，如果遭到入侵的话，较宽的铁轨距离会使其他国家的火车头和车厢在那儿动弹不得。

冬季依然固守在这个国度，白雪覆盖的洛基山脉，它们那被风、雨和冰川雕琢而成的嶙峋面貌看上去就像乌拉尔山脉一样的雄伟壮观。宽广的高原绵延无尽。城市也是不同的，它们都非常庞大。我们从西雅图折向东南，过海伦娜、瑞比德城、圣

保罗和芝加哥，然后便是旅途的最后一程。

但当列车到达大中央车站时，我们对来到纽约市还没做什么准备。家人正在那儿等着欢迎我们。又一次的拥抱和眼泪，但并不是在别列斯多克或维尔诺的那种，它们带有一种痛苦后的轻松。我们是团聚在一起的家人，看到我们时每个人都打心眼儿里高兴。那是一个安全的时刻，而我两年来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但真正震撼我的是这座城市。当我步出车站、迎面看见纽约时，我立即觉得自我的渺小，仿佛一个巨大的东西张开了嘴，将我们全家都吞了进去。我也看见过高山，但还没有看见过像山一样高的楼房。到处是人流、车流和喧嚣。这座垂直的城市躁动不安，带有神经质，摇摆在五花八门的文化和人群的律动中。瞬间，它在我身上好像是施了魔咒，而这是其他城市所不曾有过的。这个魔咒贯穿了我整个生命。当然，开始时我是犹豫的，甚至有些害怕。但我立刻爱上了它。这儿有源源不断的惊奇，这儿有不受抑制的力量，这儿有无穷无尽的冒险，这儿是美国的脉搏；在这儿我可以滔滔不绝地用意第绪语聊天，而且也有人明白我在说什么。

从大中央车站到布鲁克林坐的是飞快的地铁。我的阿姨萨拉和贝莎，我的表亲诺曼·特什和珍妮特·艾萨科维兹，还有其他人，都异常外向。他们左一个拥抱，右一个拥抱，立刻就把我们带入了他们的生活，好像我们早就是他们亲密的家庭成员了。让我们惊讶的是，“巴巴”寄来的卡片在等着我们；或许是她知道我们能够成功抵达这个新世界，所以送来了她的问候或者是道别？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后的联络。两个月后，在1941年6月27日，也就是希特勒重新占领别列斯多克的当天，我的两位祖母、姑姑玻波尔和其他的亲戚们，以及数百名别列斯多克的犹太人被押进犹太会堂——就是父亲作城市委员时拒绝进入的那座会堂，整个会堂浇满了汽油然后被付之一炬。没有人从那座炼狱中逃脱出来。而直到战后很久我们才听说了他们的命运。

每个人都来看我们。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不过他们都是亲戚，他们也都爱我们。我们围坐在一张铺着漂亮亚麻桌布的大桌子旁边，这些新亲戚们为我们的回家祝酒干杯。后来，父母开始讲述这段“梅拉姆多维奇一家的奥德赛”。听听母亲是怎么说的，她说我的手她差不多挽了有两年的时间。然后萨拉阿姨给了我一袋薯片。“能想到吗，”我一边高兴地大嚼，一边想道，“盛在袋子里的又小又薄的马铃薯饼。”我是多么热爱美国啊！后来，我那已经二十多岁的表哥诺曼成了我个人的英雄。他一直保护着我，直到8个月后美国参战，诺曼加入了海军。

我猜我们在纽约受到的这种令人温暖的欢迎，就是有史以来数百万各个国籍的难民们——犹太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波兰人等，在他们最终成功扑进美国安全的怀抱中时，从家人那儿获得的那种欢迎，这是真正、自然且自发的欢迎。而几乎同时我觉得我早就认识他们了，这对一个9岁大的孩子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课，它让我明白了血浓于水的道理。我们的家人们从此保持着紧密的关系。

几天后，我们搬进了一家位于河滨大道某处的酒店。它紧靠哈德逊河，在上游80号左右，是初来者在纽约西区的一间国际性的避难地。虽然只有一间房，但我们也不必像前些年涌入的移民那样，挤在下东区沿海斯特和奥查德街而建的那些廉价房子里。在当时，他们开始像低等舱位的旅客，后来他们成了居民，却共用卫生设施，房顶则是孩子们玩耍的操场。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犹太人们与其说是为逃避贫穷，倒不如说是为逃避迫害才来到美国（战后，在全世界的城市中，更多的犹太人愿意生活在纽约）。

几个星期后，我们已是有所见识的纽约人，出发到布鲁克林去回访我们的亲戚。萨拉阿姨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把我们当成孩子那样接纳了我们）提出要来接我们，可被父亲拒绝了。他想表现一下他作为纽约市民的独立和技能。我们准备乘坐地铁。当时，他自称可以阅读城市地图了。我们顺利地到达，并且和我们的家人共度了美妙的一天。不知不觉，夜幕降临，该走了。对方又提出送我们回家，父亲再一次予以拒绝。我们上了地铁，坐稳了身子开始享受回程。可我们放松得过了头，父亲犯了个经典的错误，地铁将我们带到了中央公园的另一边。当我们走到地面时，我们给吓傻了。“呃上帝呀，”母亲用意第绪语低声说，“我们这是到了非洲吧。”我们在某个星期六凌晨一点时站在了哈林区的正中央。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美国黑人的聚集区。当我们震惊于眼前这对于欧洲移民来说完全陌生的景象时，那里的人们却真诚而友好，没有什么敌意行为，但我们这边却异常好奇。有人过来指了方向，我们这才循着原路回到了酒店。那天晚上我们了解到了纽约的地域分隔以及文化之中还有亚文化的这种现象。

因为父母都是享有盛名的教师、意第绪语专家和社会党研究学者，纽约的犹太文化圈子迅速将他们邀请进去，举行了数不尽的聚会和欢迎仪式，父母在这些活动中介绍了国外的最新消息。他们也经常讲到我们在漫长的寻求安全的旅途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并深入分析战时的欧洲形势。父亲还时不时公开讲述纳粹统治下犹太人定居点的危险局面，并呼吁纽约的犹太人团体们尽力去拯救他们。父母一般都会将我带到这些场合去，而说着意第绪语的我也能让众人快乐起来，因为虽然我年纪不大，但却能说一口“纯正的意第绪语”。这在纽约非常少见。因为融入了英语和一些盎格鲁词语，意第绪语的纯洁性遭到了破坏。由于一直是教师，每当父母听到别人说的意第绪语错误到他们的语文修养不能容忍的地步时，他们经常会加以模仿并礼貌地对这位说话的人进行纠正。他们有时会私下里重复他们听到的所谓美国式意第绪短语，接着便大笑一番。Lozt arop die vinde，这句完全错误的“放下窗户”的意第绪短语，就是父亲经常取笑的一个。“窗户”在意第绪语中真正的对应词语是fenster。在美国生活期间，我们家里的意第绪语一直保留着它的文人特质，而至今为止，我的意第绪语也仍然维持着大部分的纯正传统。

一天晚上，父母知道不会太早回来，他们便决定将我留在酒店。因此我便成了

“小鬼当家”，想干什么干什么，可也就是听听收音机，然后在九点钟之前上床睡觉。在那个时候，周围几步之遥住着人，酒店大堂里的桌子旁也有人 24 小时值班，这就足够安全了。9 岁大的孩子能做的坏事寥寥无几。但尽管如此，为了不使我醒来后发现父母不知去向而着慌的情况发生，我还是写了张字条儿，提醒自己他们整晚上都在外面。那可是一个不眠之夜。可能是因为外面的交通，或是汽笛的长鸣，或是喧闹的邻居，总之有东西在凌晨两点钟把我吵醒了，然而父母还是没有回来。我穿上衣服，离开了房间，到大堂里面去等他们。但当我在外面逛来逛去的时候，可能没有看见回来的父母。他们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回来了，却发现我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张字条儿。这张字条儿可让母亲犯了难。对林德堡绑架案记忆犹新的她，坚信我已经给人绑架了，随即昏倒在地。这事儿报告了警察，而当他们到来的时候，我也出现了。从此以后，父母便开始密切留意起我的动向所在了。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父母为我报名参加那个聘用他们任教的夏令营的原因吧。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看住我，而且知道宿营经历有助于我的美国化进程。他们比他们所设想的还要正确。那是纽约市外几个儿童营中的一个，参加儿童的中产阶级家庭背景和我家大体相近。营地面积广阔，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游戏。入营的有几十个孩子，我与其他几个 9 岁的男孩子住在一个木屋里。我的辅导员名叫弗雷迪。虽然父母就在附近，我却几乎看不到他们。我平生第一次单独生活了。我自感遭到了抛弃，比在日本登陆时更觉陌生。这儿的中级阶级孩子们健康快乐，每个人都孕育于美国文化中，每个人都说英语，这对我是门外语。孩子们玩着各种各样的美国游戏，我却一个也没有玩过；在多数时间里，他们打棒球，这个游戏在我看来真是神秘至极。他们游泳，而我从来没有学过。他们穿短裤和高帮运动鞋，这些我也没有。我和周围世界格格不入，心中既痛苦又难过。弗雷迪设法帮助我，想教我些游戏的玩法，可这太难了，其他的孩子们也没有耐心。我成了孤家寡人，而孩子们中冲在前头的几个也开始嘲笑着这个好坏球不分的生手。面对这些戏谑和手势，我却没有像其他那些心情好的孩子们那样不以为然，因为我不懂这种语言。我脆弱极了。为了能够融合进去，每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也只能大笑，表示我也在嘲笑自己。

我怎么知道棒球是美国人的业余爱好，我又怎么知道基本上每个 9 岁儿童都能够挥棒、接球或跑垒呢？我不可能知道。让事情更糟的是，我的身高在同龄人中算是矮的，我是一个不能挥棒的生手加矮子。我每晚都哭。而当辅导员得知了我的苦恼后，他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只能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来安慰我。我不能跑到父母那儿去，因为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受到了优待。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就会被贴上“妈妈的娇宝宝”这个标签。我可怜极了，可这才过了第一个星期。

我咬紧了牙关，熬过了那个夏天的两个月。等到该回家时，我已经了解到有关美国文化的一些事情，并尝到了不能融于周围的痛苦。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始学

着用英语说话了。父母是正确的。也不知怎么的，两个月以来用英语说话感到的羞辱却起到了好效果。这是一次值得忍耐的速成学习，我甚至学了些棒球。我的“菜鸟”称号很快就被遗忘了。

我再也不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搬家。在走了 3/4 个地球后，安定下来真是太好了，在这儿有家人，在这儿我有机会成为其他每个人那样，再也不管和那些孩子们发生的事情了。我热爱纽约。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我就已经成为“大苹果队”的忠实拥趸了。

一些城市是建立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的。底特律靠内燃机跑了起来；芝加哥一度被牛力所拉动；洛杉矶以它的梦工厂而发达；但纽约好像这些都有，其天地之广阔让你正中下怀。由于我最终可以说这门语言了（几年中我的第六门语言），我在这儿觉得特别开心。如果一切可以由我决定，我宁愿在这儿待上一辈子，但谁又猜得准命运的安排呢？我从夏令营回来的一个月后，我们又一次收拾起了行囊。芝加哥的绍勒姆·阿莱希姆学校邀请父母前去担任终身意第绪语教师。父亲保证我也会喜欢上芝加哥的。不管怎么说，我别无选择。1941 年劳动节后不久，我们即往这座“风之城”飞去。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7 章

芝加哥情结

我爱上了芝加哥，但更重要的是，在这座城市里我成了一个美国人。我们搬到了芝加哥市中心西北部的一座三层楼房住了下来，就在亨伯特公园的马路对面。房子里有卧室、客厅、餐厅、厨房和浴室。以往两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我们不是拥挤在小民居里，就是颠簸在车船上，因此新住所相比起来显得宽敞极了。我就睡在餐厅里的两用长椅上，而当朋友们来访时还能用做卧室。这是两年多来我们的第一个家。在接下去的 15 年里，我们就住在凯泽和哈顿两处居民区里。

当时我已经进入罗维尔小学念四年级，我有很多学业要赶。我已经错过了两年的初级教育，当然，对英文的读写知道的也不多。孩子们知道我是个外国人，这是个无法隐瞒的事实，不仅我的口音出卖了我，还有我的“菜鸟”特点，就像我性格中的另一面，在以后的几年中一直不离我左右。对我来说，每样东西都是既不同又新鲜，而我全要从基础学起。夏令营经历让我学会了用英语交谈，却没有使我对街道上、小巷中、公园或学校里的生活做好准备。即使在那些住在市郊的人看来，美国大都市的中心城区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美国文化知识的

外国小孩来说，中心城区简直成了火星。那儿有它自己的规范和模式，有它的着装要求，有它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又一次，我必须重新找回我的平衡感。再一次，我谁也不认识，不知道如何说话，不知道如何着装，不知道如何走路，也不知道如何思考。在以后几年中，我就像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离群索居的孩子们，尝尽了只有他们才明白的辛酸滋味。

尤其还有棒球对我的诅咒。它跟着我从纽约来到了芝加哥。纽约人固然有值得他们自豪的“扬基队”，可芝加哥也有“小兽队”，40年代正是他们风头正劲的时候。如果你是个北方佬，那你一辈子就得背着“小兽球迷”这个称呼（该队实际上参加过全国联赛，并于1941年赢得美国联盟赛冠军。从此后该队再没有赢得过冠军。但我认为每个球队都有可能倒霉上一个世纪）。对于“小兽”的疯狂是属于整整一代人的，而我已经把这种疯狂传给了我的孩子和孙子们。我成了棒球的三项好手，但这只是跟我自个儿比较而已：我不会击球、不会接球也不会丢球。虽然我还没有爱好上棒球，可它在同龄人生活中的那种重要性我却开始看到了。每个孩子都有一位心仪的球员并将其作为模仿的对象——某个“宝宝”、“乔”、“斯坦”、或“泰”（球队球员的小名）什么的。当我早已不是十来岁的孩子，棒球对我来说代表的便是纪律、愉悦和雄心壮志——这些使任何工作具有成就感的调味因素。又一次，品味的愚钝为我个人带来了痛苦。别人讥讽我、嘲笑我。虽然我时常用自我封闭来躲避，但不知为何我却从未产生反抗情绪。在这种笨拙之中，我变得坚定起来。

或许是早年的经历与同龄人迥然不同的原因，我同他们疏远开来（比如拿我的名字来说吧，由于老师是波兰后裔，所以立刻知道可以把它翻译成利奥。但对于父母、亲戚和在当时或今天意第绪语圈子里的朋友来说，我仍旧是莱勃尔）。在“废料回收运动”、“橡胶运动”、“债券运动”、“胜利花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政府号召大众节约、捐助美国军队的一些活动），当然，还有食物配给等方面，战争的表现无所不在。报纸、电台广播、标志、标语、电影屏幕，处处也都有战争的存在，一些同学的父亲正在参战。可尽管如此，战争离美国好像还是非常遥远。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到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威胁。对孩子们讲述战争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将一座大厦夷为平地的炸弹的威力有多大；或者也没有看到过在那些不分士兵和平民的军队的枪口下惊慌失措、四散奔逃的人群。运动，而非政治或战争，调动着大多数小学朋友的兴趣。但作为一个逃离了战争的恐惧的孩子来说，我还是不能忽视它的存在。父母不允许我这么做。这场战争，以及欧洲愈演愈烈的大屠杀中犹太人的苦难境遇，都是我家吃饭时经常讨论的话题。那儿，就在我们的餐桌边，我关于民主和自立的意识渐渐清晰起来。

父母在职工作，这让我的生活与外界更加隔离。虽然他们提供了一个颇为舒适的家居环境，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马路上游荡，就像一个少年那样。我可不是一个混日子的流浪汉，也不是一个来自“地狱厨房”（内战后纽约哈德逊河边的一个街区的

绰号，经常有青少年在此打架滋事，发泄不满和反抗情绪）的愣头小子。我是“钥匙串孩子”——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语，用来形容那些父母在外工作，放学后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但回到40年代，双亲都在外工作，这种情况确实很少见，无非是父母就在街角开了间夫妻店，穿着镶边围裙，推着吸尘器满屋子转，这种“亨利·阿尔德里奇式”（以及后来《把它留给娘们儿吧》系列剧中）的母亲形象就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写照。一旦战争结束，甚至连萝丝和瑞芙特尔也要回到厨房。不过父母的生活观念却与之相左。像父亲一样，母亲是一名职业教师，而且不希望让家务琐事拖她的后腿。

父母学校的工作下午三点开始，正好是我放学的时候。当我从学校回到家里，他们已经走了。他们是梅拉梅德夫妇——小学教师，肩负着一种使命。母亲相信，与在锅碗瓢盆中的劳作比较起来，课堂上的工作要神圣得多，而且具有更大的解放意味。此外也有现实方面的考虑，我们需要她的收入，因为一名教师的工资实在微薄。在那些长途跋涉来到美国这片“黄金之地”的移民看来，我的父母并不是他们小时候见过的那类“梅拉梅德”。在他们俄国或波兰的故乡，姓“梅拉梅德”的人，通常是位“拉比”，在一座“切德尔”（宗教学校）里教授“陶拉”（圣经）。那是一种完全严格而正统的宗教训练。从19世纪晚期开始，并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间逐渐庞大的移民潮中，人们因为连年屠杀、贫困不堪而逃出了东欧。他们到了美国，寻找自由和机会，并且也带来了根深蒂固的精神和文化的传统。像父母亲一样，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放弃了传统的行为模式，放弃了“宗教是犹太人身份的唯一证明”这一观念。虽然他们保持着对犹太教义的信仰，他们更加喜欢他们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节日和他们的意第绪语。他们对于他们的孩子所要求的，比“切德尔”能够提供的还要多。他们要求加强孩子作为一个民族子民，而不仅仅是一个不同宗教团体成员的这种独立身份，针对他们的答案便是世俗化的意第绪语学校。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犹太人知识分子精英团体中的领袖们便决定有义务对这种要求做出反应。1908年召开了切尔诺维兹国际会议，当时像绍勒姆·阿什、亚伯拉罕·莱辛、柴尔姆·希特娄斯基这些文学巨匠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宣布意第绪语为美国全国性语言，并建议学校向儿童们教授这种语言。

在美国同时发展起了两类犹太学校。第一类是传统的希伯来学校，同时由犹太教会堂赞助，课程有“陶拉”、一些希伯来语以及犹太教习俗的理念。第二类是意第绪语学校，则完全世俗化，尤其排斥宗教。它的课程包括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文学和歌谣、犹太民歌、犹太历史、节日。这些学校里的“梅拉梅德”们就像我父母，是受过培训的教师。在芝加哥，从1912年开始，第一所这类世俗化的意第绪语学校开学了，校名叫“全国激进意第绪语学校”。许多其他的学校也纷纷效仿，芝加哥犹太人的社会政治观五花八门，而每一所学校即代表着赞助者不同于他人的社会政治观念。

最终，两种主要的意第绪语学校制度留存下来：“劳动者圈子”的那种和“绍勒姆·阿莱希姆民族研究所”的那种。“劳动者圈子”是一个势力强大的全国性劳动和共济会组织，由一群具有社会主义观念的东欧移民于1892年在纽约建立。它的目的是为工人阶级提供疾病保健（它曾在纽约的利勃蒂镇建立了一座肺结核疗养院）、殡葬服务以及通过意第绪语的公民和文化活动进行的知识修养培训，借此清除工厂在工人头脑中遗留的灰尘。到20世纪30年代，“劳动者圈子”已有8万多名成员，成为传播世俗化犹太文化的主要力量，并且在美国各大城市催生了一批意第绪语学校。不过它与社会主义的紧密联系将一种政治气氛带进了课堂，这便遭到了一些学者和知识领袖的强烈反对。为保持课堂中的政治纯洁性，“绍勒姆·阿莱希姆民族研究所”在1925年5月25日成立于芝加哥。创立者为雅各布和萨拉·杜波、M. 布劳恩斯坦博士以及柴姆·波摩朗兹。教授的纯粹是非宗教、非政治性的文学课程。

意第绪语学校的理念产生了效果，在20世纪整个30~50年代这种学校大为增多，而且一直存在到了60年代早期。在高峰时期，它们包括了芝加哥地区的许多学校、一所意第绪语中学（三年制中学）、犹太研究大学研究生课程，还主办了假日学校赞助的活动，有庆祝逾越节而在全城范围举行的“第三次萨德尔”的欢庆活动，在整个芝加哥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1941年9月，父母成为“绍勒姆·阿莱希姆民族研究所”学校的教师，父亲最终也成了学校的校长和首席运营官。在其后的20年里，随着芝加哥北部犹太居民的移入，这些学校蓬勃发展起来。1962年，与珍妮特·法波尔梅尔以及其他当年在芝加哥意第绪语学校就读、现在已为人父母的其他夫妇们，我们成功地领导创建了“劳动者圈子”和“绍勒姆·阿莱希姆”学校的联合后代。这座位于芝加哥北郊斯基的“北郊意第绪语学校”成功办了十多年。该校运营的许多资金，都是来自我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里的交易伙伴们每年的捐助。事实上，“北郊意第绪语学校”显著不同就是，它部分的预算是从猪腩合约的交易中支取来的。若干年中，我最为亲密的交易搭档之一马娄·金，和我共有的一个交易账户，就是为该校的利益而开设的。不过，世事无常，大多数这类世俗化的意第绪语学校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销声匿迹了。

在美国的犹太世俗主义、意第绪语文化和犹太民族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初的支持者已然老去。兴起于19世纪中期，从欧洲扩展到美国和南美，并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达到新的高潮的意第绪语文化、意第绪语文学、新闻、批评和戏剧的黄金时代，却在希特勒横扫欧洲时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它的这一自然进程深深地也是永远地断裂了。与600万遭屠杀的犹太人一起，大批的作家、哲学家、学者以及意第绪语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也同时罹难。新世俗文化的知识基础土崩瓦解，这造成了犹太民族正常进化链的紊乱。

而且还有其他的因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繁荣，制度上的反犹太主义明

显地减弱，相应地发生了极大程度上的民族同化。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代美国犹太人后来居上，成立了以色列国。这个羽翼渐丰的新兴民主国家，浴血而生，对美国的犹太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族主义的自豪、宗教以及犹太教集会开始缓慢地取代了对世俗化意第绪身份的需要。如果战后的一代移民——我这一代人准备改变世界的话，这必然将要发生在一个新的世界而非旧的世界环境中。当父母意识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飓风一般席卷意第绪社会中时，他们的哲学观点却坚定不移。虽然他们允许一些变化进入他们的生活和学校（犹太子弟成人戒律预备科目最终成为课程的一部分），他们对于以色列的热情却不如美国犹太人那样强烈。他们的生活中都是关于意第绪世界的书籍和回忆，但这个世界正在逐渐地消失远去，他们的奉献使这个世界撑过了接下去的45年光阴。不过像其他那些等待自己的子女成为律师或是医生的第一代移民一样，他们也在等待着。

我也在等着他们。每周三天放学以后，我会去意第绪语学校上课。其余两天，还有意第绪语学校下课后的几小时里，我会任由自己的想象驰骋，与广播剧中的英雄们为伍，像汤姆·米科斯、杰克·阿姆斯特朗，还有“午夜船长”（当时著名的广播剧主角）；或者在居民楼的狭窄过道奔跑，在巷子深处与伙伴们玩捉迷藏，或一条龙地排成队——“猜，猜，多少根手指竖起来？”我们房子的街对面是沃尔瑟纪念医院，边上的洪堡公园是街坊们的后院，那里有青草茸茸的小山包、自行车道、可以攀爬的树木、运动场，还有一块为自行车赛修建的洼地（偶然被一场火烧出来的）。我经常和住在街角的意大利人家待在一起。这家人有四个孩子，他们待我就像第五个孩子一样。我还碰见了童年时代的第一个死党——杰拉德·斯派克斯理，他的家人高兴地接纳了我，我同他们度过了无数的时光，不过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在街上游荡。但也有不开心的时候。芝加哥的西北部是犹太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的一个熔炉。基本上，各个种族的孩子自己待在一块儿，只有在上学的几个小时里才与其他种族有直接的接触。尽管没有公然的反犹太主义举动，可时常令人感觉它说不定就会从底下爆发出来一样。像我们这些在街上闲逛的孩子，总会时不时听到一句“你这个肮脏的犹太种”。数年来外国文化的经历和外国生活的际遇，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每一次新的经历都是一次新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潜在问题的根源，每一次挑战又是一次教训。很快我就学会为了生存必须得寸土不让，因为面对讥讽、威胁或是打架而退缩，将会招致另一次的讥讽、威胁或打架。在我还没来芝加哥之前，在社会上遇到这种遭遇时退缩这种办法便早已从我的自卫词典中消失了。因此，在每一次威胁性的遭遇中，无论是在学校里、街道上或是操场中，不管是对于明显的讥笑、实质性的攻击或是口头上的侮辱，我都会本能地进行反击，施以对手同等的待遇。在这个街区里有一个叫“路易”的小孩儿尤其可恶（每个人的生活中至少有这么一位“路易”），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欺负别人的机会，不是用一块石头或是雪球，便是一句“嗨，你这个肮脏的犹太种。”而我也从不让他有什么好

结果——以牙还牙。这固然让人内心坚强起来，但并不算是一段好日子。

晚上七点刚过，父母便从学校回来，我们边吃晚饭，边用意第绪语聊聊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但欧洲的往事总会强烈地影响着我们。欧洲战争、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以及美国意第绪文化的前途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父母的英语学得相当快，部分是因为课堂中进行着一种语言上的反馈：他们教孩子意第绪语，而孩子又教他们英语。不知为什么，母亲对美国的行为方式接受起来要容易得多——她更为灵活、适应性更强。而父亲就难了——他从不希望被美国化。在他的头脑和心灵里，父亲从没有真正地来到这里，直到去世那一天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欧洲人。

父母生活在一个平行的意第绪文化世界中，芝加哥的世俗化犹太生活侵蚀着它，而它又为许多机构——教育团体、政治团体、戏剧团体、音乐团体——所信奉。毕竟，他们是旧欧洲那些曾经领导过波兰世俗化犹太运动的知识精英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家庭变成了芝加哥意第绪文化活动的“麦加”（圣地），它不仅经常是城里各种重要犹太世俗化活动的中心，对于多数重要的犹太名人和文学人物来说，它又是他们来芝加哥访问或讲学时的必停之地。由于社会活动的频繁，晚饭刚过，父母通常会去参加一些与意第绪社团有关的会议或聚会。我经常被留下来进行“神游”，或者自行其是。周末他们有时会把我带上，可是在上学期间的晚上，我就待在家里，简单的规定就是必须在晚上10点之前上床睡觉。可我却经常违反这条规定，往往收听广播直到午夜之后。

当我参加各种意第绪文化活动时，我的角色并不是听众，而是一名表演者。演出通常包括一位歌手、一位钢琴师、一位诗歌朗诵者、一位政治或社会问题的演说者。同那些爱表现的父母一样，我的母亲和父亲会把我拽到一群人前朗诵意第绪语诗作。诗作的主题通常是对战争和大屠杀的反映。在我这个年纪就掌握意第绪语的孩子不多，何况幸运的是我还具备了一点艺术天赋。父母成了我的戏剧导演，不仅提供并安排艺术表演素材，而且还与我待上几个小时，确定我已记住了要背诵的东西，明白其中的意思，并能够正确地传达出它的含义。时间一久，朗诵次数频繁起来，随着信心的增加，我变得更加在行。有时，我竟然可以在诗作者面前进行朗诵，该作者还是活动的特邀演说者或来我家拜访过，这种经历便尤其特别，并极其激动人心。最终，我在芝加哥的意第绪圈子中获得了“天才年轻演员”的名声。这一重要的经历转变成了一种演说才能，使我毕生受益匪浅，并且让我在听众面前交流时从容而自信。从9岁到10来岁，几乎没有一个月不进行朗诵表演的。有的在弥尔沃基或底特律举行，但多数还是在芝加哥，因为那儿的意第绪文化比较繁荣。后来，我的诗作朗诵让我登上了犹太人的戏剧舞台，并结识了诸如我的舞台导师蒂纳·海尔珀恩等演员。海尔珀恩堪称国际明星，1988年她以78岁高龄在巴黎一座挤得水泄不通的剧院里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8个月后她因癌症在芝加哥去世。

意第绪语戏剧1876年开始于罗马尼亚，而1887年前，随着大批涌入西区麦克斯

韦尔大街居民区的犹太移民们，它就已经来到了芝加哥。可笑的是，这些在附近罗斯福道的意第绪剧院里休息娱乐的移民们，许多人就是创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黄油和鸡蛋商人。他们中还有其他意第绪群众——小贩、“血汗工厂”的工人、苦力以及小型生意人——津津有味、兴高采烈地观看这些戏剧演出。演出的有对安息日的表现、歌谣、诗歌和舞蹈、犹太人的英雄史诗、古代帝王和先知的故事、现实生活剧，以及对故乡的回忆。一批意第绪演员放弃初衷，转而成为主流演员。其中一位便是生于芝加哥的穆尼·维森弗若恩特，他后来成为奥斯卡奖明星，以其好莱坞式的名字保罗·穆尼而著称。不过，海尔珀恩——这位欧洲著名女演员伊达·卡明斯基的侄女，为躲避大屠杀被迫离开波兰的故乡，将毕生献给了意第绪戏剧事业。1947年在芝加哥，海尔珀恩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扮演鲍希亚，莫里斯·施瓦兹饰演夏洛克。

我们在1939年逃出波兰的同时，海尔珀恩在美国纽约意第绪艺术剧院的初次亮相获得了评论界的如潮好评。这是一次苦乐参半的胜利。战争已经在波兰爆发，她在美国孑然一身。她虽然得救，可她的父亲、兄弟姐妹还有数十名亲戚却死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她是一位长着黑色头发和敏感五官的美女。海尔珀恩和她的丈夫丹尼·纽曼——芝加哥抒情歌剧院的公共关系官员，于1960年在芝加哥建立了意第绪戏剧协会。海尔珀恩时任意第绪戏剧协会总监，在她挑剔的选拔下，我参加了几部戏剧并出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我同曼亚·季奇思、胡塞·波尔西亚、柴可·福克斯以及莫里斯·马松等意第绪演员共同参与的成功制作都是经典的犹太剧目，像《基什维马赫一家》、《米莱勒·埃弗若斯》、《多娜·格拉兹亚·蒙德斯》。

作为20世纪40年代的少年，我能够被邀参加这些在芝加哥西区道格拉斯公园剧院上演的职业演出，算是够幸运的了，而受到著名演员莫里斯·马松的指导更是我的荣幸。在那些年的很短一段时间里，我曾经考虑选择演员作为职业，我甚至还去过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去体验“波西米亚”的感觉。但父母对这个打算听都不想听。业余演出可以接受，甚至令人欣赏，但要作为一种职业，表演并不是我的选择。我可以考虑的绝对不能低于医生或律师。

芝加哥的意第绪文化的触角也伸向了空中的电波，它又为这个成长之中的演员提供了另一个场所。直到我变声之前，我在每周五晚上和周六下午播送的意第绪肥皂剧中扮演儿童角色。我通常可以到时收听，因为剧集已在前一周预先录制完成。关于广播剧这件事，我没有告诉我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少年人特有的谦虚吧。另外，他们对意第绪语也听不大懂，所以没有什么意义。由于诗作朗诵、广播和戏剧的表演，我与意第绪文化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而对父母的有关犹太世界方面的要求，我也几乎从来不拒绝。

甚至当我到了该领受犹太戒律的年龄，父亲依然坚持他的世俗化立场：他不允许我参加这种成人仪式。相反，我开了一场特别的13岁生日聚会，为这次聚会我将近

花了一年的时间准备。当大多数 12 岁的孩子在拉比的辅导下学习“哈夫陶拉”，一种取材于“陶拉”并与他们不同年龄段相配合的读物时，我的情况可是迥然不同。没有拉比、没有祷告、没有仪式、只有父母，以及唯一的任务：写一篇自传，当然，用意第绪语写。

我用自己的语言，记述了事件、人物、场景、文化、战争、逃亡、在美国的生活——种种我能够回忆起来、曾打动过我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场辉煌的冒险，但也是一次悲怆的经历，因为家人和朋友都留在了身后。战争接近尾声，有关大屠杀死难者的无情数字正在统计之中。欧洲已经变成了受屠犹太人的巨大坟场。纳粹们以他们精细的运输系统、奴隶劳动营、条理分明的屠杀和焚烧流程，以及回收毛发和受难者牙齿中间黄金填充物的这种疯狂的经济计划，向世界首次展示了死亡的工业化。欧洲的战争即将在我 13 岁生日的两个多月后结束。地理上，我已经和这场战争分离了 4 年，可在感情上我却从来没有将它遗忘。在以后的数年里，我遇见过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我比起来，他们对纳粹的野蛮暴行的了解要深刻得多，听完他们的讲述，看着他们的眼睛，我才知道这段痛苦的回忆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模糊。

每天放学后以及周末，我苦苦地回忆着。莱勃尔·梅拉姆多维奇 35 页手写的回忆录交到了一大帮父亲的朋友、同事和意第绪圈子里的知名人士手中。甚至意第绪报界——著名的《向前》出于对父母的尊重和他们在社区中的声望，采访了阅读会，并对活动做了完全的报道。在我以戏剧化地高声朗诵每一句时，父母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喜悦的光芒。这次聚会，与其说是我的，还不如说是为他们而举办，而正因为如此，我学校里的死党一个也没来。我仍然是大人中间的小孩子，仅有这个角色才最适合我。但与当时生活在美国的大多数同龄人不一样的，我拥有对世界的感觉——它的善与恶以及对自我的感觉。不过，我还不能完全明白世界是如何改变了我。在那个年纪怎么能呢？

今天，当我重读这篇自传时，我意识到在头 13 年里我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年轻的印第安纳琼斯。我不禁同意那些古希腊人所说的，一人的性格便是他的命运。来到一个地方可能是偶然，但留在那儿却是命运。我成长得很快，可能是太快了。一个即将成为男子汉的少年，他的回忆录带来了眼泪和欢笑，这让我明白了当时我不曾明白的东西：我有我自己的命运。

在我整个小学时代，我从未真正感到舒畅过，尽管在八年级时我丢掉了口音、掌握了英语和算术并成为班上前几名时也是这样。与杰瑞·斯派克斯里一道，我甚至成了一名巡逻队员，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帮助小孩子们过马路。在凯尔文夫人的带领下，这支巡逻队伍可是罗维尔学校的一张“王牌”。这个声名显赫的团队，有帽子、皮带、徽章和军官等级，我曾被提升为少尉。这支罗维尔巡逻队甚至参加过全城的队列比赛。我还成为一只“金鹰”，也就是课外俱乐部的成员。不过在会议上，我还

是经常会滑入一种自我抑制的状态，不太愿意说话，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听上去孤陋寡闻。而以后我便再也不会这样谨慎行事了。

我扶摇直上是在初中。到了1946年秋天，当我成为芝加哥北区罗斯福初中新生时，我的难民形象被永远地抛弃了。那是一场新生。没有人知道我的移民历史，没有人在乎。虽然我继续着意第绪教育，每个星期日去意第绪初中上课，但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属于罗斯福初中的。可能是这一次我意识到我的梦想再也不会用意第绪语来表现。我不仅听上去像个美国人，而且我像美国人那样思考，像美国人那样穿着，像美国人那样做梦。世界在变化之中，我也是一样。我的笨拙和羞涩被信心和雄心而取代，还有一帮朋友，他们可不是什么愤世嫉俗的敏感小子。不管怎么说，还没到时候。大多数的人们仍然痴迷于富贵繁荣的美国梦。冷战中的那种神经过敏还没有钻到美国人的脑袋里去，那要在1949年夏末苏联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时才会发生。

我成了个贪婪的书虫，这使我的学习受益匪浅。我最早的决定之一，是将一条已上升到使命高度的计划付诸实施。这是我孩提时代不经意听到的上千次谈话的结果，那时只要有成人在家里聚会的话，我就安静地坐在窗台上或一把不挡道的椅子上听他们讲话。父母的客人们围坐在客厅或餐桌旁，尊崇地谈到一些作家、谈到书籍和哲学家，他们经常引用篇章和词句，有时还会为它们的意思争论上个把小时，而每当此时，我那对各种知识都如饥似渴的年轻的大脑，都会牢牢地抓住他们谈话中的每词每句。我暗暗发誓，一旦长大，他们所说的东西，我一定要亲自学会，而且知道其重要的原因。发现罗斯福中学一楼的那间图书室后，我便立刻壮起胆子走到沃特斯太太跟前，她是学校的图书管理员，留着一头醒目的蓝色头发。我问她是否能告诉我经典图书的摆放位置。我猜想这是一个不太正常的要求，因为沃特斯太太花了很长时间与我讨论我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最后达成了协议，由她提供一份书单，上面那些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作家大名，她认为配得上我的要求。我得承认我并没有读完这份单子列出的所有书目，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四年后我一直看到左拉才结束，这总算还说得过去吧。

在那段文学之旅以及后来的阅读中，在某些地方，我遇见了一大批没有人选沃特斯太太名单的作家，可他们对我却有更大的吸引力，并成为我挚爱的伴侣。像厄·海明威、阿尔德斯·赫胥黎、詹姆斯·乔伊斯、艾里克·马里亚·雷马克、托马斯·曼、菲利普·怀利、约翰·李·加里，还有我终生的最爱——劳伦斯·德雷尔。在这一早期的文学生涯中，我还发现了儒勒·凡尔纳和H. G. 威尔斯，他们引我进入了奇妙的科幻小说世界，这是一个我从未离开过的世界，在那儿我还遇见了乔治·奥威尔、亚瑟·克拉克、拉里·尼文以及雷·布拉德伯利等人。

既然我的学业已经赶上了别人，我就能够开始竞争了。我当上了校报的副主编。我还进入社交圈，并成了积极人物。值得纪念的是我第一次听到了音乐，这种音乐既不属于犹太世界和意第绪舞台，也不是母亲洗盘子或打扫房屋时请我欣赏的、用

她那柔美非凡的嗓音唱出来的歌谣。虽然我从来不会跳吉特巴，我却发现了弗兰克·辛纳屈、弗兰基·莱恩和佩吉·李。我还发现了“萨奇魔”^①和爵士的世界，在那儿还有科尔垂恩、霍金斯、穆利根和布鲁贝克，他们那种非传统的声音奇怪地与我钟爱的科幻小说作家的天马行空合上了拍子。

最为重要的是，棒球不再是唯一的体育项目，篮球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虽然按年龄来看我依然矮小，可在篮球运动里，我是平等的，因为大家都是新手。我加入了初中的学校兄弟会，不仅交了大量的朋友，而且获得了一种归属的安全感，加上还有一件可以借给女朋友穿的俱乐部夹克。中学交的朋友是一个人毕生最亲近的朋友，在我身上也是如此。在罗斯福的四年里，梅尔·塞尔茨、杰瑞·斯派克斯里和我形影不离，至今为止我们还保持着极深的交情。杰瑞·斯派克斯里和我曾梦想成为商业界的大亨，把中西部收入囊中。他确实成为一位精明强干、出人头地的大律师。唉，因为他后来上了哈佛并娶了一位来自东海岸的姑娘珍妮特·科特勒，他便在纽约定居下来，而我们联手合作的梦想也仅仅变为社交方面的聚会。不过，如今我们的亲密程度不亚于当初两人在罗斯福中学走廊里闲逛或一同逃课时的光景。像那样的朋友是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梅尔·塞尔茨却始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芝加哥人，而我们又继续在很多方面有所交往。塞尔茨是一位职业商业艺术家，专门从事儿童书籍的插图绘制工作，但对我来说，他可谓知己，并也是我的良师、同胞和最好的朋友。

每一个哥们儿对我的成长都有一定的贡献，而他们又各有特点。比方说，泽夫·古辛，就是个“打领带”的家伙。不管我们在哪儿——看电影、打篮球、吃热狗——泽夫总不忘带上一条领带。有人穿着衬衫走来走去，有人穿紧身牛仔裤，有人穿黑色的皮夹克。可泽夫偏偏就喜欢带着那条讨厌的领带，跟个预科学校的小子似的。

那时街上相对来说安全些，而我们仍然是纯真未泯的年纪，并正在充分地享受着这段时光。我们曾经的时代，是一个炫耀暴力的时代，数百万年轻人接受着杀人和破坏的训练。而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这种社会氛围迟早要反映到年轻人的性格之中。虽然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街上的帮派活动，诸如暗语切口、各种独特的仪式以及置人死地的打架斗殴等才在大城市日益滋生起来，但当时我们偶尔也会经历上一次险情。就像有一次，我们三个人，斯派克斯里、古辛还有我，离开了梅尔·塞尔茨家，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帮家伙，他们坐在街边的平台上，那段街道非常地僻静。突然，他们站起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场“嘿，犹太种”般的遭遇，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泽夫的领带上。这条领带在芝加哥的那片地方简直是格格不入，对方觉得它是一种敌意的表示。难

① 著名的美国爵士表演艺术家路易·阿姆斯特朗。

道这个打领带的家伙想传达什么不利的讯息吗？他们满腹狐疑地嚷嚷着。其中的一个人摸出把六英寸长的弹簧刀，其他人抓住了那条领带。杰瑞·斯派克斯里和我正准备动手阻拦，谁料到泽夫会说出下面这句话来。“嘿，算了吧，哥们儿”，他求饶道，“这是我爸爸的领带。”那可能是他有史以来说过的最傻的一句话。他的表达被当成了挑衅，甚至连杰瑞和我也愣了片刻。顷刻之间，那条领带被一刀两断。接下来只不过有些轻微的推搡，但既然受辱的自尊得到了补偿，他们便放过了我们。

这次事件让我觉得世界是多么无可奈何，就像我们从别列斯多克出逃那样。如果我们打另一条马路走，泽夫就不可能只剩半根领带了。第二天他带了条新的。

中学意味着许多事情，包括姑娘（高中时期，我跟一年级几乎所有的犹太姑娘都约会过）、作业、电影、运动和相关的一些东西，但对我和我们一伙来说，它也意味着“四个轮子”。战争期间，汽车很难得到，只有破烂的旧车，而且非常昂贵。但战后，当底特律再一次从坦克转向新款轿车的生产时，产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二手车，对于一个有临时工作的少年人来说，已经差不多能够买得起了。而我打了许多临时工。我很早就具备了创业精神，而生意的经营之道更是引人入胜。在小学的最后几年中，我开始挨家挨户地卖杂志。在一个美元和一只“午夜船长”的解码指环的诱惑下，有哪个小孩不会变成一位资本家呢？

虽然我升入了中学，但我的野心也只能和我的成熟程度相一致。我又长了一岁，而解码指环和箱子上面那些玩具都是低年级小孩儿的东西，并非是属于中学新生的。所以我转向了火箭、樱桃爆竹和各式各样的鞭炮。我的伙伴们，杰瑞·斯派克斯里和泽夫·古辛，成了我鞭炮生意上的合伙人。当时鞭炮在伊利诺伊州已经禁放，所以也就不再出售。不过我们绕过了障碍，就和“禁酒时期”芝加哥的走私贩子一模一样。我们成为进口商，从临近的印第安纳州的制造商那里订货。送来的货都小心地保存在我的地下室里。那时我们通常将它们卖给街上的孩子们。每一次买卖我都会叮嘱道：“如果给抓住了，千万要说你是从一些骑自行车的孩子那儿买的。”生意日益兴隆，但命中的劫数也到了。一天，我刚成交了一笔生意，一辆警车便发现那些满手都是鞭炮的孩子。警官问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些东西的。这帮孩子就按我的原话做了回答。警察四处一瞧，只见我发疯似的沿着马路向前骑着自行车。他们逮住了我，并把我送回了家。

我给两个铁塔似的警察夹着，就这样上了三层楼梯到了公寓。母亲开的门，她的嘴巴、眼睛一起颤抖起来，显得困惑至极。就在他身后，父亲正站在梯子上贴墙纸——我们自己进行装修。警察将前因后果告诉了他们。开始父亲点着头，后来便投来那种冰冷的凝视。一位犹太父亲，当他确信自己的儿子最终将成为社会渣滓时，便是这种目光。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就像面对绞刑宣判时的埃尔·卡蓬。我发誓再也不会步入歧途了。警察没有发现我们在那间小屋里库存的鞭炮，可清理出这批存货，好家伙，却花了杰瑞和我大量的时间。这批鞭炮最后沉到了芝加哥河底，那

儿是各种走私货物的公墓。

下一个利润颇高的合资企业是和梅尔·塞尔茨一起搞的，那是一年以后了。这次我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开始了避孕套的批发生意。我们知道中学里每个男孩儿皮夹里都会放上一个（如果没有实用的目的的话，也只是以防万一），作为一种成年男子的标志——即使烂在皮夹里也无所谓，事实上经常如此。我们从一个医药分销商那儿买进了两整箱，享受了每包五美分的大量购买折扣，每包里有三个橡皮套。我们按每包 50 美分的价格出售，这远低于市场价，而且还省去了面对一些好挖苦人的药剂师时的尴尬。钞票源源地涌入进来。可随着生意名声的扩大，我们也开始心神不宁起来。好像每一个街角都猫着个警察在等我们，或总有什么人尾随其后准备将我们抓个正着。虽然生意是合法的，由于年纪的原因我们还是有负罪感。我们害怕极了，便决定金盆洗手。只有一件事要做——丢了这批货。一个下午，梅尔和我驱车开过洪堡公园，我将一箱避孕套从车窗里扔了出去。箱子撞上了树裂了开来，里面的橡皮套子四散飞射，就像手榴弹里飞出的弹片一样。我们转念一想，知道接下去孩子们会在街上争抢这些东西，便很快改变了主意，匆忙把它们拾回来，往森林保护区而去。剩下的东西在那里的湖底找到了安息的地方。

整个中学时代，我赚钱的本事清楚地反映在我所开的车型上。阿尼·华沙斯基是我的驾驶老师，这位伙计拥有一辆吉普——手杖式换挡杆。当然，一节课 50 美分，够开一小时左右的油钱了。一旦我掌握了这门技艺，我便渴望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花了 6 美元，我便拥有了我第一辆车的 1/4。它是一款“T”型车，需要曲柄启动，并还要人再推上一把才能跑。后来梅尔和我一道买下一辆 1928 年的拉塞尔，不带刹车和油门踏板。开着这辆车可是一场“马路灾难”，而只有拉起紧急刹车才能把它停下来。断裂的节流阀使它几乎每停一次都要熄火，所以时刻必须保持开动状态，碰到禁行标志也只能慢慢地开过去。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亮红灯的主要道口，我们不得不躲开那些喜欢开罚单的交通警察。一天，在我们向北往密尔沃基和金波尔颠簸行进的时候，遇上了交通堵塞。我们祈祷千万不要在道口遇上一位总是会站在这种地方的交警，可命运并不合作。这辆老东西熄火了，而且节流阀也掉了下来。我沉着地跳下车来，掀开前盖（它立刻落到了地上），用手拉起油阀杆，梅尔重新启动了引擎，将车驶过那个拥挤的交叉口。警察的哨子已经在我们背后响了起来。我们转过街角，在路沿上停下车后，便逃之夭夭，把我们的痛苦留给了城市车辆认领场。我们肯定这辆老拉塞尔不可能牵连到我们，因为没有任何车牌。在我初中时期，我正正经经地拥有了我的第一辆车，它是一部 1936 年产的、冬季性能好于夏季的克莱斯勒，不过它为我服务得非常到位。第二年我的档次提高到一辆时髦的 1941 年产的庞蒂亚克，也就是战前制造的最后的那一款。塞尔兹骄傲地开了一辆 1934 年产的福特，而斯派克斯里则得到一辆崭新的雷鸟作为毕业礼物。

我与汽车的浪漫情史，从来也没有结束过。驾车高速穿行于车水马龙中的那种感

觉，是我生活经历的一种写照——总是有危险，总是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地转弯，并总是有加速的必要。在60年代，当我最终负担得起一辆时，我选择了克尔维特。那辆1965年产、绿色敞篷克尔维特正是我的“梦中之车”。当然，在那之前，我已经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他们也同样喜欢上了汽车。周末，只要我不带着艾戴尔、乔丹或戴维兜风的话，我便会和其他有克尔维特的人去飙车。后来，我拥有一辆保时捷的终极梦想也得以实现。我一直沉迷在这个梦想里。

从内心来说，我是一个城市里的孩子，但在夏季我却成了一个乡下小子。每个夏天，从七年级开始，父母在印第安纳的贝弗里湖滩区租了间农舍，就在沿密歇根湖边的沙丘之间。我经常沿着又窄又陡的小径长途步行，或在崎岖不平的马路上骑自行车。那儿就像一个天堂，给了我许多童年的美好回忆。对于父母来说，夏季的生活是快乐和安定的。他们既不远足也不骑车。他们阅读或是和其他朋友谈论政治，这些朋友同样在夏天到这片湖滩来，他们也会沿着密歇根湖边的沙滩散步。母亲烧饭，而父亲总能找人来杀上一盘。迪堡夫妇，父母的朋友和绍勒姆·阿莱希姆学校里的同事，在贝弗里湖滩区有一座位于沙滩前沿的房子。每到周日下午，我们便聚在一起共度时光。日子过得闲适而安静，空气纯净，蓝色的天空越过湖面舒展开去，这让我想起了大洋上水天相连的那番景致。

随着我不断长大，那些原本就精彩的夏季变得更加妙不可言。在17岁后的那个夏天，我成为一个名为“祖国”的工人俱乐部夏令营的指导员。夏令营的主任是艾弗茹姆·古尔维兹，一位我敬爱的意第绪语教师——自父亲去世之后，他是我与父亲精神世界的最后联系。一个夏天，父亲接任了主任一职，这让我觉得有点儿怪，可我爱和年轻人打交道，并发现他们也喜欢我。我总是会为他们发明出一种不同的游戏或比赛，而我又十分擅长于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但“祖国”夏令营对我来说，不仅仅在于照顾小孩子。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个结识新朋友并使友谊牢固的地方，一个坐在星空下、木屋前的草地上幻想未来的地方。这里有自由、有成长、有恋爱。奇怪的是，夏令营指导员之间的罗曼史通常短暂得犹如昙花一现，但也有发展成终身伴侣的。在我们一组中便有很多。我们的总指导员谢尔顿曼·特尔曼，我们的长期友谊刚建立不久，他便任命我为副总指导员。他娶了我的指导员同志乔安娜·戴尔蒙德；尼娜·施瓦茨，我们的艺术和手工专家，也就是那个永远和孩子们打成一片的姑娘，最后与同事和兄弟会里的会友杰克·贝尔走到了一起；我的哥们儿西蒙·格尔顿则与同胞营员玛丽莲·卡莉什结了婚；而我，我的爱人是希茜斯·葛露斯基。她惊人的美丽，我俩一见钟情。我们炽烈的恋情持续了整整两个夏季。可惜她住在纽约州的水牛城，我们之间也只不过就是写写情书而已。

在初中阶段，我初尝政治的滋味是当我公开表示参加班长竞选之后。我很受欢迎，在此之前我已经拥有了演讲高手的名声，大伙儿都知道我可以从容不迫地在班级里数百名同学面前慷慨陈词。可也不能马失前蹄，为此母亲帮我制作了“狮子利

奥”的竞选标语，我轻而易举地当选为班长。高中时期，虽然我被看好再次当选班长，可我选择角逐副班长。这样我就可以成为毕业舞会的主席——中学里无与伦比的荣誉。我成了名人，其惯性一直影响到了我的社交生活，我被选为我所在兄弟会的会长。而当我发表了一些有关性的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后，我在哥们儿中的地位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当时，一个会员骄傲地承认他已经和他最近交的一个女朋友发生了关系。这种事情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是一种值得称颂和崇拜的征服。可连想都没想，我脱口而出：“你占了她的便宜，她也占了你的便宜？”每个人都看着我，仿佛我打破了某种神圣的信赖。可我还是坚持己见。我提出，女人，探索性方面的欲望与男人没有什么不同。而这种征服，我宣称，对双方来说是互相的。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又是在哪里获得了这种非同寻常的想法。不过，这为我贴上了一个“深邃思想家”的标签。但我在高中时代获得的最重要的地位是向高中班级发放储物箱。这绝对是一个权力地位；我控制了人们需要的某些东西。储物箱要多少有多少，但正因为储物箱的位置和学生课程安排之间的关系，才让它具有了价值。

也是在中高我遇上了贝蒂·塞特勒，她可爱、金发、娇小、自信、聪明。事后证明，贝蒂也是一只“菜鸟”，跟我一样。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贝蒂生于德国柏林，1938年3岁时同她母亲玛琳和姐姐丽耶坐着“法兰西之岛”号逃到了美国。不久之后，她的父亲哈里也设法从纳粹占领区逃了出来，还有她的舅舅塞莫尔和萨姆。她的菲尔舅舅后来也从奥斯威辛和达豪幸存下来并成功来到了美国。

我是学校里初中部的高年级生，她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生。我们一起在金保尔大街乘公共汽车到学校，一路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不知为何，她得到了一个极棒的储物箱，就在我的边上。我想这是一见钟情吧，虽然在一开始，我有时会把她和其他可爱的金发美人混淆起来。贝蒂聪明，好相处，也是其他男孩子围着转的那种。尽管我们时不时都有其他的一些浪漫情缘，但我和她中学四年期间一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我们也成了一批朋友结成的小圈子的一部分，大家一块闲逛、聚会、约会、打架，一起成长。有课要上、有作业要做，有女生联谊会 and 兄弟会要参加，还有体育活动、竞赛、舞会、电影和俱乐部活动。在中学里，大家都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多生命中难忘的事情，由此便建立了一种可持续一生、牢不可破的感情。老伙计梅尔·塞尔茨和杰瑞·斯派克斯里还有我，经常会进行“二对二”或“三对三”式的集体约会，几乎每个周末都混在一起。贝蒂的女伴们成了我的朋友，而她们的男朋友，也是我的莫逆之交。比方说，嫁给了艾贝·切尔夫尼的尤尼丝·诺文森，便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并最终成了我的私人医生，她后来主管了伊利诺伊州斯考基的茹什北岸医院。切尔夫尼博士的意第绪语会话能力使他有资格也成了我父母的医生。他们的儿子斯蒂夫·切尔夫尼和女儿菱恩也成了我儿子乔迪的朋友。斯蒂夫后来成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交易员。同样，贝蒂的儿时同伴格洛丽亚·斯坦博格嫁给了

谢尔顿·威尔斯坦，这也使后者成为我的密友之一，并且最终进入了国际货币市场的黄金交易池。

可能仅仅是 20 世纪 50 年代，战争结束，全球那种劫后重生的感觉，使得芝加哥北部罗斯福中学出现了如此强烈的同学情谊，但无论如何，当我们为了明天而拉起手、计划着、筹备着并梦想着的时候，生活是美好的。

在我心目中，从最初碰见她的那一刻起，贝蒂便是我要娶的那个人。虽然，我们之间也有风波，因为就在我的高中毕业舞会之前我们分了手，让我成为“舞会之王”的希望也付诸东流。不过，我们的爱强过任何一种舞会。我们在中学的恋情发展成了婚姻，从此后贝蒂和我便生活在了一起，正如我们当初在星期六晚上看的所有浪漫爱情电影描写的那样。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8 章

法律和混沌

我从来不曾奢望要步父亲的后尘，成为一名教师。他们也没有这样要求我。像大多数犹太父母那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从事医药或法律行当。对我来说，当我在 1950 年秋季进入地处海军栈桥的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圆形校园的前身的时候，的确还没打定主意。

我觉得栈桥的历史氛围非常神秘。建于 1916 年、耗资 450 万美元的这座栈桥，是一座水平巨型建筑，在密歇根湖偏北处的水面上延伸 3 000 英尺。这曾是芝加哥战前精神的最明显标志，也是视觉规划师丹尼尔·伯恩海姆为“风之城”所作之伟大的重新设计中的一笔。但是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运码头的使命并没有实现。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它时运多舛，结果就和芝加哥那些庞大的养畜场、钢铁厂和铁路系统一样，被时间和技术抛在了后面。但它并没有潦倒落魄，乃至被遗弃在风雨中烂去。老栈桥经过重修，焕发出了昔日的神采。现在它的身边是一座著名学府，自己也被用来接送船客。在 1995 年，它又一次被重修，成为一处曼妙的城市娱乐中心。

这儿的学术氛围可不是吹的。大多数学生是享受国会教育津贴、渴望重新开始生

活的退伍军人。他们严肃、聪明，而且在课堂里非常具有竞争力。课堂在一条近 3/4 英里长的走廊两侧。“栈桥”学校的外号由此得名：礁石上的哈佛（或者如有一些人给它的称呼，虽然不太尊敬却更为形象：礁石上的硬活儿）。课间十分钟，要从走廊一头跑到另一头的教室去上课，真是最好的一种有氧锻炼。对于老兵来说，作为一种转换，学校生活可是舒服极了。一些建筑是典型的匡希特式的房屋。我的许多朋友（能够负担得起哈佛学费的杰瑞·斯派克斯里除外，他念的是哈佛）也就读于“栈桥”，这儿是两年制的课程。学生可以从“栈桥”转去其他学校，或是去伊州南部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那·香槟主校完成学业。

“栈桥”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既有密歇根湖的盛景，又有一座优秀的、建立在一个运转良好（如果你相信这儿的政治家）的大都市中心的城市大学。在冬季，它也是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幸运的是，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风寒理论，否则它肯定会丧失一半的学生。那儿没有可称之为学生会的团体，却有一间咖啡店作为课间的聚会场所。它供应城北最浓的咖啡，也是一个让那些“红心”高手们蜂拥而至的地方。“红心”是当时在我们这帮小子中流行的牌戏。我们经常玩，有时是班际赛，有时是非班际赛，不过总是来钱的——一个红心 5 美分，黑桃皇后 35 美分。我一次彪炳千秋的辉煌战绩是以“103 个红心”终局胜出。也是在这间咖啡店里，我们比较课堂笔记、谈论政治、约会、评论女人，并且交流对未来的梦想。

我起初是一名医学院预科学生。如果我有成为艾尔伯特·施维策第二的丝毫野心，那也都终结在了生物学上，这皆因为那起“老鼠事件”。一个周末，梅尔塞尔茨和我讨论如何对付下周一进行的生物期中考试。由于那次考试主要是关于老鼠的解剖，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啮齿动物经分解后的各个部分。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星期五的下午，我们溜进了实验室，选了一只又大又肥、浸在甲醛溶液里的老鼠，把它带了出来。我们用报纸包着，将它扔到了我那辆 1941 年的庞蒂亚克后车厢里，以妥善留到星期天晚上准备供我们研究之用。当时是芝加哥的深冬，而等我两个晚上后打开车厢时，那只老鼠冻得硬邦邦的，就像保存在北西伯利亚冻土带中的某种冰河时期的毛茸茸的猛犸象。如此冷的东西，上次我还是在比罗·彼德臣才看到过。我们连报纸也剥不开了。

梅尔有了个聪明的点子。“我们把它煮一下吧。”他说道。我们把它带到梅尔在三楼的公寓里去解冻。他的父母总是傍晚回来，所以我们必须干得快些。连包装纸一起，梅尔把老鼠整个儿扔到锅里，开始煮了起来。她母亲的厨房里遵守犹太教义规定，这意味着一些锅碗瓢盆是可以用于肉类的，而另外一批单独用于奶制品。他先确定那把炒锅是严格用于肉类的。当老鼠开始解冻时，一种我从未闻过的糟糕气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们两人都开始恶心起来。不一会儿这气味弥漫了整套公寓，我们马上打开了窗户。而没等梅尔把火关上并企图把老鼠丢掉，他的父母便走了进来，和我们撞个正着。我想我还是走为上策。有几个月我都无法面对梅尔的母亲。

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受到了怎样的惩罚，不过梅尔说这是他所遭受过的惩罚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次。而关于那次考试，我们虽然顺利过关，但如果我们得以研究一下那只老鼠，成绩肯定还要好。

第二个学期我转了专业，成为一名法学院预科生，所有人都确信我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律师。我也了解到我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会派上用场，而且我还有写作方面的才能。在英国文学课上，我有机会驰骋自己的思绪，并有机会写短篇小说。这是来自一位外界权威的第一次承认，承认我在某些方向上有些天赋。有两次，老师鼓励我将自己的故事发表到当时的科幻杂志上。遗憾的是我没有保存一份当时的印刷刊物，叫做什么《奇特的冒险》，我的处女作便登载在上面——作者没有稿酬。第一篇讲的是蚂蚁文明的故事。第二篇有感于 20 世纪 50 年代那种普遍的、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恐惧。那篇科幻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发展到顶峰却为核战争所毁灭的逝去文明的故事。

可是我的背景又一次给我造成了一些学业方面的麻烦。因为父亲是一位数学家，顺理成章，我无论如何要将数学课程学习下去，就像我在整个中学里所做的那样。直到“海军栈桥”时，我的数学成绩其实还相当好，但那时我已经开始随心所欲，大学里的微积分便远非什么易事了。而我的风格又是不做或几乎很少做作业，也难得翻开书看看。等期中考试来临的时候，我对我们教授出的问题一道也看不懂。意识到没有希望了，我在教室天花板的一根椽子上偶然看到几个用粉笔涂出来的代数符号。这立刻就成了我的答案。我等待着，知道无可避免，结果教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梅拉姆多维奇，我不明白，”他说，“根据你的记录，你一直是全优生，可很显然你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翻开过这本书。另外，你是法律预科，那你究竟挤到这全是工程师的班上来干什么？”

一阵懊悔突然袭上了我的心头，我也的确非常窘迫。我决定说出实情，也好辩白一下。在找到自己的声音后，我嘀咕道：“我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我只好来上数学课。”

屋子里变得非常安静，而我也害怕地不敢抬起头来。然后，好像过了许久，教授发话了。“我理解，”他以一种父亲的口吻说道，“我也有个你这样大的儿子。我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从我的教室里从此销声匿迹的话，我就给你个 C，让你过。”这是我上过的最后一门数学课。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讲给父亲听过。

当我不上课或不玩“红心”的时候，我有时会坐在栈桥尾部的休息室里看着那些船只，幻想着在遥远地方的冒险。或者我经常去看电影。我们一帮人建立了一个“电影俱乐部”，这要求我们熟知芝加哥一带电影院新放映的所有影片。我还打打零工，用来付学费、车费和业余生活开支。在学校生涯中，无论是研究生时期还是本科时期，我有时去开出租车；发送电话号码簿；在马歇尔·费尔德百货商店当理货

员；与杰瑞·斯派克斯里一起为福勒·布拉什公司做推销员；在蒙哥马利商场分发商品目录；并帮我的伙计艾尔瑟戈尔，经营弗雷迪在芝加哥街和大道街开的热狗摊。每次我在热狗摊干完活回家，母亲总是要让我在进门之前把衣服脱下来，因为我的衣服散发出油烟和炸土豆片的味道。之后她就指挥我到浴室去。在热狗摊那儿，我第一次尝到了大麻的滋味。那时还称它为“大麻卷”，抽了第一口后，我一辈子也不想碰那玩意儿了。那股弥漫在我周围的浓重的油脂气味，立刻让我感觉恶心得快要吐了。不过这份工作非常棒，弗雷迪大多数时间住在佛罗里达，他付的工钱很不错。我甚至成功地利用我当夏季辅导员的经验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在后来把梅尔塞尔茨也拉下了水。我们在位于芝加哥西区的犹太人民研究所给孩子们进行课外辅导。当初在我填写申请表的时候，我写道我几乎什么都能教。我想我能拿着一本书在我的学生面前待上一天。今天我们演戏，明天搭鸟巢，后天作周末祷告。有一次班级里一位黑人小孩儿问我上帝是什么肤色的。“五颜六色。”我脱口而出。这个答案父母早就告诉过我了。

然而，什么也比不上开一辆带格子图案的出租车，在芝加哥的街头巷尾或沿着下威克大道跑来跑去更适合我了。芝加哥实在是街区众多，这是我开始就发现的。开出租让我了解了这座城市，这是其他工作所不能的。这是一份需要耐力的工作，也是一个苦活儿，而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出租车里的空调以及将司机与乘客隔离开来的安全罩，那时一概没有。为了不要像“没头苍蝇似的”浪费汽油和时间，我经常逼迫自己去找生意。而既要找到最快最直的路线，又不想让乘客喊你“傻瓜”，这也是个问题。我时常迷路，因为不好意思，我便免了车钱。有的人，小费给得大方；有的人，一毛不拔。有酒鬼，有奇形怪状的人；有坏蛋，有荡妇，各色人等，不一而足。开着出租车，你对生活很快就了解了。有一次，是8月里的一个下午，当时热得冒烟，3点左右，我开着车，在联合车站下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载客。外面的温度有105度（华氏），地面有140度。我的衣服被汗黏在了身上。而且，传来了下水道中那可怕的烂鸡蛋般的气味，并混杂着出租司机们的尿臭（他们把地下车道的斜坡当做了私人卫生间）。至今为止，我还十分同情出租车司机，特别是在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候。我的出租车驾驶经历还让我知道，出租车司机真是一个良好的舆论晴雨表，不管是政治方面还是社会方面的问题。出租车司机能够接触到广泛的思想意见，从而成为理想的民意调查员。可是当出租司机的最大好处是，我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这一点对于一名大学生来说真是棒极了。在法学院上课的时候，我实际上经常把车停在学校前面，课后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再拉上一车。

虽说父母到那时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有所适应，可在晚回家这一点上，还是不能通融。在这方面，他们仍然是“老顽固”，对我非常严格。多严格？这么说吧，即便我已经是大学生了，我也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前回到家里。如果我真有事情耽搁了，父母就会打电话到警察那儿，问问是否发生了什么意外。周五和周六的晚上，在我

们把各自的约会对象送回家之后，我的一帮朋友们会到“洪堡据点”碰头。那是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街和迪文勋街交界处的熟食店。这成了一个必须履行的仪式。那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嘈杂拥挤，当你踏进店门的那一刻，你的鼻子便被酸黄瓜和蒜蓉意大利腊肠的味道吸引住了。这些风干的腊肠成串地挂在柜台后面，看上去就像硕大的梅脯一样。我们一边享用着腌牛肉三明治和巧克力汽水，一边谈论着生活和女人，经常能坐上个把小时。交谈充满着智慧和争论，甚至有些自命不凡（你能猜出谁在读柏拉图或是沃尔特·李普曼）。我们并不是为了权利或名望而在高谈阔论，我们只不过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感觉，表达了我们成长在这个活力充沛的城市（在这里晚上仍然可以上街）中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对于我来说，时间好像在“洪堡据点”里停顿下来。但对于父亲来说，并不是这样。当时钟敲过凌晨两点，我便成了他的一个问题。

他会穿着睡衣和一件外套，开着车驶过公园来到“洪堡据点”。他总是一言不发地站在门口，就像“蟋蟀吉姆尼”那样看着我这个“皮诺曹”。^①一旦知道我已经看到他了，他便一个转身，回家了。我虽然又羞又气，但也只得立即跟上他。并不因为父亲是个暴君，只是别列斯多克综合征的后遗症。如果我没有按规定时间露面的话，我肯定就是碰上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无论如何，只要我还住在他们的家里，我就必须尽我所能地遵守这所房子里的规矩。不过，我并不是因为害怕而屈服，而是出于尊敬。这种对于父母的尊敬是一种强大的欧洲传统，也是一个可怕的紧箍咒。甚至在大学时代，我仍然无法考虑搬出去，像其他朋友那样住到自己的公寓里去。

在“栈桥”第二年后的那个夏天，我开始准备到外海去历险。伟大的远航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和杰克·伦敦已经占据了我的心，艾伦·瑟格尔也是如此。我这位高中里的死党，说服我与一艘挪威货船签约，成了船上一名水手。他和我决定横渡大西洋，然后将1952年这个夏天花在探索挪威和其他北欧国家那些僻静的乡间小路上。这太刺激了。不过在和我的德语教授瑙曼太太的一番谈话之后，我的航海计划突然改变了。她是一位出色的老师，而且由于我的意第绪语背景，德语便是小菜一碟。我不仅能够熟练掌握这门语言，而且还自动获得“四个小时A”的评分。自从她了解到我有上法律学校的愿望之后，她便大力推荐约翰·马歇尔法律学校，这座学校位于芝加哥市中心，她的丈夫布劳恩费尔德教授在那里教税法和宪法学。更为重要的是，瑙曼太太告诉我，伊利诺伊州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新近签署了一项法令，将法律学校入学时规定具有60小时学时（我已经学满了）改为90小时。一句话，如果这个夏天我不入学的話，我将再读一年法律预科。别无选择了。我将不得不放弃我的海上历险了。这是我生命中又一个关键时刻。

① 迪士尼动画影片里的角色。前者是只循规蹈矩、讲解常识知识的蚂蚁，后者是个喜欢撒谎、后来改正了错误的木头人。——译者注

我6月份进入了法律学校，并很快意识到这将与我之前的学校生活截然不同。直到那时，我都觉得学校学习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并没有十分用功，便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在“海军栈桥”也几乎是全“A”。然而突然之间，除了把所有规定的功课做完之外，没有捷径可走，也不能耍什么花招。这个发现可是当头一棒。不进行阅读，不准备案例，在课堂上不做大量的笔记，合同法和民事侵权法根本通不过。而那些还是简单的课程。实际上，从上小学以来，头一次我觉得学习上有了难度，突然，我成了一个用功的学生。与其他法律学生一样，我加入了一个学习小组，小组里有四男一女——拉里·麦斯特、墨尔本·利希腾斯泰恩、勒罗伊·利维和米尔德里德·麦克内利。在组员中，利维是唯一一个没有读出来的人。墨尔本·利希腾斯泰恩，他的幽默感和说笑话的本领让我对他喜欢得不得了，先是从事法律工作，然后步我的后尘进入了市场，开始在 Merc（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诸称）找了份工作，后来成为芝加哥两大期货交易所的会员。学习小组经常在我父母的房子里碰头，围坐在餐厅的桌子旁边。对于法律学生来说，一个学习小组是一种防卫机制，也是能够从法律学校毕业的唯一途径。我们将不同的科目分配给各成员，这样每个人便成了相关领域中的“专家”，而这样也就能将其专业知识传授给其他人。我的科目是宪法学和税法——通常是法律学校里的苦差事。不过，我们这个小组所做的不仅仅是学习，它成了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品位、我们的好恶、我们的长处和缺点。出于意料之中，母亲对小组的成员们都十分疼爱，视如己出。大家也都爱她，无异于她整个职业生涯中教过的所有学生一样。她经常会端来咖啡和汽水，和每个人都非常亲密。即使小组在家里待过了凌晨，这对她来说也没有什么。

当然，一旦结婚，我便要变换自己的“运作基地”。为了搬出来，与贝蒂结婚可能是我能够做的最为合理的一件事情了。和父母之间的纽带将永远存在于此，这一纽带是在逃离波兰时就已经牢固地结下了。但是我需要独立，而婚姻是唯一一条通向自由的合法途径。她18岁，我21岁，法律学校二年级；我们疯狂地恋爱着，而且是我们年轻生命中的第一次，我们自立门户了。

婚礼是标准的20世纪50年代的仪式，“初帕”（犹太教举行婚礼时用的彩棚）、伴娘、男迎宾员一应俱全；梅尔·塞尔茨则是伴郎。我的新娘光彩耀人，她那件精致的白色婚纱看上去就是出自一位时尚女服装设计师的巧手。荣誉伴娘，也就是贝蒂的妹妹李（改自“利耶”），看上去大方得体，满心欢喜。李后来嫁给了内特·斯拉特斯基，他成了瑞郎交易池的经纪商。贝蒂慈祥的好父亲、可怜的哈利·塞特勒，这位分期付款商品的销售员，虽然没钱能带妻子玛琳去体面地度假，却毫无怨言地为整个婚礼负担了所有开销。许多场面简直同巴里·莱文森的《餐车饭店》中的场景如出一辙，这些场面在美国历史里反复上演着。在位于芝加哥北区的喜来登饭店里的那间舞厅，四周都是鲜花，从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地远道而来的亲戚们挤满了整个大厅。还有街坊的朋友们、中学里的哥们儿以及芝加哥意第绪世界中的精英圈

楚们。大家频频祝酒，有的滑稽搞笑，有的正儿八经，有的则俗不可耐。父母亲一直自豪地笑着，虽然我偶尔也发现母亲眼中有泪光闪过。那是父亲第一次穿燕尾服。社会党人是不会穿这种东西的。可那天晚上，这是可以的。他的移民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朝成为一名伟大律师的方向迈进。

贝蒂和我没有去度蜜月，相反，我们用 600 美元的礼金买了一辆漂亮的、只开过三年的四门福特。它是一辆亮黄绿色的汽车，但价格正好。婚礼之后，学习小组在我们的公寓里碰头。这间公寓在谢利丹路隔壁的琼威街，离密歇根湖不到一个街区。我们住在四楼，没有电梯，也没有空调，因此，夏天便有些难熬。实际上，天气热到我们要睡到被水打湿、微风轻拂的湖边沙滩上去。

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所以在法律学校里对付宪法学中的逻辑和修辞方法是段有趣的时光。当时的美国让国家安全的威胁迷住了心窍，已然落入了麦卡锡主义的魔咒之中。我们会花上几个小时，就乔·麦卡锡的策略及其变幻不定的宪法立场进行辩论。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后，乔·麦卡锡已经成为全美国上下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有一段时间里，参议院都怕他，媒体也一样。最后，国会恢复了理智，罢免了麦卡锡。对我来说，麦卡锡事件成了一个教训，让人警惕万一领导人物走了歪路该怎么办。乔·麦卡锡是个蛊惑民心的政客典型，这让人看到绝对的权利如何能让掌握它的人失控，从而迷失了幻想和现实的界限。这个出了洋相的乔只相信他自己的假胡子。

我对法律学校是又爱又恨。像大多数学生一样，我讨厌经常不断的家庭作业、案例简述、花在学习研究上的时间，还有压力。不过我热爱法律课程中那种对于智慧的要求，它让我思考，精确地思考。“其中包含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忽略多余的东西——只抓住重要的东西”。我成了这个学术王国中的信仰者，至今我依然相信，不管日后你从事什么职业，法律学校提供的始终是最好的教育。然而那可真艰苦。我所在的班级中，刚开始有 70 多名学生，而只有 34 名得以毕业，毕业时我的成绩位列第八。分析一件案子、掌握其本质，并且试图判断其中包含的法律原理，我享受着这些工作所带来的挑战，这就像破解一个复杂的谜题。我成了一名出色的学生，并成功通过税法 and 宪法学这两门“死亡之课”。

而我对自己的天赋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我的第一个学期开始，我逃了第一节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是我的惯例。不过这次我真正感觉到内疚了。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法律学校，如果他们把我赶出去，那如何是好？我决定发挥我在“海军栈桥”练就的本事，给校长写了一封道歉信，编造了一个有关在市郊大道上轮胎爆破的故事。信中字句花哨、夸大其辞，不过还加入了些幽默调料，让人不得不相信。正如我所预料的一样，校长把我找了去。诺堡李校长是城中的一个角色，他是伊利诺伊州立法会的代表，还是一位以古怪和严格而著称的教授。我认为他的父亲就是约翰·马歇尔法律学校的创始人。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他出现，并不知

道我的伎俩能否成功。他走进屋子，将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他笑了。“因为你所做的上诉，我就应该给你这门课打个A。”因为那封信，在这位校长看来，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而在接下去的三年里，我一直是他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坦承，我是约翰·马歇尔法律学校享有最高逃课纪录的毕业生。第一次，我明白了笔的力量——在我自己的手中。干巴巴的法律分析是一回事，但激动人心的文字有时是另一回事。即使在运营 Merc 的时候，我亲手撰写的，不仅有我自己的发言稿，而且在早先几年里，还包括所有冠以交易所名义的材料——年报、市场材料，甚至大到其在国会的证词。后来，当交易所的规模发展到我不可能撰写所有材料的时候，我也至少做到进行材料的签发，否则我是不允许其发布到 Merc 之外去的。鉴于理事长肩负的所有职责，这样做的劳动强度实在是高，但我知道我希望 Merc 成为什么样，即在它成长的每个阶段我希望它树立什么样的形象，而且我明白语言的力量。

在法律学校里我也有写不出一个词的时候。那是行政法，也就是一门同政府部门办事程序打交道的课程。我讨厌这门课、这一点在我期末考试的时候明显地反映出来。我用了3个小时来答10道题。第一道题便让我犯了晕，第二题也不见有任何起色，第三道还是一样，直到第四题我才有东西可讲。不过到那时已经太晚了。沮丧让我无法正常地进行思考。情急之下，我提笔在试卷上部写下一句话：“这场考试并不好。同时由于我在行政法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所以我无法参加这场考试。”我交了卷，然后便走出教室。班上还有其他人对那位教授也有同样的感觉，但他们并不像我这样直言不讳。我不得不在夜校里把这门课再上一遍。

不过在所有的课程中，让我尴尬得几乎无地自容的是图书馆研究——一门谁都不认真对待的课程，不管通过与否，皆不算入你的平均成绩中。任课老师是肖女士，一位巡回法官的女儿。这门课讲的主要就是研究的精细和枯燥。最后，我们要交一篇带有完全脚注的研究论文，题目自选。我并没把它当回事儿，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当我想起来的时候，离规定上交的日期只有几天时间了。我到纽贝利图书馆去了一趟，这是全国最大的私人研究图书馆之一。我开始在那儿的书架上东翻西找——一个惊慌失措、寻找思路的法律学生。在一个书架上，我在一些书籍后面找到了一本塞在那儿的小册子，上面的字迹已经褪色，其中一篇文章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标题：“棒球是体育运动还是生意”。这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写的。这是一篇绝妙的论文，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注释和索引，正是教授所要求的。我放弃了心理斗争，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这儿修修、那儿改改，重写了几段，又新写了文章介绍，不过大部分还是抄的。报告发下来时，我看到上面打的并不是分数，而是一个索引目录。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紧张得连胃都抽搐起来。我跑到图书馆，根据教授提供的索引目录查找起来。那本书的名字是《抄袭》。我又羞又怕，来到了她的办公室。幸运的是，我知道这门课程不计入学分，所以并不重要。我尴尬地站在那儿，懊悔自己毫无防备便被抓了个正着。我认了罪。肖女士在审查

完我在法律学校各年级中几乎全 A 的成绩表后，认为我在学术方面的堕落应该只是一次意外失足，否则我的表现可谓出类拔萃。我强自镇定地接受了惩罚：在暑期里原创一篇像模像样的论文。早知如此，我就不和棒球什么的纠缠不清了。又犯了一次童年时代才会犯的傻。

暑假期间，我专心地写作论文。它有第一篇文章的三倍长，虽然这次也包含了棒球的一些东西，我还比较了其他四项体育运动的异同。9 月，我把它交了上去，3 个星期后，论文发了下来，得了个 A。今天每当我写东西的时候，写的不管是演讲稿、书还是社论，只要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总会详细地注明每个思想和短语的出处。我吸取了教训，并且永远也不会忘记。

为什么我要记叙这些失败呢？因为我知道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我们就是从这些错误之中重新站起来，而我们从它们那儿学到的东西才是重要的，也正是这些东西塑造了我们。错误产生谦卑。这一点我在法律学校中并没有完全领悟，直到我开始经营 Merc 的时候才明白。我可以更好地与身边那些犯错的人相处，并且更加理智地对待反对者。我学会不断地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从而避免犯错。不过，只要我犯了错，我都会毫不迟疑地予以承认。实际上，第二个机会往往比第一个机会更有价值，正如我反复发现的那样。

伴随法律学习压力而来的是经济方面的压力。虽然父母帮助负担了我的部分学费，我还是一贫如洗。我需要工作。一般来说，我希望到市中心那些律师事务所里当个法律事务员，后来我在德福利斯·菲斯克和汤普逊事务所里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那可是一家老牌的著名事务所。不久之后，我即获“提升”，肩负起了削铅笔和浇花的职责。我无聊得快要发疯，而那个夏天天气也热。一个灼热的上午，我打电话请了个病假，便跑到北大道的海滩上会我的兄弟们去了。机缘凑巧，我在事务所里的主管上司当天上午也请假，瞧瞧，沙滩上数千人中偏偏和我撞了个正着。时运不济啊。我在德菲汤的职业生涯也迅速地画上了句号。

秋季，我的课要在下午两点一刻才开始，因此我有一整个上午的空闲，这样我便可以试着再找一份法律事务员的工作干干。得知我正在找工作，梅尔·塞尔茨一天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线索。他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看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登载的招聘启事，时间正好是我所希望的。我找到了那份启事。所说的那家事务所——美里尔·林奇·皮尔斯菲纳和比恩公司正在寻找一名“跑单员”，工作时间是上午 9 时至下午 1 时，这与我的课时完全吻合。这样长的一串名字，无疑是一家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律师事务所在找一名往法院“跑腿”的法律事务员呀。很久以后，美林那“美国牛市”的广告标语才出现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

第二天早上，我按照提供的地址来到了西杰克逊街 141 号，不过却有些疑惑起来。我要进的那幢楼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在我往二楼走的时候，我不免犯起了嘀咕，一家律师事务所为何要设在期货交易所的大楼里？甚至直到走进办公室，我还

是不知道美林并不是一家律师事务所，而是一个出售股票、债券和商品的经纪公司——我还没走到办公室内部，也没有走到业务员正在处理客户下单或发展新客户的业务房间。不过即使我走了进去，我也会丧失方向的，我从来没有到过一家经纪公司。我在接待室里填写了申请表，然后交给一位秘书，后者走进一扇门内。几分钟之后，她把我引入了里面的一个房间，在那儿进行了面试。我肯定符合了对方的要求，因为我被指示说，第二天9点到北富兰克林街110号去找一个名叫乔·西格尔的人。当然，我跟自己说道，这只是一个招聘办公室，我会被送到律师事务所去的。这一切都言之成理，直到我来到北富兰克林街110号那幢大楼前为止，大楼门前石头上的名字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现在我真正糊涂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可能该事务所在这里从事商业法业务。然后我根据指示上了二楼，透过那些玻璃门却看到了我从未想象过的景象，这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了。我就像走进那面镜子的爱丽丝，来到了一个不只有一个“疯哈特”的世界，那儿有数百个“哈特”。交易员的叫喊，他们身体和双手的动作，俘虏了我的心，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我呆呆地看着那些事务员们——乔·西格尔雇我来就是做这个的——像兔子一样在场内飞奔，将买卖指令递给交易池里的经纪商们。如果它不是一面镜子，那一定就是海洋中的弱光层——一个光影、声音和思想的独特空间。可能它两者皆是。无论如何，在那片场地上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既神奇，又激动人心，虽然我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却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这并不是一间律师事务所，对此我没有任何怀疑。但是“不管是什么”，它每周有25美元的酬劳。我激动得无法言表。早上，我在入场之前，总要摸摸那只昂首挺胸、站在旧门道前面基座上的青铜公鸡。那是Merc的吉祥物。几年后，当Merc乔迁新居的时候，我像对待自己生命一样照看着那只公鸡。最后，当搬入我们位于威克大道上目前的这幢建筑时，我让人用玻璃把它罩了起来，放在贵宾画廊里展示，并贴上“我们的创建者”这个标签，这样会员们就不会忘记Merc的卑微出身了。

在我为西格尔（当时交易所的理事长、美林场内经纪商的主管）当“跑腿”的时候，Merc交易的有鸡蛋和洋葱。早上，是Merc；下午，则是法律学校。显然我学得非常好，因为一个月后，希格尔又自己掏钱，额外付给我20美元，这样我每周的薪水涨到了45美元。加上贝蒂在比阿特丽斯食品公司充当接线员一周赚的55美元，我们的生活水平对于新婚夫妇来说可以算是不错了。不管是婚姻和法律学习，我同Merc的浪漫史从来没有结束过。我着迷于买卖合约的那种公开喊价制度，所有事情发生时的那种速度，以及在这样一个充满着资本主义希望和汗水的竞技场上那些参与者的众生相。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开放式的图书馆，在那里可以研究人类的本性，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我看到的这些东西不可能在课堂里学到，或是在经济学课本读到。

虽然，与商品交易的老祖宗即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比起来，Merc 规模不大，在成交量和声望上都相形见绌。它的那位自鸣得意、傲慢自大的邻居位于市中心，当时交易小麦、玉米、黑麦、大麦和大豆。但 Merc 仍然是美国第二大的交易所。虽然 Merc 早年黄油和鸡蛋的期货合约交易已经产生了各个交易帮派，在这个党派纷争的地方，表面之下暗流涌动，不过我当时还领悟不到。我是个新手，一个初学者，一个观察者。

在开始的 6 个月里，我说得不多，辛勤地干着我的活儿。Merc 仅仅是使我从法律学校毕业的一种途径，我一直这样想。不过我知道了更多的东西，我爱上了这个地方。我和那些“跑腿”同事们打扑克，甚至和一些交易员在交易场后面的桌子上打乒乓球。这样一些游戏的激烈和竞争程度可能不亚于交易池内的交易，这也让我不下几次上课迟到。不过大多数时间里，我还是在看、在听、在学习，像一块海绵似的浸润在这片市场知识的海洋里。

乔·西格尔是 Merc 的理事长。在我看来或在任何人眼里，他无疑是交易所的权力所在。当我起初为他工作的时候，我有些怕他，但和 Merc 的前程让我敬畏的程度比起来，那还是不重要的。他是一个身体健壮、有着男高音般嘹亮嗓音的荷兰人，对人不留情面。他很聪明，为人专制，要求严格，希望事情按他的方式去做。他的脾气也是说上来就上来。一次，他朝一个犯了大错的电话员扔了一把钢制坐椅，我觉得那个孩子挺惨的。但在那儿就是这种作风：理事长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没有人会说不。不过，正如 Merc 总裁 E. B. 哈里斯过去对西格尔的评价那样：“他可以让你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学会去喜欢我的老板。我观察西格尔，看他如何与会员们打交道。他们对他又爱又恨，而我也不确定这会不会就是领导艺术的精髓。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机构的理事长：他做的事情、别人对他的态度、他运营的方法、他的思想，还有他代表的权力。这教了我许多东西，尤其是理事长肩负着大量的职责。在那些日子里，乔·西格尔用铁腕统治着交易所。

我在法律学校最后一个学年开学的时候，那是 1954 年，我做了一个对我一生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在 Merc 里工作了 15 个月，现在已然是一名羽翼丰满、肩负重要职责的电话员，不过我想得到更多。我极为迫切地希望成为一名会员，这样我就可以做交易了。事实上，我已经开始交易了。另一个美林雇用的经纪商肯尼斯·伯克斯和我成了好朋友。这份友谊在多年后产生了实际价值，它把我推上了理事长的职位。因为年龄关系，我与他比和西格尔来得更加亲密，我们的志趣在一开始就非常相投。最终，我成了他的电话员，肯让他在他的账户下交易些小头寸。这或许违反了规定，但在当时许多经纪商都让他们的电话员以这样的方式做些交易。问题是我从来就没有和伯克斯持过不同的头寸，而他在交易方面也并不怎么在行。很快，我便大大地获利，而伯克斯则需要一些钱，确切来说是 150 美元。这远远超出了我荷包的容量，我不得不从 5 个朋友那里借来钞

票，替他垫付了追加的保证金。

一个席位费是 3000 美元。在我向父亲保证毕业时会从事律师职业后，我要求他能借我些钱来买一个 CME（即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会员资格。他甚至考虑了我的请求，这就是这个男人的气度。我要的数目，可是相当于父母积蓄的一半啊！在他做出决定之前，我带他到 Merc 去了一趟，向他展示一下我的工作，并由此说明我希望成为会员的原因。我解释了鸡蛋和洋葱合约，以及在交易池里所发生的一切。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他很快领会了这个市场的概念。他能够理解这种行为。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与他小时候在波兰看到的公开市场一模一样。结果是，我在法律学校最后一年里的身份是：学生兼期货交易员。

在早上我交易鸡蛋和洋葱，到了下午我学习税法和遗嘱法。那一年在学业和经济收入上双获丰收。我的学习成绩是 A，在交易池里的收入也非常不错。我在交易方面小试牛刀，不久便赚了 12 000 美元，足够支付我的学费，而且不用贝蒂的收入我们也可以过活了。我甚至提出开始向父亲还钱，但他表示还可以等等再说。后来，当国际货币市场（即 IMM）于 1972 年建立的时候，我为父亲买了个席位，算是还钱。会员费为一万美元，我还确定父亲的交易代号为“IMM”，正好代表了伊萨克·莫伊什·梅拉姆多维奇。当然，他从来没有自己交易过——我时不时会替他做笔交易。虽然我建议，只要他愿意，任何时候都能把它卖出去，他却从来没这么做。有那么一段时间，当一个席位价值 25 万美元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觉得我们不盈也不亏。他虽然同意，但还是不愿意出售席位。当他于 1990 年过世时，一个 IMM 的席位费达到了 33 万美元。

我于 1955 年夏天毕业，随即开始准备 10 月份的律师职业考试。我的学生身份让我免于参加朝鲜战争，但现在我的免役期已过。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山姆大叔”还是一直来敲我的门。我符合服役的条件。如果我必须服役的话，我也就认命了。这将耗费我两年的生命，而本来我可以用这段时间来成家立业，每每想到此，我便觉得腹部犹如被刀刺过一样的难受。事实上，从法律学校高年级起，我经常会有胃痛，可我却不以为然，害怕如果太在意可能不能参加期末考试。在毕业时，我去看了医生，他给我做了一番检查，有上下消化道检查和各种 X 光透视。他证实我一直以来的疑问：溃疡。我有两处溃疡，胃溃疡和消化性溃疡。仅剩下一个问题了：溃疡是否可以让我免服兵役呢？

我参加征兵体检时，胳膊下面夹着我的溃疡点 X 光片。不过好像没有人对此感兴趣。我经过了一系列检查，在心理检查临近结束的时候，医生问及我带的是什么。“我的 X 光图片，上面显示我有两处溃疡点。”我回答道。“真的吗？”他说，“让我看一看。”他自言自语了几分钟后才说：“我的天哪！那儿是两个坑啊！”他耸了耸肩膀，然后我便来到候诊室，坐在那里，身上几乎一丝不挂。

事情开始变得奇怪起来。我光着身子，还夹着我的 X 光图片，被带进一个房间

里。在桌子的那头坐着三个衣冠整齐的军官。在我看来，他们就像将军一样。我坐在他们面前的椅子上，无地自容，脆弱极了。这幅场景简直与私设公堂一般无二。但是我没有胡思乱想下去，免得自己害怕得发了疯。他们中的一个开始高声读我的体检报告。“这么说你患了溃疡？”他问道。我想这就是把我弄到这里的原因吧，可恰恰相反。然后他们的说服工作开始了。“鉴于我们将向你提供的职责而言，你有没有溃疡并不要紧，因为你可以吃你想吃的任何东西，而且你也可以有规律地进食，所以不要为溃疡而担心。”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图穷匕见，我将被招募到军队情报部门工作，工作地点偏偏是在德国。军官说，在基本项目和特殊情报训练之后，我将成为一名中尉军官和一个间谍。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个完美的冷血斗士，德语流利、律师、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及一个受到美国的接纳而因此对这个国家满怀感激的人。好吧，他们部分上是正确的。是的，这些我都是。可我缺少去德国的愿望。溃疡已经让我受够了，我不希望再添上几处。他们说到一半，我意识到他们能够得到我的唯一途径是我主动报名。我想，如果我不主动报名，要么我被招募，要么因条件不合格被刷掉，如此而已。我决定让全能的主决定一切。在光着身子接受了一个小时的狡猾的宣传思想工作之后，我以自由之身全身而退。

在我参加律师考试后不久，我把名字改为梅拉梅德。父母在4年前，也就是1951年，更名为美国化的梅拉姆多维奇（即梅拉梅德）。法律上来讲，他们成为了梅拉梅德，可在意第绪世界中他们仍然是艾萨克和菲格尔·梅拉姆多维奇。我曾经拒绝改变，坚持使用祖先传下来的名字。即使我在法律学校里的教授为了试图拼出我的名字差点儿弄断了他们的牙齿，我还是不愿意将它放弃。无论在结婚证、大学学历证还是驾驶执照上，我都是利奥·梅拉姆多维奇。但是现在，当我踏上社会时，我发现客户们要拼出它来有多痛苦。客户们比起教授来说要重要多了。我放弃了。1955年，我像父母一样改了名字。

有人把他们的生命当成一场战争来策划，其中要有战略，还要有应急的策略和反击的策略。有些人在生命中又过于计较，不允许掺杂任何的机动性。我也不希望成为这种人。然而我需要自我定位，我也希望法律职业能够让我找到这个定位。我并不奢望成为这个“巨肩城”（即芝加哥）里的另一个克莱伦·斯达罗。当然，我希望有所不同，但当务之急是能够生存。我所希望的就是能够赚足够的钱，来支持家庭的生计。所以我挂牌行业，开始工作了。

第二部分

市场之美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9章

革 命

我在拉萨尔大街上开设了一间小办公室。我的合伙人是拉里·梅斯特——我在法学院时代同一学习小组的成员。我们的公司被称为梅斯特及梅拉梅德公司，但开始时进展缓慢。除此之外，我的交易情况变糟，且再次陷入亏空状态。我在米勒公司交易，这是小型本地交易商，由丹尼尔·杰西运营。杰西是一个出色的交易员，被某些人称为“赚钱机器”，他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套利交易者。套利是一种交易技术，它能够消除相当的交易风险，但也限制了一个人获取更大收益的潜在可能性。他苦口婆心地教我如何套利，但这种方法不适合我。我是一个“爱走极端的人”，要么全部买进，要么全部卖出，我想我在很多方面都是这种癖性。当我开车时，我开得非常快；我如果抽烟的话，几乎一天就能抽四包，一旦不抽，我敢打赌我甚至不会抽上哪怕一口。幸运的是，丹成了我的朋友，并在我的早期交易生涯中对我扶掖有加，使我得以度过困难时期，我想丹一定在揣摩，如果我不参加交易的话，也总是能通过做律师挣到一些子儿。

在随后的5年，我是一个律师兼商品交易者。但我永远不能同时在两个方面取得

成功。在律师的初始职业生涯阶段，你能赚到的钱少得可怜。在交易方面，每当我开始采取行动时，市场便突然转向沉寂或表现失常，我很快便因此输掉我所获得的盈利。在这一时期，我两次因为交易鸡蛋而濒于破产。我的一个难题在于，我无法持续跟踪市场。如果我要参加法庭的听证会，出席宣誓作证，或必须在上半拜访客户，那么就根本没有办法关注市场的活动。为了感知市场，我必须了解它的所有运动，观察其趋势。但最大的难题更加意义深远，和 Merc 正在交易的产品有关。由于现代的鸡蛋生产已成为全年性的业务，在鸡蛋市场上几乎无法有所作为。看起来，鸡蛋正朝着曾经一度在 Merc 取得繁荣地位的黄油期货市场的道路走去——黄油期货由于战后对黄油价格的支持性政策而消亡。我有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收入微薄，负债累累，而且，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一天下午，我达到了困难的极点，那是一个周末，而我们没有钱购买吃的东西。我把曾存在美国国民银行的一罐硬币取了出来，折合现金 26.3 美元，这点钱帮我们度过了周末。

刚开始时，我没有刻意成为商品交易员，我不是在浪费时间，我把自己的努力看做是学徒般的训练。我在学习关于交易、关于我自己、关于交易所及其会员的一切。有一些东西让我欣喜，还有些东西则不然。作为跑单员，我和其他职员一起度过了绝大多数时光，并和他们具有共同的心愿：成为一名交易员。当我成为交易员后，我进入了另外一个层次。现在我已经这帮家伙中的一员——一名会员。我处在一些老资格同僚的庇护之下。我年纪轻轻又讨人喜欢，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把我看成是有朝一日终将取代他们的新一代交易员。交易所的领导层当中，没人考虑太长远的问题，老家伙们占据统治地位。交易池是残酷无情的世界，这里强权未必总是正确但却起着主导作用。如果一个交易员或一群交易员对市场逼仓而且能够成功地在高位出货，则这些逼仓的胜利者就可以拿着战利品走人。我亲眼目睹了交易员为了操纵期货市场而对现货市场逼仓，以及他们怎样通过经纪商平掉所持头寸。我从下过市场的高手那里学到了交易的精髓，如乔·西格尔，他在洋葱和鸡蛋市场持有大量头寸，且懂得怎样使供求规律失效；丹·杰西及其兄弟马丁，作为套利者，迅捷地买入某月份合约且卖出下一月份合约；艾尔伯特·麦肯锡教我如何应用时间因素分析价格趋势图；马洛·金笃信基本分析的方法，满脑子统计数据，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供求关系。

我也学到，情感常常比事实更重要。我永远难以忘记 1967 年从以色列和埃及间爆发战争之日时所吸取的教训。战争总是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猪肉和猪腩合约的价格迅即攀升，直至达到所允许的日内最大价格限制幅度，当市场无法进一步攀升时，交易员站在交易池中，狂乱地喊价，期望以当日最高限价买入合约。突然间，马洛·金——他正在大量卖空市场，从办公室下到交易池，冲向交易池边缘，向所有的交易员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们这些家伙真是疯了！你们难道不明白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不能吃猪肉！”

也是从马洛·金那里，我知道了迷信是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确实，作为规律，绝大多数交易员，无论他们承认与否，都是迷信的——毕竟，谁真正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个伟大的宇宙在运转呢？有些人每天必戴幸运领带，有人则使用幸运铅笔，有人开车沿着固定的街道来上班，诸如此类，我甚至听说过幸运内裤——每晚都必须洗净以使得交易员能赶在第二天早上穿戴上阵。曾经连续 13 天，马洛·金坚持我们一帮人每天在同一家餐馆、同一张桌子、同样的座位上用午餐，理由在于自从我们在那儿第一次吃饭之后，鸡蛋市场就开始走熊，而我们都已在市场上进行了卖空，所以我们就每天到那儿用餐。不幸的是，第一天是我买单，而马洛·金则坚持让我按规矩继续买单。

自从我成为跑单员，我就把 Merc 的生活看成是叠放在我心中的一组抓拍镜头。一会儿是蛮荒西部的景象，一会儿则是停泊在静谧海域的航船。交易池时而热闹时而沉寂，总有某种搏斗在上演着，虽然谈不上冒生命危险，但确是众人生计之所系，这使得人们的心情跌宕起伏，就如同商品本身价格的波动一样。

有时，交易池栩栩如生地验证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一天，索尔·里奇——鸡蛋市场的一名王子、一个体格强壮的家伙，粗鲁地闯入猪腩交易池，场内的交易员被他推挤甚至踢打，我是被踢的人之一，对此我无法忍受，于是我正式向理事会提出意见，这可是闻所未闻的招数。一些理事会成员对我施加压力，要我放弃要对方道歉的要求，并把这件事忘记。米尔特·里奇——索尔之子，一个我所尊敬的人，也认为我应当屈服，但索尔·里奇对年轻会员的武断与漠视把我惹恼了。他受到理事会谴责，并向我道了歉，这增强了我作为一名强悍斗士的荣誉。对我而言，里奇的态度是一种征兆——老家伙们经常把自身利益置于整个 Merc 的荣誉之上，吵吵闹闹、结成派系的交易群体对市场操纵、逼仓，今天拉动价格上扬，明天打压价格，朝夕如此，Merc 的形象受到损害。外人便给交易所起了个绰号——“老城内的妓院”。

也许没有比迈尔斯·弗里德曼当初买进整个鸡蛋市场更好地说明老一辈人如何滥用权力的例子了。此事在我进入交易所之前很早就发生了，但这事儿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变成了 Merc 传统的一部分。迈尔斯·弗里德曼虎背熊腰、作风强悍、精力充沛，他的会员标志是衣服翻领上有朵花儿，像许多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弗里德曼出身于黄油和鸡蛋时代，多年牢牢掌握交易所权力。他在 1939 年任 Merc 主席，而他的女婿内森·沃斯海默在 1966 年任交易所主席。他们继承了门德维尔、伊萨多尔·卡兹、索尔·斯通、海·海拿、哈里·雷德芬及巴尼·施莱伯的衣钵，这些前人都曾以铁腕来统治交易所。

一天早上，弗里德曼走到用来记录所有近期、远期鸡蛋报价的黑板前（没有场内交易池），所有买入价列在黑板一侧，卖出价则列在另外一侧。他站到记录卖出报价的前面并挥手示意，场内记录员用粉笔把特定月份的所有卖出报价划上线，并写

上其姓名的简称“M·F”，表示迈尔斯·弗里德曼已经将该月份的所有鸡蛋买下了。弗里德曼走向另一块黑板，并大声喊道，“买进！”并在所有报价上画线。当他走了一圈时，已经买断了交易所的所有卖出盘，他持有所有的鸡蛋合约。当这则新闻传播开来时，聚集在一块儿的交易员们个个目瞪口呆，他不发一言地走出交易厅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鸡蛋市场涨停板。

弗里德曼知道了什么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消息，从而足以使他发一笔小财？在他的口袋里，揣着一封刚由美国农业部发给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主席迈尔斯·弗里德曼的电报。那天，农业部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学校午餐计划，这意味着政府将在未来数月大量买入鸡蛋，价格肯定会一路攀升。于是，弗里德曼当即走出办公室，对鸡蛋市场实施逼仓。

之后，理事会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妥当地处理弗里德曼厚颜无耻的轻率言行。没有罚款、没有谴责、没有开除的危险，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求弗里德曼把持有的一部分头寸卖出平仓，并接受水平下降的盈利。毕竟，他抢在所有人之前买入了鸡蛋合约，他的麻烦事也给他带来了利润。简而言之，他的不道德行为给他带来了正当的收益，他还是继续当他的主席。

在那些日子里，事情就是这么做的。在20世纪50年代我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还没有明显的改变。当我在1954年购买会员席位时，Merc只是个三流市场，总共有500家会员，大约只有一半的会员进行交易。交易厅由三个下沉式八边形交易池组成，只有两个交易池施展用途——一个用来交易鸡蛋，另一个用来交易洋葱。

鸡蛋是大市场，但极易受到操纵。我曾开玩笑说，在任何特定的周末，一些家庭主妇们可以汇聚一堂并操纵市场。这可能言过其实了，但也没有过于离谱。操纵鸡蛋市场往往成了哈罗德·福克斯的娱乐活动。福克斯是福克斯高级食品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是加工家禽、鸡蛋、日杂用品，甚至拥有自己的啤酒生产线的全国性公司，开始创立时叫做彼得·福克斯父子公司，由福克斯家族的9个兄弟经营，在20世纪70年代，福克斯高级食品公司被卖给了皮尔斯伯瑞机构。哈罗德的叔父，迈克尔·福克斯，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做过Merc的主席。哈罗德·福克斯，一个每天抽四包烟的老烟枪，老是叼着香烟，背心上落满烟灰，他算得上是Merc最大的鸡蛋交易商。在过去那个时代，福克斯家族继续保有Merc永久会员资格的同时，哈罗德的外甥乔·福克斯，成了新一代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支柱人物，也是我的坚强同盟。乔的妻子安娜是Merc会员，他的儿子们约翰、马克、托马斯以及蒂莫西也都是会员，他们从事经纪业务，和小乔一起为交易所工作。

在我成为会员后的最初4年中，Merc降格成为只有一个交易池的交易所，在消亡的边缘上挣扎。洋葱灾难是主要肇因。洋葱是在大吹大擂和美好憧憬中被推上交易所舞台的，它是价格波动剧烈的商品，受天气影响极大，这给Merc会员提供了许多采取行动的机会。不幸的是，洋葱合约设计糟糕且容易受操纵，它很快就变成了

麻烦的源泉。洋葱合约把一些新的诡诈之徒吸引到 Merc 来，如果不是逼仓的话，那就是挤市，或其他尽力操纵价格的行为。对于洋葱给交易所带来的问题，那个年代的交易所理事会能够采取的干预措施十分匮乏。自己活得自在，也让别人过得满意，之后再高谈阔论；毕竟，作为经纪商，理事会成员都从操纵者们产生的收入中获益。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市场操纵超出了交易所理事的忍耐范围，理事们纷纷采取荒谬的行动，平掉在手合约，而没有危及市场操纵所推动的价格。那时我刚成为会员，且乔·西格尔仍旧担任主席，他给我发送指令，我站在洋葱交易池中宣布愿以 3.59 美元的价格买入所有洋葱同时愿以 3.60 美元的价格卖出洋葱，换句话说，我和一些其他经纪人接受了无限量指令，这是过去闻所未闻的新事物，可以允许所有未平仓头寸以交易所理事会确定的价格对冲平仓。这是对自由市场的重新定义，也是 Merc 理事会面对的新低潮。

随后，在 1957 年，这些残酷无情的市场操纵者们，基于臆想中的洋葱短缺，把洋葱价格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洋葱农场主们没有以可获利的价格对他们的作物进行保值，而是听从某些人的劝告，效仿所谓“得克萨斯式的保值”——他们基于投机目的在期货市场建立多头头寸。结果显然可以预料，当泡沫破裂时，洋葱价格急转直下，最终洋葱价格跌到了比包装洋葱的麻布口袋还低的程度。美国的洋葱农场主们被激怒了。他们种植的作物亏了钱，在期货交易方面也同样如此。他们开着拖拉机找到国会议员，要求作出惩罚。1958 年 8 月 28 日，国会采取了闻所未闻的历史性步骤：国会颁布法令，宣布 Merc 的洋葱交易为非法。

通过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国会实际上已经通过立法的方式，禁止特定商品在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这对会员们来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冲击，对其自尊来说令人羞愧至极。虽然我没有宽恕导致洋葱灾难发生的 Merc 的愚蠢言行，但我感到国会之举逾越了立法范围。至今，我相信国会的洋葱禁令至少违背了美国宪法的贸易条款，宪法保证各州之间的贸易完整性。但 Merc 的律师在美国的上诉法院丢了官司之后，他们退却了，并怯于在最高法律向法律挑战，律师们及其他交易所纷纷规劝交易所理事会不要再进一步上诉，以免洋葱法案成为所有期货交易所的可怕先例。不用担心，如果允许忍受的话，这已经成为一个先例。Merc 已经蜕变为只有一个交易池的交易所，步履维艰，风雨飘摇。

我深感痛苦，并身处相信 Merc 应当上诉的阵营中，但那时我非常年轻，还只是非全职的交易员。我先前煽动反叛理事会的言行没有任何效应。其时，会员们是如此心灰意冷，以至于没人有兴致继续和国会周旋下去。让国会揪住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这是如此令人尴尬，以至于绝大多数会员想方设法躲避。会员们接受惩罚，若有所思，并努力着手开展业务，好像没有任何灾难性事件发生过一样。当然，这被事实证明近乎不可能，会员席位价格最终跌至 3 000 美元，理事会不得不发出布告，给会员予以补贴。自由市场的堡垒颁令支持席位价格，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但之

后再一次，同一个 Merc 理事会向过去宣誓效忠，年复一年镇静应对，由相同的交易员在鸡蛋市场逼仓，允许洋葱市场灾难的发生，并与迈尔斯·弗里德曼达成交易。

但那些 Merc 交易池里的早期岁月赋予了我大量知识，让我长了见识，我观察、聆听，我窥视所有的角落与隐匿之处；我了解了 Merc 的历史，她的遗产、强项与弱点；我懂得了理事会如何管理会员；掌握了交易所的组织体系及难以捉摸的用人方式；我学习了交易所章程、惯常做法与规则；我弄明了专家级经纪人怎样填写指令单、成功的交易员如何赚钱；我知道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交易的诡计、卑劣的方略及各种鬼把戏；我知道了怎样炒作市场，如何在交易池中生存，如何评估报告，怎样解读交易员心理，以及怎样感知市场。

但通常我从在交易池闲逛的老前辈们那儿受益颇多。例如，艾尔默·法尔科，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任何一天，他都信步于交易池，他是一个喜欢用力咬嚼雪茄烟的年老单身汉，身高将近 5 英尺，仍穿戴着短绑腿，每天开着整洁的 1932 年卢富兰克林轿车上下班。他能够把一件东西从 30 英尺远的地方投进痰盂。我不知道他经手过多少财富，但当我遇见他时，他已经破产了。传言说他在等待黄油价格图填补空档的过程中输光了他所有的钱，但市场从来没有回调并填补那个空档。他是早期图形技术派交易员之一，处处保护我并施予很多规劝和建议。实际上，艾尔默相信他掌握秘密的技术分析公式，并能够以此来赢得财富。他喜欢把我领到交易池后面的制图间，凝视着钉在布告板上的价格走势，在卡片上写下一些数字，做一些高深莫测的演算，并向我透露当日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比如说，9 月份鸡蛋合约。其他时候，他喜欢指着价格图，向附近的痰盂啐一口唾沫，从嘴巴里抽出雪茄，指向图形的特定区域，并满怀信心地说在那个价位卖出是理所当然的事或者买入肯定赚钱，艾尔默从来不含糊，他对自己的预测及图形理论坚信不疑。当这些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他便不再以此为参照。我真心实意地渴求知识，若我要求对此作解释的话，他会清清楚楚地向我说明问题及错误所在，让我深深感到，理由是如何简单明了，我真是笨得没有指望了。有趣的是，交易池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艾尔默尊敬有加。你看到了，艾尔默的预测有时真是惊人的准确，简直不可思议。除此之外，艾尔默拥有让许多人深深崇敬的渊博学识，因此即使是最顽固的基本分析派——就像我的老板乔·西格尔，认为图形无异于“鸡爪挠抓”、图形分析派只不过是部落异教徒，但他有时也会去找艾尔默，半真半假、半信半疑地向他询问对于市场的看法，这些基本分析派假装模仿这个小个子老头儿，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他们对法尔科的回答真的感兴趣。

几年之后，当我已在 Merc 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时，艾尔默·法尔科悄悄贴近我，以预见的口气轻声警告说，“不要把咱们的期货市场搞得太成功。”

“为什么不呢？”我问道。

“因为期货市场告诉人们真相，但没有人愿意了解真相。如果真相太糟糕又太张

扬，人们将不愿再参与这个市场。”

我点头同意，对这位老人所讲的富于哲理的思想感到惊奇。对于法尔科所说的，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但这已经是 30 年之后的 1987 年股灾了，股灾让我重新回想起他的预言。Merc 的股票指数合约首先告诉人们股市即将崩盘的真相，因而 Merc 成了股市下跌的替罪羔羊。这个小个子老头儿真是个圣贤的哲人。他至死都对他的秘密公式深信不疑，但是他撒手人寰时不名一文，这也证明不存在用于交易的魔幻公式。我从艾尔默那里学到了最沉痛的教训：在发生错误时，一个好的交易员必须敢于承认错误，我学会了摒弃自满情绪。

罗伊·西蒙斯代表了交易的另一种类型。他是 Merc 交易员，经常参与鸡蛋或洋葱的挤仓。除了是一个出色的交易员之外，他也是一个专业水准的“跟风者”——紧跟市场操纵并从中渔利。有一次，在对洋葱挤仓时，西蒙斯和其他大户把自己幽禁到宾馆房间里，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诱惑去卖出头寸从而中止挤仓。西蒙斯——笃信斯多葛学派的狡猾交易员，为他的赌注进行了保值。他和同僚商定了一个特殊信号：如果宾馆房间的窗户帷幔拉下来，这就是卖出头寸的信号——让其他人去死吧！在听了房间里其他人的谈话之后，西蒙斯认定这伙人的操纵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慢慢地走到窗户跟前，拉下了帷幔。市场价格也随之下跌，但这已经是在西蒙斯平仓并大赚一票之后了。

还有山姆·施耐德，像迈尔斯·弗里德曼、哈罗德·福克斯、索尔·斯通、伊祖·穆尔玛特及比尔·卡茨一样，他也是个鸡蛋商人兼交易员，在鸡蛋交易节奏缓慢的沉闷日子里，施耐德便走来走去，以浓重的犹太口音大喊大叫，“太闷了！”这是他对缺乏生气的市场的独特表述。

施耐德拥有一个打蛋厂，根据面包房、餐馆及其他商业用户的需求为其供应蛋白或蛋黄。鸡蛋以手工来打。他是个恶意剥削工人的暴君，喜欢高居于工人前面桌子的凳子之上，以劈拉作响的节奏叩击手杖，敦促生产线的运行。有一次，施耐德告诉我他如何对待政府派来的卫生检查官员，“当联邦官员来视察我的工厂时，”他以浓重的东欧口音说道，“我把他们扔到楼梯下面去。”我毫不怀疑，他肯定那样做了。施耐德家族在 Merc 交易池滚打了三代人，他的孙子吉米成了我的密友。

山姆·施耐德既狡猾又强悍。在每年的年初，他都要向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贷款 10 万美元，以运营他的厂子。在大萧条时期，没有人购买鸡蛋，而施耐德需要更多的钱，于是他回到银行，希望借到另外的 10 万美元，这次他遭到了拒绝。“对不起，”信贷员说，“我们不能这么做，你没有抵押品。”施耐德站起来，伸开双臂说道，“祝贺你，你现在拥有一个打蛋厂了，再见。”他借到了所需的 10 万美元。这是我的第一个“大而不倒”的教训。1995 年，墨西哥政府验证了这一公理。

Merc 交易池是人性生物圈，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能使人暴跳如雷。但不管怎样，拳头和侮辱终将烟消云散。这是违法的，但没关系。早年，我曾第一次亲眼目睹几

乎闹出人命的冲突。当强尼·琼，一个肌肉发达、身材高大的瑞典人，把比尔·翰拿摔倒在交易池中时，翰拿变得脸色惨白。如果交易池检查员比利·穆诺没有加以阻止的话，翰拿可能会窒息而死。比利·穆诺是我的好友，在所谓的梅拉梅德时代，他成为理事会成员。“从交易池记录员到理事会成员”，穆诺这样说。“这只会发生在美国。”我回应道。

比尔·翰拿是海曼·翰拿之子，海曼是理事会成员，在交易所是功成名就的重要人物（翰拿家族从事鸡蛋生意，这一点没有什么让人惊讶之处；在意第绪语中，“翰拿”之意即为“鸡”）。他的儿子比尔宁愿成为受嘲讽的拿撒勒教徒，总是在不出声地咒骂。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戴维，是出色的交易员，把“触发停止”发展成一种艺术形式。

路易斯·额尔班，交易池内另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他是一个成功的经纪人，为充满传奇色彩的、操纵洋葱价格的文斯·卡舒伽做代理。额尔班的财富不幸与洋葱为伴。他最终完全破产，数年之后，交易所会员为他募捐，但在他的鼎盛时期，额尔班的舌头可以如利刃般猛烈抨击这帮人中的佼佼者。有一天，他走近我并轻声低语道，“你知道，我越是看到伊祖·穆尔玛特，我就越喜欢我家邻居的狗。”这是一种流行于交易池的表述，表明你对别人非常厌恶，尤其当另一个交易员让你赔钱的时候。穆尔玛特兄弟——伊祖与杰克都是交易所的强势人物。伊祖是出色的交易员，只要他步入交易池，就常常能影响鸡蛋市场的走势，但他抱着根深蒂固的愤世嫉俗的态度，且脾气坏。在一次争吵中，伊祖在交易池内追赶查理·基辛，直至交易所门口的肯斯通时装店。他的兄弟杰克（莫雷·克拉维茨给杰克取外号为“法鲁克之王”），交叉双臂，站在门口，挡住伊祖追赶基辛的去路。我们都觉得，“法鲁克之王”救了伊祖的命，因为如果他继续追赶基辛的话，肯定会死于心脏病发作。交易池内的暴力是一种延续了多年的传统。当行为升级时，类型也改变了。例如在不久前，在标准普尔交易热烈的时段，一个已经工作过度的经纪人失去控制，张嘴啃咬一个扰乱他神经的年轻交易员的手指。

这地方满是兄弟姐妹，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除了穆尔玛特兄弟以外，还有卡茨兄弟、西格尔兄弟、福克斯兄弟、翰拿兄弟、施耐德兄弟、基辛兄弟、施莱伯兄弟、舒特兄弟等等。有大批的父亲、儿子、孙子、外甥及女婿。这地方真可谓王朝之网——由一帮从黄油和鸡蛋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贵族领主们统辖的诸侯王国，他们在19世纪末期养活了一个饥饿、困苦的城市。如果有人谋略为Merc的500名会员建立家谱，那么我不会对这些人总是有某种方式相关联感到惊奇，这实际上也是芝加哥的传统。在Merc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交易行当由上辈人传给下一代人。现在Merc交易池里全是我那个时代交易员的子孙：穆诺家的、鲍勒斯家的，还有施耐德、莫尼尔森、福克斯、米勒、卡尔、卡希尔、席勒、沈德、蔡德曼，这份名单没个底儿。这是一个你会听到所有人都在咕哝着“该死”的地方。由于不需徽章或通行证，外

人可以随便走进交易池，没有统一的着装格式，没有交易员穿戴的专用马夹，到处都在抽香烟，从香烟、雪茄以及叨在交易员嘴巴上的烟斗里汹涌而出的烟雾弥漫，味道浓烈呛人，显然，这里没有禁止吸烟的标记。但因为我自己也是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对此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实际上，没有人对任何事有抱怨，这正是问题所在。通常的态度好像是，如果有什么被打破了，那就视而不见，不要多管。那时我只是个小小跑单员，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即便在1954年我取得了会员资格以后，我这个兼职交易员的话也没有人听。我仍旧喜欢走进交易池，听听故事和传言，详查所有账户，我难以辨别真假，但这没有关系，这是个让我不断猜测的地方。我从不知道每一分钟都会发生什么。曾经有一个交易员因心脏病突发而跌倒在交易池中，而其他交易员继续进行着交易。还有一次，一个被抛弃的妻子猛冲到交易池中，用手提包殴打她那不忠的夫君。人们喝酒、发誓、玩牌、打乒乓球。

我很少喝酒，但其他的我都干。当我成为干劲十足的桥牌爱好者之前，我是个热情高涨的乒乓球爱好者，我甚至还赢得了汉姆波特公园青少年比赛的冠军。在 Merc 交易不活跃的日子——这种日子很多，经常进行热烈的乒乓球比赛。乒乓桌放在交易池后面的房间（后来此处成为瓦尔特·考瓦斯基领导下的统计部门），我在这儿和卢比·卡尔及罗伯特·雷德芬打球，或被马文·布拉格打得溃不成军。当我和布拉格在靠近密歇根南港的青少年营地时，我们重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我是一名律师、营地里炙手可热的乒乓球玩家。一天，这个瘦弱、高挑、笨拙的家伙现身此处，等待着挥拍击球的机会。我应该知道，当他从后面背包里取出他自己的球拍时，一个大高个子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但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以个子高作为取得开局优势的打球策略，他声称要让我10个球，这在21球决胜负的比赛中简直荒谬。这样做只不过是激怒我，让我推动获胜的信心。

所有的小孩子们都聚拢过来，目睹即将展开的挑战。毕竟，我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渴望复仇。当然，我拒绝了他让给我的10个球。接着屋顶就塌了。布拉格打了我个21:0，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乒乓爱好者来说，一个球都赢不了对方，让人难以置信。不用说，这对我是个多么丢脸的事儿，活动营的乒乓冠军，在他的所有倾慕者面前被人彻底击败。当然，那时我们没人知道，马文·布拉格已经是美国全国的网球冠军。显而易见，我作为青少年，即便是成人，也不是布拉格的对手。但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教我打球技巧，以至于在那年的夏天，我已经能够赢他十个球。

在我随后的生涯中，我为他找到了一个与比尔·兰肯共事的机会，比尔是培基公司的首席经纪人，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兰肯脾气坏且很少能沉静下来。风闻他像其他许多场内经纪人一样，吃早餐时也离不了酒。在做了多年的电话接单员之后，马文·布拉格申请一个星期的休假。兰肯给他假期，但当布拉格回到办公室时，他发现别人坐在了他的办公桌旁。

“我坐在哪儿？”布拉格问兰肯。

“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誰？”兰肯回敬道。这就是昔日的兰肯，布拉格真的没有找回这份工作。

这就是在早年我浸润于 Merc 之中的种种感悟。这都是那些整日与 Merc 为伴、以此为生的人们传授给我的宝贵经验。我懂得了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如何根据供求关系而调整；他们懂得如何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市场。

Merc 一直努力争取的一样东西是活力，但这是需要得到释放的被压抑的活力。有过生机勃勃的短暂时期与良好开端，但直到 1964 年，都没有戏剧性的变化。黄油品种死掉了，洋葱也死掉了，鸡蛋正苟延残喘。时而，Merc 努力争取交易或考虑交易苹果、奶酪表皮、鸡、火鸡、胡桃及浓缩橘子汁的期货合约。交易所甚至迈出更大的步子，尽力交易生铁及小虾，后者由吉尔伯特·米勒担纲，他的两个儿子艾兰和布鲁斯，都成了铁杆活畜经纪人和我的精英团队的成员。

幸运的是，我成为全职交易员的时候，Merc 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步骤以改变发展方向。1961 年，交易所开始交易猪腩合约，这是一种经过冷冻处理的未腌制熏肉的切片。这个产品经历了数年缓慢的成长，合约的大小历经了多次修改，直至突然击中了全垒打。但到 1965 年，公众对于熏肉及鸡蛋的热切需求戏剧性地增加了 Merc 的财富。1965 年上半年，近 90% 的成交量来自于猪腩交易。市场的繁荣在交易所席位价格上得到了反映：席位价格从 3000 美元涨到 8500 美元。Merc 很快为人所知——一个建立于猪腩的市场。

Merc 在 1964 年还采取了另外一个戏剧性的做法，它开始交易活畜合约。在期货交易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引入不可储藏的产品，且让人匪夷所思的奇异之处在于，这个市场交易的产品是活生生的会踢人的牲畜。根据史蒂芬·格林伯格的规则，Merc 已经打破了期货合约的标的必须能够储存的古老传统。不幸的是，活牛并未在一开始时就获得成功，问题仍然与错误的合约条款有关。几年之后，我以交易所理事长的身份指导了对合约的修改，并委任格林·安德森完成这项工作。一年之内，在安德森改变合约条款之后，活牛合约崭露生机。通过成功开发一个无法储存的产品证明，我们已经首次改变了期货业的基因密码。

在 Merc 已经成为同系繁殖基地的同时，老家伙们的任人唯亲、道德上的矛盾心理都已经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这让我感到自相矛盾。猪腩和活牛明显表明 Merc 充分具有改革与创新的欲望。但与这些成功相伴的是看起来好像越来越狭隘的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理事会。Merc 充斥的不加掩饰的亲密交情应当向公开征集每一个普通成员创新观点的方向转变。在人工喊价声中，这是一个让人感到随着抑扬顿挫的时间节拍向未来迈进的地方，而其领导人则像处于过去的某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中。毫无疑问，至少在我的心目中，Merc 强烈地要求政治改革，我们期望有人聆听我们的声音。

战线已经展开，最初的零星战斗发生在 1961 年，那时我还只是个兼职交易员。要求改革的声音开始在交易池中回响。感觉需要改变是一回事，但促使改变的实现是另外一码子事儿。这是失败的领导者学习艰苦之路的教训。这就是 1961 年 6 月我和我的同事们所面对的情况。

一个特别的规则吸引了我的目光，它集中于需要召开会员大会的法定人数。在 Merc 的 500 名会员中，召开一次会议需要有 300 名即 60% 的会员。这个百分比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它实际上有效地阻止了会员大会的召开。因此，交易所的领导权实际上一直掌握在一小撮会员手里。普通成员在决策过程中毫无发言权，且法定人数规则阻止他们表达他们的观点。

我已成为经纪人俱乐部的会员，且因为我是律师，被指定为其法律顾问。该俱乐部创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原来只是个社交性组织，但它也拥有积极的野心，不幸的是，这些目标并未能实现。它曾希望给交易所理事会施压，要求采纳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且与此同时，设法在理事会中增加新成员。在该俱乐部的创始会员中，包括我的新老板肯尼斯·伯克斯——美林公司经纪人，我在为乔·西格尔担当跑单员之后即为其充当电话接单员。伯克斯以诚待人，拥有犀利的心智和铁的意志；另一个会员是丹·杰西，老本行是电气工程师，一个技艺高超的交易员，拥有令人难以媲美的道德操守。在我断断续续参加交易的日子里，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借给我钱以保持我的交易账户的运作；还有马洛·金，我亲密的军中袍泽，一个出色的交易员，头脑清醒、富于理性；甚至还有比尔·翰拿，虽然经常很难与之相处，但此君常抱有良好意愿且对交易所的内部运作知之甚多；还有罗伯特·奥布赖恩，一个直性子的家伙，后来在经纪人俱乐部的支持下成了 CME 的理事长。该俱乐部总共有 20 名成员。在 20 世纪 50 年代，俱乐部一直处于蛰伏状态。在那些日子里，俱乐部作为社交渠道是多余的，因为 Merc 本身已经像是一个大型俱乐部，竞争较少而友情更多，且这只是个小地方，因此着实没有必要在俱乐部里边再设立俱乐部。但现在的经纪人俱乐部已经过改造，并重整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巢穴。而伯克斯与奥布赖恩，在我这一代交易员之前的人当中，算是声音最强的两个人物。肯尼斯·伯克斯最终成为将我擢升至交易所领导地位的主要力量，而罗伯特·奥布赖恩则愿帮我在他担当交易所理事长的任期行将结束时接替他的职务。在我成为 Merc 理事长之后，我发动大家选举丹·杰西和马洛·金及其他经纪人俱乐部成员进入理事会。到那个时候，当然，我和丹·杰西及马洛·金的关系已超越交易池而成为私人关系。杰西一家——丹及其妻子宝拉思，已成为梅拉梅德一家的亲密朋友。马洛·金和我成了终生挚友，彼此可以以生命相托。

开始时，经纪人俱乐部成员彼此私下聚会，必须保持秘密的气氛，原因在于一些成员的抱怨对象正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人。此外，理事会力量强大，如果我们的不满言论泄露出去的话，谁也不晓得将发生怎样的报复。我热爱这个地方，其他人也有

同感，但我深深地确信，肯定有什么事儿存在严重的错误。我目睹了强权政治，交易所规则仅被赋予空口的应承与熟视无睹。交易所由轮流坐庄的理事长们操控，他们为了一些私利坐上这个位子，以他们的方式来运作，依赖于过时的规则与不足信的理念，以铁拳来掌控交易所，他们对创新观点及会员的需求置若罔闻。我目睹了市场操纵、交易池内的欺诈及委员会的粗暴回应。我看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交易所规则变成了对法律法规的拙劣模仿。

有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会员们能够忍受这些状况？毕竟，他们拥有投票权，理事会成员不得不面对两年一次的重新选举。这些会员为什么不把这些恶棍简单地置之门外？我猜答案与政治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要实现有效的改变着实不容易，这需要变革，而变革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酝酿。

比如，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1933 年引入新政时，他掀起了一种新的治国思想——让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美国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其时，这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但在许多年之后，这种治国之道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存在需要改变的要求。然而罗斯福的这一治国方略并未受到削弱。最终，1994 年敲响了那个时代终结的钟声。无论或好或坏、或对或错，一个联邦政府减少干预的时代看起来已经来临。这种政治变革，就像每一次革命一样，需要某些要素在事先的融合。它需要时间、需要肇端、需要特别的论点、需要领导人物，Merc 的交易也不例外。会员的不满已持续增加数年，但其他要素尚未得以结合，同时，会员继续在老一套规则的笼罩之下蹒跚而行。

确实，如果不是 Merc 的执行副总裁肯尼斯·麦凯，可能甚至不会存在一套交易规则。麦凯是个好人，喜欢刨根问底，懂得明理是非。但他是知道规则内容的唯一的一个人。麦凯把交易规则存入在他的头脑中，他人永远无法得知他是否重写了规则以符合他的阐释。我喜欢麦凯，因为我知道他并无恶意，且他的动机看起来总是好的。但没有其他任何人保存有理事会采取措施的纪录。没有其他人知晓已有规则的历史和意图。而且，E. B. 哈里斯，CME 的总裁，从来不敢对麦凯的记忆力发出疑问，因此也从来不存在和麦凯争辩的事情。只有一本交易规则，且由他全权保管。与之相似的哈里斯的行政助理德威小姐，她也是个好人，她掌握着前台办公室的钥匙，且愿意施以恩惠——如果她喜欢你的话。她也能够灵活变通，假装视而不见或施以微笑，且麦凯也乐意服从。

经纪人俱乐部的成员和现有理事会的组成之间存在戏剧性的对比。那时我们都相对年轻，富于进取心，在现有体系中无足轻重。我们绝大部分人则财务困难丛生，不担心会再失去什么，对现状不满。而且，所谓的现状意味着年度成交量减少到 25 000 张合约以下，那时 CME 的市场份额占美国期货市场的 4%。

回想起来，我们围坐在俾斯麦饭店的大桌子前，经纪人俱乐部的成员经常在这个饭店租用房间举行餐会。我们共有 12 个人，每人出 20 美元支付有关费用。我引起了

每一个人的注意，因为我努力解释——直到我们把会员大会法定人数要求降低到现实的水平以前，我们无法在 Merc 改变任何事情。这是第一步。

“听着，大家伙，”我说，起劲地转向主题，“如果你不能召集会议，你就无法改变这个体系。我来自波兰，在那儿个人的声音经常不那么重要。但这里是美国，这儿每个人的声音都算数，除了在 CME 以外都是如此。在 Merc，我们的声音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在说话算数之前需要 300 名会员。那是个笑话，理事会知道这一点。”

每个人都对此表示同意。但不让任何人惊奇的是当我们要求改变法定人数时，理事会驳回了这一主张，我们被嘲笑着轰出了理事会办公室。之后我打电话给 Merc 的律师李·弗里曼。虽然我们曾见过，但他无法记起我。他在电话中咯咯笑道。“如果按照你所提议的去做的话”，他以毫无疑义的口气说，“将毫无意义。”

我所提议的是最基本的。我甚至获取了一张由伊利诺伊州秘书长签署的 Merc 规则正本复印件，以保证我的做法有坚实的法律依据。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召集会员大会并为降低法定人数要求提供解决方案。如果会员通过了这样的决议，那么理事会必须接受这一结果。

“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我对经纪人俱乐部的成员发怒地说道，“不管我们的理事会怎么想，Merc 是一家伊利诺伊的公司。CME 理事会或者其律师李·弗里曼要是想藐视国家的法律，没门。”如果他们真这样干的话，我发狠道，“我要告到法庭去。”

这时，我们尚未及考虑创建一个生机盎然运作更加顺畅的机构的宏伟计划。当时的策略由更加实际的感觉所驱动——为了生存。我们意识到，另外一场洋葱灾难会把交易所置于湮灭的境地。这不是一场宫廷政变，而我们也没有展开改变管理方式的计划。我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我和我的盟友肯·伯克斯所设计的策略在于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目的在于修改 109 条规则的法定人数要求。我们期望的数字是 100 名会员，或 20%，而非现行规则中的 60%。但这里有一个陷阱，召集特别会议需要三百名会员。

只有一个解决方法。我们必须设法得到足够的代理人数目，以召集具有充分资格的会议。以前还从未有人尝试过这种事情，这个任务主要落在了肯·伯克斯的肩上。我出了代理人的点子，而肯·伯克斯则利用他作为美林公司经纪人在会员中的强大公信力及良好资历，想方设法寻找代理人。至今，我对他的成就感到惊奇不已。他采用多种方法——写信、打电话、苦口婆心地规劝芝加哥以外的会员，以求得代理人资格。我们其余的人则通过呐喊改革激励芝加哥的会员。同时，交易所理事会深信会员大会肯定无法召开，且就算能够召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虽然我们的团队很小，但我们组织良好且设法实现反对者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由于肯·伯克斯的不懈努力，经纪人俱乐部已经获得了 120 名代理人资格——这足以完成我们的计划。通向崭新 Merc 旅程的第一个里程碑已经奠定。

在闷热、潮湿的1961年6月14日下午，Merc的年度会员大会在俾斯麦饭店召开。但这次会议达到了法定人数要求——包括到会人员及代理人。这在CME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根据我的授意，代理人都在会议之前通过肯·麦凯完成了注册手续。我和他进行了私下交谈，并相信他在被公开问及会议是否达到法定人数要求时，愿意向理事报告真实的情况。这是会议之前必须履行的程序，在肯·麦凯的事业生涯中，他首次做出了肯定的回应。我双手发颤，但以沉稳的语调向会员们报告有关人员到会的情况。说完我屏住呼吸，之后听到以洪亮的赞同声获得通过。年轻的反对派们已赢得了第一场斗争。我们做到了吗？对此有大量的充满现状的预料。没有人知道在比尔·卡茨领导下的理事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卡茨握有最高权力，曾以铁拳领导的交易所走过20世纪50年代并在60年代早期担任理事长。比尔·卡茨，一个从未执过业的律师，于1930年加入Merc，以鸡蛋交易起家。他的生意由其父萨缪尔在世交替时期建立，他在芝加哥卡朋特大街14号开了一家黄油和鸡蛋的店铺。它最终成长为一个大的打蛋企业，是芝加哥规模最大的同类企业之一，比尔·卡茨和其兄伊萨多尔通过Merc交易池实现公司的运作。

作为理事会的代言人，卡茨在第二天公开宣称——这次会议上会员的所作所为缺乏任何有效性。直到理事会做出决定前，法定人数要求将维持不变。经理事会其他11名成员通过，由李·弗里曼律师就此发布了公告。

在下一次的理事会会议上，Merc的理事们被笼罩在这件事之中，讨论演变成了争吵，情绪高亢，充满诅咒的言辞。会场上充满了不能让反对派得逞的情绪，如果反对派赢得了这一次，天晓得他们下次还会提出什么要求？如果根据理事会自己的计划，可能就已经拒绝了会员们的动议。但李·弗里曼了解得更多。虽然他曾公开声称会员的举动无效，但我始终认为他私下里持有不同的观点。尽管在法律事务的能力上我无法同他相比，但他应该知道我在坚实地领导着经纪人俱乐部。如果他考验我们的意志的话，他将在法庭上输给我们。因而在大门紧闭的理事会会议上，他采取了不同的姿态。他争辩说避免冲突的方法在于理事会自愿接受会员对改变法定人数的要求。这样一来，官方记录将显示——理事会通过自主选择做出了降低法定人数要求的决定。两个小时之后，理事会采纳了对109条规则进行修改的建议。法定人数要求降低到了现实的水平——100名。

在理事会会议之后，看起来两大阵营之间已存在咬牙切齿的感觉了。但我清楚地知道，你可以和敌人讲和，但不能与记忆讲和。经纪人俱乐部的胜利，并不是世代沙文主义或20世纪60年代破除偶像的案例；Merc只是不得不跟随时代的步伐，这意味着改变与妥协。

一夜之间，我变成了一名英雄。

对于经纪人俱乐部的会员来说，我们都自我感觉挺好。在法定人数修改问题上的胜利，警示着Merc的老人们——交易所的年轻会员们对未来期望的是什么。作为反

对派的代言人，我被看成是喜欢挑战的人。回想过去，也许部分是由于我的个性使然。我曾通过逃脱在屠杀抗拒人世间的和平，我挑战更多的纷争而落足于安全的国度。几年之后，我抗拒了我的合伙人劝我不要离开法律界的恳求。我甚至以被舍弃的痛苦代价挑战我的父亲。还有，我愿挑战理事会。

然而，如我所言，革命并非在一夜之间发生。

1961年，我们只是迈出了变革的最初一步，这场变革本身主要发生在随后的5年之中。当我于1965年在交易所站稳脚跟时，我的时机实在是太好不过了。我很清楚地知道，士兵初出茅庐时不是从将军做起的，我也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前线的战事将帮助士兵提高军衔。我已经严阵以待，准备迎接下一次交锋。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0 章

进入交易池

到 1964 年，我的法律业务兼收并蓄，我接手从人身伤害、离婚到房地产、破产的所有案子。几年以前，我离开了梅斯特，找到了新的合伙人——莫利·克拉维茨，我在海军港时代就与他相识。一个好脾气、声音粗犷、精力充沛的人。克拉维茨可以走入一个有 50 个陌生人的房间，在一个小时之内走出这间房的时候，他已经声称有了 49 个“最好”的朋友。像我一样，克拉维茨也不过是个小孩，他的双亲从东欧移民到古巴，在那儿相识并结婚，之后又搬到费城，莫利·克拉维茨出生于此。1939 年，当我家离开彼阿里斯托克的时候，克拉维茨家搬到了芝加哥。和我父亲一样，克拉维茨的爸爸作为意第绪语报纸的编辑，较多地参与犹太人圈子里的学术性事务。很自然地，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

克拉维茨在美国军队服了三年兵役，其中大部分时间在德国，之后他入读约翰·马歇尔法学院，那时我刚好即将毕业。当我被提升为 Merc 的电话接单员后，我推荐克拉维茨接替我的上一份工作，担任乔·西格尔的跑单员。很快地，他也被交易的“虫子”咬了一口，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购买了会员席位并全身心地投入交

易。但在输光了他的交易资金后，克拉维茨出售了席位并在1957年重返法律界。

我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第一任秘书莫纳·华莱士，并告诉他莫纳拥有好的头脑及美妙身材，如果我尚未结婚的话，我说，我愿意追求她。克拉维茨采纳了我的建议并与莫纳一见钟情，终于，他们喜结秦晋之好。克拉维茨点子多、惹人爱又富有创造力，有时他的主意非常富于想象力。他曾尽力组建过一个名义为“本月之剑”的俱乐部，以吸引全世界的铁杆剑迷。另外一次，他试图加入佛罗里达州的塞米奴印第安人，在他们自封所有权的土地上做出反抗美国政府的声明。我们有很多乐事。起初，日子有些艰难，但当情况趋好时，我们买了一艘船，这是一艘33英尺长的游船，我们给她取名为戴尔舍——来自于我女儿艾戴尔和他女儿舍莉尔名字的结合。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的早晨，克拉维茨怀揣着另外一个点子走进我的办公室。克拉维茨告诉我，外面谣传大都会保险公司——一个大型汽车保险公司快撑不住了。这个时期，伊利诺伊的保险行业陷入欺诈和诉讼的泥潭之中，一些保险公司，像大都会保险公司，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榨取保单持有人的保费，根本不会理睬客户的索赔要求。保险公司知道自己所处的这种优势。如果发生车祸，保单持有人要求索赔的话，保险公司则拒绝支付有关款项并让客户的起诉在法庭上兜圈子。他们充分运用所有的可以推迟付款的策略。审判大概需要6年的时间，而在此期间他们仍将继续收取保费。最终，在公司不得不向保单持有人赔付大量保险金之前就已经倒闭了。这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国家保险委员会已开始采取行动。如果大都会保险公司破产，那么政府则任命账目清理人对保险公司资产及客户索赔金额进行清理。克拉维茨期待的是所谓的账目清理人的律师，将可获得很可能是数以千计的保单持有人客户名单。他向我解释这个计划，变得激动起来。

“听着，利奥，这事十拿九稳。随着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破产，其保单持有人将需要雇用律师保护他们的索偿权。”

“那将会是梅拉梅德和克拉维茨？”我说。

“我敢跟你打赌，我们将是第一个通知他们并向他们解释大都会保险公司已完蛋的人。”

当我告诉克拉维茨不要对他的计划如此想当然时，他已经在估算我们将获得的数以千计的客户数目了。他坚持认为，我们即将迎来业务的鼎盛时期。他的旺盛活力富于感染力并最终赢得了我的首肯。

保险公司的账目清理人是由那时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科那任命的名叫约翰·波尔顿的年轻人。克拉维茨对他做了很多功夫——这家伙对克拉维茨佩服得五体投地，且我们的出价比其他所有人的都低。最终，波尔顿任命我们作为账目清理人的律师。梅拉梅德和克拉维茨如愿以偿。我们在匆忙之间获得了这笔业务，甘愿以较低的价格完成这项工作。实际上，我们所获得的收入也只是一点点而已。我们只要得到必要的支出费用、两个秘书及两台打字机。我们以低价赢得了竞标，期望着

如果 5 500 个案件中的 20% 成为我们客户的话，我们的业务都将会在未来十年兴旺发达。

一天晚上，现实悄然而至，从大都会保险公司运到办公室的文件足有一卡车。我们的两个办公室套间及接待室被文件柜塞满。我们几乎没有呼吸的空间。起初我们深感震颤，并和我们的夫人们——莫纳和贝蒂一起举办了香槟聚会来庆祝那个晚上。甚至有些报纸发表文章说，我们已获任命来处理大都会保险合同案件。我们的秘书每天工作 15 个小时，打印了所有的文件，以便和法院职员签署。已经通知所有与保单持有人相关的案件，由我们作为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来代表被告。我们也通知了所有保单持有人关于大都会保险的坏消息，并过来讨论一个事实——现在他们需要自己的律师来保护自身权益。如果他们不雇用梅拉梅德和克拉维茨，那将是另外的一个什么人。很快，被告人纷至沓来。日复一日，每天十来个人会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很快地，我们明白自己犯了大错，陆续前来造访的人向我们申诉他们的窘迫，他们一无所有。除此之外，他们斥责并威胁我们，把我们当做是为大都会保险工作的人。

“我没有自己的律师？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老几？”

“你看到了，我们是为州账目清理人工作。但这只是暂时的。”

“哦，是吗？我没钱，这整件事简直就是偷窃。”

有时，当他们凄凄惨惨地自办公室猛冲而出的时候，气氛几乎变得暴戾起来，我们得到了令人怜悯的故事，却几乎没有得到一个客户。

日子飞逝而去，而我们却从未看到曙光，之后的事情变得更糟。作为在所有案件中代表被告的律师，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法院，胳膊下夹着数百份文件走来走去。真是一团糟。在伊利诺伊州的每一个地区的法院里，都有相关的案件。如果开庭审判时我们不在场，且未能回答原告的质询，那么针对被告即担保持有人的缺席审判将被登记在案。不过没关系，被告人还不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努力也没有获得酬劳，技术层面上，我们负责 5 500 个案件的辩护。当我们驾车穿梭于巡回法院之间力图阻止质询与审判的流转时，这变成了一个没完没了的猫捉老鼠的游戏，真相是令人感到苦涩的觉醒。梅拉梅德和克拉维茨买进了俗语所说的“光吃糠不长肉的猪”。

在此期间，我继续在 Merc 从事交易。有时事情变得难以支撑下去。曾经，比如我在法庭上等待我的一个案子被传唤，这时我意识到我不得不打电话到 Merc 去。我在鸡蛋上持有头寸，需要知道价格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我手头没有一毛钱的硬币，就向法院的职员借了一枚，他警告我说如果法官叫到我的案子而我又不在的话，案子的审判将对我不利。我抓住机会，冲向门厅打起了电话。米勒老人，当时已经 80 岁高龄，米勒公司的创始人（我通过该公司交易）接听了我的电话。

“米勒先生，我是利奥，”我大喊大叫以确保他能够在交易员的喧嚣中听到我的声音。

“利奥，”他以浓重的犹太口音说道：“稍等片刻，我去叫他。”

我扔下垂摆着的听筒，跑回法庭看看我的案子是否被传唤，还没有。我急转回到电话机旁，刚好来得及听见米勒在讲，“利奥不在，再见。”他挂断了电话，我又跑回法庭。我的案子还是没被传唤。这次我跑出法院，穿过街道到了一家药店，把一块钱换成了零散的硬币，跑回法庭，我再次给米勒打电话。

“米勒先生，米勒先生，”我恳求道，“别挂我电话，我是利奥。”

“利奥，”他说：“稍等片刻，我去叫他。”几秒钟以后他回到电话前说：“利奥不在这儿。”并立即挂断了电话。我几乎要死翘翘了。我像阿伯特和麦斯泰劳[⊖]一样忙得不可开交。我急匆匆奔回法庭，刚好听到我的案子被传唤。我赢得了这件案子，却在鸡蛋交易中造成了亏损，损失比我当天所赚的还多。

这就是我尽力兼顾法律和交易业务的典型日子，时机从来都不对。我知道如果我打算成为交易员的话，我需要待在交易池里。在接手大都会保险案件一年之后，事态变得更糟。现在我们有了三位秘书，她们争分夺秒地打印文件，也只是刚好赶得上质询的进度要求，而且由于我们不能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正在失去向我们支付酬金的客户，你总得有所给予吧。

我们向波尔顿解释当前的情况，他仔细地倾听并愿意提高向我们支付费用。这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当表示每月多付50美元时，我们心凉了半截。我们告诉波尔顿，他必须帮助我们摆脱当前的困境，我们不得不甩掉这个包袱，要么就会破产。对我们深表同情的波尔顿点头同意了，但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已经是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负责相关5500个案件，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必须到庭申辩，如果他未被正式解除这一职务，他就必须对后果负责。换句话说，我们的处境进退两难，糟糕透顶。我估计要花20年的时间摆脱大都会保险案件。波尔顿建议我们把情况告诉巡回法院的首席法官。当我们要求放弃参与这案子时，法官问有无代替我们的其他律师。显然没有，可怜的大都会案件被告人雇不起律师，法官摇头，这真是坏透了，他不愿让5500个当事人失去辩护律师，他让我们吃了闭门羹。

我们被毁了。我们命中注定要瞎忙下去，且一无所得。我们的法律生涯简直乱七八糟。我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东西，径直去找伊利诺伊最高法院，在波尔顿的陪同下，我们去了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并请求最高法院作出公平的决断。他们满怀同情地听我们的倾诉，但告诉我们只有州长能把我们从进退两难的窘境中拯救出来。我们毫不迟疑，波尔顿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好友奥托·科那——伊利诺伊州的州长，约好见面的时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给予的最热烈的恳求。结果立竿见影，州长打电话给巡回法院的首席法官，并要求给予我们帮助。法官同意了，但

⊖ 这两人是美国环球电影公司系列喜剧片中的两个主人公，他们经常历险，被匪徒追踪，爆出很多笑料。

希望知道我们怎样通知所有的原告律师，起先，法院希望我们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分别撤销辩护律师资格，但我指出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与之相反，我倒是有个好主意：我们将在官方的法律出版刊物——《芝加哥法律公报》上刊登声明，罗列出所有的 5 500 桩待解决的案件，并宣布在指定日期的上午 11 点钟，梅拉梅德和克拉维茨将在巡回法院当着瓦德法官的面撤回所有案件的辩护律师职责。这种声明出现在《法律公报》上，在伊利诺伊州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那一天，当我们如愿出现在法庭时，到处挤满了人，充斥着原告律师的齐声反对。但这于事无补。瓦德敲响了槌子，通过了我们的请求。莫利和我奔跑着逃出法庭，就像两个获准离开学校开始欢度暑假的男孩。

但对于那些购买了一钱不值的保单的穷人们来说，事情的结局毫无有趣可言。那些有钱雇律师的人最终讨回了欠款，而那些没钱雇律师的人们，最终被判违约。在一些案子中，被告人不得已进入破产程序，但在绝大多数案子中，判决本身变得毫无意义——被告人无法支付且一段时间以后原告也停止了索偿行动。

1965 年，关于大都会保险的撤辩成为我的转折点。我 33 岁，有妻子和 3 个孩子，且拥有一个未能如我所愿让我满意的专长。我曾经是一个出色的法律系学生，认为自己有成为好律师的潜能，但生活未能赐给我机遇。一天早上，我径直走进克拉维茨的办公室，说道：“莫利，我们又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了，我希望离开，所有的事都是你经手的，你认为我所干的值得多少就付我多少，我要走了。”

我的话让克拉维茨出乎意料。“你不能这样，”他说：“你不能离开我，我一个人没法子做下去。”

“我不想再做律师了，”我说，“无满意可言，我想做点别的东西，我打算做个全职交易员。”

克拉维茨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并没有打算劝阻我，“你怎么会知道能够成功呢？”

“我不知道，”我承认道，“但我必须找到解决的方法。”

突然克拉维茨问道：“船怎么办？我一个人无法承担得起。”我用交易所赚的钱，和他一起买了艘船，并获得称之为“戴尔舍”的冠名权，我走向富兰克林大街，离开法庭并回到了交易池。

最终莫利·克拉维茨也放弃了法律，重返 Merc。我借给他 2.5 万美元，他又买了一个席位，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他成为交易所最具有进取心的经纪人，有人说他过于进取，在黄金期货合约上，并以此赚取了财富，造就了声名。他加入了杰克·桑德纳的公司 RB&H，发表时事分析文章——“来自交易池的观点”，后来和吉米·卡伦蒂斯合伙，他发展了经纪集团的概念——一个为场内业务提供服务的经纪人协会，并形成了 Merc 最强有力、最成功的集团。那时，由于他们的权势与影响力，经纪人集团非常惹人争议，它仍然是 Merc 的争议性问题。

几年之后，克拉维茨成了研究成吉思汗的专家，他在丰富想象力的驱动下组织了

一次寻找成吉思汗的探险。当他成功说服蒙古政府给予他特许，允许他带领探险队寻找这位蒙古皇帝的埋葬地点时，我为他欢呼、振奋。既然芝加哥大学也对这个项目怀有强烈的兴趣，那么如果克拉维茨真的有所发现的话，我将一点儿也不吃惊。

事实上，我决定放弃法律从事期货交易的决定绝非一时冲动，实际上，我做出的这个决定已经有1 000次了，但我总是在实施这一决定的过程中搁浅。首先，我父亲对此持反对意见，如果说我放弃法律将会使他震怒——这远远低估了事实。我们经常说起这件事。作为一个律师，他的移民儿子是个很体面的人，作为一个交易员，我是啥呢？只不过是一个赌徒而已。他不愿意听我所做的解释。这根本就不是应该讨论的问题。此外，我对自己做交易员的努力也有所怀疑，毕竟，我已证明我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律师，法律为我提供了生计——我得养活一家人哪。谁敢保证我如果做交易员的话，能和做律师干得一样好呢？这件事情上陪审团还没有到位。到现在为止，我知道我能在交易中赚不少钱，但同样也可以输掉很多钱。而全职交易对我的吸引力仍然是几乎无法抗拒的。我所有的感觉告诉我，只有我全身心投入交易，才会成功。对我而言，法律是对交易灾难的保值工具。我相信，知道我总是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持生计这一点让我丧失了纪律性，而纪律是成功交易的基础。

但与做律师相比，交易员的生活方式终究具有强大的磁石般的吸引力。法律固然有趣，但让人感到沉闷——事情进展缓慢，且节奏由系统化的程序所约束，能够被各种推迟、延误、恳求及技术性因素所操纵，可能要花几个月甚至数年才能赢得一件诉讼。此外律师们单调乏味，令人生厌，且对于每一次胜利，他们都要做100次感谢，感谢委托人，感谢将委托人送予他们的警察，感谢法庭工作人员的支持，感谢法官的秉公执法。与之相反，交易存在于瞬间，被信息流和即刻的反应所包围。在每一个交易日结束之时，你知道自己的位置。你也不用去感谢谁，是你自己在和市场周旋。如果你能够判断市场的走向，你只需要感谢你自己。市场每天都是一场挑战，每一天都是新的历险，谁也无法确知市场运动的方向，也无法担保我能正确地预知未来。这种不确定性的挑战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之相比，法律则那样易于预测。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

我决定在1965年夏天我的父母外出度假的时候采取行动。他们驾车穿越科罗拉多，估计9月之前不会返家。到了那时，我父亲要想劝阻我就已经太迟了。我希望避免冲突，摆脱他那富于雄辩力的意第绪语给我带来的负疚感。我仍处在他的影响之下，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事，并鬼鬼祟祟地进入黑夜之中，以逃脱他的满腔怒火。实际上我已经做出了我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

当我把这件事捅破时，我父亲并没有勃然大怒，因为这不是他一贯的风格。他坐在那儿，几乎目瞪口呆，完全无法理解一个受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怎么会放弃自己的专长。他亲眼目睹自己儿子成为一名律师，而突然之间我把它弃之窗外。我也相信，他为我和我的家庭感到担心害怕。我希望减轻他的担忧并告诉他任何事总有解决的

办法，但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这种机会。他不再和我说话，不是一天或一个星期，而是几乎整整一年。这也证明他气恼到了何种程度。我母亲则很快就原谅了我，表明了一个母亲对儿子判断力的信心。在随后的 12 个月里面，我父亲见到我时只是点一下头，只在绝对必要时才和我说上只言片语。1967 年当我入选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理事会时，他的怒气开始消散。报纸上对我的事有报道，这吸引了他的注意。也许，Merc 是一个使人提高尊严并以此谋生的地方。当我两年后成为 Merc 主席时，他完全原谅了我。这时他才确信，我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

我并非襁褓中的婴儿，在我成为全职交易员时，我已经从卑微的跑单员开始在交易所里度过了整整 10 年。就像开始时只是个在报纸上抄抄写写的无名之辈，最终成为了羽翼丰满的记者，并挪揄着编辑的位子。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名字，我也认识这儿的每一个人。

有一些会员，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愿意放弃律师的职业而从事交易员的职业，但没有人要求我对此做任何解释。实际上，我拥有一些声望。在那个年代 Merc 的交易池中，大学毕业生不多，拥有律师资格的人就更少（自从我放弃律师职业以来，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以四倍于人口增长率的速度增加，1995 年，该比例已经达到每 290 个美国人拥有 1 名律师的水平）。我能言善辩，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而且，嘿，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吸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话，也说明这儿肯定有什么名堂。

确实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有些让我欣喜，有些则不然。交易池从此不再行动迟缓。肉类合约远比鸡蛋活跃。交易池充满了买入、卖出的叫喊声。市场在运动，要判别市场运动的方向，依旧是苦不堪言的重负，但这也正是魅力所在。不论价格上涨还是跌，只要你能正确判断走势，你都能赚钱。市场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总能让人吃惊，不论你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多久，不论你赢过多少次，它从来都不会透明的，即不可预测的。在从潜伏期向爆发期的转变之中，市场可能是稳定的，节奏缓慢的，异常焦虑的，甚至令人晕头转向——所有的事都在一天之内发生。每一个交易员都对五分钟后发生什么持有自己的见解，但并没有真正知道结果。市场从不会让人感到沉闷，而且，由于其本性，你从来就不能对一个市场想当然。至今，当我被问及对市场的看法时，我总是警告说我的意见只在之后 30 秒有效。

我是所谓的日内交易商，属于一种常规的场内交易商，为自己的账户交易。也有其他的场内交易商，如经纪人，代表客户进行买卖，并对每笔交易收取佣金。由于双重交易是被允许的，所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同时为自己进行交易，但经纪人的交易量远低于日内交易商的交易量。日内交易商是“买入卖出报价商”，他们为交易所内的买卖交易指令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与股票市场的做市商不同，他们的买卖交易为单个或特定股票提供流动性支持，而我们不会刻意去支持某个特定的合约。我们可以漫步于交易场内，买卖任何产品，且与做市商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协议，我们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机交易。

对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期货交易者进行投机买卖。实际上，如果没有投机，期货合约无法发挥功能。一张期货合约是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就像一张保险单。期货合约的思想其实非常古老。我过去常常引述，圣经时代的约瑟夫是采用买入保值的先驱者，他使埃及的法老王相信，在谷物丰收的七年中买进谷物储存起来，在随后歉收的七年中进行使用。历史上，在这个国家，期货合约广泛地被农场主及生产者用来对农作物歉收，商品价格下跌进行保护。在1972年金融期货产生以后，这些合约也被货币经理、企业财务人员用来抵抗内在的金融风险、对利率风险敞口进行保值，对汇率波动进行保值，或支持资产与债务的管理，而且，投机者们提供流动性，使得把买卖双方集聚起来的竞争性市场机器处于润滑状态。失去投机者，保值者将缺乏把他们所面对的风险进行转移的对象。

但我希望不仅仅成为一个从事投机的交易商。我向前更深了一步。我决定开办自己的清算公司，这是显而易见的举措。清算公司有权通过交易所处理业务。交易池内的每一笔业务都必须通过清算公司清算，而清算公司收到少许的服务费。每一个买家和卖家都须向各自的清算公司报告所有的交易，在每天交易结束后，清算公司则把交易数据呈交给交易所的中央清算所。如果由买方与卖方提供的数据相匹配，交易将被清算。否则，任何的不一致，所谓的“外部交易”都须在下一个交易日开市以前在相关的交易者之间解决。这是期货市场最为独特的特点，且几乎不为外部世界所了解。期货市场建立在无负债系统的基础之上，所有的交易都采用“逐日盯市”；换句话说，在每日交易结束后对所持头寸进行测算，而且，所有的人都被要求为其头寸支付现金——基准则是市场的收市价格。以这种方式，在下一个交易日开盘时，每一个交易者都不亏欠任何人。

日内交易商向清算公司支付的用以保证及处理交易的佣金侵蚀了部分收益。我料想，如果我拥有自己的清算公司的话，我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此外，由于我已全身心地投入到商品交易中去，清算公司成了立足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你成为清算公司之前，你无法有所发展，而我绝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日内交易商，我满怀凌云壮志。一个清算公司须满足一定的财务要求——那时是五万美元的现金，且至少拥有两个席位（会员资格）。我设立了自己的清算公司——戴尔舍投资公司，使用我从克拉维茨那儿买来的船务公司为公司命名。而且，依照常规做法，选定了安东尼·玛特拉诺作为合伙人，他提供了第二个会员资格。

玛特拉诺文静且易于相处。几年前，他代表自己正在读中学的儿子要我办理一件个人伤害案件，我们因此而结识。那是一场可怕的医疗事故。他儿子的膝关节需要固定，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外科手术，但医生对脚部石膏绷带的拙劣处置导致了男孩的脚部感染，最终托尼儿子失去了他的下肢。我由此着手办理这起医疗事故的案子，此案件的最终结果是让保险公司以最高保额进行理赔。直到托尼去世，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作为交易员，我们共享技术分析的魔力。艾尔伯特·麦肯锡，一个敏捷的交易员及技术分析的拥趸，把我们收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的桌子上堆着精彩的价格图，并乐意把他们舒展开来，仿佛他是一个启动航程的船长。那时，市场的绝大多数部分都是未知的领域。麦肯锡的解释精确且富有逻辑，且他乐意与大家共享对市场的观点，他是一个把时间作为图形分析因素的概念介绍给我的人。就像艾尔默·法尔科，麦肯锡热诚地相信技术分析方法：图形本身说明了一切。但对托尼·玛特拉诺来说，技术分析意味着一些不同。玛特拉诺属于早期的占星者之一，相信市场的运作受到宗师的预测。我知道这是愚蠢的东西，但我不想就此事争辩，无论是什么东西，管用就行。玛特拉诺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者。

艾尔伯特·麦肯锡和艾尔默·法尔科仅仅是那些把我放在他们羽翼之下并教我如何交易的一群人中的两个，他们是技术分析派。另一方面。马洛·金和其他大多数人，则深信所有发生作用的都是影响产品供求关系的基本面情况。鲁比·卡尔属于这一阵营。在交易所的最早期，卡尔家族就开始以鸡蛋商人的身份在 Merc 从事交易，且他们是强有力的、机智的交易商。鲁比·卡尔是我的场内朋友之一，我能够和他以流利的意第绪语交流，我喜爱他独树一帜的观点，这些观点常常质疑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他最终搬到了特拉维夫，且经常往返于以色列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交易地之间。

其他人仍然相信作用最大的不是分析而是技巧。例如，西尼·谢尔是纽约商业交易所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缅因州土豆交易员，他在市场中赚取、亏损过一些财富。我和他儿子弗雷德·谢尔成了好朋友。一年春天，他邀请我到纽约去交易最活跃的五月份土豆合约，和我的好友丹·杰西（他是那儿的会员）一起去了，我们在曼哈顿区租了间公寓并在那儿过了夏天。即便我不是会员，我也能够站在靠近交易池的地方并向经纪商发出交易指令。纽约商业交易所规则实际上形同虚设，我记得，交易池中的交易员们一边吃着玉米牛肉三明治，一边推挤着达成交易。西尼·谢尔讨人喜欢，有一天他吐露说他持有大量多头头寸且卖出的时机已到。“好好看看，学着点儿。”他跨进交易地时说道，每一个人都冲过来，要看看西尼·谢尔要做什么。交易员们知道西尼·谢尔能够推动市场并对他的所有举动充满尊敬。西尼·谢尔抬起双臂，大声喊价并开始买进。交易池里顺风而动，每一个人都开始买进，且将价格步步推高。过一会儿，西尼·谢尔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走出了交易池。“你不是告诉我要卖出吗？”那晚一起吃饭时我问他。“是的，”他咧嘴一笑，“你明白了，小家伙，我的经纪人满场子都是，他们持有我的卖出指令，我把头寸都卸给了日内交易商们。”

知道我的意思吗？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分析而是在于技巧。实际上我从早期的老师们那儿学到的是——交易是极为困难的专业，不仅要求技巧，还有掌握经验、信息及出色的商业判断。从方法上来说，我懂得了并不存在纯粹的基本分析派，一个好

的交易员应学会如何将两者融会贯通。

为了运营我新成立的清算公司，我选中了瓦勒里·特纳，她是我的法律秘书，接替与莫利·克拉维茨结婚的莫纳·华莱士。特纳虽然只有18岁，但她聪明，能言善辩，满怀信心，我是直接把她从YNCA秘书学校招聘来的。由于我负担不起，我没有通过中介机构进行人员聘用。即使我能负担得起的话，我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找到和特纳一样有竞争力的人选。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她是拉萨尔大街上屈指可数的黑人秘书之一，但我看中的是她的能力。遗憾的是，对于那个年代法律圈子里的我的一些同僚来说，这一因素改变不了什么，他们更关心现状。我曾经经常带特纳到酒吧协会餐厅共用午餐，之后不久，我不断收到一些令人不快的信件，把我称为“煽动民众的家伙”。现实让我惊醒，原来真实的世界并非父母让我期望得那样理想。他们给我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对于肤色、宗教、种族、性别的区别几乎视而不见。我深感震惊，这儿不是美国的最南部，这儿是芝加哥——美国的最北部。

在我的整个市场生涯中，瓦勒里·特纳成了我的知己和最亲近的私人朋友之一。她不仅仅负责运营戴尔舍公司，还成了在交易所拥有席位的第一批女士之一（毋庸置疑的是第一位黑人女士）。1972年5月，在我的坚持下，她在国际货币市场（IMM）购买了一个席位，她还购买了戴尔舍公司少量的股份，在她的领导下，该公司成了期货行业的一个楷模。今天，她是期货运作方面最受欢迎的专家之一，而且从一开始，她就担任我的公司——樱花·戴尔舍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只是在最近，她才宣布计划退休并开始结婚的消息。

先不要一下子扯得太远，在我成为Merc主席之后，我得到了真实世界中关于偏见的第二个教训。我的当务之急是设立部门并在预算许可的范围内聘任最优秀的人员。我所接手的交易所几乎没有组织架构和部门。我不顾一切地努力创造一个实实在在的组。我想设立研究与教育部门，这在交易所是闻所未闻的，我想要一个正式的合规部门，以保证交易规则的执行；我需要一个公共关系部门以提升Merc的形象。我开始了面试与聘用。在雇了最初的五人之后，Merc的总裁E. B. 哈里斯，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要见我，他没有说事情的原委，只是说很重要。在我面前，哈里斯总是有点神经质。他认为，我作为披荆斩棘开辟新的道路的新任主席，定会在清理门户时把他一起连锅端掉。

“请向我保证，你没有发疯。”哈里斯说，在我的办公室走来走去，我说没问题。

“我支持你所做的一切。”他继续说道，“我完全站在你这一边，请相信我，你相信我吗？”

我向他保证，我相信他。

“好的。”他说，仍然在走来走去，“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对我都挺好，新的部门、新的人员，我想这真是太好了。”

我开始不耐烦了，“快说下去。”

“好，好，那我就只有一个问题，不要抓狂，但你为什么只雇用天主教徒呢？”

我无言以对，我无法回答，因为最初我简直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不了解 Merc 的新员工的宗教信仰，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但显然哈里斯对此了如指掌，并铭记在心。“你难道不晓得天主教徒们喜欢拉帮结派吗？”哈里斯说道：“如果你雇用犹太人，我不会责怪你，你自己是犹太人，却雇天主教徒。”

我既震惊又困惑不解。在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创办人主要是小麦农场主，也因而被看做为爱尔兰人的交易所，是的，那儿犹太人会员比 Merc 少。与此相反，Merc 的创始人是黄油和鸡蛋的商人，在那些日子里被看做犹太人的交易所。实际上，只有大约 1/3 的 Merc 会员是犹太人。在 1953 年哈里斯来 Merc 接替奥斯卡·奥尔森的总裁职位之前，哈里斯曾担任 CBOT 的执行秘书，他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犹太人。

“哈里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宗教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对我在交易所所聘用什么人发生影响。”说这话时，我火气直冒，几乎是在喊叫。那是我所能说的一切，从此他就再也没提这件事。哈里斯并非偏执的人，他只是有点过分谨慎。他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在伊利诺伊州的挪里斯城长大成人。17 岁时，他搭车到底特律，并在货运码头为克罗格公司工作。随后他考取了伊利诺伊大学并获得经济学学位。之后，他挣扎着在大萧条年代中求生存，并在战时为罗斯福新政府工作。在灿烂的笑容和强有力的握手背后，他懂得如何在严酷的竞争中协调工作。他做我的上司 20 年，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而我是自己时代的产物。

但他们的观点反映了交易所运作的方式。它的会员从来就不明白自己的潜力，他们从来就不想有所改变。我没有在交易池中寻找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在公开喊价的体系中，你和满足你买入和卖出报价的第一人达成交易，场面嘈杂但有效率，因为它允许交易池里每个人同时接收同样的市场信息。确实，交易员们的厉声叫喊、炫目的强光、怒吼与咆哮可能会令人感到害怕，但这是交易池文化的方方面面。像所有的资本主义巢穴一样，这儿的文化建立在财富即是权利的原则之上。金钱是衡量的标尺，有声望的交易员都是成功人士。但理论上，交易所并非富人要求权利的贵族政治。与之相反，交易所的精英管理制度要求一体化运作。一些人竭力维持生存，而另外一些人赚取财富，我们在这个地方都有份。交易所的领导们应该明白这一点，但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除非他强而有力，否则没人说了算。他们扭曲规则、操纵市场，且这一体系允许这种现象存在，这样的行为限制了交易所及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

理事会刻板而保守，充斥裙带关系，对普通成员的意见置若罔闻。我的历史书告诉我，当一个人停止听取别人声音时，他便只听从自己并依自己号令行事。反过来，这会导致自尝苦果。在正常的心智下，没有人愿意成为这种过程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尤其在会员制组织情况下），必须达成一致意见。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Merc 领

导层对自己的迟缓行动反而沾沾自喜，这贯穿于理事会直至交易会员、客户及聘用过程。通过一系列的秘密规则，交易所受到了强有力的操控。

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文化，在其中变化的速度不断提升，允许提出各种问题。我是个年纪轻轻的毛头小子，但也目睹了交易所最糟糕的时期。毫无疑问，需要改革。但怎样的改革？这是会员的机构，不是私人俱乐部，且交易所与大门之外的公众与商业世界打交道，他应该对自己负责，这意味着理事会要对会员负责，对交易所、对 Merc 用户负责。这个概念在双方对垒的分界线上摇摇晃晃。在一边，是像我及信心动摇的公众一样的年轻交易员，在另一边，则是满足于现状的老顽固们。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1 章

利奥理事长

我从来并且永远是一个交易员。按照定义，一个好的交易员在犯错的时候必须愿意承认，而且必须迅速行动。不然，他就会破产。在我学到了这条教训后，它已经扎根于我的交易文化中，然后我将它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领导者，我有同样的思维模式。如果我犯了错，我不会等待，我会马上纠正它。如果我错了，我希望尽快知道来减少潜在的损失。

我对于这样一个事实一直感到困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Merc 的领导人也是交易员，而且是非常好的交易员，但在管理 Merc 的时候他们忽略了自己的直觉。我记得在我的历史书中曾经有一段托马斯·杰斐逊^①的话，“每一代人必须重新改造国家一次”以及“民主制度必须设计出自己的命运”。同样的观念可以应用于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机构，特别是当其官僚机器已经因年代久远而吱嘎作响时更应如此——就像 1966 年 Merc 当时的情形。当时我精神上倾向于杰斐逊思想，信仰普

①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 年）。他是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成员并起草了《独立宣言》（1776 年）。——译者注

通人的权利。但我面对的理事会看上去却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应当由特权阶层来统治的观点联系更紧密。

当我没有现存的有待检验的观念时，我观察并倾听。我知道什么时候听到的是一个好主意，什么时候听到的是一个糟主意。我也领悟到了我的雄心。从1965年开始，我知道我的事业在交易所，我有一个使命：彻底地沉浸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政治框架中。

由于四年前通过的法定人数规则，没有会员推动的意见可以挑战理事会，因此法定人数规则看上去是个空洞的胜利。理事会并不重视我这一代人的需要。但是，美国国内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在游行和静坐中可以听到看到每个地方传来的年轻一代的声音。不管人们有什么动机和理由，他们基本上争取的是同一个东西：更多地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对自己的命运要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也是我希望自己和其他 Merc 会员得到的东西——对我们未来更大的发言权。

我们的心情也随着时代在变。20世纪50年代所谓“沉默的一代”被“垮掉的一代”所代替，新一代留着胡子的诗人用自由体唱着咖啡馆福音书。花季少年也不落后。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赌博，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推到历史新高。通货膨胀、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总统^①的社会运动带来的大规模国内变革都在拖累经济。

对于 CME 普通会员来说，很明显理事会漠视会员的观点，就像他们拥有交易所那样统治着交易所。我们的想法、思想和批评被完全忽略了。我们无足轻重，我们知道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声音被听见。对我来说很清楚，经纪人俱乐部必须重新恢复活力。为了这样做，部分晚辈的会员和普通会员中的老手组成了一个“我们对他们”联盟。我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衡器，一种可以迫使理事会倾听会员的呼声的东西。这次我们将推动理事会通过美国民主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全民公决。我认为，在 Merc 章程中的全民公决条款是唯一给会员对交易运营能够发一些有意义声音的办法，也是使得理事会对会员完全承担起责任的办法。当时，我认为除了极端情况外，这样一条规则可能永远不会使用。但这是一个有效的威胁，可以迫使理事会对会员加以更多的注意。本质上，我们希望得到的是精神上的平等。

从哪里开始？代理投票在我们的策略中又一次扮演了角色。但与我们的第一次努力不同，我们不必汇集代理来使法定人数规则通过；较低法定人数规则已经通过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汇集多数选票来提议和通过对章程的修正案。我们得到的回音是理事会会拼命反击全民公决规则。在理事会看来，这样一个修正案如果被通过也不会对他们起约束作用。那就走着瞧吧。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以理事长内森·韦斯海莫为首的理事会，并得到了总裁 E. B.

① 林顿·贝恩斯·约翰逊（1908—1973），美国第36任总统（1963～1969年），在约翰 F. 肯尼迪遇刺后上台继任。他在1964年大选中获胜，但因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日益增加而面临越来越多的舆论批评，在1968年没有再度参加竞选。——译者注

哈里斯，特别是 Merc 律师李 A. 弗里曼的支持。弗里曼对于 Merc 事务仍有很强的影响力。当然，卡茨以及其他一些强硬派仍然在理事会，而且卡茨仍然有很大的控制力。韦斯海莫被认为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理事长，听命于卡茨和弗里曼。

和以前一样，肯·伯克斯和我采取了策略性做法，他花了几周时间搜集投票代理以准备会员大会，已经向全体会员发了信，说明这次会议内容。这次会议是在 1966 年 12 月中的一个下午交易结束后进行的，芝加哥大街上满是积雪，就像我小时候见过的西伯利亚景象一样。每一个参与场内交易的会员都来了，还有许多在芝加哥的其他会员也来了。会员们在交易大厅里挤作一团，聆听双方的辩论，有时辩论还很激烈。韦斯海莫站在一个话筒前开始了会议，随后把话筒交给卡茨。卡茨说话声音响亮而愤怒，他告诉会员说我们的计划会毁了交易所。我们是被一些不懂交易所事务的年轻会员所领导。他的评论结束后是律师李·弗里曼的讲话，他争辩说全民公决规则在交易所章程框架内没有法律效力。弗里曼强壮而英俊，富于表情的脸，粗粗的眉毛，满头浓发，言辞激烈。他停顿了一下，清了一下喉咙，充满信心和权威地说着，最终以威胁收尾。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任何本次会议上由会员通过的动议是无意义的，是无赖行为和非法的，对理事会或本机构没有效力。

现在轮到我了。我在教室和法庭上用过我的表演才能，现在用到交易室了。我处于舞台中央，老实说，我喜欢这个角色。像托马斯·佩恩一样，我在那儿讲的都是常识。我是利奥。和其他人一样，是个交易员。而 Merc 是我今天以及明天谋生的地方。我了解会员，会员也了解我，我们同在一条船上。我们了解彼此的家庭，我们知道彼此的希望和梦想。我们把自己的未来交给理事会手上，而我们的未来不是非常光明。我们早已到了毁灭的边缘，刚刚能够生存。除非引入新的想法，建立新的秩序，否则交易所可能再次面临死亡。理事会拒绝了我们的所有要求，忽略了我们的所有想法。我们被挤仓和逼仓搞累了，我们希望一个公平的市场，那里不只是富有和有权的人才能成功。我们应该有更好地环境，我们希望有我们的声音，我们希望规则能用于任何人，所有人都得到公平待遇。我们希望我们的想法被更好地倾听。我们不需要革命，我们需要参与。如果 Merc 确实需要一个纯粹的民主体制，就应该需要有制度上的制约和平衡。时不我待，机不再来。

我认为，任何组织的政治成功扎根于个人的判断力、纪律、克制、逻辑、坦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勇气。那一天，我是否表现出这些素质中的一种或是全部，我自己不知道。在解释全民公决规则合理性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脏在跳，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交易大厅中回响。我这样做感觉良好，尽管我不是特别喜欢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但为了带来变革这也是有必要来承担的。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支持不同管理方式的革命者，相反，我是在现有框架内推动改革。在体制内部进行有效的变革需要一种精细而非严厉的方法。体制不能受到严重冲击。在胜利以后——特别是内部的胜利——篱笆需要修补，自尊心需要安抚，新的联盟需要建立，而且所有这一切

都必须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但当我向会员发表演说时，我的心集中在那一刻，而不是以后的情况。

我使用了自己作为一个演员、一个意第绪语诗歌朗诵者和一个面对陪审团的律师的所有技巧。我的语言不很雄辩，但很直截了当。我不想让词语阻挡推理和逻辑。但我也没有对会员发号施令。简单地说，全民公决是一个基本的美式原则。我们要求的不是什么引起地震或带来不幸的东西，这是一个美国传统。理事会不应对自己的会员感到害怕；相反，理事会应当欢迎并拥抱会员的参与。一个全民公决规则会鼓励对话，允许想法传播、讨论并检验。我的话非常有力，听起来不假。我的演讲充满信心，不管弗里曼说什么，我知道我站在合乎宪法的基础之上。我确信如果会员大会通过，全民公决规则将对理事会起法律上的约束作用。这是一个适时批准的会员大会，因为法定人数规则已经生效。如果理事会拒绝全民公决建议，而且如果必须法庭决定，我们这一方准备坚持到底。显然，这是一次明白的演讲。在我结束讲话以后，会员就全民公决规则或者称为 206 规则进行了投票，并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整个过程仅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

后来没有出现法庭上的战斗。实际上，所有的争端，从内容到目的，在那个下午的交易大厅里结束了。尽管 206 规则直到下一年 1 月举行的下一届理事会选举时才正式生效，会员们已经取得了胜利，理事会也了解这一点，不管是否公开承认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后来的年月里，全民公决规则更多地为理事会而非会员大会所用。但持不同政见者没有到处装模作样地宣称胜利。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目标，不会缓解阵营间的紧张。

在下一个月里胜利的势头变得明显起来。1967 年 1 月，我以所有候选人中的最高票入选理事会。这是个巨大的胜利，不仅因为我得到了相对多数票，也不是作为非现任理事我得票领先，而更多的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人选理事会的新类型理事——我不是当权派的儿子、女婿或其他关系户。引导新纪元的第一阵风已经刮过了 Merc 的交易大厅。

当理事会选出新理事长——48 岁的罗伯特·奥布赖恩的时候又一次得到了证实。奥布赖恩不仅是我的好朋友，还是经纪人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奥布赖恩是 Merc 创始前辈之一，约翰 V. 麦卡锡的女婿，他充当了老卫兵和像我一样的新一代会员之间联系的桥梁。我被选为理事会秘书。通过这一任命，理事会又打破传统，选举一个新任理事会成员充当交易所官员。理事会的任何职务都是重要的，但我渴望的秘书一职，对我来说有重大意义。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做过肖洛姆阿莱凯姆民族学院的理事长，但从他作为秘书的职位领导了这个学校组织很多年。我有同样的想法，并且知道奥布赖恩会支持我。确实，在我使用秘书职位向全体会员书写正式报告这一理事会机关的特别用途的时候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尽管这和过去理事会的秘密传统有很大偏离，但奥布赖恩确认了这一做法，因为我在公开的平台竞选理事，我应

该信守诺言。此外，公开和坦诚是奥布赖恩管理班子的特点。奥布赖恩不仅欢迎我的紧密合作，他还善于接受我的意见，并在他作为理事长的两年任期内鼓励我承担领导角色。他想让我继承他的职位。

在他的管理下，Merc 开始重新组合其力量，开始拓展其雄心。他第一个分散管理权限的做法是成立一个由 Merc 官员理事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为一个操控力量。值得赞扬的是，奥布赖恩希望新的理事会形成一个他所谓的道德规范，将老伙伴网络放在一边。全民公决 206 规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这是 1919 年 Merc 创立以来最剧烈的政策变革之一。在我的提议下，选举了一个包括小迈克尔·韦恩伯格、吉尔伯特·米勒和我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起草和修改 206 规则。此外，理事会年会次数翻了一番。公布了各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名单并送往外地会员，以便他们和芝加哥保持联系。我甚至制作了第一份官方年报。会员及其核心都做了一些调整。设备改造也在进行中，以增加 25% 的交易大厅面积。高亮度的行情报价板重新安装在交易大厅尾部部位上，还有一套通道和报价板隔间。原来的理事会会议室变成了临时的咖啡屋，原来的咖啡屋成了委员会办公室。尽管 Merc 安装了一台新的装备有 1401 处理器的 IBM 数据处理中心，离完全自动化还有很长的路。但大变革的基础已经打下了。

1969 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50 周年前夕，我再次入选理事会，会员得票率是前所未有的近 90%。这不足为奇。我作为秘书的角色高度透明。我在普通会员中关系很好，而且我是一个好的交易员。我也向奥布赖恩不断提供新的想法，他对这些想法的实施感到高兴，并诚实地说明这些想法的来源。我们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组合。此外，我信守了我的诺言，倾听会员的声音，同时服务于很多委员会，并和交易大厅的伙伴打成一片。每个人都认识利奥。

当时，我每天都要喝无数杯咖啡并抽三包云斯顿香烟。一个记者在特写中将我描述为具有紧紧卷起来的发条那样的强度。确实，我的速度近乎疯狂。半天时间用于交易，另半天以及晚上都用来处理交易所事务。但我喜欢这么做。在我再次入选理事会一周后，我将成为 Merc 的第 23 任理事长已经是可以预知的结果了。

我以前说过，我的父亲很早以前就打破了沉默，完全宽恕了我。他不是一个舞台演员父亲。他从来没有什么意愿要像比如莫扎特的父亲那样指导我的职业生涯。首先，我不是天才。但回首往事，我现在怀疑驱使我进入交易所水银灯下的部分动因，是他默契地希望在我一生中不仅仅成为一名交易员。我看到太多的儿女将自己的一生捆绑在父辈关于职业和金钱的期望上。在这方面我并不惧怕父亲，也不需要得到他的同意，但我被视为他的期望而且永远是。我们逃到美国已经将我和父母以今天我仍然让步的方式捆在一起。毕竟，我的父亲是救了我命的人。

哈里斯了解我的首要特点之一是我可以宽恕并遗忘。哈里斯认为我肯定会解雇我的主要对手——CME 的律师李·弗里曼，因此他想让我们两人见次面，期望我们

也许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芥蒂。在 Merc 所有的狮子一般的猛将中，没有一个人的咆哮声能盖过弗里曼。我喜欢狮子的咆哮声。“哈里斯，你怎么知道我要解雇这个家伙？他是个牛头犬，”我说，“为什么我不希望自己一边有一头牛头犬呢？他是个让人受不了的律师。”

当时，不管是哈里斯还是其他人都了解我的管理哲学。我无意将理事会变成哈姆雷特的最后一幕。我希望创造一个“我们都在一条船上”的合作，而非让偏执和焦虑把交易所变成背叛文化盛行之地。要这样做需要宽恕、遗忘和友好地劝说。我从来不关心一个人过去是谁，以前是多大的一个敌人，我总是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人是可以通过逻辑做通工作的。这成了我哲学的观点。在我认为有足够多的会员相信一个举动是正确的事情前我不会行动。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可以让我信服我有些事情做错了，那么我会立即试图去纠正。我总是挑战自己关于所谓敌人的观念。结果，我从来不怕反对，相反，我欢迎对我提出意见。

我和李·弗里曼见了面。他很肯定地预计自己将被解雇。我直直地看着他青灰色的眼睛说，“我不想解雇你。我想让你像为他们一样为我战斗。”他发出了响亮和猛烈的笑声，他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我们之间马上和解了。这是我做得最正确的决定之一。多年来我的很多事情都依仗他提供建议和指导。我们成了朋友，并互相热烈地钦佩双方各自的才能。不管我提出什么想法，不管多么具有革命性或是非常难于实现，弗里曼都以无条件的热情支持我，在每一次战斗中都站在我一边。我们从来没有失败过。如果 1969 年我切断了 Merc 和弗里曼之间的联系，那么交易所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失败者。

当 1995 年李·弗里曼去世的时候，我失去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和无与伦比的盟友。他可爱的夫人布莱纳和儿子小李·弗里曼给了我荣幸，让我作为致颂词人之一。弗里曼的葬礼在芝加哥大学的邦德教堂举行，请来了抒情歌剧的表演者唱歌和奏乐以纪念他。芝加哥的抒情歌剧是弗里曼的最爱，他和夫人布莱纳是其特别赞助人。面对全是站着的听众，我致辞说，李·弗里曼从 1946 年开始成为 Merc 的总法律顾问，经历了各种事件，从不向危险退缩，从不向挑战低头。我告诉到场的人，“他的名字是坚韧，他的血统是不屈，他的誓言是坚强，他的血液是忠诚。”他称呼我堂吉诃德。如果我是堂吉诃德，那么我找不出一个比李·弗里曼更像桑科·潘萨^①的人，我们挑战的巨大风车是心有不甘的权力机构、人为敌对的金融世界、充满敌意的法律环境、挑剔难弄的政府组织和势不两立的当地设区。

在我们和解不久，弗里曼指派了来自他公司的一名哈佛毕业的年轻律师杰瑞·萨尔兹曼与 Merc 合作。这是一个出色的决定。弗里曼在我任期早期给我提供了力量和关系，而萨尔兹曼和我亲近得多，他是一名出色的律师，在我们即将开始的推行

① 《堂吉诃德》小说中人物，堂吉诃德的仆人。

激进和创新的想法时成为可以信赖的合作者。

我不会记仇，我也不介意化解宿怨。13年前，当我还是一名正在奋斗的律师兼交易员的时候，我在北方信托银行开设了一个支票账户，该行绰号是拉萨尔大街的灰色贵妇，^①一方面该行的砌石立面的颜色是灰色的，另一方面该行倾向也很保守。我经常冲到银行去存钱以补上我开出的支票。我仔细地避免透支，因为我不希望得到一个赖账不还的信用评级。在一天交易特别顺利后，我存了很大一笔钱，支付了我的所有账单。但一周后，我开出的支票被退了回来。我马上赶到银行，向银行的一个职员指出银行出现了差错，未能正确地记录我的存款。起初，银行否认出现了差错，给了我一段艰难的时期。后来，银行不太情愿地承认出现了差错。我坚持银行向所有那些接受我被退支票的人写一封道歉信，威胁说如果不这么做我会起诉银行。银行发出了通知，承认了差错，我的信用等级也澄清了污点。但该银行还是对我有些恼火，要求我撤户，于是我撤了户。但当我尝试在另两家拉萨尔大街上的银行开户时遭到了拒绝。我可以发誓我上了某种黑名单，但我从来无法证实这一点。最终，我在美国国家银行开了户。这是1956年的事情。我已经忘了这一事件，直到1969年我成为Merc主席的时候才想起。

尽管我们当时还是一家小交易所，我们却是银行的大客户。我确定我们的存款分散在各家银行：美国国家银行、第一国家银行、大陆银行和哈里斯信托银行都拿到了钱。而北方信托银行一文不得。然后有一天，E. B. 哈里斯问我为什么要排斥“灰色贵妇”。我告诉了他和来见我的两个北方信托银行的职员有关我的故事。我告诉他们当时一个奋斗中的拉萨尔大街律师如何寻求一家友善的银行却被断然拒绝，我发现他们退避了。他们得到了信息。

其中一个银行职员问我：“有没有办法可以弥补我们过去的过失？”

我说，“我不记宿怨，如果你们理事长为那件过失给我写一封道歉信，我会给这件事情一个了断。”信发了过来，我们就在北方信托银行开了户。

从那些早期年代开始，我总是有一小群人成为我挑选的核心集团。他们是最接近我的人。他们都是些聪明诚实的人，我可以向他们寻求建议；他们会告诉我真相而不会对我感到胆怯。他们是我的宣传媒介、我的朋友、我的建议提供者以及我的真相小组。有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话召开会议，大多数时候是面对面聚会。通常是工作完毕后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场所会面。有时是在我们一间办公室，有时是在其中谁的家里，但最经常的是在一些通宵咖啡馆，我们可以吃三明治，喝很多杯的咖啡。在那里我们可以讨论并争论以探索或计划一种策略、一种创新或Merc发展的下一阶段。

这些人都是些从不把个人利益置于交易所之上的人。这些人总是准备去工作，

① Gray Lady [美] 红十字会的义务女医务人员（着灰色制服）。

是我可以信任终生的人。这些人是和我一起建设 Merc 的人。和他们在一起，可以把各种想法推进到下一层面前进行各种检查和测试，这些人都属于权力层——各委员会和理事会成员以及交易所的高级管理层。在第二层面，可以为了改进和实施目的而对各种想法进行检查。这之后，我会到交易大厅去。在那里，我也有一个忠诚的中坚团队，可以推进目标、实施计划。属于这个团队的任何人都愿意为我赴汤蹈火，我为他们也是如此。

尽管多年来我的第一层面的核心集团成员有些变化，有时扩张，有时收缩，这个集团保持着相对小的规模，但也有一些人一直是核心集团成员。几乎从一开始我就非常依靠巴里·林德。他对数字的天赋是一种特别的资产。1970 年我任命林德负责 Merc 的结算委员会，这是我们金融完整性的神经中枢。在他的指导下，先前开始的结算所重组和交易所财务结构重整进入了高潮，提高了财务要求，指定了更高的财务标准，开发了现代的工作指引，建立了正式的监察和审计系统。在林德的帮助下，Merc 建立了无与伦比的财务力量和完整性基础。

林德是芝加哥著名的犹太教领唱者菲尔·林德的儿子。他的职业生涯从萨姆和菲尔·贝克尔公司的职员做起，但很快沿着职业阶梯上升到成为 CME 理事会的一个有价值 and 受尊敬的理事，而且最重要的是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林德在事业上极为成功，同时也是最不可能你到处可以找到的“应声虫人物”。在理事会服务后，他将其天才应用于成立的第一家期货折扣佣金商。今天林德－华尔多克公司在期货市场中的地位等同于嘉信公司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

我们经常发生意见不一致的情形，但我们总是尊重对方的观点，并且一直是最紧密的朋友——也许用兄弟来形容更为合适——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且经常会碰到困难的时期。不仅如此，我们的家庭也变得很亲密。我成了他与戴莉结婚时的男候相，而且立即喜欢上了戴莉的直率和洞察力。贝蒂、戴莉、巴里和我成了一个稳固的四人组合。我们一起到世界各地冒险——阿卡普尔科[Ⓐ]、里约热内卢、伦敦、巴黎、伯根斯托克[Ⓑ]、威尼斯、斯考茨戴尔、阿斯彭[Ⓒ]，并且珍视在一起的每一分钟。林德和我有很多方面的不同，但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共同点，我们都开保时捷车——而且都喜欢开快车。在我退休的时候，他给了我最大的称赞，承认我开车从他家到芝加哥中心城环路最快用时 19 分 34 秒，因此创下了世界纪录——比他自己的记录快了 58 秒。

起初，我的核心集团也包括经纪人俱乐部的成员肯·伯克斯、丹·杰西、鲍勃·奥布赖恩、马洛·金和比尔·布罗斯基（和现在的 Merc 总裁没有亲戚关系）。另外

Ⓐ 濒临太平洋位于墨西哥南部的一个城市。是旅游胜地，有一悬崖和海岬围成的天然良港。

Ⓑ 瑞士山城。

Ⓒ 科罗拉多中西部的一座城市，位于落基山脉的萨瓦其山，约在 1879 年由银矿勘探者建立，现为一流行的滑雪圣地。

还有我在戴尔舍公司的合伙人乔治·佛塞特，他是一个具有非凡洞察智力的精明交易员。还有我的朋友雷蒙德·内西姆，他是菲利普兄弟公司的市场顾问，后来成为我的公司樱花戴尔舍公司的理事。一开始，核心集团也包括税务专家艾拉·马库斯，我将他请到交易所担任税务顾问。他令人眼花缭乱地找出合适的法律保护，可以使得我们以后提出的部分想法得以实现。后来，核心集团还包括杰弗里·约瑟夫森，我在智力层面和交易方面都跟他有联系，直到他于1989年过早去世。他和他的妻子塞伯尔跟我成了家庭朋友，贝蒂和我可以在他们身上寻求支持和解闷。

还有莱斯·罗森塔尔，他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中精力旺盛的人，并且是所有芝加哥交易所很多会员的可信赖的朋友。1976年，莱斯·罗森塔尔赢得了一个独特的声望，他是我们CME理事会的理事，又是我们的竞争对手CBOT理事会的理事，同时还是期货结算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在他成为CBOT的理事长后，他和我和谐相处，带领互相竞争的两家机构和期货业经历了许多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甚至开玩笑地提过合并的想法。莱斯·罗森塔尔和巴里·林德一样，成为我的一个特别亲密的私人朋友，我喜欢他的幽默感，在后来的岁月中我可以向他寻求建议和帮助。实际上，我们两个可以互相信任到我们生活的最亲密的细节——并且总是如此。我们两个都有难民的经历——罗森塔尔来自匈牙利，提供了一个特别结合的基础，并且这种关系延伸到社会层面，他亲切的妻子哈里特成为贝蒂的好朋友。

布赖恩·莫尼森是一个数学和计算机内行，是我们集团中第一个真正懂得计算机分析的人。后来他成为Merc的理事长。从幼年时代开始他就是一个赛马运动爱好者，是芝加哥第一个设计和编制电脑化障碍赛系统的人，他的产品赚了一大笔钱后，他开始将他的技能用于在Merc交易。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赛马的业余爱好。后来，他和一个特别成功的交易员同时是我们两人的共同朋友乔治·西格尔成为赛马阿茨普雷斯的马主，这匹马成为两岁马世界纪录创造者和1992年标准赛的年度马。莫尼森和我成为不可分离的朋友，在我们推出部分Merc未经考验的金融合约以及涉足建立和新加坡SIMEX之间的世界第一个期货交易连接的领域中时，我非常看重他的意见。我们两个首先都是交易员的这一经历铸成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延伸到社会方面。我们也了解到双方都是桥牌迷并成为桥牌伙伴。最终，布赖恩·莫尼森和他的妻子多丽丝步我们的后尘，在亚利桑那州买了第二所房子，我们四个可以跑跑步，看看电影，放松放松。

还有亨利·贾勒基，他原来是一个纽约的精神病医师，后来成为一个贵金属套利者和摩卡塔金属公司的负责人。他的智商和商业才能对我来说有不可动摇的吸引力。他从一开始就成为我可以信赖的知己，是激发我思路和讨论的无穷源泉，是我核心集团的固定成员，从来没有不能对我的想法提供具有启发性和坦率的评论，并且他还是国际货币市场的创始理事之一。一次，他充满激情地公开宣称，他“将跟我赴汤蹈火”。许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贾勒基也是一个难民，孩提时代从德国来到美

国。这一发现导致认识我们两个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主席吉姆·斯通这样说，“你们的出生是一样的，你们的生活却走了大相径庭的道路……贾勒基几乎都是以私人企业家的身份在运作，而梅拉梅德将他的天才都用于公共事业。”随着时间的流逝，亨利·贾勒基和我将我们的友谊扩展到了社会层面，哲学地探讨生活的意义，探索新的想法，在欧洲一起奔忙。

作为理事长，我不仅希望能够保持前进的动量，而且也关心长期发展的思路。你可以做空市场，但你在管理交易所的时候不能短视。^①我认为在事业上，不前进就等于后退。但我也很现实地认识到重生当然比维持旧的政策困难得多。我不想轻视传统，而只是想去影响它，这需要一个灵活的管理方式和强硬、断然甚至哲学化的语言。我给全体会员起草的第一封信表达了我的感情：“……我建议我们的选择是必须用我们前进的动量保持我们处于持续的进步之中。但前进中的问题在于没有魔法公式，特别是在一个大机构中尤其如此。对一个机构来说是有效的对另一个机构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

我要求他们忘记交易所旧有的模式，而代之以一个进步的模式，其领导人可以看到未来 50 年的发展。在一个交易员文化中慢慢灌输长期的思考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大多数交易员是靠短线交易来维持生计的。但这是挑战的一部分。我必须为 Merc 遭受的危机管理综合征找出一付镇痛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设定了我作为理事长将要追求的三个目标：重写并更新 Merc 的章程；打击那些试图操纵市场的交易员来改变我们的形象；通过创建新市场来使得交易所多元化。

首先，我评估了一下人事安排。我的优先选择是保留人员不动，特别是那些有业务专长和历史感的人。我相信保留 Merc 拥有的每种资源都是有用的。在一个仍然是新兴的行业中要轻易地找到替代人员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于多数局外人来说，尽管他们财务精通，但商品交易对他们来说还是个谜——实际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哈里斯对我来说是个未知数，他当了 15 年的总裁这一点让我对他很有偏见。但我发誓要克制不轻易作出最终判断。他也对我管理交易所的才能感到怀疑，疑惑我是否具有足够的外交才能来沟通业已存在的代沟。从直觉上判断，我得到的结论是哈里斯已经陷入了超出他控制范围的局面之中。他很少能从一个经常反复并且有时是刻毒的理事会得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承担起一个领导角色是很困难的。不过，他有经验，有实践智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家才能。他是我过去时代的参考。但哈里斯给予我的经常多于我所需要的。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会一直说啊说啊，离开了手头的话题，迷失在回忆的薄暮中。但他是一个重要的宣传者，懂得如何对付芝加哥的老伙伴网络。支持哈里斯的人比反对他的人更多。有一天他的一个举动使我喜欢上他，他指着西尔斯大厦大堂里由运动的车轮、钢铁手

① 做空（short）和短视（shortsight）源于同一个英文单词 short。

臂和巨大的钢螺丝钉组成的考尔德^①的雕塑，“你知道这描述的是什么？”哈里斯问我。我摇摇头，完全搞不懂。“这是西尔斯^②多年来为公众所做的事！”你怎么能不喜欢一个有如此理解力的人。

因此我保留了哈里斯的位置。我们形成了一种伙伴关系，架起了代沟，向全体会员表明过去与现在的交接与转变是可以和谐进行的。我也表明，一个人不会再为任何交易所未来政策的失败充当替罪羊。理事会和理事长也要完全负责，责任不仅仅是总裁的。我建立了每个部门从上到下的重组。职位被创造出来并被重新定义，包括行为规范。我慢慢灌输了一种关心职责的态度，通过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一个个人榜样。Merc 要成为一个不光是工作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人们可以爱戴的地方。我希望会员也来参与，来感受 Merc 的新的能量和热情。新成立的委员会将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委员会主席将是交易所主管，他们被驱使与部门经理紧密合作，并将其工作报告理事会。试图建立一个更具参与精神的组织意味着给予委员会更大的权力。会员的想法将受到重视。

在 1969 年要设想 Merc 的未来是很困难的，我在招募员工时要数到每一个铜板。我每年的预算是 18 万美元。当我 22 年后离开 Merc 的时候，预算已经超过了 1 亿美元。

从某种程度上说，好的领导就像好的演员，他们可以掌握转变各种角色的艺术。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将军、大学校长以及美国总统，不同的职位他都出类拔萃。我不是说我可以和艾森豪威尔相提并论，但我对担当理事长的角色感到自在，尽管我之前从来都没做过理事长。我跟着直觉、逻辑和良心走，奋力防止我的自我妨碍我的商业判断。我把自己看做在某地舞台上表演戏剧中的主角；同时，我在导演着场景，走上前靠近看看，然后后退几步看看效果，力图琢磨出我角色的深度和感情。我们在芝加哥拉开帷幕。三年后我会到大街上，路演一个叫做国际货币市场原创产品的广告。

① 亚历山大·考尔德（1898—1976）美国雕塑家，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在巴黎创造了活动雕塑，并且创立了固定的抽象雕塑，即众所周知的稳定风格。

② 理查德·沃伦·西尔斯（1863—1914）美国商人，他于 1886 年建立邮购公司，后来成为西尔斯·罗布克公司。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2 章

按 照 常 规

作为一个理事长分析一个组织的缺陷时，我和一个解决病人问题的精神医疗医师的做法没有太大不同，病人的问题来自于内部病理因素，需要加以识别、检查与矫正。Merc 对我来说就像一个 50 岁的病人：固执、狂躁，受困于本体危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幸的是，我没有一个精神病医生通常治疗病人那样宽裕的时间。变革必须同时既剧烈又迅速，而当时正处于一个“再”词语——再造、再发明、再组织、再布置、再定位等——进入商业词汇之前相当长的年代。

“一个市场有没有可能不再有逼仓？”我在成为理事长后不久问哈里斯。

他变得忧郁起来，浮现出悲哀和不常见的宁静表情。显然，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而通常情况下健谈的哈里斯此时却保持沉默的事实告诉我必须了解真相。

“我不知道，”他敲着自己的下巴说，“我就是不知道。”

“那么，让我们找出答案吧。”

如果他说了不，我也不会感到害怕。作为 Merc 的新任理事长，我是一个新来

者，没有污点，也没有钱，而且我不可能被收买。那不是说我不喜欢钱，因为我确实喜欢钱。但我希望是依靠在一个根据市场力量来分配收益和惩罚的市场上进行交易来挣钱，而不是从那些仅为自己私利目的利用交易所来盈利的那些人那里挣钱。在期货市场上仅凭供求基础判断正确是具有足够挑战性的，不需要再有其他的回扣。

我热爱自由市场的美。尽管我从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我直觉地和强烈地相信，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真实的价格会最终胜出。但在 Merc 有太多的人相信是强权能够获胜，对于这些人来说，金箴^①被不恰当地解释为那些有金钱的人说了算。换句话说，只要有足够的权利和金钱，他们可以超越真实。其中有些人是 Merc 的支柱，他们拥有理事会席位或者他们有能力接近理事。尽管听起来毫无新意，我希望任何人都能按同样的规则进行交易。我希望给市场一个机会来说了算。

我们是美国第二大商品交易所，但那没有什么值得夸耀。Merc 的期货业务份额只占全国总量的 6%。这个统计和我们在金融世界的较低地位相配。我们除了是一家地处穷乡僻壤的商店外，什么也不是。我们的财务价值有些可疑，市场大鳄可以有机会吃掉不知情的猎物。哈里斯有一次吐露真言说，“利奥，交易所是所妓院。管理者提供床，其余的都是交易员来干。”

如果我们想要有一天达到一个坚实的国家价值水平，如果我们想要有一天拥有一个稳定未来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方法，重新做人。一个新 Merc 的基础必须基于新的规则和一个可以有办法终止市场操纵、挤仓和逼仓的新纪元。不能再有市场欺压。我们必须将市场从非法控制的锁链中释放出来。

从历史上说，所有的商品市场的形象都不怎么样。期货市场被认为仅仅是金融家族的私生远方亲戚。我们的目的和功能并不被人理解。我们是影射和嘲笑的对象。总是有一些政客试图象关闭赌窝那样地关闭期货市场。实际上，在书本上记载过可以将期货投机者和赌博者一样关入监狱的法律，甚至还有法律禁止期权。小说家也在交易池中发现了肥沃的材料，写出了关于市场操纵者罪恶的小说。其中有弗兰克·诺里斯的经典小说《交易池》，写的是 19 世纪 80 年代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市场的挤仓故事。需要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而这需要交易所来做。这成了我的使命，我可以从 Merc 开始。

我知道不管是公司理事会还是和总统闹别扭的国会，管理层可以拥有的一个最强大的武器就是不作为。不幸的是，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工具，因为其结果将是机构的萎靡。作为理事长，我代表的是那些认为理事会太长时间什么都没干的会员。我的当选给人一个明了的变革的承诺。每一个开始成为领导的人都有一些新的愿景：

① 金箴 (golden rule)，《圣经》教导说一个人要别人如何待他，他也应该要求自己一样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特迪·罗斯福^①的诚实交易，富兰克林·罗斯福^②的新政^③，哈里·杜鲁门^④的公平交易，约翰·肯尼迪^⑤的新边疆^⑥，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及当时的共和党美洲合约。每一代人是自我的世界，由此也拥有被认为其独有的愿景。一代人发动战争，下一代忘了是为了什么发动战争。时间会砍凿掉人的判断力。

我也有我的愿景。我想要一个模范交易所。为了达到这个愿景，我需要一个忠于职守和积极肯干的理事会。在我第一份给理事会的《CME 现状》的报告中，我试图给我的管理定下基调和要旨。我在报告中说，我们不再是十年前那个同样的机构了。现在我们是一个不久将跻身美国最伟大企业的公司的理事。这带来了一种严肃的责任。我试图传递的是一种自豪感和超越平庸的欲望。埃萨克·迪斯莱利曾经说过，“在卓越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却满足于平庸是可怜的浪费。”我不仅说这些话，而且尝试去实践它。我夜以继日地干。我创建了很多委员会，设定了其目标；我会在他们进行商议的时候去看看；我会鼓励其他人来参与；我会提出我的建议和想法。我尝试表明每个人的想法都是重要的。不久理事会成员开始全职为交易所工作。不久，成为理事会成员不仅是拥有威望，而且要承担义务。这意味着要将时间投入到很多会议中，意味着要倾听会员的声音，也意味着要对新的需求和更广大的目标做出反应，意味着要塑造未来。在给会员的第一份年报中我告诉他们，“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倒退或者前进”。我们没有理由要倒退。

对于美国联邦当局来说，除了农业部下属的商品交易所（CEA）以外没有其他组织。商品交易所局由亚历克斯·考德威尔领导，下面有他的副手查尔斯·罗宾逊（后来成为期货业协会（FIA）的首位总法律顾问），几个秘书，实际上就没有其他人

-
- ①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9年），他是美西战争的中心人物，曾任纽约州州长（1899~1900年）并在威廉·麦金利被暗杀后（1901年9月）继任总统。他的政策以调节托拉斯集团、建筑巴拿马运河及对外奉行“说话和气，手持大棒”为显著特征。他因调停俄日战争而获19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 ②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任总统（1933~1945年），任美国纽约州州长（1929~1932年）参加总统的竞选诺言是为美国人民实施新政，他的政策以实行和计划、采取措施增加就业、协助工业和农业从大萧条中复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显著特征。他是唯一一位连任三届（1936，1940和1944年）的美国总统，死于任上。
- ③ 20世纪30年代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颁布实行的一种政策，旨在恢复经济、改革社会。
- ④ 哈里·杜鲁门（1884—1972），美国第33任总统（1945~1953年）。他授权对日本使用原子弹（1945年），施行了马歇尔计划（1948年），发起建立了北约组织（1949年），并命令美国加入朝鲜战争（1950~1953年）。
- ⑤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17—1963），美国第35任总统（1961~1963年）。曾任美国国会议员（1947~1953年）和马萨诸塞州议员（1953~1960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当选总统（1960年）。肯尼迪同意侵略猪湾（1961年）但失败，迫使赫鲁晓夫从古巴撤出苏联导弹。他建立了和平队（1961年）并倡议平民权利改革。于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遇刺。
- ⑥ 美国第35届总统肯尼迪提出的施政方针，要求美国人民探索和解决“新边疆”以外面临的各种问题。

了。商品交易所局预算微不足道，这和其权力也十分相配。但我知道这会改变。如果我们不希望政府来对我们的行动指手画脚或者按照洋葱丑闻那样的方式来掐死我们，那么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在建立了一个审计与调查部门后，我安排了一个注重实效的律师威廉·菲兰来负责。我希望从内部创造一个现代期货交易的模式——由那些懂得业务和细微之处的人来管理，而不是屈服于外界人的心血来潮。当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乔·肯尼迪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第一任主席的时候，他没有挑选一个职业官僚，而是一个清楚了解华尔街各个方面包括其黑暗方面的内部人士。在为 Merc 提供了多年的出色服务后，菲兰成了伊利诺伊州巡回法院的法官。

两年半前，作为 CME 的秘书，我最终看到了规则全貌。我知道规则已经过时，但我从来没有想象到是如此完全过时，并且经常含义模糊。有一些规则，好像都是在真空中加入一段，从不考虑这十年到下个十年的变化。规则全部捆扎在单本的粗糙的书中，用发黄的苏格兰透明胶带、胶水、回形针、钉书钉固定起来；包括上溯到 1898 年 Merc 的前身被称为黄油和鸡蛋交易所时理事会的打算。一些纸张是打印的，另一些是用褪了色的墨水潦草写成，需要一个埃及考古学家来提供破译服务。我把自己封闭起来，用了一个长长的周末穿梭在这片大杂烩中，发现这些规则充满了前后矛盾，放在一起绝对没有什么意义；一些特别的修改放在其他章节上下文中通常意味着一些不同的东西。对我来说很清楚，每一次变动既不被理解也不被解释。我原来怀疑 Merc 的机构记忆和章程全部装在一个人——肯尼斯·麦凯头脑中，现在得到了证实。突然之间，他担任过执行副总裁、结算所秘书、经理以及交易所的行政管理人员。麦凯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可以收集更多的头衔——历史学家和遗物保管人。

作为一个律师，我很清楚我们的法律部门已经无法修理了。需要一个全新的基础。现有的规则结构是没有出路的。我毫不犹豫地发起了可以描述为立宪大会的运动。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半时间。我组织了几十个委员会，几十个会员和律师对很多规则进行了费力的审查和修订。我们花了很多个夜晚在租来的俾斯麦旅馆的房间里，就像几年前经纪人俱乐部成员所做的那样。投入不仅来自交易所会员，还有业内专家和终端用户。有时在周末，我们的律师杰瑞·萨尔兹曼和我在我家碰头，餐厅桌子上撒满了纸张和规则手册。我的孩子艾戴尔、乔丹和戴维会充满敬意地看着我们两个就某一条规则的措辞加以争论。他们在观察一个新的架构的生成、新 Merc 的诞生。在这个艰苦的过程中，萨尔兹曼检查了几百条的交易所规则，许多规则是五易其稿才得以通过。在 1919 年最初规则制定后这是第一次规则体系被全面重新制定了一遍。

当我们完成的时候，Merc 的章程最终变得清晰、及时和权威。我力主改革的新 Merc 的政治机器的框架完成了。我任命了丹·杰西负责规则委员会，因为我知道他

会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对规则进行解释，而不管应用于谁。1970年6月，我骄傲地做到了向每一名会员发放了一本 Merc 规则。其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商业行为委员会——规则有了约束力。到那时为止，我没有办法知道以我为舵手的 Merc 的未来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结果，但我知道当时时点上 Merc 处于什么位置，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了 Merc 的巨大潜力。我还知道其他一些事情：靠交易时使眼色违规的日子已经不长长了。

不久规则就遇到了考验。我碰到的对手是索尔·斯通。很清楚这是新旧两个时代的碰撞。斯通是22岁俄国革命后直接从俄罗斯的一个小镇罗曼诺夫移民来到美国的。他的职业生涯是从一个蛋品灯光检验员开始的，他为芝加哥的富尔顿大街上的一家鸡蛋粉碎工厂贝克兄弟公司工作，每小时60美分工资。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他成为 Merc 的会员，几乎是一手创办了令人尊敬的索尔·斯通公司——一家大的结算与经纪公司。尽管斯通是从鸡蛋起家的，他很快将知识应用到相对较新的猪腩市场。当发生逼仓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商品并不重要，方法都是一样的。所要做的就是拥有大部分可交割商品，然后很快就可以控制期货市场的价格。但这次不行了。我的私人专家马洛·金对于统计信息比计算机还要精确，证实斯通对到期月合约的可交割猪腩进行挤仓。“李，”马洛说（“李”是我交易池中的名字缩写），“如果你不加以干预，斯通可以将价格抬到他任意希望的价位。”

“就是他，”我告诉哈里斯，“我要阻止他。”哈里斯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祝你好运，”他咕哝到。

为了显示我对我和斯通之间年龄差距的尊重，我在斯通的办公室和他见了面。“索尔，”我说，“你可以尖叫、争辩、虚张声势、叫喊，但事实是你拥有了比可见供应量更多的猪腩。”

他沉默地坐着，冷冰冰地瞪着我，“索尔，你听见我说了吗？拥有比可提供供应量更多的现货是违反规则的。”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他嘴上露出一丝笑容说。

“哦，如果你也不知道，那我不懂还有其他人会知道，”我回答说，“但不管怎么样，到下周五你必须将一半的头寸平掉。你有整整一周来做。我不会来打搅你或对其他入提这件事情。没有人会知道。但我希望你下周从周一开始每天将猪腩头寸削减10%。”

“你肯定是疯了，”他轻声说，笑了一笑，“有谁能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

我打开了规则手册指着其中的一段说，“索尔，这里新规则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商业行为委员会可以要求你提高保证金，直到你支付不了为止。请不要让我证明这一点。”

他又笑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道。

我不知道他是否是虚张声势。但我知道我自己没有。我准备执行威胁并接受结果。这是一个新纪元，我们要按新规则来办。这不是我的规则，是 Merc 的规则。

到下周二早晨，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打电话给索尔，“我不是虚张声势，索尔，”我平静地说，“你今晚将接到正式通知。你猪腩头寸的保证金将每天提高 25% 直到你平掉一半的头寸。”

电话那头一片沉寂。“你在听我说吗？索尔。”我听到咔嚓一声。斯通挂断了我的电话。我彻底目瞪口呆。我要怎样做才能让这些家伙明白我是认真的。幸运的是，我用不了很长时间就可以看到 he 相信我说的话。

形势发展得很快。周三猪腩市场出现了跌停板，是一天内允许变动的最大幅度。周四也是跌停，周五又是。索尔·斯通公司的大量抛盘使得市场出现螺旋式下降。到周末，斯通已经将其头寸减半。

我感情上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这几天令人心痛。斯通他们在价格大跌中损失了几十万美元。我赢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但在这过程中也树立了一个有力的敌人。请相信我，我并没有兴高采烈；相反，我被焦虑所折磨。我感慨，我还要面对多少索尔·斯通啊。老哈里斯对整个事件感到惊讶，并且有一定程度的震惊。我感觉，从那一刻起，哈里斯开始相信我的判断。老实说，我对自己的判断也更有信心了。

但这又是代际的问题。我们必须证明老的一套已经过时了。索尔的儿子汤姆·斯通最终接管了公司，人很正直。索尔的女婿杰拉尔德·海尔希是索尔·斯通公司的执行官，担任过很多年的 Merc 理事，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其幽默感超群。从一开始，海尔希就告诉每个人由于将和老板女儿结婚会得到好处。他确实得到了。至于索尔·斯通，在某种程度上他不仅宽恕了我，而且成了我的崇拜者。

勇于面对问题总是我管理风格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不会面对困难问题做逃兵，或是让交易所忽视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埃莉诺·罗斯福^①迷，我也相信她经常引用的克里斯托弗社团的座右铭，“点燃蜡烛比诅咒黑暗更好。”那不是说我相信一个领导人将决定强加于其投票人。相反，一个领导人通过引导、塑造以及倾听仔细记录每个人的观点来达到意见一致。一个领导人可以将讨论向需要的方向引导。我会微笑、摇头，摘下眼镜和保持直接的视线接触。我不希望出现僵局，而是各方的妥协，这需要耐心。有时我必须哄骗、奉承和迁就别人以形成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有时我彻底无情地要求检查某个特定事情，但我从来没有遏止或压制相反的观点。只有当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到时才能达到真实的意见一致。我把布莱克本的约翰·莫利子爵的话“你并不能因让人闭嘴而改变一个人”显眼地贴在我办公室的门上。这是我的信条。

①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1884—1962），美国外交家、作家和美国第一夫人（1933～1945年），总统富兰克林 D. 罗斯福之妻。作为联合国的一名代表（1945～1952 和 1961～1962 年），她积极提倡人权主义。其作品包括《这我忘不了》（1949 年）。

一年以后，我又有了另一个机会来证明我制止逼仓的决心不仅局限于索尔·斯通。在1970年的猪腩审判中，我让Merc在清理形象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历史上第一次，一群试图逼仓的交易员被公开问责于交易所。1970年10月，他们在Merc理事会面前回答指控。我们既不是“袋鼠法庭”，^①也不是模拟法庭；但我们是同行组成的陪审团。如果我要做一个改革者，我希望成为一个谨慎的改革者，特别是当危及生计和声誉的时候。但Merc的声誉也会处于危险之中。

该案被指控的违规者包括大卫·G·海纳，他策划了这一阴谋，还有其他一批会员包括老牌的结算公司L.D.施莱伯公司以及安·库尼奥，她从她去世的丈夫那里继承了会员席位。到理事会接受指控的其他人是因为他们被认为参与了同谋，包括西德尼·马德夫和L.D.施莱伯，他们两人都名列当时最显赫和成功的交易员。在一份由商业行为委员会准备的详细文件中，海纳、马德夫和其他人被控与1970年7月或8月猪腩合约逼仓和操纵价格有关联。

我记得我看着L.D.施莱伯疲倦的眼睛问他关于逼仓的事情，他是Merc的创始会员，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有问题的交易是通过他的公司结算的。他用上升到嘶哑的声音说，“小家伙，问我30年前发生的事，我记得。问我昨天发生的事，我什么都不记得。”

幸运的是，比尔·菲兰的审计与调查办公室一直在监视Merc大的交易员的头寸，其中包括海纳和库尼奥。他有事实。杰瑞·萨尔兹曼作为起诉人非常出色。首先被告通过控制可供交割的现货在现货市场上逼仓。从那时起，他们就通过小幅但却获利很高的震荡来操纵期货价格。他们未能建立真实的套期保值账户，而是进行投机交易，使得市场价格按照对他们有利的方式摆动，他们则通过日内交易和转换头寸来获利。密谋者被判有罪并受到了惩罚。

理事会给出了创纪录的罚款和处罚。一个经纪人被罚款10 000美元，并被禁止在Merc交易三年，另一个经纪人被禁止交易两年。在当时，这被看做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一家结算公司被停止营业两个月，第二家公司的主要所有人被禁止从业两年，他公司的结算特权被取消。一家副会员公司的会员优惠费率被取消，第四个个人保留了会员资格，但被罚款30 000美元——这是当时对Merc会员最高的罚款。我们改革后的形象向前迈了一大步。

由于在案件审理中我作为主要法官，需要对付一个私人方面的难堪，因为其实我喜欢大卫·G·海纳。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优秀的交易员，正常交易也能取得巨大成功。他既是一个基本面专家，也是一个技术面专家，是第一批能够成功运用点数图表的人。在我早年的交易生涯中，大卫和我经常是在市场的同一方，双方的交易风格互

① “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也指囚犯在狱中举行的模拟法庭。

为补充，我们轮番在市场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向运动时触发停价指令。我一直以为他违反规则的原因仅仅是想开玩笑。有许多交易员喜欢这样，他们可以在界内的几乎所有比赛中轻易取胜，但总是有一些东西吸引他们在规定的界限外尝试。

我不清楚理事会成员个人对于猪腩审判的后果有什么想法。但总体来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迹象。而且毫无疑问，这件事情永久地改变了交易所的性质。我们跨过了一道坎，进入了不再容许胡闹的新纪元。审判会连同新的章程是一种校平器，提醒所有的 Merc 会员生而平等。长时期以来第一次我感觉 Merc 成了其应该的样子：这是一个人们可以在市场的测试中发现自己真实勇气的地方，而且可以在经济上生存下去。

在审判的时候，会员都感到骄傲。审判会在结算所的办公室举行，一周举行了两三次，向任何想来看看的会员开放（只要当时还有座位），触动了整个 Merc 的会员。一些会员感到目瞪口呆，一些会员有些生气，而更多的会员则热情高涨。在审判会期间，忠于我的场内交易员之一——埃迪·卡西尔喜欢说理事们应当戴上有斑点的假发，穿上长袍后才退到密室中参加判决。但每个人都知道审判不是开玩笑，想想逼仓会损害每个人的钱包。

在某种程度上，审判会解放了交易所，因为审判会将市场从市场操纵者手中解放了出来——至少在当时是如此。对于我来说，强化了我的领导角色。我从来没有因为以前没有而由我去尝试实践一个理想感到神经紧张。在我成为理事长以前，Merc 是个伤心地，受到道德模糊的拖累，充满了易怒的老人，他们的竞争倾向经常超越了公平竞争的界限。

审判会也起到了回答那些对我们自律评价不高的批评者的作用。但我还没有天真到相信我们已经让我们的诽谤者永远闭上嘴或永远不会再出现市场阴谋家的地步。总是有嘈杂有力的批评，安静微妙的批评，或者是两者结合的批评。也总是有一些人出来逼仓，对一些资金雄厚的人来说控制简直是一种病态。我只是不希望他们到我们的赛马场上。

理事长不时要掌握平衡的艺术。我必须知道怎样领导以及什么时候要服从。我必须对别人的建议敏感，但这绝不意味完全受他们的影响。我希望有所成就，但不是以掩盖同事贡献的自我甚至组织本身为代价。当然组织一定会给我知名度，但我不能用组织作为达到个人好处的手段。我绝不能做任何贬低或玷污组织的事情。特别是我需要结果。

我试着举个例子。我总是在自我检讨自己的表现。如果我犯了错误，我希望立即能够纠正。如果我发现了问题，我会尽快找到解决办法。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问题发出的噪声如此响亮最终你不能听到自己的思考。如果你把问题放到火炉中，它们开始是闷烧，然后突然变成大火。我的前任从来不是这么考虑的。我发誓我卸任后账本清白，不要留下后遗症。我的决心很快就碰到了考验。我最初碰到的问题之一

是从已有的惯例——固定客户佣金标准带来的反垄断起诉，可能会造成巨大损害。这是本过去年代的旧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诉讼是由我的小学同学阿拉姆·哈图尼安向我们提出的。在和 Merc 律师李·弗里曼的谈话中，我很快得出结论，与其进行这场旷日持久的不可能获胜的战争，不如尽快了解此案去干正事。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不是说这是个完满的解决办法，但这是个实际的解决办法。法官奖励我们由于停止了损害，我们的对手不能得到他指望的额外费用。

这次早期的遭遇概括了我的风格。这是我在以后令人神经紧张的岁月中应用的方法，在这些岁月中我们见证了1972年国际货币市场的诞生，1981年现金结算的引入，1982年股票指数期货的上市，1983年1.5亿美元建立新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大楼——有一个备用的交易大厅，1984年新加坡SIMEX连接，GLOBEX的出现，1987年的股灾以及1989年美国司法部对Merc和CBOT场内交易员交易行为的调查。

现实主义为基础解决方案的一个美妙的副产品是创新。在我成为理事长以前很久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我挑战过更有问题的章程。有一条我特别想废除的是关于对妇女成为会员甚至交易所工作人员的歧视。这也是过去时代的旧账。我们的理事长罗伯特·奥布赖恩完全赞同我的想法，但其他理事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的平均年龄都超过60岁。那一年是1967年，迷你裙开始流行，这成了理事会争论的一个来源。为了废除对妇女的禁令，我不得不同意应对着装有所规定。那天的问题是：一个妇女允许到交易大厅时她的裙子应该长到膝盖以上或以下什么位置？争论中有人说亮出膝盖会给会员带来问题——会使会员的独立思考分神，尽管在喧嚣的交易大厅里实际上没人介意你是个女人、男人还是从火星来的外星人。一个理事警告说，“你会让交易员走来走去时勃起。”在经过三个小时的辩论后，我们达成的结果是裙子底边必须在膝盖下方二英寸，这已经大大超过了当时政治上正确的尺度。桑德拉·史蒂芬斯在楼上的R.J.奥布赖恩也就是理事长所在的公司工作，恰当地成为美国交易所中在交易大厅中出现的第一个女人。同年晚些时候，纽约股票交易所接纳了该所第一个女性会员，1968年，CBOT也改变其章程允许妇女交易员进入交易大厅。

在打破妇女障碍方面我们成为创新者。无意间，我成了女权运动的发起成员。我的女儿艾戴尔喜欢提醒我在Merc理事会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是女权运动的成员了。她告诉我一个故事，在她弟弟乔丹7岁生日的时候，我回家时带回了他的生日礼物。但和往常一样，我也给她带了礼物，她当时8岁，另外给她另一个弟弟大卫也带了礼物。很多年后她问我是否记得我为乔丹买了什么礼物，我不记得了。“是一付棒球手套，”艾戴尔加重语气地宣布。“我的礼物是什么？”她问。我恐怕也不记得了。“也是一付棒球手套！”她骄傲地说，“在你眼里我和弟弟是平等的。”

1972年，障碍完全消除了。我赞助我的朋友和桥牌搭档卡罗尔（米基）·诺顿成为IMM的会员，在那里她成为第一个实际在全部是男子的交易大厅中交易的妇女。

芭芭拉·戴梦德、多萝西·哈里斯、泰莉·萨维奇以及其他一些妇女跟着也来到交易大厅。我碰到了萨维奇，她学东西很快，并将其学到的技巧用到了作为全国商业新闻广播评论员的职业中。但交易大厅对她们来说并不容易。这是一个男人主导的世界，而会员们也不怜香惜玉。金·哈夫作为一个年轻女子从1973年就开始在活牛交易池中工作。5年后她成为会员和B类套利者，给妇女会员和员工介绍预期会碰到什么事情以及怎样对付时说，“不要在交易池中哭泣，”她严厉地警告说，“永远不要给那些杂种有种满足感。”很多年后，金和前IMM的理事舍温·凯特结了婚，继承了从性别歧视结束后开始的Merc交易大厅恋情的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多萝西和艾伦·普莱斯、尼娜和汤姆·库尔腾是首批交易大厅中的夫妻档。珍妮特·迪斯特尔多夫将其成功归结于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学的戏剧专业，她在那里学会了控制声音，从1982年起，她就是活牛交易池中活跃的经纪人。今天，接近一半的CME工作人员是妇女，在交易池中也可以发现很多女交易员。但直到1988年，诺玛·纽伯格，一名前退休教师交易员，才成为第一个被Merc会员大会选为理事的妇女。

差不多在我们关注妇女平等同时，我们也开始关注自动化。CME记录交易和结算的过程仍然相当原始，其过去的传统仍占主导。在我开始在交易大厅里交易的时候，一个叫萨米的人栖息在一个玻璃小间的高凳子上。在他旁边站着乔，一个高大魁梧的人，他老鹰一般的眼睛盯着交易大厅中的黑板记录员，那些记录员听到价格后就记录在黑板上。乔就报出价格变化，萨米的手指就在键盘上飞奔，在一个连续走的纸带上记录交易，这些纸带最终都会扔到传统的垃圾桶中。这个系统是你能得到的最低科技了。随着交易量的增长，尽管有萨米和乔的奉献和长时间工作，他们还是跟不大上。在交易日结束后，经纪人会得到一张粉红色的买转移单和一张蓝色的卖转移单。他们随后手工记录每一笔交易的价格、数量、交易对手。这些转移单随后交给我们的“计算机”哈维。

哈维在普通人中有些不俗。他是一个高个、瘦削的老人，稍微有些耸肩，永远皱着眉头。他戴着一副绿色的眼罩和黑色的臂章。哈维的功能是什么？他是结算所，负责所有的记录和计算每日记录，决定亏损的人需要支付或盈利人所收到的净额。有许多晚上，哈维要到凌晨两点才完成工作，而早上七点又要开始工作。这是个令人筋疲力尽的作息时间。如果哈维没有完成其工作，上帝也不允许，而且Merc第二天不能开盘。

哈维对于交易量激增的解决办法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他有一次对我说，“也许我们不得不减少交易时间，因为成交量太大，难以处理。”这不是我就任后心里所想要的答案，就算当时是计算机时代的黎明，硬件和软件程序都有限。但当Merc正成为一家主要的期货交易所、成交量增长的时候，交易必须在第二天开盘前结算，我们正在爬上自动化的高速公路。在20世纪60年代，席卷华尔街的交易风暴将经纪商的后台埋在文书工作的暴风雪中，纽约股票交易所曾短暂地临时缩减了交易时间，以

便能有时间结算。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几乎不能算是一个解决办法。没有办法可以让我阻止交易的进行，哪怕意味着雇用大量的“哈维”。

我还不至于走那么远。1963 年左右，CBOT——我们的大哥交易所，在清算过程中通过“记录敏感”卡片用于交易记录从而迈出了朝向自动化的第一步。这是正确方向的一个重大步骤，但 Merc 理事会对此表示怀疑。

幸运的是，威廉·戈德斯坦是当时 Merc 的猪腩交易员之一。比利·戈德斯坦在技术方面总是领先众人一步，成了 Merc 内部的计算机专家。他建议交易所：跟随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幸运的是理事会听从了这个建议，尽管很原始，Merc 还是迈出了结算过程自动化的最初步伐。比利是从哪里和怎样获得技术知识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但我知道他是交易大厅中唯一一个实际上花了 600 美元购买第一批便携式计算器的人。该计算器有一个手提包那么大，一天他带着骄傲和一些神秘色彩地显示给我看。几乎同时，另一个交易员约翰·盖尔德曼，从 CBOT 来到 Merc，在 CBOT 他和他的兄弟汤姆建立了一个相当显赫的结算公司。约翰·盖尔德曼和老一代 Merc 当权者有联系，因为他和福克斯家族的人结了婚。盖尔德曼个子高高，做事安静，对于计算机技术有特别的技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后很快在 CBOT 开始了他的事业。当他的交易公司在 1964 年壮大的时候，他转移到 Merc 交易猪腩。过了几年，盖尔德曼和他的合伙人阿特·奥格来第创建了计算机服务公司 CIS，这是最初为期货市场参与者提供簿记服务的私人公司之一。到 1984 年，CIS 变得如此成功，被大公司 ADP 收购。但盖尔德曼获得的知识仍在家族中流传了下来。接下来的一年，约翰的大儿子杰夫·盖尔德曼建立了 GMI 公司，今天 GMI 有争议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期货市场交易处理机构。

约翰·盖尔德曼于 1968 年被选入理事会，他的计算机技巧成了 Merc 不可估量的资产。接下来一年，罗伯特·奥布赖恩和我鼓励盖尔德曼带领我们通过结算自动化的初始阶段。到 1969 年，我发誓 Merc 再也不是哈维结算机制的囚徒了。我让约翰·盖尔德曼负责场内设施委员会以及一个新建立的特别计算机委员会，目标是将 Merc 的交易和计算过程自动化。

我希望从黑板交易的系统中解放出来。这种过时的系统不仅让我们致力于建设的现代 Merc 感到尴尬，而且终结于一个丑闻。由于我们只能用有限次数的黑板，我们引入了一种技术对黑板记录拍摄宝丽来照片，以记录先前的交易然后黑板可以很快重新使用。一天，我们发现 Merc 负责照相操作的经理在过程中应用他自己的创新，利用暗室给裸体女职员的照片显影。这是黑板时代一个不那么光彩的结束。

这导致我们引进了由费兰提-帕卡德电子公司生产的第一块自动报价板。在我批准之前，盖尔德曼要求这家加拿大公司给我在交易大厅里做一次私下演示。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们雇用了格伦·温德斯特拉普。温德斯特拉普是一个奇特的年轻人，喜爱孤独，经常坐在办公室灯也不开。但温德斯特拉普完全靠自学成才，而且人很

聪明，他成了 Merc 的技术专家、盖尔德曼的得力助手。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盖尔德曼联合温德斯特拉普及他的助手，确保了我们可以得到最新和最漂亮的电子报价板、主机和高速通信系统。我们很快接通了世界，世界也接通了我们。从技术上说，我们再也没有回到黑暗的世纪，尽管在完全自动化的报告系统成为标准配置前我们也在打孔卡和手持装置的中世纪徘徊过。有一段时期，盖尔德曼和我完全依靠埃德·罗温德夫斯基——这个技师编制了 Merc 的第一个结算程序软件。当程序中断的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们会发疯般地在附近的酒馆中寻找罗温德夫斯基，然后试图让他足够清醒，在第二天开盘前能够给问题打上补丁。我们的自动化越高级，我们可以承受的交易量越大。也许这代表了另一个不成文的市场规则：交易量将按你能够清算的能力同比例增长。尽管有哈维的建议，我们从没有缩减交易时间以便让我们的结算歇口气。

信息是任何市场的灵魂。我有两种方法可以应用这条法则：提供信息来帮助我们的交易员，发布信息来建立 Merc 的形象。会员开始每天收到一份市场统计快报——前日最高和最低、持仓量等。他们也开始收到一份正式的执行报告和月度的新闻快报，他们可以了解理事会的动作。我将年报制度化，在新成立的公共关系部经理罗恩·弗罗斯特的指导下，将其转换为一个营销工具。为什么年报看上去要沉闷和破旧呢？那可不是市场的真实状况。市场和 Merc 都是富有色彩和节奏的。在交易所选举前，我也将描述有关理事会有前途的候选人事迹的小册子加以制度化。会员应该了解他们投票选举的人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我指挥了编印一系列教育小册子，这成了 Merc 最有价值的营销工具之一，这是一个为每个交易所接受的遗产。

但对于我来说，教育远远超出了每日的信息、小册子或者年报。教育从我儿童时代起就灌输给我作为生命本身的精髓。部分地，这是希伯来圣经规定的经典犹太教规：教育是生命实现的大道。但在我们的家庭中，地位甚至更高。就像我们家族的名字——意思是教师，表示我的父母首先是而且首要的是教师。梅拉梅德维奇家的我非常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职业。作为一个孩子，教育、学校、家庭作业、分数在我的生存原则中已经根深蒂固。我父母没有一天不抽时间教我一些生活的道理。这种心理定势成了我生命的一个永久性特征，教育成了我所从事的任何事业的关键途径。本能地或是有意地，通过微妙地推动或公开的行动，通过私下的方法或公开的申明，我将教育变成 Merc 的一个永久性机制——不管是针对交易所员工、会员、我们市场的使用者、监管者还是一般公众，或是针对上述全部对象。这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但在接下来的 20 年间，通过小的或大的步子，教育成了定义 CME 的特征之一。由于教育与 Merc 的成功是那么明显地相互交织，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想法也被美国和世界其他交易所采用或复制。随着时间的过去，Merc 发展了各种形式的教育：研讨班和研讨会，定期的全球座谈会，出版书籍，在学院和大学设立永久性课程的基金（一个例子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期货中心，该中心多年来由富兰克林·爱德

华兹领导)，支付奖学金和特殊学习津贴；交易所派出讲课人和演讲者，推动合作教育课程，拍了一部 Merc 的电影，赞助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从芝加哥大学开始建立了期货市场课程的永久性教授职位。

另一个和过去不同的做法是我公开尝试和我们的经纪公司以及我们交易产品的行业发展良好关系和增进交流。我决心向我们所谓期货佣金商（FCMs）的结算会员公司以及终端用户群体说明我们代表了一批新的交易员，而且这个 Merc 是一个新的 Merc。他们的想法是受欢迎的，他们的电话是有人回答的，他们在委员会派代表是所希望的，他们的批评不会对着聋子的耳朵。这及时地给 Merc 赢得了区别于 CBOT 的声誉，CBOT 当时以只听自己场内圈子而闻名。有时候，我组建了由非会员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成员们会定期提出建议和意见。这被证明是建立和专家的联系的最有效手段，这些专家可以为我们市场贡献一些东西但却从来没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正式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是金融界的替罪羊。我们宣告，商品期货已经摆脱了罗德尼·丹杰菲尔德^①的形象，值得大家尊重。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市场给国民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功能。这对我们会员、我们的交易员、我们的终端用户、我们的监管者和广大公众来说是一个新的信号。

我向罗恩·弗罗斯特解释说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新的形象。这是他的主要使命。他的回应是让我们涉足社区事务，通过和媒体发展工作关系，通过我们和当地农业论坛和广告谈话节目挂钩。各种努力汇总起来，我们有意铸造一种向媒体开放的政策。这在 Merc 历史上是首次。我们不再回避对来自媒体的困难问题做出反应。理事会的动作也不再对会员保密。我们欢迎媒体采访，我们接受批评，我们发布新闻报道。对于习惯于理事会不发声音和事情出错时顽固不认错的会员来说，这又是一次革命。

为了决定我们的广告计划，我给一些 Merc 理事打电话，这些人有一些我们所需要的天赋：首先是小迈克尔·韦恩伯格，然后是拉里·罗森伯格，再后来是杰拉尔德·海尔希。1965 年的广告预算是 1600 美元，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时膨胀到 70 万美元。我们和一家小的以马丁·科恩为首的外部广告公司签了约，科恩富有创造力，创作出了一些商业世界所看到的最具有煽动性和得奖的作品。第一个科恩广告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画面上是一头强壮的猪的照片，标题是“资本主义猪”。画面简单，但非常聪明、有效和时髦。另一个广告是招徕我们的木材期货合约，甚至和善地袭击了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用了一幅宽四英寸厚两英寸的木材的照片，标题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展示交易的木板”。^②

Merc 是严肃的事业，和我的前任老板美林公司类似，当然对美国看多。但那并

① 美国喜剧演员。

② 交易的木板 the board of trade，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英文名称是 Chicago Board of Trade，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呆板、乏味、僵硬和缺乏想法。不，我们不是华尔街。我们也不是股票。我们是某种产生自国家核心的东西：开路先锋，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吸收独创和勇气的营养，致力于保持边疆精神。在我关心的范围内，期货业还是一片待探索和开发的广大商业边疆。也许所有关于先锋的谈论都有些陈词滥调味道，但这是芝加哥，一个坚强的、宽广的有着钢铁神经的城市。对于期货来说，芝加哥是世界第一城市。1848年CBOT是在这里产生了期货交易。

尽管1969年Merc是美国第二大期货交易所，但远远落后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其谷物市场不光对于美国，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产品线。谷物商人买卖巨大数量的谷物出口，经常在CBOT对其头寸进行保值。不同的谷物之间由于受到通胀因素、天气状况、市场供求等因素的影响定价可以有所差别。比如说，小麦处于牛市的时候，玉米可能处于熊市。CBOT组织完善，轻易就拥有了世界一半左右的期货交易量，从来不必要忍受会员席位价格需要补贴的尴尬。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Merc的交易量徘徊在55万张左右水平，而CBOT的交易量已经达到250万张。我的梦想和目标就是和我们街对面的对手能够平起平坐。

当然，Merc不完全是一个新入门的交易所，其血统可以上溯到1874年的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成立，以吸引来自美国东南部的鸡蛋和黄油的买家。交易所经过了不同的阶段，包括1898年分立了芝加哥黄油与鸡蛋交易所，然后于1919年重组后改名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Merc的部分气质是其生存能力，这一技巧我可以迅速识别出来。Merc已经证实了其弹性。它经历了在黄油鸡蛋的生产和营销模式改变后市场的崩溃。交易所甚至在1958年由于失去了其洋葱合约导致的消失边缘顽强地活了下来。现在，10年后，Merc以猪腩市场而闻名。猪腩合约使交易所活着。但没有人知道只靠一个交易品种交易所能生存多长。我给出的分数不高。

我知道我们要生存必须使产品多样化。在第一次目击了单一品种交易所的危险之后，我拼命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这个使命成了一个优先任务。1969年，我们重新启动了处于冬眠状态的肉猪市场，该合约是1966年上市的；在理事格伦·安德生的帮助下，我们改变了活牛合约的条款，增加了新的交割地点，给一个沉闷的合约吹入了生气。这些改变成了活牛合约在接下来十年成为主要的Merc合约的关键因素；我们又通过开设木材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此外我们最终终止了成蛋合约；代之以鲜蛋合约；1970年，又出现了无骨牛肉、高粱和肥牛合约；我们也修改了爱达荷土豆合约条款，试图再次启动。有一次，我要求土豆合约委员会负责人巴里·林德在一个周末（他说感觉就像过了一个月）到爱达荷州的波卡特罗^①去参加土豆大

① 波卡特罗，美国爱达荷州东南一城市，位于爱达荷福尔斯西南偏南。从1882年起它就一直是一个铁路枢纽，同时也是爱达荷州立大学（建于1901年）的所在地。

会。根据林德的说法，他是开会者看到的第一个犹太人，他差点没能活着回来。但我对这些新合约并不特别乐观，继续搜寻一些有生命力的合约，也许甚至是在一个新的维度上的产品。

1969年还有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创新，和其他交易所相比大大推动了 Merc 的财务形象改善。CME 成了第一家设立公共信托基金的交易所，其目的是在结算会员之一发生倒闭的时候保护客户资金。这在美国的交易所中是独一无二的。完成这次壮举我们得益于艾拉·马库斯的天才，他是我任命的 Merc 税务顾问。

和许多好的主意一样，这是需要的结果。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前，Merc 年复一年地亏损，因此美国国税局从我们这里没有收到一分钱税收收入，他们也没有预期会收到税收。但到 1969 年年底，美国国税局突然发现在前五年左右时间内我们实际是盈利的，因此需要补缴税款大约 500 万美元左右。这是我们财务部门所有的全部资金，我不打算将这些钱交给政府。因此我找了马库斯，我当时有一个疯狂的想法。我问，我们能否通过将我们的钱放在一个为公众谋利益的信托中而不用缴纳任何税收？换句话说，用做结算会员倒闭时的财务保护。开始马库斯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一样，然后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魔鬼似的微笑。如果他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就是多么大的一次政变啊。他就这么做了。我们保护了我们的 500 万美元，对这我有其他的计划。据我所知，Merc 仍然是用这样一个免税信托的唯一的美国交易所。每一年随着来自 CME 收入的贡献持续流入，其规模在日夜涨大。

在我回想我上任的第一年时，很难相信完成了那么多的任务。要说这是忙碌的一年，这是明显保守了。变革才是其背后的主题，这包括改革交易所规则，挑战逼仓和挤仓，新形象的诞生，部门组织，会员委员会的重组，场内会员参与公司管理，完成了新的和扩建交易大厅，公共关系的大幅改善，建立免税信托，开始了产品多样化进程。而且还有更多内容。

我的内心没有怀疑，我处于我应当属于的位置。我吸引了交易所的注意，会员们支持我。但仅因为我是他们的 1 号计划选择并不能保证我成为最有价值的人。就像下一副象棋。在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面前有那么多步需要考虑，要考虑各种策略。一个好的棋手不是预判对手的下一步，而是下几步。关键的词语是预期，不管你是揣摩市场玩家还是交易所的策略。1970 年的时候我嗅到了金融界的一丝风暴。那是预期的味道。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3 章

第一块里程碑

变革的最大机会之一来自 1969 年 11 月 6 日，《全民公决规则 206》第一次使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一个理事会发起的全民公决，要求会员授权理事会开始寻找和协商以决定 Merc 重新寻找场地。我实践了我的承诺，让会员决定。但我并不是对这次投票不再费力地进行政治活动。我过去在和会员的经常对话中进行每日一次的民意测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现在的场地太小了，而且不能再扩大，因此我认为会员们会支持找一个新场地的举动。

这不是 Merc 第一次考虑重新寻找场地或建一个新的大楼。这个主意已经酝酿了好几年，但总是挑起争议。过去的理事会也时不时地加以讨论，但从来没有做出决定。有时候装装样子地进行分析，但从来没有导致过行动。我猜测害怕变动总是一个流行的理由，现有状态是那么地安全。回过头来看，Merc 持续碰到的灾难是不承担不必要风险的充分理由。这一次，我对全体一致支持我的内部圈子人说，情况不一样了：“我们要坚决地硬着头皮顶下去。”

但在我将这件事提请表决前，我知道我必须面对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大楼的地主，

这座楼从1928年起就矗立在富兰克林和华盛顿大街的拐角。我不愿意这么做。他不是一般的地主，他是亨利·克朗上校，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实业家，积累了美国最大财富之一的人。

克朗邀请我共进午餐，希望能把我吓退。我们在 Merc 大楼顶层他的私人会议室内吃饭。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以及一个专门伺候我们吃饭的管家。克朗的年龄是我的两倍还多，他是一个犹太裔立陶宛移民的儿子，经历过战争、大萧条、经济衰退，有亿万家财可以展示。我对财富的要求就是一辆新的护卫舰型号汽车和在芝加哥城外的中产阶级居住的斯考基郊区有一所错层屋子。毫无疑问，他知道该如何生存。他谦恭地从一家称为材料服务公司的小砂石厂公司起家，这家公司成立于1919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也成立了。在大萧条的恐慌中，Merc 的理事会将其大楼回售给了为交易所提供融资的保险公司。没有其他人能像亨利·克朗上校那样，以极低的价格从保险公司那里把大楼买了下来。几年以后，Merc 付给上校的年租金就等于上校买下大楼的钱。

“梅拉梅德，”他开口说，“你将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你准备做的事情将拖垮交易所。”他停了一下以加强印象，“大萧条还会再来的。”这是一个拥有帝国州大厦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人在布施他的智慧。我不会轻易听从他的“提示”。但我知道我所了解的真相。我没有带着一堆轻率的图表和统计表格，而只是常识以及知道 Merc1969年的交易量比1968年增长了109%的事实。我的每一个直觉都预示着这个增长只是开始。我知道我们是上校的主要租户，而我们的场地会不够用。我知道如果没有新的场地，Merc 将注定永远会成为一家二流交易所。我知道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个第一步的扩张步伐，我永远无法实现我的交易所梦想。我知道会员会全力支持我。我也知道风险承担者需要承担风险。我感谢克朗提供的午餐和建议。我告诉他，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前进。

回到办公室后我受到了更大的压力。80岁的L. D. 施莱伯打电话给我说这一举动是错的，我们会超出原来预算，并使 Merc 永远处于财务亏损境地。路德维希 D. 施莱伯身高1.93米，是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人。每个人都用他的简称L·D或巴尼称呼他。1932年他担任过芝加哥市的书记员，从1933~1935年当过CME的理事长。他公司的合伙人是我的技术行家——埃尔默·法尔克，他只有L·D的大约一半高。他们的绰号是穆特和杰夫。但L·D很快从普通交易员成为一个模范交易员，他是世界第一个学会对鸡蛋进行套期保值的人。我有礼貌地听着。我然后向施莱伯先生保证我不会超过预算。我会将费用控制在全体会员批准的数量以内。

当然，多数老兵是反对重新寻找场地的。就像索尔·里奇告诉我的，“利奥，如果你这么做我们会破产。就像你扩大一家成功餐厅因为它太小了一样；这从来没有成功过。”老兵们对北富兰克林街110号的场地有些迷信。这里是他们成长和赚钱的地方。任何变动都被认为是危险的。但我知道他们是少数，我知道不扩充场地我的

长期梦想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知道不同的观点是代际的，索尔的儿子，米尔特·里奇就支持重新寻找场地。

有许多个夜晚我翻来覆去地睡不好，在想克郎的说法。如果他是正确的怎么办？如果又来一次大萧条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又得像 Merc 以前做的那样出售新大楼呢？我会不会声名狼藉地下台？但我提议的新大楼并不需要负债。这将全部从我们的现金储备约 600 万美元中支付。这笔钱是我们从山姆大叔的手上省下来的。那是我的预算，我一分钱也不会多用。造价不能超过这个数字，因为我不相信举债支出或者融资。

1970 年我们公开了寻找一个新的大楼地点的计划，雇用了室内设计公司帕金斯和韦尔公司进行特别物理需求研究。这家公司也重新设计了我们目前的交易大厅。Merc 的不动产委员会由丹·杰西牵头，考虑了 200 多个地点后将范围缩小至最后一个。我让丹·杰西牵头是因为我可以信任他。我必须肯定我们做的交易是符合 Merc 最大利益的，而不是符合某个其他人的利益。丹·杰西从来不可能被买通。但我仍然从不离开委员会，参加其每一次决策。参与所有事务是我担任理事长的基本风格。我由此得到了“独裁者”的声誉，但这是完全不准确的。按定义，独裁者不需要对民意做出反应。而我总是考虑民意。我和提希曼组织的艾伦·戈德波罗会面，该组织在称为盖特威中心的综合性建筑中建造办公楼。我们同意 Merc 需要两个东西：交易大厅以及一座 Merc 会员可以有办公场所的大楼。他说 600 万美元几乎不可能同时完成这两个东西。他建议在西杰克逊大街 444 号建一个“盒子”建筑，可以放下我们的交易大厅，而我们的会员公司可以利用相连的南里弗赛德广场 222 号的 35 层的塔楼来作为办公场所。Merc 仅拥有“盒子”，但这给了我们通货膨胀保护的手段。杰西和我喜欢这个想法。尽管我认识到这可能不是 Merc 的最终解决方案或给予我们梦想的世界级形象，这是当时我们可以做得最好事情。“但你不能超出 600 万美元，”我警告说，“我知道了，”他回答说。

和 Merc 的全体会员交涉需要和面对交易池里的个别对手不同的方法，交易池里每样东西是一种肾上腺素的冲动和自然的爆发。而在交易池以外，我必须深思熟虑，加以计划，在全民公决事件中甚至必须导演配乐。这也成为我管理风格的一个特点：尽可能少地留下碰运气的机会。

帕金斯和韦尔公司准备了一个幻灯片演讲。我和总建筑师斯基普·罗林斯紧密合作，可以回答问及我的很广范围的问题。新的建筑将是世界上最现代的交易大厅。在演讲当天有 200 多家会员到场。我安排了我圈子里忠心的场内交易员坐在人群中的指定位置，在需要鼓掌的时候有特别的指令。我叫坚定支持我的人之一的迈克·斯特奇负责。迈克绝对是原石中的钻石。他是芝加哥北区成长起来的硬汉，上了五所不同的高中才毕业——他的家庭从来没有搬离原来的社区。但从 12 岁起，他就通过他的叔叔——一个 CBOT 会员，开始接触了商品市场。交易大厅成了他的梦想和生活

公司的斯基德莫，他设计了 Merc 现在的大楼，提出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通过向西扩建 90 英尺来扩大交易大厅面积 40%。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需要芝加哥市给一个大的优惠。我们需要从市政府购买空间权，目的是可以让现有的建筑向交易所西面的卡耐尔街人行道上空悬臂延伸。芝加哥建筑局当即拒绝了我们的计划。在公共人行道上空建筑在芝加哥历史上只批准过一次，当时是为了建一所医院。我们的想法就要泡汤了，除非市长大人理查德 J. 戴利愿意行使对他自己的建筑局的否决权。

我开始准备和预演，在 1976 年夏天我到市政厅五楼的市长办公室，带上了斯基德莫提供的建筑透视图和计划。尽管市长知道我，但我还是感到孤独紧张。毕竟，我只有 40 岁出头，芝加哥以外很少人知道，而市长是个世界级人物，是美国的强人。他刚刚第六次当选。此外，我去那里可以说是去要求一个私人帮忙。

市长安静地听完我的请求，没有插话，当我结束发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这可以为芝加哥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没有预料会问到，但我想我知道正确的答案，“市长先生，”我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对金融期货的看法正确，IMM 将会使美国的金融中心从纽约向西移几英里。”

市长发出了由衷的笑声，“我喜欢这样，”他说着和我握手，“去扩建你的大楼吧。”

我们扩建了我们的楼，我向戴利市长的承诺也实现了。芝加哥成为了风险管理的首都，不仅是对美国而言，而且是对世界。没有市长的批准，这可能就不会实现了。

大楼的扩建，尽管给我们的只是临时的缓解，但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推出下一波的金融合约——利率和股票指数期货，这些市场确保了 IMM 的显著成功。十分关键的一点是扩建给了我们临近的一个交易大厅，这主要归功于比利·穆诺的坚持——代价是 100 万美元，在新的部分加出来以前，这个建筑从大楼外墙上移走了大梁。一个没有中断的大厅对于交易是非常有传导性的。理查德 J. 戴利市长在我们市政厅会面后不到六个月就逝世了。

但对于盖尔德曼和他的团队，当时有温德斯特拉普，也包括汤姆·皮克来说，1975 年的扩建与下一次和 Merc 历史上最关键的考验来说只是小儿科的游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他们积累的专长在我在 Merc 的最终梦想——拥有一座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一样巨大、享有盛誉的大楼——变为现实过程中成了不可或缺的财富。但那还要等几年以后。

一直到当时，我实际上是在猪腩交易池里领导交易所，我是猪腩交易池里主要交易员之一。但这不是很容易，因为猪腩，生猪和活牛交易池吸引了很多新的天才；他们是些年轻、聪明的孩子，进入了交易环中的最高一级。有一些人，包括马克·

米尔斯坦、吉米·考兰提斯、卡尔·利文、约翰·麦克吉尔、马歇尔·斯坦以及马克·帕尔默，从跑单员或一般职员兢兢业业地做起。一些交易员——龙尼·克莱因、乔治·西格尔、杰拉尔德·帕姆、艾伦·米切尔和卢·施瓦兹是通过亲戚或朋友介绍到 Merc 的；其他人如沃尔特·马克西姆、米尔特·列文、菲尔·卡拉佛他、朗尼·希勒、乔纳森·穆拉斯和艾伦·米勒是出自会员家族，其历史可以上溯到 CME 成立的时候。实际上，希勒是三代 Merc 会员。

肯·麦克凯和 E. B. 哈里斯一般都站在交易池外，看着我的眼睛，等我休息。然后我们就会在交易大厅里趁交易暂停时碰头。就这样每个交易日要持续四个小时，不断有人来到猪腩交易池谈话，职员会给我电话信息。我从没有因为我在交易而不管交易所事务。此外，我由衷地相信，交易员的心理，特别是将自己的钱放在里面的交易员的心理，提供了创新思维的肥沃土壤。这也是我鼓励许多我的交易伙伴竞选理事的理由。这些人是懂得市场的人。因为作为一个交易员，我每天和其他交易员交往，想法能很快浮出水面。今天，有任务小组、经济论坛、经济部门、学者、研究小组和电子分析来研究市场，就像实验室样本那样来发现其秘密。但最好的想法是来自交易大厅，来自交易池。会员自己是最好的专家。

由于这个原因，我总是要接触会员，倾听他们的想法，得到他们的主意，听取他们的投诉和建议。但在交易大厅工作是个双向街道；我安抚会员，会员也安抚我。我会灌输想法，游说我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我会得到反馈，知道他们会支持什么，不会支持什么，以及这样做的原因。我在交易卡上记录下谁说了什么，这些卡片积累在我的口袋中。没有什么太小的事可以逃过我的注意。我清楚地了解傲慢是一种职业上的危险。这是管理上一种似非而是的观点：委托人偏向于他们选出的官员，其既显得比他们高明，但又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不管我是针对一个 10 人还是 150 人的群体，我总是在谈话、讨论、回答问题、解释、教育、游说和倾听。经常是一对一的过程。这可以在感情上耗尽、时间上耗尽。也许这种方式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缺乏管理魔术的所有要素，但最终这总是有效果的。一旦我赢得了会员的信心，我可以更深地推进。我总是在不得到他们同意前暂停推销我的想法。意见一致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是一个教育和逻辑的坚定信仰者。会员们是聪明的，如果我的想法是好的，他们会支持这些想法。如果我不能获得他们的信心，我的主意可能有缺陷。我从来不希望人们停止批判性地思考。我需要一个批判性的和知性上诚实的环境中测试我的想法。当我的想法成功后，我知道不要将功劳全归到自己。我总是记得慷慨地赞扬所有参与者和有贡献的人。

现在我的生活是疯狂的。除了每天参加越来越多的委员会会议，我开始在越来越多的特别场合上演讲，包括木材或活牛研讨会到家禽和鸡蛋馆的献词——这是交易所 50 周年时给林肯公园动物园的礼物。赠送礼物的想法——在动物园建一个“农场”，让城市里的孩子们知道母鸡是怎样下蛋的——来自迈克尔·温伯格。这个主意

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开幕仪式上，农业部部长克利福德·哈丁是荣誉嘉宾，我代表 Merc 向芝加哥的市长 J. 戴利捐助了 50 000 美元的支票以支付永久展览的费用。

当有关交易所时，我试图将我个人的感情放在一边。以吸烟为例。与我同一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在高中开始吸烟，大约每周一包。现在我管理交易所，需要很多咖啡，一天吸烟近四包。上午 10:00 左右我就抽完一包。尽管我喜欢吸烟，但我不反对禁止吸烟，首先在交易池中，后来在整个交易所大厅里都不准吸烟。这是理事会又一次行使《全民公决规则 206》。“你让我失望，” 比尔·卡茨说，他和我一样，是杆老烟枪。卡茨和我那时已经成为好朋友，早就将宿怨和解。实际上，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比尔·卡茨就像一开始就是梅拉梅德派那样支持我的举动。作为回报，我也成了卡茨追随者。

尽管我很多次尝试戒烟，我知道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我相信戒烟会影响我玩桥牌的能力。这期间桥牌成了我的爱好。桥牌锦标赛，又称复局，是一种很好的治疗方法。玩桥牌需要完全集中注意力。桥牌迫使我在玩的时候将交易所和交易池放到脑后。但没有香烟就玩不转，或者我是这么想的。我玩牌是有意决定放弃象棋而开始的。我在象棋上已经达到一个水平，经常可以击败我的父亲，结果我发现我尝试去输棋。我不想击败他。因此我决定转去打桥牌，买了有关方面的每一本书。我开始和丹·杰西作为搭档。我们一起学习了游戏的基本规则，但我很快发现要在桥牌中进步必须和一个比你强的做搭档。和其他事情一样，我的竞争欲望推动我去获胜。

通过桥牌我和卡罗尔（米基）、伯特·诺顿认识。他们都是桥牌专家，成了我的朋友，后来在国际货币市场 1972 年成立的时候成了会员。桥牌是文明的亚文化，有严格的规则、规范和道德观。桥牌有一种站不住脚的等级制度，这是其最坏的特征。比较好的玩桥牌者，特别是“终身大师”，甚至从来不和“赶超崇拜者”讲话，更不用说教他们怎样打桥牌了。作为芝加哥 Merc 的理事长我有一些名望，因此我是作为桥牌势利规则的例外。按照桥牌界的说法，米基·诺顿接纳了我，我们做了一笔交易：我教她如何交易，她教我如何打桥牌。除了米基成了交易池里出现的第一个女交易员以外，对于我们都是一笔好的交易。我成了终身大师，这是桥牌中的最高等级，有些类似历史记录（米基和我一起得到很多冠军），她在交易中也赚了足够的钱，最终成了芝加哥公牛篮球队和芝加哥白袜棒球队的部分所有者。伯特·诺顿最终成为我的 B 类套利公司的同事，这个公司是我在 IMM 设立的提高货币交易的公司。他也赚了足够的钱，以致能够继续作为一个全职的桥牌选手。偶尔，我也会和我的太太贝蒂一起打，她是为了自卫才学打牌的。值得赞扬的是，她变得相当熟练。很久以后，布赖恩·莫尼森才成了我的固定搭档。我们一起达到了职业顶峰，赢得一次全国冠军。1975 年，我们组建了一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商业队参加了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冠军锦标赛。除了布赖恩·莫尼森、伯特·诺顿和我以外，队员还包括兰迪·麦克凯、詹姆士·科德斯和大卫·乔斯。在决赛中，我们轻易击败了一支 IBM

的队伍。

但最终我还是放弃了桥牌，因为 Merc 需要我的全部时间，而要保持顶级水平需要每周打四五次。对于吸烟，我直到 1984 年才抽出时间戒掉烟瘾，我用跑鞋替换了云斯顿香烟。当我最终戒了这个可怕的习惯时，我突然完全不吸——这是我所做过的最难的事情之一。

实际上，我应当将戒烟的功劳归于我的女儿艾戴尔。当她足够大可以发表意见时，她此时是两岁，她总是提到我吸烟这件事。我的三个孩子对我的生活都有巨大影响。艾戴尔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在我从法律学校毕业后不久。当时我们住在芝加哥北区的一个一室户公寓里，我们的所有朋友都在生孩子。贝蒂和我跟着潮流，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们要抚养一个家庭是太年轻了。我们结婚的时候贝蒂 18 岁，我比她大两岁。我猜我们是随着孩子一起成长的。我的女儿艾戴尔自然成了我的公主，这在父亲中是很普遍的事。幸运的是，我对她的宠爱没有干扰她内在的分析能力，也没有转移她天生的判断力。她后来继她父亲的脚步就读于约翰·马歇尔法学院，成长为一个出色的律师（专长当然是期货市场）。她还可以继续追求她的律师生涯，但现在这已经排到后坐，她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但在郊区学校系统中她的智力和分析能力有了很好的发挥余地，在那儿她非常活跃，并成了父母—教师协会的总裁。多年来，我学会从她那里寻求我生活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我利用她的天才，就像我的知己女友。

自然的，艾戴尔在 Merc 遇到了她的丈夫霍华德·德布瑙。德布瑙家族是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西蒙·德布诺夫的后裔。霍华德遇到我女儿的时候，她在戴尔舍公司找了份暑期工作，担任跑单员，而他当时是一个位置较低的黑板记录员。他们俩一见钟情。我们的四个孙辈——乔舒亚、亚伦、贾瑞德和玛拉证明 Merc 可以是个好媒人。和 Merc 交易大厅的其他那么多人一样，霍华德·德布瑙从普通职员上升到经纪人，并被指数和期权市场分部选入 Merc 理事会，他担任了几年的理事，而且很有声望。根据艾戴尔的说法，当他离开理事会的时候，是因为去从事他的足球、篮球和小联盟棒球队教练的业余爱好——毕竟，他和艾戴尔贡献了那么多有潜力的选手。同时，霍华德从事的全职职业是 Merc 要求苛刻的股票指数交易池的专家级经纪人。

我们的第一个儿子乔丹在艾戴尔出生后两年不到的时候出生。他从一开始就很聪明有天赋，并且具有高度竞争性——就像他父亲一样。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后，他很快成为一个成功的交易员，赚了很多钱。但对乔丹来说，就像他父亲一样，仅做交易是不够的。他想在不受他父亲影响的领域证明自己。他的兴趣很广，他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一个电影导演。但在从事其电影生涯以前，他说动了时装设计师玛丽谢和弗朗索瓦·吉尔伯给他该地区的独家代理权，在芝加哥开设了第一家时装店。后来，他开始在好莱坞声名卓著的美国电影学院（AFI）学习的时候，他和一个合伙人在贝弗利山庄开设了第二家吉尔伯时装店。他自编自导的 30 分钟的 AFI 论文电影，讲的

是黄金交易池里的交易。

大卫在乔丹出生四年后出生。他也是个聪明的孩子，并且观察力特别敏锐。他从美国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成长为一个特别富有洞察力的成年人。例如，他有很好的政治观察力，可以轻易变成一个出色的政治分析家。大卫事实上通过两个大学暑假在两党参议院担任实习职员而得到了一些很好的政治训练。他也继承了他父亲遣词的能力，可能将其天才用到公共广播的职业中去。但大卫的生活理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期货交易员。这不是一个容易的目标。但不出人们意料，他多年来浸泡在很多图表和经济学知识中，可以和专家讨论最复杂的市场情况。

有三个孩子，一个太太，在郊区的一所房子，以及需要我全部时间来管理的交易所，我的生活至少说富有挑战性。我被拉扯着试图完成所有的任务。尽管我在一天的交易和长时间的会议、演说、新闻发布会以及经常和几百个会员交流后回到家已经精疲力竭了，我还是迫使自己给我的家庭所有的关爱，不管一天已经剩余没多少时间了。经常我回到家刚好有时间给孩子吻晚安。但是，我要确保周末完全是他们的。我试图整天和他们在一起，不管我有其他什么计划，即使是一起去杂货店也好。但更经常的是，每个周末有个特别节目，或者是看电影，或者是去动物园，或是其他什么不寻常的。

当他们足够大的时候，艾戴尔和乔丹会和我一起坐在餐厅的桌子旁，当我在商品价格图上记录过去价格变化时，他们报出最高价和最低价。我们在一起的周末一直维持到外界活动和他们的朋友开始垄断他们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一旦学校放假，我们总是要进行一次特别的远足。有时候我们在附近的印第安纳州或密歇根租一个夏季村舍。我会周末过去，有时候一周之中也会过去。有一次，我们一家到以色列、希腊和英国去旅行。这是一次独特和记忆最深的旅游。又一次，当乔丹和戴维大一些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了巴黎，看了戛纳的海滩。当乔丹过18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两个去了摩纳哥观看国际汽车大奖赛。

其他的时间我们会计划开车游遍美国。我们的计划是每个人都到达国家的每一部分。一年是往西，又一年是往南等。我们通过玩各种我们发明的汽车游戏或唱歌来打发开车的时间。旅行包括所有的普通和预期到的路上家庭冒险，包括我安排的一次访问白宫的难以忘怀的时间。当时可怜的戴维患了腹泻，突然要呕吐。他吐在国家饭厅里。我永远不会忘记艾戴尔悄悄走开，假装不认识我们。贝蒂总是要责怪戴维，说他迫使帕特·尼克松带着拖把和桶下来清理脏东西。总而言之，那都是有趣的夏季旅行。但乔丹喜欢说他知道美国每一个电话亭的位置。这是真的。每当我看到一个电话，我经常会把车开到路边打个电话给市场。这是我可以接触市场和监视我头寸的唯一方法。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汽车停在高速公路旁边，我在电话亭里，地上铺着图表。

这样，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到哪里，我的生活都和市场和交易所连在一

起，市场和交易所总是拖着，将我拖离我的家庭生活。贝蒂比任何其他人更懂得我的驾驶技术，给予我所需要的松弛。但我对孩子们总是心有愧疚，他们被迫和我分享期货世界。我实际是干了三份全职工作：一份是作为丈夫和父亲，另一份是交易员，第三份是 Merc 的理事长。我的白天和黑夜混在一起。我每天（现在仍是如此）睡三到四个小时。因为我可以将我的责任和行动分离开来，我在交易结束后离开交易池时通常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头脑。然后我以交易员同样的工作强度投入到交易所事务中。再后来，我会匆匆赶回家。

我从来没有将理事长看做是牺牲，或者让其压力压垮我。我也拒绝为这个位置接受任何酬劳。我准备了一周工作七天。我甚至将我的结算公司戴尔舍投资公司的发展放在优先级较低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如此之低以致在近 25 年后才来发展这个公司。当然这些都是交换。但只要我能让交易所发展前进，我会因深层的内在目标成功而感到满意。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个人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利益：我创造的每个成功的市场是我的又一个交易机会，交易所交易量越大我的席位会越值钱。如果 Merc 兴旺了，我也会兴旺。但最能推动我的是建设一些新事物的智力挑战——一种心理的满足感，正是因为这我放弃了律师这一行业。

是的，我有雄心。是的，我是理想主义者。是的，我是资本主义者。是的，我喜欢理事长的感觉，权力和塑造新的伟大事物的想法。我希望我的角色和一个重要的使命一致，那即是使世界有所不同。就像索尔默·门德尔松所说，我应该如此。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4 章

不合常规的主意

到 1970 年，我开始将期货交易所看做一个合约竞争生存的生态系统。期货合约不能竞争或找到一个缝隙市场的话就会像物种一样消失。但从本质上说，多样性会来接替，一个灭绝的物种通常会被另一物种所代替，或者更有效率或者更适应环境。而且任何科学家会告诉你，多样性是生物演化的逻辑结果。因此，如果这些市场真的经历一些生态过程，我问自己，多样性的下一阶段会是什么？我并不能完全确定这意味着是哪一类的期货合约。这需要一个凭本身头衔就很严肃的合约，而不是又一个农业的继子女。

外汇市场的想法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也没有一个单一的事件让我一个早上醒来时大喊：尤里卡^①，我有了一个新市场的绝妙主意。相反，这个想法已经在那儿了，尽管还隐藏在过去经验的地层以下，隐藏在当代事件的洪流中，隐藏在朋友和同事的低声讨论中，隐藏在我心中的要寻找一样东西能够将 Merc 弹射到一个更高境

① 希腊语，“我找到了！”，“我搞清楚了！”，源自希腊数学家和发明家阿基米德发现测量不规则固体体积的方法，并以此发现测定金子纯度的方法时的惊呼。

地的不断的内在压力中。

作为一个从一个边界到另一个边界的孩子，我对外汇变动的面值和价值的神秘领域有了第一次窥视。在短短的一年半中，那时我还未满九岁，就已经见识了波兰兹罗提、立陶宛里特、俄罗斯卢布、日元和美元。搜集硬币对于我来说相比其他同年齡孩子要容易得多。然后，仍然作为孩子，在遥远的日本，我学到了迷人的外汇黑市的第一课。

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我关注货币市场是源于当时的事件。1967年，英格兰银行将英镑从2.80美元贬值到2.40美元而搅乱了世界，这个举动从将其货币单位与实际吻合角度来说说是必须的。这是许多步最终导致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版图缩小的第一步。突然之间，外汇和货币价值成了反复出现的新闻。在商业版上有越来越多的新闻故事讲述贬值和重新估值。有文章讲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足之处。关于浮动利率还是固定利率也有热烈的讨论。有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①主张浮动汇率的好处以及现有体制的不足。还有我个人的货币交易专家理查德·伯克，他是我的好朋友。伯克思维清晰，直切主题，他是一个精明的交易员和理解市场的基本面人士。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会戏谑世界大事，国际货币市场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伯克是我们一群人中第一个试图涉足货币的人。他发现这几乎不可能交易货币。

布雷顿森林协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寂静山林中的一个度假小镇上出炉的，当时仍然有效，将世界主要货币和美元挂起钩来。该协议由杜鲁门总统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代表签署的，在世界货币和美元之间建立了一个狭窄的波动区间。接着美元以1盎司35美元的价格和黄金挂钩，美国保证以该固定价格向那些需要持有黄金而不是美元的政府出售黄金。因此官方货币汇率被人为固定下来，公开市场的买卖被罩了起来。这种固定当然可以一直维持到压力太大维持不了时为止。

当然也存在一个现金银行间货币市场，但这是一个排他型俱乐部，在国际巨额融资的阴影下运作。在挂牌的官方汇率背后，银行之间或为其大商业客户的货币交易有一些轻微的波动，公众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我读到一篇报纸文章说了一件有关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轶事，当他试图交易英镑时被银行拒绝。这篇好管闲事的报道清楚地说明当时的银行将货币市场局限在商业用途中。他们不会和个人做交易，一个无力的解释是“个人没有商业理由”。他们说这会鼓励投机。所以，不管个人净资产有多高或生活中位置有多高，他们都被排除在远期市场交易之外。如果你是通用汽车公司，你被允许交易货币。但如果你是

① 生于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因其经济学专论中货币管制和无政府干预理论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奖。

米尔顿·弗里德曼，你被禁止进入市场。我的伙伴伯克，也想做空英镑，他和弗里德曼一样预期英镑要贬值，但也没有银行和他交易。不过，伯克坚持不懈，最后利用他父亲的商业联系找到了一个方法。我经常和他及其他人讨论形势的不爽，从感情上纠缠于这个话题。机会是明显的。

例如，很清楚英镑已经和实际脱钩了。或者英国政府试图维持这个关系而破产，或者放手让英镑贬值。为了利用这个形势需要有一种方法可以做空英镑——专业人士都称英镑为“电报”。我也尝试了，但银行拒绝收我的钱。这让我很困惑。为什么个人不能有和公司一样的交易货币的权利呢？经济机会不是给予每个人的吗？个人没有权利来保护或增殖其个人财产吗？

这些事件和这个推理让我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不为每个人创造一个货币市场？但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对这些事情并不很精通。于是我将问题给了我的货币专家迪克·伯克：“我应该为 Merc 考虑这样一个市场吗？”“绝对应该！”伯克回答说，就像这是世界上答案最显然的问题。“这是自然的，”他说，激动地解释着这个题目，“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市场。”突然，它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为什么不开一个货币期货市场能够向所有大的和小的投资者同样开放呢？当然这会偏离我们的肉类产品体系。我们两个一遍又一遍地讨论。我也和哈里斯讨论过，他也有这个倾向，但认为这是几乎不可能的概念。但伯克对于这个想法思考了很多次，最后他自己写了一封信给 E. B. 哈里斯进行游说。哈里斯没有回答。但我没有泄气。我可能不能让它跑了。我是交易所的理事长，急切地想进行多样化，尝试了所有那些古怪和疯狂的潜力可疑的合约。为什么不转向金融呢？

我还没有盲目到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通过向期货界引入一个金融工具，我会成为开路先锋。在期货市场的几百年历史上——从 1650 年日本大米商人开始在大阪交易“米票”开始，这些市场完全是在农产品领域。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以前没有任何人考虑过金融？为什么不给商业和财务经理们以及他们农产品行业同行所能够利用的风险转移手段呢？有没有一些基本面理由使得金融产品不适合期货机制呢？我想不出有这样的理由。相反，所有我的直觉告诉我金融界可以比农业界更好地利用期货市场。

1970 年 3 月，我被这个想法迷住了，决定实施这个想法。现在哈里斯步伐一致了。更重要的是，马克·保厄斯热情接受了这个概念。这在精神上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圈子中唯一的真正的经济学家。显然，保厄斯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的合适的人。作为在威斯康星州一个乳牛场成长起来的 11 个孩子中的一个，保厄斯当时 31 岁，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写的博士论文有关猪腩期货。我想要建一个经济研究部，需要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创造新的产品，编写合约条款。这个人就是保厄斯，一个深思熟虑和富有表达力的人，有一颗富于创造的心。他的简历是哈里斯给我的，我于 1969 年 1 月雇用了他。据我所知，他是期货交易所

中第一个经济学家职员，而且是少数几个理解期货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之一。结果我发现他非常有才华，在我们最终接受的革命性道路上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保厄斯在交易所工作的第一年，就考虑了 30 多种候选期货合约。我们因不同的理由筛选了其中大部分合约。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了。CBOT 有谷物和所有的谷物副产品，我们被锁在那个市场大门之外。我们是早就有肉类系列产品，而且表现良好，但你可以从那儿到哪里去呢？你不可能发明另一种肉。此外，肉类是一个单一产品线，我对将交易所领到依赖一个单一产品线的道路上去害怕得要死。作为一个 Merc 小子，我首先目睹了这样一个政策注定将是要失败的。要成功，我们就必须多样化。

但我还是决定要慢慢走。首先，我完全了解外汇的概念是如此重要，偏离现状又是那么远，这代表了一个在最好环境下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每个革命性想法在其被注意到之前都需要的，毫无疑问是一个可信度高的认可证明。我需要权威人士告诉我，我不是太出人意料。我不必走很远的路，就在芝加哥，我们鼻子底下就有这个可信度问题的答案：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我的经济学神人。他是一个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陈旧的，需要被浮动汇率货币替代。在这种环境下，我知道货币期货市场有机会。弗里德曼会同意吗？如果他同意，并且公开说出来，我的想法就会有国际认同。

弗里德曼在自由市场经济学的作品对我来说像一块无法抗拒的磁石。我过去甚至偷偷溜到芝加哥大学他下午课中听他演讲（由于我不是一个支付学费的学生，我可能是他著名的规则“世上没有免费午餐”的某种例外）。我也拜读了弗里德曼的大多数著作，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学教科书。如果弗里德曼相信布雷顿森林体系将会改变，我毫无疑问这确实会发生。

我所学到的证明了我的想法，也就是当前系统主权参与者的不同的外部和内部兴趣——他们不同的经济增长速率；他们不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源于不同的政府形式；他们不同的劳动力考虑；他们不同的选举时间表和政治压力，所有加起来就可以摧毁一个依赖于对各自外汇价值的联合意见的机制。

米尔顿·弗里德曼从头就知道这一点。他是这么写的：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生效的时间起，就不可避免地要最终消亡……它试图完成不可调和的目标：国家追求独立内部货币政策的自由；固定汇率；和相对自由的货物与资本的国际流动……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凯恩斯试图通过提供汇率的灵活性来解决不调和的问题，他设想的汇率是可以频繁调整和相当同意地实现官方平价的变化。实际上，这种希望命中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维护宣布的汇率成了有关声望和政治争议的事情。因此各国尽可能长地维持平价，在此过程中让

小问题变成了大的危机，然后进行大的变动……

因此我推断，如果布雷顿森林体系将要崩溃，那么货币期货市场就能成功。CME 可以为这个市场提供设施、通信、公共参与和专有技术。交易所可以汇集买方和卖方。交易所可以吸收商业客户，也可以吸收投机者。考虑到规模，货币可以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市场啊！这当然符合我多样化的计划。这也满足我所相信的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需要。忘了猪腩，甚至忘了农产品，我告诉保厄斯，考虑一下钱——终极商品——所有各种类型的钱。我要求保厄斯和弗里德曼联系，可以说是经济学家联系经济学家，来决定他对货币期货想法的反应。就像我对保厄斯解释的那样，如果弗里德曼的回答有一点点肯定的话，那就是我所拼命要追求的卓越 Merc 的胜利之门。

我们没有等待多久，几周后收到弗里德曼给保厄斯的回信，情况令人鼓舞，尽管他承认他并不知道这样一个期货市场是否会成功。当然他不知道，也没人知道。但对于我来说这已经相当鼓舞了。确实，这是一盏明亮的绿灯。现在我必须说服 CME 理事会。

我判断他们接受这个想法需要时间，因此我在一次理事会会议上试了一下水。我记得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一些人毫无疑问是极力抑制其笑声。美林公司的卡尔·安德森问，“你是说外汇吗？”脸上有些困惑。对于我们小小世界一角来说这是如此宏伟的概念。我们的历史是黄油和鸡蛋、土豆和洋葱、猪腩和活牛。这个年轻的顽童理事长梦想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不是有些不正常？货币，想想看！其中的一些人把它看做是过眼云烟。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我。到当时我已经有相当好的职业记录，每个人都知道场内交易员会站在我一边。我解释考虑到世界固定汇率机制的显示，这个想法还为时过早。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但为了强调我是认真的，我警告理事会、哈里斯和保厄斯，不准向外界透露我们的考虑，否则要他的命。我知道这个想法是无法取得专利的。如果我们等待过长，其他人终究会得到相同的结论。

果然，1970 年 4 月，更名后的国际商业交易所（ICE），原来是纽约的农产品交易所，开始提供货币的期货合约。我的心一沉。这正好是美国国家航空宇航局发射阿波罗 13 号发生问题的时间。几个月后，哈里斯和我飞赴纽约去亲眼看一看这个地方。这家交易所地处下曼哈顿，我们来看看一家古旧得直喘气的农产品交易所试图转型成为光荣的货币交易所的情况。在一面墙上有货币期货的挂牌，但这个地方安静得像是图书馆的阅览室——它被遗弃了；没有交易量。让我松一口气的是，他们的合约很小，主要是为了小投机者而开；他们的方法很初级，合约大小为 15 000 ~ 20 000 美元，不是设计用做商业用途。ICE 不是我心里设想的产品的试验。它的想法更多的是远期货币交易所而不是我认为可能的金融期货市场。他们的合约类型有问题，他们的合约条款有问题，并且以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时间发起。

我知道产品要成功，合约条款必须能够吸引银行交易员和公司财务官的兴趣。ICE 的合约做的正好相反。这代表了一个致命的缺陷。看上去 ICE 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概念。成功的期货合约至少需要 20% ~ 25% 的商业参与。你不能是一个全部由投机者组成的市场。ICE 也不理解这个市场代表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以一种平静的方式推出这个新概念，就像又一个新的商品期货一样。货币期货市场想法的革命性如同期货市场本身的革命性一样重要。要么就做大手笔，要么就不值得做。我们必须吸引世界的注意。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得到美国政府官员的支持。这会立即给我们可信度。要成就诸如货币期货这般宏伟的概念，必须有一些戏剧性。

我开始别的什么都不想，而且夜不能寐。我疯狂地爱上了这个想法。我知道我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可以永远在市场上打上我的印记。在我心底，我对所有的想法反复测试，我知道这会成功。但我越是想这件事，我变得越紧张。如果我不赶快行动，这个想法可能被别人夺走。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以利沙·格雷在实际相同的时候互相独立发明了电话。ICE 已经叩过货币市场门的事实让我相信其他人也在附近——也许有更具雄心的计划。也许纽约股票交易所，或者更糟的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我变得有些偏执。

但正如哈里斯所指出的那样，时机还不成熟。固定汇率机制会毁掉任何成功机会。实际上，ICE 的货币合约很快平静地寿终正寝。只要布雷顿森林体系还生效，就不会有足够的生意或者货币价值的变动来保持一个期货合约能够存活。对于我来说，这是自明的：期货市场要成功，基础现货市场价格必须变动。保值者需要一个理由来进行保值，投机者需要有动力才来交易。在当前的固定汇率机制下，每日的货币波动是不大可能的。货币价值变动的唯一时刻是当财政部长聚集一切，让某种货币贬值或重新估值一个比较大的 5% 或 10% 的幅度让汇率回到现实水平的时候。在那些关口，一夜之间，会出现一个巨大的价格变动。但没有什么人能够事先做些什么。即使部长们也不能精确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这样的变动。在一天价格波动后，情况会又一次回到正常的以美元计价的固定汇率上去。

这样一个体系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商业世界要受财政部长决策的支配，然后感受头夜酒醉后第二天醒来后的剧烈头痛。对于即将到来的价格变动他们基本什么也做不了来保护自己。只要这种汇率调整次数不多，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能很好地运作，但诞生该体系的 1945 年的那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剧变。到 1970 年，世界大战的影响已经消失。美国不再是世界唯一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成功地达到了新的商业上的成熟。他们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使得每个人都能了解各种新闻。在多年以前，需要几天有时甚至是几周才能了解外国经济报道或政府行动，现在信息几乎是瞬间就有了。这需要立即对外汇关系进行调整。但现在没有这样的机制。就像弗里德曼后来指出的，在伦敦、苏黎世和纽约

的货币中心银行之间的外汇远期市场并不具备广度、深度和弹性或者是广泛延伸的通信网络等明显必要的手段来使得市场具有竞争力。

到1971年中的时候，国际货币市场开始在上世界上财政部长的脚下颤抖。美国作为世界的银行家，学到了痛苦的一课：美国花费、借出或赠予的货币越多，全球经济会变得更润滑。但随着更多的美国货币在世界各地漂浮，其他国家对它的信心越小，国际性金融危机的舞台已经摆好了。贬值和重新估值开始以危险的频率不断出现。最终，西德和日本再也不能承受压力，切断了它们对美元的挂钩关系，允许马克和日元自由浮动。由于其货币自由浮动，这些国家直接违背了国际货币基金的规定，这个机构是根据布雷顿森林协议设立的超国家监管机构。现在是货币无政府主义时代，每个国家包括美国都自己决定汇率。整个体系瓦解了。

突然，时间成为一个关键因素。1971年8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使得整个国际金融界感到震惊，他宣布美国不再遵守其保证用外国持有的美元来兑换黄金。这给世界带来了地震，其震动未来十年都能感受到。总统决定的理由是多重的，但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创纪录的贸易赤字，其数量超过了诺克斯堡[⊖]剩余的所有黄金。没有人在得知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三年前就看到问题会到来时感到惊奇。在一封1968年10月15日写给当选总统的私人备忘录中，弗里德曼教授敦促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并概括了需要立即采取的其他必要行动。当总统于1971年采纳弗里德曼的建议时，对美国的危害早就造成了。

我们开始迅速行动。我要求哈里斯联系米尔顿·弗里德曼，安排我们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弗里德曼当时在佛蒙特州隐居，他和我及哈里斯的会面安排在纽约。1971年11月初一个温暖的周六上午，我们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见了面。我问弗里德曼新的货币秩序会不会是灵活的，如果是的话，他对我们开设一个货币期货市场有什么看法。弗里德曼从来不会转弯抹角，认为这样一个市场的想法“精彩”、“富有想象力”。后来，他在一个访谈中说，“我也认为这是个鼓舞人心的想法，因为我们在赌一些必须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一些早就发生的事情。”关于弗里德曼还有其他东西让我对他产生亲近，这就是他对芝加哥的观点。他认为芝加哥和自己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纽约不同，芝加哥是他所谓的“不合常规”想法的肥沃土壤，产生了很多独特的概念，其中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学派和芝加哥建筑师学派。显然，我不仅要求助于弗里德曼的智力，而且也要求助于他的不合常规。

我们会面的时候，弗里德曼对于Merc及其领导了解不多。但当他听了我的介绍后他有了一定了解。我解释说，如果要把概念转变成行动，我需要像他这样一些人的证明。“利奥·梅拉梅德，”我说，“是一个无名之辈。但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你能否为Merc写一篇文章来阐述你的观点？”

⊖ 美国联邦政府的黄金储存地。

从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者的他回答说，“当然，但你必须为这个给我补偿。”我感到十分欣喜。“多少钱？”我问道，准备支付几乎任何金额。“5 000 美元。”弗里德曼回答。这实在是过于合理了。实际上，我是要求这个伟大的人押上自己的声誉，他愿意这么做，本质上并不是那么多地为了 Merc，而是为一个即将到来时代的想法。自从那一天后我们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三周后，我桌上有了他所谓“一篇可能的文章”的初稿。文章通俗，进行了定性分析，很多地方避免了技术术语。像一场仔细排演过的舞台演出，没有回避理解问题。文章的标题就说明了一切——“货币期货市场的需求”。

弗里德曼问我们是否有什么修改意见。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但正如我在给他的信中写的，这些对于他的文章来说不是关键的。他能不能详细阐述一下对于加拿大元的想法？他能不能解释一下即使交割受到影响期货市场仍能起到稳定作用？他能否进一步解释存在货币期货市场的话是如何减轻执行货币政策时的问题的？对最后一个问题，我注意到“这可能为建立这样一个市场提供最有力的论据，而且这种观点会对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银行业产生影响”。

我向弗里德曼保证即使他不对我们的建议做出反应，我们还是会接受他已经写的这篇文章。为了他的工作，一张 5000 美元的支票——这是 Merc 进行的有史以来最好的一笔投资——装入了信封。在我们等待最终稿子的时候，我对我们正在走向正规非常有信心，在信的结尾处我告诉弗里德曼：“……我们将开始为建立这样一个市场进行必要的行动，我们可能于近期发布关于总体概念的正式声明——因为，正如你指出的——时间是关键。”

尼克松宣布政策改变的时机对于我们来说不能更好了。就像无名氏拉丁谚语所说，“需要是发明的母亲。”这后来成为 CME 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市场的广告主题之一。黄金窗口的关闭改变了美国国民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美国不再是决定其货币命运的唯一因素。美元的价值会更更多地取决于对德国马克或日元的相对价值。外部世界的力量甚至会导致万能的美元贬值。随着贸易收支平衡情况从报纸财经版转到报纸头版再转到电视上，公众对于货币汇率的认识会加深。然后，我认为，公民会开始寻找一种方法来加入这一新的国际化进程，他们会在含有国际货币性质的工具中寻找投资和投机机会。甚至更重要的，商业兴趣也需要一个市场来对冲风险。

我想组织一个期货交易所，专门用来交易货币工具。第一个工具将是真的东西——货币。从直觉上讲，我知道这个新合约有巨大的机会——还有：没有人能够对货币市场挤仓或逼仓。经济将会主导这个市场。供求将会决定其价值，其他什么都不能。政府干预当然总是一个因素，因为政府总是会作出支持其货币的举动。但由于货币市场最终会变得十分巨大，政府也不过是另一个大玩家——和其他交易商一样，有发表其观点的权利。我知道市场比任何人都要大。政府也会知道。

1971年12月13日，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聚集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丢弃了布雷顿森林协议，推敲了一个新的方案。美国同意美元贬值。现在美国人购买大众汽车需要付更多的钱，而一个德国人却支付更少的钱来买一卷柯达胶卷了。实际上，可以在海外销售更多的美国物品，而美国人购买更少的外国物品，因此可以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他们同意将其货币上调，使得其货币相对受到打击的美元更贵，目标是减轻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角色承受的压力。

到会的10国财政部长也做了另一个决定，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允许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波幅扩大到官方汇率上下2.25%。嘿！现在货币可以上下波动4.5%而不是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2%。从交易员角度来看，更大的范围提供了更大的价格运动空间，IMM向现实又进了一步。史密森协议只是导致固定汇率机制总崩溃的一系列步伐中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周一，1971年12月20日，弗里德曼将修改稿发了过来，并回答：“你提的建议都非常好，我相信已经进行的修改会改善备忘录。非常高兴这方面你们正在向前走。”

可能说向前奔更为合适。就在那个周一早晨，我正式向世界宣布了我们建立外汇期货市场的计划，我们将交易七种合约：英镑、加元、德国马克、意大利里拉、日元、墨西哥比索和瑞士法郎。我在一份由我们公共关系部发出的一份三页长的稿子中写道，“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发展和允许外汇汇率更大幅度变动的协议使得我们急需尽快推出这个新市场，希望在明年初能够推出。”

我也玩了一副可信度的牌，我披露Merc已经请米尔顿·弗里德曼分析了这样一个期货市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遍布新闻稿的是从弗里德曼论文中截下来的片段：“不管在什么地方，一个成功的（外汇）期货市场应当发展起来，这显然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因为这会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但在美国而不是在国外发展这样一个市场更加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在这里的发展会鼓励美国的其他金融活动，通过服务出口提供更多的附加收入，并减轻执行货币政策的问题。”

弗里德曼教授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都赞同，而且实际上鼓舞了我们。但如果我们的队伍中没有弗里德曼的委任状，显然不同常规的想法永远也跳不出其开始时的大门。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5 章

IMM 狂热

1971 年的冬季假日我没有休息。圣诞节后两天，我和 Merc 理事会成员碰了头，讨论会员全民公决来批准我们的新交易所概念，接受我们选择的名称。名字来自罗恩·弗罗斯特提供我选择的五个不同方案的名单。“国际货币市场——IMM”立即吸引了我，因为它把什么都说了。新实体将单独设立，成为一家分离、独立的交易所，不仅仅是为了交易外汇，而且为了交易每一种金融产品。

接下来的活动以一种疯狂的步伐进行：数不清的场内准备，新闻发布，法律考虑，规则制定，公关和教育材料的准备，委员会的组建以及和会员的会议。杰瑞·萨尔兹曼和我，连同由理查德·伯克、约翰·盖尔德曼、威廉·戈德斯坦、威廉·海纳、巴里·林德、拉里·罗森伯格和迈克尔·温伯格组成的 IMM 过渡委员会，专心于为一家新的交易所创造一套全新的章程。尽管这是模仿 Merc 的规则，但这次重新开始给了我们改变旧想法和引进新想法的很大范围。在我们的税务专家艾拉·马库斯的指引下，我们也创立了向公众出售席位的规定，我的财务顾问巴里·林德帮助形成了 IMM 的新结算所和财务规则。“利奥，”林德对我说，“我们必须向世界发

表声明，让人们没有疑问 IMM 财务上和纽约股票交易所一样健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理想，但这也是一个值得争取的目标。为这个目的，我成立了一个有选择的结算所子委员会，开始了考虑的过程。我们第一批见证人之一、我的好朋友、亨利·贾勒基博士差一点在 IMM 项目开始前毁了这个项目。

亨利·贾勒基是一家纽约黄金交易商莫卡塔金属公司的主席，他的知识力量 and 一贯的玩世不恭对我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立刻就成了 IMM 概念的拥护者，坚持认为他的资信使他有资格进入理事会。这是一个纽约式胆大妄为的典型例子，纯粹的厚颜赢得了我的心。但我还比较沉着，要求贾勒基首先成为一个 IMM 会员，这笔投资需要出资 10 000 美元。这个要求可以暴露贾勒基的机智和风险厌恶的程度。贾勒基以某种方式找到了我们的一个会员乔·西盖尔——排名倒数第二的风险承担者，我将其和达蒙·伦永的《伙伴与玩偶》中的无与伦比的赌徒斯盖·玛斯特森并列，给了他有问题的一年时间的 IMM 席位。

尽管从一开始贾勒基和我碰头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在他出现在我们委员会的那天，开头一两秒钟，我还是有严重的疑惑。我们从来不知道这是一个真诚的陈述还是一场闹剧，但贾勒基和他的助手萨尔·阿萨拉一起来的时候，准备了长达 1 300 英尺的计算机打印纸，他解释说绝对可以证明我们货币期货新市场创造的累积风险可以有一天“击溃西方文明！”

会场上短时间一片寂静，我们委员会的成员在思考到底是笑、哭还是要求贾勒基再也不要出现在芝加哥。尽管贾勒基可怕的预测还没有得到通过，我不会点数判他输。但考虑到今天和我们货币期货相比沉闷的银行间和柜台交易衍生品市场，我建议说如果贾勒基的预测成为现实，原因也是由于银行间和柜台交易衍生品市场而非货币期货。

但在当时，相对于我对 IMM 财务完整性的关心程度，我对西方文明的财务程度的关心要少一些。如果这个概念成功的话，我需要吸引世界的金融大公司成为会员。当然我们有一些华尔街的经纪公司传统上是期货交易所的结算会员，但我们也需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多大的机会啊！我在访问银行纽约办公室时第一个被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的钱是安全的？”

事实的真相是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多年以前，当我问 E. B. 哈里斯关于 Merc 结算所的安全性说，他会耸耸肩膀，溜转眼睛。

“没人知道，利奥，没人知道。”从理论上说，任何一家结算会员倒闭需要其他会员来承担。

“这一原则曾经试过吗？”我问。

“就我所知，没有。”哈里斯承认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推动这件事。如果你去推的话，你会让美林吓得尿湿裤子，他们会退出交易所。”

但我不能放心。如果我们要让 IMM 像巴里·林德建议的那样和纽约股票交易所

同样安全，世界不需要再猜测他们资金的安全性。我们需要在章程中白纸黑字写下铁的规则。还有什么时候能比我们写一套新的规则更好的时机呢？我向包括我们两个律师萨尔兹曼和马库斯在内的结算所子委员会提了一个简单的建议，“让我们把总是不成文的原则落实到纸上。让我们创造一个所有结算会员间的共同约束，这个约束可以保证每个人的资金安全。如果任何一家结算会员倒闭，可以由其他会员来承担。”

这一次，我立即得到了艾拉·马库斯的支持。萨尔兹曼的反映也是正面的。另一方面林德有一个实际的担心，“如果结算会员拒绝加入怎么办？”他问。“他们不会拒绝。”我充满信心地回答。我其实心里也不是很有底，但我知道：没有财务完整性，IMM 永远也不会成功。委员会开始了工作，如同我设想的，在那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形成了被人熟知的“直到最后一滴血规则”。如果任何结算会员公司发生违约，所有其他财务补救——包括 CME 信托基金都被耗尽的时候，剩余没有补上的违约金额将在结算会员之间分配，考虑每家结算会员的资本、交易量和持仓量的份额。这使得 Merc 的结算所成为世界最强壮的结算所之一。

要说空气中充满了激动实在是低估了那个年代。交易大厅的亢奋是有传染性的，所有的理事会成员现在都得了 IMM 高烧。实际上，我仔细地尝试控制士气的激涨使其不要过分，因为我希望这种期待在未来几个月中逐步形成。IMM 计划要下一年五月才开设。新合约上市的人气时机的重要程度和合约本身一样重要。就像每一个好的政治家知道的那样，如果你的动力高潮来得太早可能会是致命的。和每一场伟大的舞台演出的导演一样，我向核心集团成员和 Merc 工作人员说明了计划，他们的任务是到开张的时候一直保持一个渐强的步子。同时，我不断要求每个人不要对开头寄予过大的希望。我知道 IMM 不会立刻就成功，因为这太具有革命性了。对一个新合约最糟的莫过于立刻失败。尽管我预计场内会员会立刻支持，我知道不要从外部期望过多。私下里，我希望我们能在两到三年里打开局面，但公开场合我警告说 IMM 是一个十年的游戏计划，不要另用一套标准来衡量。实际上，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只有几百家美国公司在海外有足够的业务，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但所有这些即将得到改变。在浮动汇率下，几千家从来没有用过外汇市场的公司需要学习如何利用。要解释这个事实需要解释 IMM。

我们在涉足一个创新领域可以明显地从没人知道 IMM 应该受谁的监管看出来。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货币交易没有管辖权，商品交易局也没有权力。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这些事情没有规则。市场还没有设立运营，因此不可能知道对美元是否会有，有的话会有多大的冲击。但对这一点我是确信的：Merc 不可能从裤子后袋中上市货币期货。如果我们所要做的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知道金融世界的鼓动者和动摇者。我希望人们向 IMM 致敬而不是贬低它。但要销售这个想法比我们以前销售的任何东西都要难。这不是某个单一行业的单一商品期货，比如说，在活牛合约方

面让农场工人进入市场。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这是一个完整的市场——国际货币市场——立刻要上市七个不同的汇率合约，使用者遍布世界，涉及不同行业，从金融到制造业。这是一个新的交易所——未尝试过，未测试过，被低估的，未知的，阳光下每个以“未，低”打头的字都可以来形容。

既然金融理论正在成为金融现实，我们的调子必须不仅仅是热闹，需要比金融咒语更有实效。我在鼓吹一种新的期货交易所，这将和一种新的货币秩序所相互影响。对经济来说，私人企业可以创造奇迹，但必须要有一家组织的交易所来给买方和卖方在与市场力量的博弈中带来某种秩序。这是我在巡回全美国几十次鼓动对市场的支持时发出的信息。我是一个福音传道者，一个梦想家，一个堂吉珂德，半个疯子，相信金融期货这个想法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希望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我面对的听众有多有少；我给有影响力的成功人士和普通民众谈过话；我向商界和学术界演讲过。没有人被排除在我发的信息之外；没有人在我在场的听力范围之内会漏听我的话。反应有好有坏；有许多人表示出敬意，有许多人鼓掌，但大多数人或者是怀疑，不理解，或者是不关心。我坚持因为我坚信。

同时，IMM 过渡委员会和我不断开会，设计出合约条款。马克·保厄斯是非凡的：他是一个猪腩专家，当我问他多快能写出一套从来没有设计过的货币合约条款时，第二天早晨我的台上就有一份草稿。当他一完成，我直接碰到了古老的关于商业和个人投机兴趣之间的冲突。商业用户总是喜欢大合约。对于公司用户来说买卖一张 100 000 美元的合约比买卖两张 50 000 美元的合约成本要低，因为场内经纪商的佣金和交易所手续费是按张收取的。但进行市场交易的个人希望合约小一些，因为他们经常不想承担很大的风险。同样，交易所会员倾向于小合约，因为会带来更多的佣金。还有，专门为商业性客户服务的经纪公司希望要大合约，而那些为零售投资者服务的经纪公司想要小合约。商业用户是保值者，没有他们就没有市场。当然，没有投机者也不行，因此合约大小必须仔细平衡。这是永远不会终结的很多利益之间的冲突。通常，我会倾向于商业性利益，因为一般说来，投机者会到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而不管其合约规模。尽管我远未肯定，我再一次遵守我的通常原则。但这次犯了个错误，但直到市场开始运作之后我才知道。

到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回到纽约向华尔街经纪公司献殷勤。有少数公司给了我们宝贵的支持，包括美林公司，E. F. 哈顿公司和谢尔森公司。其余金融界公司，那些从来没有用过一张期货合约的——这在华尔街是大多数——完全忽略了我们。由于我在美林公司开始我的商品交易生涯，这家美国第一证券公司对其前任芝加哥跑单员总是有好感。几个月后当 IMM 开始运作的时候，我访问了华尔街自由广场一号的全新美林公司总部，我突然见到的一幅景象让我一下噎住，眼泪都流了出来。在他们的底层大堂里，有一整面墙的 tote board 让全世界都能看见，喧闹地滴答声记录了 IMM 货币的价格变动。注定要成为美林公司期货子公司负责人的约翰·康西内，花

了很大的代价，决定美林公司对 IMM 看好。

回到芝加哥，大银行已习惯于和 Merc 做交易，认为 IMM 是一个机会和获得更多交易所业务的来源。他们和期货市场长期以来的关系是有利可图的，并且获得了期货业务的专门技术。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很容易掌握货币期货市场的概念。很幸运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令人快乐的是，四家芝加哥大银行——大陆伊利诺伊国民银行与芝加哥信托公司、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哈里斯银行与信托公司和美国国民银行与信托公司非常支持 IMM 设想。实际上，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执行副总裁罗伯特·阿布德，成了最初 IMM 理事会的理事，该银行成为结算会员，意味着在新货币市场上它可以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这是一个多年来没人预料会发生的突破。芝加哥银行提供帮助的传统，特别是芝加哥第一银行管理层的支持，持续了很多年，我 1975 年任命威廉 J. 麦克多诺为 IMM 理事。他现在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1983 年，我任命了理查德 L. 托马斯为 IMM 理事，他后来成为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主席。同样重要的是，芝加哥哈里斯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贝里尔·斯普林克尔，也接受了我的邀请加入了 IMM 理事会。斯普林克尔博士享有全国声誉，后来他成为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的到来立刻提升了我们的可信度，成了一个无价的同盟者，帮助我经历了说服华盛顿官员认识我们 IMM 想法价值的过程。

当然，1972 年的时候，和当时芝加哥最大的银行——大陆银行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除非我能够解决交割问题，我甚至不能设想一个货币市场（这是现金交割替代实物交割需要很久以前）。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可以在世界上到处运营的机构成为我们的交割代理。换句话说，如果有人交割日元，他必须能够在东京收到钱。如果要交割瑞士法郎，必须在苏黎世，等等。芝加哥只有大陆银行有世界网络。E. B. 哈里斯认识该行总裁提尔顿（提利）·卡明斯，他在芝加哥是个强人，并且是老伙伴网络的一部分。“我会安排我们去见他，利奥，你来解释给他听。”哈里斯对我说。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陆银行外汇部门的负责人是罗伯特·莱克勒克，他正好是那一年的外汇协会的主席。外汇交易商是一批由全球外汇专家组成的精英，他们喜欢过去做事的方式。他们最不希望的是 IMM，因为这会通过让外汇价格变得透明来颠覆其获利丰厚的垄断。莱克勒克告诉提利·卡明斯我是毒药。幸运的是，提利有其主见，给了我一次说服他的机会。我们坐在拉萨尔大街的大陆银行大楼卡明斯漂亮的办公室里，E. B. 哈里斯看着我用了 45 分钟流利地解释 IMM 的优点。当我结束的时候，卡明斯把他的一个助手叫了进来。

“大陆银行将担任 IMM 的交割代理。把机器设起来，”大陆银行的总裁说，“我们将为此收费，但我们会担任交割代理。”

就这么简单，我们开始了营运。我忍住没有去拥抱他。这是又一时刻，我再次认识到把哈里斯保留在 Merc 是多么地正确。没有他，我永远进不了这间办公室。

现在轮到大陆银行的管理人员约翰·麦克帕特兰了，他被指派设计在全球设置货币交割机器。这是在计算机有足够能力处理这样的复杂事务很久以前。麦克帕特兰完成了这一任务。由苏格兰决心和创新心灵武装起来的他，一手设计了外汇交割系统，给 IMM 带来了生机。他自己承认，这一系统还很粗糙。在早些时候，大陆银行偶尔还要承担风险，银行到时候必须在得到卖方的支付之前进行交割。

6 年以后的 1978 年，麦克帕特兰和 Merc 的交割专家米尔顿·斯特恩，重新设计了大陆银行的 IMM 交割机制，使其完全安全。米尔特·斯特恩对外汇交割一点都没有概念，他的儿子威尔后来成为一个成功的场内交易员。但他对活牛交割非常熟悉，设计了 Merc 活牛交割设施的复杂网络。你看，用格特鲁德·斯泰恩的话说，“一种期货，作为期货中的一种，毕竟还是一种期货。”麦克帕特兰和斯特恩的 IMM 外汇交割系统一直沿用至今。

但如同我们所预料的，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来自纽约的大银行或其他货币中心银行的支持。他们不仅质疑 IMM 是否真的会比现有的银行和货币交易商网络给参与者提供明显优势，他们一致感觉芝加哥是个错误的地方来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毕竟，每个人都知道纽约是金融首都。他们相当肯定 IMM 想法很快会倒下。IMM 的诋毁者争辩说，如果 IMM 成功的话，这会招来美国和外国政府的愤怒，因为通过煽动货币投机机会扰乱合法的汇率。这里是我在设立货币市场时面临的问题的症结，这个市场上实际上是邀请投机者参与。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英格兰银行第一次大的货币贬值之前很久，政府圈内将大的货币变动归罪于投机者导致的压力就很普遍了。投机者总体说来在金融世界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好的印象，而货币投机者类型被认为是其中最坏的一种。投机者被描绘为潜伏在伦敦、苏黎世和法兰克福等金融中心的面容丑陋的一批人，他们在随其心意的时候这里卖一英镑，那里卖一美元，做多日元或马克，做空瑞士法郎。然后这些完全可鄙的家伙以中央银行付出代价而获得利润的时候，会幸灾乐祸地偷乐。货币投机者——不爱国，贪婪，不负责任，没有优点的笨伯，成了中央银行挖苦嘲笑的对象；中央银行是好人，他们爱国，负责任，值得尊敬，为了法律、秩序和认为合适的货币价值而英勇奋斗。

当一个人进一步仔细观察国际舞台的力量相互影响以及读一读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奥托玛·埃明杰、弗里茨·马克路普、罗伯特·阿里伯、乔治·舒尔茨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还有很多事情没讲。实际上，在完全熟悉了牵涉到的各种复杂情况后，你会不可避免地得到结论，真实情况和政府官员所说的完全相反。首先，“坏蛋”、投机者经常是跨国公司的财务人员、银行家、主权国家或享有很高声誉的金融家。进而，这些人的动机并不总是为了私人获利，经常是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获利。相反，他们的动机经常是为了他们公司、银行或国家的最高利益。经常出现的情况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为了防止损失或使损失最小

化。总结起来，他们的行动是基于他们认为是合理的经济或商业判断。

但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事实是人们可以发现，大体上，投机者是告诉货币价值真相的人。最经常的是政府或中央银行家会为了政治动机忽略现实。无论如何这是无效的。在这个年代，货币的价值如同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一样，不可能在一个关起门来的会议室里秘密地决定。只有市场的自由力量可以做一个诚实的估价。

我从来没有在会员中进行过民意调查，来决定真正懂得国际货币市场对 Merc 未来的意义的会员的数目。但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判断有信心，并且对 Merc 成长的方式感到满意，因为当时 Merc 的席位费已经上升到了 10 万美元，远远高于仅仅几年前的 3 000 美元支持价。他们在 1972 年 1 月 17 日显示了他们的忠诚，会员投票以 321 对 19 票通过了作为一个单独交易所组建 IMM。这是对信心的压倒性个人投票。

从财务上说，对他们这也是一笔好的交易。每个 Merc 会员以 100 美元价格得到一个 IMM 席位。实际上，我打算给所有现有的 Merc 会员免费赠送一个新交易所席位，但艾拉·马库斯坚持为了税收目的要设定一个价格。他们在另外的席位向公众以 10 000 美元价格出售时已经赚了 9 900 美元利润。但为了保护新的买家，Merc 会员被要求必须持有 IMM 席位至少一年以上才能出售。一开始价格有所回落，最低纪录是 8 800 美元。22 年后，一个 IMM 席位价值超过 75 万美元。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6 章

我们是谁

在我看来，我们成功的关键是我坚持 IMM 以单独交易所设立，专门设计用来交易金融工具。据我所知，这样一个想法以前从来没有交易所尝试过。我的策略是吸引一批新的交易员军团，他们可以塑造一个金融形象而不承担农产品期货历史带来的义务。实际上，我寻找的一些金融玩家和机构对于购买一个“猪腩”席位十分反胃。此外，我需要年轻的新鲜血液，他们愿意在这一新的组织中寻找机会。我覬覦的勇敢企业家没有钱或者没有一个富有的老爸来资助购买 100 000 美元的 Merc 席位。最重要的是，我创立一个单独交易所的基本理由是限制其会员交易活动于 IMM 的合约。实际上，他们成了货币交易池的俘虏，被迫在那里交易。要么发财要么破产。我知道这一点，不然，有可能新会员会被吸引到成功的活牛、生猪和猪腩市场，那里交易已经很活跃，更容易赚钱。为了让 IMM 能够成功，我需要交易员只能交易货币或我们在那里挂牌的其他金融合约而不能干其他的。

从任何度量看，最吸引新一批交易员的因素是 IMM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梦想——一个有着无限机会的梦想。他们中的多数人开头没有什么钱，多数人受过的正式金

融或外汇训练甚至更少，多数人背景卑微。但那些一开始进来的人，将他们的希望和 IMM 星星结合了起来，随着 IMM 的发展上升到了他们难以想象的高度。他们来自生活的各个层面，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雄心。如果你随意走下大厅的过道，你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每个会员有一个不同的故事。我会时不时地那样做，就是为了得到我们是谁的感觉。

我们吸引了一类年轻和有闯劲的企业家，他们覆盖了很广的范围——从一般到卓越，从学生到职业人士，从医生、律师到赌徒和冒险者。

例如，像汤姆·迪特默，在作为一个白宫海军荣誉警卫队员服役后，来到 Merc 当一名职员。在大厅里，为了获得额外的现金，他出售旧手表。他很快认识到他有金融天赋，开始做起美梦。对于他来说，IMM 提供了一个达到美国金融阶梯最高一层的机会。他不屈不挠地工作，创建了 REFCO 公司，这家国际性经纪公司现可以和华尔街的老牌公司竞争。值得赞扬的是，迪特默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开始、我们的友谊，也没有忘记 IMM 给他提供出人头地机会中扮演的角色。

相反，伊拉·哈里斯是不情愿来到交易大厅的。他从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制定了自己的政治职业生涯，到华盛顿特区为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工作。伊拉·哈里斯的父亲乔·哈里斯，成功地在 IMM 交易大厅进行银币套利，对他儿子的决定不甚热心。而且乔·哈里斯不能被推倒，他是一个厉害的空军老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过领航员。为了纪念他的战争经历，他用四个字母 A-R-M-Y 给四个孩子命名。伊拉是最小的一个。在丘奇参议员的跨国子委员会没有实现后，乔·哈里斯把他的儿子一路踢着喊着，拉到交易所大厅，为美国国民银行做 B 类套利。用不了多久伊拉就会看到他父亲的智慧。伊拉·哈里斯成了一个出众的非常成功的 IMM 交易员、一个受人尊敬的交易所领导人、我的精英场内兵团的永久成员。

另一方面，斯科特·戈登是作为利维公司职员来到大厅的。他很聪明，而且雄心勃勃，从来没有看到过德国马克是什么样的，他为罗森塔尔公司开了一家 B 类套利公司，使他走上了管理层的阶梯。他最终入选 Merc 理事会，许多年他作为 CME 秘书使用着我以前的办公室，后来成为第一副理事长。

比尔·谢帕德、拉里·谢帕德和查克·吉尔克莱斯特的历史如同交易大厅发生的故事一样，提供了 IMM 中由穷变富的典型故事。1968 年，拉里·谢帕德卷入了一场与高中其他孩子在新泽西州一条河上的胡闹，结果将一个农民的划艇给弄沉了。那些地方的法官将这类罪判得很重，于是给拉里的选择是：要么参军要么坐牢。在他入伍体检没有通过后，拉里非常害怕，开了吉普车就往西部赶。在芝加哥附近车坏了。那个夜晚，在靠近市中心的快餐店里，拉里和侍者查克·吉尔克莱斯特聊了起来。吉尔克莱斯特告诉拉里不要被他的侍者制服所迷惑，他是一个真正的百万富

翁崇拜者，白天工作是在 CME 为穆拉斯兄弟公司担任跑单员，他预测自己将在这个行业发财致富。第二天早晨，拉里·谢帕德毫不犹豫地来到 Merc，用一些从他家里借来的资金开始进行交易。他在交易方面要比划艇好得多。几个月后他写信给他的堂兄比尔·谢帕德，当时他正在越南丛林中，信中说，“吉尔克莱斯特和我在五年内将成为百万富翁。”比尔·谢帕德也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他一离开军队就直接来到 Merc，看他的堂弟到底在说些什么。他来的时候正好是 IMM 即将开张的时候，1971 年 12 月。比尔·谢帕德成为一个特别精明的期货交易员，从我们见面第一天起就成了我精英团队中受人尊敬的副手。

有一些人像马蒂·利伯曼，他从罗斯福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但放弃了该行业的职位，还有一些人像吉米·施耐德，他的家族鸡蛋生意帮助交易所开张，他离开了阿拉巴马州的养鸡场回到交易池，还有像莱尼·费尔德曼，离开了他作为一家夜总会经理的生活，这家名为“去去威士忌”的夜总会坐落在节奏很快的拉什大街上。

利伯曼深思熟虑，大多数时间不与人交际；施耐德很快被交易大厅接纳，施耐德家族是 Merc 创始人之一，他的祖父整个一生都靠 Merc 生活；费尔德曼性格外向，其出众的幽默感使得每个人立刻成为他的朋友。一次，在一节特别热烈的交易中，莱尼·费尔德曼的声音在喧闹声中仍能听到：“停止交易，停止交易。”他叫道，他把交易卡仍向空中，“我想我破产了。”一瞬间，一些会员真的在犹豫是否要笑，然后再继续其热烈的交易。但也只停了一瞬间，大家都知道交易池里的交易是不会停的。甚至偶尔出现的一个交易员在交易池里心脏病发作也不会不交易。在他被转移到担架上后几分钟，交易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的那样继续。

也许一个更给人印象深刻地说明交易员的一心一意的例子，是电影《刺》在新 Merc 大楼下面的联合广场放映的时候。南希·吉尔斯，一个漂亮的年轻职员，她认识制片人，被介绍给电影的主角保罗·纽曼和罗伯特·拉德福特——后来和一个非常成功的猪腩交易员莫里·克伦豪恩结婚，比较镇定地打电话给我到火车站介绍认识。我没有用很多时间就说服了这两位超级明星应该去看一看我们交易池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当我骄傲地陪同他们到达交易大厅的时候，毫无准备的 Merc 会员出现了混乱，因为他们突然看见，在他们中间，是两位最著名和受爱戴的美国男演员。我们周围立刻挤满了人，情绪热烈。突然，在当时的喧闹和激动之上，我听到比尔·穆诺的声音从他所在的猪腩交易池中对着众人喊：“叫那些讨厌鬼让出通道，我的跑单员不能跑单了。”

这些新的 IMM 会员很快融入了这一领域，除了他们比较年轻而且只交易货币以外，你不能把他们和 Merc 原来的会员区分开来。我们也有很多 Merc 会员的儿女，以及职员、跑单员等待机会进入 IMM。一年后，我们出售了 150 个 IMM 席位，新席位的发行停止了。这些最初席位购买者成了我的金融期货战斗的第一个 IMM 军团。他

们到今天都是我的忠实追随者，就和 Merc 的最初 500 个会员一样。

然而，要绕道走是不可能的，新合约要成功，IMM 的一部分必须从 Merc 上切下一块。要让习惯于交易猪腩、生猪和活牛市场赚钱的 Merc 会员转到 IMM 交易，一开头是有些难度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于交易大厅我的精英队伍，他们都忠实到家了。而且他们被一根共同的线串起来：一个交易员的直觉。

马洛·金，我基本面导师，做了 IMM 英镑合约的第一单——而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英镑是什么样的。我给艾伦·弗里曼派了一个职责，要使 IMM 远期合约价格和当月价格匹配。弗里曼从美林公司派在 CBOT 的职员做起，当时我在 Merc。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大陆。卢·马达，从为乔·西格尔担任鸡蛋合约跑单员起家，当需要在英镑市场担任做市商时丝毫没有犹豫。马达是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我和他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一种共同纽带，因为我们都是芝加哥大街的产物——不要管什么他父亲是采葡萄做葡萄酒，而我父亲是写数学书的。一点不懂外汇的汤米·里奇，勤奋地将其时间用于给新市场提供流动性。里奇的父亲托尼是 S. S. 波顿公司的头查克·波顿的得力助手，这家公司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芝加哥奶制品公司，是 Merc 的创始会员。罗伯特·西拉奇是我精英部队中的注册会员，我喜欢他对我们周围交易员天性和心理的与生俱来和完全正确的理解。我们经常会比较记录，我们的估价不可避免地一致。西拉奇从芝加哥市中心街道以最优成绩毕业。他从肉类市场开始期货生涯，但本能地掌握了瑞士法郎市场的专长。他已经将 IMM 的火炬传给了他的儿子安德鲁。

或者看一看利维三兄弟——莫利、摩特和伦纳德，他们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芝加哥拉比。^①他们兄弟三人成了货币期货最坚定的支持者。莫利·利维通过各种肉类合约的价差交易赚钱，也就是建立组合的多空头寸。他知道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之间有某种联系，因此他在两者之间进行价差交易。换句话说，利维兄弟已经将其交易技巧从一个商品转到另一个商品。还有无数 Merc 交易员在 IMM 战斗的头几年里自愿加入这个队伍，并获得了无数类似的成功。其中的一些人成为金融世界的永久成员，但大多数最终还是会回到肉类产品交易池。

我们的交易员很少懂外汇的事实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大多数交易员即使交易猪腩合约很多年也从来没有看到过猪腩是什么样子的。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一个好的交易员在交易大厅上行走，听声音从哪里传过来，然后那就是去交易的地方。什么合约并不重要，因为不管什么产品市场都会因类似的理由上涨或下跌。无论如何所有交易池里交易员要做的是跟随大势。当然，对我们来说，金融产品相比任何一个新的农产品偏离现有产品的程度都要大。很清楚，我的猪腩交易员们不是来自

① 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众领袖。

国际金融传统。布鲁斯·约翰逊一次向我吐露，当他的一些来自美国农村的亲戚来到交易大厅探访他时，他们要求看一看哪个交易池可以交易瑞士热狗。他用了一分钟才明白他们说的是瑞士法郎。

但我的伙伴学起东西来都很快。逻辑告诉我们，那些单纯的猪腩、活牛和生猪交易员在奸诈的外汇深水中与老练的外汇专家做交易是不能长久的。但这种不平等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所降低了，那就是我们是用自己的钱在交易。银行的外汇交易员从来都不用自己的资本冒险。这一简单的区别带来了交易的纪律和对知识的渴望，这种组合成就了那些来到 IMM 货币交易池的 CME 会员。

新交易所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我可以塑造其理事会。我明白 IMM 的形象必须将其定位于国际舞台上一个严肃的演员。Merc 的理事会全部由全体会员选举出来的会员组成，其中没有人有金融背景的证明；IMM 给了我机会可以任命一些外部理事（1977 年，在 Merc 和 IMM 合并后，我将这个概念带到了新的 Merc 规则中）。在组成 IMM 理事会的时候，我首先自动任命了所有的现任 Merc 理事，^①然后我加了一些来自金融界的著名代表，包括 A. 罗伯特·阿布德、弗雷德里克 W. 项茨、贝里尔·斯普林克尔、亨利 G. 贾勒基博士；最后我加了两个大厅会员理查德 E. 伯克和威廉·戈德斯坦，他们两个不知疲倦地让 IMM 起步，但不是 Merc 理事。

我被选为 IMM 理事长，哈里斯被选为总裁。我们两个是唯一在 IMM 和 CME 都做过这两个职位的人，因为四年前，IMM 被合并为 Merc 的一个部门。但我很快放弃了我的 Merc 头衔，有两个理由：首先我想集中关注 IMM，第二，我感觉 Merc 理事长位置不应该被一个人占得太久。Merc 因为过去权利滥用而受到了伤害，我热烈地相信阿克顿勋爵的忠告：“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此外，在我的内心，我知道控制并不一定需要理事长职位实现。1967～1969 年作为 Merc 秘书，实际是我在管理交易所。

但是我作为 Merc 理事长通过的第一批规则之一，就是将理事长任期限制在连任不超过三届，每届一年。1972 年，我于是要求小迈克尔·温伯格取代我的理事长职位，我则又担任我的老职位秘书。但实际上，由于 IMM 和 Merc 的活动经常相互交织，因此实际上两个机构都由我领导。

温伯格是 Merc 的贵族，是第三代的 Merc 交易员，他的祖父 Marx 是黄油鸡蛋交易所和 Merc 的执照会员。他的父亲老迈克尔·温伯格担任过黄油鸡蛋交易所的总裁，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担任过 Merc 的理事长。小迈克尔是我的朋友、忠实追随者、IMM 鼓吹者，在六个 Merc 委员会任过职，做过秘书、财务总监、第二副理事长。他富有

① 包括理事长迈克尔·温伯格；第一副理事长约翰 T. 盖尔德曼；第二副理事长丹尼尔 R. 杰西；秘书利奥·梅拉梅德；财务总监巴里·林德；卡尔 E. 安德森；劳埃德 F. 阿诺德；马洛·金；威廉 C. 穆诺；唐纳德 L. 米努西亚尼；罗伯特 J. 奥布赖恩；劳伦斯 M. 罗森伯格。

思想、深思熟虑，给 Merc 提供了很多新的想法，在他两年任期内和哈里斯与我非常和谐。

领导位置的更迭使我可以把全副精力投入到 IMM 营销的艰苦劳动中。我在后来几年中费了很大的力气让别人理解，并和怀疑者论战。至少，银行家、交易员、记者和政府官员都有他们的怀疑。如我后来所知，和怀疑者论战是项艰苦的任务。有一些怀疑者，在他们的自负后面，争辩是为了显示他们无所不知。有一些隐蔽的怀疑者，他们心中恼怒，却毫不作声，好像他们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这里点头，那里假笑。当然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怀疑者，他们愿意从两面看一事物。但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怀疑者从迅速打击其他人的想法中获得幸灾乐祸的感觉。

IMM 怀疑者的队伍很长。他们不仅炮轰这个想法，还有这个想法背后的人。“想象一下，外汇可以交给一帮猪脑赌徒来交易，实在是太可笑了。”一个著名的纽约银行家在 IMM 开张的前夕说。《商业周刊》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新货币市场仅限于掷骰子者使用……如果你把自己当做是一个国际货币投机者而又缺少资源，那么你的日子来了。”

这些是在我们巡回推广和阅读报纸时向我的同事和我扔过来的一些“好听的奉承话”，报上将我们写成还来不及尝试实现金融无序。这些言论持续了好多年。1976 年，在 IMM 新的利率市场开张时，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说了下面的话：

像那个有着深喉的女人琳达·拉夫罗斯一样，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国际货币市场（IMM）试图通过比其竞争对手更无耻来赚钱。现在它的货币期货市场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个市场是 1972 年一些穿着奇装异服的女人开始的——IMM 本月将开一个美国国库券期货的交易池。政府债券和猪脑、活牛和三个月鸡蛋在一个大厅里买卖。

甚至十年以后，巴伦杂志在谈论新的股票指数期货市场时是这么说的：“和那些闪电般步伐的电子游戏一样，股票指数期货市场可以让你瞬间暴富、瞬间破产，取决于你冲动的精确和反射的迅速。”

我们的诽谤者完全没有说到点子上。IMM 不是要击败任何人，我们也没有尝试去让某种东西复活或重新发明某样东西。这是完全的发明——转折时代的新市场领域。我试图去描绘一幅展现在前面的金融地图，试图给企业和金融界以及农产品行业类似的风险转移机制，这些机制已经成功地运用了 100 多年。而这是一项困难的销售任务。

但我还是找到了同盟军。实际上，同盟军有很多。一些人在高位，如美联储主席阿瑟·彭斯、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还有

财政部的保罗·沃尔克。另一个人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查尔斯·珀西，他是权力很大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是 Merc 的坚定支持者，鼓吹自由市场。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联储主席阿瑟·彭斯，提到 IMM，“……对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有显著的作用……”

我们的律师杰瑞·萨尔兹曼向我保证我们不需要监管部门或其他部门的批准就可以上市货币期货，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不是这样。我从一开始就相信有充足的理由去和美国政府官员及外国政府加强联系。首先，我希望给予 IMM 适当水平的支持和关注；其次，获得一个正面的回应，可以用来推动这个想法的实施；最后，如果回应是负面的，那么也要控制其副作用。结果我的直觉完全正确。几年后当金融期货生根的时候，我在美国政府高层建立起来的支持和良好关系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也为最终我们可以建立华盛顿游说机制打下了基础。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当 IMM 诞生的时候，在政府高层有一批自由市场人士。

哈里斯和我拜访了乔治·舒尔茨，他在 IMM 成立后不久就当上了财政部长。只有哈里斯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首都。但我没有告诉他我感到紧张，当我第一次走进建筑宏伟的财政部大楼时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感受到肖勒姆·阿莱谢姆的格言所描述的那样：一个自由、民主、充满机会的国家。

舒尔茨在芝加哥大学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同事，是正式收到我事先寄给他的弗里德曼论文的第一个政府官员。我没有告诉哈里斯，在我们到达前我安排弗里德曼给舒尔茨打了一个私人电话。

“听着，”舒尔茨用和蔼和平静的声音说，“我读了记录和声明，我对你们很了解。如果对于弗里德曼没有问题，那么对于我也没有问题。”

他愿意接受货币期货的想法，不是因为涉及什么法律，而是因为他达观地赞同这一想法。我的高度随着弗里德曼的高度而上升。实际上，弗里德曼低估了他提供可行性报告带来的好处。我们乘着他的燕尾服飞扬。

舒尔茨问了我各种问题。用哪种货币？合约大小是多少？我急促背诵出货币名称，理由在弗里德曼的论文中早已解释过了，我所做的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和词语论述自由公开市场上的供求，在市场上通过买卖报价可以建立真实的价值。他的眼睛发亮了。对于舒尔茨的耳朵而言，这一自由市场论调如同音乐。当时我就知道来华盛顿是来对了——不是来要求获得批准，而是来获得证实——“我的裙子是直筒的”并保持接触。

“你试图做的是件不可能的事，”舒尔茨说，“而且你成功的机会接近于零。但如果你能干成那上帝也会保佑你。”简而言之，舒尔茨是在说“阿门”。

下一次旅行中，哈里斯、保厄斯和我与吸烟斗的联储主席阿瑟·彭斯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会了面。每一次，结果都和舒尔茨的类似：亲切，怀疑以

及对成功的祝福。甚至当时在财政部的保罗·沃尔克，尽管起初有些犹豫，但后来对这个想法很热情，告诉我这是个迷人的概念。每次到华盛顿都让我进一步确信接触当时国家的权力人物这一步是走对了，其中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在和风车作战。相反，有时我访问纽约银行家的办公室时，我离开时的感觉是他们不希望我们和他们走得太近。有些人还有一种想法是货币期货可能会很危险。

尽管这些政府官员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让 IMM 走上正轨，我确信在我去的时候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成了我从弗里德曼开始的可信任链条中的环节。在从纽约到旧金山到苏黎世到伦敦的 100 次演讲中，我会引用弗里德曼、舒尔茨和彭斯。首先我解释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然后是为什么需要这个市场。我总是以这样的结束语来达到效果：“看看谁在支持我们。看看谁也认为这是个伟大的主意。”这仅仅是我和华盛顿浪漫史的开始，这一关系在后来的 20 年中起起落落。

2 月，在 IMM 交易前两个月，为了庆祝其生日，我们在芝加哥的帕默旅馆举行了一个货币会议，吸引了 700 多名最大的美国 and 外国银行、各种行业、经纪公司、学术界和交易所会员参加。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站起来公开宣布 IMM 诞生，并介绍发言人，其中包括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和斯坦福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保罗·库特纳。弗里德曼的背景论文已经发到了每个人手中。我选择让萨缪尔森担任主旨发言人，是试图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想法得到了来自经济学各种流派的支持，从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到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但结果不完全是我所希望的。尽管晚会充满喜庆气氛，非常成功，让我完全失望的是，保罗·萨缪尔森有些令人沮丧，他说尽管他不是来向我们的游行浇雨的，但他对货币期货不是抱很大希望。当我后来告诉弗里德曼故事的经过，他笑道，“你还能期望什么！”

然后是 3 月，我们又到华盛顿，早晨哈里斯和我见了联储理事詹姆士·米切尔和他在联储的同事，来讨论外汇期货的经济影响。我们做了很多猜测。几个小时以后在几个街区以外，我们又和商务部的官员见了面。我们推介活动的基础以及我的华盛顿访问开始有了效果。现在有关 IMM 的报道不仅仅出现在芝加哥的报纸上，也出现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以及全国性杂志和通讯社上。路透社在 3 月晚些时候报道说：

财政部官员告诉新闻记者说，财政部欢迎在芝加哥建立国际货币期货交易市场。他们说，建立货币市场没有技术或法律问题。“我们欢迎一个成功的市场。”一个官员说，另外对远期市场的需求也在增大。他们说货币市场官员在市场成立前已经咨询过财政部。

在座谈会、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和大量的书面印刷材料向金融和银行界散发后，国际货币市场于1972年5月16日正式营业。金融期货新纪元诞生了。这是意义重大的一天，尽管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其全部意义。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经常向我悲叹他错过了到交易所见证这一历史事件的机会。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米勒教授对这一事业的成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刺激了现代学术理论接受了风险管理原则作为一个必要的商业安排，因此确保了金融期货的使用及在金融殿堂中的合法性。

我们开张时候的热闹程度和我们的想象一样。我们不想对钱这样值得尊敬的事物表现得太不敬。嘉宾演讲人是威廉·戴尔——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理事，他提醒听众IMM在史密森协议后只有5个月就开张并不是偶然的。“协议提供的更宽的波动区间，”他说，“表明一个像IMM的市场在评定风险和估计未来方面是有作用的。”这样的评论，特别是来自一个华盛顿官员，在我耳朵听来就像是美妙的音乐。米尔顿·弗里德曼终于有了一个他可以交易的市场。

第一天我和其他几百个交易员一起交易。在货币交易池里我一点也没有感觉不方便。交易池就是交易池，我告诉自己。猪腩，活牛，生猪，鸡蛋和货币……我可以将一种商品的交易知识转到下一个。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伙伴们还是倾向于回到肉类合约以前踩过的地上，那里是战斗的地方，那里是他们知道如何谋生的地方。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成了一个被困扰的单人实施者——强迫、哄骗、劝告和恳求我们的Merc会员交易货币市场。我恳求说我们需要流动性。每个人都不得不出一点力。我整天其他什么都不谈，在交易时间里寸步不离地待在交易大厅。大多数情况下，交易大厅回应了我的恳求。这些人毕竟都是我的人。有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跟着我到天涯海角。

对我来说，我知道最好的教育方法是实例。我不能要求别人来交易，除非他们看到我在交易。新合约成功上市的这种个人方法，长期以来多次使用，已经成了我的特别商标。每个人都知道利奥将自己的钱投到了他嘴上说的地方。我不会要求某人去做一样我自己不会去做的事情。不幸的是，有时候这样做代价很大。作为一个交易员，我做空比做多更在行。在IMM开始的时候，我跟随着自己的直觉。我充满信心地卖空了10手瑞士法郎。不幸的是这时正好是美元第一次大跌的开始。后五个交易日中，瑞士法郎一连五个涨停——也就是一个交易日中允许的最大价格变化。由于没有流动性我无法出场。我们的停板远低于现货市场。我被套在其中，亏了一大笔。开始并不顺利，但我从来不否认交易货币对于甚至是最出色的交易员来说都是比较难处理的。这是一个假定的事实。这也印证了另一个格言：一个投资者必须为一个成功的发明付出特别的价格。

在IMM交易的头21天里，总共交易了22 455张合约——一天要1 000多张。这

也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潜在的市场用户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到年底的时候，IMM交易量达到了值得尊敬的144 928张。下一年交易量增长了两倍多。这超出了我最乐观的估计。我心中毫无疑问国际货币市场的想法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在1972年年报中对会员发表的声明中，这是第一次官方说起交易所的子女IMM，我对我们已经做的事情的评估一点也没有感到害羞，并展望了其未来的潜力：

1972年5月16日开张的国际货币市场和第一家有组织的商品交易所的成立一样，是具有革命性的一步……

……我们相信比货币期货本身范围要广，我们希望给市场带来其他的合约和商品，这些合约和商品直接地和货币有关，并且可以补充货币期货经济学。

当然，运气在其中也起了作用。实际上，如果我可以重新布置创立一个金融期货交易所用来帮助管理货币风险和利率价格波动的背景墙，我不可能做得比实际发生的更好了。在IMM诞生后的一年内，紧随其后的经济混乱极大地改变了后来很长时间内世界的金融秩序。1973年10月，石油禁运和石油涨价以及阿以战争带来了经济剧烈变动，这一金融混乱的纪元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接下来的几年，这种混乱考验了西方社会的非常基础。美元急速下跌，美国失业率超过了10%，油价飙升到39美元一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到570点，黄金价格达到了800美元一盎司，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和平时代所没有达到过的20%，利率水平更高。这些经济相互作用保证了IMM确实成为了时代需要为发明的基础。

不是每个来到IMM的交易员都能够赚钱或成为百万富翁。但那些致力于这个市场并且富有勇气的交易员得到了回报。忘记种族、宗教或民族背景。最要紧的是雄心。我们是一批有着不同面容、不同特点的人的集合。但一样事情是不变的：不管朝交易大厅哪个方向看，都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梦想。

在IMM十周年的特别庆祝会上，我向听众朗诵了我特地写的一首短诗。题目是“我们是谁”，我想这首诗说出了真相：

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群饥肠辘辘的人。

我们是交易员，

我们不关心交易的是——

鸡蛋还是黄金，

猪脑还是
英镑，
火鸡还是国库券。

我们是森林中的孩子，那么天真，
在一个我们不懂的世界里，
我们傻傻的，不懂害怕。

我们是大胆、厚颜和粗声的先锋——
太脱离尘世而不知道我们可能不会赢。

不利我们的概率是太高了：
银行从不信任我们，
政府从来不让我们，
芝加哥是个错误的地方。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7 章

新艺术十字军骑士

在 IMM 开始走上正轨后，我甚至比以前更用功了。现在我决定必须在国际市场上吹响我们的号角。我授权我们的公共关系部雇用了柯蒂斯·郝克斯特——一个纽约的金融评论员，他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兴趣，希望能帮助安排到欧洲的金融中心城市去做一次盛大的巡游。这支 IMM 特种装甲运输队除了我以外，还包括八位交易所官员，理事会来的都是 IMM 官员：约翰·盖尔德曼，第一副理事长；丹·杰西，第二副理事长；罗伯特·奥布赖恩，秘书；拉里·罗森伯格，财务总监；巴里·林德，Merc 财务总监；还有 E. B. 哈里斯，我们的总裁；马克·保厄斯，我们的经济学家以及罗恩·弗罗斯特，我们的公关官员。这是 Merc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我们这些竭力给 IMM 带来生机的人来说是个特别的奖赏。

柯蒂斯·郝克斯特进行了必要的安排，到六月中，我和 IMM 高级官员分遣队横跨大西洋。我们的目标是双重的：对我们交易货币所在国家的中央银行表示敬意，其次，在欧洲金融界吸引对新生交易所的兴趣。

我们是货币交易新艺术的十字军战士，决心要将 IMM 放到欧洲公司和货币的版

图上。两周的旅程要将我们带到伦敦、米兰、罗马、苏黎世和法兰克福。到达每个城市后，我们一天安排了三到四次会见。每一站我们给出的信息和国内对他们同行给出的一样：解释新市场是如何和为何开发作为减少外汇风险的另一种机制，以及那些从事国际贸易、银行和外汇交易的人可以如何利用这个市场。我们强调，IMM 被设计用来对现有的银行外汇远期交易的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当时很多欧美公司因为货币波动带来的损失高达净利润的 20%。这些公司的财务人员基本上不能忽略合适的保值带来的价格保护。

在我们和欧洲人会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金融展示和讲述课中都有特别的任务。我会就自由市场做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讲，勾画灵活汇率机制带来的新秩序和 IMM 提供对冲内在风险的市场的目标。哈里斯讲述 Merc 的背景。保厄斯介绍合约条款。林德和罗森伯格从交易员角度巧妙地对付问题。弗罗斯特负责媒体事务，他不仅派发英文版的材料，还派发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版的材料。我发现对于 IMM 的怀疑是普遍存在的，让我完全清醒的是只有很少人参加我们的会议。

这次出行一开始调子还很高。柯蒂斯·郝克斯特和我们一起走，他安排了英格兰银行接待我们代表团。我们参观了银行，看了看理事会会议室，其历史和宏伟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英国人是特别亲切的主人，让我们高兴的是安排了午餐，地点就在针线街老夫人^①神圣的大厅里。然而出于一种我们当时不知道的原因，一些央行官员没有出席，另一些很晚才到。在午餐当中，行长解释说，尽管英格兰银行完全赞同自由经济，对于我们的事业英国确实帮不了什么忙，因为英国法律禁止英国公民交易货币期货。然后他为 IMM 干杯，并礼貌地问还有其他什么事情他们可以做。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害羞的，并且注意到英国人的幽默感，我立刻说了一句俏皮的话，“是的，如果你可以让英镑自由浮动那将帮我们很大忙。”

芝加哥代表团的成员都笑了，但我注意到英格兰银行行长甚至没有微笑，其他英国官员看上去很沮丧。我感到很窘，我猜测我的玩笑开错了地方，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当天是 1972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

第二天早晨我们已经在米兰。当我们代表团起来吃早饭时，谜团解开了。当我打开英文报纸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报纸通栏标题是“英格兰银行决定英镑自由浮动”。如果这个巧合不是发生在我眼前我简直不敢相信。很清楚，英国官员对我的笑话不感到好笑的原因是他们这不是个玩笑。他们肯定刚开完领导层秘密会议，公众中还没有人知道他们已经做出了关于英镑的历史性决定。他们只能推断通过一些不知道的途径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决定，因此是在拧他们的鼻子。我觉得这次旅行不管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早就非常成功了。接下来的年月中，我会将这个故事作为 IMM 的力量的证据来讲述。

① 英格兰银行的别称。

30年前，军事坦克在战争笼罩的欧洲大陆上隆隆作响，现在我们是作为一个思想坦克在行动，在货币战争中作战。不幸的是，从那一刻起，我们的旅行走上了下坡路。我们抵达罗马时，原定要 and 受人尊敬的中央银行家嘉利博士会面，我们代表团多数成员都感到时差开始起作用，人很疲倦，在赫克斯特和弗罗斯特安排的每一场研讨会都缺乏听众，这让我们感到很泄气。实际上，情况越来越糟。有时，巴里·林德和我感到头晕，绝望地压制自己不笑出声来，我们试图用严肃的声调来谈论 IMM 的美丽，但一间屋子里听众比我们人数还少。这种情况下，和孩子一样，我们之间的一个眼神会让我们陷入不可控制的情绪发作。更重要的是，最新的生猪生产报告大大出人意料，导致美国肉类期货极度疯狂。我们代表团的一些人是交易员，他们正在丧失一个宝贵的交易机会。我们决定缩短我们的行程。除了约翰·盖尔德曼、马克·保厄斯和罗伯特·奥布赖恩，代表团其他人飞回了芝加哥。欧洲之行只是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美国 and 外国银行都不相信 IMM。一句古老的芝加哥格言概括我们的城市是还没有做好准备改革，看来欧洲是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自由市场。

从我们的欧洲之行回到 IMM 交易大厅，我需要面对现实情况。尽管 Merc 交易员和他们的新 IMM 会员伙伴尽力来交易货币，他们的买价、卖价和成交价像是处于幻想的土地上——和银行间市场的真实价格缺乏联系。简而言之，银行甚至是芝加哥的银行都不直接使用 IMM。我们交易员会读一条新闻报道，并对其通过买入日元或卖出马克来做出反应，但我们从来都不确定我们的价格和真实世界价格保持一致。尽管我参观过芝加哥和纽约的银行交易室，和银行官员见过面，做过演讲，我也不能说服他们直接到我们大厅来交易。他们对期货市场机制有种不信任，认为我们的交易员配不上成为他们商业客户的对手。一段时间我绞尽脑汁也无能为力。突然我有了答案。

我必须为银行再走一步。我必须发明一种办法将 IMM 和现货市场结合起来。我想这个答案就是套利。简单地解释，套利是一种自明的原理，当交易同一商品有两个市场时，经常会发生价格不一致的时候。套利者是一些利用这两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差来获利的人。这种应用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套利者可以简单地在价格比较便宜的那个市场买入，同时在价格比较贵的那个市场卖出。由此不仅套利者可以锁定一笔利润，他会使两个市场的价格互相趋于一致，最关键的是给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我决定，IMM 所需要的是在我们交易大厅和银行市场之间的套利者。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银行对我们个人会员的财务状况持不信任的态度。要成为套利者需要一定资本。此外，银行怎能肯定套利者不会利用套利的设施搞一些投机呢？例如，为他银行的现货市场账户买入比在 IMM 卖出的金额更多的日元呢？进而，如果判断错误，谁来承担损失？这是些困难的问题，但我想我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答案。我再次找了我大陆伊利诺伊银行的朋友，银行总裁再次出手相助。这次他

让我找大陆银行的律师，我们争出了结果。他们赢得了他们所有希望得到的可以确保系统安全的保证，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和银行间系统的直接联系。

我让 IMM 创造了一个被称为 B 类结算会员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这类结算会员只能和一个选择的银行进行货币套利交易而不能做其他任何业务。根据银行律师要求的财务安全原因，每一银行需要一个不同的 B 类结算公司。B 类套利者随后在这家银行开设一个账户来进行其自身的现货市场活动，而其 IMM 套利交易则通过他的 B 类公司进行。IMM 将向银行公布所有套利者在交易所的交易活动以确保 B 类公司的所有开口货币头寸和其在银行的现货市场头寸是平衡的。这个机制非常严密，而且不需要我们的会员需要有大的额外资本。莫利·利维成了第一个大陆银行套利者。后来我也在我的戴尔舍投资公司和大陆银行之间创立了一家 B 类公司，作为一个别人可以跟进的样板。我的桥牌朋友伯特·诺顿成了新成立的 B 类公司的套利者。

这个想法对于 IMM 来说是神奇的。在那些第一批 B 类交易员中包括莫利·利维、杰拉尔德·赫希和菲利普·格拉斯，他们为进行外汇套利的特权支付了 50 000 美元。例如他们会从银行购买日元并在 IMM 卖出日元期货或者相反。该系统实际上架起了银行和 Merc 交易大厅之间的桥梁——就像我知道的那样。最终我们的价格和真实世界结合了起来。没有 B 类公司，IMM 会像一门不精确的大炮，有时接近真实世界的价格，有时偏差很大。一旦有了 B 类公司，人们可以在 IMM 放心地交易，因为价格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对于我们的交易员来说，这是一个获利很高的情况。每个套利者都赚了钱，一些人赚了大钱。我记得伯特·诺顿在第一周套利交易后找我，给我看他的交易卡，说他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根据他的计算，他在套利第一周就赚了 10 000 美元。他说很可能他算错了，但实际上他没有算错。

在最鼎盛的时候，IMM 可能有 35 家不同的 B 类套利公司在和美国每一家大银行运作。不仅对于套利者可以获利，对于银行来说也带来了利润和新业务。最后，所有的纽约银行都开始参与 IMM。像亚当·斯密教育我们的那样，利润可以带来奇迹。我们赢得了尊敬、交易量和信誉。当然，随着 IMM 的发展，B 类套利注定要过时。一旦大银行意识到在 IMM 直接交易是安全和有利可图的，他们会最终决定他们不再需要中间人充当套利者。通过购买一个 IMM 席位，他们可以自己充当套利者，在市场两头获利。这正是我所希望发生的事情，不过当时这还得好多年后才变为现实。

B 类套利是一个特别的概念，这是 IMM 时代所需要的。但还有其他 IMM 创新是新市场所压给我们的。例如，货币现货市场变动那么快，我们的期货市场跟不上。期货有每日涨跌幅限制，决定了市场能在前一日收盘基础上上涨或下跌的幅度。这在农产品市场起作用，对 Merc 来说当时农产品市场是主要市场。一旦期货合约达到了涨跌停板，现货市场的交易实际上停止了。但在货币市场中，IMM 价格是第二位的，跟随着现货市场。当现货价格突破 IMM 允许的限制时，我们的市场就没有了交易。曾经发生过期货市场用了 10 天才跟上现货市场。对我来说很明显，旧的规则在

我们设立的新市场上不适合，我们必须创新。我打电话给保厄斯，告诉他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新办法来适应新的秩序。保厄斯接受了挑战，他想出了一个货币期货的灵活价格限制计划，可以让我们的市场迅速赶上现货市场。直到今天，在 IMM 货币市场上灵活价格限制仍在起作用。

我在 IMM 所犯的最大错误是野心过大。我曾一次上市了七个货币合约，在今天就不会这样做。我们在 1972 年一天内做的额现在可能要几年才能做。也许我希望我的热情能感染他人，冲向交易池和银行与经纪商的交易室，涌向公司财务官的办公室，用钱之河来取代谷物之河。我也必须指出，我希望在建立一个令人生畏的世界金融滩头阵地。一两种货币达不到这个目的。除此之外，外汇交易是互相关联的生意。我们交易的是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的相对价值，一种货币的每一个变化会影响所有其他货币。如果不懂这个基本事实，那么世界会忽略这一努力。

我第二个错误是设计的合约过大，影响了公众的参与。由于我急于讨好银行家和外汇交易员的商业性兴趣，我被说服批准了非常大的合约规模。这么做却是我的计算失误。尽管商业性客户会对大合约感到满意，但在开头的时候，只有很少的宝贵商业客户在 IMM 交易。而合约大小对于一般的投机者甚至是场内会员来说也太大了。因此 IMM 合约缺乏成功的中心因素：流动性——流向市场的买卖报单。幸运的是，在我决定采用较大合约的时候，我知道一个让我受用多年的秘密。如果你合约搞得太大时，你可以容易地将合约一拆为二。那些做多一手合约的人现在有两手——这没有问题。但反过来就行不通。如果你开始设计的合约过小，你会陷于一个陷阱。要告诉已经买了一手合约的某人说突然他只拥有半张合约是很困难的。当我确信 IMM 合约过大的时候，我成了只有一个使命的牛头犬，我拒绝听从商业客户的请求再观望一段时间。我迅速行动，将合约一分为二。这起了作用，但最终我将合约又一分为二，将合约大小砍至约 10 万美元一张，以使其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在那个水平时，效果不错。

在那里存在着新建一个市场的挫折感——你感觉到的靠近不归路的不安全的气息。每次我试图推一样新的东西，都有一种模糊的害怕，我会成为堂吉珂德式的失败梦想的追随者。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想法需要到世界上去检验。市场没有魔法，只有现实。没有人能让市场根据自己意志来运转。我必须等待出来结果，放弃对市场的控制直到市场成功或不成功。此外，如果有我可以弥补的失误，我会迅速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如果我知道这个失误是什么。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一点别的办法。

如果期货市场可以和里氏地震级数对应起来，那么在 IMM 开张后不久这个读数就达到了九级。那个夏天，苏联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小麦以抵消国内粮食歉收的影响。谷物之河在银行泛滥。根据当时的农业部长厄尔·巴茨的说法，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谷物交易。这次购买启动了解放商品的大牛市。全球范围内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对商品的公共敏感和意识。谷物、肉类和金属成为遍及全国的投机热潮的焦点。

从纽约的建筑工人到皮奥里亚的牙医到洛杉矶的理发师。每个人看起来都有一个哈里叔叔在一个高速市场上赚了一笔快钱。

在资金涌进这些市场的时候，不像许多处于剧变阵痛中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那样，这里没有焦虑和不安全感。相反，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创新和推出新想法的冲动。金融世界变化得太快，以至于不能在发现新的具有独创性的工具来对付不确定性方面太落后。我不打算坐等商业团体来赶上 IMM。我知道其他交易所也会有新想法。

在 IMM 开始后的一年左右，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当时由弗雷德·乌尔曼担任理事长，他的父亲创立了乌尔曼谷物公司，该交易所分离出去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在乔·沙利文的带领下，CBOE 成了第一家在有组织交易所交易股票认购和认沽期权的交易所。这不是小的创新。这成为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永久论坛，这个著名的公式是由费舍尔·布莱克和迈伦·斯科尔斯发明用来决定期权合理价值的公式。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还没有费心金融期货。这给了我们几年宝贵的时间专注来发展 IMM，没有竞争对手盯在我们后面。实际上，在 IMM 的最初几年里，CBOT 的官员对于我们进入金融世界的尝试的感觉和我们纽约同胞的看法差不多：这注定要失败。

亨利·霍尔·威尔逊是当时 CBOT 的总裁。他曾担任过约翰 F. 肯尼迪总统的助手，对于证券市场比对新的期货合约更感兴趣。我认为他的政治资历使得他有点瞧不起我们这些交易员出身的低一档的人。即使我是 Merc 的理事长，我要约见威尔逊先生也很困难。后来我学会了结识一个人秘书的力量，这个经验我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我不是威尔逊秘书苏·格林的私人朋友，我可能永远见不到他。

CBOT 对于金融期货的看法在沃伦·勒贝克取代威尔逊成为总裁后还有了很大的转变。勒贝克作为全国著名的蒙哥马利·沃兹商店的首脑塞维尔·阿弗莱的秘书和行政助理学到了他的本领，塞维尔·阿弗莱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坐在椅子上执行公务的。勒贝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来到 CBOT，于 1973 年成为总裁。一年以后，他带来了理查德·山道尔，他是一名出色的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金融学教授。勒贝克的举动对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来说被证明是最吉利的一个举动。1975 年，山道尔实际上通过将 CBOT 带入金融期货世界而拯救了交易所。

对于 IMM 前途的早期负面观点并不必然为 CBOT 的普通成员所共享。交易员是按不同的直觉来运作，而不是跟随某个大亨。例如莱斯·罗森塔尔看到了我们这里的动作，毫不犹豫地成为 Merc 的会员。他立即就成为一个坚定的 IMM 的鼓吹者。还有奥康纳兄弟比尔和埃德，他们是 CBOE 创立背后的推动力量，带来了部分 IMM 最初的公众交易。还有在 CBOT 力量很大的李·斯特恩和亨利·沙特金，他们影响了其他 CBOT 会员作出同样的举动。我和许多期货交易所会员的友谊开始于我接管 Merc 的时候，当时比尔·马拉斯是 CBOT 的理事长。即使 CBOT 被视为我们最大的竞争

者，我总是很尊重他们的会员，并且很骄傲可以成为那家交易所的会员。和 CBOT 会员之间的私人友谊在后来的岁月中给了我很多的回报。沃伦·勒贝克和里奇·山道尔成为我的亲密朋友，而且关系一直保持了很多年。20 年后，当比利·奥康纳成为 CBOT 理事长的时候，他和我战胜了各种阻拦和障碍，在我们两个竞争的交易所间建立了 GLOBEX 合作伙伴关系。

许多早期的 CBOT 会员购买 IMM 席位都是莱斯·罗森塔尔努力的结果。在 IMM 成立一年后，席位市场允许自由交易，我不希望冒险由于席位价格下跌让新交易所形象受损。因此我要求我的伙伴罗森塔尔，他是个非常受尊敬的 CBOT 会员，注定要在 1980 年成为 CBOT 的理事长，让他找一些朋友来通过购买 IMM 席位来支持 IMM。和惯常做的一样，罗森塔尔回之以兴趣，“没问题，利奥，你需要购买多少个席位？”IMM 席位价格守住了，结果是他的一些 CBOT 朋友做了他们一生最好的投资。当然，我也利用 Merc 的伙伴来帮助我支撑 IMM 席位价格。格兰·布罗马根是懦夫那赫特·布罗马根·赫兹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提供了一些关键的 IMM 价格支撑。布罗马根成了我最强的支持者之一，在芝加哥斯文森·吉尔莫公司的畜栏工作的时候被介绍到我们的市场，这个公司归约翰·吉尔莫的父亲所有。1986 年吉尔莫成为 CBOT 理事长。“我怎样才能帮你？”布罗马根慢吞吞地说，我解释了我所需要的。他让他的一些活牛客户购买 IMM 席位。每一个人的投资在获利出局前都翻了番。

随着期货市场扩张，芝加哥的政界认识到了期货市场对城市的重要性——就业、税收、隔夜银行存款和支持服务（在 1972 年 IMM 开张的时候，芝加哥没有一家外国银行；20 年后，城内有超过 100 家外国银行营业）。有史以来第一次，市长理查德 J. 戴利宣布 1973 年 11 月 12 ~ 16 日这一周为商品周。11 天后，在早晨举行的杰克逊大街和芝加哥河畔我们新 Merc 大楼落成使用仪式上，我敲响了一个自由钟^①的复制品，象征着“为自由人士开设的自由市场”。

IMM 和货币本身一样——它有价值是因为人们对它有信心。如同 E. B. 哈里斯指出的那样，市场代表了孕育经济力量的阴阳元素；交易员由于货币的不稳定而获得收益，而政府则力图保持币值稳定。在每个市场裂缝中都存在着机会，如果不同的市场同种货币价格不同，套利者就会冲进来获利。这个诱惑可能低到只有一美分的 1%（像超级套利者亨利·贾勒基反复证明的那样），执行速度决定了差别：一秒钟前的报价已经成为历史。

在运营后的第二年末，我感觉到随着一场大战的第一个胜利而来的一种信心，而最终的结果还分不大清楚。我非常想让会员和全世界知道前景是光明的。实际上，事情看上去比我敢于希望的要好很多，当然比我们紧密圈子以外的人所认为的可能也要好得多。在 1973 年给会员的年报中我洋溢着信心：

① 指美国费城独立厅的大钟，1776 年 7 月 4 日鸣此钟宣布美国独立。

新纪元也会给我们机会，来向金融参照系的其他潜力领域扩展。那是孕育 IMM 的价值观的核心，我们的新市场特别设计用来囊括越多越好的金融世界可行的交易工具。我们必须有意并准备好探索所有的可能性。

实际上，当 1974 年到来的时候，我们有了第一个机会来扩张我们的市场基础。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后，美国将放弃古老的禁止美国人拥有黄金的法律。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觊觎这个大奖的期货市场之间将有一场肉搏，但最终将只有一个获胜者。第一个问题是法律要等到 1975 年 1 月 1 日才生效。这给了我一个主意，如何才能超越所有其他的交易所。

伦敦几个世纪以来是世界黄金交易中心，每天“决定”黄金价格。但哪里写过伦敦是唯一可以给黄金定价的城市？为什么不是芝加哥？由于黄金交易商可以免除黄金交易禁令，为什么我们不能在 IMM 交易大厅立刻建立一个芝加哥黄金定价机制？如果我们能够那样做，等到黄金期货交易变成合法的时候，IMM 将会占得上风。这是一条在黄金交易上可以确保成功击败其他对手的道路。这有一个难题。要在美国建立一个黄金定价机制，我必须得到财政部的批准。在这之前我去了伦敦，第一手看看黄金定价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到我的常任黄金交易专家约翰·贾勒基那儿，开始建立一个芝加哥黄金定价机制，并找一些交易商来参与。我们甚至找了特别的一间房间来进行黄金定价。最后，我安排会见保罗·沃尔克，当时他是财政部主管这一领域的副部长，以获得他的批准。

“这不是向公众开放的交易，因此没有违反拥有黄金的禁令。”我对令人印象深刻的沃尔克先生说，他身高接近七英尺。

“我坦率地说，这很困难。”副部长说，他后来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联储主席之一。他所说的我全明白，看来这件事当时是无法办成了。但他对我还是很诚实，并没有给我绕圈子，我感谢他。

于是我试了另一种方法。1974 年 8 月初，我碰到了杰克 F. 贝内特，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我向他陈述了我认为是充足的理由，让他修改规定允许黄金期货早日上市，但交割直到拥有黄金成为合法以后才开始。规则所写的方式对于美国公民是不公平的。我解释说如果黄金价格在 1974 年 8 月和允许美国公民合法拥有黄金时的 1975 年 1 月之间大幅上涨，美国政府将受到公众的严厉批评。

“这就像欧洲人和其他非美国公民可以牺牲美国公众的利益来确保赢得一场赌博，”我说，“他们可以现在购买黄金，然后以高得多的价格卖给美国人。”

我差不多就抓住了稻草，因为这正是当时外国投机者做的。我坚持说黄金期货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一想法又一次需要研究研究，然后石沉大海。

终于 1975 年 1 月 1 日 IMM 开始进行黄金期货交易。如我预料的，我们并不是唯一一家。纽约的期货交易所 COMEX，这家交易所在很早以前成立以交易贵金属，也

在同时开始黄金交易。优势在 COMEX 一边。他们和世界黄金交易员的联系和长期以来金属交易的传统使他们容易赢得黄金期货市场。我公开告诉我们的会员我们需要进行一次非常激烈的战斗，而且机会不利于我们。但最终的奖励值得我们付出努力。此外，我很有雄心，COMEX 没有我们那样勇敢的交易员队伍。如果没有其他因素，黄金方面我们可以和他们并排前进。我们确实这样做了。

从一开始我们的会员就充满活力地应战，IMM 的交易量实际上比 COMEX 还大。我们两家已经把其他对手抛在了后面，这成了两个战士之间的战斗。黄金合约实际上直到近四年后世界笼罩在通货膨胀、利率提高和美国股票市场下跌时才真正活跃起来。但市场已经存在，开始利用剧烈变动的经济情况而发展。到 1980 年，在世界黄金高潮顶峰的时候，其价格实际达到了名义 850 美元/盎司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IMM 的黄金市场和 COMEX 黄金市场都欣欣向荣。实际上，IMM 能够持续地和纽约对手平起平坐的事实给了我们交易所一个胜利者的形象，我们的会员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我实际上相信我们最终能够获胜。我想了一切办法来保证我们能够获胜。

为了使我们交易所有关人员和伦敦黄金交易员建立更好的关系，我甚至带领 30 多个 IMM 黄金交易员到伦敦走了一次，同时参加在那儿的 IMM 办事处的开幕仪式。我们举行了会议，开了聚会，我们将伦敦城闹了个底朝天。想象一下把一群骄傲的芝加哥交易员放纵到尊贵的英国的情况。接下来的故事足够讲上一生。这一活动的高潮是在声望很高的戈德史密斯的金色大厅举行的半正式礼服的庆祝晚宴，邀请的是伦敦金融界的精英。我做了一个鼓动人心的主旨演讲，杰克·桑德纳和拉里·罗森伯格为女王祝酒。

当然，最好的部分发生在晚会结束后。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杰克·桑德纳无法为他的无尾半正式晚礼服打上领结，于是我让盖瑞·赫尔希将他的扣上式领结和杰克的领结换了一下。在晚会结束后的凌晨三点，杰克和一些其他人仍在我住的套房里欣赏睡前酒，突然电话响了。是赫尔希，有点醉，他想从杰克那里要回他的领结，并要求知道我的房间号码以便他过来拿。凌晨三点？我认为有点过分，为了扯平，给了他错误的房间号码。我想最坏的可能是他会吵醒一个陌生人。大约半小时后，有人用力敲我的门。来人是盖瑞·赫尔希，大声喊叫，准备敲开我的门。当开门后，赫尔希脸红红的，十分粗野，向我猛冲过来，想废了我。在其他两个交易员把他拉住以后，他解释了发生的事情。

“你看，当我来到 607 房，也就是梅拉梅德给我的房间号码，我看到门外有一双皮鞋准备送去擦。我想那是梅拉梅德的鞋子，我立刻拉开我的裤子拉链，向鞋子里灌了一点夜料。然后我敲响了房门。让我彻底沮丧的是一个七英尺高的昏昏欲睡的英国人开了门（赫尔希自己刚够五英尺半高），他眼睛朝下看着我穿着晚礼服，手里拿着他的还在滴答的湿皮鞋。我看到我的生命从我眼前飘过，但我急中生智说，‘先生，您的鞋明天七点可以擦好。’我头也不回就离开了，很幸运我还活着，我现在必

须杀了梅拉梅德和他房间里的每一个人。”

直到1983年，IMM和COMEX在黄金竞争中一直齐头并进。最终COMEX获胜，证明了我坚信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市场法则：同一期货产品不可能在相同时区的两个交易所同时获得成功。为什么IMM最后失败了？有各种理论，一些理论认为是芝加哥交易池里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从来不相信这是原因。实际上，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我必须假设纽约交易员在道德素质上要比芝加哥交易员高出一截。让我休息一下！我们IMM黄金市场败给COMEX，我的理由要复杂得多，而且真实得多。这和一种被称为“税收一跨时”税收递延制度有关。

通过使用期货市场，特别是像黄金这样高流动性的市场，人们可以采用一种价差技术，使得一个税务年度积累下来的利润可以转移到下一年度。这是一种合法的避税行为，税务规则中许多的漏洞之一。用一个税收跨时，你可以避免支付所得税。多年来，这是一个“内部”操作也就是场内自营商使用的做法。但随着我们市场知名度日渐提高，这种避税方法的使用也日渐多了起来。

但税收跨时有一个问题。和市场中的所有事物一样，这样做不是没有经济风险的。在一个人建立一个跨时交易——买入一个月份的合约同时卖出另一月份的合约，他会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因为两个合约月份之间的价差是不断变化的。但在COMEX价差交易可以在“闭市后”进行，也就是在真实市场关闭后进行。COMEX会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定在他们的“闭市后”交易中，合约月份之间的价差要稳定得多。不仅仅这样，在市场不动的时候建立一个跨时操作要容易得多。这种闭市后交易是根据COMEX一条古老的规则并取得了合法地位。结果COMEX吸引了大量税收跨时价差交易，而IMM则没有。这显著增大了他们黄金期货合约的持仓和交易量。尽管税收产生的交易和两个黄金市场的相对成功没有关系，世界将COMEX更大的持仓量看做是他们黄金市场比IMM更具有流动性的证明。实际上，COMEX闭市后交易只不过是為了避税而采用的一种计谋。当我向CFTC上诉请求批准IMM也采用一种类似的闭市后机制时，CFTC拒绝了。当我抗议这种做法显失公平，结果会导致IMM失去黄金市场时，我的请求无人理睬。CFTC既没有勇气停止COMEX的做法也不允许IMM来竞争。税收跨时引起的争议持续了数年。最终，美国国会完全禁止了这种做法，但那时IMM已经在黄金市场竞争中战败。这是唯一我们输给另一交易所的市场。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8 章

联储来了

秘 鲁凤尾鱼改变其交配习惯的精确原因还笼罩在神秘之中，但毫无疑问它们改变生活方式的结果导致了作为家畜饲料的美国鱼粉供应短缺。此外这也导致了一种称为夸内的鸬鹚离开了秘鲁海岸以寻求更具吸引力的地平线，显著降低了世界海鸟粪的供应。鸟粪中氮含量很丰富，海鸟粪是廉价肥料的主要依靠。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大自然的这些改变对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美国食品—价格螺旋式上升”是关键性因素，导致一些古怪和严肃的国家反应。其中一件事，这种变化导致 1971 年尼克松总统的价格控制政策——在福特总统的 WIN（立即控制通胀）计划达到了顶峰。另一件事，导致了立法创建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这是监管期货市场的联邦机构，通常简称为 CFTC。

尼克松的价格控制可以预计是一个灾难。作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市场教义的信徒和非常自由市场机构的理事长，我对价格控制的责任特别强烈，并带领 Merc 投入了废除价格控制的战斗。这一争议事件持续了数年。

开头的是尼尔·史密斯，好争吵的艾奥瓦州国会议员，他认为食品价格上涨是

个理想的政治舞台。他选择了商品市场，特别是活牛交易，作为他选战的中心议题，声称这些市场需要得到控制。史密斯先生说，芝加哥交易池里的阴谋诡计，特别是活牛期货，应对美国肉类价格上升负责，他们将正常的利润从爱荷华州的农民手中抢走。尽管尼尔·史密斯对商品市场没有联邦监管权，他是小企业特别问题子委员会的主席，利用这个伪装进行商品市场错误利用和滥用问题听证会。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操练我的意第绪语的舞台雄辩技巧，也许是国会议员第一次听到如此进取和英勇的保护期货市场的演说。但对于期货市场的死敌尼尔·史密斯来说，要将我们的市场作为他的主要焦点——这一点使得我们业内所有人义愤填膺。毫无疑问的是，他和他所吸引的其他商品市场敌人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特别是如果他的听证会导致对交易所的立法。更糟的情况是，议员的指控找到了一个不幸的回声，即当时发生的全国最大的商品期权交易商，贝弗利山庄的戈德斯坦·萨缪尔森公司倒闭的丑闻。尽管当时期权和期货市场没有直接联系，噪声已经将我们全部淹没了。

因此我们求助于鲍勃·玻阿格——权力很大富有传奇色彩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他是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传统上对我们的市场拥有立法权。玻阿格不懂期货，也不关心，但我们设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至少也要阻止史密斯窃取立法权。1973年6月，玻阿格主席将商品市场问题授权给众议院农业委员会法律顾问约翰·瑞恩伯特。

当时我们仍然不关心政治，到华盛顿就如同孩子进入了森林。有些议员对我们的市场有一些了解，但更多的是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看做是一个商会组织，如果他们曾经听说过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他们认为那是一家银行。结果我们的市场实际上没有什么名气也不受监管。商品市场的监管技术上属于农业部下一个不起眼的部门商品交易管理局（CEA）。这一安排对于期货行业的几乎每个人来说都是个好的安排。警察越少越好。

但突然我们受到了攻击，现在要指望约翰·瑞恩伯特来拯救我们不受尼尔·史密斯的攻击。瑞恩伯特和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约翰·奥尼尔及其他职员和华盛顿内部人士交换了意见，决定农业委员会最好召开自己的听证会。这是华盛顿一个相当正常的防卫战术。很快瑞恩伯特来找 E. B. 哈里斯，哈里斯立刻向他指出了我。

于是，在史密斯听证会后，我又一次成为一个明星证人，这次是在众议院农业委员会，我们称之为“友好的”听证会。尽管瑞恩伯特开始听证会的时候采用了防守的策略，就像华盛顿特区经常发生的那样，后来事件占据了主导，于是创建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来监管商品市场的想法应运而生了。

对于这个议题我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像我们行业其他人一样，我反对更多的联邦监管的想法。自律监管是我们的信条——我们可以自己监管自己。但我当时的修辞是严格外交辞令的，我公开欢迎 CFTC。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我愿意和一个联

邦机构一起生活，但不是在奥威尔^①式的阴影下。我不想每个交易池都有一个警察，我也不曾想等到联储带着“关闭酒厂”的想法向我们猛扑过来。我们是合法的、半公众的机构，当然也足够老练可以制定我们的政策进行自律监管。我们从被一撮鸡蛋交易员控制的“每月逼仓俱乐部”的日子已经走到很远了，那些日子我曾经要求每一次让 CEA 的管理者亚历克斯·卡德威尔站在鸡蛋交易池边，看上去他在观察交易（不幸的是，他从来没有来过）。那些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但就像我说的，我的感情是复杂的。我明白直到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联邦机构，否则我们这个行业就永远得不到尊重。按照定义，尽管听上去很讽刺，任何可以自夸拥有联邦机构的努力肯定是重要的和合法的国家事业。每个成功的行业都有一个对应的联邦机构，不管是银行对应于联储，还是证券对应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此外，我毫无疑问我们引入金融期货将导致该行业有巨大的发展，增强其显著地位和可能的恶名。一个联邦机构可以作为我们和期货市场敌人之间的缓冲，而期货市场的敌人有很多。

在我看来，联邦监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结果成立，为什么不在这一过程中扮演角色以影响其结果呢？奇怪的是，我的第一个直觉是支持 SEC，后来我的想法有了 180 度的转弯。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在金融期货、期权和衍生品站住脚跟之前，农产品是期货市场的国王。SEC 不会想要我们任何一个部分。我们是谁？不管我们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我们肯定不是金融。我们是拉萨尔街，不是华尔街。

但最重要的是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计划，只有联邦机构才能执行：在我们的市场中废除必须进行实物交割的要求。实物交割是一件紧身衣。按照定义，这种交割方式排除了一大类可以在期货交易所交易的产品。简单地说，有一些工具是无形的，不能实际进行交割。其一个，多年以前在和 small 埃默·福尔克谈话时提起的，开始在我头脑里秘密地流淌。也许，我安静地想，一个联邦机构可能会有勇气向期货市场打开一个全新游戏的大门。

到 1973 年末，约翰·瑞恩伯特说服玻阿格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进行必要的立法。该委员会开始了其工作，和行业领导人会谈，甚至访问了 Merc 和 CBOT 的交易大厅。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访问商品交易所。随着进程的进行，我们中的一些人沉浸在其中，成了立法过程中的特别顾问。在和 Merc 律师杰瑞·萨尔兹曼以及 CBOT 对应人物交谈后，我告诉瑞恩伯特在一些条件下我们可以支持立法。首先，法律必须明确只有在一个授权合约市场（交易所）才能交易期货合约。这样一个条款在保证交易所的持续运作方面是基本的。其次，新的机构应当有排他监管权。这一点上，瑞恩伯特和我观点一致。但最后分析中，是 CBOT 的总法律顾问柯克

①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作家，其极富想象力的小说猛烈攻击极权主义并反映对社会平等的关注。作品包括《动物庄园》（1945 年）、《一九八四》（1949 年）。

兰和埃利斯事务所的菲利普·麦克布莱德·约翰逊，写就了法律条文以确保 CFTC 将拥有排他的对期货的监管权，禁止 SEC 或州的监管者来监管我们的市场。

最后，我们要求新机构在决定诸如交割类型（实物或其他方式）、双重交易、自律监管、创立全国期货协会等事情上拥有行动的自由。我们的观点是这些复杂的事情不能预先确定，最好是留给联邦机构以后决定。当然我们的推理是，由于交易所在这方面是专家，我们的思路最终会占据上风。对我来说特别的考虑是确保该机构批准新合约时不采取经济论证作为前提。我恐怕这样一个条件会压制所有的期货市场创新。在包括了这些内容后，该法案最终编为 H. R. 13113 号，后来包括了五个不同的标题。

1974 年 5 月召开了新的听证会，我告诉农业、营养和森林委员会委员，Merc 不反对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也不反对提议立法中的很多条款。但我希望国会了解我感情上有所保留。我仔细地不要说得看不起我的听众。我的想法不是要疏远他们而是要教育他们；不是让他们被我所知道的所震住，而是让他们感觉平静。洋葱丑闻教会了我，要让国会采取行动并不一定需要非常大的选民规模。由于我明白当前的事情是食品价格螺旋式上升，选民的声音宏大而响亮，我最不希望的是国会像洋葱案例中那样指责我们。

我的声音温和让人放心，我的脸皱眉表示关注，但我并不干巴巴或太技术性。我的信号是独特的。“主席先生，”我说，“莫斯科没有商品交易所，哈瓦那没有期货交易所。这些国家的农民没有提供价格保护工具的必要，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制定购买农产品的价格。只有在美国农民才能生产多于我们自己所需的农产品。”这些话被设计用来取悦于国会的自由市场精神，并解释了我们市场的价值。

Merc 的天才广告专家马蒂·科亨坐在听证室里。当他听到我的话后，他突然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使得他获得了当年广告界最渴望的大奖。该广告画了不存在的莫斯科和哈瓦那的交易所，问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些地方为什么不存在这样的交易所？这幅广告色彩丰富、吸引人，并给出了一个尖锐的信号。该广告成了著名的 Merc 招贴画，供应量从来都不够。

我也试图澄清对于提高的食品价格我们市场所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信号器”实际上是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之一。“按照定义期货市场必须给我们提供一瞥未来将要到来的情况。”如果这些市场没有预测即将到来的高价格，那么它们的功能就没有发挥好。实际情况是期货市场表现得很好。

最终，参议院也完成了其程序，CFTC 法案顺利在两院通过了。然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约翰·奥尼尔和约翰·瑞恩伯特投硬币来决定谁给新机构命名。奥尼尔获胜，该机构被永久定名为 CFTC。

当所有这些事情在我们世界的小圈子内进行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水门事件”的阵痛。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杰拉尔德·福特将接任总

统。同时，农业部长共和党人厄尔·布茨认为我们不需要另一个联邦机构，威胁着要让总统否决该法案。在他这样做之前，布茨要求约翰·丹姆嘉德——他手下的一个聪明的年轻职员，他实际上对我们市场有一些了解，要求他写一个备忘录，说明CFTC法案的利弊。在尼克松辞职、杰拉尔德·福特接任总统之后，看上去已经决定要总统否决CFTC法案了。实际上，福特的新闻秘书已经向媒体公开宣布该法案将被否决。最终没有被否决。一些支持我们的共和党人，在最后一刻，说服了总统在向他的朋友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鲍勃·玻阿格征询意见以前不要否决该法案。玻阿格在私人层次上赞同该方案。现在约翰·丹姆嘉德的备忘录变得十分关键，因为该法案向总统解释了我们行业。手里有了丹姆嘉德的备忘录，福特要求对该法案的部分缺陷进行修改，玻阿格同意了。尽管福特仍有许多保留，他还是签署了该法案。总设计师约翰·瑞恩伯特因为其努力获得了总统的签字笔。

走到外面的还会回来。非常合适的是几年后约翰·丹姆嘉德担任了我们行业的一个重要职务，在期货业协会FIA的创始总裁约翰·克拉吉特退休后接任了该协会的总裁。丹姆嘉德使得FIA成为今天令人尊敬的行业协会。

这就是CFTC法案的传奇故事。我们市场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大戏现在转到白宫任命新的独立联邦机构的主席和四个委员了。这成了当时在白宫人事办公室官员贝弗莉·斯普雷恩的主要职责。她向总统的推荐很可能成功。斯普雷恩向我证明了政府不是总是不好的。这是我所碰到的最聪明、最负责和最具表达力的人之一，确实是为政府工作。除此之外，作为一个芝加哥本地人和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她和我一样是自由市场信奉者。在贝弗莉·斯普雷恩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活力十足、天资聪慧的31岁女士，对期货业怀有感情。作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具和涂色工的女儿，她在密歇根州的弗林特长大，获得了汉语学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MBA。斯普雷恩在波士顿做管理咨询，后来作为白宫助手加入了福特政府。

我们首次见面是在白宫后面的老总裁办公室大楼，我们讨论的问题包括双重交易、保证金和交易所结算部门的运转。在我以一种指南方式解释时她一边听一边记了很多笔记。会面很亲切，我发现斯普雷恩学得很快。从那时起，每次她碰到问题，她会打电话给我，很快对我们市场有了相当的认识。作为回报，斯普雷恩成了一个无可估量的同盟，在立法过程的关键事情上做了很多幕后游说工作。

但我知道的是，她有一些秘密的危险想法差点改变我个人的历史轨迹。当时我在夏威夷，和贝蒂度一个很久以前预定的假期，参加一个全国桥牌锦标赛。一天早晨4点，我被贝弗莉·斯普雷恩的电话惊醒：“梅拉梅德，我已决定向福特总统推荐你担任CFTC主席。”

从深深的睡眠中惊醒，我被这个声明完全惊呆了。最后，我恢复了感觉，我喊道，“贝弗莉，你疯了！”

“见鬼，我是疯了，”她回答说，“已经决定了。”

这是世界上我最不愿意的事情。我现在刚开始 IMM 的事业，充满了想法、精力和计划让该交易所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交易所，突然这个华盛顿官僚要把我膝盖处砍掉。我沉思着，地狱之路真的是由好心铺设的。我当然知道一旦总统正式邀请我出任，再要拒绝将非常困难。

“贝弗莉，听着，”我恳求到，“至少在你我面对面会谈前不要做任何事情。我会立刻搭乘一架飞机去华盛顿，尽快和你见面。”

斯普雷恩不情愿地答应了。贝蒂和我冲向一架飞机，在桥牌锦标赛中间离开夏威夷——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到了华盛顿，我用了我所有的说服力量向斯普雷恩解释在私有部门带领 Merc 和期货业比我为国家服务好得多。她仁慈地看清了情况，把我的名字从推荐名单上划掉。

1975 年 3 月，总统行动了。约翰·瑞恩伯特被恰当地任命为他帮助创建的委员会委员，后来成为其副主席。另外三个委员是里德 P. 杜恩，一个老牌棉花交易员和国际棉花协会的执行总裁；罗伯特 L. 马丁，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前理事长和盖瑞 L. 西佛，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尽管西佛有一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农业经济学，他克服了这个农业背景，很快成为新委员会的内部金融产品专家。西佛成了我的同盟，在我们最终的国库券和欧洲美元合约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后来，西佛去了高盛公司并成为其合伙人。1986 年，西佛成为 CME 的理事。

命运并不像会计那样精确。CFTC 主席是威廉 T. 巴格莱，他是前加州下院的议员，在竞争加州审计官时惜败，他对期货市场一无所知。巴格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伯伯特·霍尔法学院的毕业生，是一个政界人士。他也是一个可爱的人，很容易交朋友。让人想起喜欢白色领带和吊带裤的绅士，巴格莱是在政府监管开始放松的时代来到一个新机构的。巴格莱将 CFTC 看做一个由公众要求引起的国会行动的例子。但他很快注意到机构并不是由于行业丑闻或行业要求结果而创建的。尽管他不懂我们的市场，他还是立刻喜欢上了它。

巴格莱有着我所知道的最为自由的精神，一点没有禁忌，很难让人不喜欢他。他的滑稽富有传奇色彩。一次，在参加伦敦的一个期货会议时，我到了伦敦最豪华的餐厅之一的米拉贝尔饭店，巴格莱离我有几张桌子远。当他发现我后，他毫不犹豫地双膝跪下，挪到我的座位旁，握住我的手，吻我手上的一个想象中的戒指。餐厅的服务员惊得目瞪口呆，他停下一切事情充满敬畏地看着 CFTC 主席用高昂的舞台台词语说道：“哦，教父，您真好，能接受我这个卑微的仆人！”这是最佳的巴格莱。

我的伙伴亨利·贾勒基有一个更精彩的关于巴格莱主席的故事。当贾勒基和我在第一届 CFTC 顾问委员会任职的时候，我们发现对于期权我们的观点相反。期货的期权在美国市场是禁止的，贾勒基是一个职业的期权交易员，希望废除这个禁令。我不能确信，我认为尽管期权表面上有用而且友好，但期权可以变得十分复杂而危

险。我知道，交易公众并不足够老练来使用这个金融工具。

这些个人怀疑单方面地使期货期权批准延迟了几年。最后我妥协了，因为 SEC 批准了在竞争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期权。期权后来确实发展成为特别复杂的工具，尽管今天期权市场很成功，相比 20 世纪 70 年代有多得多的老练交易员会利用这个市场，我仍然有疑问，例如当今奇异类型中的内嵌式期权在市场上造成了危险的金融风险。

但在那个时候，贾勒基和我都同意职业交易员应该免除各种禁令，因此我们向巴格莱游说。尽管巴格莱尝试帮我们忙，但他无法说服国会立法者。免除要求被拒绝了。巴格莱因为他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很困窘，CFTC 主席问贾勒基禁令会让他损失多少钱。

“哦，没什么。”贾勒基回答。

“不，不，”巴格莱坚持说，“我要知道 CFTC 因为这个禁令给你带来多大损失。”

“好，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是 2 400 万美元。”贾勒基说。

没有任何慌乱，CFTC 主席打开他的私人支票本，写了一张 2 400 万美元的支票给贾勒基。贾勒基把玩笑开下去，他接受了礼物，放进了自己的西装口袋。故事可能到此结束了。但当天晚上贾勒基乘长途车回纽约，他的西装和别人搞混了。那个人结果是约瑟夫·克拉夫特——著名的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他惊奇地发现在西装口袋里有一张 2 400 万美元的支票，由一个政府机构的主席付给亨利·贾勒基。尽管恶作剧的细节最终得到了澄清，一开始还成为《纽约时报》的一条爆炸性新闻。

巴格莱作为主席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任命贝弗莉·斯普雷恩担任 CFTC 的第一执行理事，这让一个职业人士来负责新机构建设，创立部门，招募职员。斯普雷恩将新生的 CFTC 建设起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我不会忘记。

这个时候，肯·麦克凯将要退休，我希望替代他新设一个执行副总裁职务。我需要有人帮助我管理由于迅速发展带来的交易所人事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对我来说明显的候选人是贝弗莉·斯普雷恩。我和她在华盛顿见了面，一起吃晚餐时我向她的提供了这个职位。我们的角色倒了过来。一年前，她设法让我担任主席，现在我设法让她为我工作。尽管她担任 CFTC 的执行理事只有九个月，她接受了我的邀请。

说服我的好朋友和新任 Merc 理事长约翰·盖尔德曼把她作为该工作的最好人选丝毫没有问题，因为斯普雷恩的保守政治观点和盖尔德曼的彻底共和党观点完全啮合。但我知道要说服理事会要难一些。这是 1975 年，在金融界的高层中还只有很少的女性任职。实际上，贝弗莉·斯普雷恩将要成为美国交易所的第一位女执行副总裁。但 Merc 理事会成员的任何保留都只能自己留着。

斯普雷恩替代麦克凯真正结束了一个时代。他已经在 Merc 待了 48 年，所有

Merc 雇员中他的历史最长。斯普雷恩的任职是与 CFTC 的主要交易的一部分。马克·保厄斯，他通过创立可交易的货币和利率期货合约将理论应用到了实践，在服务了十年后打算辞职。我成功地说服 CFTC 任命他为首席经济学家——这是该机构新设的一个职位。想起旋转门，这次任命不仅成为马克职业生涯中的进身之阶，而且是保持 CFTC 走上正轨的一个保险政策。这仅是将期货业天才输送到政府管道的开始。

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时代。1974 年 8 月 9 日尼克松总统辞职。价格控制成为古老的历史。其遗产 CFTC 是我们的未来。从事后看，如果我要就 CFTC 在期货市场发展中的价值和扮演的角色做一评价，我毫无疑问地会做出正面评价。不错，在我们业内许多人认为对我们持续扩张很重要的事情上该机构经常会挡我们的道，有许多次战斗，有一些是我领头的，一些我们失败了，一些我们胜利了。实际上，有些人会说我们的行业尽管有 CFTC 仍然繁荣。但我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一个公正的评价必须超越个人的事务，超越很多小的争论，超越在私有部门普遍存在的一般的反政府态度。有许多关键事情上可能会对我们的潜力加以限制，但结果却对我们有利，很大程度是由于 CFTC。总之，CFTC 为我们的行业服务得很好，结果也满足了美国金融服务业的最大利益。

必须说，除了其主席和委员，是 CFTC 的许多天才职员产生了正面的结果，同样重要的，保护了期货市场的地盘不受 SEC 和其他竞争性市场的侵入。不可能全部列出他们的名字，但就我所知，像交易和市场部的托马斯·卢索和安德里亚·柯克兰这样的职业人士在我心中就很突出；同样，法律部的霍华德·施耐德、杰克·该隐、马歇尔·汉伯利和肯·雷斯勒是非常有效率的，以及经济和教育部的马克·保厄斯和保拉·托西尼；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执行部门一个机构就不能有结果，我需要单独提一下丹尼斯·克莱尼亚，他在这个方面工作超过了十年。这些职业人士以及其他，从 CFTC 成立以来就为其服务的人都值得我们的赞美，我一个人，给他们成绩的评价要远远高于这个联邦机构给人的总体形象。

在尘埃落定的时候，我写了这首《价格控制颂》，我在我们一次会员大会上吟诵。

我希望记录，仅仅是为了娱乐，
71 年价格控制是怎样发生的。
故事可以成为未来的教训，
如果我们的经济很糟糕，
因此当这一切已在六英尺的地下，
我们是犯了怎样一个经典的错误？
未来的人们，我命名的这首颂词，

女士们先生们请听我说——

民主党人说：

下一次需要主张的事情，
是上涨的价格以及它们预示的事情。
我们需要一种看上去不错的补救，
一种吸引人和让人理解的补救。
“价格控制”，当然这满足了需要！
一个立刻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这样可能结果很糟，
导致短缺、混乱，这太不幸了。
但那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
我们创造问题，然后就是看他们的了。
老党[⊖]永远不会批准这个方案，
这反对自由市场机制。
那么我们可以指责价格上涨，
是因为共和党在危机时刻不作为。

共和党人想：

民主党造了一个聪明的陷阱，
我们可能代人受过的事情。
这会让我们失去很多选票，
通货膨胀会扼住公众的咽喉。
但我们也可以玩这场贴标签的游戏，
在政治专有技术上我们也不落后。
我们会掀翻他们安排的小小桌子，
我们也会加入价格控制的队伍。
当然，这样可能结果很糟，
导致生产下降，这太不幸了。
但总统永远不会玩这个调子，
让国家走向毁灭。
他会毫不羞愧地忽略控制，

⊖ 指共和党。

那么没有人可以指责。

媒体和新闻界说：

报道新闻是我们的义务，
要寻找事件或是它们的变种。
通货膨胀已成为可怕的敌人，
我们需要一个让它迅速受控的方法。
国会动作看上去很好，
为什么总统不去做他分内之事？
当然，这样可能结果很糟，
被证明是反动的，这太不幸了。
但至少这可以管一阵子，
价格上涨会成为一种罪过。

劳工领导想：

我们的工人已经碰上了价格上涨，
必须做些事情来结束危机。
一个自由经济是好的，
但我们的美元坠入地狱就不妙了。
价格控制是我们所需要的，
(但工资不能控制——上帝不允许！)
当然，这样可能结果很糟，
导致就业减少，这太不幸了。
但那时我们可以指责立法者，
因为他们是坏法律的制定者。

消费者鼓吹者支持：

大企业管理着美国，
他们让小人物付钱付钱，
我们是他的拯救者——无知的笨蛋。
我们提议的是一根魔杖，
手一挥价格就下来了。
这个东西就是控制，它们的作用像魔术，
他们会停止利润，但那不是悲剧。

当然，这样可能结果很糟，
导致囤积和恐慌，这太不幸了。
但如果它们像古代伏都教[⊖]一样，
他们我们会得到名声获得奖赏。

商业管理层说：

危机必须加以终止，
我们必须修补公众形象。
控制会安抚公众情绪，
如果我们赞同这样做看上去不错。
当然，这样可能结果很糟，
导致生意清淡，这太不幸了。
但如果我们反对太过强烈，
会被错误地理解。
因此让我们希望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要理睬。

总统顾问的劝告：

这些控制很糟，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如果我们只用一会儿，
一种大选间的实验，
这不会损害我们的保守风格，
也许不会堆积很多损害。
同时我们可以得到政治分数，
通过平抑家庭主妇增加的愤怒。

总统说：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控制
这不是风暴的答案。
这会搞乱美国的经济，
导致短缺和配给。

⊖ 一种主要在加勒比海国家尤其是海地流行的宗教，由罗马天主教仪式原理和达荷美奴隶的泛灵论和魔法结合而成，其中一个至高的上帝统治着包括地方神、监护神、神化的祖先及圣者的万神殿，他们与信徒在梦境中、梦幻之境和宗教仪式的领地进行交流。

这会导致像物价管理局那样的官僚，
他们会导致不平等和混乱。
但等等——让我们看看事实，
控制是国会法案创造的。
民主党和老大党他们批准了，
他们选择了向我推卸责任。
新闻界赞同它，媒体也是，
反对者都安静而且人数很少。
劳工要求立刻采取行动，
如果我不做会看上去像个傻瓜。
消费者认为是个神奇的符咒，
价格会铃一响就下来。
企业界赞同它，他们肯定知道，
什么对国家经济是好的。
我的顾问同意，如果使用一会儿，
可能不会累积很多损害，
我看不到这点多么愚蠢，
如果每个人都赞同，他们肯定是对的。
它们会帮助平息公众的愤怒，
它们会打碎螺旋上升的火苗。
也许它们是神奇的——你不能肯定，
任何行动可以是正确的药房。
当然，这样可能结果很糟，
但国会也通过了法律，太糟了。
这个故事很滑稽，如果不是那么坏的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有了。

第三部分

未来与从前不一样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19 章

酸性试验

如果我必须要选出在 IMM 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那就是 1976 年 8 月 31 日，当天墨西哥比索贬值 50%。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异常震惊的事件，可以说是当时最为严重的一次货币贬值。全球外汇市场一片混乱，没有人能够为墨西哥比索报价。没有人，当然，除了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的会员们之外。我们的市场业务如常，继续全面运转着。突然之间，我们站在了舞台的中央；突然之间，IMM 的比索市场成为全球货币价格的焦点所在。

这在 IMM 历史上是一个辉煌的转折点。金融世界第一次认识到了期货市场的巨大价值。1976 年比索危机向甚至是最为倔强的怀疑者们证明了期货市场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为全球的套保用户和投机者们提供价格。IMM 顿时声名鹊起。不过，这样巨大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首先，我当初从没想过在 IMM 挂牌交易墨西哥比索。我那时为这个市场极力推崇的是交易那些由市场供需情况自由定价的工具。而我们又怎么能交易一种根据政府指令定价的货币呢？当然，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墨西

哥比索并不包括在 IMM 的开业产品花名册上。这完全都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方式下发生的。

在我们宣布推出新的货币市场大约一个月前，我接到了有一个国务院打来的陌生电话。他们希望碰个面，讨论一下我们的计划。国务院为何会对我们新的 IMM 产生兴趣呢，带着这种疑问，还夹杂着些许忧虑，我做了必要的安排。

“我们听说你们并不打算挂牌交易墨西哥比索，”当那位官员在 Merc 大厦五层楼我的办公室里落座后，他说道，“这是真的吗？”

我吃了一惊，并解释说我们对于上市一种固定货币还有些犹豫。这不会使自由市场中的价格产生动荡。这位官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不过却解释说国务院害怕墨西哥政府会把这种举动视为一种侮辱。

“你知道，”他严肃地说道，“你们上市了加拿大货币，他们是我们北方的邻居，不过却遗忘了我们在南边的邻居。我们觉得这可能会造成外交上面的冲突。”

我哭笑不得，不过我还是受宠若惊，因为 IMM 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居然如此重要。另一方面，我又担心听到我们已经做了错事。我不希望出现外交上面的冲突。我决定有勇更要有谋，便召集 IMM 临时委员会开会。墨西哥比索很快便被加入到 IMM 的标价牌上。当然，数年之后，因为墨西哥国内的限制性政策而无法交割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将比索摘牌。在 1994 年危机之后，墨西哥政府最终将比索从政府管制下解放出来，而这个货币单位重又回到 IMM 进行交易了。

但在 1976 年，也就是 IMM 开业的四年后，比索就像是在我的雷达屏幕上伺机出现的敌机一样。实际上，大多数市场观察家对比索贬值并不感到吃惊；只有确切的发生时间和规模人所不知。而正如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市场无所不知。我的意思是，从 IMM 交易伊始，比索的远期价格就是贴水。也就是说，市场一直预测比索在未来的价值比现在低。几年过去了，这种远期贴水程度越来越深。而这个现象使得比索成为一种获利丰厚的逃税手段。简单来说，你买下远期比索合约，并同时卖出一个近期合约。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远期合约的价格将会持续上升，补掉贴水，因为在到期日——期货和现货价格重合，它将是官方现货市场的汇率。如果你持有远期头寸达六个月甚至更久，你便有效地将你的利润转化为资本收益。同样，虽然这样做更加危险，你还是可以买入远期合约，并牢牢地攥上六个月，这可是一桩稳赢的买卖。

IMM 对这桩“稳赢的买卖”的议论开始传播到世界货币买卖圈子中，并吸引了许多大玩家的注意力。不过，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稳赢的买卖”。如我一次在西北大学的讲座中向同学们问得那样，“你们认为谁会出卖这些价格低估的期货合约？”一个扔钱的傻瓜？当然不是！期货价格贴水是因为市场知道比索的价值低于官方汇率。市场预计到了最终的贬值。换句话说，出于商业上的利益，有些人愿意以一个较低的汇率卖出远期比索，作为对将来他们预期的价格下跌的对冲。尤金 T. 穆勒是我们 IMM 的忠实拥护者之一，这个聪明的交易商狂热地相信对比索的大清算正在到

来，市场上的空头将会大赚一票。年复一年，穆勒一直在沽空比索，虽然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过对于因此而生的巨额损失，他也是一笑了之。“我的好日子会来的，”他常常对那些愿意听的人这样说。唉，对于那些固执地与市场作对的人来说，总有这样一条悖理乖张的市场法则。它又一次应验了。尤金·穆勒最终还是平仓放弃了，而这恰恰是在他朝思暮想的日子到来的前夕。

随着真相揭晓的一刻在1976年越来越近，我们在IMM中的一些人变得愈发担心起来。IMM要求的保证金，就像所有的期货合约一样，只占合约价值的很小一部分。在价值可以自由调节、每日赢退亏补的市场里，这是可行的。但在一个像墨西哥比索这样的盘子，其价值本身就是虚的，这种制度因此就充满了危险。正常情况下的保证金根本不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程度剧烈的贬值。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客户为墨西哥比索多头的清算公司可能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垫付价值上出现的变化。

起初，清算所主席巴里林德清楚存在这种风险，不过他仅仅只是提高了比索合约的保证金。“坚决不能危及我们的财务平衡，”林德冲我们这个不大买账的理事会叫嚣道。可是当保证金率抬高到合约价值的10%左右后，我们意识到如果再如此下去，这个市场就要关闭，这对IMM的形象是不利的。而且，如果贬值率达到25%或是30%，交易所的财务平衡便会岌岌可危，一些清算会员可能会穿仓。因此我建议采取一项非常的保护措施。巴里林德立刻领悟了其中的概念，随后我们一起力促通过一个特别规则，要求那些持仓比索合约的清算会员将额外一部分资金放入清算所——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资金，即他们客户所持合约价值的30%。这是一个残酷的要求，我能清楚地听到清算会员们的尖叫声响彻芝加哥。不过作为理事长，我知道我已经立下了规矩，危急时刻必须权威说话。

马杜夫公司手上的墨西哥比索合约看多仓位是最高的。该公司的东家——西德尼·马杜夫，这个在1971年猪腩逼仓事件中逃过一劫的家伙，在新的资金追缴要求宣布时吵吵道“这是惨无人道的谋杀”。他威胁要起诉交易所。

“那个客户，他就在我的户头上做墨西哥比索，”他冲着我叫嚷道，“这个人的钱比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还要多。你竟然害怕他补不了亏空。”

“西德尼，”我一边尽量保持镇静，一边反驳道，“我不知道你的客户是谁，我也不想知道。如果你不把资金补上，你就平仓出局。”我向马杜夫指出，交易所与客户不发生直接关系，而只同它的清算会员打交道。另外，如果他的客户这样阔绰，为什么马杜夫不从他那儿搞些钱补上呢？

“你知道你在说谁吗？”马杜夫嗓门更大了。“我的客户是拉摩尔·亨特。”报出亨特的大名只是为了吓唬我一下，企图让我马上向马杜夫道歉，并取消保证金的要求。不管怎么说，亨特先生也是个得克萨斯的亿万富翁，其父就是已故的得克萨斯石油大亨——H. L. 亨特。当时，亨特正在玩着所谓“稳赚不赔”的比索税收把戏。不过林德和我都无动于衷，即便马杜夫威胁说亨特会亲自起诉我，我也毫不畏惧。

几天后，拉摩尔·亨特和他的律师出现在 Merc，向巴里林德和我施加压力，马杜夫也在场。意料之中，亨特张牙舞爪，用带有色彩的语言务必让我明白他是谁以及他认为我是什么东西。不过，语言还是很有趣的，长于芝加哥内城又在 Merc 交易池里讨生活的我，说起脏话来脸不红、心不跳，绝不比谁差。不过那会儿地点时间都不对，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在林德和我向他们出示了 IMM 的紧急规则之后，亨特的律师让他的客户平静了许多。我们然后建议了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把比索头寸转到一个可以提供额外保证金的清算会员那儿，这样对于亨特来说会好些。选了 E. F. 哈顿，头寸也适时地转移了。

还不到一个月，比索就贬值了 50%。在那个时候，这便是 IMM 有史以来多空之间一日最大的价值差，一亿美元。虽然这个美元数字在 1987 年股灾时那日所损失的 25 亿市值前黯然失色，可在当时这个数量还是令人心惊肉跳。不过，因为我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Merc 清算所从它的会员那儿提取了必要的保证金。没有发生任何违约事件。我们的清算系统在那次酸性试验中幸免了下来。但这并没有逃过金融界的注意。事实上，这是 IMM 历史上成败攸关的时刻。我个人最为激动的经历便是婉言拒绝了大通曼哈顿提出的用于“拯救 Merc”的一亿美元紧急贷款。很少有一句“不，谢谢”会是这样悦耳的。

与拉摩尔·亨特见面几年后，他和他的兄弟们企图逼仓全球白银市场未果，损失了大部分资金。亨特在白银上的惨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其对金融世界影响之大，甚至动摇了交易白银合约的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根基。虽然亨特兄弟没有得逞，但在其逼仓的过程中，他们把银价推倒了不可思议的价位上。高价位最终使得每个家庭，只要有多余的银碗或银勺，都会拿到市场上来交割，结果市场崩溃。国会的听证会随之而来。我在作证时竭力辩护，尽量避免让 COMEX 的惨剧使整个期货业从此一蹶不振。该事件使亨特金融帝国走向瓦解。

“亨特白银”事件也成就我创下了最糟交易纪录。我的公司合伙人乔治·福赛特与我从 1978 年 6 月开始便牛眼看白银，当时交易价格还在一盎司 5 美元左右。市场与我们预期的一样，银价节节攀升。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们断断续续地积累了相当大的白银多头头寸，并且不停地从一个合约月“滚”到下一个合约月。在 1979 年 9 月，白银达到了每盎司 15 美元的高点，我们两个账面的利润非常可观。乔治和我以前从来没有赚过这样的钱，那真是飞来横财呀！我俩都开始坐立不安起来。银价还要走多高？是到平仓数钱的时候了吗？而且，市场好像在同样的价位区间徘徊了许多星期了。我这才明白，大盈利原来比大亏空更加难以应付。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时是一家著名的大型交易公司的交易经理，该公司在贵金属市场上尤为在行。事有凑巧，他来芝加哥，我们约好了在希尔斯大厦的都市俱乐部吃午饭。既然他也知道我是白银的多头，我就斗胆问问他的意见。“好吧，利奥，”他回答说，“你的白银头寸做得非常棒，而我真的看不出银价还会涨多高。

不过我告诉你，15 美元已经非常贵了。根据历史上的价值，白银无法保证更高的价格了。”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的真知灼见。

我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乔治听，然后我们决定如果这周内平安无事的话，我们就平仓拿钱。我们正是这样做的。那时是 1979 年 10 月底。既然这是我当时有生以来赚到的最大一笔钞票，为什么我又说那是我最糟糕的交易纪录呢？因为，在我们平仓出局的 30 天之内，亨特逼仓上演了。银价发了疯似的，在允许的范围内不断触高，日复一日。价格一直上涨到 1980 年 1 月的每盎司 50 美元。乔治和我做了将近两年的白银多头，而只要我们再持仓坚守 30 天，我们将“被迫”赚得盆满钵满。我们俩发誓，再也不要再去计算究竟错过了多少百万。

IMM 在金融期货上的成功注定使它受到模仿。我知道某天必将发生的竞争，已经来到眼前。到了 1975 年，有迹象表明，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这个我最害怕的竞争对手——最终看到了光明所在，并准备模仿 IMM 的策略，推出自己的金融产品。对我来说，我们这么长的时间里都相安无事，真是让人惊讶。数年之后，纽约金融界会时常哀叹，芝加哥并不是实现这个主意的合适地方。哎，谁叫纽约不想要它的。纽约众交易所面对金融期货的新时代醒悟过来，那还要再过上 5 年。

纽约股票交易所在 1978 年组建了它的纽约期货交易所（NYFE），不过并没有开始交易它的外汇、短期债券或美国长期国债合约，这样等到 1980 年夏天。这是向芝加哥发起的正面攻击——8 年太晚了。事实上，在期货市场，8 天都可能太迟了。正如我之后经常宣称得那样：“第一家最多，便是胜利。”NYFE 理事长刘易斯·霍洛维兹，这个你所能想见的最具智慧、最为诚实的人，领悟了其中的真谛。他私下里向我承认，他们没有丝毫的胜算。他非常正确。同年，COMEX 携两年期国库券合约进入金融领域。它虽然与 IMM 交易的合约不一样，但极为相近。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机会。

真的，无论何种交易工具，也不管哪一家交易所参与进来，“占得先机”的箴言牢不可破。如果你想在期货上获得一个胜利的机会的话，那你还是得快点儿将你的想法付诸实施。1981 年，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最终从其传统的缅因州土豆市场上脱身，后者丑闻不断，差点要了它的命。Nymex 其时推出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它引入了所谓能源期货：取暖油和汽油合约。这些合约大获成功，而且当芝加哥双雄——CBOT 和 CME 企图从它手中将这些市场争夺过来时，我们失败了。数年之中，时不时会有这家或那家交易所做出同样的努力，但无不铩羽而归。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德意志期货交易所（DTB）为争夺由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推出的德国国债期货合约而爆发的战役。由于德国国债合约代表了德国政府债券市场，扎根于德国的 DTB 觉得赢得这个市场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可逻辑并不算数。LIFFE 首先推出了这个合约，而且直到今天，它仍然统治了该合约的市场交易。

1975 年，市场上有许多工具可供选择：金融世界为期货交易提供了几乎是不胜

枚举的、未曾为人尝试过的产品种类。它使我觉得像是一个来到了糖果店里的孩童。不过答案好像是明显的。既然货币和黄金都已是落花有主，马克·保厄斯和我非常肯定地感觉到下一个方向将是向一个绑在利率上的期货产品发展。仅有的现实问题就是，用什么产品？利率回报曲线代表着各种各样的吸引力，而又有无数个产品是和利率波动相互挂钩的。

保厄斯所代言的是 90 天美国短期国债期货合约，为此他费了不少口舌对我进行游说。他解释说，90 天国债是短期利率回报曲线的市场基准。它能为那些买卖政府债的证券商们提供一个转嫁利率风险的市场。他的论点令人折服，而我也向他的经济学学识弯腰低头的倾向。但我还是侧面做了些偷偷摸摸的调查。我曾了解到在 CBOT，他们新任的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桑多尔正在计划推出一种以抵押为标的的期货合约，或称为金尼梅（即政府国民抵押协会——GNMA）。与 90 天国债相反，GNMA 代表着长期利率回报曲线。在我做出有关短期国债的决定之前，我平静地邀请斯坦福大学的金融教授罗杰·格雷来 Merc 一谈。他是我一个朋友，也是 CBOT 关于金尼梅合约的顾问。他对我说的话让我和保厄斯走到了一起。虽然格雷教授认为金尼梅是个好主意，但仍然对它的成功潜力心存怀疑。他觉得，其中存在着一个交割上面的问题，这会损害这个合约的实用性。我抓住了短期国债。

硬仗在后面。与我们四年之前推出货币合约不一样——那时需要联邦政府批准，这次，新的合约必须得到我们新近成立的政府监管机构 CFTC 的批准。看来我们这方腿上必须勤快点儿，否则批准不下来。

这真是似曾相识啊。首先，我聘用了贝瑞尔·斯普林克尔，也就是今天 IMM 的主管，让他与他以前的教授、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进行一次会谈。那是整个批准过程中的关键。之后的那次在联储委员会会议室中进行的会见，也包括马克·保厄斯在内，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并且还是一个滑稽有趣的小故事。伯恩斯和斯普林克尔都是老烟枪，而我，当然，也是烟不离口。在我们三个中间，烟幕厚得彼此都看不见。

“多有趣的点子，”听完我们对自己想法的解释后，联储主席说道，“使用这样一个期货合约的将是政府证券商、投资银行家、各种各样的商业利益机构还有投机的，对吗？”

“是，”斯普林克尔和我附和道，“它的参与者将包括商业和投机世界中的各个部分。”我们进一步谈到了这个合约的价值，直到联储主席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有了一个好主意。

“这样看来，”伯恩斯博士说，“这个期货合约将成为一个预测利率走向的奇妙的风向标，对吗，贝瑞尔？”

贝瑞尔·斯普林克尔犹豫了，看着我寻求帮助。我也不知道答案，所以我仰望天花板，看着围绕在那儿的滚滚烟雾。马克·保厄斯也保持着沉默。

在一阵尴尬的停顿之后，贝瑞尔想出了一个不置可否的回答：“啊，主席先生，它可能会像联邦储备委员会自己的经济计量学模型一样好吧？”

“那个东西，”联储主席笑了一声说道，“连屎都不如。”这就是诚实叫人喜欢的地方。

在我发现他和他的妻子像我父母一样都是意第绪语学者之后，与伯恩斯博士的那次见面发展成了友谊。应他们的要求，我为他们找到了 I. L. 佩雷兹的意第绪语著作，伯恩斯博士就是带着它们前去就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的。

经历了这个障碍，下一步我要寻求并得到艾伦·格林斯潘的支持，他当时是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与他的会面真是一剂强心针。还没等我将短期国债期货合约解释完全，格林斯潘便插嘴了。

“多伟大的想法！”格林斯潘说道。然后，他一口气就继续说出了这样一个市场的十多种用途，其中一些我们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一句话，那次会面使他成了一位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如此。我们的友谊在 1987 年股灾时尤其显出其重要。

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得了个头彩，居然撞上了赫伯特·斯泰因，也就是格林斯潘在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任。正像任何一位优秀的福音传道士一样，我立刻从头至尾解释了我们此行的原因，并征求他的意见。斯泰因毫不迟疑地来了一句妙语：“我不反对两位成人首肯的任何事情。”

接下去我转到 CFTC。加里·西弗尔斯委员很快理解了这些新型利率产品的潜在价值，并且成为了一名宝贵的同盟。但当时还要看比尔·巴格利，也就是 CFTC 主席的态度才能定。我试图用许多政府官员都已经下水这一事实来打动他。但巴格利没有任何金融背景，所以害怕为这样一个革命性的决定承担责任。

“利奥，”他恳求道，“我像疼自己兄弟一样地疼你，也希望这样做，但我需要一个位置更高的人物向我说声‘可以’。”

“要多高？”我一边问，一边想他没准儿需要神灵介入进来吧。

“嗯，”巴格利答道，“短期国债难道不是美国国库的财产吗？或许我们需要某人的批准、手谕，像财政部部长威廉·西蒙。”

真离谱。西蒙在华盛顿特区是初来乍到，就连用上 E. B. 哈里斯的关系也搭不上边。但不做适当保护就上路似乎是错误的。所以我开始四处打电话给我们清算会员中的一些高官，看看是否有人认识比尔·西蒙。

当然，天上掉下了馅饼。桑福德·韦尔——希尔森公司的老总，是财政部部长的一个朋友。韦尔还是一名精明的市场分析师，他能觉察到我们的短期国债合约中的巨大潜力。他答应帮忙。我随后又采取了一个额外的预防措施。我致电米尔顿·弗里德曼，希望他再一次发挥神力。弗里德曼大施恩惠，给西蒙打了电话。1975 年冬天当桑迪·韦尔和我在财政部出现在他面前时，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买卖了。他迅速地同意了，并签署了早已准备好的给巴格利的批准函。

短期国债期货合约的规格却又出了另一道难题。股票和商品交易的传统理念使人觉得买价一定低于卖价。随着商品或股票购进，价格上升，买方获利。当价格下降，其便遭到亏损。相反，如果他沽空，价格下跌，他即获利；价格上升，他便亏损。

这与利率交易却是南辕北辙。在交易短期国债和其他以利率回报基差报价的工具时，因为利率回报率和价格呈负相关关系，买价高于卖价是正常的。如果短期国债以更高的利率回报率出售，该债券的价格将会下降，反之亦然。如此一来，要像现货市场那样交易利率，我们交易员的思路必须反其道行之。那将意味着卖价非得高于买价才有效。那样的话，据我判断，在交易池的环境下会是困难的。会员们可能会放弃这样一个交易池。我需要的是一种短期国债合约，它的规格既能与传统的期货交易方法相吻合，又能为专业的现货货币交易员所理解。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有寻求短期国债规格委员会的帮助了。这个委员会包括梅尔文·安特曼、菲利普·格拉斯、威廉·哥尔德斯坦特以及阿特利科尔。

我们对这个问题集思广益了几个星期，但好像没有任何解决方案。不过我不愿意放弃，并且督促每个人继续思考。然后，在一个周末，梅尔文·安特曼（以前是位银行家）带着一个出色的方案来到我面前：“我们来交易 IMM 指数。” 他的想法建立在实际短期国债利率回报和百分之百的差。这样，一个短期国债利率回报率为 6%，那它在 IMM 的报价便是 94.00（若卖价上升，比如是 94.05，这说明利率回报率略降至 5.95%）。而这个指数并不会改变现实——更高的价格仍然意味着更低的利率水平，这使期货交易池可以正常运行。卖价照旧低于买价。当什么人买了我们的合约，而 IMM 指数上升的话，这个人就能赚钱。当然，如果一个人预期利率会上升，他就会卖出 IMM 指数，因为债券价格会随着利率的升高而下降，就像在现货市场中一样。另一方面，如果某人预计利率将下跌，他就会买入 IMM 指数，因为债券的价格将随着利率的走低而升高。我们不仅将 IMM 指数概念运用在短期国债中，还用在了存托凭证和欧洲美元合约上。安特曼的点子变成了全世界期货利率交易的标准。

1976 年 1 月 6 日，米尔顿·弗里德曼大驾亲临，敲响了 IMM 短期国债合约的上市钟声，从此开创了利率期货交易的时期。我再一次踏上了市场推广之路。每次新产品一出，这样的义务我就非得从头再进一次。我觉得有点儿像个记者，今天刚写了一篇头条，可第二天那位饥饿的编辑还盯在后面说：“今天你有什么给我吗？” 不管交易所是多成功的一个单位，它的每种期货产品必须有自己的分量。正如货币期货的概念必须推销给银行一样，短期国债期货的概念就必须出售给投资银行家。我知道如果我能够说服那些顶级投资银行家中的一个的话，其他人肯定就会跟风而动。我瞄准了所罗门兄弟公司。

费了些周折，我终于安排好和高级合伙人威廉·所罗门在纽约的会面。开始的时候他听得非常仔细。“短期国债期货，” 我解释说，“将成为除政府债券以外的工具，

如商业票据、银行承兑票据、机构代理票据、存托凭证等规避利率波动风险的良好手段。短期国债也可以开辟一个市值超过 50 亿美元的一级市场，并使之具有极强的流动性。”

在他的脸上，我可以看见一种表情，IMM 初创之时，当我试图向其他人推销货币产品时，许多人也是这种表情：一种充满怀疑主义的疑惑神情，甚至还带着些担心我万一动粗的恐惧。而每一次我又不得不提醒自己，与那支对金融期货不屑一顾的军团比起来，只有那么一小撮士兵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对所罗门不合适，”他说，清楚地给了我一个印象，他不相信这会起作用。然后，就像任何一个优秀交易员都会做的那样，所罗门留了条后路。“不过，如果你能够证明它的作用，放了心的所罗门公司会成为你头一个交易商。”然后我基本上就是被请了出去。

短期国债成了一种为数不多的期货工具：一炮走红。一年后，我接到了汤姆·斯特劳斯的一个电话，他那时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执行副总裁，那次和他的老板比尔·所罗门的会见就是他安排的。

“我们在 Merc 受欢迎吗？”斯特劳斯羞怯地问。我笑了。“你在开玩笑吗？”所罗门兄弟是业界里的巨头之一。它如果能够成为 IMM 的会员，那真是像得了大奖一样。“我肯定欢迎。”我说道，而且做得更好。一年后，我指派汤姆·斯特劳斯进入 IMM 理事会。斯特劳斯最终成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总裁。正如允诺得那样，他的公司成了我们短期国债市场的最大用户，并且也是 IMM 一贯以来的朋友。

短期国债期货的另一位早期的重要使用者是一个叫韦恩·安吉尔的堪萨斯银行家。就在短期国债合约于 1976 年推出后不久，身为康瑟尔·格罗夫全国银行所有者的安吉尔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上读了一篇关于 IMM 新市场的报道。这引起了他的好奇，所以他进行了一些调查，并打电话给我进一步了解有关信息，并且做了些计算。安吉尔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他卖出了短期国债，买进相同交割时期的短期国债期货，这样便做了一个几乎没有风险、结果使银行投资组合回报率上升 140 个基点的跨市套利交易，其利润颇为可观。日后成为州长联邦委员会委员、出色地为国家服务的韦恩·安吉尔，一直是我们市场的坚定支持者。

也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的银行或者投资银行几乎没有几家曾经使用过期货。事实上，它们对公开喊价制度、下单的程序、交易池的习惯或其他任何事情的知识非常缺乏。它们甚至不知道，在每个工作日结束的时候期货市场会以逐日盯市制度为基础对未平的头寸进行现金结算。我还记得当汤姆·斯特劳斯询问我关于我们市场的一些基础问题时，他那窘迫的样子。这背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除非社会了解了我们这个市场，否则它们是不会去使用它的。我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我将必须利用我继承下来的那个教师职业了。

我的公司——戴尔舍投资公司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教育机构。一段时间后，金融

业的任何一位皇亲国戚，诸如所罗门兄弟或是玛尼哈尼，或是大通曼哈顿，或是其他许多经我怂恿进入期货市场竞技场的华尔街街民们，在瓦莱里·特纳（戴尔舍的首席运营官）的教导下，上了他们最初几次期货市场的介绍课。一旦他们的入门课程结束，我简直是把他们推出了戴尔舍的大门。“你们已经毕业了，”我经常这样说道，“现在就去建立你们自己的清算公司，然后把你们的客户带到 IMM 去。”我知道，IMM 要想成功，纽约的金融界必须成为我们的会员，并且把他们的生意带给我们。

接下去的六年中，短期国债期货成为了 IMM 交易最为活跃的合约，为那些“安全证券”交易商们提供了一条巨大的安全毯，并由此保证了利率期货的成功。随着利率交易的稳定，CME 成为短期利率回报曲线的领地，CBOT 则占据了长期的。后见之明还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品评那个时代的决定。首先，格雷教授认为 GNMA 合约不会获得巨大成功是正确的。正如他预测的那样，出现了较多方面的问题。但是，不管是格雷、保厄斯，还是梅拉梅德，都没能猜到理查德·桑多尔博士竟会如此迅速地意识到金尼梅合约的真相，并将他的概念转变成为 CBOT 赢得极大成功的 30 年国债期货合约。其结果是，桑多尔不仅让 CBOT 浩浩荡荡地进入金融期货的竞技场，而且他还保住了交易所的未来。没有长期国债，CBOT 可能才是它今天的一层皮毛而已。

回顾当初，很显然我应该也是愿意在 Merc 推出长期国债合约的。但如果进入了那个长期市场，等到另一种工具的准入空间完全开放后，我们可能不得不去面对一个竞争者。不管怎么说，CBOT 似乎会占上风，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交易的 GNMA 合约就是一个长期的工具。另一方面，我们在回报曲线的另一端上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合约，90 天短期国债合约。而且马克·保厄斯以及其他曾经建议过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个世界正在向利率曲线的中端区域而非长短区域移动。他们都觉得挂牌四年期国债合约的主意不错。当然，这在后来证明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四年期合约砸了锅，事实上，它从来没有任何的机会。30 年国债合约大获成功。

不过抓牢回报曲线的短端，其奖赏还是巨大的。有一个想法深深地埋在我的脑海里，我只同 E. B. 哈里斯、马克·保厄斯以及几个自己圈子里的人讨论过。在和一些国际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谈过之后，我确信最终的短期利率期货市场将开辟在欧洲美元上——美国之外的美元储蓄，由个人、公司、银行和中央银行持有。短期国债是在美国的短期工具。但 90 天欧洲美元则是全球短期利率的普遍基准。其使用者的数量使所有竞争性工具相形见绌，有可能使欧洲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期货合约。这可不是个值得人垂涎三尺的奖励。

我的策略很简单，它建立在我以为肯定的基础上：流动性是通向市场成功的钥匙，而买卖价差又是流动性的关键。所有的短期利率合约都有一个紧密的关联性。我知道一位交易员会在短期国债和其他的短期利率合约间作价差交易，但却不会在短期和长期利率工具之间进行价差套利。因此，我明白如果 Merc 在利率回报曲线短

期区域站稳脚跟的话，这将保证其日后可以在 IMM 上市欧洲美元合约。换句话说，通过继续发展我们的 90 天短期国债市场以及日后的（同样道理）90 天存托凭证市场，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这场欧洲美元的争夺战中，居于有利地势，能打败任何一个竞争者。

这个策略证明是空前成功的。国内存托凭证合约遭到了 CBOT 以及新成立的 NYFE 的争夺。不过因为我们的会员能够用短期国债在存托凭证上进行价差套利，IMM 赶走了所有的竞争者。等到几年后欧洲美元合约获准进行交易的时候，没有其他任何一家美国交易所胆敢向我们叫板的。因此，虽然桑多尔博士的 30 年期国债合约给 CBOT 下了一场及时雨，我们的 90 天短期国债的决定为 IMM 赢得了短期利率回报市场，并为我们取得了最丰厚的利率奖赏：欧洲美元合约。

我还知道一个交易所不应该一下子推出过多的产品。推出新品需要大量的策略、筹划、资金以及人力资源。市场中交易员如此之多，所以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并且承认我们应该经常审慎地将一些产品暂且搁置。如果一个交易所贪多嚼不烂的话，它的野心会让它给噎住的。最后，不光这个市场会被它拱手让人，整个机构还将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示人。一个坏形象对于交易所的前途不啻丧钟一记。

当时的决定还有另外一个奖励。如果 Merc 历尽艰难，赢得了长期国债，从而将 CBOT 从金融期货市场中赶了出去，长远看来我们还是失败。单枪匹马、永无休止地与 CFTC 或者国会对峙，我们无论如何也胜不了。多个交易所才能成就这个行业。随着 CBOT 成功地进入金融领域，Merc 在华盛顿作战时突然有了一位影响巨大、坚定不移的同盟。一转眼，我们最大的竞争者变成了我们最强有力的盟友——至少是在与监管者的战斗中。其中的价值怎么说也不为过。携起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积聚力量以捍卫我们在芝加哥市场上的地盘，击退期货业中共同的竞争者和敌人。独立作战，我们可能一败涂地。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20 章

宏伟的设计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农业永远不可能代表着未来，而金融却可以。如果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有任何未来的话，这必须要依靠国际货币市场才能完成。不过在 1975 年关于此我还无法证实，因为货币和金融期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人必须要相信。在当时，农业市场仍然处于巅峰时期，发展迅猛。肉类市场交易量率创新高，而相比之下，金融市场看上去就像个孱弱的小妹妹。要相信它的潜力，一个人必须将目光投放到眼前的交易量之外。毕竟，金融期货只有三岁。

Merc 的大多数会员和我走到了一起，但不是全部。有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保守派，他们心存怀疑。时运昌盛，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肉市会永远这样下去。谁需要一个傻乎乎的货币和短期国债市场呢？期货是为农业而不是金融服务的。那些和我走到一起的会员也只是为了赚些 IMM 席位放进他们口袋里的快钱罢了。不管怎么说，他们花了区区 100 美元买到了 IMM 的席位，现在一转手便可获 1.8 万美元或 2 万美元的利润。这笔买卖一点儿也不差。当然，也有与之相反的一幅画面。也有

CME 的会员十分信赖金融市场，他们愿意出售他们在 CME 的席位，以保持 IMM 的单一会员资格。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的严重后果正在酝酿之中。IMM 是一个独立的交易所，有它自己的规章制度和管理理事会，一旦 Merc 的会员卖掉了他们在 IMM 的席位，他们便不再是 IMM 的会员了。他们的忠诚突然间产生了分化。他们不能再在金融市场里交易了。人类的本性就是这样，这些非 IMM 会员们开始敌视 IMM 了。事实上，随着 IMM 的发展壮大，其席位价值相应地得到提升，那些已经卖出席位的 IMM 会员们傻了眼，后悔卖得太早。没人喜欢做一次糟糕的交易，这加剧了他们的敌意。

随着更多的 CME 会员们从他们的 IMM 席位上获利，非 IMM 成员的队伍也在扩大。随着这支队伍的壮大，敌意也在加深，它们就像是我们中间的第五纵队。他们开始用敌对的眼光看待 IMM 了。“那些 IMM 的家伙正在用我们的交易大厅。”“他们在喝我们的咖啡。”更糟的是，另一帮会员也加入了这些非 IMM 会员的行列，他们购买了 CME 的席位，所获得的权利只包括农产品市场交易。这些 CME 的会员们从来没有当过 IMM 会员，因此与金融合约再怎么怎么说也没有任何的感情。我们队伍的分化使两个交易所在交易大厅和其他设施的公平使用上出现了紧张的局面。足够空间的缺少使问题更加恶化。新 Merc 大厦中许多计划中的扩展区域都已经被 IMM 占用，而且预计将要上市的黄金、银币和短期国债合约也需要更多的交易空间。

每过一天，我就会意识到问题又严重了一些。至今为止，消极态度有所减弱，有意见通常只是小声嘀咕一下罢了。毕竟，没有人明目张胆地希望攻击我的“孩子”。不过，只要有几个煽动者，问题便会发生，而且不满意的声音时不时地就会传到理事会办公室来。有一些抱怨戴着合法的光环。举个例子，有人要求 IMM 为使用 CME 的设施付费。当然，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从一开始起，我就和我们的财务专家艾拉·马库斯共同安排，让 IMM 分担一部分费用。不过因为 IMM 是一个羽翼未丰的交易所，没有什么钱，因此所分担的费用还是非常优惠的。如果 IMM 被迫按其实际使用 Merc 设施、公共关系、教育材料、人员等全额支付费用的话，它不出片刻就会倾家荡产。金融合约的潜力可能永无释放之日，Merc 的未来也可能消失在灰飞烟灭之中。

不过敌对态度也是一柄双刃剑。IMM 的会员们也开始剑拔弩张了。他们把非 IMM 会员的抱怨看做是酸葡萄，并不是真心的：他们把 IMM 会员资格出卖得太早了……他们鼠目寸光。对于 IMM 的会员来说，无疑，金融是期货的未来。

到 1975 年 6 月，我开始相信，如果放任自流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像一个肿瘤一样生长，最终将分裂 CME，在这个交易大厅上引发一场 Merc 会员和 IMM 会员之间的内战。“如果允许这种吵吵闹闹的歪风邪气继续下去的话，”我对我们的理事会说道，“这将会蔓延并传遍整个交易所，如果没有让我们的机构衰弱，那也肯定会使我们停滞不前。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加以避免。”我每句话都是说真的。我看到了发

生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事情，造成这种结局的是它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在 1973 年两所分离过程中的关系。敌意在两家兄弟交易所之间筑就了一道墙，双方各自为政、互相竞争、离心离德。从一开始起，就因为与 CBOT 有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参与者，CBOE 就像个后娘养的。其结果是两种独立的文化和日益增长的敌意，特别当证券业大发展、商品势微停滞的时候。既然存在分裂，而每一个交易所都各自为政，最终它们都搬到了自己的大楼里。我并不希望看到 Merc 和 IMM 出现那样的未来。CBOT 的经验和教训加强了我一直相信的一个观点：一个人不可能改变一种文化，或是把它像地图上用于铅笔描摹的塑料薄膜一样覆盖到其他的文化上；一个人必须要去适应一种文化。必须要有比 CBOT 更好的办法，一种在同一屋檐下将统一起来的文化维系下去的办法。不过，要想使市场能够相互独立，而又能团结一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骄傲和对过去的缅怀。

虽然注意分离是我首要考虑的问题，但它却不是我仅有的顾虑。我经常与我的理事会成员同仁们谈论我们所面对的其他困难。在使 Merc 成为世界第一的这场运动中，我知道 CME 受到了严重的羁绊，因为其会员人数有限。会员是交易所所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财产，他们是使交易场具有生命和流动性的群体。交易所的会员越多，其潜力就越大。当我接手 Merc 的时候，我们有 500 人。这是 CME 章程规定的会员数量的限额。当 IMM 创立时，又出售了另外 150 个席位，将我们的行列扩充到 650 名会员。但 CBOT——我们最大的对手，比这个数字的两倍还要多。如果我们的数量少于对手的一半，我们又如何同他们竞争甚至是赶超呢？而我们近来的成绩又容易使事情变得更糟。这让会员价格水涨船高，要往交易所里增加新的会员就更难了。会员资格的价值形成了既得利益，更多会员的加入会摊薄该利益。会员们不希望会员资格贬值。

还有一个问题使所有事情复杂化了。CME 的会员们都集中精力交易活牛、生猪和猪腩。结果是，没有足够数量的人去交易我们正在推广的 Merc 的其他一些非金融产品，如木材、无骨牛肉、火腿、蜀黍、土豆以及火鸡；或者是未来的那些产品，那些仍然仅仅是希望和梦想的产品——金融产品等。如果现在的市场还没有完全使用，Merc 又怎么能期望那些还未上市的产品呢？这个问题仅仅通过增加新会员是解决不了的，即使规则允许也不行。正如 E. B. 哈里斯喜欢说得那样：“万事开头难。”我知道无论我们为交易所设计出哪一种结构，这都会迫使会员们关注于特定的产品。三年前 IMM 推出伊始，这种方法便得到了证明。我们出售的单独会员资格将交易员的活动限制在金融产品上。它奏效了。新流入的 IMM 交易员使金融合约获得了持久的流动性，并为它开创了广阔的前途。为推销新合约，我们大肆宣扬的那股热情也只能把我们带到这儿了。最后，我们需要一群人每天在交易池内，让这些产品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那些解决了许多问题的方法。我关于 Merc 的设想远远超过将

CME 和 IMM 进行合并。我计划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我就重组事宜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在一份精心拟就的报告中我对委员们说道：“我们结构的错误之处是 500 这个数字所不能代表的。对于会员的限制不仅将伤害 Merc 交易池的流动性，还会妨碍我们的未来。”同时我告诉委员会，这次重组绝对不能动摇 Merc 原有的团结。正像一位法国哲学家曾经说过的那样：“打碎你的锁链，你会自由；但拔去你的根基，你将死亡。”需要根据当前的现实情况仔细加以筹划，从而保证 Merc 根基的完整。

我提出的宏伟的设计方案旨在服务于两个目的：团结和独立。在一个团结的 Merc 里创造一个部门分立的结构。CME 和 IMM 要合并，CME 就是合并后的交易所。要推出部门内的席位，这些席位只能交易上市于该部门的合约。IMM 将成为 Merc 的金融市场部，而 IMM 会员维持着他们在这个部门里的单一席位。当时 CME 的席位所有者和 CME 席位的新近购买者都享有在 Merc 所有市场中交易的权利，包括交易在任何一个部门挂牌的产品。还要建立第二个部门，暂时称之为非家畜市场部（NLM），这个部门的会员只能交易鸡蛋、木材、蜀黍、黄油和冷冻火鸡（不久之后，NLM 更名为副商业市场或 AMM 部。最终，它成为了指数和选择权部（IOM））。虽然，据我所知，提出的这个概念以前从来没有在任何交易所试行过，我还是确信它会起作用的（几年后，CBOT 基本上是仿照了这个部门式的设计方案）。

我还相信这个计划能够解决我们面对着的其他问题。这个方案通过向交易所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使之发展壮大，虽然也限制了在一些指定市场中的交易。最为重要的是，这将迅速为我们会员中的分裂主义画上句号。由于所有 CME 会员都获准交易 IMM 产品，这样由于空间和设施分配而产生的敌对态度就此终结。而因为 Merc 绝大多数会员仍然拥有 IMM 的席位，这个方案又能鼓励将此席位出售或转让给那些限于交易金融合约的新会员们。这就意味着，假以时日，随着更多的 IMM 席位进入新会员的囊中，IMM 的全体会员数量有可能发展到 650 名。当你将这个数加在原有 500 名 CME 会员上，Merc 的规模将比合并前翻上一番。加上 NLM 部将要发放的会员数量，或者其他未来的部门，Merc 将掌握持续扩展的秘方。回顾当初，Merc 的部门分立式结构是其最终成功的关键，促使它以全球交易所中最快的速度成长。这一点现在是非常清楚的。

但合并来得并不容易。首先，该方案必须通过 Merc 历史上最为繁琐的一次全体会员投票。大家对此众说纷纭，而我也尽了平生最大的努力进行游说。当时的许多会谈都是一对一的。而由于 Merc 处在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节骨眼儿上，因此每次会谈都至关重要。我同双方都碰了面；CME 会员和 IMM 会员，赞同合并的和反对的。虽然这次合并合情合理，但要被人接受，必须加以解释，让人们理解。而我也要再一次放出长远的眼光来。

对于 Merc 的会员们，这相对容易些。他们可以拿回他们的市场，而且现在可以

在不须丧失交易权力的情况下就能出售他们在 IMM 的席位。对我忠心耿耿的科尔基·拉布肯，本人是从阿瑟·安达信来到 Merc 的。他对我说道：“从一名律师和注册会计师的角度来说，我告诉你这对所有人都是一桩绝妙的买卖。”科尔基交易的是活猪，这个合并将给他一个交易金融产品的机会。同样，坚定支持这次合并的 CME 会员吉拉德·米勒也不遗余力地站在我一边。不过 IMM 却问了：“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市场给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回报啊？”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概念。对于 IMM 的会员来说，他们的合约前途远大。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没有 CME 的鼎力支持，这个前途永远也到达不了。潜力需要合适的环境才能实现。

我记得与兰迪·麦凯，也就是那个年轻有为的 IMM 货币交易员的谈话。他属于 IMM 的贵族，1970 年和他的兄弟泰里来到了 Merc。他们开始为帕克斯交易公司跑单，并被我的同僚之一麦克斯德奇介绍去了交易大厅。由于聪明伶俐且雄心勃勃，IMM 给了麦凯兄弟一个闪亮发光的机会，泰里后来用他在交易中赚到的钱在房地产上开创了一番成功的事业。他们都是忠诚的 IMM 会员，一呼百应，并且清楚 IMM 具有无量的潜力。不过兰迪·麦凯反对合并。他是 IMM 顽固派中的一个，坚信总有一天 IMM 的规模会超过 Merc。这我同意——除非合并得以通过。我对他苦口婆心，因为我知道许多人会听他的。这个差事真是够呛，不过最终我还是说服了他。还好他也相信我。

“利奥，”兰迪·麦凯最后说道，“合并我会投赞成票的，尽管我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你能把电冰箱卖给爱斯基摩人。我认为这绝对不会发生，不过我还是投你一票。”

必须使 IMM 的会员们相信他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团体，包括 Merc 的基础设施、房产、实力和金钱。毕竟，IMM 是依赖 Merc 而建立起来的，它的资源、知识和人才，这是一个反对者所忽视的事实。没有 Merc，IMM 便不可能存在。在这一点上，它还有什么都不是呢。

10 月初，Merc 和 IMM 的理事会同意了特别委员会提出的重组方案。全体投票安排在 11 月 3 日。投票前一天，在俾斯麦酒店召开了一次通气会。整整一屋子的人都站着。1 000 只眼睛盯住我，看着我用一个小时指出问题的所在，以及合并对于两所为何如此必要的原因。敌意和不屑统统消散在空气中。

会员大会在芝加哥交易所中是一项神圣的遗产。它不仅仅是章程中所要求的一种仪式。它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居民从这个共和国的早期便继承下来的遗产，在当时城市大会是唯一一种向公众通报利害关系或解决问题的途径。10 年前，就是会员大会让我有机会挑战 Merc 的领导层，并由此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也发誓，不管这种大会对于领导层或 CME 的理事会有多困难，这都是一种绝对不能打破的信任关系。它代表着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会员都能就任何问题向理事长直接发问。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员可以借此机会让全体听众聆听到所问与所答。真的不错，

后者是整个过程中的重点。在大会上，会员的问题——有时使管理层尴尬万分——必须得到解答，不是在理事长办公室里私下了事，也不是通过私人信函，或在分发到全体会员的备忘录中（在那里，回复的措辞可以详加斟酌），而是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所有的会员都可以当即听到回答，判断答复是否老实，都能够立即加以追问。换句话说，会员大会允许争论，这是一个民主制度——以及一个交易所的血脉源泉。

1975年11月的那次会员大会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紧张态势，完全在“石头脸”、Merc的忠实拥趸伊奇·玛尔默特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只从中世纪教堂的塔楼上睥睨下望的托斯卡纳屋檐滴水怪兽。伊奇是那些从一开始便反对IMM的老顽固的典型。而且，伊奇甚至拒绝按照要求，掏出一笔象征性的费用来购买IMM的会员资格。另一方面，他的儿子麦克斯韦“老弟”玛尔默特对IMM和其代表的新时代却是全心全意。他付了要求的100美元为伊奇买了个IMM的席位，历经数年的巨幅升值后这个席位竟然成了他父亲的摇钱树，真是世事弄人啊！现在，玛尔默特家族骄傲地宣布其三代皆是Merc公民，伊奇的孙子彼得·玛尔默特现在是一位出色的IMM货币交易员。

“我们为什么需要IMM？”伊奇发难道，其男中音嗡嗡作响。“他们在用我们的地盘。他们在用我们的黑板。他们在呼吸我们的空气。”

说得没错。意思非常清楚：梅拉梅德在用Merc的钱和它的基础设施来养活IMM——我不能否认这个事实。Merc的回报呢？未来的市场。

相反，罗伯特·斯韦德洛，这位IMM交易员兼忠实拥护者，轻蔑地站起身来反戈一击：“利奥，IMM把新市场给了CME；可CME给IMM有什么回报呢？”

“生命。”我回答道。我说的是真的。

CME以343票对23票通过了这项方案，它也得到了IMM会员的批准，396票对57票。因此IMM得以作为一个分部并入CME中。这次合并为IMM将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因为所有过去的债务都得到了豁免。反过来，CME获得了IMM的潜力，因为它将成为全球最为活跃的市场。在1976年1月，即新的CME理事会选出之后，大家一致选举我成为这个重组后——团结起来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首任理事长。

我希望担任理事长，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历史的目的：成为新近合并的CME和IMM交易所的首届理事长。第二，因为这个职务意味着，我能够有机会按照我希望它显现的模样和运作的方式，将这个新交易所塑造定型。我尤其坚定的是将交易所章程合并起来，这样IMM发明的那些现代的规则和理念可以替代CME的一些陈旧过时的规章制度。举例来说，有必要引入IMM尽善尽美的清算会员契约，如此一来合并后的清算所的经济实力至少与它的前身平起平坐。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组建了一个特别规则委员会，并亲自指挥工作，杰里·萨尔兹曼始终从旁协助。这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不过在我届满之时，也就是在1976年12月21日，CME和IMM

的合并规则终于被采纳。它们成就了现代 Merc 的基础。

希望成为理事长的另一个原因是，理顺由于合并投票而扰乱的关系，建立起 Merc 永久团结的基础。我的直觉告诉我，这肯定不会是一场仅仅局限于字面上的合并。使 Merc 突入期货业界前沿的唯一而且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词，团结。“我们的会员目标一致，正是这股独特的力量促使 CME 去创新、去探索、去厚着脸皮推广我们的理念，并且最终，取得成功。”我曾经说道。为将来而建立一个团结的组织是我的使命。整个一年我都为此而努力，同两个部门的会员们谈话，了解他们的想法，感觉他们的脉动。重组之后，CME 理事会从 12 人扩充到 18 人，四名新代表来自 IMM，两名来自 NLM。不过，将委员会的结构合并起来也同样重要。除了农产品中一些特例，我不希望在职责上有分别。当会员们在一个委员会中共事时，他们从相识到相互信赖。虽然奇怪，但实在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来自两个部门的会员们非常地相似——相似的观点、相似的问题、相似的解决方法。事实上，在随后的数年中，不管在何时进行全体投票，毫无例外的是，每个部门中的大多数会员们投票结果相同。

依我看来，在合并后那些我不顾许多理事和清算会员的反对而领导的创新举动中，之一便是给 Merc 的会员费永远地封了底。这件功劳可不小。我知道会员资格的价值如同军队队伍里的骄傲和喜悦，如果一家交易所的体制给其席位的价值加上了不合适的压力，这种交易所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加入的。

根据这些规则，CME 和 IMM 的每一位清算会员至少拥有了交易所的四个会员资格，两个 CME 的，两个 IMM 的。也有许多人以为，合并之后他们可以卖掉两个会员资格了。“门儿都没有，”在我们撰写合并规则时我同埃弗雷特·哈里斯和巴里·林德说道。“从现在开始，每位清算会员在 Merc 创立的每个部门中起码要有两个会员资格，永远如此。”我绝不动摇和妥协。通过立定这一原则，我不但使我们清算会员们的财务状况更为健全，而且保证了大量分部的会员资格永远掌握在那些财力雄厚的公司手中，并免受市场影响。这项规则一直是 Merc 清算所的标志，并运用到了之后创立的 IOM 市场中。

1976 年 CME—IMM 的合并有这样一个脚注。这次合并明显发生在金融市场成熟为“金刚”^①前，许久之后，它才有后来的这番模样，并占到了 Merc 交易量的 95% 以上。达到这份荣耀恰恰是这次合并的目的。不过在当时，CME 的会员们是山中的“大王”。他们的交易量从来就是 Merc 收入和力量的主导因素。我们在 MCE 和它的分部中分配投票权时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否则我们绝对得不到 CME 会员们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巴里·林德秘密讨论了很久，最后我们坚持建立一个倾向于创始会员的投票权重型的组织结构。我把 Merc 看做父母，而 IMM 和其他分部就是它的子

① 美国影片《金刚》的主角，是一只力大无比、对人类发动攻击的巨型大猩猩。

女。长辈应该享有的权利必须镌刻成文，永久保留，这样那些子孙们才不会不公平地对这位前辈群起而攻之。我称之为我与 CME 的“盟约”。不过反过来也是一样：CME 的会员不应该不公平地联合反对他们的后辈。需要的是一种完美的投票平衡，所以我让巴里·林德来做这道算术题：这是他的专长。“我觉得你是在异想天开。”巴里开始这样说道，不过我知道他能做到。结果便是一个加权式的制度系统，它将父母安全地同孩子们隔离开来，反之亦然。实质上，这保存了我们的根基。每一个 CME 会员拥有六票，每一个 IMM 会员拥有两票，而每一个 AMM（IOM）会员有一票。这也反映了他们出席理事会的代表比重。这种“六二一”式的制度成为新组成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基础。

在那时，我对包括 CME 理事乔尔·格林伯格在内的一些影响力更大的 Merc 成员们说过：“我会给你这份权力，不过你绝对不能把它当做一种武器，因为必须允许这些孩子去成长。分部的会员们需要资金、空间还有提携。这种权重式投票制度是一种控制手段。但是，不要把它当剑使，它只是一面盾牌。”格林伯格理解了，他是一位强大的朋友，也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活牛和猪腩交易员。事实上，格林伯格在使 Merc 成为“猪腩造就的大屋”上起到了作用。格林伯格可不是什么傻瓜。在农产品上财源滚滚，事业发达，并不意味着他就看不见金融产品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他和其他一些人同意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 年之后，也就是 1994 年，这一切天翻地覆，当农产品合约变成了 CME 产品中孱弱的小妹妹后，这个问题又浮出了水面。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21 章

权力和领导艺术

随着 1977 年的临近，我所做的一项私人决定仍未有改变。我将再一次辞去理事长的职务。我曾经无数次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一直得到的是同样的结论：我的使命已经完成——或诚如我所认为的那样。正式来说，我在 Merc 做了三年的理事长（1969 ~ 1971 年），然后在 IMM 当了四年的理事长（1972 ~ 1975 年），并在 1976 年又一次成为 Merc 理事长。实际比那还要长。我从当初收购时，即 1965 年起，就开始领导 CME，那次收购让我在 1967 年进入了理事会。这样一算，我塑造 Merc 整整有 12 年了。这个阶段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

要说我满意于自己的成就，此说法之保守可能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我肯定不是单枪匹马打天下——我得到许多热诚的场内会员、理事和员工们的协助，我毕竟把金融期货介绍给了全世界。在我的核心圈子、我的精英场内部队和无数场内交易员的帮助下，我主持了 Merc 的重生，将它领出了可怜的过去，把它带到了一个通向光辉未来的门槛前。没有夸大，也不用狂妄，我肯定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期货行业成员中的大多数人关于我这些年来的领导有同样的评价。E. B. 哈里斯给予了我最高的褒

奖，他称之为“利奥·梅拉梅德时代”。

如果我决定继续担任 CME 理事长，理事会将一致推举我，会员们也会全力支持，这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不过仔细考虑过所有的原因后，我觉得是到了该辞职的时候了。正如每一个优秀演员所说的那样，趁观众们还在疯狂地鼓掌时便离开舞台是最明智的。而像每一位演员一样，我希望受到所有人的热爱。不过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如果我不和他人共享一盏聚光灯的话，一段时间之后，厌恶将不可避免地取代赞赏。人性如此。因此，我辞职的决心已不可更改了。可这还是让我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我未来在交易所的日子怎么过呢？我只有 45 岁。我既可以完全退出理事会，又可以在此参加竞选，成为 Merc 的又一位统治者，就像我之前的许多理事长所做的那样。可没有一种选择合适。

要把我整个儿从 Merc 的统治机构中去除是件无法想象的事情。它的血管里流淌着太多我的血液。另一方面，在我的独特统治之后，再要想简简单单地坐在那个位置上好像也同样不合时宜了。理事会里也没有一个人希望我这么做的。这样说吧，我是这场游戏的发明者。事实上，我交谈过的每个人，不管是理事会还是场内会员，都希望我继续积极地担任领导角色。但如何继续呢？我同我的核心集团合计了一下。当时这个圈子包括了我所有的知心朋友：巴里·林德、莱斯·罗森塔尔、亨利·杰里基、拉里·罗森伯格、贝弗利·斯普雷恩和 E. B. 哈里斯。

这些幕后的谈话引发出了一个新的主意。为什么不建立一个特别的办公室，这样理事会便可以把我任命到那里去呢？经过推论觉得，我在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继续行领导之实，而不用与交易所那个有名无实的理事长去共同承担责任。这种解决方案，能够充分地打消掉我对继续“高处不胜寒”的顾忌。这听上去不错。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会员代表听听他们的反应时，它受到了绝对的赞成。这好像符合了场内会员们的愿望，他们希望找到某种方式来表达感激之情并能够让我继续介入进来。我们最终商定的职衔是理事会特别顾问。我的诽谤者们后来会说：“他那是加冕成了皇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这变成了一种超理事长待遇。然而，我还是坚持，该职位每隔两年需要理事会重新任命，因为它不必经过全体会员选举产生。这样说来，我解释道，理事会应该保留改变主意的权利。

我还记得 1976 年 12 月份最后一次理事会议。当时，面对大多数理事走走过场、毫无必要的反对，我坚持离开理事会议室，以便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让他们对这个想法进行自由的讨论。会议进行中，我却身处 Merc 理事会议室外，这种感觉是多么奇怪，又是多么令人难受啊——十年来的第一次。这种感觉我再没有体会过，直到我在 1991 年真正从 Merc 退休。（像会员们喜欢说的那样：“利奥从 Merc 退休过许多次了。”）理事会的一致通过，使特别顾问这个职位得以创立，而我又以一个崭新的身份重新进入了领导层中，这是我在之后的 14 年中一直拥有的身份。

不过首先，当然啰，在 1977 年 2 月会员们为我举行了一场退休晚会，这是我

（后来即是如此）那些像履行仪式一样的退休晚会中的一场。这场聚会由拉里·罗森伯格、丹杰瑟、乔尔·格林伯格和贝弗利·斯普雷恩赞助，其内容真是应有尽有。就是在这次，贝弗利·斯普雷恩第一次说出了“梅拉梅德是他自己头脑中的传奇人物”。巴里·林德率先发动了攻击，而莫里克·拉维茨用吉他演奏了一首标题为“梅拉姆多维奇”的东西，他自己填的词，照《戴维克·罗克特之歌》^⑥的曲调用他那刺耳的嗓子唱了出来。另外，一些 Merc 的忠实会员们送给我一块刻着“谢谢你”的纪念盘和一块传统的金表，并且凑钱在芝加哥大学设立了一个“梅拉梅德经济学奖金”。

虽然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担任过 CME 理事长一职，但我们的会员不久之后即认同了这样一个现实。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则轶闻最能说明问题。这位伟人曾经受到邀请，参加一位英国社交名流在其府第举办的节日宴会。“丘吉尔先生，”当他抵达时，这所房子的女主人说道，“我希望您坐到主座上去。”温斯顿·丘吉尔停下来看看这位女主人，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夫人，我坐到哪儿，哪儿就是主座。”

我的意思很简单。领导权并不是靠你坐在哪儿或你有什么头衔而能得到的东西。我并不需要合法的头衔。虽然从我成为特别顾问那刻起，我就一直融洽地与 CME 理事长合作着——同他共同担责任、共享聚光灯，然而周围的世界和我们的会员清楚实际情况，他们继续把我看做 Merc 的领袖。

在我成为特别顾问的时候，众望所归，但在今天回顾当初，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多年之后，随着会员构成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新近加入的会员对 Merc 的历史知之甚少，他们就会把我当成某种独裁者。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一些新会员有时会奇怪我为什么不像其他所有人那样经过选举选出，对此我并不惊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历史。他们都知道过去的一些零星片断，而这些听上去已经比传奇还要传奇了（鲍伯·塔玛金关于 Merc 详细历史的著作直到 1993 年才发表，也就是在我辞去交易所公职两年以后）。我过去常常开玩笑说，我必须每天到交易场去转一圈，好向大伙儿展示这段传奇确有其事。不过，在我的任期即将结束时，大多数 Merc 的会员们对我地位的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

CME 理事长的选举过程不同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后者的理事长从全体会员中选举产生。在 CME，理事长是在理事会中选出的。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不过 Merc 的做法保证了制度的延续性。尽管我几乎没有介入到理事会职位的竞选中去，在选择我愿意支持的理事长人选上，我却是非常谨慎的。在理事会议室这种场合，你很快就能了解谁是可能的领导者，他们是否诚实，他们是否脚踏实地，以及他们是否值得信赖能够公开地代表 Merc。而只要我是特别顾问，任何一位竞选理事长职位的理

⑥ 为美国边疆开拓者，其狩猎和同印第安人作战的传奇广为传颂，后在阿拉莫被墨西哥军队杀死。

事必须得到我的全力支持才能成功当选。当选举程序在秘密举行的时候，理事会成员都唯我马首是瞻。不过，也可能出差错，有些时候教训还是非常沉痛的。我成了四个人的导师，这些人包括约翰·盖尔德曼、拉里·罗森伯格、杰克·桑德纳以及布莱恩·莫尼森。每个人都有我所钦佩的特长，他们担任理事长期间，我和其中任何一个的关系都不错。反过来，他们也都高兴和我共同参与决策过程并且分担工作职责。

在1974年和1975年，我支持约翰·盖尔德曼当上了理事长。他在交流和电脑上的才能对那时的交易所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虽然公开演讲和领导魅力并不是这位性格死硬的共和党人的强项，盖尔德曼却是直肠子一根。也就是这个特点吸引了我，因为我仍然担心得要命，害怕Merc可能又会回到过去那种“你瞒我、我瞒你”的道路上去。只要理事长愿意保护交易所的规则，我觉得我能够继续在华盛顿和其他的公开场合代表交易所。之后证明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盖尔德曼和我成了密友，工作配合得非常默契。我们的真正利益便是让CME变得更好，对此我们谁也没有怀疑。我在1989年和1990年再次将他推上了理事长的位子。

在我于1977年成为特别顾问之后，拉里·罗森伯格代替我成了Merc的理事长。罗森伯格是我的清算公司戴尔舍投资公司的副主席，不过我们的友谊超越了生意的范围。他是从CBOT来到Merc的，而我帮忙使他入选了我们的理事会。我们共同的犹太身份和文化背景使罗森伯格一家（拉里和他的妻子琼）成了贝蒂和我的知交。他收过良好的教育，诚实，知道并了解交易场的事情，这使得我在离开之后继续支持他竞选理事长变得容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虽然对于私人生活，他比我还要讳莫如深，他却对国家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我采取了关于Merc进行积极政策参与的工作计划，为的是建立一个华盛顿的权力基地，对此他也表示同意。他的民主党倾向和我的保守风格不是一直都能相合的，不过在CME的事情上我们总是有共同点的。罗森伯格的两种特质对我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那强烈的幽默感，还有他总是衣饰华丽。后者让我们理事会的大多数成员偷偷摸摸地妒忌起来。在他的任期内我们始终是好朋友，并且经常一起周游世界去为期货布道，宣扬Merc的全球主义。罗森伯格从1977~1979年担任Merc的理事长，以及首先在1976年，后来从1983~1987年任副理事长。

杰克·桑德纳，这位茹芬纳赫特、布罗马根和黑尔茨公司（RB-H）的总裁，在1978~1979年间担任第二副理事长后，之后接替罗森伯格于1980~1982年担任理事长，并于1986~1988年再次担任这一职务。我唯一一次与理事会另一派别的严重政治冲突便是发生在他初次参选理事长的时候。唐纳德·米努西厄奇，这位理事会里的老资格，受到我的老对手比尔·卡茨力捧，参加理事长一职的角逐。米努西厄奇是一个有想法、行事正派的家伙，不过我还是觉得桑德纳的演讲能力可以使他成为一名更为出色的理事长。这是对我在理事会上政治力量的一次关键测试，而我也

不遗余力地推选桑德纳。投票结果如我所愿，这也让桑德纳得到了全体成员的注意，并且在 CME 的权力阶层中为他创造了第一的位置。特别是因为我的支持，使得桑德纳在 CME 中以这样或那样的身份进行领导的年头比其他官员都要长。结果，桑德纳在我身边度过了相当多的时间。

在桑德纳的首任届满后，迎来了我核心集团中打桥牌的老哥们儿——布莱恩·莫尼森，他也经营一家期货佣金公司——GNP 商品公司。他在 1980 ~ 1982 年之间是 Merc 的第一副理事长，从 1983 ~ 1985 年担任理事长。他吸引我的地方是他高超的市场感觉。虽然在一些方面不甚老练，他对于世界却有着一种天生的感觉。莫尼森在衣着上缺乏的，他在脑子上都补了回来。他了解复杂的经济问题，并且能够就 Merc 新的概念性市场与我进行探讨，他的见解胜于其他任何一位理事。他是理事会中极为稀有的交易员理事之一，像我一样，我能够和他就某种交易方法讨论一番，因此我们之间还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至少你和我还知道现实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在与理事会中的其他人激烈地争论之后，他会经常这样对我说道。莫尼森的唯一问题就是他太过于相信别人，这种性格特点最终给他招致了严重的问题。

我总是认为，变革是建设 Merc 这一持久过程中的一部分。由此看来，我并不介意引入新的管理执行人才。但是领导的延续性也是我关于 Merc 战略的关键方面，因为这向世界表明我们是稳定的。这也就是这些年来，为了保证延续性，我精心安排了一条延伸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职位链，并且在前进道路上辅佐每一位 Merc 理事长的原因所在。

同大多数机构一样，Merc 有一个自成逻辑的体系，它也在承受着传统和惯性的重量。将近 25 年里，我已经建立了这个逻辑体系的一大部分。正是领导的延续性使得 Merc 能够抛除那些困扰多数大机构的官僚主义羁绊。我让这条延续性的细线绷得紧紧的。例如，当桑德纳在 1988 年辞去理事长一职时，虽然他已经达到了最大的连续任期规定，应他的要求我还是敦促理事会为他开设了一个新的职位。我们在“高级政策顾问”上达成了协议。在他于 1991 年再次担任理事长时，罗森伯格当选就任这一高级政策的职位，以代替离职的桑德纳。

每一个理事长都有一个特殊的长处：运动型并且和蔼可亲的罗森伯格擅长于市场推广和公关；头脑灵活的莫尼森了解技术和系统，就像盖尔德曼一样，后者也管理过我们的扩张工作；而桑德纳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实用主义者，具有娴熟的谈判技巧。

他们怎么说也不是一伙溜须拍马之辈，他们同我的目标一致，又可以分享我的权力。自然，我与他们密切地合作着。不过我真正罩着的人是桑德纳。他是一个苦干家，又有市井中的小聪明，当他还是一个刻有文身的 15 岁孩子的时候，他便从中学辍学，之后又跳了回去，上了大学，然后敲响了圣母法学院的大门，全凭一张嘴便

进入了这个学校，并且以荣誉身份毕业了。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桑德纳为莫里克拉维茨律师事务所打了几场官司。他和商品交易员的第一次接触可笑地发生在 1969 年我公司的圣诞晚会上，在 Merc 大厦的五楼。我那时并不认识他，而他也是不请自来，想会一会我的这一帮人。当艾迪克·希尔和瓦利·威兹柳斯基和他在晚会上迎面撞上时，话语尖刻起来，而且桑德纳又使出拳击技术将毫无防备的威兹柳斯基摆平在地。桑德纳随后便逃之夭夭。虽然这一事件让我极为扫兴，我也是既往不咎。我和桑德纳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在后来，当时他正在处理一些账目问题，并担任里顿豪斯经纪公司的法律顾问，该公司违反了 Merc 的一些规则。桑德纳接受了批评，并且向我保证违规行为将会被纠正过来。两年后，他借了 8 万美元买了一个 Merc 的会员资格，而把他的法律行当搁在了一边。

1976 年，桑德纳加入了 RB-H——这一全国最大的商业家畜运作企业之一。他穿了一件交易马甲，一双牛仔靴，就这样进入了活牛交易池。他还参与到交易所的政治中去，在 1978 年当选为理事。我们在随后的几年里密切合作，应对了一些 Merc 最大的挑战，并在这个过程中交上了朋友。我之所以会经常邀请他陪同我们 Merc 的代表团正式出行，甚至在他不再是理事长的时候也是如此，其主要原因便是我们的友谊。我们不仅在旅行时彼此相处得非常愉快，而且在家中同他的妻子卡罗尔都是亲密的朋友。作为理事长，他在 Merc 的问题上总是等我做出决定，并且彻底听从我的领导。正如他经常私下或是公开场合承认的那样：“利奥，你是我的导师。”

随着日月变迁，理事长走马灯似地变换，我却始终如一。不过时不时地，首席“麻烦解决者”的负担会压迫我，而辞职的想法也强烈到无法抵抗的地步。其中一次是在 1984 年 11 月 7 日，那次就好像我在整个交易所上空投下了一颗炸弹。当天我再一次写信给 Merc 的全体会员，宣布我有意大幅度削弱我在 Merc 的地位。老问题还是不断地来烦我，我需要更多的时间陪我的家人、打理我的生意，还有《第 10 颗星球》——一部我已经开始撰写的科幻小说。

我并没有完全地抛掉交易所的生活。我希望可以继续担任特别顾问，这个职位不领工资，七年前我辞去 Merc 理事长以来一直担任此职，在中央层面上为 Merc 服务。不过我觉得我将不再参加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会议，也不再插手 Merc 当前的决策过程。当时的理事长布莱恩·莫尼森形容我的新角色是从“一个运作经理转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战略规划师”。

我的半自我流放生涯只持续了五个月，我很快意识到我尝试做的事情并无可能。Merc 的理事会、理事长、总裁以及员工们长期受我的领导，以至于突然之间无法改变他们的行事方法。只要我的身子还出现在理事会会议室的桌子旁，我的声音和意见就具有主导性。因此，虽然我假装半退休，可我比以前插手得还要深。我只有向

现实低头，所以又写了一封信给 Merc 的会员们，解释说：“为了解释马克·吐温的作品风格，我提前退休的消息遭到了绝对地夸大……而且，尽管这封信势必导致一片哗然，我还是觉得应当澄清事实。事实上，正如多数获悉消息的观察家所知，我并没有获得准许以原先计划的那种程度从 CME 的事务中引退。”

忘了引退吧！到 1985 年为止，我的职能和职责之多，使得我“特别顾问”的头衔完全是用词不当。在国际上，这个头衔甚至起了误导作用。当时的 Merc 总裁克莱顿·尤特，一次从日本回来，告诉我说日本官员将“特别顾问”解释成一名律师。我和尤特、威廉·布罗德斯基、CME 理事长布莱恩·莫尼森以及其他 Merc 的官员们商量，想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头衔。那些讨论使 Merc 的职位等级真正确定下来。CME 的规则得到了修改，规定特别顾问成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因为执行委员会包括了 Merc 所有的官员（也包括理事长），并在理事会休会时运营交易所，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反映了我在 Merc 的真正地位，这无需进一步的解释。

这个头衔也符合我的想法。当然我很清楚我又一次成了 Merc 的理事长。不过自从 1977 年起——当时我担任了特别顾问一职，促使我分享头等荣誉的道理依然说得通。毕竟，理事长这个头衔并没有实际需要。Merc 通过委员会的架构进行运作，而我基本上是每个常设委员会以及许多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不管是为交易所开发所有新的金融产品的金融工具指导委员会，或是监督 Merc 在国外办事处和运营机构的国际指导委员会，还是创造和指导 Merc 长期规划的战略规划委员会，或是管理我们政治行动决策的 CFPF，或是指导 Merc 法律工作的立法委员会，抑或是阶段性为单一目标服务的一批特别委员会，我作为委员会主席，便能够领导他们的工作和活动。由于多数这样的委员会的组成包含理事会理事和（通常来说）Merc 的理事长，他们的建议将无可避免地为理事会所采纳。

因此我在 Merc 的职责无所不包，一以贯之。不过权力就随持续性而来了。权力是一个怪东西。当我寻求它的时候，我意识到它所具有的动力既诱人又危险，它可能是一个诡异的陷阱。权力能够诱使你相信你总是无所不知。你总是知道真理。我的少数几个担心之一便是——不要让那种因为我一直任职而产生的权力影响了我的感觉。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应该如何检验我是否违背了真理呢？我知道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公开的对话。我鼓励别人和我进行争论，以检验我是否理性，让我接受一个崭新的观点。如果他们无法做到，那么我通常会自行其是。不过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便会立即掉头。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总是不断寻找一些理智的人加入到 Merc 的领导层里来。我知道每一位领导者的根本财产就是他周围的人。独木不成林。每个单位必须具有这样一些官员，他们聪明、诚实，在业务上有专长。因此，当我面试那些应聘 Merc 高层的新人时，我并不仅仅关心他们的履历，这虽然重要，但是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我所希望了解的是，他们是不是能够勇敢地站在我和其他 Merc 高层官员的

对面，有勇气告诉我们——言简意赅，你们错了。这不是一个容易发现的品质。而且这也往往不是在一个工作面试之中就能发现的。

一旦入了伙，员工们很快就知道我愿意公开地与他们争论问题。“公开”意即在 Merc 会议的范围内。我们的律师杰里·萨尔茨曼是任何一次公开而且有时激烈的争论的焦点——主题多样，从规则制定到 GLOBEX 建立不一而足。我认为萨尔茨曼经得起理性方面的质询。他为人机敏，对最为复杂问题的领悟能力令人惊叹。不过对我来说，其最为重要的特点还是他在诠释自己对真理理解时的那种全力以赴、矢志不渝。无论对错，我都指望萨尔茨曼能够提出他的观点，并且可以和我进行争论，如果他觉得有必要的话。

还有里克·吉尔克林。他师从福瑞德·阿尔蒂逊，后者也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吉尔克林从联邦储备委员会带着作为金融经济学家的骄人纪录来到 Merc，不过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固执，而且十分诚实。作为 Merc 创新能力最强阶段中一些时期的首席经济学家，吉尔克林敏锐地分析了那些不总是显现出来的、深藏其中而且复杂的问题，从而为 CME 做出了贡献。而且他对错误有坚定的原则。实际上，他的一意孤行完全没有政治上的考虑，有时可能令人尴尬。举例来说，那次桑德纳、吉尔克林和我在伦敦征询罗斯柴尔德银行主席对于将“黄金定价”概念引入芝加哥的看法。从后来吉尔克林和主席之间的激烈争论，你甚至会觉得吉尔克林在这个问题上懂的比那些著名的罗斯柴尔德人还要多，而正是后者在几十年前创立的这个概念。不过，我还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吉尔克林的固执或许令人讨厌，它却代表着一种我能够一直依赖的巨大力量。吉尔克林不总是我行我素，不过我们从来不用去怀疑他的立场。我过去经常在执行委员会前或一小帮官员间提出他的一些颇具争议的想法，因此他的观点就可以在一个高度吹毛求疵的环境下受到检验。最为重要的是，我靠吉尔克林告诉我真相。有几次，就如同在 1987 年股灾之后，像吉尔克林的这种性格对于 Merc 的命运是非常关键的。

另一位口无遮拦的明星是约翰·戴维森。他在 1983 年受雇于 Merc，起初担任清算所国内业务经理。不久之后我开始与之有了私人接触，并且发现他为人诚实，具有清算所方面事务的精深知识。我看中了他对于 Merc 中是与非的那种完全坦诚的态度，并为之衷心地喝彩。戴维森以流星般的速度在 Merc 的职级表中向上升去，最终成为清算所的高级副总裁。那可正是时候。Merc 正处在其交易清算运作模式的关键转折时期，迫切需要一个既精通专业知识又不怕摸老虎屁股的人。我很高兴能够让他信马由缰。在戴维森的领导下，我们进行了创新，改变了我们的清算程序和运作模式，这样一来，当 1987 年股灾发生的时候，我对我们处理那个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的能力抱有信心，并且肯定戴维森交出的统计数据能够证明那次股灾并非是 Merc 所为。

一些 CME 的官员们，包括杰里·贝厄在内，因为讨论主题的敏感性，更加喜欢

关起门来进行我们之间的讨论。多年以来掌管 CME 和规与监管事务的贝厄明白，有关和规与否的检查以及 CFTC 的一些监管方面的问题可能会产生像爆炸一样的后果。因为在期货交易所颇不得志，他来到了 Merc。不过杰里·贝厄是个极为聪明的人物，他有能力看清人们隐藏起来的动机，而且他也能够意料到因监管而产生的后果。他常常会抓紧时间把他的结论强加于我，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他完全值得信赖。就像他对我说的那样，Merc 是他的情妇、他的爱——就像对于我一样。这种对于 Merc 的献身精神在我们之间结下了一条强大的感情纽带。最为重要的是，他遵循我的要求，让我了解他手中每个事件的全部本质，无论其结果如何，或者我是否会喜欢我所听到的东西。我相信贝厄的判断，并几乎总是按照他建议的方法行事。

阿莉森·波斯纳也喜欢在幕后工作，并且一样地有着出众的能力和忠诚。来 Merc 之前她在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担任新选择权产品的研究分析员。在我们第一次面试中，当我问到她希望在 Merc 做什么时，她回答：“我希望像你一样。”这个回答最让我着迷的地方不在于其中的奉承，而是它的大胆。正如贝弗利·斯普莱恩曾经说的：“我是自己心中的一个传奇。”眼前是这样一个人，几乎无所作为，但却有着一份希望成为传奇的莽撞。这是我最为幸运的雇用者中的一个。波斯纳升得很快，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她与众不同的优点中的一个便是，当她觉得我做错了，不管问题的实质如何，她都能够私下里告诉我，不过却毫不犹豫。这有时不免泄气，可却总能让人有崭新的视角。像杰里·贝厄一样，波斯纳对于人们的动机和他们感情上的微妙变化非常敏感，而我却经常看不见这些东西。因为她能够直接进入我的办公室，还有她那种坦率直言的行事风格，她可以洞悉其他 Merc 员工的优点，我却相反，对它们往往视而不见。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默默无闻地待在 CME 研究部的分析师戴维·埃曼纽。没人对埃曼纽的才华多加注意，也没人关心他所发明的选择权风险评估系统。一直没有人，是波斯纳让我注意了这件事情，并且说服我去检验一下他的工作成果。埃曼纽异常欣喜，因为最终可以向某个人来演示他的创新产品了，而这个人能理解它的巨大价值。后来产生的 SPAN，即标准组合分析系统，是如今全球期货行业在保证金评估方面的标准机制。

这样说吧，波斯纳可以辨别我周遭的环境地貌，并且向我提供建议，除了这种能力，她还具有一种组织材料、为手中的项目精确地提供合适文件的独特才能。她可以把我口中的那些想象中的创意和点子转变成“硬拷贝”。在这个方面，波斯纳俨然变成了同我一样的人。当 GLOBEX 的概念在 CME 的会员中以压倒性的优势得以批准时，我将它大部分归功于阿莉森·波斯纳创作的文字和图片材料，每一个会员都得到了这些东西。

也因为面临着反对，所以我也经常会将我的那些最为严厉的批评者任命到重要的委员会中去。要想听到他们的观点，要想把它们与我的加以对照比较，这是条必

经之路。对于局外人来说，我可能表面上位高权重、不易妥协，可是理事会和局内人的看法就不同了。这些任命所产生的最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的批评者亲身体会到 Merc 的决策过程是以一种平等的方式进行的，而并非外界普遍认为的那种独裁风格。经常是这样，发现的结果使一个敌人变成了一位朋友。这种变化使我更加相信，开诚布公的商量还是可以影响大多数人的。

就这样我领悟到领导艺术是许多事情的综合体：要看、要听、要准备。或者像洛杉矶国王队那位伟大的冰球明星韦恩·格雷兹基说的那样：“朝冰球要去的方向滑，而不是它曾经在过的地方。”不过，最为重要的是，领导艺术包括对真理的寻求，以及影响他人信仰它的能力。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22 章

Merc 前往华盛顿

生命中许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但你是否曾经试过不用钱去买它们呢？1976 年当我开始筹建 Merc 在华盛顿的政治基地时，我想起了幽默大师奥格登·纳什的这句妙语。我意识到虽然钞票买不到选票，可它能够提供其他的东西：与那些有权投票的政客们接上头。

Merc 正是雄心勃勃的时候。我们的市场在成长，交易所的价格在各处被使用着，这让我们受到了充分的关注。交易场内业务繁忙、气氛活跃，报纸上也经常有连篇累牍的报道。交易员们忙着赚钱。会员、公司和交易所本身的业务都有广泛的拓展。新会员不断地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有关我们的潜力的消息传遍了全美国。我们就像一个大熔炉，汇集了新的想法、新的要求，大家普遍觉得有奔头，浑身是劲。我的时间都花在了一连串旋风般的会议、演讲和讨论上面，速度之快，令人目眩。

我没有写下来的计划或者蓝图来遵照执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我脑子里。那些细枝末节全部在我的脑海中，就像某一种秩序漂浮着的星球一样互相联系着。要让它运作起来，我必须得控制住委员会、人和钱包。我知道我需要的人才，以及驾

驳 Merc 朝哪个方向走。我并不是哪个商学院或者哪个公司的产品，我所做的大多是出于本能，而非什么逻辑性的举动。Merc 一日千里地前进着，所以我必须要肯定它最后不会像自由落体一样失去控制。部分的控制因素与政治有关。新的成功让我们闻名全国；知名度给我们引来了注意力；而注意力又让我们成为了政治上的标靶。而作为标靶我们总是非常地脆弱，因为我们没有影响力。我总结道，如果想要一如既往地达到它的目标，并且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参与者的话，Merc 需要影响力。

美国的期货市场存在了大约 130 年的时间，但要说到货币和其他的金融工具，它顶多只是一个新兴的产业。现在我们需要将自己与金融期货市场联系起来，提高立法者的认识程度。我们的政治朋友们主要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们，他们明白并且欣赏这些交易所和它们的影响。不过这样就有盼头了：来自“小麦带”的议员们了解农民，而那些来自密歇根的，便是汽车工人了，等等。

整个期货行业处于转型之中：交易所是飞速成长的服务行业中的一部分，而后者正在取代美国的制造业。金融市场也有一天会取代农产品市场成为主导的期货市场。我希望能跳过国会这个龙门。如果这些市场会发展，就像我预计的那样，我们必须改变与立法者之间的关系。唯一进入他们头脑的方法，我相信，就是让他们进入 Merc。不过首先，要在华盛顿的走廊中穿梭，要掌握政治生活中的要领，我需要一位向导。

CME 新一届理事长拉里·罗森伯格，也就是在 CME 重组后我的第一位继任者，同意我的有关开设一个华盛顿办事处的想法。他像我一样认识到，我们最大的弱点在华盛顿。“如果我们不到那里去，他们就会来找我们。”他打趣道。因此我们请一家管理人员搜索公司帮助寻找那个能够为我们开设“华盛顿之窗”的合适人选。他们向我们介绍了 C. 戴尔·黑宁坦，我们把他带到了芝加哥，并且当场录用。戴尔在美国空军里待了 20 年，先升任少校，后来又担任了众议员 W. R. 波伊吉的行政助理，后者也就是那位令人尊敬的得克萨斯州农业委员会的主席。作为一个在得克萨斯坦普尔（波伊吉的家乡）长大的理发师的儿子，黑宁坦伶牙俐齿，知道在国会山那儿该怎样大干一场。对于第一家在华盛顿开设办事处的期货交易来说，我的目标清楚而直接：让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更好地为立法者所理解。

说波伊吉是黑宁坦的导师是不完全的。在黑宁坦 7 岁时波伊吉便是他的议员了，从他 16 岁起两人成了朋友，在他 40 岁时又成了他的老板；而黑宁坦在 50 岁时又在游说波伊吉了。1978 年，80 岁的波伊吉退休了，而黑宁坦则有意回得克萨斯竞选波伊吉的议员席位。我们为了给黑宁坦造声势，特地把他安排在拉里·罗森伯格的私人飞机上飞到芝加哥，拉里·罗森伯格也是一名飞行员。黑宁坦对 Merc 知道得很少，所以我们把他招了进来。

我告诉他，我担心的事情就是我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如果有的话。我经常是拜会

一些人，然后离开——总是有虽然吃了一顿饭，但还是饥饿的那种感觉。从来没有什么后续工作。如果我过几天打个电话，更多的情况下，Merc 将只是一个模糊的回忆而已。

“你希望我做什么，利奥？”黑宁坦问道，“在朗沃斯大街和国会山交叉口有个拐角，所有的国会议员们都要在那里穿过马路去投票。”我说：“实际上，如果你需要看到一些人，你就到禁行路灯那里等着点名，你会看见你需要看见的每个人，这样就省了很多时间。我就希望你就在那个拐角站着，并让每个人都说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我知道怎么做，”黑宁坦说，“但这会很昂贵的。”就在当时当地我们开始增加押在黑宁坦身上的筹码。担任波伊吉行政助理时，他的年薪是2.2万美元。我们给他开的是6万美元。几个星期后，位于五月花酒店隔壁、康涅狄克大街1101号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华盛顿办事处，就由黑宁坦和一个秘书运营起来。

我希望 Merc 找到发言的机会，就像那些来到国会山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所做的那样。Merc 推崇自由和公开的市场环境。你又如何去解释呢？我知道我可以向华盛顿的官员们推销这个市场的魅力所在，但在他们的特区办公室里我可不能这么做，因为候见室里有他们的委托人在等着，会有不停的电话来打断谈话，还有他们的工作人员在一直转移着他们的注意力。另外，要完全体会我们市场的活力，你就必须去亲眼目睹。这就意味着仅仅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把国会议员们带到 Merc 来。

当了7年波伊吉的行政副官后，黑宁坦在“山”上有极强的人脉。他与得克萨斯派的关系尤为密切。在他开始为我们工作后不久，得克萨斯的吉姆·莱特，就是那个以一票优势当选多数派领袖的民主党人，致电黑宁坦，祝贺他的履新。

“如果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就尽管说吧。”莱特说道。

我在第二天打电话给黑宁坦时，我问：“我们该把谁第一个带到芝加哥呢？”

“嗯，我们为何不从多数派领袖开始呢？”黑宁坦回答道。

莱特过来参加了一个晚会。在里兹·卡尔顿酒店的三个多小时的宴请中，这位多数派领袖、罗森伯格、黑宁坦和我谈论了政治、我们的背景，还有市场环境。他了解了 Merc 和它的潜力，明白它将成为该行业中的翘楚。笼络莱特的工作开始了。由此建立的关系史的我能够就一些行业问题直接打电话给他。我肯定地认为这个新发展起来的友好联系会持续下去。几年以后，当吉姆·莱特成为众议院发言人时，我为他安排了一次与 CME 理事长杰克·桑德纳的会面。这位发言人同意了，杰克和我非常荣幸能够在他的私人餐厅中与他共进午餐。这次机会让我们发现原来这位发言人和桑德纳一样，都是拳击迷，并且在后来结伴前去观赏了一两次拳击比赛。

黑宁坦教我认识到了国会工作人员，甚至包括秘书们的重要性。黑宁坦记得所有人的秘书们的名字。“他们拿着进入这个王国的钥匙，”他解释道。顺藤摸瓜，我是毫无问题的，所以不久后我便成了许多关键人物的哥们儿。比如说，马歇尔·莱内

姆是多数派领袖的左膀右臂。在费城著名的装订商餐馆里挂着一幅相片，上面我正在为莱内姆擦鞋子。虽然这是个开玩笑的玩意儿，但却是莱内姆最引以为豪的照片。在那之后，在他面前我就没有什么可忌讳的了。

在经济学研究上，我持保守观点，但在社会问题方面我就是个自由派了。这也就是我在两个政治派别中都吃得开的一个原因。仔细看来，许多与国会议员们的友好关系建立在感情因素上；你们或互相喜欢或话不投机。当然，我可以成为堪萨斯共和党人鲍勃·多尔的好朋友，我也可以和马萨诸塞的民主党人逊普·奥尼尔有着一种特别的关系，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我出身于书香门第，所受的教育偏重于犹太文化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奥尼尔则来自狂风暴雨般的爱尔兰政治文化。

甚至从体格上看，我们也是两个极端：我身材普通，面色黝黑，一头整齐梳理的黑发；他是一个脸庞红润的魁梧汉子，五大三粗，头顶一丛浓密的白发。我们几乎就是自己的漫画形象。但神就神在这儿。每当我们在一间屋子里，而他又看见我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朝我挥手并且说：“利，站起来。”奥尼尔竟然知道我的名字，我对这一点总是吃惊不小。他让人觉得激情四溢，而他又非常会作秀；他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并且又是握手最用力的一个。只要观察他摆布一帮人的那种方法，就让我获益颇多。他为人们所爱戴和尊敬。

在我们建国200周年庆典的时候，黑宁坦在费城的独立厅为Merc安排了一场聚会。当我等着要陪逊普·奥尼尔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在抽着一根粗大的雪茄。可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厅里面，吸烟是严格禁止的，而且我们也已经仔细地告诫过我们的客人。然而谁跟逊普讲呢？他的秘书长瞟我，轻声说道：“没人。”逊普·奥尼尔是唯一一位在独立厅里抽过烟的人。

另一次，在博卡·拉顿年度期货行业会议期间，我们在一艘租来的游艇上邀请了两三百名客人。当晚我们的贵宾就是逊普·奥尼尔，我们计划了一次赏心悦目的水岸泛舟。我陪同这位发言人上了船，不过逊普看到了这艘船突然停了下来。他把我拉到一边，轻声说：“利，我讨厌被困在船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强迫我做这个或者做那个。这艘船不会离开那个他妈的什么码头吧，嗯？”当然，逊普·奥尼尔没有留下任何令人质疑的空间。我命令船长，当晚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湖岸一英寸，否则格杀勿论。

在交易场中，个人背景如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我要说的是政治舞台与交易场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交易合约，立法者们交易着想法，不过最终，重要的还是业绩，这才是成王败寇的分水岭。只是我们用美元来衡量业绩，政客们靠的是选票，当然选票也要花钱。

黑宁坦思考着，期货行业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它才刚刚发现公共政策是在华盛顿制定的。当然，这也有好处。像他说的那样，通过试图进入华盛顿的工作，“你真正就快要进到一个鱼缸里去了。”

我们已经在里面了。你所要做的就是随便捡上一天从 Merc 的参观廊往下望，就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我们不像大公司那样，把股东和报界关在门外，闭起门来处理问题。我们的生意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我们根据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买卖我们的产品。交易所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一扇窗户，反映出发生在各个角落里的事情；它是一个既带着好消息又带着坏消息的信使。但也就是一位信使。它还是一套自我修正的系统，运作起来几乎不需要他人的摆弄。

我知道一间华盛顿办事处仅仅是解决了这个难题的一部分。我们同样需要全国性的立法和政治上的资金。我意识到，如果 Merc 的总裁是值得华盛顿敬礼的某个人的话，那将会是极大的帮助。不幸的是，这个人不是曾经担任 25 年 Merc 总裁的 65 岁的 E. B. 哈里斯。哈里斯就是这样一种人，我对他敬爱有加。他交游广泛，可以打上几个电话，能够找人帮上几个忙，可他却不知道如何在华盛顿调兵遣将。他怎么能呢？那从来就不是他的工作。虽然哈里斯在以往就像我的一张安乐毯，但如今他却迷失了方向。他的喋喋不休、他满怀着的激情以及那些自产自销的处世哲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真是妙不可言，而在 70 年代的国际主义中却不合时宜。“英国人的穿着，意第绪人的思想。”他常常私下里对我说。这句话很可爱，但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未来是我当前所担心的。IMM 是一把国际性的钥匙，是通往伦敦、东京、新加坡、中国香港、法兰克福和巴黎的桥梁。我需要某些不仅具有华盛顿关系，又能进入国际圈子的人物。我们正在树立一种全新的、异于从前的形象。

我认为哈里斯也知道这一点。他觉得他的时代已经完结，并且有时向贝弗利·斯普雷恩提起，斯普雷恩便会耸耸肩膀，叹口气。然后她经常来向我表示同情。斯普雷恩催促我把真相告诉 E. B. 哈里斯，可我拒绝了，因为我不想伤害他。我希望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之后，在 1977 年的一天哈里斯想探探口风，便对我啾啾地说道也许他该退休了。我欢呼一声，当场就接受了他的提议。哈里斯让我迅速的反应给吓了一跳，不过他总算解放了。我们商量好 1978 年退休的日期。

罗森伯格和我组成了一个总裁寻找委员会，我任主席。我们仍旧让那家全国性的管理人员招聘公司——斯宾塞·斯图尔特来找人。斯宾塞·斯图尔特公司的合伙人斯科特·谢尔顿在设计我们的战略时起到了极为宝贵的作用，但是从一开始起我认为我知道下一任 CME 总裁应该谁。我的目光投向了克莱顿 K. 尤特。我曾在几年前见过尤特，当时他还是农业部的助理秘书。他熟悉华盛顿，思想上又是一位自由市场论者。他曾经协助起草了建立 CFTC 的有关法律，所以他对我们的市场有一些了解。大约一年前，我曾经把他领到 Merc 来参观过一次，并看出他对交易场和对会员们的态度。我们共同的保守经济信条和我们相同的关于庞大政府的不赞成态度让我们很容易就能立即相互欣赏起来。

但这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买卖。尤特对 Merc 知道的不多，而他也担心其声誉受到影响。Merc 过去的历史对他来说是个问题。逼仓事件和洋葱丑闻绝不是干一番华盛

顿事业中的组成因素。在共和党人的圈子里，他是一只潜力股，而我也知道他不可能在 Merc 待上 25 年，因为他太有野心了。尤特是一名律师，又有农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 47 岁的他，曾担任过福特总统的美国代理特别贸易代表。我们俩都明白他在政坛上前途似锦。

当我向他提出工作邀请时，他犹豫了。他告诉我他不能对它置之不理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本人尊敬我，并且赞赏我所推出的这些革命性的市场。他确定 Merc 的未来在金融上，而我已经把它引入了正确的轨道。这些足够鼓励我游说下去的了。在他驻留芝加哥的奥哈拉机场时，我们在那里碰过两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交谈。第一次我们没有结果，不过在第二次结束时，我认为尤特对这个主意开始热衷起来。

在一间机场的小餐馆里，喝了无数杯咖啡，我们花了几个小时讨论这份工作：他可以自由地打着 Merc 的旗号，告诉我们有关那些尚未使用期货的领域里的情况，并提高我们对国际社会的认识程度。我们不会要求他担任行政主管一职，因为我们的执行副总裁贝弗利·斯普莱恩将会继续担负起这一职责。会员方面，我来负责。最重要的是，我保证 Merc 再也不会滑到它从前的老路上去。说话之间，我可以从他的眼里看到未来的机会：会见全球各类金融界人士的可能。只要 Merc 的声望不断提高，他的声名也就不成问题。Merc 的地位将会极大地推动他的事业，我觉得我已经让他相信了这一点。

尤特边从桌边站起来，边恭维我：“利奥，你他妈的真是一个游说高手。要想说服我接受这份工作，你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我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我心里美不可言。我们握了手。Merc 有了一个新总裁。

尤特拿的是公务员的薪水，而我们给他的要多得多。不过他并不是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那种人。如果他觉得这份工作将影响他在美国政治系统中的升迁，他就会辞职不干。当然，这不会发生。在完成他在 Merc 的定额工作后，他会继续成为美国的贸易代表、农业部部长以及共和党主席。尤特生性独立，但是他对于华盛顿文化的体会教他成为一名团队奋斗者，并且愿意听从命令和指挥。当他在 1978 年开始总裁生涯前不久，他对我说：“听着，Merc 是你的。我只是一个外来打零工的。”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让他的私人日程压过在 Merc 的工作，这种风格我非常欣赏。我们达成协议，他当“门面先生”，我继续做“内务总管”。事实证明，这是一段完美的联姻。

凭着脸上时常挂着的笑容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尤特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美国及海外的业内会议上都充当了一名理想的使者。在接下去的四年里，他马不停蹄满世界地跑，并会在 Merc 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向我汇报他的工作进展。在国际层面上介绍 IMM 及其市场的情况，尤特在这一点上干得非常出色。Merc 从中获益良多，并得到了持续的成长。就在任命尤特的同一个月中，我们在华盛顿的办事处开张了。他在就任 Merc 总裁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将在国会山积极活动，因为那里是“值得一干一场的地方”。曾经在政府里工作过的他明白官样文章的危险，并且也直言不讳。

“我们不会向 CFTC 磕头，”他告诉记者，“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如实告诉他们，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结果证明，克莱顿·尤特，如我所料，是在 CME 关键时刻最好的交易所总裁人选。

后来，我们雇用了查尔斯（奇普）·西格担任法律顾问，应付监管部门和国会立法事务，我们的华盛顿办事处因此得以壮大。西格在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华盛顿办事处工作，那是个内布拉斯加州的事务所，尤特曾经是里面的一位合伙人。该事务所专长于行政法。

与尤特和黑宁坦一样，西格也是一只政治动物。作为一位空军职业军官的儿子，西格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们在浪迹天涯的生活中成长起来。每隔 3 年左右，他们便要举家搬迁，这样西格学会了很快就交上朋友，也使得他那 6 英尺 3 英寸的身板显出运动员般的体魄。他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国会议员查尔斯·提格再选班子里。提格是加州的共和党人，在州农业委员会公干，这就使西格有机会学习一些关于期货市场的东西。

因为他最为欣赏的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人靠衣装。一丝不挂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西格和我走到了一起。Merc 一丝不挂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现在我要给它穿上一件衣服，这会是件半是囚服半是铠甲的衣服。如果我们没有在当时落实我们的华盛顿计划，在接下去的 30 年里，看看那徘徊不去的经济衰退、崩溃的市场还有政府班子的更迭，Merc 和其余的期货业界将碰上什么样的境遇，这是不用说的。因为我们在华盛顿的耳目喉舌，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那些不怀好意的官僚和政客，并且能够为我们自己也调皮捣蛋一下。

现在是时候使出最后一招了。我希望把华盛顿的眼睛和耳朵带到 Merc 来。为此我需要那种使华盛顿运作起来的玩意儿——钱。换句话说，关于政治进程中金钱的问题，不管我私人的看法如何，我最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政治中，金钱就是上帝”。只有一个人让我懂得了这一影响政治进程的概念，他就是 CFTC 主席——我的好朋友威廉·巴格利。在 1977 年，他有时让我坐下来，就像一位父亲准备告诉儿子有关性方面的常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关于美国首都的一些常识。“华盛顿特区，”他说，“像一个工厂，有老板有工人，需要用钱让它运转起来。”巴格利说报酬虽然平平，但竞选费用昂贵。“你们这些家伙在这个过程里不会有发言权，除非或直到你们具有了政治方面的力量。为此，你们需要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

这对我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我认为我知道如何去组建一个。首先，按照我的风格，我需要一个有权威的声音。我问巴格利是否愿意出席一次 CME 的特别会员大会，把他对我讲过的话再重复一遍。这位 CFTC 的主席很乐意，并在说好的时间来到芝加哥俾斯麦酒店，在那里我召集了 500 多名 Merc 会员。我介绍了主题以及 CFTC 的主席，后者则用他坚决低沉的语调解释了 Merc 需要华盛顿政治发言权的原因，以及非金钱不能达此目的的道理。那次会议批准我创建 Merc 的商品期货政治

基金，即 CFPF。

我按照联合犹太吁请会的架构建立了它的运作体系，因为我有切身体会，知道前者在基金募捐方面极为成功。首先，我建立了一个理事会，成员都是交易所理事会和交易场中受到尊敬的人物。我当选为 CFPF 的主席，在接下去的 15 年里我一直担任该职务。理事会和一群特别任命的领导者和衷共济，紧密配合。这些领导者都是些享有盛名的会员，他们担任交易场的“内部区域指挥”，并肩负着从我们的会员那里为 CFPF 募集志愿捐赠的责任。我们每年集合一次，向每个特别领导派发出 30 ~ 50 个 Merc 会员的名字，特别领导们会逐一联络，寻求捐赠。CFPF 的组织结构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每次历时两周的年度筹款活动中，CFPF 得到了大约 50% 的会员们的响应。在多数年份里，我们的目标是 50 万美元左右，这很快使得 CFPF 成为全国最强大的商业性政治行动委员会之一。

开始时，要决定在竞选时期向谁进行捐赠以及捐增多少，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新鲜。CFPF 理事会的成员们就像一伙在一轮无记名反对投票中的兄弟会会员，花上几个小时激烈地争论 Merc 应该向谁，以及为什么要向这个人捐款。我们试图挑出一些起码思想开放并且愿意听从我们的意旨的候选人来。不过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倾向于那些具有自由市场理念的思想者们。很自然，我们的顾问们尤特、黑宁坦和西格在 CFPF 支持谁这点上有很强影响力。我是在支票上签字的，所以我要确定我在政治上要紧跟华盛顿的动态发展，并且指挥黑宁坦和尤特向我汇报情况。钱的流转去向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知道钱正在建立我们在华盛顿的网络联系，在那里我正在花上更多的时间出席二级委员会的听证会、表达我的观点、与更多的立法者见面，从而了解更多关于政治和政客本质的东西。

那些年里，CFPF 已然成了全国最为有效的一个商业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他商业委员会的资金往往会跟着我们跑。而 CFPF 也成了 Merc 最终成功的关键。我们的成功有四个因素：我们的组织结构；尤特、黑宁坦和西格的政治才干；我在激励 CFPF 理事会、它的特别领导人和 CME 会员上所发挥的作用。这就需要定期召开一些宣讲会，在上面我经常是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地解释，我们的委员会是如何如何有价值，就像一份保单，让我们能够对付我们的那些政治对手所制定的反面立法或者其他一些敌意举动。还有第四个因素：我们特别的交易场主席——“帽子哈利”劳伦斯纳无与伦比的努力工作。

“帽子”这个名字已经人所共知。他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场内经纪商，嗓音沙哑，其在街头学来的那一套足智多谋真是无人可比。他的绰号是在一次 Merc 棒球赛上给叫开来的。那次，他带了一顶五彩缤纷的帽子，在他跑垒的时候，那顶帽子就会闪闪发光。哈利·劳伦斯是 Merc 里演绎“从乞丐到富翁”故事的最杰出代表。1962 年，年仅 16 岁的他从中学辍学，到一家社区杂货店里卖冷饮。在那里他碰上了 CME 里受人尊敬的统计学家沃特·科瓦爾斯基。后者喜欢上了哈利，把他带到 Merc 统计

部做了个跑单员。但是劳伦斯很快就意识到在 Merc 要成功的话，需要上学和金钱——会员费在当时要 9 000 美元，对于哈利来说则不亚于 100 万美元。他从此发奋，辞去 CME 的工作去完成中学学业。19 岁时劳伦斯重返交易场，那时他的儿子刚出生不久（他结婚还非得他母亲签字，因为不到年龄），名下一个大子儿也没有。不过他很快就说服哈罗德·海恩荷尔德给了他一份工作。后者就是那位因印第安纳到处遍布其猪肉供应站而成名的猪肉买卖商，颇具传奇色彩。海恩荷尔德还是在期货市场中普及商品基金的第一人。不久后，劳伦斯便靠为猪腩交易池的两位经纪商——艾迪·卡希尔和迪克·莫什尔想出了“多方代理”的点子，得到了两份工作。在所有期货交易所实行“多方代理”的传统自此而始。

同时，在海恩·荷尔德和鲁芬·纳赫特公司里，“帽子”是正式雇员，他和劳艾德·阿诺德结下了友谊。阿诺德是 CME 会员中最受爱戴的一个，最喜欢赛马。1970 年 12 月，阿诺德前往澳大利亚买马，这给了哈利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劳伦斯哄阿诺德的女婿相信，阿诺德曾经从澳大利亚打电话来，授权向哈利出借五万美元，以购买一个 Merc 的会员资格。这奏效了。后来，Merc 无法更改这次交易。结果是，所谓的劳伦斯规则得以制定，即从此之后清算会员购买会员资格必须有书面批准方能进行。不过，不久之后劳伦斯就成了一名出色的经纪商，并把借款还给了阿诺德。也还是不久之后，劳伦斯就成了我的知心朋友，并是我在交易场中那支精英团队的创始成员。虽然在当时我为此受到不少责难，然而我所做过的最为明智的一次任命决定便是让哈利·劳伦斯出任 CFPF 的交易池领袖。

对于 CFPF 的成功，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正像大多数奋斗史一样，里面总有一些默默无闻、甘做人梯的无名英雄，没有他们在行政方面的协助，什么事都办不成。琼·布什，这位 Merc 的忠诚雇员，在 CFPF 这个项目中担任我的助理，她的作用谁也无法替代。布什叫得出所有人的名字，知道谁是谁，也清楚那个特别领导会从谁那里拿到最多的钞票。

这样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教育了。起初，对于一个有敌对态度的国会，我们并不会像对待一个温和国会那样去和它对着干。我要做的就是教他们知道我们是谁以及市场是怎样运作的。黑宁坦的工作是进行联络，并亲自陪同他们到交易所来个一日游。“帽子”的任务是筹钱。“奇普”西格干的就是保证所有的东西合法，而琼·布什就是保持每样事情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进行。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团队。当尤特在的时候，他便是我们的门面。

在早期，黑宁坦利用他个人的手段让国会议员们到芝加哥来。一旦他把他们带到那儿，我就接过来。我在教育中推崇“事必躬亲”的方法。我会把一位参议员或是众议员带到我在交易厅的戴尔舍交易台旁，写上一张买卖某种产品的指令，并一边解释着我待会儿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就把那张指令交给我的职员，后者便把它“跑”到交易池里去填写，我们大家在一旁看着。这可是战场上的真枪实弹，而华盛

顿来客们偏偏就吃这一套。一分钟后，填妥的指令送还给我们，而那些官员们盯着报价牌上的价格看我是中了还是没中。不可避免，这种演习让我赔钱，可物有所值。那些议员们亲身了解到这一过程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的公开和光明正大。几年后，他们还会经常向我提及我当初教给他们的东西。由此产生的默契非常珍贵。

不顾理事会中许多人的反对，我还是坚持我们应该同 CBOT 一道开展我们的行动。这样一来每个人花了钱都能得到更多的回报，而我们结合起来的实力也将更为强大。另外，就华盛顿而言，我认为，CBOT 并不是我们的竞争者。议员们飞来芝加哥，分别在 CME 和 CBOT 与各个交易所的官员们会面。我们也会经常邀请理事和 CFPF 的特别领导们提出问题，并去见那些政界显要们。随后那些华盛顿来客们便会参观交易大厅，发表简短的讲话，并在回华盛顿之前用个中饭。为了这次访问，每位议员收取 2 000 美元的车马费，每个交易所凑 1 000 美元。

最终，我们就不必费力赚吆喝了。口口相传了呗。一位议员告诉另一个说：“你应该和戴尔一起去。这趟旅行真是棒极了。你会长不少见识，并且乐在其中的。他们还会把你放到 PAC 名单上的。”我把这个提出来做个注脚。我们决不会忽视任何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士，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愿意的。

在接下去的 15 年里，Merc 接待了不下于 85 位参议员和近 200 位众议员的访问。黑宁坦陪同了每一位到访的参议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来了又来。CFPF 成了我的战略中的重要部分，而基金的多少以当年政治的活动而定。例如在 1988 年，Merc 将两万美元分给了总统候选人，向共和党人乔治·布什、鲍勃·多尔和民主党人理查德·格法特、艾尔·戈尔和保罗·西蒙进行了捐赠。在前一年，众议院和参议院农业委员会——CFTC 的主管部门 43 名成员中的 24 位在 Merc 和 CBOT 露面而接受了馈赠。

我从未把政界中的花费看做是一种进攻的策略，相反，是防守策略。那些认为你可以用一千或两万美元买得议员一票的人是天真的。在 1986 年，国会有一项禁止活牛期货的决议案。幸运的是，未获通过，但许多接受过 CFPF 捐赠的议员们投票反对 Merc，支持该项禁止决议案。政界中再“自己人”的问题也不会总有优先权。我尊重这一点。所有的那些捐赠只能保证我们有权利证明自己有理。而那就相当不错了。

我们通常能够到我们在伊利诺伊州的议员们那儿诉苦。他们了解我们的业务，要么至少清楚这种业务对于芝加哥和全州的重要意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当时有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该人以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时创立了自己的自由市场理论，还有个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就是那个来自州南部的大豆带、知道套期保值能给农民带来好处的政客。到了 70 年代早期，道格拉斯被其从前的学生查尔斯·珀西取代，后者曾在 28 岁的大好年华便成了贝尔和霍威尔公司的董事长。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长任上，珀西的势力经常可以帮我们联络到我们需要动用的人物，那时还是我初任 Merc 理事长的时候。

不过要在很久以后，从 80 年代开始，就是在我们的市场不断成长、声势浩大并

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在国会中的需求变得更加显著。没有一年没有一些可能影响到期货业未来的立法议题或行业问题会摆到我们的案头。有时是 CFTC 的权力重整，这牵涉到该委员会的权力、司法抑或交易所监管等问题。有时是关于我们市场上交易收税那没完没了的斗争。通常这些问题表面上无伤大雅，但实际上却是暗布陷阱。小问题会以某种方式不断积聚，并且一旦累加起来，会对我们的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我们在华盛顿的办事处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对任何可能影响市场的问题，无论大小，一律保持警惕。而有时一些问题会非常严重，包括一些有可能直接禁止或限制期货市场进入某些业务领域权利的立法。

机关就在于从来不把我们自己扮成受害者，而是金融方面的英雄。我向立法者的进言既直接又带着警告：芝加哥是全世界的期货之都。我们这些交易所有长远的眼光，能随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有敢于创新的胆识。而作为结果，我们将全世界的业务带到了芝加哥。但我们还不仅仅如此。我们的市场是国家金融服务领域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当听说全球其他地方也想拥有像我们这样的市场也并不令人吃惊。所以当那些立法者正在试图改善我们的市场时，我警告他们千万不要把我们放在了一个不利的竞争位置上。

我的朋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认为创新的金融产品就像冰层下面的种子，等待环境的变化使它们发芽生长——即法规和税收方面。不过那些相同的因素也会让市场情况向另一方向发展，只要考虑到资金不再在手上而是在屏幕上换来换去。比如由于美国对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上限的政策，欧洲债券市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起来，但后来因为在美国购买这些债券的海外投资者在债券付息时须缴纳 30% 的持有税，市场便从纽约转到了伦敦，伦敦市场现在还存在着。我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着他的这个例子。

我并不期望赢得每场战斗。而当我输了几次时，我对不同意我观点的立法者从未心怀怨恨。在变化无常的政界中，昨天的对手可能成为今天的所谓“权力经纪人”。我几乎可以根据我们每年 5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招待会画出一张“Merc 影响图”来。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是从黑宁坦加入 Merc 时开始的。“好吧，”波格对黑宁坦说道，“我觉得赫尔曼（塔尔玛吉）和我应该为你举办一次聚会，向你的朋友们宣布一下你的新工作。当然，由 Merc 埋单。”1977 年第一次聚会只有几个议员参加。罗森博格和我喜欢这个主意，并把它立为一个传统。之后的每一年来宾名单都会根据我们的影响力而变长。到 90 年代，它就成了吸引 15 位参议员、76 位众议员，再加上内阁成员、CFTC 和 SEC 的监管者以及国会助手们的大型晚宴。所有的人在众议院农业听证厅里聊上几个小时，四处都是佳肴、美酒、杜鹃花，还有华盛顿的闲言碎语。

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这几十年里，两位伊利诺伊州的官员充当了我们主要的“古罗马百夫长”。他们是参议员艾伦·迪克森和众议员丹·罗森考斯基。参议员迪克森是从伊利诺伊的政界中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聪明，学东西快，并且是关于伊利诺

伊州的行家。在非常成功地完成几届伊利诺伊州秘书长任期后，他竞选参议员，并轻松胜出。迪克森在去参议院之前与 CBOT 的汤姆·多诺万保持着长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多诺万成为达利市长的政坛“出头人”时就开始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幸运的。现在，作为参议员迪克森，他成了我们在美国参议院中最强大的同盟。在他的任期内，迪克森在两个委员会中都曾任职，这两个委员会——参议院农业和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实际上左右了期货市场的生命。这并非凑巧。汤姆·多诺万帮忙说服迪克森到他应该去的岗位。实际上，我们期货市场在参议员迪克森心中的分量证明了，我当初有关 CME 在 PAC 行动或华盛顿游说工作方面应与 CBOT 联手的坚持是多么正确，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汤姆·多诺万最初把我介绍给迪克森，并向我保证这位参议员明白我的观点和建议中的价值。后来，当比尔·布罗德斯基在 1985 年成为 CME 总裁时，我才能将这位参议员的可靠关系传给他。

多年以来，在我们请求迪克森帮忙的许多问题上，无论何时，多诺万和梅拉梅德或是后来的布罗德斯基提出要求，他总会有求必应。他的办公室一直向我们敞开。幸运的是，迪克森并不是一个只会站在那儿握握手而几乎不为我们的案子进言的油嘴滑舌的政客。周围那种参议员也不少。但就迪克森来说，他是卷起袖子，亲自上阵。事实上，作为政坛上的职业选手，迪克森在参议院里可是个精明强悍的主儿，他知道各方环节，并能最大限度地交易到投票和支持。

在 1987 年股灾后的几年里，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私底下已成为期货市场的“外科手术室”，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支持下，参议院艾伦·迪克森的办公室成了我们的家。股灾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他就像一只斗牛狗，只要它的院落四周——我们的市场仍有游手好闲之徒在活动，它就不愿休息。在他的监督下，参议院没有制定过任何对期货业有实质性损害的法规。当迪克森 1992 年在竞选中败下阵来，我们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受到了重创。不过我们还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的位置上来了卡罗尔·莫塞莱·布劳恩。虽然布劳恩参议员在期货市场上没有任何背景可言，并且在参议院中建立起权威也颇花费了她一段时间，但她异常聪明，在领会我们的问题方面也是求知若渴。在她来到华盛顿的第一天，黑宁坦为我和这位新任参议员安排了一顿晚宴。布劳恩参议员从此以后证明是芝加哥期货市场的一位重要和有效的盟友，而且又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这个结果与我们芝加哥市场建立的效力非常的政治机器有极大的关系。

丹·罗森考斯基是汤姆·多诺万的挚友之一，我自己也和这位议员有着长期的紧密关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我首次在他那位于芝加哥西北部富勒敦和达门大厦的办公室，请他协助解决某项悬而未决的法规问题时，罗森考斯基的一个问题打断了我：“这对芝加哥重要吗？”我的肯定回答就是他需要的一切。一段持续了 20 年、不仅仅建立在我们期货市场的政治需要上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犹太移民背景和罗森考斯基家人的波兰移民家史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还有成长在 50 年代芝加哥西

北部街道里的我们之间形成的那种共同的情感纽带。

当然，罗森考斯基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伊利诺伊众议员朋友。除了众议员卡迪斯·科林斯、约翰·波特、迪克·德宾，或是前议员玛尔蒂·罗索之外，我几乎想不出还有谁会对我们的问题更为忠贞不渝。同样，数年以来，丹·罗森考斯基可谓芝加哥期货市场的最为高大和高效的战士。只要与 CBOT 和 CME 有关，对于他来说，没有太小的问题，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作为伊利诺伊州议会代表团中的泰斗，罗森考斯基还为我们的阵营带来了其他的伊利诺伊州议员，民主党或共和党人。在 1983 年 11 月 28 日，在 CME 新大厦的启用庆典上，罗森考斯基，这位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中大权在握的主席，莅临典礼并说了他在公开场合对芝加哥期货市场常挂嘴边的赞誉：“Merc 对于芝加哥来说，就像石油对于得克萨斯或俄克拉荷马、牛奶对于威斯康星，还有玉米对于爱荷华一样。”

1987 年股灾导致过一场特别艰难的立法战役，而就在罗森考斯基带领我们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后，我买了一套精装的托马斯·巴宾敦·麦考利的史诗《桥上的贺拉修》，并让 Merc 的每位交易会员在上面签了名作为一种公开的谢礼送给了罗森考斯基。这部诗作是关于罗马的守门人贺拉修的作品。贺拉修单枪匹马勇敢地守卫着“他先父们的骨灰和神灵们的庙堂”。这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每每在傍晚，虽然我们的对手们已经经历了所有的战斗，他们仍然还要面对众议院赋税委员会的主席并接受他的教导。而他，就像桥上的贺拉修一样，在挺身保卫着芝加哥的庙堂——我们的期货市场。

一句警告：政治知识、政治能力和政治力量对于任何主要的机构或产业来说显然都非常重要。不过，政治舞台——无论国家的或是本地的可能会是一个陷阱。被位高权重者赏识，看清政府中的权势人物并和他们拉上关系，这是使人感觉良好、妄自尊大的灵丹妙药。但就像每个首席执行官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内在的危险，这可能会蒙蔽一个人的感情，而让其忘记了孰重孰轻。

我对于政治和文化事务都是一样，即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活动对于实现我们真实目标的作用。实际上，在我们的领导中，主要的精力不得不集中在成长、发展势头、新兴市场和创新上。我们运用政治和文化上的活动来提高我们实际目的的实现可能。这些重要次序万万不能被颠倒过来。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23 章

马不停蹄的交易

戴尔·黑宁坦不久就领教了我妻子、我的孩子和我的朋友所认识的我：电话是我长久的伴侣。黑宁坦曾经告诉鲍勃·多尔，在他和我共事后，他知道了国会山每个付费电话的位置所在。他讲得很有道理，与我打交道意味着要容忍我的交易习惯。我几乎从来不会让任何事情打扰我在市场上的交易，不管我在世界的什么角落。在新加坡或在东京，我会半夜起床，从芝加哥那边开市起一直交易到闭市。然后，只睡了一个小时还不到，我便必须在接下去的工作时间中正常运转。在伦敦和巴黎，时差小了，但交易中还会有问题。

我的交易奇遇或许可以拍出一部令人爆笑的电影，因为我曾经从最奇异的地方、在最古怪的境况中打电话到市场中去。无论如何，我总会保持连线——从遥远的岛屿，在那儿我不得不从一个私人接线局恳求到，或简直是买到电话的接通；或从欧洲的店铺和酒店大堂中进行跨洲通话。不管是从公路旁，或是特区的参议员办公室，还是加勒比岛一个小餐厅冷饮机上的电话机旁，我总会找到直达交易池的办法。而近年来，三万英尺的高空也从未阻止过我，只要飞机上有电话。在报价可以用便携

式机器看到后，我到哪儿身边总有这样一台。甚至在国会作证时，我都会在面前的桌子上放上一个“报价得”屏幕，就是那种可以通过调频频率提供在线报价的便携式报价器。而那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好奇心会让他们情不自禁地走下椅子，从四处围拢来看我在做什么。一段时间之后，它成了我的个人商标，而最终，官员们还忘不了。

不过即使有报价机，电话还是不可或缺的。在华盛顿的某个早晨，当时让生活变得容易得多的手提电话还未出现，黑宁坦和我约好了和纽约州议员巴伯 B. 康纳伯见面，后者是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中的第二号人物。他是共和党里的大腕，统领着共和党鹰派，并将接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世界银行行长。他是乔治·布什的“左膀右臂”。

我们需要就一个技术性的税赋问题同他谈谈。他很难找到，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他工作时逮到他。黑宁坦听说康纳伯将到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赞助、在喜来登酒店举办的早餐会上作演讲。他又认识组织这次早餐会的共和党秘书南希·索蕾，飞快地聊了几句之后，他成功地为我弄到了一个挨着康纳伯的位子。在我们到达酒店时黑宁坦告诉我，人们为了得到那张椅子简直“打破了头”。

当天上午的市场走势疯狂，而我又握有大量的头寸。在那个房间外面有三部付费电话，我便三个都用上了。我无法离开这些电话。黑宁坦待在屋里，有些尴尬。

“你能保留这把椅子吗，因为利奥在接一个重要的电话？”他问索蕾。

“如果你现在不坐那个位子，”她坚持道，“我就给其他人了。”

“利奥，过时不候了。”黑宁坦催促着。

就像一个追踪热点新闻、力图挖出内幕消息的匆匆忙忙的记者，我从电话那儿冲了回去，听筒兀自随着电话线荡来荡去，这样线路就一直保持在接通的状态。之后我到康纳伯旁边坐了15分钟左右。我们谈到了所有与我相关的要点。然后我借口有事，又回到电话那儿接着打。

我老早就学会了在移动中做交易，使用电话亭的频率足以让克拉克·肯特[⊖]垂涎三尺（遗憾的是我并没有他那种X射线的眼神）。长期以来有一句评价直到今天还跟着我：“梅拉梅德一直在打电话，一直在交易。”

我在1979年7月确实歇手过一段时间，为的是庆祝我女儿艾戴尔和霍华德·迪布瑙的婚礼。那是一个庄重的庆典，该有的都有了；这种婚礼上第一次有这么多的交易员参加，就像是Merc的年度晚宴舞会。毕竟，交易员就是我的家人。虽然那是在大使西部饭店巨大的金色大厅中举行，贝蒂和我还是把邀请的人员控制在300人。那些被砍掉的人就此怀恨了好几年。在当时，它可是那个季节的重要社交活动，并在后来拿来与马利奥·普佐的《教父》里的结婚场面相媲美。

⊖ 电影《超人》男主角。

那场婚礼与贝蒂和我曾经希望的一般无二，只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差点儿坏了整个好事。我女儿的婆家人赫伯特和蒂尔玛·迪布瑙，是严守教规的犹太人，而我的父亲却相反，如我所解释过的那样。出现的问题便是我父亲是否愿意带上那顶传统的无边帽站到犹太婚礼彩棚下。正如我怀疑的那样，他拒绝了。不管怎么说，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那样的危急时刻他在别列斯多克的犹太会堂里也曾拒绝戴帽子。他对我的请求一概不予接受，一步也不让，直到我使出了“杀手锏”。我用意第绪语对他说道：“求求您了，千万不要把您唯一的孙女的婚礼给毁了。”他对艾戴尔的爱暂时压倒了他的原则。这在艾萨克·梅拉姆多维奇的生命中可是不同寻常的事件。

幸运的是，婚礼安排在7月4日，交易所休市。否则，像我儿子常常说的那样，我可能会从婚礼彩棚那儿往市场中打电话。我记得在1980年黄金市场热潮中，胆囊炎都没有阻止我。在清晨五点从我的医院病床上，我打电话给我的秘书，让她把我的图表拿来。在她两个小时后到达的时候，我被撑起坐在床上，嘴边叼着根香烟，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臂上扎着静脉输液针，而电话就贴在我的耳朵上。我向我的场内职员阿瑟·特什，吼着交易指令。特什是我的表弟，一个绝对能干的家伙。他的父亲是诺曼，诺曼的姐姐珍妮特是我们家在这世界上关系最紧密的亲戚，当我们初到美国时，就是他们收留了我们。特什利用自己的经验做了我的报价和下单职员，并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上专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职业。

当医院护理们来带我去检查时，我执意不走，直到交易在下午一点半结束。我记不起来那天究竟是赢是输，不过我知道我平了仓，恐怕万一X光会显示出比不满的胆囊更为严重的毛病。不用动手术。只需饮食习惯的改变和一些休息。几天后我又回到交易厅，声嘶力竭地高喊去了。在那之前，我猜我首先报销的器官会是肺，没想到竟然是胆囊。

我承认，我一交易就动力十足，但我坚持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交易痴。我沉溺其中有两个讲得过去的理由。一开始，市场并不知道我不在交易厅，或在几年后，不在屏幕旁。他们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无论我是不是在那儿看着它。而我也已经发现，对于我和大多数交易员来说，交易中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了解市场的节奏。你的脑子里至少必须有一幅画面，那就是市场已经到了何处以及它是如何到达现在的价位的。虽然电话至多只能蹩脚地代替身临其境，提供暂时的市场情况，但聊胜于无。电话打得越多，这幅画面越清晰。

其次，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交易是我收入的主要来源。发明IMM并没有红利和版税所得。我也不指望。我建立Merc并不全是为了我的努力能够换来报酬。我这样做从来不带着一种“我可以得到什么”的态度，我也没有企图把Merc当做一个换到其他工作、开拓自己职业的跳板。当然，新的市场提升了席位的价值，我同其他的Merc会员从中获得了利润，但这种利润并不像收入那样是现成的。

外界大多数人的想法却不一样。我曾经和一位全国顶级的并购专家共进晚餐，他问我是否介意告诉他身价几何。我乐了，好奇他为什么这样问。

“噢。”他回答道，“这是为了赢一个赌局。众所周知我是一个亿万富翁，我打赌你也同样是一个。”

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了出来。“你是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傻念头？”我问道，禁不住大声笑了出来。“虽然我日子过得不错，我可还没有接近那样一个阵营呢。”

“但那怎么可能？”我的晚餐同伴坚持道，“我知道当我参与到一个新股的发行或新近收购的公司中能赚多少，而你呢，你发明了一条全新的生产线，即使你只从它对交易所产生的价值中抽取 10% 或 15%，再过上几年，你就会拥有亿万富翁的头衔了。”

要解释我的发明是免费的，真有些尴尬。但至少这次谈话是一个不错的故事。

Merc 将一生的职业合并成了一个：商业、金融、政治以及十来个其他的职务形成了我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我还是要赚钱过活啊。而交易就是我的第二职业。在交易上我拥有全部的决定权，并亲自通过市价指令、限价指令，或是止损指令的方式将这些决定安排好，并使用直线免提电话或私人电话联系 Merc 交易大厅里的戴尔舍交易台，由我的职员玛丽·安布罗斯将它们迅速送到交易池里执行。这个系统同那些银行或投资银行交易员们在银行间市场和现货市场中进行交易所使用的一样。

过去，在进入交易池前一刻，我会扫一眼自己手绘的价格走势图，然后冲进去，又喊又叫，推推搡搡，有时胜利，有时失败。今天，当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我放松地坐着（有时在散步），而我的交易环境包括一套路透 SDS—2 通讯系统，它可以提供现金报价和普通资讯；一个“山杨”网络图表计算机终端，它可以在我设计的一系列程序上运作；一组每日、每周、每月的数据表，它们可以每天更新；还有一套内部“Merc 报价机”。我这个在芝加哥办公室里的交易“军火库”，在我位于芝加哥市郊的住处和亚利桑那的第二居所各复制了一套。

我设计的使得我在交易日的全部时段里可以跟踪所有的市场、快速进入交易厅下单和执行指令，并能够灵活地完成多种正式的功能。多亏了我扬声电话上的静音键，我甚至能够一边做交易一边接听来电、处理办公室预约或会议。我的交易方式经常让我办公室的访客和同事们迷惑，他们和报价机让我无法兼顾，我还要时常冲扬声电话吼着指令，这让他们一不小心就成了我精力不集中的牺牲品。

在 Merc 供职期间，我总是对任何有关报酬的企图加以回绝。当一年一度的理事会提及这个问题，我经常解释说服务 Merc 是我的荣幸，这个报酬已经足够了。我知道这听上去可能显得愚蠢或古板，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坚持这个说法。只要我能够交易并以此过活，我就很满足了。我树立的这个榜样，很不幸，使理事会里的其他官员，特别是理事长，无法获得任何可观的报酬。

之后事情真的变了。Merc 奇迹般的成长使我和 CME 理事长的责任巨幅增加，简

直是耗费了我们的全部工作时间，甚至还要多。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更为严峻，因为这严重地影响了我的交易能力。在1987年，由于股市暴跌，我的时间有限，不管有多少电话亭，我都无法再有效地交易下去。事实上，职责的增加使我遭受了大量的交易损失。布莱恩·莫尼森也是像我一样的交易员，以前担任理事长时也经历过工作负担所带来的影响，他坚持 Merc 应该重新制定报酬制度，以便能够反映当今时代的真实情况。“利奥，你得把个人的喜好放在一边，接受现实吧。运作这个交易所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必须要让会员们明白这一点。”20年来坚持除了象征性的车马费外不拿任何报酬的我妥协了。一个特别的 Merc 薪酬委员会，包括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院长唐纳德·雅各布斯在内，建立起来以研究其他交易所的做法，并向理事会提出它的建议。之后形成的薪酬计划经过理事会的批准，首次将我作为特别顾问的年薪订在50万美元，交易所理事长的年度工资为25万美元。虽然这些数字在经过了“无偿”制度岁月的我们看来已经非常巨大，但它们还是远远低于大型金融机构首席执行官们的现代标准。虽然如此，CME的会员们对这个政策上的突然变化还是没有准备，而当有人将这个�息还没有充分地向会员们解释之前便捅给了报纸时，一些会员气愤了。

当时，《芝加哥太阳报》引用斯宾塞·斯图亚特公司合伙人斯科特·谢尔顿的话说：“如果他们每年必须付给利奥·梅拉梅德1000万美元的话，那也是一桩便宜的买卖。”尽管如此，大约一年之后，这却引发了一个事件，使我和会员之间长期的友爱关系短暂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那次争论是由我的宿敌道格拉斯·布拉根，和一个保守的活牛交易员埃米特·维伦在交易厅掀起来的。一开始，他们推出了一个投票决议，号召任何没有通过会员选举便进入理事会的官员不得领取这笔工资。表面上，这并不是一种针对我个人的攻击。维伦公开表示：“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会选梅拉梅德做理事长，他想要多少就给他多少，不过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通过竞选当官。”特别顾问和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数年来都是由CME理事会设立并派人担任的。虽然我并不是不同意这项决议的精神，但它还是让我觉得沮丧。尽管这项决议案被轻易地击败，尽管我意识到这个事件只反映了少数人的口头观点，但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我之前“无报酬”的政策究竟是否明智。

不管是赢还是输，我靠交易维生的实施确实对运作这个交易所许多影响。首先，当然，这使我与交易团体心心相印。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不仅能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市场，我还知道一种产品如何可以吸引交易员。这种利益上的共同点是新品推出时我能够赢得会员支持的唯一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我认为这是 Merc 的秘密武器，也是 Merc 在新产品方面拥有远远高于其他交易所的成功率的主要原因。标普合约仍然是所有交易所在最近成功推出的“大”合约。在刚推出时，我全天候交易它。

交易也可以让我洞察到新的期货工具能够成功的潜力。这种信息离开市场是无法得到的。市场就像一个观点的大杂烩。好点子留存下来，其他的很快就被抛入了

垃圾堆。而点子又是获得新交易工具的跳板。金融期货的点子就是这样产生的。Merc的“全球交易所”GLOBEX，也是这样演变而成的。

作为一个交易员还意味着我熟悉期货市场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个声名狼藉的“税赋骑墙”事件。当1980年早期税法的改变威胁到期货行业时，这个问题落到我和我在CBOT的搭档雷·罗森塔尔的肩上，后者也是一个交易员。很自然，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到丹·罗森考斯基那儿，而他又点名让议员马尔蒂·拉索处理这个问题。这极其复杂。国内收入署正在就通过所谓的“税收套利”的方法来推迟赋税时间的获得利润、免除损失的把戏进行质询。期货行业认为这种做法是合法的，因为一个“税收套利”的期货头寸有内在的经济风险。风险的原因在于不同合约月份之间的价差，也就是构成税差（某月看空，另一月看多）的基础，一直在变化。实际上，为将持仓风险降至最低，那种包括三个合约月份称做“蝶式套利”的方法流行开来。“蝶式套利”稳定了各合约月份中的内在变化，并且减少了暴露的风险。

税收套利可不是小事一桩。特别是在一些华尔街的大公司，甚至像美林公司（其董事长唐纳德·里根铁定成为里根总统麾下的财政部长）之流，都设立了专门的部门为客户进行这种税收交易策略。你真的不能怪他们；“税收套利”有着丰厚的佣金。有谣传说就连“滚石”乐队也用“税收套利”来避税。也可能是，就像唐·里根后来声称的那样，他并不知道他的美林下属们都在做些什么。但还是奇怪，在他成为财长之后，他对于我们的市场怀有“复仇”的态度，企图通过法规来征收交易税。

雷·罗森塔尔和我在奥黑厄希尔顿宾馆里租了个房间，两人和玛尔蒂·拉索在那里关了一整天，这样我们就可以让这位议员知道期货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税收套利的复杂之处又在哪里。拉索全力以赴。他提交了一份法案，旨在打击除期货交易员以外任何人进行的税收套利行为。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托尼·科尔霍，一位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人，1981年时任民主党国会选举委员会主席。我们永远忘不了科尔霍所给予的支持。拉索的法案被国会赋税委员会采纳，并于1981年7月由众议院通过。这场战役我们赢了一半。人们会有充分的理由觉得拉索是正确的：期货交易员在交易中承担了巨大的风险；而这又创造了流动性，并促成了市场的成功。但一个交易员要想年复一年地获得利润却没有任何保证。如果某个交易员上一年获利并因此缴纳了税款，可今年又是净亏，这位交易员便没有充足的风险资本可以继续用来做市了。

一时之间，看起来好像是玛尔蒂·拉索拯救了这个商品期货业，CBOT的人也开心地笑了。但是此项法案还没有送交到参议院去。参议院那儿虽然我们也有朋友，但有可能赢不了。我们在政治方面的门路，即使通过朋友，也只能帮到这一步了。堪萨斯州共和党人、参议员鲍勃·多尔，的确是一个具有自由市场观点的思想者，并且是我和Merc的朋友，多年来他曾经访问过我们六七次。他或许比较尖刻，但还

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思路敏捷、聪明，而且实话实说。有一天，正当关于税收法案的争论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多尔给我看了一张“净化处理”过的纳税回条，其中显示一个未指明的纳税者——一个交易员，收入一亿美元却一个子儿的税也没有付（这位参议员不知道的是，我依然能够颇为准确地猜出这个交易员姓甚名谁）。多尔把这个给我看，意在证明“税收套利”将在参议院中遭到失败。我相信他。当此问题在参议院中进行投票时，纽约州参议员帕特里克·莫伊尼翰斥责税收套利时说，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蝶式骑墙套利’指的一定是流行于明朝时期的一种乐趣横生的色情活动”。参议院否决了税收套利。

在该法案送至国会会议委员会以厘清参、众两院法案的分歧之前，鲍勃·多尔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进行一次私下的会晤。多尔提出一个妥协的办法，我也觉得这非常公平。不过，我还是不能单方面接受他的建议；我需要全行业的支持。虽然我就此妥协建议做了游说，但 CBOT 不愿意让步，因为他们仍然仗着罗森考斯基是会议委员会主席并坚定支持我们的这一事实。但多尔也是委员会的人，而这却是罗森考斯基的首次会议。多尔获胜。这对我们行业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不过我们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保留了一些东西免受损失。更改后的税法对我们的交易员做了有利的处理。交易利润的最高应纳税额从 70% 降到 32%，并允许交易员即使在短于六个月的投资上也能获得高额长期资本回报率。而情况发展得更好。几年后，在汤姆·多诺万和我的推动下，罗森考斯基重提“税收套利”一事，并且成功地针对从前进行过美国国内税收套利的交易员们制定了“祖父”条款。这把我们中的许多交易员从国税局那里拯救了出来。另外，交易员们获得了五年的时间来补交他们欠下的税款。

这也让我第一次真正见识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桀骜难驯。这是他们作为世界上最老和最大的期货交易所而与生俱来的传统。这经常接近于一种“舍我其谁”般的傲慢。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现代期货时代之前，CBOT 是世界上唯一的商品交易市场。它有自行其是的门路和权力。1981 年时，我把这抛在了脑后。每个伟大的机构，我认为，都有它的错误。另外，CBOT 犯了一个诚实的错误；我们都那样做了。

时过境迁。金融期货的出现动摇了那些粮食市场的统治地位，而 CME 也向 CBOT 的“天下第一”的位置发起了挑战。虽然 CBOT 的强势形象依旧保存着，可它也学会了在期货业内进行合作。在整个期货业，我可能是与 CBOT 官员们打交道最多的人了，我也掌握了一个秘密：CBOT 的官员们能够讲得通道理，并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妥协——如果他们信得过那个正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麻烦的是，它过去的名声经常会吓着他们的对手，从而使他们在接近 CBOT 时小心翼翼。怀疑滋生出不信任。当然，在当时来看，CBOT 的声名使我更容易为 Merc 树立一个相反的合情合理的形象，这让两个机构彼此有别。奇怪的是，自从我自 Merc 的官位上离开时起，我不自觉地觉察到就公众对于两家芝加哥交易所的态度而言已经发生了一种角色转换。可能是我的

想象吧。

不过，我与 CBOT、它的官员以及会员们的关系几年下来一直非常牢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它开始于 70 年代早期，并一直继续到现任总裁汤姆·多诺万和理事长帕特·阿尔博任上。但这种关系在 1979 年，即在 CBOT 理事长拉尔夫·彼德斯任职期间，受到了相当大的推进。和我一样，他首先是一个交易员，区别是我从来没有加入过彼德斯的联盟。事实上，如果要我选出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交易员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拉尔夫·彼德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在标普合约推出时，我让彼德斯支持我们。他不假思索，在交易最初的一周内就买了一千张标普合约。我想他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一直捂着这些合约，所以赚得了丰厚的利润。

我得到了 CBOT 的最高赞誉，那就是当作为 CBOT 理事长的拉尔夫·彼德斯提出让我担任理事会理事职务。在给彼德斯的拒绝信中，我写道它“是我所得到最高的奖赏”。因为我们是竞争对手，无疑这将与我的忠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明显我将倾向于 Merc。另外，我再将我的想法和精力全部贡献给 Merc 后已无再多的闲暇。作为特别顾问，我参加过 Merc 的每一次理事会会议和无数的专门委员会会议。我也是 Merc 金融工具筹划指导委员会的主席、行政委员会以及房地产委员会和其他一些委员会的成员。另外，我还是美国期货协会的主席以及期货业协会理事。而且所有这一切中，还有我的交易。

不过，我并没有对彼德斯的表态敷衍了事。相反，我把它看做缓解两家交易所之间矛盾、开始为未来合作打基础的一次机会。在行业事务上，我认为，两家最大期货交易所能一直对外是有必要的。在我给彼德斯的信中，我安慰他说他的建议“已经并且将在 CBOT 和 CME 的关系上产生一些有意义并能持久的效果”。然后我又敲响了警钟：

我不需要告诉你在芝加哥的我们面临着纽约那些可怕对手，更不用说与华盛顿长久以来的争吵了。因此，我们两家机构有义务在这些方面联合力量，并尽可能紧密和谐地工作……因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对芝加哥期货市场都是有利的。我向你保证我会向你效劳，而无论是需要我的建议，还是要我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担当特别的任务，CBOT 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做出指示。请将这些想法传达给你行政委员会的成员们。

这封写于 1979 年的信确定了我在 CBOT 会员们心目中的有利地位。今天重读这封信，想到它是写于股灾的八年之前就觉得它更为非凡。因为就是在那场股灾后，芝加哥期货行业才奋起反击，向华尔街在金融市场的统治地位及其在华盛顿的影响发起了挑战。

交易为生同样让我知道如何更好地去描绘我们市场的美妙。就拿 1980 年的一天

来说吧，当时我正陪同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参观交易所。该代表团的团长是一位魅力十足、幽默感非常的绅士，也是第一次访问芝加哥。我们来到了交易厅，而且正如我接待官方显要的惯例，我希望用行动来展示资本主义，从而让他们知道市场运作和参与者是如何获得财富的。我在参议员和众议员面前表演了许多次。我会买上一张或多张合约，然后让我的客人观察价格的变化，目的是在这笔交易上获得利润。进来再出去。

当天上午我买了五份短期国债合约，这并不是一笔大买卖，但顷刻之间市场开始下跌了。我平仓出市——亏了。那位中国官员咯咯地笑着，冲我耳朵里小声说道：“嗯……午饭没有甜点了。”没有甜点吗？！就凭我刚刚在交易中输的钱，我可以为他整个代表团买上一顿午餐了。学生付出高昂学费上一堂课是一码事，而让老师为这节课买单，那又是另一回事。那只是另一次提醒，市场就像一片丰茂的雨林，充满了机会和灾难。

当然，我的那次输钱可让 Merc 大赚一笔。那些中国银行的官员对他们的访问念念不忘，并一直保持联系，数年后，他们给我寄了一份完全官方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函——即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打开大门不久，而中美关系的真正升温却远未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希望与交易所的其他官员们分享这次机会，我就问我们 Merc 的理事长和其他官员是否可以一同前往。我的要求当即就被接受了。1984 年 9 月，我带领着 Merc 代表团，包括 CME 理事长布赖恩·莫尼森，第一副理事长拉里·罗森伯格，行政委员会委员吉拉德·米勒和杰克·桑德纳以及我们的配偶们到这个神秘的国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次旅行与我们十年前的欧洲远足相似，但这次我们需要证明的东西要少得多，而我则受到了政府本身的招待。我们得以游览了当时大多数西方世界仍无法见到的景点，包括紫禁城、长城和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那是一次难以置信的访问，我们全体都能有幸看见中国在现代化改造之前最后一刻的模样。这也证明了我一直所怀疑的：我们的政府对中国只了解些皮毛。

在出发之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被派来向我大致介绍在中国应该如何接人待物。“不要用‘利润’这个词，”这位官员警告说。他还告诫说：“有人向你敬酒时，千万全喝光；如果你没有，那就是一种侮辱。”还有另外一些“金玉良言”，可我之后都忘了。

看看，我们刚到不久，我们的官方联络人、一位中国银行的官员就问我们普通的交易员一年有多少“利润”可赚。国务院的情报也就这么多吧。然后，在国宴上，这位日后成为中国银行行长的官员向我和我的代表团们敬酒。看到我把一整杯中国茅台——在这个星球上与航空燃油最相近的东西灌下去的时候，他满眼惊讶。喝完后，我注意到他的嘴唇只不过略微沾了一下杯中的酒。“你肯定喜欢喝酒。”这位银行官员向我说道，还挤挤眼睛。我几乎无言以对。贝蒂不得不把我架回了酒店房间。

然而，好事还没完呢。在我动身返回美国时，我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已经接受了我的邀请，只要来美国，就会访问 Merc。CME 顿时陷入了疯狂的准备活动中。负责担任国家首脑警戒任务的美国财政部探员们，全部盯着我们对大楼进行安全检查。但这位中国的主席是否会参观交易厅呢，这是个大问题。如果是的话，财政部探员便要求受过训练的警犬在大厅里嗅一嗅，看看那一大片会员工作台下是否藏着炸弹。我迟疑着没有回答。“那些狗还会闻出其他什么东西来？”我问道。那是 1985 年，天知道会员们会在他们的抽屉里藏些什么东西。回答是“这些狗会把什么都给找出来。”莫尼森和我就此咬了咬耳朵，试图想象出万一财政部的人员们发现了大麻，第二天的新闻头条会怎么写。我们决定主席只从参观廊那里看交易厅。

1985 年 7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他的代表团抵达我们的大楼，而楼顶上手持机关枪的财政部探员们正在巡逻。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公关机会啊。据我所知，我们是第一个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惠顾的美国机构。CME 理事长布赖恩·莫尼森和我同李先念主席坐在参观廊里，一同向他对交易做全面的介绍，正在那时，我们下面在标普交易池里的交易员们将手中数千张交易卡抛向了空中，给他上演了一场 CME 版的华尔街纸条欢迎仪式。后来，当国务院打电话问我是如何办到的，我解释说这用了五张短期国债合约。

那次访问对 Merc 来说不仅仅是一次难以置信的机会，它还定下了一个永远的规矩。让我们的交易厅成了重要人物来到芝加哥必看的地方。毕竟，只要我们对总统、首相甚至国王的公关人员说“中国主席去年访问过我们”，让他们来就变得更加容易了。这种高规格来访所产生的免费宣传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就像它对会员们的士气所起到的鼓舞作用一样。

在 Merc 农产品的全盛期，来访的显要们常常是一头巨大的冠军菜牛或得奖公猪，但是在金融产品来到 Merc 后，政客们来了。这种当代的传统可以追溯到 1972 年，那一年我首次邀请正在竞选总统的埃德蒙德·马斯基访问我们。马斯基相对来说是扑腾出了一朵小浪花的小鱼一条，但这让我知道重要人物们对于这些访问所能吸引的新闻报道量有多热爱。这些访问对于 Merc 的形象树立也有极大的好处。因此我在社会和政治的阶梯上不断高攀，去接触那些众议员和参议员。然后，在 1975 年，众望所归并最终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前来视察了新 IMM 的运作情况。由此产生的公众效应促使许多其他的显要们紧随其后。不久之后，风放出去了：Merc 值得一去。当我们建立起 Merc 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并坚持让官员们参观交易中的市场时，这个吸引达官贵人的程序简单了。在 1980 年，我是罗纳德·里根总统竞选班子里面早期加入者之一，由此可以为他来 CME 交易厅访问进行筹备。使我们的会员们（他们隆重地欢迎了他）高兴的是，我让他成为 Merc 的荣誉会员。Merc 的 CFPF 为里根的每次竞选批准了最高为 1 万美元的捐赠；不过，个人会员的捐赠总额还要高。作为

总统，里根依然记得他在 Merc 的交易员朋友们，并又回来参观了一次，在 1988 年卸任时他再次造访。

历年来，为了尽可能吸引公众的注意，我制定了一项政策，即每位高层官员应该至少有三位 Merc 官员陪同参观交易厅，除我之外，还通常包括 Merc 的理事长和总裁。我们还要确保有足够的媒体在场，官员要有足够的机会和会员以及职员们握手，并要拍照片。这样，这些访问就有助于实现一些明显的目的，包括使 CME 迎合官员的兴趣并给他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

所有这些以及运作这块地方所逐渐增多的要求，当然让我在交易厅交易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最终让我从交易厅交易员转变成了一个“楼上”交易员。这个调整非常困难，但我的哲学化市场理念仍然保持一样。我是个企图在长线持仓上获利的短线交易员。还有一些实用的调整。一方面，我现在本人基本不在交易厅处理交易，而使用厅内经纪商给我的职业增加了一大笔开销。另外，我一直被电话和约见给打断。多年以来 Merc 和我的同事有一个长期的规定，早上必须让我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交易。我长年挺身而出，为在理事会或委员会中任职的所有交易员和经纪商们说话，力图避免那些从交易伊始开到交易结束的会议。在这种讨价还价中我并不是一直都能成功的。

每天早晨那些许的“隔离”交易时间对我来说可能比两周一次的休假还要管用。我用一种压力换来了另一种。但那种跟着市场跑的交易压力和运作交易所的行政压力有不同的地方。虽然我不能解释，我却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市场关闭后，那种市场压力可以瞬间结束，但 Merc 的那一摊子事儿却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一周七天。有时在我结束了一次夜间迟会、独自驾着我那辆保时捷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往家开去，那才是仅有的可以安静思考的时刻。从我年少之日起，我便知道我具备了詹姆斯·克莱维尔在《诺贝尔屋》中赋予大班邓乐斯的那种能力。它使他能在压力下应付自如，并且不失水准地完成多重任务。基本上，这是一种将个人关注焦点分门别类的能力。这非常类似于关上一个抽屉，又拉开另一个。任何时候我都不允许第一个抽屉中的内容影响到我处理下一个抽屉中内容的能力。每个主题都会得到我百分之百的关注。这对所有好的桥牌选手来说都是一种必需的品质。缺乏这一点，上一局中所犯的任何错误都将影响下一局的表现质量。管理一个交易所同样如此。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24 章

终 极 合 约

在欧洲美元成为 IMM 的王牌期货合约之前，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需要逾越。问题在于交割机制上。短期国债和证券存单之所以能够交割，是因为它们是实物工具。但欧洲美元就是另一码事了。

从久远的时代起，一张期货合约的结算便是通过该产品的交割来完成。事实上，法律上对于赌博和期货的界定便是期货对交割有“全面的考虑”。换句话说，没有交割，我们和一间赌场——正如我们的诽谤者们历年来所说的那样——没有太大的不同。交割和人们对于我们事业的印象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父亲一次对我说，他一直担心有朝一日什么人会开着辆卡车冲进我们的住处，冲他问道：他们应该把他的儿子错买的那一整车的洋葱放到哪里。

真实情况是交割发生的次数仅占很小一部分。期货市场不应该用来替代那些普通意义上获得产品的渠道。用于结束一个期货合约的交割唯一目的在于防止潜在的逼仓者将价格哄抬到实际价值之外。有交割的威慑力在，就可以保证如果一个期货合约与其现货市场对应物的价格在该合约到期日无法重合时，卖方可以选择交割该

产品，而非对冲他的期货头寸。这对于那些被挤得出轨的农产品来说是不错。但货币或利率期货又怎么办呢？在我看来，担心什么人会对，比如说德国马克，逼仓真是杞人忧天。所以我认为金融合约无须交割。

另外，期货市场有保险单的作用，不用非得交割不可。一个交易所所希望的就是这个工具在买时和卖时（相反亦然）的现金价差。换句话说，千万别替德国马克担心，给我利润即现金就行了。正如 E. B. 哈里斯总是说得那样：“金钱一开口，牛屎把路走。”

与证券存单和短期国债不同，欧洲美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们只是一种利率。这一实际情况不但让我们的监管者们想不通，我的许多同事们——他们中的一些还是 Merc 理事会的人——也是云里雾里。甚至连巴里·林德，这个在领会我们市场运作原理方面上常常比其他大多数理事们早许多的人，看我的眼光也让我觉得自己已经误入歧途。“没有交割，你什么意思？你怎么能推出一种不用交割的期货合约呢？”那同解释欧洲美元是什么一样困难。我记得曾在 1980 年痛苦地向 Merc 新任理事长杰克·桑德纳（来自一专做活牛合约的经纪公司）解释说欧洲美元绝对不是散落在欧洲各处的美元，我们的许多场内交易员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所提倡的欧洲美元合约是以不可流通的定期存款为标的物。这就使传统的交割机制问题百出。你无法交割一个利率；相反，你可以以现金方式支付买入和卖出时（相反亦然）的利率差。

换句话说，如果 Merc 能够推出欧洲美元利率合约，它将首先实现现金结算。但现金结算是一项新发明。而在到期日仅仅根据最终结算价变化保证金支付数额的做法是没有尝试过的。以欧洲美元合约来说，其结算价是根据最后交易日当天伦敦银行的平均 LIBOR，即伦敦同业拆借利率而确定的。

我这个摆脱实物交割束缚的念头并非拜欧洲美元所赐。实际上，当我最初考虑无交割市场时，CFTC 还没有成立呢。对我来说，这个想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在很久以前同埃尔默·弗克的一次谈话——不是关于欧洲美元或现金结算，而是关于股票指数期货。虽然我通常被誉为股票指数期货的创始人，可它并非我的主意。

埃尔默和我一次在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探讨新产品（一直是我脑海中最为重要的课题）时，突然，他严肃起来，对着他的雪茄屁股吸了几口，又汹涌地喷了出来，然后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小声说道：“听着，利，终极合约当然是道琼斯期货！”

“道琼斯期货，哇！”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也被这个主意吸引住了。“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做过呢？”

“你不能交割呀。”这个矮个子下了断言。

我明白了。埃尔默说这个想法可能流传了一百年，但没人这样做过。毕竟，要交割一个经过完全加权的、含有指数中的每一个股票的股票组合是不可能的。我们怎

样才能交割 30 个各有拆息、分红和其他一些经常性变化的道指股票呢？不过那场谈话并没有让我就此罢手。它一直深埋在我的脑子里，并且折磨了我好几年。如果哪一天我们不用交割了会怎样！如果有能力用现金而不是用交割来完成期货合约又会怎样？那时，好家伙，你就能得到埃尔默的终极合约了。

在 1974 年，当我开始考虑是否要支持建立 CFTC 时，唯有一个联邦机构可以颁布现金结算法令的想法蹦了出来。如果此法可行，那么 Merc 就会拥有股指期货，而且，天晓得还有其他什么。当然，现金结算对于 CFTC，甚至是 Merc 而言都不是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我们有关现金结算的努力直到 1977 年才算真正开始，之后我们即证明了利率是期货市场的成功载体。之后，在 1979 年，新任 CFTC 主席詹姆斯·斯通对于这个想法连听都不想听。直到他在 1981 年被菲尔·约翰逊取代后，杰里·萨尔兹曼、马克·保厄斯和我才开始了说服 CFTC 的艰难历程，我们要让它相信现金结算不会使市场机制由于价格操纵而遭到损坏，它也并不是赌博的狡猾变形。委员加里·希弗斯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我同每一位 CFTC 委员都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见，包括主席菲尔·约翰逊。这些私下讨论产生的作用，加上杰里·萨尔兹曼所提出的那些法律依据，终于奏效了。我认为，如果 CFTC 需要证明自己对于市场的价值的话，首先，它可以骄傲地指出现金结算来。如果期货交易非得实物交割，我们是否可以取得我们已经获得交易量的一小部分，或是为我们业已具有的潜力进行规划呢，对此我深表怀疑。没有 CFTC 那永远不会发生。当时菲尔·约翰逊对我说，批准现金结算是他 CFTC 主席任期内的里程碑。我当然同意啰。

1981 年，主要因为我不懈的游说努力，菲尔·约翰逊成为 CFTC 的主席。奇怪的是，由于与 CBOT 的一次不愉快，约翰逊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不过以其卓越的法律背景和在期货方面的渊博知识，他还是 CFTC 主席的最佳人选。我已经厌烦了政治上的任命，那些人对我们的市场一无所知。如我预料的一样，菲尔·约翰逊干得异常出色。他精简了 CFTC 的人员和办事程序，推陈出新，并且打破了合约申请久置不决的僵局。除了现金结算之外，菲尔·约翰逊的另一个贡献，也给我们的行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甚至在他被任命为 CFTC 主席之前，他就请了 9 个月的假，放下他在律师事务所的活儿，写起一篇名为《商品监管》的论文来。这部由里特尔和布朗公司出版的著作共两卷，内容丰富，可谓这个行业的圣经，今天看来仍然是关于期货市场监管的权威性作品。

1981 年，Merc 的欧洲美元合约作为期货市场中第一个通过现金结算的合约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不过，从技术层面上看，澳大利亚悉尼期货交易所理事长雷·郝斯金却拔了头筹，他在 1980 年率先推出一个现金结算的美元合约。可惜啊，那个合约当时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赶上了指数期货的时代。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那句简洁的至理名言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响：“发明造发明。”

我未等现金结算获得批准便推出了有关埃尔默·弗克在股指期货上的终极合约的战略。早在1978年，我们的眼光就落在了标准普尔公司500股票价格指数（标普500）上，但一直到1980年才最终达成协议。这个决定的作出，Merc进行了让人不堪忍受的内部讨论，不过这种讨论最终让我们总结出，就像事实证明得那样，标普500是最有可能成功的股票指数。

在当时，它是那个时代最具争议、最为困难的问题。每一家交易所，无论大小与否，都准备推出股指期货。纽约期货交易所自然会上它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指数。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最终选定了价值线指数。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决定推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合约也不是什么秘密。清楚的是，道指是当时最为流行和著名的指数。和今天一样，它是公众和媒体衡量美国股票变化的途径。

我又一次面临着与我当初在长短期利率上作抉择时相同的问题。Merc要不就向CBOT出击，去争夺道指，要不就选择仅剩下来的另一个指数——标普500。我们的经济学部门提供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基金经理们（我们认为他们可以为期货业带来生意）用标普500来衡量他们的年度业绩。这向我指出，标普500指数对于商业套保用户来说，比道指有更大的吸引力。

但没有任何以往的经历可以让人作为依据去判断哪一个指数将会成功。所能做的就只有去感觉、凭直觉，还有猜测了。我们的股票指数委员会等着听我的意见，而我对此也是辗转反侧、举棋不定了几个月。我最终决定选择标普，但还是想听听巴里·林德的看法。作为一个一般性的规律，林德总是青睐那些更加吸引大众参与者的合约，而我通常看重商业利益者。这本来会让我们在这个指数问题上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但这一次，虽然林德先前曾经左右摇摆过，可他还是同意了我的观点。

如历史显示得那样，选择标普对于CME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决定。这确保了Merc股指期货世界之首的地位，并为我们的会员们创造了崭新而且巨大的业务来源。的确，标普合约后来的成功让人想象不到当初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并且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并不是一个一目了然的选择。的确，直到今天，我认为如果CBOT能够推出道指合约的话，它将会非常成功。事实上，几年之后，我们曾经试图和道琼斯的所有者签订一份合约，好让他们坐下来谈判，但却没有成功。

犹如事实证明的那样，选择标普的决定或许不及选择是否为之付钱的决定来得重要。CBOT犯下的关键错误不是他们选择了道指而非标普，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道琼斯指数应该是公共领域这一认识上。换句话说，CBOT并未觉得他们需要将该指数的使用权从道琼斯公司那里拿过来以用于一个期货合约。有史为证，道琼斯指数的所有者们在此问题上的意见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把CBOT告上了法庭，并且在伊利诺伊州高等法庭上胜诉。道指被判决为道琼斯公司的私人财产。

后来，在芝加哥西岸俱乐部的一个衣帽间里，伊利诺伊高等法庭法官西摩·西蒙

就此问题和我面对面进行了一次私下里的谈话。多数人的意见是拒绝给予 CBOT 使用该指数的权利，而西蒙法官却独执己见，不以为然。我认为应该给予 CBOT 使用道琼斯指数的权利吗？我坦诚地回答说，那时可真是悬哪。

但在我们决定使用标普指数之时，对于那些指数是否属于公共领域这一问题仍存在着巨大分歧。我们的律师杰里·萨尔茨曼与 CBOT 的律师一样，都认为那些指数在一段时间后将会成为“公用资源”，它们的所有者也将会丧失财产权。而当我说道，首先，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其次，我对此并不关心时，萨尔茨曼真够聪明，并没有和我争论。我向萨尔茨曼表明的观点在于我不习惯于冒不必要的风险。我并不打算因为一毛不拔而让 Merc 将来在终极合约上的成功面临风险。另外，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教导过我，首先和最为重要的是，成为一个资本主义者。我准备为标普指数使用权付个公平的买价，从而不用操心它是不是属于公共领域。

那之后不久，杰里·萨尔茨曼、杰克·桑德纳和我频频与标准普尔公司的官员们会面，来敲定合同条款。那些谈判是有些滑稽。直到今天，我依然不能确定布兰顿 W. 哈里斯（标准普尔公司总裁）或是乔治·巴伦（他们的法律总顾问）是否完全明白我们为何要获得对他们指数的使用权。在当时，与股市有关的期货合约听起来肯定像是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中的某个构思一样。当然，我们中没有谁真的知道这些权利的价值。此协定最终于 1980 年 2 月 28 日得以达成，每笔交易付费 10 美分，每年总费用有固定上限。后来看起来，这个价码定得实在太低了。事实上，在 1984 年，我才和艾拉·黑伦斯坦和鲍勃·安德里亚里斯，也就是麦克格鲁·西尔集团标准普尔分部的掌门人达成了协议。我们撕毁了旧合同，双方谈判后，标普获得了一桩更为合理的买卖，而我们则得到了更长的使用期。

在 CFTC 批准现金结算之后，CME 是以现金结算的股指合约的最早申请单位。理论上说来，这意味着 Merc 可以领先于所有人取得以现金结算的股指合约。然而，尚在现金结算的概念获准之前，股指合约的第一个申请是由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为其价值线指数所提出的。该项申请的内容是实物交割，并包含有复杂的交割程序。它获准的机会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现金结算刚获批准，堪城交易所便迅速撤回了它的实物交割申请，换之以一个现金交割的合约。但这却使得堪城交易所落在了其他申请者后面。

CFTC 委员苏珊 M. 菲利普斯（不到一年后即成为该机构的主席）打电话给我，说了—个非常特别的要求。她说，堪城交易所是一个小交易所，正在这片金融决斗场中苦苦挣扎，力图站稳脚跟；纽约期交所也一样。菲利普斯询问道，如果 CFTC 在 Merc 之前首先批准了堪城交易所和纽约期交所的合约，Merc 能否息事宁人，不要较真呢？这只是几天的差别啊，她许诺说。我同意了。我认为 Merc 不会有太多的损失，因为对我来说非常清楚的是，我们的标普合约必将统治整个期货世界。而这次帮了 CFTC，很多好处会在后面等着呢。就这样，Merc 的申请第三个获得了批准，我们的

股票期货合约在 1982 年 4 月 21 日推出。

我将所有这些事情是为了说明一个市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一个聪明的主意。它需要规划、计算、角力，以及建立市场并使其运转的韧劲。即使它已经轰隆隆地上了路，它依然需要人去驾驶、去推动。而有时候它还得被重新启动。

标普期货合约上市后就像晴天里打了一个霹雳，不久便超过了其他合约，由此证明了好汉不愁落人后的道理，与利奥·杜洛谢声称的相反。但这是巨大努力的结果，我也付出了我的全部——在筹备期内一天 24 小时地工作。我不仅亲自同十几个交易员谈话，而且还让我在场内的精英部队们准备继续耍出那套“支持这个合约”的把戏。我们为我们的会员们和潜在的证券参与者准备了无数的学习班、研讨会和参考资料。为了十拿九稳，我同许多大自营商碰面，并让他们对开盘当日和后续日期中的交易量做了明确的保证。这对我来说是标准的操作方法。而向大交易员作持仓量方面的要求，这对我来说也是正常的。我通常都能获得我所需要的帮助。由于新型金融合约的爆炸增长，并为了让它们在全国受到瞩目，后一种方法便应运而生了。

在早期，IMM 尚未诞生之时，重要的任务仅仅是要把报价摆到报纸中去——任何报纸。只有一种办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新合约的价格上去：它的每日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荣·弗洛斯特和我过去常常连花几天的时间拜访和打电话给全国各地报纸的编辑们，甚至还有国外的报纸，为的是让他们相信他们的读者非常迫切地需要知道3月育种牛或是12月火鸡的收盘价。在芝加哥，《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太阳报》最为关键。《纽约时报》当然重要；但要在全国成功，你非得将那些价格打入《华尔街日报》才行。

当关于新型金融产品的竞争逐渐热化的时候，事情真正变得难办起来。各种报纸，特别是《华尔街日报》，只有这么大点儿地方贡献给金融报价和统计数据。每个交易所都为那块新闻纸进行争夺。如果无法获得，为了刊登新合约的价格而在财经版上买空间的做法就变得普遍了。但那是一种昂贵的做法，而每个人的目标就是免费获得报道。为了决定登报价谁免费、谁付钱，《华尔街日报》发明了持仓量测试法。持仓量反映了一个合约未平的多空头寸数量——理论上讲，持仓量越高，该合约就越成功。《华尔街日报》自行其是地宣布，哪个合约都不能免费报道，除非其持仓量达到五千张合约。现在比赛开始了。每一家拥有新产品的交易所都希望首先达到那个魔术数字。

其结果在预料之中。每个为新市场而战的交易所，它们的交易员们都会竭力在他们的交易簿上保存持仓量。这些交易员们常常用套利交易的方式，即买多一个月份合约，同时卖空另一个月份合约。如此，持仓量创造了出来，而交易者的风险又保持在最小限度。但在新市场中，流动性微乎其微，所以一个套利交易得以很快执行的可能性也非常小——除非，也就是说，一个对手方交易员碰巧对这个价差来了一个

相反的操作。当某交易所正在推广一个新合约，并力图增加它的持仓量时，它会鼓励它的交易员们去满足这种需要。1982 年股票指数合约上市可能是交易所最后一次这样做了，因为 CFTC 下令停止这种做法。但直至当时，在所有的交易所中持仓量分配都是普遍存在的。

为了板上钉钉，我给当时是 CME 会员的每一家大型股票公司、经纪公司和投资银行打了电话，还有几年来我所接触的方方面面：给我们你的“斯帕兹”业务吧（标普期货合约在会员中间的外号是“斯帕兹”，因为它的交易代码是 SPZ，表示它是 12 月合约。）每个人都来添砖加瓦，有的多有的少。我的哥们儿詹姆斯·凯恩——我和他相熟自芝加哥的桥牌圈子——当时在贝尔斯登是埃斯·格林伯格的左膀右臂。众所周知，凯恩几年前加入贝尔斯登是出于埃斯·格林伯格的要求，因为作为桥牌迷的格林伯格需要一个专家级的桥牌搭档。凯恩对于我的帮忙请求二话没说，立即进行了回应。不仅从第一天起贝尔斯登向交易池内提供了报单，而且凯恩还授意他那声名赫赫的纽约投资公司，为 Merc 的标普期货合约在《华尔街日报》上做了整版的广告，以示支持。詹姆斯·凯恩自然不断高升，成为贝尔斯登的董事长，而且还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桥牌选手之一。

我洋洋自得了差不多一个月。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我们的标普交易量开始落后于我们最可怕的竞争者——纽约期货交易所，即 NYFE。约翰·菲伦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主席，而他的期货后裔 NYFE，则由他的前专业搭档刘·豪洛维兹领导。菲伦几年前来 Merc 拜访过我，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亲自来看看“利奥是如何把它干出来的”。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我带他参观了交易场。这个家伙极为能干，所以不需多久菲伦便揣度出两方面造就了这种不同：个人领导和我们的交易员。NYFE 主席刘·豪洛维兹也知道这一点。

我当时在伦敦和杰克·桑德纳一起去走访基思·伍德布里奇，为的是打开市场，后者负责我们在当地的 IMM 办事处。在 1979 年，拉里·罗森伯格和我开设了这间伦敦办事处，它是首家走向海外的美国交易所，那是我们为使芝加哥市场国际化所做的努力之一。但在这次走访中，我们的标普交易量开始巨幅下降，我变得非常紧张。在得知标普合约陷入麻烦时，我都无法集中精神了。所以我们中途结束这次出差，跳上了下一班返回芝加哥的飞机。在飞机上，我有了思考的时间。我认为我们在场内的那帮子人变得过于乐观了，我们启动得太快了。近几年在竞争中屡屡获胜让这些交易员们产生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那样一来又有问题了。我意识到这个新指数和期权市场（IOM）中的交易员们过于缺乏经验和资金，完全不能在我们争夺交易量的战斗中起到任何关键作用。如果我们要赢这场战斗，那得全靠我们那些经验丰富的 CME 和 IMM 部队。但是要叫经验丰富的会员在他们自己的市场如火如荼时，放弃自己成功的农产品、货币或是利率市场总是非常艰难的，几乎不太可能，当时也确实如此。需要的是一种特别的手段。

在飞机上，我有了思考的时间。我认定我们交易场里的那帮人变得过于乐观了。我们启动得太快了。近几年在许多竞争中获胜，这让交易员们产生了一种不可击败的感觉。突然，在3.5万英尺的空中，我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我想到如果每天我只要求他们花上一小部分的时间，我的这些伙计们也许会帮忙。当我们返回后，我们用一句崭新的营销广告重新启动了标普500合约：“请花15分钟。”我敢打保票这招一定灵。这一策略的锋芒直指那些老派的会员。每位会员在交易日中都被要求至少在标普交易池里花上15分钟。杰克·桑德纳和我站在门口，亲自把“请花15分钟”的纽扣递给每个交易员。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添了把柴”，但已经足够了。后来看起来这是我最为成功的一个市场营销的点子。由于亲身领导了这场反击战，我一直没有离开交易池。在我们的交易量开始走出低谷并随后汹涌向上时，我记得这些会员们的脸上洋溢着骄傲。

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唐·纳迪克，每天都会到我这里来，好像是在表明他们非常好地遵守着他们在时间上的承诺。纳迪克是跆拳道黑带的。他热爱体育，并且告诉我对他来说“交易就像是棒球中的本垒打、篮球中的远投进篮或是橄榄球里的触地得分”。纳迪克在中美洲商品交易所，即所谓的交易圈子中的小职业联盟，接受了系统的交易员训练。中美洲商品交易所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所有，只交易CBOT产品中的一部分，用的是Merc在杰克逊区和芝加哥畔的老房子，这是他们从我们那儿买过去的。它向许多人提供了进入期货世界的廉价通道。在这儿，许多像里奇·丹尼斯一样的交易之星冉冉升起，并继续到大联盟中去发了大财。当然，丹尼斯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慈善家，他用他在商品上获得的利润来推进他的慈善事业。

一些交易员，包括泰德·克尔和蒂姆·麦克奥里弗，开始来做个15分钟，后来便成了标普交易池里的永久会员。克尔是一个老派的Merc交易员。另一方面，麦克奥里弗则是那些坚强而又实际、喜好争勇斗狠家伙中的一个。他曾经和一些Merc会员们在麦克勒格球场里打壁球，很快5美元一局迅速飙升到2000美元一局，而麦克奥里弗，这个半职业选手，赢了大部分的钱。1980年里的一天，萨姆·卡尔（一个肉猪经纪商，他的兄弟豪威是个前明星球员，所属球队堪称德保罗大学众篮球强队之一）对麦克奥里弗说，凭他的那种神经，他应该去试着做做交易。“在那里你才能发现你真正是块什么材料。”蒂姆·麦克奥里弗接受了萨姆·卡尔的战书，并且很快便爱上了交易所带来的挑战。因为我们1982年的场内请求，标普交易池成了他的家——至少几年中是这样，就像其他那些一旦发现斯帕兹的波动性便立即为之吸引的数不胜数的人们一样。不久之后，这些交易员把局面反转了过来。标普合约从此一马平川，再也没有回落过。

与拜占庭政治和许多企业管理者的动机不同，Merc的文化是一种共有的价值观。交易员们是股东，每个人的投票都算数。不存在什么企业仪式、老板和工人，职业

人员和员工之间也没有复杂的关系。我真正认为，我从 Merc 会员那里得到的回应，比其他交易所从它们的会员们那儿得到的要多，这是因为，同其他人一样，我是一个风险爱好者，而一个交易员可以反映一种制度的本质和它的组成部分。随着 Merc 的成长，我要建立一个世界级交易所的愿望也愈加强烈。而当我能够不懈地将我打定的主意付诸实施时，我脑子里想的一直是这样一个念头：交易所比任何一个单独的交易员都来得重要。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25 章

难题的最后一部分

我从来没有将标普合约看做是 Merc 的另一种产品，比如，就像瑞士法郎或者是短期国债。从我们和标准普尔公司签订合同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它代表着一种真正伟大的东西，好像金融期货本身的推出一样。毕竟，它是那种所谓“终极”的合约，也就是那种可能会将期货市场同纽约证券市场种类庞杂的各种业务联结起来的合约。它不仅会有助期货使用的走向正轨并使之进入金融的殿堂，它还可能把从前不曾考虑过我们交易所的参与者和会员们吸引过来，从而改变我们市场的面貌，而且甚至更多。欧洲美元合约是 Merc 第一个现金结算的产品，而标普则代表着第一个现金结算的指数合约。对我来说有一点很明显，一旦我们开始了在指数大道上的旅程，我们就通向了那些从来没有被设想过的合约——以及在以前根本不可能的交易量。和房产、就业、通货膨胀、保险、能源、情感等指数相应的合约，现在将成为可能。就像股票市场各个板块那各种各样的指数，如运输、公用事业或是技术，甚至还包括场外交易的股票。

这种思考的结果又一次让我意识到了会员数量这个问题。Merc 的不够多。就目

前的会员数量而言，我们无法希望指数产品的潜力能带来多少东西。再加上 CFTC 准备取消对于期权的限制这一事实，这将使期货交易所的合约潜能翻倍上升。我想我们的理事会问道：谁能为所有这些新的合约提供服务？Merc 现有的会员们全部在我们已经开出的市场中忙碌着。显然，没有新会员的加入，这个晨曦初露的新时代所蕴含着的潜能，就永远不能焕发出来。

我得到的明显回答就是，为 Merc 建立另一个新市场部门，确切地说，一个指数和期权市场部，或是它在今天的称呼 IOM。又一次，我觉得我们站在了 CME 发展的节骨眼上。再建一个 Merc 市场部门不是什么新鲜的主意。IMM 推出时，这个概念就已经诞生了，1976 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国际货币市场的合并则为它将来的实现提供了契机。不过 1981 年这个新 Merc 市场部门的想法不仅仅限于会员数量的扩大。在我的头脑中，一个新的 Merc 市场部门意味着一幢新的 Merc 大厦。这就是我称之为：“让 CME 得到世界级地位的、在整个拼图中那不可或缺的最后一块马赛克。”

第一个听我讲述这个主意的人是巴里·林德（这几乎成了一桩不小的外交事件，因为我们的税务顾问伊拉·马科斯被抛在了一边）。林德已经不再是理事了，但他依然是我最重要的心腹。我向林德解释道，根据马科斯说的，出售资本资产的收入在美国国税局那里是免税的，而标普合约就是一种资本资产。巴里不用多久就猜透了我的心思。如果 Merc 为交易标普合约创造出一个新的市场部门，出售新的会员资格而为此部门创造的收入是免税的。这笔钱足够用来盖一幢新的 Merc 大厦了。林德热情洋溢地接受了这个意见，我还记得他当时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

我们的需要没有什么神秘之处。Merc 正在迅速地占满它现有的空间。位于杰克逊大道和芝加哥河畔的那座房子是在 IMM 诞生之前设计的，然后花了巨大的代价进行扩建，为的是满足推出金融产品的要求，现在它已经撑得快要爆开来了。交易员们不能进入池内交易，跑单员们无法把指令送给经纪商。1981 年欧洲美元合约推出后，给标普期货合约就几乎没有剩下任何空间了。在这种场所中，不可能考虑什么未来的发展。唯一的答案就是新的场地。

林德和我开始玩起了数字游戏，好得到正确的数量。我们应该卖多少席位？我们能够卖多少席位？多少价钱可以凑成我们觉得一幢新大厦必需的投资额 3 000 万美元？直到那时我才把这个主意告诉伊拉·马科斯，我已经得到了一些人的祝福，包括 Merc 总裁克莱顿·特、Merc 理事长杰克·桑德纳、第一副理事长布莱恩·莫尼森以及总法律顾问杰里·萨尔茨曼。他们也立即意识到这个解决办法的美妙之处，一来我们有新鲜的会员血液，二来我们又有建造一幢新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大楼的经费。但没有我们的财务顾问伊拉·马科斯，任何一点都无法执行下去。我记得在那年的 12 月邀请马科斯来到戴尔舍投资公司的圣诞聚会。聚会地点在东岸俱乐部，那是芝加哥的一个豪华的体育和社交场所，在全美国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我希望他到那儿去，以便能够亲自就我的想法对他进行游说。虽然他和我早就讨论过这个问

题，但在后来的细化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参与进来。一开始，马科斯无动于衷，可在我请求他发挥创造力之后，他来劲了。我说，毕竟，他给了 Merc 一种“免税的信托”，而全国没有另外一家交易所可以办到这一点。一旦马科斯加入进来，我知道这件事成了。

最终，在公决中 IOM 分部架构和会员费获得了压倒性的通过；但之后理事会同一小撮会员之间发生了许多摩擦，这些会员由道格拉斯·布拉根挑头，他是一名 IMM 会员。布拉根属于那种经常喜欢斗争的人，大多数时间，他都代表着麻烦。布拉根和我第一次的狭路相逢是在 1976 年讨论 IMM 合并时。他反对合并，并且试图暗中破坏大家的努力。他竟然过分到同另一个会员雷·布莱特合伙分发“投反对票”的纽扣标志。他们输得一败涂地，但这却使布拉根注定成为一个反对派。一段时期内，我试图接近布拉根，由此甚至提出要给他 CFPF 理事会里安排个位置，但他拒绝了，他更喜欢成为一个捣乱的家伙。正如格里·赫什常常说的那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在当前这个问题上，由于理事会建议搞一个双轨制的出售——现有会员一个价，公众一个价，布拉根便竭尽全力，企图降低对现有会员的收费水平。杰克·桑德纳和我与布拉根进行了谈判，最终同意给现有会员的价格是 3 万美元，而给公众的报价是 6 万美元。一夜之后，不仅我们赚到了成堆的免税钞票，Merc 的会员数量也大大增加。现有会员们买了总数为 1 039 个会员席位（他们在后来把这些席位或卖或转让给了新东家），公众买了 125 个，还有 AMM 市场部转变出来的 123 个席位。算上所有的这些分布的和转变出来的席位，Merc 的总体会员数量上升到 2 724 名，625 名来自原来的 CME 分部，812 名来自 IMM，1 287 名来自 IOM。我们为新时代的来临几乎做好了准备。

还要再走一步，而拉里·莱维，那个老谋深算、野心勃勃的房产专家，知道其中的道道。我第一次遇见莱维是在乔尔·格林伯格家里举行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那是 1979 年的冬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告诉他现在是把那缺少的一块放进去的时候，他立即完全领会了我的想法。

“你的意思是，”他试探着，“为了实现你为 Merc 设计的终极目标，你非得拥有你自己的大楼，这幢大楼既配得上 Merc 的全球地位，又能彰显 Merc 对于芝加哥所具有的重要性。”

我笑了，惊叹于他的领悟力。

他讲得一点不差。“没错，”我回应道，“或者，至少要及得上 CBOT 大厦的地位。”

我不是说着玩儿的。CBOT 的大楼立于拉塞尔街首，俯瞰芝加哥的金融区，是一个城市的标志。Merc 一天没有它自己的这样一座大楼，我就一天不满足。自从 CBOT 的理事长拉尔夫·彼德斯一次说漏了嘴、谈到有可能让我们两家交易所共用一幢大楼的时候，我的这个念头就萌生了出来。我们知道共处一室是通向 CBOT 和 CME 最

终合并的必由之路，这个宏伟的计划我们两个都在揣度着。据约翰·吉尔默说（他后来成了 CBOT 的理事长），拉尔夫·彼德斯对这个主意非常痴迷，甚至有一次他私下里告诉他的同事，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愿意将这幢共用大厦命名为梅拉梅德广场。我们甚至建立了一个联合房产委员会，但无果而终。CBOT 的会员和员工们觉得 Merc 的级别不够。当雷·罗森瑟尔成为 CBOT 理事长的时候，合并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我们两个也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一谈的想法，并且跟进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可惜每家交易所内部的制度使它无法推进下去。我们仍然不是同级别选手。这始终是一个宏伟却又缥缈的想法，可能在两家交易所平起平坐时成为现实吧。

1980 年，我知道是时候建立我们永久的家了。首要的前提是找到一个房产咨询，它可以帮助 Merc 在错综复杂的芝加哥中心城区办公楼市中找到方向。有许多芝加哥的开发商愿意一试身手，其中包括逊什曼公司，我们现在在杰克逊和那条河畔的大厦就是他们建造的。但自从我和拉里·莱维那番谈话后，我知道他是我们的人。莱维，也就是莱维机构的董事长，知道他的主旨所在，他还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家伙。毋庸置疑，他明白我的想法，以及这对他的事业所具有的意义。Merc 这个数百万美元的开发项目是个值得炫耀的亮点。他如愿以偿，而这个合同也证明了它的价值，对莱维对 Merc 都一样。数年以后，莱维的房产机构在全国打响了名气，他的莱维餐馆公司在全国开了 49 家餐馆和特许经营店。在那以后，他告诉我 CME 大厦的开发是他最伟大的成就。

我们组建了一个房产委员会，任命约翰·格尔德曼为理事长，并且立定了一些要求条件。虽然在芝加哥没有人比格尔德曼更能让我放心地托付这个项目了，但这仍然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艰巨的任务，而我也计划坐镇中央。我们再次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格兰·文德斯特拉普负责。我确定的有一点，这必须是最后一次搬家了。而那就有问题了。Merc 的成长速度是每年 40% 左右，以这个速度看来，我们建立的任何交易场地要变得不够用真是容易极了。但我们不能每隔几年就建上几座大厦。经过讨论，我建议或许我们应该建一个备用交易场。格尔德曼揶揄地瞅了我一眼，笑了，然后就同意了。这是解决这个两难处境的唯一答案，虽然听起来既新鲜又大胆，我们在与莱维初期的讨论中还是把它作为前提条件提了出来。要说服我们的理事会就难得多了。在一次理事会议上，大家热火朝天地争论着，比尔·穆诺叫嚣道：“这个备用的交易场永远也派不上用场。”然而，回首来路，这个花费了 500 万建筑费用的决定给 Merc 节省了不知有多少百万的钞票，而且证明是我们最为明智的决策之一。用莱维的话来说，“那个备用交易池简直就是神来之笔。”1995 年，CBOT 决定再需要一个交易场时，场地所在新大厦的预算费用是 1.8 亿美元多。

1980 年夏天，拉里·莱维来见我，带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虽然他正在开发位于芝加哥赫赫有名的密歇根大道上那幢 58 层高的“伟大一英里”，他说他关于 Merc 有个绝妙的主意。他告诉我，JMB 房产公司，就是那个由两个本地小伙子贾

德·马尔金和尼尔·布鲁姆开办的芝加哥房地产机构，刚刚花了3 000万美元在威克大道买下了一座市立停车场，就在门罗和麦迪逊路中间。虽然300美元一平方英尺在当时看来是个天价，莱维却说这个地方对于Merc是非常合适的。JMB和一些房地产开发商都市建筑公司已经准备开发这个楼盘，盖起两幢40层楼的大厦。

莱维的激动真诚而具有感染力。从名气这个角度看来，那个地点确实是最为合适的地方，而名气就是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我眼里，芝加哥河畔的威克大道就像是纽约的公园大道，特别是在世界第一高楼希尔斯大厦耸立在那条街上以后。建筑师将是富士川·康特拉脱·罗汉事务所，其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密斯·冯·罗赫公司。格尔德曼、桑德纳和我同拉里·莱维敲定的买卖给了我们希望赋予Merc的所有东西：这幢大厦将成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中心，这样我们就有了永久的称号；百分之百地拥有了这座交易大楼后，我们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的交易设施建造费用是1 600万美元，这不仅和我们的预算相符，而且还是极为便宜；它里面将有两个没有立柱的交易场，一个4万平方英尺的我们可以马上投入使用，另一个3万平方英尺的可以作为未来的后备场地；Merc和他的会员公司们都会得到非常优惠的租金待遇；还有一个地下停车场供会员停车用；外立面将铺盖上大理石——给人一种安全和强悍的感觉。

而我还有一个另外的要求。我说服了理事会，我们必须在这个项目中参股，这样我们在大厦的运作中说话才会有底气。在接下去的谈判中，莱维按成本价给了Merc一部分股权。花了区区80万美元，Merc就成了南楼10%股权的所有者，一笔绝佳的投资。最后，经同意，莱维的高级副总裁郝莉·扬霍尔姆继续留任Merc的永久房产代表，处理所有的会员租赁和投诉事宜。扬霍尔姆对于她的房产代表职责可是认真极了，以至于后来竟然同我们的一位欧洲美元交易员理查德·杜兰结了婚。

1983年11月28日，在新任Merc理事长布莱恩·莫尼森的主持下，芝加哥市长哈罗德·华盛顿宣布了大厦的开幕。典礼能够在感恩节期间顺利进行，这主要要感谢约翰·格尔德曼及其人马的筹划和辛苦工作。我在Merc难题中的最后一项工作完成了。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26 章

成 年

1982 年 3 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刚好在标普推出之前，儿子乔丹和我计划避开芝加哥的冬天，到亚利桑那州斯克茨戴尔那个美丽的“山间树荫”度假村去享受一个周末的阳光。就在我们出发前，CBOT 总裁鲍勃·维尔莫斯给我回了个电话，并坚持要和我们同行。我们在“骆驼背”山脚下的讨论，具有一定的意义，对整个期货业的发展起到了作用。

虽然我主要关心的一直是 CME，但我也清楚 Merc 仅仅是更大蛋糕上的一块而已。我们是期货行业的一部分，而且，从最大程度上看来，Merc 的未来和发展都要依赖整个期货市场的命运。如果这个行业失败了，或者它的规模受到了限制，Merc 好不到哪里去。十多年前，从我成为 CME 理事长的当天起，我就接受了这个事实。而这个行业里一直存在着一些矛盾。不过在 70 年代末期，这些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因为资金的不足，CFTC 无法胜任其工作。

1976 年成立伊始，这个联邦机构的麻烦便接踵而至了。经验的匮乏，加上资金的有限，这都成了不能逾越的障碍。而同时，我们这个行业却在大大跨步地前进。就

在它成立后的几年里，这个人员短缺、资金短缺以及不受青睐的 CFTC 觉得它必须进行整改。根据建立该委员会的法律条文规定，国会必须每隔几年就其命运做出裁定。这让 CFTC 副主席约翰·瑞恩伯特头痛不已，他抱怨说这种整编工作让这个机构和它的员工们成了“游说分子”。1979 年，经过一场斗争，CFTC 获得了整改批准，但主席巴格利却丢了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卡特总统任命的詹姆斯·斯通，可他的专长在于保险业监管而非商品市场。华盛顿对期货市场缺乏了解，CFTC 巴格利的这种哀怨的论调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们的行业里几乎没有人去和这位新主席讲话，反之亦然——只有亨利·杰瑞基和我自己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但是期货市场未受影响，一直继续着它那无与伦比的发展。到 1982 年，我们已经成长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行业。我们在 4 个城市里有 11 个期货交易所；400 家经纪公司或所谓的期货佣金商（FCMS）；5.5 万名销售人员和资金管理员，他们负责管理客户的账户；5 700 名场内经纪，他们在交易所的交易场内执行指令；1 500 个人员和机构向公众出售交易建议服务；还有 1 200 个商品基金。

成功有其代价。不幸的是，和其他监管机构不一样，要想得到更多的联邦政府资金，人们看来，CFTC 的地位还不够重要。就在指数产品推出前的那段时间里，国会全体上下力图推行对期货交易全面征税，借此负担我们这个行业的监管费用。我们对这样一种交易税坚决反对，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期货行业。然而，国会在 1981 年没有任何关心我们的兴趣。不管我们再如何努力游说，大多数立法者仍然视我们这个行业为蛮荒的西部一样，而且，麻烦的是，人们的这种看法还是有其一定的事实依据的。曾经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新的佣金公司，它们哪个交易所的会员都不是。这些非会员佣金商不受交易所的监管，监管它们的职责落到了 CFTC 身上。不过，我们的这个联邦机构没有必要的资金来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管理。这些非会员公司从公众那里赚到的大笔钞票，成了一个监管上的漏洞。非会员公司的违约情况，像当时芝加哥折扣经纪公司那样的，发生的频率高得令人咋舌。这损害了我们的行业形象，并危及了它的未来发展。国会并不愿费心来区分谁是会员公司，谁又是非会员公司。一起违约事件就是一起违约事件，如此一来我们的行业就成了罪魁祸首。

由于害怕政府的管制日益增强，我集中注意力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源于 CFTC 法规的第三条。我的这个计划是再成立一个联邦制监管机构，使 CFTC 得以成立的法案允许成立一个自治性的组织——全国期货协会（NFA）。理论上，这样一个机构可以监管那些非交易所会员的经纪机构，从而使混乱的局面恢复秩序。在 1978 年 2 月时，我便首次公开提出了这样一个自治性组织的想法，那时国会正在就 CFTC 整改问题进行听证。国会对此的看法莫衷一是。不过，关于 NFA 的想法对我和我们行业中的一些人来说非常有道理，尤其是美林期货的头儿约翰·康希尼。幸运的是，我们两个人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沃伦·雷贝克，这位颇具影响力的 CBOT 前总

裁，不久也加入了我们的阵营。我们认为，NFA 将会使期货行业拥有自治的权利，同时为 CFTC 减轻一些负担。正如我们所预见的那样，NFA 将依靠它自己的法律和调查队伍，对期货佣金商、商品基金管理者、商品交易咨询公司和介绍经纪商们的财务情况、散户销售常用手段和业务行为进行监管。

我们针对这一概念开始了游说活动。我同参议员多尔（时任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开始了激烈的公开争论，并使他相信，要对非会员公司那些层出不穷的问题进行监管，期货行业远比 CFTC 要胜任许多。参议员多尔接受了我的意见，并最终同意运用现有的法规建立全国期货协会——作为全国证券商协会（NASD）的对应组织。然而，为了得到他的支持，我们不得不让国会放心，NFA 的财务预算经费从其会员的交易手续费中提取，而这是要会员甘愿承受的。在约翰·康希尼、沃伦·雷贝克和 CBOT 理事长雷·罗森瑟尔的支持下，该方案获得了同意。而且，我还说服了参议员多尔，场内交易商和会员的交易应该继续免税，因为建立 NFA 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非会员的交易。这绝不是一个小成功啊。

1981 年 9 月，CFTC 批准建立 NFA。不过，我却体会到，比起让期货行业认识到监管的必要性，让联邦政府认识到这一点实在是容易得多了。许多期货行业的参与者觉得，再来一个发号施令的警长，没有这个必要。好像我这里的这些硕果仅存的 60 年代强盗型商品大亨们，他们依然保持着他们目无法纪的优良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下，力大的就是正确的，谁有足够的赚钱小聪明，那钱就是他的。我的目标是使期货行业被纳入到美国金融业之中，而这些人从来对我的这个目标不以为然，他们也不想要必然存在于这个视野中的那种监管格局。这一小撮 NFA 的敌视者们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说运动。

我必须再一次变成一名福音传道士。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和宗教产生了关系——那种交易场内的宗教。交易场是神圣的。交易场上的交易员们，特别是 CBOT 和他们在纽约的同行们，强烈地反对 NFA，他们担心这个新的监管机构将会来到交易所的交易场内吆五喝六的。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非交易所机构来监管或是管制他们的行为。这对于他们的传统来说是一个绝对的威胁。脑子里考虑着这些现实情况，我们组建了 NFA 筹建委员会。我当选为主席，约翰·康希尼是副主席。为了平衡起见，委员会还包括 E. F. 赫顿期货的主帅戴维·约翰逊、希尔森公司期货部主管乔治·蓝博、CBOT 前总裁沃伦·雷贝克、CBOT 理事长雷·罗森瑟尔以及芝加哥大企业斯托特勒谷物的首脑霍华德·斯托特勒。这个委员会把纽约证券公司的大经纪商和芝加哥交易所里的老板们集中在一起，显示了两个期货交易中心意愿的统一。

不过，在最后的分析中，建立 NFA 的决定因素却是我与 CBOT 会员们的友谊。CBOT 理事长雷·罗森瑟尔做了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他安排了 CBOT 最大竞争对手的领袖进入他们神圣的理事会办公室，去为 NFA 进行游说。这个方法奏效了。在这个

激情洋溢的演讲中，我告诉 CBOT 理事会和它的满腹狐疑的会员们，我们的行业必须成长起来。我们自己来监管自己，这比起让政府来代行此职明智许多。我承诺说，NFA 会维护期货行业的信誉，与此同时，它永远不会对期货交易所越俎代庖，抑或是干预交易所场内会员们神圣的权利。

我说得认真，他们接受了我的说法。而且，我从 CBOT 那里募集了 4 万美元作为 NFA 必需的筹备资金，与 Merc 捐得一样多。这是 CBOT 理事会第一次见识到我的演讲水平，尽管不怎么样。当然，像我提及过的那样，这是一种才能，这种才能诞生自意第绪语的舞台上，成熟在芝加哥的大街小巷中，磨炼于法庭里。在那些岁月里，我那些充满激情、如火般炽烈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地激励着 Merc 的会员们前进并且保持一致的目标。这是我个人的秘密武器，我可以时不时地运用这件武器来鼓动 Merc 的全体会员们。不过为了有效起见，我首先必须相信我动机的正确性。

为了应对纽约那里对 NFA 同样的反对态度，特别是在 COMEX，我派出了 NFA 的律师——芝加哥科克兰和艾里斯事务所的约翰·斯塔森，他接替了菲尔·约翰逊，免费出力。斯塔森完成了任务。他向纽约的交易商指出，芝加哥两大交易所的领袖——利奥·梅拉梅德和雷·罗森瑟尔本身都是如假包换的场内交易商，他们绝不会自绝于场内大众。斯塔森说道（这有些在拿我们两人的性命开玩笑）：“那两个 NFA 的铁杆支持者已经授权我作以下承诺，NFA 决不会跨入交易所大门半步，否则，这二人甘愿受死。”纽约各交易所停止了抵抗，并且还为 NFA 的建立进行了捐赠。

大约在那个时候，雷·罗森瑟尔给我打电话，要讨论 CBOT 总裁的事情。鲍勃·维尔莫斯自 1977 年 10 月起接替沃伦·雷贝克成为 CBOT 总裁。在进入期货业之前，他在银行业干了 27 年——1950 年开始任职于芝加哥的第一全国银行。维尔莫斯在旧金山的克罗克全国银行任总裁时，CBOT 理事长荣·扬为他指了一条回到老家的明路。CBOT 在维尔莫斯的手里繁荣起来，但是当交易所在建的新楼——就在交易所著名的拉赛尔街标志性建筑的后面——严重超出预算时，他在交易所的工作遇上了麻烦。虽然还不确定该批评的应该谁，但一般来说，会员们总是会让作为总裁的维尔莫斯负责的。结果是，罗森瑟尔明白维尔莫斯在 CBOT 的日子将会愈加艰难。他还明白作为 NFA 筹建委员会的主席，我现在有责任建立一个机构，以达到我对参议员多尔许下的承诺中那些苛刻的要求。换句话说，我需要一个 CEO 来组织和运作 NFA。我可以与 CBOT 进行上述这个交易吗？罗森瑟尔问道。

我同意了。鲍勃·维尔莫斯成了 NFA 的总裁，雷·罗森瑟尔提拔了他们的行政副总裁汤姆·多诺万担任交易所的总裁。几年后，曾为高盛合伙人并于 1986 年担任 CBOT 理事长的约翰·吉尔默，把这个事情称做“期货史上最为艺术化的交易”。他说道“这就是经典的梅拉梅德；一次交易让每个人都高兴”。多诺万是从芝加哥市政府直接到 CBOT 来的，在前单位中他从 1969 年起就是理查德 J. 达利市长的左膀右臂。当时，就像今天，芝加哥被称做“工作着的城市”，它现在在理查德 M. 达利市

长（前任市长的儿子）手下依然如此。不过事实是，它在理查德 J. 达利时代的工作成绩，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汤姆·多诺万，因为他的智慧、直觉和管理能力无人能及。在市长的指挥下，多诺万协助调理着一个重要美国城市的千头万绪。

一个交易所非常像一座城市——会员是它的市民，理事会是它的管理委员会。当他来到 CBOT，多诺万对期货不甚了了，可他明白运作一个负责机构所需要的东西。在短短的几年当中，他掌握了我们市场的基本情况，并且将他在一个名叫达利的芝加哥百事通指导下学到的管理才能运用出来。多诺万还和每个伊利诺伊州和芝加哥的政客们保持着私交——他们中的一些正是因为他的支持才有今天的事业。他还与一些全国领导、参议员和众议员有私交。不管怎么说，几年下来，理查德 J. 达利的芝加哥机器，在多诺万的管理下，成了国内最受尊崇的东西。多诺万现在运用着他广博的知识体系和庞大的关系网，开始建立起强大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华盛顿特区游说机构——就是那个让我学到不少东西的游说机器。

多诺万的才能当然未曾浪费在我的身上。在他于 1981 年成为 CBOT 总裁的很久之前，我还在手把手地教着当时的 Merc 理事长杰克·桑德纳，那时我们就一起邀请多诺万来担任 CME 的执行副总裁。这个邀请让多诺万受宠若惊，但他的眼光放在了一笔更好的买卖上——NFA 的建立成为他一直等待着的机会。不过，汤姆·多诺万留在 CBOT 的决定并没有阻碍我俩结下异常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源于我们对彼此不同境遇和才能的惺惺相惜。

对于 NFA 来说，鲍勃·维尔莫斯是个完美的人选。我们的 NFA 筹备委员会，在考虑建立正确的组织架构这个问题时，几乎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维尔莫斯不仅有完成这项工作的管理能力和期货市场经验，他还希望得到这份任命。我和他那个周末在亚利桑那州斯克茨戴尔的谈话，为 NFA 的建立、它的初始预算、它的未来行政人员以及它绝不干预交易所监管的基本思想等定好了框架。最终，维尔莫斯将一些极为专业化的人士网罗起来，加入进来的人包括 CBOT 的简·狄更斯，就任行政部副总裁、CFTC 的丹·德里斯科尔，就任合规部副总裁、CBOT 的肯·哈斯，就任信息系统部副总裁、西德尼和奥斯廷事务所的约瑟夫（杰夫）·哈里森就任 NFA 的副总裁和总法律顾问以及后来接替总法律顾问一职的丹·罗斯。

位于芝加哥的 NFA 于 1982 年 8 月 2 日开始运行，是现存的一个注册的期货协会。它从大陆银行借来了办公设备和一笔数万美元的应急款。事情一旦运作起来，支援马上来到，责任也随之而来。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协会员工从十几个扩大到 330 名，包括纽约办事处的 30 名员工，预算达 2 800 万美元。

NFA 要确保期货行业的成员保持着高水准的职业行为和财务上的责任性。其效率，加上在公共客户资金极为安全的管理纪录，为 NFA 赢得了国会、CFTC 和其他美国监管机构的赞誉，并且成为全球相同监管机构的楷模。NFA 还是私营产业自我监管提高成本效率的活生生的例子。在维尔莫斯和 NFA 财务顾问们（包括 Merc 的巴

里·林德、CBOT 的约翰·吉尔默和卡吉尔金融服务公司的董事长哈尔·汉森) 的领导下, NFA 每笔交易费下降了 57 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内, 所有的联邦监管机构大幅提高了它们的预算需求。事实上, NFA 成功的一个证明就是, 过去对建立 NFA 持反对态度的期货业界, 如今却在游说, 希望给予 NFA 更多的权力。NFA 如今成为声名赫赫的私营自律机构, 这首先要归功于鲍勃·维尔莫斯。

我自 1982 年 NFA 成立伊始担任其主席, 直到 1990 年为止(我仍旧是它的永久特别顾问)。我离开后, 约翰·康希尼接过了指挥棒。之后是哈尔·汉森, 即现任主席。NFA 的极为分散化的理事会——出自约翰·斯塔森的绝佳创意, 这样一来每个人的投票都有重要作用——包括了来自期货行业各个层面的 40 多名代表。对于我来说, NFA 是期货行业进入成年的标志。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27 章

重渡太平洋

谈到财政政策，我从来也不同意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但凯恩斯主义中有一点我是衷心拥护的：“改革任何企业最大的困难不是想出新的方法，而在于从旧的方法中逃脱出来。”

到 1982 年，我从那些老掉牙的方法中已经逃脱的差不多了，足以称得上期货行业中的霍蒂尼。[⊖]或者每当我想到一个新的点子时，我至少可以让怀疑者们安静下来。现在，人们不再冷嘲热讽了，他们开始倾听——或者是假装的吧。

怀着令人精神抖擞的许多愿望，我观察着各种问题和各项发展态势，借此保持着我在领导时的效力。离开我们农业市场这个摇篮是艰难的，可年轻和热情能够克服几乎任何问题。需要联邦政府介入到监管中来，这一点很容易看到。保证没有清算公司违约，从而建立 Merc 的财务信誉，这是另一个重点，还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管理体系、扩展我们的会员基础、使产品种类多样化、为配合成长发展一支有实力的员

⊖ 美国著名魔术师，以表演逃脱魔术闻名。

工队伍以及建立一个适合我们地位和新的潜能的实际交易场所。我觉得它们都是一些战术方面的行动，是预测性的行动而不是事到临头才做的反应。

这一招屡试不爽，并没有在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所谓的“残酷的现实”中失灵。安于已经获得的成功非常容易。为何要搏机会呢？如果你做错了，这会让你无地自容的。然而，我明白一家交易所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可以成长，也可能有死亡的风险。而让我对变化的现实置若罔闻，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首先要处理内部的变化。1982年春季，我开始寻找可以代替贝弗利·斯普兰成为执行副总裁的人选。贝弗利希望从交易所生活的辛苦中摆脱出来，而 Merc 的员工们也强烈地需要重组。我心目中替换者的人选落到了威廉 J. 布罗斯基身上，他对我们的期货市场几乎没什么了解，而对农业那一摊子，像活牛、五花肉什么的，知道得更少。但这没有关系。作为 38 岁的美国股票交易所执行副总裁，他在股票和期权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布罗斯基毕业于锡拉库扎大学法学院，之后踏着他父亲（一位在证券行业有 60 多年经历的老手）的足迹，开始了在华尔街上的职业生涯。布罗斯基是纯粹的纽约人，生于斯长于斯。你从他的口音里就能听出这一点。眼下拉塞尔街和华尔街关于金融合约的竞争渐渐激烈起来，要给 Merc 引入一位期权专家级的高管，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时间吗？指数和期权市场（IOM）也已推出，而我们对期权全部的知识少得可以写在一张邮票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或者美洲证券交易所这两个期权交易中心输入专业人才。我们需要来自证券世界、对指数和期权都有所了解的人物。

为了得到布罗斯基，我做了几次努力。首先，他和他妻子琼（也是一个纽约人）不愿意在赫德逊河西岸重新定居。我没有进行强行推销，也没有做承诺说，当尤特博士准备退职时，执行副总裁和首席运营官将自动成为总裁。我所能告诉布罗斯基的是，这非常有可能。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我经常当着 Merc 理事长杰克·桑德纳的面和布罗斯基会见，在当时，我就感觉出我的名气吸引了布罗斯基。“利奥，你是纽约人唯一听说过的人。”他告诉我说。这是句恭维之词，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经历和深厚的经验。我认为让布罗斯基回心转意的是 IOM 分部的建立，以及一个周末价值 3 000 万美元的新会员资格出售费用。想让他看到我们在芝加哥建立的机构所具备的实力，这个成绩比什么都说明问题。

布罗斯基在 8 月份接受了这个职位，在 3 000 万美元的预算框架下开始了工作。花了一年时间重组了部门和行政职员，到 1982 年为止行政职员已经增加到 450 名。当然，那些委员会是重要的，但那些结构老旧的委员会对交易所日常事务的处理工作，很久以前就被专业职员们接过去。理事会的情况几年下来也变化了。至今我们有 18 位理事，他们是 Merc 会员；三名公共理事，以及来自 Merc 清算公司的三名行业代表。

我们所取得成功的一个结果是，我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把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吸引到理事会来。他们的现身说法提高了 Merc 的形象，并把其他有同样名望的人吸引过来。一段时间后，要坐到 CME 的理事会中去，这对于外来人员是件风光的事情。这些理事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背景。^①

突然间，10 年过去了。1972 年差点胎死腹中的一个想法，现在已满 10 岁。1982 年 6 月 4 日，与往年一年一度的 CME 舞会晚宴不同，Merc 全体出动，举办了一次非常正式的聚会，庆祝国际货币市场这个分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金融超市——建立十周年。我是这个颇具纪念意义的活动的司仪，而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嘉宾们也莅临祝贺。我们甚至还准备了一部精装本的《IMM 历史回顾》，以便作为礼品送给每位会员。不过当然，晚会的亮点还是我们的荣誉来宾——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他发表了主题致辞。我们之前派出一架私人飞机，把他接到芝加哥来参加这次活动。在 Merc 全体会员为他的友谊和协助所报以的雷鸣般的掌声中，弗里德曼用几句话对我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并且把 IMM 誉为一项其时已到的创新事业。

我无法压过他的风头，但我准备了一个令人惊喜的东西。这是我写的一篇追忆往昔的散文《这就像是在昨天》，文中涉及了我们在来路上遇到的大多数事件——有时酸甜掺杂，有时令人捧腹。整个大厅都快塌了。

我们打下了江山，但现在是该守住它的时候了。金融期货的国际种子最先是在伦敦播下的。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1982 年开张，在芝加哥的每个人都为之鼓掌。就像那句谚语说的那样，模仿是最好的赞扬。说实在的，这对于期货是件大好事。竞争是成功的动力。而另一家金融期货交易所会扩大市场参与。因此我尽我所能，帮助 LIFFE 的主要创新者约翰·巴克谢尔把这个企业建立起来。巴克谢尔是一个有着迷人魅力的家伙。他 1980 年到芝加哥拜访过我几次，还带了一帮同事，其中包括 LIFFE 1995 年担任理事长的杰克·威格尔斯华斯。外表上，巴克谢尔是个十足的英国人：身材瘦长、浓重的英国口音，穿着方面无可挑剔。但他完全缺乏我们的英国兄弟们那种典型的保守思想，他和他的同事们乐于创新。巴克谢尔头脑机灵，立刻领会到了 IMM 成功的关键所在，并要求我帮助他把这套东西照搬过去。而我对

① 在那些被任命的理事中，一些是从前的国会议员，如约翰·怀特，民主党前主席。一些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包括托马斯 W. 斯特劳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任总裁；路易·马格里斯，也来自所罗门；添惠雷诺尔兹的劳伦斯 E. 莫尔纳；罗伯特 B. 菲敦尼亚克，摩根士丹利的副总裁；理查德 L. 托马斯，芝加哥第一全国银行的总裁；约翰 J. 康希尼，美林期货的董事长；罗伯特 J. 波恩鲍姆，美国股票交易所前总裁；W. 高登·宾斯，通用汽车养老基金；罗伯特 G. 伊斯顿，商品公司董事长；唐纳德·巴特勒，全国养牛者协会总裁；以及共和国银行的弗雷德·鲍嘉。其他的是学者，像唐纳德·雅各布斯，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甚至还有像默顿·米勒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其他人来自政府，包括理查德·莱恩，农业部前部长；理查德·奥吉尔维，伊利诺伊州前州长；苏珊 M. 菲利普斯和温蒂 L. 格莱姆，两个都是 CFTC 前主席；前参议员鲁迪 E. 勃什威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玛莎·赛格尔以及汤姆·伊格尔顿，前参议员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此却有点儿紧张，我真的做不了什么。我们在 IMM 所做的一切都不再是秘密了——在金融服务方面没有哪一个点子是有专利的。另外，巴克谢尔和我已经预见到了未来 IMM 和 LIFFE 之间的业务联系。我们设想的宏伟蓝图是，在最后，我们两家交易所可以统治全世界的金融期货生意。实际上，巴克谢尔、威格尔华斯和其他 LIFFE 先锋们设计的最初合约简直就是 IMM 货币和欧洲美元合约的翻版。在当时，我认为我们和欧洲之间的时差可以让我们不至于成为直接的竞争对手。我不久便意识到事情并不会这样发展下去。首先，迈克尔·简金斯，就是那个知识渊博、智慧超群、跟随巴克谢尔运作这家伦敦交易所的家伙，对 LIFFE 忠心耿耿、死心塌地。他更加关心的是欧洲，而不是全世界。虽然他也愿意考虑在我们两个交易所之间建立联系，可他在谈判中对 IMM 的要求超出了我们愿意考虑的范围。他的眼睛盯着欧洲美元合约，可我对他的想法却不大喜欢。我意识到 LIFFE 可能会是一个棘手的竞争对手。虽然他们的货币合约从来没有真正地启动起来，他们的欧洲美元合约却开了一个好头。好得过了头。我不久便懂得了为何伦敦在几个世纪以来是欧洲乃至欧洲以外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很大程度上和时区有关。

如果所有其他因素都一样，期货市场的参与者会使用在他们上班时间内交易的那个市场。这意味着只要我们两个市场在产品品种、流动性等方面没有多大差别的话，在欧洲的交易商喜欢使用 LIFFE，而北美的机构喜欢使用 IMM。如果是这样，也就算了。可对于远东参与者来说，我们就不一样了。伦敦的时区使 LIFFE 每天开盘的时间刚好赶上了亚洲工作时间的尾巴——而在芝加哥我们还在睡觉呢。这使 LIFFE 对亚洲银行家和其他期货市场参与者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暂时说来，LIFFE 的优势还不算致命，因为 IMM 的欧洲美元合约有更大的流动性。交易商们只喜欢使用具有流动性的市场。但是危险正在慢慢降临。每过一个月，我可以看到 LIFFE 的欧洲美元持仓量逐渐向上爬，并且接近了 IMM 的水平。由于从一开始起，我便确定欧洲美元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期货合约，LIFFE 在时区方面的优势让我寝食难安。

而问题还没完呢。既然 LIFFE 证明了 IMM 的榜样是可以效仿的，又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亚洲的市场，比如说在日本或是香港，不用一个类似的金融交易所和一个相同的欧洲美元合约，或是其他任何 IMM 交易的产品来吸引外来的参与呢？期货的宇宙跨过海洋、越过时区，而我能够感觉到亚洲世界正在太平洋那头眺望着我们的成功呢。IMM 所特有的东西是需要严加防卫的，可这好像不太可能。同样，我认为必须有某种经济方面的同步处理可以使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竞争，并保护我们的发明成果。

1983 年的唯一答案就是同一家远东交易所联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之分享金融期货业务，并且共同促进它的发展。一开始，我们中没有谁真正地提出所谓的互相对冲这个主意，因为那有些标新立异。互相对冲是一种理论上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两个独立交易所交易的相同合约可以进行交换。举例来说，现在，如果有

人在 LIFFE 买多欧洲美元，并希望在 LIFFE 市场关闭后平掉这个头寸，这个交易商别无他法，只有等到我们的工作时间在 IMM 上卖出此合约。但这又建了第二个头寸。这意味着这名交易商在 LIFFE 买多，在 IMM 卖空——这样做买卖，成本昂贵，效率低下。由 Merc 最终设计出来的互相对冲系统（MOS）克服了这个问题，它使两个独立的合约能够进行串换。有了 MOS，你就可以在一个交易所卖出某合约，从而平掉你在另一个交易所建立起来的多头头寸，结果就是你在哪一家交易所都没有头寸了。这是一个极富革命意义的方法，而且在哪里都没有试用过。但这确实诱人。当然，这样一个系统所节省的成本和提高的效率足以使你战胜任何的竞争对手。不过，在一开始，我认为 MOS 是一种理论上的概念，离实际运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我曾经和罗森伯格和桑德纳去过中国的香港，为的是寻找一个可能的联盟单位，这样一来，虽然我们的市场在夜间歇了业，但它依然能够使交易得以进行。不幸的是，香港，这座货币随着贸易自由往来的城市，当时它的前景却不够明朗。

当然，每个人都同意日本总有一天会成为亚洲的金融大国。不过在当时，日本的法律不允许我们考虑在东京的任何事情。因此，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新加坡，这座由李光耀紧紧管控的城市国家。它有心与中国的香港一比高低，意图成为新的金融中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正在重新考虑新加坡黄金交易所的作用，并组织了一群新加坡人，希望走在香港前面，与一个美国期货交易所联合起来。1982 年 5 月，CME 理事长布莱恩·莫尼森和我访问了新加坡，并同称之为“新加坡工作党”会面，这个党派曾经大声呼吁要和我们建立合作企业。我邀请了杰克·桑德纳一同前来，因为他也同我一道考察了香港的情况。

新加坡人的确就是我想要寻找的那种。他们将商业和政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是香港所缺乏的。但对于我来说，正是林霍基，这位 MAS 官员和新加坡黄金交易所的前主席，表现出了最为不同的特点。现任瑞士银行东南亚执行副总裁的林先生，他当时是“工作党”的中心人物和发言人。他是位身材瘦长的绅士，态度咄咄逼人，嘴巴能说会道，在我眼中，这个人了解期货市场，如果事情不像他以为的那样发展的话，他是不会不说上两句的。而他站在 MAS 的立场上说话时，也是义正词严。林说服我相信，新加坡而不是香港理所应当是 Merc 的业务联系的所在地。一个月后，林霍基到 Merc 来拜访我，从此以后，我们走到了一起。就在此前，我仍然还在想着某种变通的办法，而没有考虑互相对冲。在和林一对一的交谈后，我认识到或许我们可一路走下去。他让我相信，如果 Merc 想要和一个远东的伙伴一起开创一段划时代的事业，现在正是时候，而他们就是合适的人选。但这也是危险的一步。刚与林谈完，我便直接和布莱恩·莫尼森坐到了一起，我们私下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几个小时，从任何一个可能的角度对这个想法进行了考虑。在我们结束时，莫尼森说：“利奥，我完全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干成的话，这会对期货交易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莫尼森的支持，给了我前进的勇气。我然后分别同尤特、桑德纳、罗森伯格和林德碰

了头，进一步讨论了这个想法。每个人都接受了这个意见。

想法是革命的动力，而个人都能够实现它们。但革命不是转眼间就能发生的。这个和新加坡联手的想法酝酿了两年。1983年5月，林霍基来到芝加哥，随行的有18名“工作党”官员，包括伊丽莎白·萨姆和吴国松，这两人日后都是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的理事长。不过林却突然告诉我他将离开MAS进入私营企业，尽管他还将继续担任顾问的角色。那时我觉得这个项目泡汤了。如果吴国松没有代替他在MAS的职务的话，事情很可能会这个样子。我们两人深深为彼此所倾倒，我觉得在吴的领导下，“工作党”将会有能力处理一些事情的。我是正确的。这是我参与过的最为困难的一次协议，是吴国松扭转了败局。他经验老到，有理有节，而我也懂得应该信任他那深邃的智慧。虽然他的风格和林霍基截然不同，他却更为有说服力，而他获得互相对冲协议的愿望也同样强烈。这个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吴国松，他把这个合作看做是让他国家经济多元化的重要一步。

俯身在谈判桌上的我，带领的CME谈判小组相对小一些——是他们的1/3，包括莫尼森、罗森伯格、林德、桑德纳以及我们的律师萨尔茨曼。我们在三天马拉松式的谈判环节里，一边在便笺簿上潦草地写着笔记，一边用各种问题彼此为难着，这三天简直就像在一堆敏感问题的迷宫里迂回。问题诸如交易所的独立性、财务上的保障、交易规则和清算机制。这更像两个国家正在进行高层次的贸易谈判，试图从外交上制定出符合相互利益的事件进程。实质上，我们就是如此。我需要知道新加坡政府是支持我们的，而MAS也是愿意批准一些与CFTC管理办法相符合的规则。吴国松向我保证了这一点。双方都希望互相对冲能够实现，所以讨论的基调是妥协而非否决。我对吴的努力评价甚高，所以，后来我一定让我们1983年的年报特别提到了他。

实事求是的考虑是非常好的。忘了理论吧，这个东西如何才能运行呢？毕竟，这将使投资者们可以在Merc或是SIMEX开仓交易，并且在同一个或另一个交易所平掉相应的头寸。同时，市场上的价格将在两个时区里上下变动。这在货币上引起的情况令人害怕。欺诈或者违约的概率大得不得了。CME经济稳健，可SIMEX怎样呢？这根本就是破天荒的事情。相应的程序又是如何呢？保证金如何收取呢？我们如何能保证在两个交易所之间的期货头寸上的资金流动一直是安全的呢？没有答案的问题。Merc的经济学部加班加点，但他们每交一个提案，我们的MOS委员会便毙了它。然后，过了个周末，我们其中一位经济学家迈克尔·埃塞带来一个复杂的模型，不过却是一种崭新的方法。埃塞和他的哥们儿罗杰·鲁茨在1980年一道从联储进入期货市场。他们在联储里是经济研究员。联储是我们一个绝佳的培训场所。鲁茨去了CBOT，平步青云，很快就成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清算公司也就是CBOT清算部门的主管。埃塞来到Merc，1983年，就在Merc，他发明了这个堪称完美的互相对冲机制。我把它交给巴里·林德和布莱恩·莫尼森，让他们看看是否能找出任何的漏洞

来。他们找不出来。我们三个人和萨尔茨曼律师一道，制定了一套非常严苛的财务保障体系，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SIMEX 必须要达到体系的要求。不过起初新加坡人犹豫了，这些要求成了成败的关键。我拒绝继续下去，除非对 Merc 的财务有保障，也就是我们这群财务专家们认为必需的这种保障应该实施到位。最后，协议得以达成。MOS 系统和它的财务保障体系从一开始就运作得无懈可击。1995 年巴林银行倒闭时，MOS 系统使 Merc 清算所躲过了这家伦敦银行金融灾难的打击，安然无恙，这确实令人自豪。

1984 年 9 月 7 日，四位舞者环绕在 SIMEX 的交易场，表演着东方那代表好运的舞狮子，从而开启了 Merc 和 SIMEX 具有历史意义的业务联系。在这一欢乐的生日庆典中，我对新加坡商业界人士发表了主题演讲。我向 SIMEX 的会员们致敬，并祝愿“IMM 的火炬将在新加坡的海岸上明亮地燃烧”。

为了千方百计地让这一创新事业成功，我任命贝弗利·斯普兰为 Merc 的新加坡联络员，接下去的两年中她住在新加坡，与 SIMEX 的官员和交易商们共事一处，提供建议和指导。如我所料，让新的互相对冲系统有效地运作起来，斯普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继续执掌 MAS 的高炳森也是如此。我们在亚洲上市 Merc 的欧洲美元合约，目的在于抵挡来自伦敦 LIFFE 日益增长的威胁。最为重要的是，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项目非常诱人。从 SIMEX 开门那一刻起，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LIFFE 的欧洲美元合约持仓量开始衰退了。几年后，它的官员们放弃了战斗，完全把这个合约摘了牌。Merc 和 SIMEX 之间这个联手项目使新加坡成了东南亚金融期货的灯塔，并且使 IMM 的欧洲美元合约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期货合约。

不过，在期货上，生活是复杂的，并不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在我们和 SIMEX 谈判中，股票指数期货之争又一次热了起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舔干了损失道指合约留下的伤口，回到了画板前，又有了一个点子：场外（OTC）股票市场的一个指数。这是一个绝妙的点子，但我们的经济学部门也有一个同样的主意。关于这个市场现有的唯一著名的指数是由 Nasdaq 本身运作的，而两个芝加哥交易所都在争夺使用它的权利。我们派布罗斯基到纽约去和 Nasdaq 的官员们进行谈判。这是他对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这个风波汹涌世界的首次体验。我觉得他在证券方面深厚的资历，加上 Merc 在标普股指合约上的非凡成功，能够使我们成功。但是布罗斯基这次却经历了炮火的洗礼。CBOT 获胜了。他们让 Nasdaq 相信，如果在 Merc，他们的合约将会给标普市场拎小鞋，因为 Merc 会员们要为“斯帕兹”创造流动性，这样会分散他们对其他合约的注意力。这个论调说到了 Nasdaq 的心坎里，于是 Merc 便被束之高阁了。

不过并非全盘皆输。我们不能放弃战斗，因为如果 CBOT 成功地开发了一个 Nasdaq 期货市场的话，这会打击 Merc 美国指数期货市场头块招牌的形象。另外，OTC 证券市场看上去像是未来的方向。我和 Merc 理事长布莱恩·莫尼森和首席经济学家

里克·基尔克林来了一次“头脑风暴”。绝望之中，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或许可以到标普公司那里，说服他们创造一个新的场外股票指数。我们可能无法赢得OTC指数市场，可那肯定能把CBOT这一池塘水给搅浑。

接下去爆发了Merc的SPOC（标普场外）指数和CBOT的Nasdaq指数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迄今为止，是我们两个交易所历史上最为激烈的。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每家交易所在筹备、公关和广告上花了大约400万美元。我们各自的会员，就像备战之中的两支军队，情绪激昂到了极点。每个可以想出的招数都派上了用场，包括在我们大楼外和芝加哥的大街小巷上悬挂标语旗帜。CME甚至企图邀请《星际迷航》中扮演斯伯克先生的利奥纳多·尼莫伊来为我们的SPOC合约敲开市钟。唉，他的要价太高。我们预算中的大部分都归了路易·拉吉瑟尔，他在我们的全国广告中成了领衔配音员，并为投资组合经理们录了一盘介绍性磁带。拉吉瑟尔乘势甚至在CME的交易场内录制了他《华尔街一周》的电视节目。另外，一张包括所有Merc交易商的照片，包括我自己在内，被放到了各大报纸和期刊上，作为主打广告。我本人也一个早上一个早上地在SPOC交易池里交易（亏了很多），为的是吸引我们的场内交易商。当时花钱之多，竞争之激烈，结怨之深，只有后来两个交易所各自电子交易系统GLOBEX和Aurora之间展开较量时，才能把它比下去。

这场OTC之战打了个平手，哪个合约都没有获胜。或许在1985年说哪个是“下个世纪的市场”还有些过早。不过我相信：没有CME的干预，CBOT的Nasdaq市场很有可能获胜，它无疑是两个OTC指数合约中比较好的一个。因此，虽然SPOC从未成功过，它仍然实现了其首要的目的：保住了CME指数期货中心的地位。

就在SIMEX开始运转之前不久，贝蒂和我，还有我们最小的儿子戴维，在我们亚利桑那州的家里待了一个长周末。路上，我凑巧在电台上听到了一条新闻，说得是比尔·布洛克从贸易部长位置上卸任，接手成为劳工部长。这个消息像闪电一样划过了我的脑海：克莱顿·尤特，这个曾经在全球宣扬过我们自由市场主义的人，将会是布洛克的最佳接替人选。尤特经常在私下里和我说，USTR（美国贸易代表）的位置能够把他引诱回华盛顿。

我立即打电话给他。“克莱顿，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但如果你曾经想过要回到华盛顿去的话，现在是个机会。里根刚刚任命比尔·布洛克为劳工部长，贸易代表的职位空缺了。”

尤特博士马上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当时是周五的上午，而再过几小时他计划飞到德国去，在一个国际性会议上做演讲。他如何能首尾兼顾呢？

我并不是千方百计想让克莱顿离开Merc。相反，我认为他会是一位杰出的总裁，而我对尤特也是崇敬得无以复加。他为Merc所做的不懈努力产生了极佳的效果。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事实证明，尤特在全世界的金融中心里可以非常出色地代表我们的交易所。他能说会道，他了解期货，他知道掌握分寸，他还知道全世界那举不胜

举的对金融有决定影响的因素。他的“门面先生”形象和我的“内务总管”角色相得益彰。所以我当然不愿意失去他，但我也也不想成为他事业道路上的绊脚石。他属于 Merc，但他也应该为美国总统效力。他的投入，还有他的国际交流技巧，也就是他在全世界马不停蹄地为我们充当大使时练就的这种本领，都会得到这位总统的欣赏。

贸易代表，这在我看来，是个绝对适合的岗位。尤特博士聪慧、老练，形象庄重，不过在那副外表之下，有种内部拉斯加人的乡土魅力，视在场者的不同，他能够展现这种魅力，也可以藏而不露。而他也懂国际贸易。我真的认为他是这个国家的一种宝贵财产。而他也确实如此。

“你来处理，”尤特催促道，“我会让吉姆·雷克在华盛顿尽其所能，而你把私营企业这块搞定。你们两个能行。我们保持联络。”

这个空位当然能吸引一大批顶尖的候选者。但如果吉姆·雷克，这位白宫顾问和里根总统的媒体咨询，和我能够让尤特成为少数几个等待考虑的候选人之一，我确定剩下的尤特会自己解决的。他自己的履历会使他脱颖而出的。

我一挂上和尤特的电话，便开始拨打起那个有影响力的电话来。在接下去的 48 小时里，我儿子戴维和我从头至尾坐在一起，亲身领会了游说的艺术所在，还有影响力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在这阵旋风般的电话工作中，我和我的助手苏·格林相互配合（如今她在芝加哥我的办公室里为我工作），为尤特的游说就这样开始了。

又一次，贝蒂成了“公务寡妇”，我在为 Merc 和期货行业服务的过程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妻子的最大优点之一便是她几乎不抱怨，她总是以我的工作为重。一次又一次，盼望已久的假日或远足会没有预兆地被推迟或取消，她经常会遭遇这种令人失望的事情。可贝蒂真正是我事业上的搭档和伴侣，她会在整个过程中尽其所能地支持我、协助我。有时，这意味着做安排或做一些研究，或帮着写一篇文件；有时，这仅仅意味着待在那儿，或只要提供“茶和同情”；而其他时候会是一个知心朋友或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就一个难题进行讨论的对象。有时是分享胜利的喜悦，有时却是分担失败的辛酸。不管目的为何，任务为何，贝蒂总在那里，尽她应尽的义务。

吉姆·雷克和我运筹了一番后，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我们出手要快，这是关键。在特区的政治中，如果一位有希望的候任者在行动上时间拖得过久，敌人就会把他给生吞了。我们只有这个周末了。我们列了张名单，上面都是我们必须争取到的支持者，我们一人一部分。雷克负责从内部打通政治上的关节，而我则对工商界进行游说。在接下去的两天里，我与全美国的 35 位主要的首席执行官们取得了联系，让每个人都给他们的参议员以及他们认识的头面官员们打电话。我解释说，克莱顿·尤特是这个国家里贸易代表的最佳人选。像这样的话可以不胫而走。我只吃了一个闭门羹。

在一些情况下，雷克和我认为我们两个都要发动攻击，共和党参议员鲍勃·多尔就是如此。他对于任何的任命程序都是非常较真的。我知道从前多尔并非尤特的忠实拥趸。在尤特任职农业部的岁月里，两人曾经在一些问题上产生过分歧。雷克第一个给他去了电话，碰巧这位参议员正准备去和白宫办公厅主任唐·里根见面。雷克刚挂电话，我随后就打了过去，我们两个一起说服了多尔摒弃前嫌。在推荐尤特任贸易代表这件事上，多尔参议员同意出力。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我还给丹·罗森考斯基打了电话，他虽然是一位民主党员，却可以在他的朋友里根总统那里说说话。

另一个关键性的电话是打给我的朋友贝瑞尔·斯普林克尔的，他以前是 IMM 的主管，现任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普林克尔与唐纳德·里根过往甚密，后者极有可能向总统作最后的推荐。我联络到了贝瑞尔·斯普林克尔，他也在德国出席一个经济会议。斯普林克尔的助手为我接通了国际长途，这又一次证明了与助手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斯普林克尔同意尤特博士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并说给唐纳德·里根打电话这件事情包在他身上。

之后我的运气来了。当我给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约翰·菲伦打电话时，我得知唐·里根在下周一到 NYSE 去访问。菲伦在华尔街做美林董事长的时候，就是里根的哥们儿，他答应在这位总统的办公厅主任面前替尤特说几句好话。事情有门了。

吉姆·雷克和我谈了肯定不下十多次，我们向对方简要汇报了情况，比较了笔记纪录并制定了进一步的战略。我还和在德国的尤特谈了几次。这个周末的努力起到了极大的效果。尤特博士的名字出现在那张推荐名单上。等到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他得到了唐纳德·里根在华盛顿的约见。而正如我预料的，身为一名资深政治职业选手的克莱顿·尤特，自己把剩下的问题都给解决了。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这是一个享有殊荣的大使和内阁级职务。从此，尤特开始继续沿着他的政治阶梯向更高处爬去。这不仅是尤特的一次伟大成就，还是 Merc 在公关方面的辉煌胜利。这个贸易代表的职位，大大提高了尤特和 Merc 在国际事务中的可信度。而后来当乔治·布什总统任命尤特为农业部部长时，这种效果又得到了增强。

但现在我们必须填补上在 Merc 里的空缺了。我又开始做工作，为的是让比尔·布罗斯基得到总裁的职位，但却发现 Merc 行政委员会里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内部看法，那就是布罗斯基的资格与 Merc 不相配。他在交易所外基本上无人知晓，而与克莱顿那种全国性的资历更是相去甚远。委员会催促我物色一个更具国际信誉的人选。我拒绝让步，坚持说布罗斯基的聪明和职业经验可以让他慢慢胜任这份工作。我的主要论点就是，Merc 在国际上形象非常好，现在需要的就是内部的管理。布罗斯基在这方面已经显示了他的本领。最终，我让反对方土崩瓦解，并且亲自替他谈定了一份不错的合同。1985 年 6 月 1 日，比尔·布罗斯基接替克莱顿·尤特成为 CME 的总裁。历史已经证明了我固执己见的正确性。

在尤特离开之前，他和我聊到过 Merc 的未来。我们都同意我在角色上的转换是必要的。随着他的离去，我必须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把 Merc 领向世界，特别是站在全球的前沿。我们认为，与 SIMEX 的联手是朝着这个方向上走的正确一步，但这仅仅是开始。Merc 一定要继续向全球迈进。是啊，我放眼全球看到的东西实在让我担心。金融工具现在已经统治了各个市场。利率、证券还有货币合约从 1980 年的 18% 飞升到了 1985 年的 59%。在我看来，这一趋势无疑将持续下去，在可能的程度上，我们必须保住 Merc 的业务量，使之不受未来国际竞争的影响。我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远东。

1985 年 5 月，Merc 迈出了进入亚洲金融巨擘——日本的步伐。我收到安达信公司的邀请，在他们的东京金融期货中心的开张典礼上作主题演讲。这代表着我以正式身份重返日本，也是我日后对这个国家众多访问的开始。在当初我的父母和我逃离可怕的大屠杀时，这个国家为我们提供了通道。但这次活动也代表着另一个第一次。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次会议的特别演讲人。他在这个国家有些神化了，并且是日本银行宝贵的顾问。他讲的是宏观经济学，我讲的是期货。也就是说，和我共享这个讲台的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这将我介绍给了日本社会。这种机会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

也是在这次访问中，我结束了克莱顿·尤特没有完成的和《日本经济新闻组织》关于专门使用他们的日经 225 股票指数的谈判。CME 因此取得了上市日经股票指数（跟踪东京股票市场）期货合约的权利。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股票市场。一周后，我在香港的 IMF 国际货币会议上讲话，这也是该会议第一次期货演讲。几年后，1988 年 9 月 2 日，我为大阪证券交易所上市日经 225 期货合约剪彩，并重访了我在小时曾短暂住过的神户地区。

安达信 1985 年力图将自己建成亚洲的专业期货机构，他们这个大胆的行动并非出自偶然。这表明，自从 10 年前金融期货发轫他们便推出相应的长期战略计划起，现在这个计划仍然在继续。这项非常成功的战略首先是密切尔 R. 福尔舍的作品，他是安达信最聪明的年轻官员中的一个。福尔舍和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一见面，马上成了知心和知交。福尔舍领悟到金融期货对他事业的意义，而我也意识到一家领先会计机构的财力在推进期货市场事业上具有的潜力。在言谈之间，我们成了搭档，找到了我们利益上的共同点，建立了互惠的基础。这种合作关系持续了多年。

Merc 同时在东方和西方展开了它的全球之翼，我也同 Merc 的营销主管芭芭拉·理查兹坐下来讨论设立 Merc 年度研讨会的想法。我解释说，CME 必须披上一件国际化的外衣。理查兹聪明，学起东西来非常快，在金融界里人缘好，关系多。她本能地领会了我的意思，并娴熟地为这一研讨会项目奠定了基础。研讨会于 1985 年开始于伦敦，后来又发展到了东京。在我的授意下，理查兹还组建了“欧亚金融工

具顾问讨论会”，顾问们都是从我们的全球清算会员里仔细挑选的专家。^①这些讨论会不仅为新一代的经理们和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大放异彩的机会，比如，坎普湃金融服务公司的杰出经济学家戴维·黑尔就是通过该论坛在国际上初次崭露头角，而且还让 Merc 通过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了解到他们的想法和批评，并为我们赢得了许多朋友。多年来，我在 Merc 的任职期内，这些研讨会一直在进行。它们办得非常成功，并为 Merc 赢得国际声誉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不久之后，其他交易所都将此研讨会当做标准而纷纷效仿，过了许久，CBOT 和我们合作举办起这些会议来。不过，Merc 在此领域里的领头羊作用以及理查兹的专业水平，使我们的形象无人能及。

1986 年，我们回到了日本，这次是任命荒川赳夫为 CME 新的日本办事处的管理董事。荒川是日本财务省（MOF）的前官员，是财务相特别顾问内海英郎向我推荐此人的。多年以来，有关日本期货市场的事宜，我已经成了一个不领工资、非正式的 MOF 顾问了。这个角色开始于我和内海之间的友谊，当尧太丰（现任世界最大银行的东京/三菱银行董事长）成为 MOF 特别顾问之后，这一角色延续下来。结果，我同许多日本官员们建立了私交。内海是个博学多才、智慧超群的人，我们之间发展起来的友谊在日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层关系，我可以赢得 MOF 的批准，从而使 GLOBEX 得以在日本开始营运。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还是要说，梦想就是由“不可能的任务”这种东西所组成的。我们的成长速度、我们的影响广度、我们计划的扩张程度就像一剂强心针，在它的鼓舞下，没有什么目标看起来像痴人说梦或是异想天开了。很显然，我知道并不是我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但安于现状无论如何是吸引不了我的。冲向风车未免徒劳，但我却不会畏首不前。没有异想天开，就不再有目标，而没有目标，就没有期货市场。我最喜爱的礼物，它还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那是我们的法律总顾问李·弗利曼送给我的，它是一尊堂·吉诃德的雕像，即塞万提斯笔下那位主人公。

① 在他们中间包括：布林森合伙公司的加里 P. 布林森；吉德尔·皮博迪公司的马克斯·查普曼；国际纸业公司的米拉·德拉克尔；威尔斯·法尔格投资顾问公司的弗莱德·格劳尔；第一波士顿公司的 T. 布赖特·海尔；东京银行有限公司的本田健吉；期货基金顾问公司的罗伯特 L. 埃塞克森；瑞士信贷的莫伊兹·亚马尔；摩根士丹利的谢尔顿·约翰逊；德·佐俄特·威德公司的弗兰克·琼斯；三菱银行神谷明；第一波士顿公司的彼得·卡彭；大通曼哈顿的约翰·凯利；折扣公司的墨尔顿·莱恩；米德兰·蒙太谷公司的伯纳德 J. 林德；J. P. 摩根的爱德华·麦卡丁；贝尔斯登的威廉姆·麦克尔切克；哈利斯信托储蓄公司的布鲁斯·奥斯彭；大陆银行的威特·劳力斯；美林的约翰·理查兹；西尔森·雷曼的戴维·萧恩瑟尔；斯坦福大学的米伦·斯科尔斯教授；W. I. 卡期期货公司的迪蒂埃·瓦尔莱特；以及日光证券有限公司的横山直树。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四部分

机器、市场和心灵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28 章

GLOBEX

1986 年 5 月，也就是国际货币市场（IMM）诞生 14 年之后，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服务金融学教授莫顿 H. 米勒，对金融期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之为“过去 20 年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金融创新”。1990 年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米勒教授的高度评价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一种空前的荣誉，同时也让我们备感压力：如何才能让 IMM 永立潮头？

从米勒教授所指的金融创新诞生之日到 1986 年，期货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 年首次引入金融合约时，期货交易的机制仍然与一个世纪前这些市场刚创立时几乎一模一样。事实上，本人 1977 年为《豪弗斯特拉大学法律评论》撰写的一篇文章曾经对公开叫价交易大唱赞歌。当时我认为交易池是获得流动性的唯一方法，而电子交易永远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当然，我是根据那个时候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来写这篇文章的。要知道，那个时候，美国金融市场的地理屏障还没有被卫星、微处理器和光纤打破，我们还没有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没有所谓的个人电脑，比尔·盖茨还在上大学，视窗系统还不知为何物，苹果公司也未见踪影。

10年后，一切都变了，而我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为此，我不得不再次阐述以前的观点以及现在的观点。但是这种转变并非一夜之间就发生了，世界永远在变化，社会也在不断进步，而我的观点也随之逐渐改变。

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市场从一个标准的国内市场变成了一个国际性市场，Merc的交易量也增长了7倍，从1976年的大约3700万张增加到1986年的2.16亿张。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金融期货已经成为风险管理的标准工具，它们的运用也在朝三个维度扩展：新产品、新技术、新用户。金融期货的成功也带来了竞争。新的交易所在各大洲不断涌现，威胁着CME在期货市场的主导地位。

Merc与SIMEX（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两地时差为14个小时，相距9400英里）的合作表明，交易所之间与国家之间一样，可以跨越文化、大洋以及时区，形成稳固的互利联盟。但是任何事情都处于变化之中，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或者安全的。日本期货市场一旦步入正轨，也许就会全面压倒新加坡期货市场。还有大量涌现的OTC产品对我们的产品形成了竞争，包括银行、投资银行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推出的混合非交易所期货产品，更别提我们已经感受到的来自于银行间市场和期转现市场的竞争。

在背后推动这些变化的基本力量是技术变革，而这种变革并不会结束，相反，它将会让任何事物变得过时。花旗银行前总裁沃特·瑞斯顿有一句话能够很好地概括这一切：“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更为迅捷的国际金融新系统的建立……这个系统和以前的系统截然不同……这个系统不是由政治家、经济学家、央行官员或者财政部长建立，而是由技术建立，由那些通过电子通讯技术和计算机将整个地球连接起来的人们……”因此，瑞斯特认为，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信息本位已经取代了金本位。事实的确如此。

我是带着敬畏和惶恐之心来看待这种转变的。由于信息能够以光速自由流动，它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系统的主宰力量。这个事实对期货市场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在警告我们的会员时，我说得非常坦率，我向他们解释说：“计算机芯片与电话的结合已经把世界从联邦式的自治金融市场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市场。欧洲、北美和远东三个主要时区之间不再存在明显的界限，原来三个市场的运作彼此独立，有各自的市场中心、产品、交易时段以及客户，而今天三个市场已经不再是彼此独立了。”

今天，我们市场的用户来自全球各地，而有关的消息也会同时传遍各个时区。当这种信息流动要求财务经理做出某些市场反应时，他们不再需要等到本地市场开始交易，相反，他们能够立即建立起市场头寸，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全球化”。由于全球化，每个金融中心都成为了其他金融中心的直接竞争者，这带来了新的机遇、挑战以及危险。面对这种引人注目的转变，我们不得不想办法防止我们的市场份额被蚕食。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战略来应对这种情况，这个战略应该基于全球角度，既包括复杂的系统也不失政治机动。这个过程将会涉及许多深刻的甚至是痛苦的自

我反省，因为我们知道计算机技术的使用的确可能威胁 Merc 最为神圣的基石：公开叫价。

为了激发大家的努力，我做了两件事情。作为 Merc 战略规划委员会的主席，我将应对全球化效应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我任命了 Merc 的一位新雇员肯尼斯·科恩主持委员会的讨论。肯·科恩是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曾经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也曾经是博思·阿兰·汉弥尔顿管理顾问公司的管理咨询顾问。仅仅通过与科恩的一次谈话，我断定，这个家伙就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他才华横溢，思维缜密，又具有洞察力。科恩与托德·佩泽尔、埃里克·沃尔夫、卡尔·罗耶尔以及艾琳·弗拉荷蒂代表了 Merc 的下一代管理层。这些专业人士与早期 CME 的员工类似，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头脑非常独立，喜欢毫不犹豫地表达看法。佩泽尔原来受雇于咖啡、糖及可可交易所，相信有一天会成为 Merc 最受尊敬的高级职员。沃尔夫则由于其在市场调研方面卓越的专业技能而倍显突出。罗耶尔和弗拉荷蒂则是具有相当专业技能的律师。事实上，我深深地被艾琳·弗拉荷蒂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所折服，以致在随后的几年，我选择她作为我的公司——樱花戴尔舍公司的法律总顾问。

战略规划委员会是 CME 的神经中枢。组织该委员会的早期目的是研究 Merc 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成为了该委员会的主席，布莱恩·莫尼森则是副主席。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交易所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它所做出的建议毫无例外都会被理事会采纳，这些建议将对 Merc 的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我知道，就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的建议可能会深刻地改变期货市场的进程和历史。

当然，Merc 并不是唯一察觉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危险的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也把即将形成的日本市场作为其核心产品——30 年期美国国债期货的潜在威胁。美国国债拥有一个流动性相当好的现货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全天 24 小时都可以交易。对于日本来说，在东京开设一个新的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展美国国债交易，以吸引亚洲的长期利率业务，这并不是一件难事。这是 CBOT 赖以持续发展的业务。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威胁，CBOT 采取了意图非常明显的措施。他们开设了美国国债的晚间交易时段，从晚上六点开始，正好与东京工作日的开始时间吻合。CBOT 认为，这个防御性措施将会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业务吸引到芝加哥，而不是潜在的东京交易所。

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想法。CBOT 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竞争问题并且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对此我很赞赏。但是对于他们所采用的防御措施，我却不敢苟同。对我而言，一个每晚交易几个小时的晚间市场就像为了躲避龙卷风而藏进纸板箱。晚间交易时段仅仅覆盖了国外工作日时数的一小部分，这样的盘后交易时段要完全覆盖其他两个时区，需要延长到 16 个小时，而这根本不可能。此外，晚间交易时段充其量只能用于有限的几个交易工具，可以用于债券，但要增加其他的品种将会非

常困难。据此，我认为，在美国开设晚间交易时段是否能够阻止外国开设正常交易时段内的本地交易所，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事实上，东京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TIFFE）已经于1989年开业了。

但是，坦率地说，CBOT看不到别的选择，它沉迷于公开叫价系统不能自拔，根本不考虑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比如说为了应对全球化而采用自动交易系统。公平地说，在我们行业中，几乎所有交易所都跟CBOT非常相似。交易池交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任何朝向电子交易的变动或者甚至是技术进步的采用都被视做是迈向“黑箱”、“达斯·维德”。^①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交易所敢于迈出这一步。

尽管自1730年大阪大米交易所成立以来，有组织的期货市场即已存在，尽管这些市场已经逐渐远离了它们的农业起源，尽管它们已经摆脱了实物交割的束缚，但是有一样东西却始终保持不变：公开叫价。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公开叫价交易系统是获得必要的流动性以形成和维持一个可持续市场的唯一经过证实的机制。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世界和我们的市场都是动态的。对我们的市场构成威胁的不仅仅来自于其他国家，那些来自于国内证券交易所、OTC市场、非正规机构以及新技术的竞争力量也正在对我们的市场形成巨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忽视我们周围的这些巨大变化，我们就可能被抛在后面。认为交易池交易是终结的交易方式将会让你形成一种致命的安全错觉。相反，我相信，为了保持公开叫价的生命力，我们应该调查一下这个交易系统是否能够满足目前的需要，如果不是，我们应该如何改进。

我也不认为几年前我所倡导的，在Merc与SIMEX之间进行的“对消”，足以应对全球化的竞争挑战。虽然该系统运作很成功，也证明了不同时区的市场能够相互合作，为对方提供非正常交易时段的服务，从而使双方获利，但是这样的合作有着严重的局限。充其量它只是部分地解决了问题。虽然对消系统适用于欧洲美元，用于其他金融产品却并不成功。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创建对消系统过程所遭遇的法规的复杂性就如同噩梦一般让人不堪回首。我怀疑这个系统是否能够在全球的基础上采用。单一的合作无法覆盖全天24小时的交易期间，而一些金融中心恐怕并不欢迎对消系统。

而我的看法是，过去几年的技术进步要求我们对面临的竞争问题采用完全不同的应对措施。那些不能认清这一点的人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为了应对国内的竞争压力，我们不得不接纳新技术，研究是否能够把这些新技术融入公开叫价。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我们必须承认，电子通讯正在造就一个全球市场，而这个市场将包括电子交易机制。谁要是敢于忽视这些现实，最好的情况是沦为世界市场的二流交易所，而最糟的情况就是消失。

我所寻求的答案是非常容易的：在正常交易时段结束之后通过电子交易延长期

① 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黑勋爵。

货和期权合约的交易时段。电子交易系统将通过 Merc 会员配备的设施为他们所用，并将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我们的合约，从而使得 Merc 市场几乎全天 24 小时都可以进行交易。这样的电子交易系统代表了对国际竞争的全面应对，并且彻底地将 Merc 置于信息本位中。实际上，盘后交易时段的电子交易系统将对消系统与晚间交易结合起来，并且将它们与公开叫价交易融为一体。可以肯定，这将阻止我们的外国竞争者在本地的交易大厅推出 Merc 合约。此外，通过采用计算机技术，我们将抛开市场原有的束缚，可以充分享受现代能力和创新的成果。当我第一次和里克·基尔克林探讨这个想法时，他立即表示赞同。“我喜欢这个想法！”他大声说，并且他还把这个想法称做是“一个概念的飞跃”，已经把传统的应对全球化的概念远远地抛在后面。

我也从那些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中获得一些启示。1976 年，纽约股票交易所启动了其小额指令执行 DOT（指定指令回转）系统，1984 年则启动了超级 DOT 系统。同年又出现了 INTEX 的创意，即针对期货产品的国际电子指令配对系统。由于缺乏交易所的支持并且试图取代现行的竞价系统，这个创意没有获得成功。1985 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启动了针对股票和指数期权的散户自动化成交系统（RAES）。同年，新西兰期货交易所宣布该所正在进行电子交易系统的试验。随后，在 1986 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其交易大厅，转而采用了一个股票自动报价系统——SEAO。当然，我们周围还有其他一些技术进步的例子。

正如我当年在 IMM 涉足一无所知的货币交易时所干的那样，我现在正在要求期货行业跟随我踏上另一次冒险的旅程，旅途需要跨越大洋，横穿大陆，并且通过高技术的鸿沟。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一点：如果你的目标不够远大，那么你的想象空间也不会宽广。毕竟是想象而非空想将我们带入未来。再来看看我写的科幻小说《第 10 颗行星》，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普特拉尔——一台无所不能的计算机，能够在银河系的 5 颗行星之间行走。我从 1983 年开始写这本小说，1986 年完稿，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 GLOBEX 的概念，而它就是期货世界的普特拉尔。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此前儒勒·凡尔纳月球旅行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人类的真实生活越来越接近科幻小说所虚拟的世界。计算机某一天也许会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987 年，《第 10 颗星球》正式出版。写这本小说成了我舒缓市场压力的妙方，它也让我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小说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手写，完成的时候却是在电脑上。在机场，度假期间，或是清晨，我都会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但是我知道，在我所承担的所有任务中，电子交易将是最为困难的。期货市场的当权派实力强大，可以预料他们将像当年的勒德分子^①一样强烈反对自动化。正如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克曼所说的：“人们不会相信那些在他们计划或者预先安排之外的

① 1811 ~ 1816 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的人。

东西。”为了让我的计划纳入会员表决议程，我还需要将我的计划做得让人看上去有一些特别的吸引力。我和我当时的核心团队包括巴里·林德、布莱恩·莫尼森、杰克·桑德纳以及约翰·盖尔德曼等人商讨了一些相关的策略。

我认为桑德纳一开始就非常喜欢这个想法，因为它将表明 Merc 比 CBOT 先进多了。“它将让 CBOT 的晚间交易时段变得一无所值。”杰克告诉我，后来他也向媒体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但是巴里·林德却成为了 GLOBEX 开发过程中最热心的支持者以及我所信赖的顾问。立即采用新技术是 CME 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他给了我勇气让我继续下去，他说：“利奥，我对你转向电子交易的思想和当初关于国际货币市场的想法评价一样高。”林德并不仅仅是恭维，不久，他就他自己的经纪公司采用了高技术战略。

在与肯·科恩以及里克·基尔克林的交谈中，我向他们解释，为了让 Merc 的会员接受电子交易的引入，我们的计划必须包含三个要素。首先，我们必须找到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专家加入我们的队伍，从而帮助我们获得技术上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我们本身无法提供，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计划至关重要。肯·科恩和里克·基尔克林很快向我证明，大型国际报价公司路透控股集团，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同时该集团也对我们的计划非常感兴趣。路透集团在收购 Instinet（股票指令配对系统）和引入针对外汇交易的 Dealing FX 系统时就已经在自动化交易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同时，路透无疑是一个最负盛名的国际品牌。正如 10 年前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我试图引入金融期货时所扮演的权威角色一样，路透集团也能够扮演引入自动化交易的权威角色。

我需要的第二个要素是消除会员们对于电子交易的恐惧，他们认为电子交易将会对他们在公开叫价交易时段的生存空间形成威胁。Merc 主席杰克·桑德纳曾经负责战略规划职能，他和我一致认为，我们要向我们的会员保证，没有经过他们的允许，在 CME 的正常交易时段，我们不会推出竞争性产品的电子交易。

接下来我认为，我们的计划还必须给 Merc 的会员们提供货币报酬。我们的交易商首先是资本家，他们必须要有利润驱动。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很清楚，通过新的电子交易系统进行的交易要征收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最终会形成利润，而这部分利润将以股利的形式分配给我们的会员。我提出了一个 70-20-10 的利润分成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莫尼森、林德、桑德纳以及盖尔德曼的赞同。70% 的利润分配给会员，20% 分配给清算会员，剩余的 10% 留给交易所维持新系统的运作。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大的利润机会。其他交易所和 Merc 一样也面临同样的全球竞争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邀请其他的交易所加入我们的电子交易系统并且推出他们自己的交易工具呢？当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计划的最后一个要素就是如何提交。根据我的想法，我们应该注意两个地方。在我们准备披露这个想法以及它的合理性和相关细节之前，有关计划的一切内

容应该高度保密。我始终坚持这一点。我十分清楚，稍微有一点泄露就会给这个计划带来错误的印象和揣测，同时也给了那些恶意的批评者一个歪曲概念的机会，这将使得该计划无法获得表决通过的机会。如果该计划有机会进行表决，它必须在一个特别会议上完整地提交给会员，而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应该能够防止计划的内容外泄。我和杰克·桑德纳对理事会的所有成员以及有机会听到该计划只言片语的雇员都提出严正警告，要求不能泄露半点内容。同样重要的是，表决时分发给每位会员的书面材料应该注意表达方式，要确保给会员们留下最好的印象。我把这个责任交给了艾利桑·波斯纳，他是书面和图解表达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这本题为《期货的未来》的小册子和其他要素一样获得了会员们的积极反响。

邀请路透集团参与我们的计划实际上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在路透集团于纽约举行的特别董事会会议上，我与他们的管理层进行了会谈，我发现他们非常愿意并且急切地想跟我们合作开发电子交易系统，因为这将使得他们成为盘后交易时段期货报价的唯一提供者。我毫不费力地让他们相信，未来将由技术主导，Merc 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因为有机会和我们一起创造这个历史性的突破，他们同意免费为 Merc 建立该系统，并负责维持该系统的正常运作，按交易费用的一定比例收取佣金。几周后，合作方案获得了会员的表决通过，CME 和路透控股集团正式签署了长期合作协议，该协议将建立一个全球电子自动化交易系统，提供美国正常营业时间之前及之后的期货和期货期权交易。

1987 年 9 月，在 Merc 尚未投入使用的交易大厅里，1 000 多名会员前来参加会员大会，这是 Merc 历史上参会人数最多的会员大会。这种感觉是令人兴奋的。我能感觉到全体会员都在摒住呼吸。这个计划的保密工作非常严格，以致于就在会员大会的前一周，《芝加哥太阳报》预测 Merc 将步 CBOT 后尘，开设一个盘后交易时段的公开叫价市场。面对肃穆和异常拥挤的人群，我们公布了 P. M. T. P. M. T 是这个系统的项目代号，这个代号出自我的坚持，目的是强调我们的计划是推出盘后交易，减少人们关于这个计划将会威胁公开叫价的恐惧。让我感到懊恼的是，我们很快得知，这样的简写也用于其他目的，比如在英国，它表示经期前的紧张。我们不久就改变了系统的代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GLOBEX（全球交易所），这个代号是由理事会从计算机所产生的名字清单中选择出来的。

从特别会员大会开始的那一刻起，我就确信，绝大部分会员都会支持我们的计划。从他们听取报告时的全神贯注，我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从他们在适当时候的热烈鼓掌，我也能听出这一点来；从他们步出会堂拿着书面材料的方式，我能感觉到这一点来。路透方面派出的参会代表安德烈·维勒纽夫和约翰·赫尔向我们的会员做出了个人保证，路透集团已经准备好成为 Merc 的唯一合作伙伴，他们的评论十分令人鼓舞。我们打出的这张信任牌显然非常有效。尽管我和桑德纳在表决前花了很多时间游说会员们，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怀疑过表决的结果。1987 年 10 月 6 日，会

员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我们的计划，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再次永久地改变了期货市场的发展进程。

Merc 的宣告带来了整个国际期货行业的地震。CBOT 主席卡斯坦·马尔曼后来把 GLOBEX 描述为氢弹，严重威胁公开叫价交易的生存。但是令所有人感到吃惊的是，CME 辉煌的创新历史（曾经在期货史上走出了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步）以及会员们的高度支持会对我们的计划产生如此有利的影响。媒体显然也喜欢我们这个计划，它们把这个革命性的宣告看做是 Merc 再度成为勇敢的变革者的标志，它们认为 Merc 值得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GLOBEX 和它的技术合作伙伴路透集团正好具备了让媒体信任和称赞的特质，而这正是我所计划和希望看到的。

跟我们所预料的一样，GLOBEX 的出现引发了电子交易系统的热潮，这些系统要么用于延长目前的交易时段，要么用于全部交易时段。第二年，东京证券交易所、大阪证券交易所、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丹麦期权及期货交易所、瑞士期权及金融期货交易所以及东京谷物交易所都启用了自动化电子交易系统。又过了一年，爱尔兰期货期权交易所、东京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以及悉尼期货交易所都启用类似的系统。到 1991 年年底，又有 10 个交易所采用电子交易系统，其中包括德国期货交易所、伦敦期货期权交易所、瑞典期权交易所、芬兰期权交易所以及西班牙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

对于世界而言，GLOBEX 不仅仅代表了一个已经成为现实的创意，它也代表了期货市场权威的一种官方认可，亦即自动化是期货市场必不可少的一个附属物。Merc 再次成为了美国金融服务行业的宠儿。我没有办法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有办法知道 GLOBEX 成为现实用了将近 5 年时间。正如罗伯特·彭斯^①的诗里所说：“最妙的策划，不管人和鼠，都会常常落空。”^②

^① 苏格兰诗人（1759—1796）。

^② 引自彭斯的名诗《致鼠蹊》（*To A Mouse*）。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29 章

预 警

我 现在还记得我和 CFTC 主席苏珊·菲利普斯 1987 年初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让人不快，甚至有些滑稽。她说：“让我直截了当地说吧，利奥。你的意思是要对标准普尔 500 指数期货实施每日价格波动限制？坦率地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苏珊·菲利普斯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是爱荷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我非常熟悉。我曾经积极支持她入选 CFTC 的主席职位，也曾经在市场中广泛地研究她的一些观点。我们两人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美妙，共同反对对市场变动的人为限制。现在我却突然建议对价格的自由变动设置一个主观的障碍，这完全违背我以前的立场。她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突然的转变。梅拉梅德出什么问题啦？我没事，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向我们行业的联邦监管主席解释说，我担心股票市场将会崩溃。这样的话本身就可能导致崩溃。

当然，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认为股价已经虚涨得太多。还有其他人和我的想法一样，也看到了道指和标准普尔指数的脆弱。其中有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主席约翰·菲

伦。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中，菲伦总要大声疾呼他对于市场崩溃的担心。但是他把“瀑布”似的下跌归结于指数套利与投资组合保险。

我担心的是，到股市崩溃的那天，我们的标准普尔合约将第一个向世界传达这个坏消息。我很清楚人们会怎样对待那些传达坏消息的信使。绝望中，我开始进行大胆的尝试，试图把我们的市场与即将到来的风暴隔离开来。只有一个办法。如果我们的标准普尔 500 合约存在预先设定的价格波动限制，那么我们的市场在任何交易日的跌幅都会有限。假如股票市场真的崩溃了，期货市场价格将会在现货市场价格水平之上。这样，我们的市场就不会背负骂名。但是我最终没有做到，我只能竭力向它靠近。

苏珊·菲利普斯一直以来很欣赏我的见解，她此刻的反应也值得称赞。她咬了咬嘴唇，某种意义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利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考虑支持这样的要求。但既然是你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同意提议进行试验。但是，利奥，你知道，整个行业会因此而炸开了锅，他们会说这是血腥的谋杀。他们永远不会支持价格限制。你怎么应付这种局面？”

CFTC 在变更法规之前，首先会将有关材料交给市场中的一些机构用户进行评议。我知道，如果在评议期间 CFTC 收到大量反对进行设定每日价格波动限制试验的信件，CFTC 将很难不考虑这些反对意见。这是一场我们必须面对的战斗。我告诉菲利普斯，FIA 年会即将在博卡拉顿召开，我会趁这个机会抛出这个议题，试探一下大家的反应。

“苏珊，”我非常感谢她支持我的想法，“如果我在博卡失败了，那你就别左右为难了。”

针对期货合约的价格波动限制并不新鲜。所有的商品期货市场都存在价格波动限制。原因在于市场参与者只需要很小金额的保证金就可以建立一个市场头寸。然而，价格波动限制对农产品期货市场能起到作用，但涉及金融合约时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这些新的市场参与者并不习惯对价格变动进行人为限制。机构用户（尤其是股指期货合约市场的参与者）一致认为，价格波动限制对指数期货的成功是一个严重的阻碍，也违背了我们所公认的自由市场哲学。此外，我也意识到，与农产品不同，金融衍生品市场还要与没有价格波动限制的强大的现货市场竞争。事实上，我们成功地说服了所有的期货交易场所请求 CFTC 撤销对金融期货的价格波动限制。尽管标准普尔指数合约最初交易时设定了比较小的价格波动限制，不久限制就加大，直至最后完全取消。

而在 1987 年的 2 月，我却突然之间有了 180 度的大转弯。当然，我的动机是不希望让我们的市场陷入更为糟糕的境况，但是我无法明言。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股指期货衍生品市场的领导者，我不能随意公开谈及市场崩溃。我也清楚，我将无法得到来自交易所机构用户的支持。罗·马格里斯（所罗门兄弟国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

一，当时是 Merc 理事会的理事之一）是唯一的例外。他本人也认为应该实行价格波动限制，而他的理由跟我相同。

我把巴里·林德、布莱恩·莫尼森以及里克·基尔克林召集在一起协商。我向他们解释了我的担心以及我正在考虑的补救措施：“我们要通过限制市场在某一交易日的最大跌幅来避免金融期货承担骂名。”我们在一起仔细权衡了利弊。林德和莫尼森跟我的看法一样，认为市场崩溃即将到来，而价格波动限制将能发挥作用。“灾难毫无疑问即将到来。”莫尼森说。林德唯一的疑问是价格波动限制应该设定在什么样的水平，是否能够及时地实施。我们都认为，这个措施的缺点是期货在危机期间不能发挥作用，但是这样的代价却能换回它的生存。杰克·桑德纳不久也加入了我们，接受了我的观点，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向 Merc 理事会提出建议，要求为斯帕兹设定每日价格波动限制。由我担任委员会的主席，成员包括桑德纳、马格里斯、林德、莫尼森和罗森伯格。我们把每日价格波动限制定为 12 点，这个建议最终获得了 CME 理事会的通过。但是这场战争中难啃的硬骨头还在后面。

随后我打电话给 FIA 会长约翰·丹姆嘉德，在年会议程上预定了一个时段，讨论股指期货的价格波动限制。但是年会召开前我还有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我知道我的良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又被称做“自由市场先生”）一定听说了我的提议。很清楚，弗里德曼将会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市场变动的破坏。但是弗里德曼并不是期货交易所的领导者，如果我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他不必考虑什么政治后果。我战战兢兢地拨通了弗里德曼的电话，最后足足花了一个小时向他解释为什么我的想法是合理的。我主张的核心必须涉及经纪人接到的留存指令的数量，这些留存指令在市场异常波动的时候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价格偏离正常值即所谓标准差越远，市场中的留存指令就越少。换句话说，当价格剧烈波动时，市场中的在手指令将越来越少，难以吸收大量涌入的市价指令所带来的冲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理论上留存指令将消失，市场将像自由落体般下跌，而这正是我竭力想避免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完全说服了弗里德曼，但是我的确让他理解了，对我而言，我必须考虑一些超越纯粹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东西。

预先进行的努力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在 FIA 的年会上，当我抛出这个想法时，来自股票行业的代表集体向我发难，我丝毫没有还手之力。罗·马格里斯再次挺身而出，成为纽约代表团中唯一有勇气和远见支持我的想法的人。但是马格里斯的声音，甚至加上我和几个 Merc 交易商（他们也明白局势的危险）的声音，是远远不够的。我打电话给苏珊·菲利普斯，告诉她我失败了。她总算脱身了。1987 年大股灾后的数月，我经常反思，当初我差点就可以让我们的市场免受责难（要知道这种责难有的时候看起来就像要终结期货市场），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我们的市场成为了反对指数期货观点的牺牲品，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于两种期货市场的操作策略：指数套利和三重巫术效应。这两种操作彼此独立，但二者往往一

起成为反对者用以证明我们的市场充满罪恶的证据。针对这两种操作的攻击随股指期货的发展而日甚。道指的每次下跌都被归咎于指数套利。每一个所谓的三重巫术到期日都被认为是对市场的不必要的破坏。这些与期货相关的效应都被斥为造成了失控的波动，而那些自封的专家认为正是这种失控的波动吓走了小投资者。

如此这般的话大多是一派胡言。所谓的指数套利技术毫无神秘可言，它也不是什么新的恶魔。它和其他形式的套利在运用上没有任何不同。自从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市场交易相同或相似的产品，这种市场操作手法就已经出现。在股票指数套利中，某个机构会同时监控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合约（比如标准普尔 500 指数合约）。例如，如果期货合约和标的股票相比价格偏高，那么这个机构会建立期货合约的空头头寸，买入股票组合。当期货合约相对价格偏低时，可以进行相反的操作。只要二者之间的价格差异超过交易费用，那么这种套利就是有利可图的。

对于纽约的交易商或投机者而言，这种套利卖出（或者买入）看起来就像是价格变动的根本原因，但实际上，根本原因是投资者对市场的看法，正是投资者的看法对期货市场形成了卖出或买入的压力。

Merc 的肯尼斯 R. 科恩在他的反驳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把整体市场价格波动归咎于指数套利，就像是把大风雪归咎与扫雪机一样荒谬。扫雪机清除积雪，但是它们没有造成大风雪。套利交易商在一个市场买入，在另一个市场卖出，在交易所之间传递需求压力，但是从整体上看，他们并没有形成驱使股票价格变动的净压力。”正如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阐述的那样，期货市场对新信息的反应一般情况下比现货市场更快，而“套利行为确保现货市场的价格不会滞后”。

指数套利是恶意批评者的战斗口号，但他们的攻击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股票指数期货是新鲜事物，与人们所习惯的东西截然不同，而几乎每个人私底下都会怀念过去那些更为简单的日子。无论哪个地方，总会有人呼吁回到“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也就是没有股指期货，没有程序交易，也没有指数套利的日子。当然，每个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过去那些简单而美好的日子里，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平均日交易量仅为 1 150 万股，大额交易只占报告交易量的 15%（目前则占到了 50%），股票买卖仅仅基于单个股票的内在价值，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还没有引入基于指数的市场业绩比较而使事情变得复杂，资产配置几乎还不为人所知，固定佣金仍然是合法的，而市场的全球化还不过是未来派的概念。这些好日子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在我们如此依赖并且为争取外国资本而竞争很久以前，在我们关心别的股票市场在做什么而他们可以不用过多地关心我们在做什么很久以前，在杠杆收购、零息债券或者垃圾债券很久以前，以及分类股票很久以前。

反对者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群体：一个群体是的确没有理解指数期货的功能，对于未知事物感到恐惧；另一个群体则是别有用心了。后者主要是基金和货币管理公司（比如纽伯格和贝尔曼公司，在一群大声鼓噪的反对者中尤其突出），他们通过投

资于选择股票来管理数十亿美元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以及富人的投资。这些货币经理把股票指数投资的增长看做是一种竞争趋势，将会威胁他们制订的选股投资哲学。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趋势保持了强劲增长的势头。而我们的指数期货市场推出不久便很快成为了指数化交易的重要工具，从而助长了这种趋势。作为他们的敌人的朋友，我们也就成了他们的敌人。

1987年的股灾之后，SEC主席大卫·S·鲁德很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为了理解1987年10月的美国证券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必要理解过去10年机构交易策略发生的变化。在此期间，许多投资组合的规模日益增长，这使得投资组合经理在投资某单一公司股票时，很难避免过度影响该股票的价格。此外，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因此，许多投资组合经理开始把重点从单个股票选择转向整体市场交易。

或者就如SEC委员约瑟夫·格兰德费斯特所言：

政策争议的某些参与者完全有动机混淆视听，以便阻碍技术进步，因为这些技术进步会威胁传统的交易机制，从而影响某些市场参与者的实质利益。说得更坦率一点，今天所运行的系统会给某些人造成损失，那些设计用来使我们的市场更有效的措施（比如提高信息透明度、扩充能力以及提高流动性）并不一定符合他们的财务利益。

反期货运动的声浪日益高涨，我很清楚，这对于我们市场的持续生存能力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挑战。为了与之作斗争，我组织了指数交易协调委员会。除了CME的官员，这个委员会包括CBOE主席阿尔杰·查普曼公爵，CBOE总裁查克·亨利以及CBOE执行副总裁阿恩·罗德；来自CME的有来自瑞富集团的汤姆·迪特莫，所罗门国际的罗·马格里斯，第一期权的吉姆·波特以及高盛的加里·西佛斯。我们的行动包括召集纽约地区的部分机构团体召开特别会议。这个群体已经在广泛地使用我们的指数市场，并且获得了利润，但是并没有出来为我们的市场辩护。他们要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要么需要推动。我希望获得他们强劲有力的支持，激发他们的声音，利用他们的公众反应来修复我们被破坏的形象。

会议在1986年9月30日召开，地点是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办公室。会议召集了纽约地区最有名望的一些机构团体、所有指数交易的支持者以及我们交易所的有名望的会员。总共有27位官员到场，分别代表美国证券交易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纽约股票交易所、贝尔斯登公司、德莱克塞尔·本汉姆·兰伯特公司、第一波士顿公司、高盛公司、基德·皮波迪公司、美林资本市场公司、摩

根士丹利公司、佩恩韦伯公司以及所罗门兄弟公司。值得称赞并且让我深深感激的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现任主席理查德·格拉索也出现在了会场，完全支持开会的目的。他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演讲为期货设定了一个正面的基调，并且证实，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在共同为美国投资者提供经济利益。

我的演讲持续了大约 30 分钟，列举了媒体上报道的一些关于我们市场的争论，描述了一下指数期货所面临的困境。随后是比尔·布罗斯基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意见，他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随后其他人依次发表了意见，提供了一些建议。每个人都似乎已经准备好了担负起各自的职责，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有理由进行一场反击。当我总结陈词时，我的激情感染了房间里的人们：“你们的声音，你们的专业意见，你们有关指数期货的知识必须让人们听见。你们代表了我們信任度的主要来源。”

第二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三重巫术日效应”，媒体把它描述成指数期货和期权给人类带来的瘟疫。三重巫术日效应一年出现四次，也就是每个季度的第三个星期五。在那天，股指期货、指数期货期权、股票相关的期权以及指数期权同时到期。由于期货和期权市场上一些复杂操作策略之间的反向操作，当天市场一般都会产生异常波动。这样，它就成了无休止的批评的焦点。

SEC 主席约翰·夏德在其任期行将结束之时，开始和他的委员们寻找解决三重巫术日效应的途径。我非常欢迎夏德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因为我本人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夏德把市场比作一个巨大的活动装置，当交易商拉动其中一个部分时，其他部分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几乎同时做出调整。夏德的观点很明确，市场将对任何异动迅速做出调整，因此他反对监管机构破坏这种调整机制。但是他的观点属于少数。

除了那些支持彻底抛弃指数期货的人之外，还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对这种到期日现象基本上无能为力，因此建议保留目前的“星期五闭盘”的方法。第二种观点支持在结算前的第三个星期四停止交易，结算改在到期后的第二天早晨进行。

而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专家都积极支持第二种观点，这个事实自然让我怀疑第二种观点。事实上，芝加哥的大多数专家都支持保留目前的处理方式，认为变化会对 CME 不利。我意识到这个争论可能变得失去控制，于是我再次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我需要的是一个专家团体，来帮助我制定 Merc 的最终决策。委员会由一些精英组成。人员除了来自 Merc 理事会之外，我还选择了一些观点坦诚并且彼此观点相异的人士。我特别需要那些说话具有权威性的人，乔·里特奇就是这种类型的家伙。作为当时美国最大和最成功的期权交易企业——芝加哥研究和交易公司（CRT）的首席执行官，他的观点非常明确坚定，“利奥，”他告诉我，毫不掩饰他的感觉，“如果变为星期五结算，芝加哥的血将会向东流。”

鲍博·泽尔纳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他非常博学并且富有见地，是我信任的人之一。我知道他在参加讨论之前不会有先入为主的观点，他会提供一个综合各方的、深思熟虑的观点。来自 Merc 的人员包括：CME 总裁比尔·布罗斯基；Merc 执行副总裁麦克·阿帕托夫；我们的研发总监，非常富有见地的伽林·伯格哈特；CME 首席经济学家里克·基尔克林；我们的特别项目副总裁艾利桑·波斯纳；我们的总法律顾问杰罗德·萨尔兹曼。除了前面提及的这些人之外，我还需要一个来自学术界的专家，他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中立的、深入研究的分析。出于这个目的，我找到了汉斯 R. 斯托尔，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经济学家，也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教授。斯托尔教授已经撰写了一些文章，对三重巫术日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学术界和业界都被广为尊重。

1986 年 10 月 29 日（正好是大股灾的前一周），委员会的决定性会议在西尔斯大厦的大都会俱乐部召开。我做了开场白。我在开场白中强调，尽管三重巫术日一年只有四次，但它是“我们最为头疼的问题，经常被反对者和媒体利用，一年到头攻击期货”。

斯托尔教授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分析，使得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期日所发生的情况。随后我们进行了长达数个小时的广泛讨论，问题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最后讨论产生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委员会的大多数（其中包括 CRT 的乔·里特奇）都做出了跟我一样的结论：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于是我们开始进行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这次变化被视为两个市场之间合作的一个标志。我们建议修改我们的结算程序。1987 年 6 月获得联邦监管机构批准后，Merc 和 NYSE 开始共同实施这次变化，对部分到期合约（到期日为合约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五）修改结算方式。结算价格根据第二天早晨 NYSE 的特别开盘价确定。这个修改基本上可以给 NYSE 的专家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解决巨大的买卖盘差额，充分减少由到期合约引起的波动。自那以后，几乎所有的全球性交易所对于那些与股票指数相关的产品的结算，都采用了这种美国式的程序。

尽管做了这些努力，但我不会天真地认为，那些关于我们市场的经济价值的争论就会休止。我非常清楚，一旦我们那些试图让我们的市场在股灾中保持安全的努力失败，我们很可能成为责难的对象。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的市场完全恢复了清白，并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是整个过程却花了大约两年时间，其间包括数以吨计的研究材料，无数次的讨论和计划，国会委员会的无休止的调查，媒体难以计数的采访，大量的报告，会议和讨论上花费的难以估计的时间以及与监管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无数次会谈和电话交谈。两年当中，所有人都在猜，这一切该怎样收尾。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30 章

黑色星期一

10 月 19 日，星期一，那是一个美好的秋日。我不记得我当时驾车行驶在伊顿高速路上时开得有多快，但是我看见树木已经披上了秋天的颜色。那天似乎每件事情都在飞驰：我的思绪，我的心情，还有市场。

早晨快到六点半时，我的车载电话响了。电话的另一端是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约翰·菲伦，我知道他打电话来不是为了聊天。

“利奥，你听到消息了吗？看来今天是个非常糟糕的日子。”他非常烦恼。

我谢谢他给我打电话，我们聊了一会，并且约定保持密切联系。

菲伦带给我的消息是我曾经预料到的。他告诉我，有大量卖单聚集在 NYSE，准备打压市场。我们的交谈发生在 NYSE 开盘前的两个多小时。一般情况下，NYSE 不会那么早就看到委托单的流入情况。我意识到今天将是一个充满风暴的日子，市场将会延续上周五的走势（当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108 点），进一步走向深渊边缘。

我永远没有否认过，我成长的世界是一个动荡的世界，现在我仍然如此认为。既

然市场反映了这个经济无序的世界，那么他们出现动荡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在1987年的下跌（黑色星期一）中，美国的金融界显然没有准备好应付这次历史上最惨烈的股市崩溃。

我把关于这次股市崩溃的分析留给经济学家，他们似乎总是能在崩溃后的市场遗留物中找到某些引发崩溃的线索。似乎有一大堆原因导致市场从强劲的牛市变成脆弱的熊市。关于这次崩溃的理论就跟理论家一样多。在比较有名的理论中，有一个理论认为，崩溃是所谓的资产组合保险（一种与期货相关的避险策略，由两位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海恩·勒朗德和马克·鲁宾斯坦始创，并由他们的LOR（勒朗德、奥布赖恩、鲁宾斯坦）投资公司推广）造成。一些专家在媒体上抛出了另一个理论，认为崩溃是由“自动执行的计算机程序交易”造成。但是两个理论后来都被否定了。还有人指责NYSE的专家系统，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陈旧的系统，并不足以处理全球市场中大量突发性卖单的冲击。另一方面，财政部长吉姆·贝克指责德国提高利率以及民主党提出增税议案。民主党则指责总统反对增税以及没有控制联邦支出。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加剧了崩溃，上面这些原因都没有形成产生恐慌的首要条件。一句话就足够了：股票市场的螺旋式上升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远上升。因此，美国是一个虚假的亿万富翁；市场已经定价过高，严重超买以及兴奋过度。而崩溃充当了一个残酷的提醒者：市场的退潮和涨潮一样容易，顷刻之间就会让你的口袋空空如也。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崩溃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大多数信息充分的观察家都承认，崩溃的成因能够在那个时间段的经济环境中找到。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时说，1987年股灾“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件”。当然，不止一个人预料到股灾的到来。

“你认为它会有多糟糕？”里根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问。当时是股灾的一周左右，费尔德斯坦来我的办公室聊天。他也担心市场状况，并且同意我的判断，即我们也许处在一个糟糕的时期。“我不能确定，”我回答说，“但是我会买一些保险。”费尔德斯坦笑了，“噢，我已经买了。我在CBOE买了OEX认沽期权。”这是一个很明智的举动。

另一个预料到股灾将临的人是贝里尔·斯普林克尔，他长期执教于芝加哥经济学系，曾经是国际货币市场的创始理事之一。1987年，斯普林克尔时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政府高官中难得的几个理解造成金融市场涨跌的供需原理的人之一。他看到的一切让他非常焦虑。在斯普林克尔的眼中，美国的货币政策无疑太过于紧缩。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变，美国的金融市场可能会崩溃。

斯普林克尔意识到紧缩并不是格林斯潘（新任命的联储主席）的政策，而是财政部长吉姆·贝克的政策。斯普林克尔尊重格林斯潘，知道他的经济学修养是值得信赖的。而另一方面，吉姆·贝克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经济教育。贝克是一个聪

明的家伙，曾经是白宫办公厅主任，但是当总统同意政府高官的抢座位游戏时，麻烦出现了，吉姆·贝克成了财政部长。他在巴黎与德国做了一笔交易，就是所谓的卢浮宫协议，以保卫美元，阻止其下跌。

斯普林克尔知道协议存在致命的缺陷，将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危险。他不是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我颇为尊敬的朋友、影子开放市场委员会主席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艾伦·梅尔泽公开宣称，美国财政部要“停止试图把美元汇率维持在目标水平的努力”，允许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努力是根本没有作用的。在今天的全球市场，每天的资本流量数以万亿美元计，试图管理美国货币的价值是荒谬的。而那正是贝克所做的，为了影响美元价值，他强迫联储主席紧缩货币政策。

这样的举动并不新鲜或者唯一。事实上，总有一些官僚梦想返回到美元汇率固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他们醉心于决定德国马克和日元对美元汇率时的那种权力感。大约一年前，由于美元持续疲软，这个想法开始有了市场。甚至一些华盛顿的重量级人物也加入了这场运动，支持恢复对币值的积极管理。贝里尔·斯普林克尔当时打电话给我，以确定我并没有忽视这种现象的发展。

“利奥，事情有些失控，没有人知道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最好召集一些人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以防患于未然。”

他的电话就像我的出发令，我立即打电话给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也认为这场试图回到固定汇率时代的运动是危险的，并且建议我带头来阻止这种趋势。于是我首先组织了美国弹性汇率联盟（ACFX），联盟由100多位全美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组成，领头人物则是来自华盛顿的律师查尔斯（齐普）·西格。他们非常乐意参与我们的努力，共同公开宣布反对任何形式的固定汇率体制。在我题为“回到固定汇率体制是愚蠢的”（发表在1986年1月份的《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一文中，我用了很多笔墨来说明，这场运动根本就是愚蠢的，市场力量将让试图决定美元实际价值的G-5或其他任何人为系统的操纵变得无效。

米尔顿·弗里德曼也鼓励我担任论文集《弹性汇率体制的优点》（10月大股灾后由乔治·梅森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主编。齐普·西格对于材料的汇总和全书的整理再次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本论文集由弗里德曼做序，收纳了著名学者哈里·约翰逊、弗里茨·马克鲁普、哥特弗莱德·哈伯勒以及弗里德曼撰写的几篇有关弹性汇率的经典文献。它也提供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亨利·华立奇以及主席格林斯潘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雅克·德·拉罗西埃的观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贝里尔·斯普林克尔和委员迈克尔·穆萨的观点。它向读者奉献了这个时代诸多顶尖学者的重要思想，其中包括马丁·费尔德斯坦、鲁迪格·唐布什以及我的好朋友——芝加哥大学教授雅各布·弗兰克尔（即将担任以色列银行总裁）。

这本论文集也第一次出版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给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秘密备忘录，备忘录为尼克松提供了一个大胆的方案来解决约翰逊总统在任时形成的

财政赤字问题。尼克松政府花了三年时间来执行弗里德曼的方案，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随着 1987 年 10 月的临近，贝里尔·斯普林克尔也日益感到受挫。在与总统及相关政府官员的第一次会谈中，他提醒人们注意卢浮宫协议产生的负面影响，但这并没有让美国政府改变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他看来，时间正在逐渐消失。而尤其让他担心的是，不久他就要卸任 CEA 主席一职。妻子病重迫使他向总统提交了辞呈。起初里根总统拒绝了他的辞呈，但贝里尔坚持说，他本人已经忠诚地为国家服务了多年，而现在他必须要卸下这份重担。里根总统最终勉强接受了他的辞呈，并向媒体公布了他的离任，但是具体离任日期未定。

于是斯普林克尔拜访了里根总统的新任办公厅主任霍华德·贝克，告诉他必须立即举行第二次会谈，“必须让总统清楚目前局势的危急。”

霍华德·贝克，这位来自田纳西州的前美国参议员，是一位非常聪明的政治家，对华盛顿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并不是经济方面的专家，但他知道总统欣赏斯普林克尔，于是进行了安排。会议安排在 1987 年 10 月 16 日（股灾前的星期五）举行，地点是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当里根总统到场时，美国金融系统所有政府高官都已经在场，他们包括：财政部长吉姆·贝克，联储主席格林斯潘，CEA 主席贝里尔·斯普林克尔，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华德·贝克以及办公室副主任。

根据斯普林克尔的要求，霍华德·贝克安排了发言顺序。“总统先生，”贝克说，“根据斯普林克尔博士的要求，我们今天再次召集会议来讨论美国金融市场的形势。”随后他要求吉姆·贝克提出他的看法。贝克向总统保证，美国金融市场是平稳的，没有什么需要关注的地方。而他一手炮制的卢浮宫协议正在发挥作用。“美元已经稳住了，”他说，美国股票市场近期的下跌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贝克随后转向了联储主席，问他，“艾伦，你同意这个看法吗？”当时，格林斯潘还只是这幢大厦的新人，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这么早与财政部长在官方关系上公开斗争，于是发表了一些“联储讲话”，这是所有央行行长通用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语言，后来格林斯潘在他联储主席任上把这种语言发挥到了极致。

斯普林克尔相当失望。他原本希望跟他具有相同经济学和哲学信仰的格林斯潘能给予支持。当霍华德·贝克问斯普林克尔是否同意贝克的看法时，他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总统先生，不，我不同意。”斯普林克尔事后推测说，当时之所以这么大声，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因为他不久就要离开华盛顿的政治圈子。“我们本不该签订巴黎协议。由于这个协议，财政部强迫联储推行紧缩货币政策，这已经把金融市场推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可能会造成市场暴跌。”

会议又持续了一会儿，但是没有做出什么决定。总统将经过深思熟虑后再做出决定。格林斯潘按照预定计划去得克萨斯为美国银行家协会做一个演讲。其他人也准

备去度周末。总之已经太迟了，地狱之门就要打开。接下来的一周将会以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揭开帷幕。

在10月份那个宿命的早晨，早在约翰·菲伦给我打电话之前，我就知道，今天将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日子，因为海外市场发生的一切已经预示了某些事情。我关注着世界上其他地区市场的有关情况，而新闻是让人沮丧的。那天早晨，东京的日经225指数（类似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2.5%。香港证券交易所弥漫着恐慌的气氛，开盘40分钟，恒生指数就下跌了133点。伦敦（比芝加哥早6个小时）的金融时报指数到正午时已经跌去了10%。清晨5点，我被广播吵醒，电台里交易商根据伦敦市场的种种迹象估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NYSE开盘时会下跌200点，这个预期是空前的。而那些拥有海外分支机构的大型美国经纪商很清楚，外国投资者更多的抛售很快就要涌向美国的现货和期货市场，更别提已经超买的美国养老基金及机构。但人们很快发现，事情远比预计的残酷。

一到达Merc，没有片刻犹豫，我立即安排了上午10:30召开CME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实际上，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晚上6:30。随后我打电话给Merc主席杰克·桑德纳，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在上午9点以后到达办公室。他还没有听到有关的新闻。

开盘前，我走进了交易大厅，了解一下市场的情况，慰问一下这群经纪人，他们已经非常勇敢地准备好了对付即将如潮水般涌入的卖单。他们都聚集在我的周围，眼中充满忧虑。没有人能够确定市场开盘时会跌去多少，但是事情看起来非常糟糕。我们不得不一直等，看多头在什么价位上愿意买入。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惊慌的时刻。经纪人要为他们成交单上列出的价格负责。在这样充满压力的市场环境中，如果他们错过了一张委托单，错误成交，卖出变成买入，错填了价格，或者做错了别的什么事情，他们必须为之负责。在那天，错误意味着数千甚至数十万美元的损失。一些经纪人和交易商选择了逃离，大多数标准普尔指数的交易商像勇敢的战士准备战斗一样，选择了留下。我还记得我与约翰·欧伯曼（一位老资格的标准普尔产品的经纪人，也是一位敢于面对战斗的家伙）之间的一段短暂交谈。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利奥？”他问，似乎认准了我有神奇的解决方案。而我清楚，灾难已经来临。

“全力以赴。”我平静地回答，我们目光进行了短暂交流，似乎对困难的局势有了共同的理解。

不出所料，开盘前很久，卖单就同时在股票和期货市场大量堆积。在NYSE，巨大的买卖盘差额淹没了专家，也就是那些针对来自公众和其他经纪商/交易商委托单用自己库存来买卖股票的交易商。专家拥有某些股票的专营权，作为垄断的代价，它有义务维持一个公正和有序的市场。但是星期一早晨的市场毫无秩序。事实上，市场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噢，NYSE开盘了，好，开盘铃声响过，灯亮起来，但是市

场根本就没有什么价格。卖单如此之多，以致专家要么无法做市，要么不愿意做市。对于 NYSE 的大多数股票，根本就没有价格。那些报出的价格经常都是几个小时前的成交价格。而当天用来计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的价格是采用了自上周五收盘以来的最后报价，这样，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价格并没有反映现货市场的实际价格。

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的一个很大的差异是，我们的市场总是按照预定时间开盘，并且从开盘铃声响过后会一直提供价格。我们的做市商不能垄断市场，他们必须与交易大厅中的每一个人竞争。市场开盘时，买单和卖单找到对方，于是价格就确定了。不幸的是，如果卖单超过买单，那么价格就会下跌——而这正是那天早晨所发生的事情。

标准普尔期货市场在中部标准时间上午 8:30 开盘，多头和空头的价格同时确定。价格并不妙，起初我甚至难以相信。跌了多少？我的上帝，怎么可能？斯帕兹（12 月份）期货合约开盘价格为 261.50，比上周五收盘时的价格跌了 20.75 点。用 Merc 的术语来说，市场下跌超过了 2 000 点。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形。我的反应不仅仅是震惊，而是一种真正的恐惧。

当天的其余时间，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真实的。人就像陷入了噩梦之中，事件之间似乎都被分割开来，除了当这些场景一一展开时，你可以找到彼此之间的可怕联系。执行委员会第一次紧急会议在星期一上午 10:30 召开。会议室变成了 26 人（包括工作人员）的作战室，大家围坐着一张巨大的会议桌。首先从前座开始发言。我首先向大家通报了与约翰·菲伦以及其他行业官员就如何应对当前市场形势进行的交流。比尔·布罗斯基汇报了他与行业官员进行的交谈。接下来是由工作人员就一些具体事务所做的普通工作进度汇报，比如保证金、交易量等事务，还汇报了一件事情，由于异常的市场状况，Merc 对 13 个清算会员收取了特别日内结算保证金，总额是 2.9 亿美元。

Merc 的管理信息系统总监唐·舍皮科汇报说，由于交易量巨大，“紧急状态清算程序已经启用，将针对标准普尔 500 指数和欧洲美元的期货和期权合约开设一个特别的交易外时段，时间安排在当晚的 11:30。会议同意继续与 CBOT 和 CBOE 的管理层保持坦诚的对话；布罗斯基也将与 AMEX 保持联系。虽然我们听了每一份报告，但是每个人的神情似乎都有些恍惚，眼睛都盯着头上的屏幕，这些屏幕环绕在 CME 会议室的红木会议桌周围。屏幕调到了 Merc 的内部报价系统，提供了楼下的前线所形成的实时价格。上午 11:05，我中止了会议，两个小时后又重新召集开会。

市场已经中断了联系，但 Merc、NYSE 和华盛顿之间的电话线却没有断过，我们一直在交流各自市场的信息。接下来的 4 个小时，我们努力组织市场力量进行抗争：更多有关与政府和交易所官员交谈的汇报，更多的结算变动保证金要求以及更多的来自清算会员和场内自营商的报告。

每次休会其间，我总会冲到标准普尔指数产品的交易大厅内，与那些正在疯狂进行交易的交易商和经纪商沟通。每次来到大厅，我都会立即被蜂拥而来的会员包围，恳求我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且试图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事情到底有多糟糕。他们都很沮丧，但是就如陷入飓风中的航船的船长，我深知必须要消除人们的恐慌。于是，我会微笑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并不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华盛顿的高官们正在与里根总统进行再次会谈，但这次却是紧急会议。此时，市场处于自由落体般的下跌，警报声在全世界响起。从远东的东京市场开始的暴跌已经像病毒性疾病一样传到了伦敦，现在已经侵入了纽约和芝加哥。讨论集中在金融市场是否应该被关闭的问题上。财政部副部长理查德·达尔曼做了支持关闭的发言。

贝里尔·斯普林克尔气炸了：“总统先生，那样做简直是疯了。如果你关闭市场，你将丧失理解市场向我们传递信息的能力。市场必须保持开放。”

尽管已经取消了演讲，但是格林斯潘还没有从得克萨斯赶回来，他通过电话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表示非常同意斯普林克尔的看法。紧急会议结束时达成了两个决定：一是市场继续开放，二是增加金融系统货币供应量。贝里尔·斯普林克尔负责处理芝加哥市场的有关事务，霍华德·贝克则同意负责纽约市场。斯普林克尔说，格林斯潘关键时刻非常清醒，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由于资金缺乏而导致金融连锁反应。”联储主席告诉每个人。随后格林斯潘动用了联邦储备的巨大力量，并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杰拉尔德·科里甘合作，将流动性注入美国金融系统。

这段历史还有一个脚注。就在本周行将结束时，霍华德·贝克造访了斯普林克尔。“贝里尔，总统告诉我，他改变主意了，他不能接受你的辞呈。总统要我告诉你，如果你留任，CEA 的主席职位将提高到内阁级别。”

显然，这是对斯普林克尔关于市场的看法投下的一张很有分量的信任票。在贝里尔·斯普林克尔打定主意前，财政部长吉姆·贝克打电话给他了，“贝里尔，你必须留下来。如果你走了，总统会很不高兴。”

电话非常诚恳，并无任何做作或者勉强。这让人无法拒绝。贝里尔·斯普林克尔于是留了下来，一直到里根任期结束。

到下午 1:15 执行委员会再次召集开会时，1987 年 12 月份的标准普尔指数合约已经跌去了 5125 点。我再次通报了我和贝里尔·斯普林克尔、约翰·菲伦、汤姆·多诺万、卡洛·海纳曼（7 月份苏珊·菲利普斯离任后被任命为 CFTC 代理主席，而苏珊·菲利普斯则等待赴任联储理事）以及其他许多政府官员和行业官员的交谈情况。杰克·桑德纳和比尔·布罗斯基也进行了汇报：当天的晚些时候将再次追加日内结算保证金，预计总金额将达到 6.7 亿美元……交易提交清算所进行第一次对账的截止时间后延……经纪商交易清算报告将在早晨 6 点准备好，等等。会议在下午

1:40 休会，下午2:30 继续进行。

当我们从会议室鱼贯而出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船长，而船正在十级大风中航行。我们的船能够渡过危险吗？幸运的是，从运营的角度看，Merc 挺住了（第二天早晨可以看出这一点），而这一切大部分应归功于 CME 清算所总监以及运营总监玛丽·墨菲的鼎力相助。CFTC 将会在崩盘后的报告中做出结论，“CME 及其会员使用的指令传送、成交以及清算程序在股市崩盘期间运行良好……”

整整一天，我心中始终充满担忧，既有近忧，也有远虑：近忧是用来结清多头双方收支的庞大的追加结算保证金，而远虑则是灾难后将要面临的责难。因为 Merc 是美国最早开盘的市场，这样我们就有责任将坏消息迅速地传递给美国投资者。而传递坏消息的信使，很可能成为千夫所指。事实证明，我没有说错。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传统市场技术水平相当落后，如果把它们的技术比做汽船，那么那些进行市场决策的人使用的则是喷气式飞机。金融的决策权大幅压缩：大量的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然，大量资本的结合也给散户提供了随之获利的机会。不幸的是，传统的市场机制尤其是股票市场的机制，由于设计上的先天不足，难以承受大量和突发性的资金流动。

时间也是一个因素。欧洲、北美和远东已经成为了一个横跨所有时区的连续市场，能够同时对信息做出反应。原来市场是一条条河流，现在却汇成了海洋。我们已经进行了所有的市场变革，我们抛弃了陈旧的技术、陈旧的市场观念、陈旧的时空概念。当我们顷刻间抛弃了所有这一切时，市场变成了一头口吐白沫的怪兽，将一切挡住去路的东西踩个粉碎，直到它的狂暴结束。

在那个 10 月的早晨，汹涌而来的委托单让 NYSE 的专家系统崩溃了，最终也导致了指定委托单处理系统（DOT）的崩溃。由于 NYSE 的很多领头羊股票都没有开盘，这意味着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精确地计算出道琼斯指数或者标准普尔指数（Merc 期货合约的标的指数）。也就意味着，Merc 的标准普尔指数合约、CBOT 的主要市场指数（MMI）合约、NYSE 的 NYFE 合约或者堪萨斯城交易所的价值线指数合约，以及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和其他交易所的期权合约都脱离了 NYSE 和 AMEX 的现货市场。卖者过多而买者不足，这就给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造成了巨大的下行压力。由于我们存在一个市场，所以期货市场在风暴中首当其冲，卖单会率先涌入期货市场。比较起来，期货市场技术更为先进，能够顺利地将委托单传递给交易大厅内的经纪人。当期货价格明显低于现货价格时，投资者会从卖出期货转为卖出股票。但是让投资者惊慌失措的是，证券公司的客户服务人员不会或者不能接听他们的电话。

1987 年 10 月 19 日，股票和指数期货市场都创造了历史最高单日下跌纪录。道琼斯指数暴跌 508 点，跌幅达到 22.6%。这几乎是 1929 年 10 月 26 日创造的上一个跌幅纪录 12.8% 的两倍，几乎等于 1929 年 10 月 28 日和 29 日两天的下跌点数（24.5% 的跌幅）。在总数达到创纪录的 6.08 亿股的委托单中，超过 5 000 亿美元

（大致相当于法国的全部 GNP）的账面财富消失无踪。在芝加哥，衍生品市场也经历了直线下挫。Merc 的标准普尔 500 指数期货合约跌了 80.75 点，跌幅达到 28.6%。CBOT 的 MMI 指数（由 20 只股票组成，其中 17 只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成分股）期货跌幅达到 24.38%。针对散户的最为流行的指数期权——CBOE 的标准普尔 100 指数（OEX）合约，标的指数的价值下跌了 21%。

股市崩盘完全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尽管在主要市场中，美国的单日下跌幅度最大，但日本也达到了将近 15%；英国当日为 11%，第二天为 12%；悉尼几乎达到了 25%，新加坡日经指数期货合约由于缺乏流动，经历了一个似乎看不到底部的疯狂下跌。在香港，下跌导致了比其他任何市场更多的显著后果。10 月 19 日，恒生指数狂泄 420 点（跌幅达到 11.3%），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单日下跌点数，许多投资者无法追加保证金。形势继续恶化以及大量违约的可能导致香港证券交易所在本周的其余时间一直处于关闭状态。香港证券交易所停市后第二天，期货市场也随之关闭。关闭交易所被证明是一个大败笔。当香港证券交易所在第二周的星期一（10 月 26 日）恢复开盘时，市场再次暴跌 33%。后来，政府援救计划花费了 40 亿港元来复兴香港金融市场。

但是，数字永远不能传递隐藏在数字背后的情感。整整一天，大脑和机器都在与一个计算机程序无法处理的东西战斗：恐惧。我们全线撤退，交易策略将股票、期权、期货紧紧地连接一起，都要应付市场的颠覆。最终，市场一如既往地战胜了恐惧。

当星期一的收盘铃声在中部标准时间下午 3:15 响起时，我心中在默默祈祷。我不知道我们的市场是否已经渡过了这场劫难，但是至少当天市场已经不会再下跌。痛苦可以暂停片刻。当我从阳台往下看标准普尔合约的交易大厅时，我看到了一幅让人刺眼的众生图，潮水般涌动的交易商和他们的办事员处于一片混乱状态，看着令人恐怖的未配对的委托单，他们不知所措，坐立不安。在这个扭曲和裂成碎片的市場中所进行的神经战，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只能茫然地围着交易大厅团团转。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10 月 19 日的一次晚餐会议，参加的人员包括我自己、桑德纳、布罗斯基、里克·基尔克林、肯·科恩以及路透控股集团的一些管理人员——安德烈·维勒纽夫、约翰·赫尔，会议的主题是讨论 GLOBEX（我们的合资电子交易系统）的项目启动。晚宴设在西尔斯大厦大都会俱乐部，10 点钟开始，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心情来讨论如何制订一个计划以通过 Merc—路透计算机系统实现 24 小时全球期货交易。我们的心思在别的地方。

接近午夜时，尽管已经非常疲惫，但是紧张不安还是驱使我们这群 Merc 官员返回了 CME 大厦，来看看它是否还在战斗。我的秘书和得力助手帕特·雷菲尔满眼血丝，还在我 19 楼的办公室值班。她递给我一份来电记录，上面包括：联储出席格林斯潘、CEA 主席贝里尔·斯普林克尔、参议员唐·里格尔（银行委员会中的民主党

人，代表委员会主席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来电)；CFTC 的卡洛·海纳曼。这些来自政府最高级别官员的电话无疑也证明了 Merc 在美国的金融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这种证明的方式并不是我所喜欢的。

我用汗津津的手首先给格林斯潘回电。自从 1976 年他支持我引入国债期货以来，我们已经相交多年。他知道我非常赏识他，在他尚未担任联储主席时，我曾经邀请他担任 Merc 的理事。很可惜，他有更大的抱负。但是在股灾期间或者其他不止一次的场合，我都会暗暗感谢上帝，好在格林斯潘今天是联储主席而不是 CME 的理事。格林斯潘的声音是平静的，似乎在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然，这是他的一贯风格。然而他的第一个问题还是暴露出了局势的危险。

“明天早晨你们会开盘吗？”他问，我们两个都明白，这是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只要 Merc 的交易清算完毕，只要所有的市场头寸按照前一交易日的收盘结算价格结清，只要买卖双方都能获得支付，那么 Merc 将会在第二天早晨准时开盘。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糟糕的“只要”。不像证券行业可以有 5 个工作日内清算一笔交易，期货行业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系统。在下一个工作日开始交易前，所有的账户都必须采用现金结算——亏损的一方必须支付给盈利的一方。我们清算所总监约翰·戴维森告诉我，10 月 19 日的结算总量创下了一个惊人的纪录，达到了 25.3 亿美元，而正常交易日大约是 1.2 亿美元。换句话说，由于股灾，多头欠下空头约 25 亿美元。“我的上帝！”我心想，不觉有些发抖，“这个金额超过了一些国家的 GNP。”就在戴维森说出这个金额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非常时刻。从来没有人设想过会出现这么一天。

但是当交易奇迹般地清算完毕时，我和戴维森都无法确保多头的资金能够到位或者及时到位，以便第二天开盘。如果资金不能到位，空头没有获得支付，那么 Merc 将不能开盘。如果第二天不开盘，不仅会引起包括彼此联系的现货、期权和期货市场在内的美国金融系统的瘫痪，而且整个世界都会怀疑，是不是美国金融系统某个机构破产了？也许是某个大型机构破产了。我并不是指本地交易商（也有一些），我是指上百个大型机构中的任何一个，也许超过一个。未知比已知更让人恐惧。这可能会导致金融的连锁反应，机构投资者将会犹豫是否给其他投资者支付，因为它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支付。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恐慌，并在散户间蔓延开来。恐慌还会导致银行挤兑，这正是 1929 年所发生的。

现在，这位美国银行家的领军人物——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正在问我，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他知道我完全明白局势的严峻，他也知道我正处于风暴的中心。

“主席先生，”我用嘶哑的声音回答，又感到了一些紧张，“我认为我们没有问题，但是说实话，现在说这话太早。”

“我明白……你们的交易在清算了吗？”

“正在清算。”

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他向我保证，联储将尽一切努力来维持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保持流动性是拯救金融系统的主要手段之一。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到了早晨，有关主要市场自营商巨额损失的传言满天飞，即使是那些信誉良好的客户，银行也不太愿意提供信贷。混乱正在沉重地打击金融系统。这可能是联储介入的最佳时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杰拉尔德·科里甘命令各银行积极使用格林斯潘提供的流动性。如果不是科里甘坚持不懈地直接警告各银行不要收回信贷，我们很可能就会看到金融连锁反应的到来，危机可能就会以灾难结束。

交谈快结束时，联储主席问我，我是否能想到一些别的他应该做的事情。我真的是受宠若惊，有些不知所措。整个西方世界第二有权势的人正在问我是否还能想到别的事情。后来，我想起我们在会议室曾经谈的事情。我问：“艾伦，你可以让联邦储备支付系统通宵开通吗？”

联邦储备支付系统是特别联邦储备担保的银行通讯系统，用来保证银行间的资金流动。正常情况下，联邦储备支付系统随营业时间的结束而关闭。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晚上，如果我们有可能获得 25 亿美元，那么我们需要一整晚来进行处理。

“好主意。”联储主席回答，并且告诉我，只要我需要，他的电话线也对我通宵开通。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左右，我试图回余下的电话。尽管早已经过了午夜，但是大部分电话我都回了。贝里尔·斯普林克尔向我简单介绍了华盛顿官员正在如何处理危机，我们还花了很长时间讨论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试图鼓励对方。剩下的时间，我走出办公室，到了 Merc 清算所，约翰·戴维森、巴里·林德、比尔·布罗斯基、杰克·桑德纳和清算所职员都在那。经历了漫长而又痛苦的白天，清算员还不得不把紧张带入晚上。我还记得那天深夜和巴里·林德的一次私人交谈。林德是清算所委员会的主席，我试图从他的专业知识上寻找到一些安慰。“你认为怎么样，巴里，我们能成功吗？”当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问他，并且盯着他的眼睛，试图从中找到答案。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低声说：“我不知道，利奥，但是如果我们明天早晨不开盘，我们会失去所有的赌注！”

华尔街主要的投资银行家那天成了主角之一。一方面，Merc 欠高盛 6.7 亿美元，欠基德·皮波迪公司 9.17 亿美元；另一方面，摩根士丹利欠 Merc 10 亿美元。这让我们在清算过程中非常担忧。不是摩根士丹利不能支付这笔钱，问题是它能在第二天早晨 7:20 以前支付吗？这么大的一个数字，结算银行会非常谨慎，并且会明显减缓信贷审批过程。芝加哥的银行（比如大陆伊利诺伊银行）会等到核实资金已经从相关纽约银行到达芝加哥后，才愿意完成会员企业的交易。

大约凌晨 3 点，戴维森告诉我，他怀疑大陆银行的支付可能会有所延迟，因为摩根士丹利资金的进账比较慢。这让我吓得半死。我告诉杰克·桑德纳，在我打电话给格林斯潘告诉他我们的担心之前，最好有人先给摩根士丹利总裁理查德 B. 费舍尔

打个电话。我们分配了一下任务。杰克给费舍尔打电话，而我负责格林斯潘。但是杰克有些犹豫，深更半夜给一个没有听过他名字的人打电话，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我答应坐在他旁边，听他们交谈。我们打了电话。如果此刻不是这么严肃，这件事情将是非常有趣的。我对着杰克·桑德纳的耳朵低声说，而戴维森和其他人站在我们后面，在这样的深夜，杰克用电话吵醒了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投资银行的总裁，并且告诉他，他欠了我们10亿美元。我不知道当时费舍尔有什么样的想法。

后来，里克·基尔克林告诉我，桑德纳的电话也许还不够。我们再次讨论我是否应该给格林斯潘打电话，最后决定，首先由基尔克林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史蒂夫·西克联系。他已经跟我们保持了长时间的联系。西克同意向费舍尔追讨资金。但后来证明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我从来不怀疑摩根士丹利的支付能力，但是如果他们造成我们推迟开盘，后果难以设想。

早晨6点，芝加哥天刚亮，执行委员会再次召集会议，讨论黑色星期一当天标准普尔指数合约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让人难以置信：12月份标准普尔指数合约跌了87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合约的总交易量达到162000张，几乎相当于交易所当天总交易量的1/4；未平仓合约从146000张跃升到约172000张；未配对委托单占了大约8%，需要的保证金总额是39亿美元。我们也研究了席位的买入和卖出报价，二者之间相距很远，卖方是亏本销售。

快到早晨7点时，也就是开盘前半个小时左右，我离开会议室，给大陆银行负责Merc账户的财务总监威尔玛J.施梅尔泽打了个电话。我必须知道，我们是否能开盘，这也是格林斯潘提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是坏消息，我下一个电话将打给联储主席。我问施梅尔泽有关Merc账户的收支情况，是否足以结清所有头寸。她回答说，我们还缺4亿美元。由于银行的保密规定，她不能告诉我是谁导致了短缺，但是我很清楚这个客户是谁。

“威尔玛，”我说，“你是指我们的短缺资金从25亿美元下降到了4亿美元？简直太棒了！”

“是的，利奥，但是还差4亿美元。”

“威尔玛，”我说，变得有些激动，“我确信你的客户有能力支付。你不会因为这讨厌的几亿美元而让Merc毁于一旦，是吗？”

“利奥，我没有权力。”

“请听我说，威尔玛，你必须帮我们补上这个缺口，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将不得不给格林斯潘打电话，而且我们将会再次下跌。”

电话的另一端沉寂了片刻，威尔玛在犹豫。她正处于抉择的时刻。我并不喜欢把这种压力强加在施梅尔泽身上，她很尽职，负责Merc账户已经多年。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谁能责备她？她觉得她没有权力去承付那种资金，特别在目前这种危险的局势下。突然，奇迹出现了。

“稍等一会，利奥，”她大声叫着，“汤姆·西奥巴尔德先生刚刚进来。”西奥巴尔德是大陆银行的主席。

几分钟（我却觉得非常漫长）后，施梅尔泽回到了电话前。“利奥，我们这边没问题了，汤姆说我们尽管做。你会获得你需要的资金。”

我看了一下时间，当时是上午7:17。在我们货币市场开盘前，我们还有3分钟的空闲时间，这时我通知约翰·戴维森，事情办妥了。整个世界都不知道我们曾经离悬崖那么近。实际上，摩根士丹利的资金在大约20分钟后进了大陆银行的账。但其实我们本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題。资金不会消失，但套在了另一个交易所的头寸上。这次股灾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要让结算银行知道客户在其他市场的所有头寸。从这个历史事件中，我们还吸取了许多其他的教训。但是这些教训的价值要在我们有时间思考期货的完善和发展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在这场风暴期间，我一度不能确定期货将来是否还会存在。有时候我会静静地想，这是期货市场的末日抑或是世界的末日？

数年后，博士后访问学者詹斯·卡斯腾·杰克威斯与马克·鲁宾斯坦教授（1995年获得了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IAFE）/桑加德最佳金融工程师奖）一起，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证据证明，1987年10月19日并没有发生股灾。根据他们的概率公式（1995年出版），这种股灾发生的可能性是 10^{-160} 。换句话说，“即使一个人和宇宙一样已经生活200亿年，经历了200亿次大爆炸，在此期间经历一次类似下跌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我在股灾期间就已经知道了这种令人鼓舞的理论。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31 章

自由落体

中部标准时间星期二上午 8:30，股指期货市场再次准时开盘，但不像星期一的直线下跌，星期二更像是滑坡铁轨。大陆银行支付事件只不过后续事件的前奏，形势一触即发。从任何角度来看，10 月 20 日都是我作为 Merc 领导者任期内最为艰难的一天。它也是交易所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

尽管国外市场通宵大跌，但我们仍然预计华尔街开盘将上升。我希望这种上升也给我们的期货市场提供一个好的基调。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的市场开盘就急剧上涨了 23.50 点，随后又回升了 16 点。道琼斯指数开盘走势也非常强劲，回升了 200 点。但是道指的回升刚刚开始就迅速消失了。而在 Merc，卖压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已形成。只要卖压形成，我心里的紧张感又回来了。我知道市场的强烈反弹是暂时的，那些没有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开盘时卖出的空头将开始重击市场。正当我推测的时候，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市场开始急剧下跌。卖单潮水般涌入 Merc 和 NYSE，打击市场，打压蓝筹股。二级市场许多股票根本找不到买入获利的机会。

到中部标准时间上午 11 点左右，我开始收到汇报，NYSE 的大盘股已经被卖盘

淹没，专家不能做市了。我被告知，由于 NYSE 140 只主要股票（多数都是标准普尔指数的成分股）出现了买卖盘差额，这些股票的交易已经暂停。唐纳德·斯通（一位非常内行的老资格专家，危机期间我真正认识了他，并且开始佩服他）后来告诉我，这是他一生中最惊慌的时刻。他说，星期二的开盘回升之后，市场上根本没有买入报价，而 NYSE 却正在收到无数卖单。“利奥，”他描述道，“这就像把你的头放进炮口，然后用炮弹轰你。”在芝加哥，我们的交易大厅也陷入了类似于自由落体的境地。

刚过中部标准时间上午 11 点，局势变得真正危险起来。比尔·布罗斯基已经打电话证实，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已经正式关闭了它们的市场。这个消息让我感到一阵战栗。我们很快变成唯一还在运作的市场。整个上午，Merc 都陷入在巨大的卖压中。CBOE 的价格一开始就不存在，而 NYSE 和 AMEX 的许多股票要么从来没有开过盘，要么随着卖单淹没专家而暂停了交易。尽管 CBOT 的 MMI 指数合约从技术来说还在交易，但是它的合约规模太小并且缺乏流动性，因此意义不大。其他期货市场也都无足轻重。因此，实际上只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交易所还在开放，一个 NYSE，还有一个就是 CME。尽管 NYSE 的许多股票已经停止了交易，但至少一般公众还是会认为 NYSE 仍然在交易。只要这是事实，我就会坚持这么说。

随后，我收到 CFTC 通知，一件我最为害怕的事情发生了：NYSE 已经通知 SEC，它正在考虑关闭交易所。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清楚：如果 NYSE 关闭，无法控制的恐慌将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Merc 仍然开放，全世界都会把责任推到我们头上。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这是那天早晨我和菲伦的第三次谈话。电话是通过比尔·布罗斯基办公室的通话盒进行的。桑德纳、布罗斯基、基尔克林、萨尔兹曼和杰里·拜尔都在场。我们都屏住了呼吸。

我告诉菲伦，我们已经听到了 NYSE 将要关闭的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菲伦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糟糕。“我们正在接近关闭的边缘，”他回答。“没有买方……我们将开会决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关闭。”

我们面面相觑。几乎可以确定 NYSE 将要关闭。菲伦也没有说正式关闭之前他会通知我们。“他们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事情。”桑德纳对我说。我们的市场将独自开放。

我们俩离开了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现场去打电话，所有人都等着我们回来。打电话之前，我们俩进行了短暂的商谈。我说，如果 NYSE 不通知我们就关闭，我们的怀疑就会成为可能，恐慌将随之而来，所有的卖单都会涌向我们的交易大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采取措施之前有 15 ~ 20 分钟的时间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及声明；在这段过渡期间，谁也无法知道斯帕兹的价格将走向何处。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即使只

有只言片语泄漏出去，让人们知道 NYSE 正在考虑关闭，也足以让我们的市场再下跌 1 000 或 2 000 点（相当于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 10 或 20 点）。

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只能采取一个保护措施，而且我们必须快速行动。我们不得要求暂停交易，直到 NYSE 做出决定。桑德纳和布罗斯基同意了，执行委员会的无记名投票也通过了我的提议。我们准备了必要的声明，并确信声明不会提供过多的信息以免有人从中渔利。布罗斯基通知 CFTC，而我给白宫的贝里尔·斯普林克尔和 CBOT 的汤姆·多诺万打电话。我把情况解释了一下，并且告诉他们，如果可能的话，交易中断将是暂时的。发表声明的同时，我去了交易大厅，向交易商解释这个声明；杰克·桑德纳也陪我一起去了。当时大约是上午 11:30。我们进入交易大厅时，骚乱已经有所平息。交易商都停下了脚步，以便听见我们说什么。

尽管我的情绪非常激动，但是我的声音非常平静。我用最自信的口吻向大家解释，交易中断是暂时的，最后是否恢复交易取决于 NYSE 是否关闭。“我们不能独自开放让所有人把责任推卸在我们身上。”我说。大多数交易商点头表示同意。我们一得到有关 NYSE 最终决定的确切消息，将立即通知他们。没有人提出疑问。几个交易商认为这是 Merc 末日的开始，于是跑去卖他们的会员资格了。

我们返回到布罗斯基的办公室等待 NYSE 的结果出来。大约 15 分钟，我们再次拨通了菲伦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了些信心。NYSE 还没有关闭。他的声音告诉了我想知道的一切。与此同时，我做出了恢复开放的决定。执行委员会同意了，于是我们发表了声明。在我们暂停交易约 35 分钟后，标准普尔指数重新开始交易。危机过去了。

菲伦的声音已经告诉了我（根本不用任何言语），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计划（这是我整个上午为之期待的）已经启动。由于华盛顿官员的强烈建议，许多公司纷纷宣布了股票回购计划，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本周末。这种买入力量成为推动星期二蓝筹股反弹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并且使得期货市场也出现了买方。在当天交易时段的最后半个小时，SEC 暂停执行其禁止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的规定。回购计划的消息成为了 NYSE 避免关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无论 NYSE 是否正式关闭，Merc 是唯一还在运作的市场。灾后分析中，数据将证实，黑色星期一早晨的前两个小时，当恐慌性抛售第一波打压市场的时候，Merc 是卖单能够涌入的唯一大规模市场。如果 Merc 当时不能承接那些卖单，NYSE 也许当天不会开盘。当然，公平地说，在恐慌来临时，没有任何一种机制可以应付如此巨大的交易量。NYSE 专家系统不能，NYSE 的自动化交易系统不能，期权市场不能，场外交易市场不能，即使期货市场专为应对恐慌性抛售而设，它也不能。通讯线路堵塞，技术用尽全力，而有的时候整个金融系统看起来就像要彻底崩溃。但不管怎样，在这些混乱无序的交易日中，标准普尔 500 指数合约的交易大厅安然挺过了危机。

市场中有大赢家，同时对应的就有大输家。大赢家可以就此退休，大输家却要卖掉席位来弥补损失。大多数交易商惊魂未定地离开了市场，不过仍然有偿债能力。到了星期五，当每个人都筋疲力尽的时候，那些星期一离开交易大厅的小交易商开始回来。在这场股灾中，有许多暂时的痛苦，有许多永远的裂缝，还有许多的故事可以说，这一切足以填满一个人一生的记忆或者写一千本书。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某个交易商数小时，甚至有时是几分钟内变成百万富翁的故事，也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失误（一些失误让经纪商暴富，另一些却令经纪商轰然倒闭）的故事，还有许多关于偶然撞上、错过和几乎错过的故事。

最出名的故事之一就是有关乔治·索罗斯，神奇的倒数第二成功的基金管理人和希尔森公司（受人尊敬的华尔街经纪商）之间的一场争吵。根据《巴伦》1987年11月2日的报道，乔治·索罗斯“参与了股灾周的疯狂抛售”。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并且导致了一场由芝加哥地方法院受理的官司，在这场官司中，乔治·索罗斯拥有并且经营的量子基金成为原告。量子基金要求被告赔偿损失6 000万美元，并且支付惩罚性赔偿1亿美元。

原告指控，在10月22日星期四，希尔森公司的三个场内经纪人（拉里·以色列·迈克尔·穆林斯和道格拉斯·扬）和其他大约100个交易商和经纪人，共谋以人为低价卖出量子基金持有的2 400手斯帕兹期货。很显然，当时索罗斯基金决定在星期四早晨开盘时卖出其所有头寸。开盘时，希尔森经纪人以市价卖出1 000手。根据巴伦的报道，“场内自营商一开始摸不清虚实，有些犹豫，放过了猎物。后来卖出报价从230迅速下跌到220、215、205、200。随后场内自营商开始向猎物发起攻击。索罗斯的合约卖出价格从195回升到210。价格波动异常剧烈。只要委托单一成交，市场就反弹回230，买家则趁机抛出，获得巨额利润。”报道引用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场内自营商的话，他说：“希尔森执行指令非常糟糕，大概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糟糕的执行之一。”

希尔森否认了这些指控。根据一些报道，牵头经纪人曾经向基金经理提出请求，让他不要发出如此大量的市价指令，而改为限价指令。但最终官司并没有开庭审理，而是以一个比较小的金额了结了。

10月大股灾已经尘埃落定，但是我们又听到了一出嘈杂的大合奏，无休止的大量研究、分析、声明以及反唇相讥。在所有的调查当中，最著名和最具有影响力的是里根总统任命的总统工作小组（由即将成为美国下一任财政部长的尼古拉斯 F. 布雷迪担任组长）所进行的调查。布雷迪（迪龙·里德公司的联合主席及新泽西州的前参议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华尔街专业人士，但对期货知之甚少。如果他对我们市场有一些华尔街流行的不太符合事实的看法，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毫无疑问，布雷迪小组里有人一开始就把 Merc 当成主要的嫌疑犯。工作小组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调查各个市场高管人员的交易记录。我预计我的交易活动记录将会被置于高

倍显微镜下，由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以及尼克松的保密检查员（如果他们还在的话）来进行检查。我只能设想，如果布雷迪发现 Merc 理事会成员及执行委员会主席在股灾前突然卖出期货，大赚了一笔，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结论。然而，他们的调查结果发现，10月19日星期一，我没有拥有任何市场头寸，这个时候我却看着他们的惊慌失措而暗自发笑。

一般情况下，在市场崩溃前将空头头寸平仓，这是一个让交易商后悔得想吞刀片自杀的行为。但我却在市场崩溃前的星期五将空头头寸平仓了，事后证明，这笔交易是我曾经做过的最漂亮的交易，我喜欢这么认为。

在我任职 Merc 期间，我一直小心翼翼，避免在我的个人交易和我的 Merc 职位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要知道，我进行交易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当我以 Merc 的身份涉入某些敏感事务时，我会确信自己没有持有头寸。这意味着，当我面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时，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我会丧失交易机会，结清所有市场头寸。而这些做法让我在 1987 年的股灾中安然无恙。

早在 1987 年年初，我就已经看跌股票市场。但是市场仍然在不断地上涨。我并没有动摇，坚持认为，股票价格已经被严重高估，调整的时机到了，因此我依然坚持我的相反观点，并且在标准普尔 500 指数走高的时候，卖出它的期货合约。我的损失持续增加。但是到了 7 月份，我的策略开始奏效了，因为这个时候市场变得反复无常。5 年的牛市在 8 月达到顶点。当市场开始一点点往下跌时，我的损失开始减少。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及世界范围内一系列负面经济因素开始打击市场，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到 10 月份时，我已经有了盈利。

当然，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市场将会崩溃，就算知道，也无法确定是什么时候。但是在股灾前一周，卖单突然大增。到星期五时，市场已经开始大幅跳水，这也成为近期股票市场表现最差的一周，而我已经赚了很多钱。既然已经赚了不少钱，我决定套现，入袋为安，而不是把头寸留到下一周。我预料到市场还会继续走低，但我希望首先会有所反弹。我不知道市场的恐慌程度经过一个周末竟然进一步加剧。很大程度上，无论是 1929 年还是 1987 年，国内的媒体利用周末的时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我在早餐期间浏览星期天的报纸时，我就已经知道，将我的空头头寸平仓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个周末，全世界大多数投资者都决定星期一去赚点钱。当然，其余的是历史。

如果我继续持有头寸，而不是在上周五平仓，很清楚，我会在黑色星期一全部平仓，那会让我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提前平仓却让我收获了更有价值的东西。我避免了可能受到的利益冲突指控，在 Merc 和期货行业的地位也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我认为尼克·布雷迪最终学会了信任我们这些芝加哥的家伙。

我还记得他对 Merc 的第一次官方访问，而他随后的发言称，他最担心的是出现第二轮下跌。

“第二轮将会跌多少？”他问。

我想当时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认为市场不会再下跌了。”

“你怎么能这么确定？”

我耸了耸肩，“我认为所有的泡沫都已经挤干了。”

他笑了，“希望你是对的。”

随后他问我们多快能把 Merc 股灾周的交易记录给他的工作小组。“60 天够了吗？”他想知道。

桑德纳、布罗斯基和我互相看了一下，笑了。“你们离开前给你们怎么样？”布罗斯基没有掩饰他的吃惊。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华尔街程序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股灾后不到一周，我们竟然就已经准备好了股灾期间所有参与者进行的所有交易的记录。事实上，我们在股灾后第二天就已经有了这些信息。而 NYSE 花了几个月。

布雷迪工作小组的执行组长、哈佛教授罗伯特 R. 格劳伯总结了股灾最重要的教训：“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传统上被看做是各自独立的三个市场——股票市场、股指期货和股指期货期权实际上是一个市场。”这是正确的。这些市场通过金融工具、交易策略、市场参与者以及清算和信贷机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尽管布雷迪工作小组突出这个“发现”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这对于布雷迪工作小组而言算得上是一个发现，但对于我们这些芝加哥人（我猜纽约和其他地方的专业人士也一样）来说，三个市场联为一体（不仅美国如此，全世界都如此）的事实不过是旧闻而已。

三个市场已然联成一体，但不幸的是彼此并没有协调。这个缺陷成了灾后市场的主要焦点。但是我们的市场首先成了公众关注的对象。成百万的股东突然之间意识到了另一个市场的存在——期货市场，一个衍生品市场。也许他们还没有理解这个市场，但是他们知道它很重要，因为突然之间，华尔街的权威们都在谴责它，认为它应该对这次历史上最大的股灾负责。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公众认知度的市场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居然要为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股灾负责？期货市场——特别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正在和伟大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分享头条。如果我们相信 NYSE，那么就是 Merc 因为所谓的指数套利而导致了这个问题。推测起来，股灾起始于芝加哥期货市场的大量卖出，从而导致标准普尔期货合约的大幅跳水，继而通过指数套利传递给纽约的现货市场。我一点都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事实上，在最后的分析中，证据非常清楚，最后的匿名报告意见也非常一致，那些指控毫无根据。两个市场同时受到大量卖单的打压。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问题要指向 NYSE 的专家系统。股灾期间，一些资本不足的做市商没有承担他们应尽的义务。期货市场不是黑色星期一的罪魁祸首，也不是星期二反弹的功勋。恐慌心理不会由于 CBOT MMI 交易大厅的力量而终止，也不会因为 NYSE 终止程序交易而消失。与一些流行的怪论相反，在高盛或者任何别的地方，不存在秘密的联合定向购买股

指期货合约的情况。这件事情毫无神秘可言。联邦储备委员会向市场注入的流动性以及公司的股票回购，再加上恐慌性的抛售已是强弩之末，局势在星期二反转了过来。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是金融环境已经被搅乱，人们正在寻找替罪羊，这个时候要向人们解释清楚非常困难。这就像我不得不再次面对孩提时就经历过的挑战——拿起投球板。但是这次接的不是垒球，而是硬式棒球，而且是打大联盟。而埃尔默·法尔克的幽灵和他30年的关于期货市场报信者的成功的预言又闯入了我的记忆：“如果真相太糟糕，太振聋发聩，他们会把我们关闭。”

好在还没有人会关闭 Merc。我赶紧整理一下我们的战略。黑色星期一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六，我召集齐了我们的战略团队。就在 Merc 会议室外的艾利桑·波斯纳的小办公室，我把自己关了起来，里面还有里克·基尔克林、杰里·萨尔兹曼和波斯纳。不知道喝了多少杯热咖啡，也不知道吃了多少个冷比萨，我们的头脑风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萨尔兹曼在场可以确保我不会陷入法律困境；基尔克林掌握大量无可争议的统计数据，他在场可以证实我所知道的是正确无误的：股灾中所暴露出来的金融市场的技术缺陷既不是期货市场的错，也不是机器的错；波斯纳的角色是协调并且把我们的想法整合起来。

对我而言，基尔克林的存在是对我自己的感觉的一个鉴定。相信我们自己没有犯错是一回事，而获得事实真相是另外一回事。我非常担心 Merc 的官员为了照顾我的感受而故意迎合我。星期六我之所以让基尔克林到场，是因为我知道，他是 Merc 少数几个能对我说真话的人。对我来说，来自基尔克林的事实就是铁定的。

数年以后，里克·基尔克林告诉我，黑色星期一期间，有一件事情一直让他很迷惑，就是为什么我能立即确定，芝加哥的卖单不会导致 NYSE 倒闭。他说，正是我这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和果断让他和其他 Merc 职员坚信，纽约金融界的恶毒攻击、媒体的推波助澜（媒体总是认定，华尔街人才是真正的金融专家）不会摧垮 CME。

“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个星期六早晨，当基尔克林骄傲地确认，数字完全证实了我的观点，即芝加哥股指期货的卖单很少转移到 NYSE，他这么问我。

这也许是与逻辑相伴的直觉吧。通过观察交易大厅以及和交易商交谈，我感觉到，在星期一上午的股市大跌中，前几个小时的买家并不是套利者，他们在芝加哥买入不是为了在纽约卖出，他们的交易并不符合指数套利的特征。而我的感觉被随后的逻辑进一步证实。为了进行指数套利，必须知道现货市场指数价格，还需要有 NYSE 的买家承接。而我可以确定，在星期一这些条件不可能具备，指数套利根本无法实施。我的直觉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10月19日早晨，NYSE 开盘时的买卖盘差额是如此之大，以致对于许多最能代表标准普尔指数的成分股，专家不能做市。实际上，开盘一个多小时后，道指成分股中，超过1/3的股票没有开盘，其中包括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尔斯公司、埃克森公司。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是头脑正常的套利者，

他不会试图进行指数套利。当天，NYSE 有 187 只股票推迟开盘，7 只暂停交易，3 只暂停后没有恢复交易。星期二（10 月 20 日）早晨情况也基本类似。那天有 92 只股票推迟开盘，175 只暂停交易，10 只暂停后没有恢复交易。很清楚，NYSE 的那些专家（当星期一承接了过多股票后逃离了市场）并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过了星期一之后，NYSE 几乎没有做市能力了。”布雷迪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乔·科亨指出。

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套利者还要依赖 NYSE 的自动指令执行系统——DOT 系统。科亨最后指出，“由于巨大的交易量的冲击，DOT 系统在星期一下午崩溃。指令被备份，而套利者无从知道他们的指令何时才能执行或者以什么价格执行。”随后在星期二，NYSE 禁止了纯粹出于指数套利而对 DOT 的使用。

那个星期六早晨，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制订 Merc 的策略。基尔克林能够非常肯定地确认，在星期一，只有大约 20 000 张合约（大约相当于 5 000 万股股票）是出于指数套利的目的而购买。换句话说，基尔克林能够证明，NYSE 创纪录的 6.05 亿股交易量中，只有不到 10% 的比例是由指数套利形成，正好与 CFTC 和 SEC 后来的研究所证实的一样。换言之，与所有来自华尔街的指控相反，在 NYSE 星期一的总交易量中，超过 90% 的比例与 CME 的期货买卖无关。反过来它还证明，Merc 当天吸收了大约 1.5 亿股的交易量（相当于股票市场总交易量的 25%）。如果 NYSE 开盘，这些 CME 的卖单将涌入 NYSE。正如我们一开始所宣称的那样，Merc 的投机者（包括我们的场内自营商）缓解了机构的卖压。

开完星期六的马拉松会议，我把我的观点写成了几篇论文，并做成了小册子，其间要感谢基尔克林的研发部、萨尔兹曼的法律指导以及波斯纳的组织技能。这些小册子在股灾后的 6 个月内陆续出炉，内容涉及了 Merc 与 10 月股灾相关的方方面面。第一篇形成于股灾两周后，题为《1987 年 10 月 19 日：真相》。金融界、政府和媒体的数百人，或者也许是数千人拿到了这本书。第二篇小册子题为《关于股票指数期货和期权对股票市场波动率影响的研究》。这本小册子收罗了一些以前出版的与程序交易和指数套利有关的文章，目的是反驳这种指控：与期货市场相关的交易行为会损害现货市场，并使现货市场产生异常波动。最后一本小册子题为《期货“保证金”的角色》。这本小册子对于期货保证金和股票保证金的角色差异进行了全面的描述。

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 Merc 的会员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在浏览报纸，无疑也会感受到那些攻击的压力。我知道，如果能够正确引导，那些会员将会形成一个强大的队伍来捍卫 Merc 的领土。而这支队伍的士气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必须给会员提供指导以及真相。这些将成为战斗中无坚不摧的武器。我确信，在 10 月 26 日（星期一）早晨，我们的会员明白了，当全世界都在对我们进行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攻击时，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在 Merc 每个会员的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份星期六起草的 Merc 的官方声明，它为反击定下了基调。声明给我们的会员提供了真相，并让他们确信，Merc 和它的斯帕兹交易商在股灾期间没有任何可以被指责的地方。它成了 Merc 的原则。

随后，我和布罗斯基、桑德纳拿着《真相》出发了。我们在芝加哥、纽约、华盛顿、巴黎和伦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大家讲解（并且辩解）股指期货、程序交易、资产组合保险、保证金和指数套利。同时，我们与《华尔街日报》、《财富》和《新闻周刊》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其间还接受了许多电台的采访，进行了很多次电视座谈。很清楚，我们正在保卫可保卫的一切。

而 SEC 主席对大卫·鲁德尔而言实际上是一份全新的工作。他此前是西北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很了解 SEC，但对期货市场和衍生品却知之甚少。关于鲁德尔对我们市场的观点，我们的最初印象是来自他在 1987 年 8 月成为主席后不久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他选择了芝加哥（他的家乡）来进行他对债券俱乐部的演讲，主题是《市场波动》。

股灾后的第二个星期六，我和 CME 的一个代表拜会了 SEC 主席大卫·鲁德尔。我们通过一些颇费周折的渠道得知，鲁德尔将在他的家乡埃文斯通（位于芝加哥北郊）度周末。于是我们匆忙进行了预约，第一次拜会新任 SEC 主席。我们都意识到，鲁德尔关于股灾的声明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SEC 深受华盛顿重视，远远超过了 CFTC，要知道 CFTC 当时甚至还没有常任主席。在政治上，当感知远离真相时，感知就是事实。

陪同参与会谈的人员包括 Merc 总裁布罗斯基、里克·基尔克林和唐纳德·雅各布。唐·雅各布是鲁德尔西北大学的同事，凯洛格商学院院长。他当时是 Merc 的外部理事。在对 SEC 主席的第一次重要拜见中，雅各布的声望给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否则，这将是一次非常艰难的会面。不久我们就痛苦地发现，鲁德尔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先生，对我们的市场果然知之甚少。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我开始对疯狂的股灾周进行评论，其间对鲁德尔进行了期货知识的启蒙教育。我告诉他期货市场如何运作，它们的功能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不同于证券世界。随后，我们给鲁德尔呈上了由研发部收集的股灾其间的初步统计数据细目。鲁德尔记了很多笔记，也问了一些问题，感觉就像他几个月前教过的法学院学生一样。然而结束会面时，直觉告诉我，鲁德尔并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即期货导致了波动。

与鲁德尔的会面证实了我们原来的猜测，事情将会变得更糟。我能感觉到 Merc 大厦底下的土地正在颤抖，因为敌人就要群起而攻之了。我们将为了我们的生存而战。我们就像一块肥肉，不可能被政府和媒体忽略。正是我们可以提供的写作素材让温和的编辑们变成了恐怖分子。这是两个州之间的金融内战：期货州和股票州。这将是我最困难的时刻。我清楚地知道，历史不会重演。当 NYSE 在东部发起冲锋时，我除了反击别无选择。斗争将产生 Merc 的机遇。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32 章

意外之果

早在本周结束以前，就有一帮人在助长怀疑。尽管金融界（和交易所）已经安然地度过了股灾周，但疑惑甚至是迷惑仍然存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快地同时将手指向 Merc 的原因。市场恐慌的成因很复杂，但总有一些人认为可以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我們就不幸成为了这个答案，我们被看做是一群对股票市场下赌注的投机者。

当感情占据了大脑，逻辑就会漂走，人们就会停止正确的思考。股灾来源于恐惧，人们害怕利润和业绩受到威胁。NYSE 把矛头向西指向了芝加哥，于是媒体全盘接受了这种指控。与此同时，单枪匹马作战的 Merc 正在寻找战斗伙伴。华尔街一些重要的投资银行家已经使用股指期货来为客户的投资组合进行保值，Merc 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但是，结果却只有沉默。

市场崩溃就像一本故事集，里面收罗了经济学故事、政治故事、新闻和计算机的故事，还有关于技术是怪兽的故事。崩溃成为了计算机的阴谋。媒体实际上不用费太大的力就能挑起一场地区之间的斗争。哈得逊河成为了分界线。在这个混乱的金

融领域中，纽约和芝加哥互相指责，华盛顿的立法者则作为仲裁人进行仲裁。这场纷争把故事推向了高潮。事实上，灾后的许多争议都反映了金融领域中的政治角力。

“两个城市的战争。”1988年5月3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头条非常抢眼，也给这场关于风险管理和现代全球市场的争议添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文章引用了唐纳森·鲁夫金·詹雷特公司的一位股票交易商的话，“关于芝加哥，我好像找不到什么好话。”芝加哥的理查德·丹尼斯则反驳，“我们之间的这条河沟固然很宽，但我们之间的利益差异甚至更大。”《时代》杂志显然把这些微妙而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如果《时代》杂志的这篇文章是基于个人利益而写的，那么这种有利于纽约和华尔街人的偏见就是不可饶恕的。我向编辑的抗议也随后在《时代》杂志发表。在抗议中，我试图让事情恢复原来的面目。

在这个复杂的争议中，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看出来，《时代》试图采用一种“‘战争’文化来进行一个老套的描述——纽约：‘传统的、善于分析的、互助的、相当自制的’，而芝加哥：‘年轻的、冲动的、投机的、毫不顾忌的、嘈杂的’”。这是愚蠢的陈词滥调，似乎想要返回到至少50年以前的观点。似乎生怕万一有人不能理解这个观点，《时代》的作者还进一步让读者确信：“很显然，就外表而言，芝加哥交易商的个人风格使他们看上去像曲棍球的狂热者，而非金融专业人士。”说得好听一点，这种关于两个市场的描述完全是不公正的。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艰难的战斗。FIA 会长约翰·丹姆嘉德正确地描述了这场战争的特点，当时他把 NYSE 描述成一个“国会眼中的800磅的大猩猩”，在媒体眼中也是如此。我很清楚我们处于危险之中，但我不会让 Merc 成为金融这块土地上的逃亡者。那时候我们有一种孤立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身处于浩瀚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四周没有别的岛屿。这种感觉并不新鲜。我早就经历过这种感觉，当时我艰难地向满是怀疑的金融界推销我的 IMM 和货币期货，同样也有孤立无助的感觉。我还能记得15年前迎接我的白眼和奇怪的表情。

今天，1987年的股灾已经过去多年。当年弥漫在华盛顿、纽约和芝加哥的紧张气氛，今天已经不可能准确地描述；还有人试图推动立法禁止或削弱股指期货交易以及限制期货市场的发展，这件事情到底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充分地描述了。我们的市场富有效率，并且紧随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但是这个事实反而伤害了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市场太富有效率。一些批评认为，指数期货使得市场太复杂和太动荡。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计算机照样运作得很好，为什么现在我们需要它们？股灾后的一则新闻广播的摘要反映了这种观点：“没有头脑的计算机装在了自动驾驶仪上……技术已经凌驾于它的效果之

上……效率需要刹车！”

这样的观点让我愤怒异常。我从来不会跳快舞，总之，我宁愿跳 20 世纪 50 年代的那种舞。但是我不会因为约翰·特拉佛塔在 70 年代传播《狂热迪斯科》和迪斯科风潮而谴责他。世界在变化。我们的市场变得日益全球化，这就需要市场能够对信息做出即时的反应，而这种能力必须通过一些工具来完成。股指期货正是这样的一种工具。

《华盛顿邮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来源不明的最简洁的评论：

在政治家和监管者对这头叫做“程序交易”的怪兽进行政治迫害之前，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术语的含义，也许对他们是有用的。本质上，它涉及了华尔街对计算机技术的两个相似的应用：从一台计算机到另一台计算机的高速电子通讯以及高速的数据处理。通过程序控制，计算机可以通过响铃或者闪灯的方式提示在某一交易所卖出某一合约的最佳时机。但是，正如闹钟不能决定你什么时候该醒，这些非人类的机器也不能决定什么时候买入或者卖出。

但政治迫害还是来了。芝加哥大学教授默顿·米勒公开警告：“计算机交易将受到谴责。情况和 1929 年相同，不过当时没有计算机交易。他们总得找出替罪羊。1929 年，保证金购买成为替罪羊，现在是计算机交易。这仅仅是一次恐慌，就像一次标准的银行挤兑。”

但是米勒的声音以及其他一些试图用理智战胜情感的勇敢人士的声音，完全淹没了在各种书面和电子媒体的谴责声浪中。相反，类似“期货正在把美国变成一个赌场”的言论甚嚣尘上，吸引了大量的眼球。还有一些“禁止期货”的叫嚣也是如此。

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 J. 马克凯（他领导的众议院电信和金融委员会对 SEC 有管辖权）立即要求举行听证会，甚至不等尸体冷下来就在崩盘后的第二周访问了 CME，甚至在来芝加哥以前他就下定决心了。

在股灾周的星期四，马克凯已经确定了裁决和惩罚。“在这次市场暴跌中，程序交易双手染满鲜血，它就是背后的元凶，”《华盛顿邮报》引用他的话。“星期一已经昭示了程序交易的终结……就是说它……它已经结束了。”

敌人越是猖狂就越能激起我战斗的勇气，让我更有力量去打一场漂亮的战斗。股灾刚刚过去 10 天，马克凯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由于手里握有充分的证据，我在听证会上穷追猛打，毫不手软：“难道因为我们的市场不同，所以就要让我们相同？难道因为我们已经提前进入信息本位，所以就要让我们退回到技术落后的过去？难道因为我们在被某些人视为纽约专属的领域获得了成功，所以就要让我们把市场份额

拱手送给他们?”

已故参议员约翰·海因茨（来自宾西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和其他一些国会官僚一起提出了一个建议，把股指期货的保证金比例提高到 50%，以和保证金股票交易的水平相同。当里根总统表示支持这个想法时，这个所谓的保证金“一致”的概念获得了生命力。这个议题成为我们最恐怖的噩梦之一。像其他一些想法一样，这个提议貌似正确，实则荒谬。

期货的保证金用于保证价格出现最小变动时能够履约，而股票的保证金是购买证券的部分付款，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显然的。当我们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杰克·桑德纳对两种保证金之间的差异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解释。他用图解的方式向国会描述了我们的系统其实比股票系统安全多了。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提出保证金一致是因为他们缺乏了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出于恶意的竞争动机。对我们而言，正如默顿·米勒所说，“保证金的议题不过是企图扼杀期货市场的幌子。”默顿一如既往地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同时，像一个精神科医生对一个病人的内在自我做冗长乏味的分析一样，市场被探查、拿捏、刺戳，在成堆的分析报告中被详细检查。Merc 被放在了显微镜下，如果我们有任何污点，全都会暴露。我们完全清楚，在这些研究当中，有一些显然是由我们的敌人所指使。于是我们决定开始进行我们自己的研究，以进行回击。然而，对于 CME 调查委员会（主要职责是调查 1987 年 10 月 19 日期间的相关事件）的人员组成，我非常慎重。我要确保该委员会由那些可信度不容置疑的人士组成。我们邀请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默顿·米勒（三年后由于其在金融理论方面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委员包括耶鲁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漫步华尔街》的作者），斯坦福大学金融和法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广为使用的期权定价公式——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联合创立者），律师、联邦储备系统前法律顾问约翰 D. 豪克（精通金融机构监管）。他们的报告于 1987 年 12 月 22 日发布，并且为随后的报告提供了一个范式。正如我所预料的，没有人敢质疑他们的结论。

总而言之，对于这次股灾，前后大概出现了 77 份不同的报告和研究。这些各种各样的报告共同成为了一段恐慌主宰市场的短暂期间的历史背景。但是市场不像被战争摧毁的城市，杳无人烟，无法恢复；市场原来被忽视的空间会迅速被那些将市场下跌看做入市机会的人迅速填补。就在最后一份股灾报告完成以前，市场开始反弹。下面是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报告的发布时间：CFTC 的临时报告发布于 1987 年 11 月 9 日（后续报告发布于 1988 年 1 月 6 日）；尼古拉斯·德 B. 卡森巴赫报告（股灾前由 NYSE 委托，研究程序交易）发布于 1987 年 12 月 21 日；美国审计总署（GAO）报告发布于 1 月 26 日；CFTC 的最终报告发布于 1 月 29 日；SEC 的最终报告发表于 2 月初。每个报告都有所不同，让我感到满意的是，没有一份报告把期货市场

作为股灾的元凶。CFTC 报告称赞了期货交易所在整个股灾期间的决策和执行，否认了指数套利和资产组合保险互相作用导致股灾。SEC 报告证实了上述调查结果，并得出结论，机构大规模抛售股票是引起 10 月 19 日开盘大跌的唯一因素。

最全面的报告之一来自理查德·罗尔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终身教授）进行的独立研究。他的结论几乎列举了其他所有学术研究得到的观点，一步一步，费了很大周折来平息那些因无知而反对期货的愤怒的声音：首先，股灾是一个全球性事件，而美国市场并不是第一个急剧下跌的市场；在对 23 个股票市场的比较中，美国的下跌幅度居倒数第五。第二，既然美国是唯一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指数期货市场的国家，那么没有理由认为，衍生品市场是导致股灾的原因。第三，自动化报价、远期交易、交易税、价格波动限制以及保证金要求对股灾程度没有显著影响。第四，计算机引导的交易（比如资产组合保险）不会加剧股灾；事实上，在计算机交易盛行的 5 个国家中，平均下跌幅度低于其他 15 个国家的下跌幅度 6.6 个百分点。最后，在与价格下跌程度相关的 10 个变量的实证检验中，期权和期货交易与股灾程度不相关。

布雷迪报告于 1988 年 1 月 8 日提交给总统、联储主席以及财政部长。报告许多方面都有利于期货，但也包含了两个非常负面的建议。报告支持保证金一致以及股票和期货市场的单一监管。后者得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支持，当然还包括 NYSE 以及 SEC 主席大卫·鲁德尔。期货行业每一个人对这个建议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由 SEC 来监管也许意味着期货创新和扩张的终结。SEC 了解股票，但不了解期货。除非 SEC 能够将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等量齐观，否则我们不希望让它来监管。杰里·萨尔兹曼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总结：“期货行业之所以抵制 SEC 的监管，是因为人们知道，SEC 把 NYSE 看做长子，而把 CME 看做战场上掳回来的努比亚^①人奴隶所生的私生女。”

我个别拜访了各监管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我们得到消息很简单：他们正在处理使美国的金融服务行业高居世界第一的高度复杂的机制，不必要的立法并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其中的一些委员会已经收到了 CME 的谢礼和 PAC 的捐赠，但我不会愚蠢地认为，他们将自动地站在我们的一边。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我们必须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市场，而前提是他们理解我们的市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我们的支持者。而我们最强大的联盟阵线包括参议员艾伦·迪克森、鲍博·多尔、菲尔·格拉姆、唐纳德·里格尔以及克里斯多佛·多德。我和其中的几个人（比如鲍博·多尔和克里斯·多德）在信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如果我们的理由站不住脚，或者我们真的是罪魁祸首，他们中没有人会站在我们这边。

在华盛顿，关系经常比原因重要。这些年来，我们拜会过的许多人都曾经访问过

① 非洲东北部一地区，历史上曾为一古国。

交易所，他们已经学会了相信我们的判断。“在政治上，芝加哥比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交易所都要活跃得多和老练得多。”阿瑟·莱维特（后来成为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主席、纽约金融社团的长期会员）说。莱维特是一位机敏的政治观察家（如果有的话），他说得很对。Merc之所以成为政治上老练的交易所，是因为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只有在华盛顿拥有强大的代言人，我们的交易所才能存在。我们也感谢像比尔·巴格利、克莱顿·约特、戴勒·海宁顿、齐普·西格这样帮助我们的人，还要感谢我们的 CFPF。

2月10日，大卫·鲁德尔采取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措施，他把两个战争阵营的领导者召集到了一起。这是一个英明的主意，它对解决两个阵营的分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SEC主席邀请了我、菲伦，还有CFTC的代理主席卡洛·海纳曼。我们在他的华盛顿办公室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试图设计出一个交易中断系统，或者是所谓的断路器。这个系统将对出于波动危机中的市场起到缓冲的作用。会议的目的是让我们双方开始对话。对于市场波动问题，我和菲伦的观点都认为，交易所（而不是监管机构）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鲁德尔和海纳曼同意了我们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立场。然而具体谈到断路器，我们有一些困难。对我而言，断路器只是价格波动限制（对于这个问题，股灾前我就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对菲伦而言，它意味着介入价格的自由变动，这种介入让他感到犹豫。“市场出现疯狂抛售的时候，如果你用系统暂停的办法来停止这种抛售，准会有人发疯，”菲伦说。

在哲学上，我完全同意菲伦，但是我认为，一个精心设计的、短期的、预定的以及广泛宣传的“冷却”程序将能起到一些正面作用。“它是一个我们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我认为。我的好朋友，前SEC委员格兰德菲斯特后来责备我，我应该比别人更清楚，“当系统将要崩溃时，不管有没有交易中断，它都会崩溃。”他说。

而当时我和菲伦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们结束了会议，但我们都比较乐观，同意继续保持对话。4月14日，国会议员埃德·马克凯按照他的计划，邀请我和菲伦到众议院电信和金融委员会作证。他的听证室变成了股灾后果的焦点。里面挤满了记者和电视摄像机。我们的证言、评论以及同意或者不同意都会被媒体报导，然后通过报纸、杂志以及电视屏幕传遍美国。但是我和菲伦都不想公开争论和相互揭短。相反，我们同意在参加马克凯的听证会前去华盛顿的四季大酒店进行私人早餐会谈。我们谈到了市场、时间安排、波动，我们提出了一个90天的时间表，一是促进CME和NYSE的交流，二是设计一个新的断路器系统。

那天下午，我们两个出现在听证室前排中心位置，并排坐在马克凯的委员会前，向他们解释交易所为了应对股灾而采取的每一个措施以及我们未来的计划。我证实说，Merc已经制定的措施中包括提高股指期货合约的保证金以及实行暂时的每日价格波动限制。菲伦告诉议员们，NYSE也在提高技术水平和建立安全措施，以防止再

次发生黑色星期一的连锁反应。显然我们两个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媒体或者国会都没有充分的素材来写头条或者立法。

《华盛顿邮报》随后报道，“4月14日，在参加由共和党人、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议员爱德华·马克凯担任主席的众议院电信和金融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之前，菲伦和梅拉梅德在四季酒店进行了早餐会谈，随后，转折点出现了。他们当天达成的交易将有助于平息计算机交易引起波动的争议，并且第一次向国会表明，交易所能够独立地达成和解。”

但是为了与证券市场相互协调，期货市场本身也需要形成统一阵线。这清楚地意味着，我们必须把CBOT包括进来。幸运的是，我和CBOT的官员关系非常密切。然而CBOT和NYSE之间却存在这一段难以克服的互不信任的历史。当菲伦邀请我和其他CME官员坐下来和他以及其他NYSE官员交谈的时候，起初他并没有包括CBOT。但是我坚持我的观点，CBOT必须得到邀请。最终，CBOT总裁托马斯·多诺万、主席卡斯坦·马尔曼与我、布罗斯基和桑德纳一起，与菲伦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了会谈。可惜的是，NYSE和CBOT之间的陈年旧怨再次显露出来，双方产生了碰撞，会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不过，在记者招待会和国会听证会之余，我和菲伦的对话仍然在继续（媒体并不知情）。有时我们通过电话交谈，有时私下会谈，有时在纽约，有时在别的地方。媒体仍然在大肆宣扬我们的分歧，强调纽约对垒芝加哥，而菲伦和我却抛弃了冲突。我们完全理解并尊重对方的观点。他无疑会阻止人们对专家的谴责，而我宁愿死也不允许期货市场成为替罪羊。我们是来自两个阵营的特使，各自有不同的委托人和不同的利害关系，但是我们意识到，最终我们必须达成某些一致。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都热爱我们的市场，并且都明白，这两个市场是互补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两个都不愿意政府介入市场。交易所必须证明，它们有能力解决共同的问题；这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到了最后，我们知道我们将走到一起，求同存异，为我们的国家提供一个协调的市场结构。对我而言，这段艰难时期带给我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我和菲伦由此而成为了好朋友。事实上，当他1990年从NYSE的主席职位上退休时，我是他的退休派对所邀请的唯一一个来自期货领域的人。

但是和平不会来得太快和太容易。事实上，在1988年的上半年，局势每况愈下，最困难的挑战之一是让我们那些位于纽约的会员团体为我们大声疾呼。我知道，只有当媒体认为专家来捍卫期货市场时，它们才会安静下来。但是我的努力通常都会失败。我们市场的纽约会员要服从上级机构的命令。老牌的经纪商和投资公司，它们的主要利润来自股票和其他证券；期货只占利润的一小部分。为什么要让它们的钱袋去冒险？为什么要去激怒它们的客户、公司股东（它们一般不理解或者不相信期货市场）？

媒体在无情地寻找并盯牢股灾的罪魁祸首，政治迫害上足了发条，而指数套利仍

然是众矢之的。1988年1月份，希尔森公司在超级杯期间骄傲地宣布，它已经停止使用指数套利。当人们在猎杀魔鬼的时候，报告、事实、逻辑都不重要。政治迫害赢得了市场，支持者众。1988年5月10日，政治迫害到达了巅峰。当时美国几个最有声望的投资银行，屈从于荒谬的压力，宣布取消各自的指数套利。美国金融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异常悲哀的一页。

于是，我要求与联储主席安排一次会谈。尽管格里斯潘和我在电话里已经谈过，但自从股灾以来，我们还没有面对面地谈过，我有许多事情想跟他谈。他问我为什么这么久没来，当我告诉他我不想打扰他，他回答，“我的门始终为你开着，利奥。”我认为他是真诚的。当我们在他办公室坐下时（一对一），他平静地问：“利奥，为什么你们这班芝加哥的家伙遭到这样的打击？你们的朋友在哪？那些成功地使用指数期货的投资银行家在哪？为什么没有重要人物为你们大声辩护？”

我看着我所敬重的朋友，毫不犹豫地回答：“主席先生，我们的朋友好好地在那，但是他们不敢说。除非某些有权威的人，或者某些有专业知识的人，或者某些可信度高的人，又或者某些政府高官首先说出来，否则他们会一直保持害怕和缄默。”

房间里出现了片刻的寂静，这时我们互相对视，每个人都明白他的问题和我的回答的含义。

1988年5月19日，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爱德华J. 马克凯领导的众议院电信和金融委员会前作证。格林斯潘的话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他的话使这场战争出现了有利于我们的转折。

格林斯潘说：

许多针对股票衍生品的批评家没有意识到，这些工具的市场之所以变得如此之大，不是因为聪明的促销活动，而是因为它们给它们的用户提供了经济价值。通过帮助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用户快速和低成本地避险以及调整头寸，这些工具在投资组合管理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格林斯潘随后继续解释为什么期货能够反映事实：

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期货市场对新信息的反应比现货市场快，这很正常。一些人断定……这样期货价格的变动一定会引起现货价格的变动。然而，在期货市场调整投资组合头寸的成本明显更低，并且能够更快地建立新的头寸。这样，投资组合在获得新的信息时，会很自然地倾向于在期货市场交易，这样导致价格变动首先在期货市场发生。套利行为确保了现货市场价格不会滞后。

随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乔治 D. 古尔德提供了证词。他有 30 多年时间是作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但是他也知道真相：“许多对指数套利的公开批评，”他说得很简洁，“是典型的‘向信使开火’的例子。指数套利就是这样的信使，它把 CME 抛售的坏消息带到 NYSE 的交易大厅……”

我曾经被我的好朋友迈克尔 R. 达尔比（后来成为负责经济政策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引见给这位财政部副部长。达尔比是一位经济学家，1987 年 10 月股票市场崩盘后成为危机管理小组的成员。他非常熟悉期货市场，知道我们需要帮助，所以毫不犹豫地伸出了他的手。当他把我带进古尔德在财政部的办公室时，这位副部长已经准备好了把我作为朋友接待。古尔德抽出了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来了解期货市场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我们是信使而不是罪魁祸首，巧合的是，迈克尔·达尔比离开财政部，成了商务部副部长。而在这个新的职位上，他也给我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他成功地说服了商务部部长莫斯巴切帮助我获得日本大藏省的许可，把 GLOBEX 终端引入日本。达尔比今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也是约翰 M. 奥林政策中心主任。

格林斯潘和古尔德在国会前提供了清晰和明确的证言之后，我确信他们的话语已经传遍了金融界的每个角落，这就像摩西已经下山了。突然之间，各种各样的纽约金融专家开始保卫期货市场。突然之间，我们的市场提供了经济价值。华尔街的显要人物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公开承认，也许，只是也许，罗伯特 R. 格劳伯在布雷迪报告中所说的是对的：我们是一个市场，我们彼此需要。鲍博·格劳伯后来接替乔治·古尔德成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6 月 14 日，桑德纳、布罗斯基和我在纽约会见了菲伦以及 NYSE 的其他一些成员。晚饭后，我们就布雷迪委员会的一些核心建议进行了讨论。在 10 月份的股灾中，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联系中断了。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前所未有的合作中，Merc 和 NYSE 达成了一致，决定共同设立相互协调的断路器以及能让混乱的市场得以喘息的股票减震器。这些协议是我和菲伦达成的，并且在两个交易所得到了实施。直到现在，这些措施仍然是市场下跌时交易所基本的应对手段。

如今，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已经清楚地表明联邦储备委员会对监管期货交易并没有兴趣。相反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的鲁德尔坚持认为期货业与证券业相比监管力度明显不足，并且认为应当把更高的保证金要求作为稳定市场的一种手段。但是，新上任的 CFTC 主席温迪·格拉姆认为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格拉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他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寸步不让。结果是 SEC 与 CFTC 仍旧各司其职，这很符合机构相互制衡的原则。

1988 年后期，当里根总统任命玛丽·夏皮罗去弥补 SEC 的一个委员空缺时，期货业显示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夏皮罗曾经是 CFTC 前主席苏珊·菲利普斯的助手，这使得我们有缘相识。事实证明，夏皮罗的期货背景在我们反对 SEC 的监管权

接管时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理查德·布里登在从大卫·鲁德尔手中接管 SEC 后，违反了他曾经作出的保证，与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一道再一次挑起了接管期货市场的权力斗争。

尽管有布里登和布雷迪，我们在议会的影响力还是占了优势。最有帮助的是，依照我和迪克·格拉索达成的协议，NYSE 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中立。依靠 Merc、CBOT 和期货业的游说努力，把股指期货的监管权交给 SEC 的法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这对于期货业在国会的力量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多年来辛勤的努力、友谊和合作的结果。

在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和睦相处中，我避免了利益的冲突、两种文化的碰撞以及两个城市之间的碰撞。1989 年 1 月 5 日，作为约翰·菲伦的特殊客人，我应邀出席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理事会会议。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受到邀请的人，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无上的光荣。我从西部越过了哈得逊河到达了纽约。之后我向菲伦发出了同样的邀请，邀请他到芝加哥来访问 Merc。菲伦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

1993 年，阿瑟·莱维特成为了 SEC 的主席，此时玛丽·夏皮罗已经是 SEC 一个相当受尊敬的委员了。这样顺理成章的，当莱维特要我为 CFTC 的主席一职提名推荐一个候选人时，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她。莱维特当时不太赞成我的提名。他对我说“这问题对你来说意义重大，不能有失”。但是后来莱维特对这件事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起来。1994 年，在克林顿总统的任命下，夏皮罗正式成为了 CFTC 的主席。现在，她已经成为了 NASD（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监管主席。

就像在许多伟大的戏剧中一样，这次股灾也应该有一个收场白。在某种意义上，纽约股票交易所做了最后的发言。1987 年，大崩溃侵入到了美国市场的根基，这导致了在重大的规则变化和市场交易过程的重新调整。在这成为现实之前，纽约股票交易所试图通过举行一次讨论会使这些变化和调整合法化。为了更好地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期货交易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纽约股票交易所成立了市场波动和投资者信心研究调查小组。通用汽车公司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罗杰 B. 史密斯被纽约股票交易所理事会任命为调查小组的负责人。调查小组还包括 19 名独立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成员，他们分别代表了投资者团体、上市公司、成员公司、学术界和股票及期货交易所，总之就是一份美国公司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名人录。理论上，纽约股票交易所可以不在调查小组中安排来自期货市场的代表。但是一旦这样做了，纽交所就面临着这样的风险：调查报告中任何关于期货市场的批评和建议都会受到怀疑和奚落。所以，纽交所最后在调查小组中安排了两个来自期货市场的代表。他们分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默顿·米勒和戴尔舍投资公司的主席利奥·梅拉梅德。

在长达 5 个月的讨论中，调查小组主要关心市场波动的影响和对所有参与者来说保持一个有效市场的必要性。调查小组成员每个月定期会面，并且听取来自专业人员、政府和学术界的意见，回顾了 1987 年 10 月以来金融市场中发生的主要变化。

1990年5月24日，调查小组向纽交所理事会提交了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出了8条具体建议，这些建议覆盖了广泛的市场行为。如断路器的引入，要求SEC停止对公司股票回购能力的限制，通过媒体进行投资者教育以提高发现操纵市场行为的能力。

米勒教授和我在讨论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警惕，尽我们的一切努力保护了期交所的利益。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米勒教授的专业智慧，而米勒教授也对我泰然自若的演讲感到很满意。我们受到了来自于摩根士丹利、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的主席兼总裁詹姆士·克隆南以及其他一些代表的欢迎，他们给了我们出人意料的帮助。总的来说，我相信我们无论是在反击对我们不利的观点时表达出来的情绪，还是在措辞的分寸的把握上都获得了成功。然而，在调查过程的最后，两个有争议的建议遭到了米勒、克隆南和我的强烈反对。第一个建议是“美国权益和权益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机构应当合并为一个联邦政府机构”。第二个建议是“大部分调查组成员相信美国权益和权益衍生产品的保证金要求应当在统一政府机构的监管下由交易所来决定”。

这些建议是米勒和我永远无法接受的。一些调查组成员加入了我们，接着是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最后，默顿·米勒、我以及后来加入的詹姆士·克隆南告诉调查组负责人罗杰·史密斯：“除非最后的报告包含我们对前面这两条建议的保留意见，我们才能在上面签字。”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幕后讨论。罗杰·史密斯最后能有一份没有反对者的全体一致的报告，但是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不得不决定是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继续还是对我们的要求屈服。最后我们获得了胜利。

这样，在将近三年的痛苦、相互指责和反思之后，1987年的大股灾最后终于告一段落。它并没有产生我们曾经预期的结果。埃弗雷特·哈里斯曾经对我说过“把逆境当做良机的踏脚石”。实际上我们的确这样做了。股灾并没有成为灭亡我们的工具，反而成为了让我们的市场获得前所未有的信任度的垫脚石。误解让Merc走入了这个国家的聚光灯下。期货市场已经变得重要而有价值，它已经被看做是美国金融服务行业的一个平等的伙伴。它代表Merc历史上一个极富纪念意义的转折点。

在过去的这些年，也许有1000个教训可以总结。但对我而言，在所有这些教训中，没有一个比我在《弹性汇率论文集》所写的更有意义：“用有效的方法来拙劣地修补自由的市场力量，将会产生不合规律的经济环境，从而产生不合规律的经济后果。”这个简单的真理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贝里尔·斯普林克尔、默顿·米勒、艾伦·梅尔泽、马丁·费尔德斯坦以及从本书开头提到的许多其他人来说，是非常明显的。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33 章

联储又来了

芝加哥的冬天总是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感受过的西伯利亚的寒冷。这是 1989 年 1 月的冬天，猎猎寒风抽打着密歇根湖，空气寒冷刺骨，雪下得很大，冰雪迟迟不化，一片骚乱中的景象。

1 月 18 日，也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我到华盛顿参加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这天晚上，一场联邦传票的风暴袭击了 CME 和 CBOT 的 40 个期货交易商。这次事件是一场历时两年的调查的顶点。在这场调查中，4 个伪装成交易商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密携录音设备潜入这两个交易所的交易席位。这是有史以来对芝加哥市场进行打击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精心设计的秘密行动，旨在逮住那些据称是欺诈客户的交易商。

作为联邦政府的武器之一，联邦调查局（FBI）应用《欺诈影响和行贿受贿组织条例》（RICO）对交易商的借口进行探问并让交易商相互作证。RICO 法案是战争期间为了防止有组织的犯罪而设计的，用来查抄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房产、汽车、船只和其他财产。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交易商受到拘留，因而从技术上来说这些交易商并不需要聘请律师。政府发动的这次午夜袭击造成了恐惧和混乱。

这次 RICO 袭击似乎是过分地严厉了。《华尔街日报》在后来一篇批评这一行动的社论中指出：“无论指控的罪行是什么，这些调查手段违背了司法部门自己的准则，即禁止把 RICO 的威胁‘仅仅或甚至主要’用来创造一个可资讨价还价的工具。在这种环境下强制性的自我辩护产生了信任问题。”

袭击发生的当晚，芝加哥交易市场的领导层都还在华盛顿。和我在一起的有布罗斯基、桑德纳和 CME 新当选的主席约翰·盖尔德曼。CBOT 的汤姆·多诺万和卡斯坦·马尔曼当时也在华盛顿。直到很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场袭击很可能是计划好在芝加哥各交易所的高层领导都不在的时候才发动的。FBI 采用的策略加剧了我们会员的混乱。

当我和贝蒂正要穿上正式的礼服参加就职典礼的庆祝晚会时，宾馆中的电视转到了 CNN，在新闻广播员突然宣布发生在芝加哥的袭击时，我非常震惊。那位新闻广播员甚至宣称我、桑德纳和 CME 的其他一些官员都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这一明显的错误不仅使我盛怒，而且使我觉得整件事情完全是一个可笑的错误。CNN 后来收回了这一荒谬的断言并对我表示了歉意。

翌日清晨，《芝加哥论坛报》在头条新闻中以“美国政府对期货交易所进行调查”大标题宣布了这一事件。乍看确实让人觉得恐怖。许多交易商被指控参与了范围甚广的欺诈客户、操纵市场、欺诈以及涉及数百万美元的逃税——这都发生在有严重缺陷的交易监管系统的鼻子底下，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一报道的话。

近两年来，FBI 在 CME 和 CBOT 的交易大厅都使用了联邦密探，即所谓的双重间谍（FBI 对 CME 的调查代号为“篱笆修剪器行动”，对 CBOT 的调查代号为“酸麦芽汁”）。这些密探记录下待之如密友的交易商们在交易席位上、酒吧、餐馆、健身房甚至在家中的谈话。这是一次精心策划、花费巨大的侦探行动，是 FBI 历史上最为艰巨的金融秘密行动，当局说。

我刚刚从股市崩盘的压力下解脱出来，现在令人感到情绪激昂的争斗又开始了。我又想到了白氏综合征——我母亲对不祥的担心潜藏在每个角落。她是多么地正确。但是一开始，我对局势并不能彻底领悟。这次行动有点打击重大犯罪的意味，它针对的是犯罪集团、毒品卡特尔或是某种有组织的地下犯罪网络。对涉及数以百计的交易商的指控，即声称他们组成错综复杂的网络进行串通和欺诈的人人参与的犯罪狂欢，这真是个无耻蛮横的指责。我知道这样的立场有些离经叛道。

但是，媒体——还有司法局却非常兴奋。FBI 的夜间突袭，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是“先斩后奏”。而且好像在把事情搞清楚之前，我们还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侮辱。到 2 月份的头一个礼拜，《商业周刊》已经宣布了判决：“这些交易所将被迫改变它们神秘的有一个世纪之久的交易系统，许多投机交易商发现自己会被投进监狱。”

不用多久我就辨别出，是什么潜藏在这次布置周密的行动后面。FBI 对芝加哥期

货交易商的调查正值对华尔街内部交易的指控和定罪被公之于众引起轩然大波之时。纽约的美国联邦律师鲁道夫·朱利安尼——华尔街内部交易者的噩梦，从他对白领犯罪的攻击中攫取了相当多的政治油水。这件涉及数百万美元的丑闻动摇了纽约，使许多在购并交易中操纵目标公司股票的交易商被捕。首先落网的是丹尼斯·列文——德莱克塞尔·本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一个投资银行家，他已经认罪，承认在1986年通过内部交易获利。然后当局又使列文牵扯出伊万·波依斯基——一个华尔街的投机商，他被处以一亿美元罚金并被判处三年监禁。接着，波依斯基又帮助检方追查迈克尔·米尔肯，80年代德莱克塞尔公司的垃圾债券之王。1989年3月，米尔肯和他的两位同事被控以诸多诈骗罪项、证券欺诈以及其他一些罪名。德莱克塞尔·本汉姆·兰伯特公司为其证券欺诈和其他罪名支付了创纪录的6.5亿美元罚金，使具有152年历史的公司倒闭和蒙羞，这是华尔街历史上的最大失败。

逻辑非常简单。如果像那样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地下交易在纽约证券市场存在，那么在芝加哥期货市场至少存在同样金额的腐败。当然，结果并非如此，但这并不是因为司法局和FBI没有去进行一次学院般的尝试。芝加哥新闻界甚至开始将美国联邦律师安东·瓦鲁卡斯与他纽约的同行进行比较，该同行能够将公众关心程度这样高的案件变成政治通货并最终赢得了纽约市市长的位子。确实，司法局在先前包括华尔街内部交易丑闻的调查中所采用的手法，好像已经成为这次芝加哥秘密行动的蓝本。在调查中使用联邦密探以及配备隐藏录音设备的双重间谍，这与5年前FBI对芝加哥库克郡司法系统名为“灰色勋爵行动”的调查中所采用的手法如出一辙。在那个案子中，涉案人员被迫“递推”到，或说就是告发其他人以换取宽大处理。这使得许多法官、警务人员、律师以及法庭官员承认了在毒品案件中所犯下的从操纵交通罚单到贿赂法官的各种罪行。

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全国性的媒体都是毫不留情的，就像在股市崩盘时那样，Merc是以指控、谣言和含沙射影所组成的外壳示人的。一大群平面媒体和电视记者与摄像师跑来交易所。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期货市场根本就不熟悉。我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这些指控是没有根据、没有理由的”，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对手掌握了什么样的信息，这一直是我对指责所进行的断然否认中的一个障碍。毫无疑问，这是FBI战略的一个部分，即制造出一种恐惧，以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重大的东西，而实际上，他们所掌握的情况很少，他们只不过是在去钓鱼的郊游路途之上。但是一开始我们没有人清楚这些。那些含沙射影、那些头版大标题、还有夜间突袭战术使得每个人都失衡了。我坚持认为我们会员中的大多数是遵纪守法的，我不可能使自己相信在我们的交易大厅里已经发生了任何未经查明的重大犯罪。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表达我们的意思，以防万一有什么我们一无所知的定时炸弹在那儿。

为了使会员们的焦虑得到缓解，理事会于2月13日发布了一封信，做出声明，节录如下：

……在此关键时刻，非常肯定地澄清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作为一个机构，不是联邦调查的焦点所在，这是非常必要的。这从一开始就应该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严苛的媒体报道已经制造出一个充满混乱和错误信息的环境……造成的结果是，对期货业所造成的破坏可能会超过由于某些交易所会员对错误行为的最终披露所带来的益处……确实在单个的诉讼被提起之前——在任何人被交付审判之前，这种媒体的疯狂已经不公平地将怀疑施加到整个期货行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以及自律机制。这导致了 CFTC 重新被授权的推迟，并煽动了至少一次国会调查……

新闻界还在继续施以重锤。很快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开始嘎嘎作响了，就像曾经霸占市场、颇具传奇色彩的强盗地主的陈旧故事又被发掘出来，在附栏中加以强调以吸引人们拷贝并使读者想起了那些曾经栖息于交易席位的邪恶角色——好像他们仍旧在掌控着现在的交易文化。曾经爆出新闻的《芝加哥论坛报》，以追求普利策奖般的热忱，连续两周在头版对此进行演绎。这些头版的大标题使它成了比历史上最大的股灾还要大的新闻，比纽约内幕交易丑闻要大得多。每当传票发出的时候，记者们就会袭击华尔街，在电话中随机地采访交易商，这些交易商的名字是从报纸文章、企业名录以及其他一些资源上挑出来的。通过向新闻界透露一些必要的消息以保持故事的新鲜并在记者中制造某种巴甫洛夫反射，看来政府已经通过这种手段让新闻界发挥了它的长处。《芝加哥律师》1989年3月的一篇社论对这种情况做了总结：“《芝加哥论坛报》的电话和新闻共同制造出了恐慌和偏执的氛围，这可能是司法部消息透露者早已精确计算过的，以恐吓交易商们在调查中予以合作，这个策略在以前的秘密行动中就已经用过了。”

西北大学麦迪尔新闻学院的教授大卫 L. 普罗特斯指导他的学生对头 10 天的报道做了一个内容分析。他的观察报告对媒体进行了谴责：“刚开始政府（对新闻界的）消息透露很快变成了频繁误导、有时不准确的颇具侵犯性的新闻故事聚集成成的洪流。”

继之，在为《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所做的一篇文章中，普罗特斯对有关这次秘密行动的新闻报道总结道，“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没有哪项指控来源于有真名实姓的任何人……新闻报道中所含的几乎 2/3 的信息来源都出自匿名。”

CBOT 的汤姆·多诺万和卡斯坦·马尔曼给编辑去信控诉《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太阳报》的歪曲报道。他们在信中阐述道，“你们报纸连篇累牍的头版报道”，已经助长了“对期货行业中的个人、商业行为以及机构组织已经犯罪的臆测，而期货界仅仅是收到了一张传票被要求提供一些信息……这些新闻报道完全是基于来自无名消息源的非官方的、未加证实的指控”。

然而，媒体的闪电突袭正在造成损失。偏执多疑成了交易大厅日常例行事务的一部分。有关指控言论的谣传要么是 FBI，要么是逮捕令已签发，要么就是说某个交易商或职员佩着隐藏话筒，这样的谣言就像野火一样在交易大厅蔓延。市场中的谣言也成了交易商日常例行事务的一部分。市场中的流言蜚语或是断章取义的信息已是家常便饭了，交易商们也学会了如何应付这些谣传。通常在事实最终浮出水面后，这些谣言就会在交易日的进行过程中得到澄清。但是在这次的秘密行动中，没有人知道事实是什么。含沙射影和谣言都是建立在彼此之上的，终于变成了恐惧和混乱的巨大金字塔。没要多久，普通的交易商为了减轻一些恐惧之情，都会开玩笑说站在附近的小伙子或许就是密探或藏了隐藏话筒。关于 FBI 夜袭的栩栩如生的惊恐被新闻界广泛传播，使这些恐惧和交易所的焦虑又雪上加霜。在交易席位中到底有多少联邦密探呢？我们还可以信任谁？就像理事会的一个成员，英镑经纪商吉姆·奥利夫对我说道，“我好像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我已经不敢和任何人交谈了。谁知道那些联邦密探会从我说的话中挖掘出点什么。”奥利夫的话真是切中肯綮。由于其独特的规则和语言，期货的神秘世界中的一切对于搜索丑闻的外人看来都可能会显得有些可疑。吉姆·奥利夫后来成为了 Merc 的首任道德培训教师，对于会员来说，必要的课堂活动是秘密行动的一个积极成果。

FBI 连续不断的秘密行动看来是和媒体合作一起进行的，很难描述这次行动对一个人情绪上的冲击。接二连三不停歇的公众的指责是精确算计的，用来向每个人传递恐惧之情。它确实起作用了。在每个人都胆战心惊之后，1月25日，20个交易商被传唤至大陪审团前作证。他们中间有 CME 的日元交易委员会联合主席大卫·郝伯格，他通过我的公司——德尔舍投资公司进行交易清算。在此关头，根据曾会见过郝伯格的 Merc 律师杰里·萨尔兹曼向我提出的建议，我立刻与郝伯格断绝了清算关系。我已经开始向犯罪的指控屈服了。不幸的是，这些情况被《华尔街日报》利用了。郝伯格没有被指控犯有任何错误，他于3月中旬回到另一家公司重新进行交易。

现在我已取消了访问澳大利亚的计划，桑德纳和我本来计划于1月27日在悉尼期货交易所新楼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由布罗斯基代我成行。我总认为这些挫折是暂时的。但是现在的局势看架势得拖数月，甚至可能数年，考虑到将要面临更多的传票，然后是起诉、审判。又一次，我得让自己振作精神去面对那些批判者、揶揄者和期货市场的敌人。这恰恰是那种可以同时为我赢得坚定朋友和恶毒敌人的局势。这样，我又一次推迟了退休的考虑。在1987年的股灾中，我不止一次地考虑等到 Merc 恢复正轨后我就可以喘口气了。现在由于秘密行动的全力出击，我又一次地感受到了责任需要我留在舵手的位置上，尽我所能去克服困难并使 Merc 保持正常。但是私下里我发誓要在这次灾难结束后尽快离开 Merc 的官场。

媒体的进攻是永不疲倦的，在每个犄角旮旯里寻找污垢。很清楚，FBI 想找到一些 Merc 和 CBOT 大人物的蛛丝马迹，那将是给他们的大奖赏。毫无疑问，他们设想

就像在纽约内幕交易丑闻中那样，恶行的链条将逐级朝上并牵连到期货交易所的领导层。很容易理解一个官僚或调查者会怎样下结论，如果交易席位上的某个家伙赚了黑钱，那么他上面的人肯定赚得更多。确实如此，在秘密行动时期，为了努力获得些对 Merc 以前和现任领导层（也包括我）不利的东西，新闻报道充斥着含沙射影，致使谬种流传。

就像普罗特斯教授指出的那样，Merc 主席约翰·盖尔德曼成为“新闻过剩的第一个牺牲品”，我是另一个。1月19日晚间，有线新闻网报道有三家经纪公司已经收到了传票，一家是我的，还有一家盖尔德曼“拥有的”。然而事实上，没有什么传票发给任何一家公司，盖尔德曼在 CNN 声称他所拥有的那家公司也只有很少的一点权益。CNN 第二天晚上收回了这则新闻。

前主席拉里·罗森伯格则成了毫无信用的媒体先前关于其利益冲突的指责的错误的牺牲品。数月前，CNN 错误地报道罗森伯格已经接受了 Merc 的一家清算公司 LNS 金融公司的总裁职位，同时他又是 CME 商业行为委员会的主席，而此时该委员会正在举行关于那家公司官员因违反规程而遭到投诉的听证会。事实上，正如 Merc 的律师萨尔兹曼对 CNN 所说的，罗森伯格在收到这样的工作邀请时立即向 Merc 做了汇报，并自动脱离了商业行为听证会。罗森伯格的做法是值得推崇的。

与此类似，《芝加哥论坛报》和《华尔街日报》又开始传杰克·桑德纳，他在调查进行的那两年曾担任 CME 的主席。许多有关他和他的公司 RB&H 的负面消息开始出现在新闻界，使他那段时间非常糟糕，名声也不好，这些负面消息主要是关于他公司以前的销售程序。桑德纳试图为其行为进行辩护，但是却被引用为承认“事后看来，可能我们是做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CFTC 备受尊敬的前任副法律总顾问，后成为 CFTC 交易与市场部第一任总监，现任雷曼兄弟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首席法务官的托马斯·卢索被迫站出来说，在管理其聘用程序上“我认为这个行业做得还不够”。这构成了伤害，并且引起了对 Merc 监管其公司行为的能力的密切关注。

该问题的一个持续消息来源是关于桑德纳与某个所谓的经纪集团有财务上牵连的谣传与指责，该话题在 Merc 已经非常有争议。《芝加哥论坛报》以“经纪界是合法的，但可能导致滥用”为题刊登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报道。该报道引用了 Merc 合规部前官员约翰·特罗埃尔斯特拉普的话，“滥用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经纪商受到带他们入行的人的控制。”《华尔街日报》随后刊登报道指称桑德纳“从与 Merc 最有影响力的经纪商 ABS 合伙公司的特别亲密的关系中获利”。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成立的经纪人联合会是一个大厅经纪人组成的集团，它可以更好地为我们整个交易大厅的清算公司提供订单执行方面的服务。这样，经纪人集团就可以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并可以提供较不属于任何集团的“独立”经纪商更具竞争力的佣金费率。

许多会员的指责和意识是，经纪人集团采用了有问题的交易手段，并且由于它人

多势众，在桑德纳任主席期间对 Merc 事务施加了过多的不适当的影响力，经纪人集团尤其不受那些没有加入它的经纪人和交易商的欢迎。他们指责集团中的成员只与他们各自的组织进行交易，而不将他们的订单放在所有的交易席位进行交易，而这恰恰是 Merc 公开喊价的交易规则所要求的。

在那段充满谣言的日子里，我从没有遇见过桑德纳并给予他同情和支持。新闻界是不问青红皂白乱开枪的，就指望牵扯出一些大人物，对任何带有点丑闻意味的东西都大加抨击，这都是司法局引发出来的。我对这种策略拒绝信任，也不会向谣言和含沙射影低头。我的世界充满混乱，失去了平衡。FBI 的秘密行动以其巨大的力量给期货界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沉重的打击。交易量在有关调查的消息公布后那周下挫了近 25%。确实，FBI 的调查压倒了我们为来年所做的一切，就像前两年股灾那样。1987~1990 年间，Merc 估计花费了 5 000~10 000 个劳动小时以应付国会的听证会和联邦官员。

一开始，联邦律师安东·瓦鲁卡斯就很清楚，交易所、交易所的官员及其会员公司都没有牵扯进与联邦调查相关的任何不良行为。这是有利的，但是这也使交易所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很清楚，Merc 和 CBOT 除了在调查中尽力合作没有其他选择，但是这样做又会使我们的会员觉得我们在对付他们。这使我只能在勉强与当局合作与抵抗他们以保护会员之间走钢丝，我坚持认为会员们在指控中是无辜的。在此进程中，许多 Merc 的会员愤怒了，并且有时会指责交易所的领导层没有进行干脆坚决的抵抗。但是我们有责任站在法律和秩序一边，而且我们从不清楚联邦调查局手中掌握了什么。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不管会员们怎样阐释我的行动，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Merc 必须生存下去。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存在。虽然 Merc 在华盛顿的政治基础是坚实的，但是随着 CFTC 的重新开始监管以及 SEC 监管权的若隐若现，人们担心立法上的报复。现在我们自我管理的能力遭到质疑。在此关头，理事会同意不对任何事情进行隐瞒，加强监管措施以支持投资者的信心并保护我们执行法规的权利。

在杰里·拜尔监管期间，CME 从 1984~1988 年对违规的处罚纪录显示，我们的法规执行部在业务活动扩展时增加了执法和罚款。例如，在 1984 年，征收了总计 750 000 美元的罚款，1985 年为 1 499 000 美元，1986 年为 1 969 000 美元，1987 年为 3 517 000 美元（股灾那一年），1988 年为 1 762 000 美元。确实，与其他主要的期货交易场所相比，Merc 在法规执行上已经是最积极的了，美国总会计办公室（GAO）在 1989 年呈交给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但是，组织的完整性似乎仍然处于危险的边缘。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我就一直为之工作的一切在我眼前闪现。我变得有一点伤感，我感觉我又把那块老旧的大石块推上了山顶。FBI 的指控挑战了我的两个神圣信条：自律和公开喊价。虽然 CFTC 是期货行业的监管者，交易所还是处在了监管的第一线。但是现在联邦调查者们宣

称交易商们总是无视交易法规并且那些对《商品交易法案》的违反没有及时发现。

作为秘密行动首次爆发后我与亨利·贾勒基以及汤姆·卢索直接交谈的一个结果，我决定采用能最好地保护 Merc 的完整性与它的自律能力的战略。我带着这个想法去找布罗斯基和盖尔德曼。他们立刻就意识到其价值并全心全意地表示支持。“这将立刻给予我们可信度。”比尔·布罗斯基说。我们着手创建了交易操作审查特别委员会。于1月25日开始启动——FBI 秘密行动后仅仅一周，它成为众所周知的 Merc “蓝色绶带小组”，并被证明是一个卓越的防御策略，在很长一段时期，它维护了 Merc 的完整性。“蓝色绶带小组”的主意并不新鲜，在问题的解决需要组建一个“独立”的审查委员会时，这个概念经常被私营部门和政府的组织机构所采用。它的最著名的应用是为调查肯尼迪总统刺杀案而组建的沃伦委员会。

这种特别委员会的成功要诀在于它所任命的成员的可信赖程度是无可指责的。他们需要高度的诚实正直——非常干净，即使最为苛刻的媒体记者都不可能否认该小组的有益之处。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够，那么该小组的结论毫无疑义，这样的努力看上去就像是粉饰过错的一种尝试。同时，这种小组对所涉及问题要有高度的专业技能。对于期货市场这样的神秘世界，这一点尤为正确。

在与布罗斯基进行了会晤之后，我们可以规划好特别委员会的架构以达到恰到好处的好处平衡。对于提供 Merc 的内部专家，CME 主席约翰·盖尔德曼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在我心目中他的正直诚实从没有问题，他担任该小组主席；我将担任联合副主席并充任小组的执行总裁，而 CFTC 前主席苏珊·菲利普斯因为其期货专业才能和毋庸置疑的可信赖程度，担任我的联合副主席非常不错；比尔·布罗斯基作为 CME 的总裁自动成为小组的成员之一；Merc 的公共理事、全国牛农协会前主席唐纳德·巴特勒将代表农业利益；路易·马格里斯也是 Merc 任命的理事，当时正担任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执行总裁，他将代表金融市场；芝加哥公司总裁、CEO 约翰·温作为 SEC 的前法律顾问在我们这行受到高度尊敬，是担任全行业代表的绝佳人选；还有 NFA 的总裁、我们私有部门的监管者罗伯特·威尔毛斯，将担任小组的特别顾问。

到此为止，一切都还挺顺利，但是现在我遭遇了由两部分组成的窘境：一个是杰克·桑德纳，他正担任 CME 理事会的首席政策顾问，这是我在他主席任期满后为他特别设立的职位；另一个是前参议员托马斯 F. 伊格尔顿，他是 Merc 的列席公众理事。桑德纳来找我，恳求能进入该小组。他的理由很有道理，即如果我遗漏了他，他说，人们将要做出的明显的结论就是那些关于他的谣言、指责以及负面的媒体报道都是真的。由于布罗斯基和盖尔德曼都在特别委员会，所以桑德纳的缺席非常惹人注目。据他的观点，这将毁了他的事业前途。杰克的道理很有效，但这也恰恰是我对他的加盟存在疑问的症结所在。并不是说我不能信任他或从他的帮助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全世界的眼光都关注着我们和桑德纳身上的媒体阴云，我不想冒任何没有必要的风险，让某个人进入特别委员会而影响到委员会的可信度。我刚刚用

了 15 个月的时间力图重塑 Merc 在 1987 年股灾后的形象，将立法者和公众重新拉到我们这边来。在 CFTC 重掌监管权之时，不论对 Merc 还是整个期货行业，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 Merc 的“蓝色绶带小组”把历史纪录受到新闻界如此强烈质疑的某人包括进去，苛刻的媒体会怎么看呢？

然而，杰克和我一直都是并肩战斗的好朋友。他对我在 Merc 的举动一直都是支持的，并且在争斗中经常站在我这边。我永远都不可能背叛我的朋友。因此，我选择直面媒体的批评，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得知真相。

“好吧，杰克，直接跟我说吧，”我说。我喉咙很紧，不得不费力吞咽。“你和任何经纪集团有什么关系吗？我不得不做些了解，因为经纪商联合会与特别委员会将要审查的一个关键问题有关联，我不想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你在任何经纪集团有没有什么财务或其他利益，就像谣传说的那样？我需要知道，这样我就不会盲目。”

他直视着我发誓说他与任何经纪集团都没有什么关系。这对我就足够了。我把他安置在特别委员会，给予他面对批评时所需要的可信度，而我却可以感受到来自媒体的压力。

伊格尔顿参议员则是这个窘境的相反一面。他不想为特别委员会服务，但我想他加入以提高小组的可信度。当爆出 FBI 秘密行动的新闻时，伊格尔顿反映出很强的挫折感和尴尬。我真的不怪他。他作为一位美国前参议员，曾是民主党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提名人选，而他所担任公众董事的组织的会员却受到 FBI 和司法部对其进行各种可憎的违规交易的指控。他感到极度沮丧并且公开地这样说。所有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不要辞去 CME 的职位以示抗议以及不要要求联邦参议院和国际法庭的独立调查。他在特别委员会的存在可以明显地提高委员会的可信度。如果小组没有他，其价值将大打折扣，他可以扮演“要散架的大炮”^①的角色。很幸运，伊格尔顿信任我而且甚至可能有些喜欢我。在 1988 年 10 月 CME 的伦敦金融论坛上，伊格尔顿参议员向听众介绍我的时候这样说：“丘吉尔可能会引用迪斯雷利或休谟勋爵，约翰·肯尼迪可能会引用丁尼森，而利奥·梅拉梅德引用……利奥·梅拉梅德。但这没问题。你知道，利奥·梅拉梅德的聪明就连亨利·基辛格也认同。”

于是我使伊格尔顿参议员相信如果他参加我们的“蓝色绶带小组”，那就没有什么障碍了。“任何与交易大厅有关的做法都会摆到台面上来。”我对他说。我向他保证小组中的每个人都是无可指责的。他可以问任何他所挑选的问题，要求他所希望的任何人的出现，并且不用签署任何最终报告或建议书，除非他完全满意。

对于“蓝色绶带小组”的成立，汤姆·卢索称之为“一个重大的进步”。新闻界的许多人也这么认为，表示“这项举措将带来更为强健的市场”。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的公众正面的反应，这代表着负面评论和职责的风暴中也会有一个短暂的停歇。

① 指不听管束、随时会捅娄子的工作伙伴。

我一直觉得 CBOT 不建立一个类似的独立审查委员会是一个错误。

几周前，我们的内部调查涉及对合规体系的审查，就像会计公司做审计那样。小组安排3月中旬在芝加哥和纽约召开了一星期的会议。所召开的三个会议接受了超过40个专家证人的证词，并对这些证词进行质询，还为审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这是由上至下的审查，客户、来自期货佣金商的代表、法律界、各方面的用户、经纪人集团、学术界以及CME的场内经纪人和交易商都被问到了许多细节。

交易做法得到仔细审查，执行过程也得到彻底的检视。证人们得到鼓励对任何题目做出证词，但是也被特别要求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提供信息，比如，双重交易、经纪商联合会、客户要求担保价格的压力、市场的开盘与收盘、快速市场、电子监管；还有一些纪律方面的问题，包括委员会构成和最小惩罚的指导意见。除了证人们提供的口头和书面证词，委员会还受到了来自行内外其他专家的详尽的书面证词。简而言之，这是比任何交易所曾经进行的审查还要综合全面的对Merc的交易规则与交易做法的审查。

当然，进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伊格尔顿总是在Merc改革交易惯例的决心中寻找缺陷。当联邦律师瓦鲁卡斯因为司法部也在进行类似的调查而反对Merc对违规进行内部调查时，伊格尔顿认为他发现了这样的缺陷。而Merc的律师杰里·萨尔兹曼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CME无视它的联邦管辖者的要求不继续进行内部警戒和调查程序，那么CME将违反CFTC的法规。确实，萨尔兹曼是正确的，CFTC并没有取消这项要求。但是伊格尔顿本人，作为一名前联邦律师，也不信任CFTC，他认为萨尔兹曼的反应代表了Merc员工干涉司法部调查的一种阴险策略。这就导致了在一次小组会议期间萨尔兹曼和伊格尔顿之间令人尴尬的大声争吵，造成了他们俩之间长期的裂痕。这样的裂痕完全具有意味深长的后果。

与此同时，司法部的调查也如火如荼地继续展开着。早些日子的秘密行动对我们的会员所造成的几近惊恐的状态现在变成了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正常的交易对话维持在最低限度，取而代之的是面部表情。每个人都一丝不苟、逐字逐句地遵从法规中的每条交易规则。谣言萦绕不散，交易席位间弥漫着恐惧和不信任的空气。大厅中的谣言总是自发产生的，刺激了一些交易商，他们开始佩带翻领纽扣，用红色斜条纹指示麦克风，以使同事相信他们没有隐形话筒。更加增加焦虑因素的是，Merc从1983年1月1日到1987年1月18日的交易纪录都受到了传唤，呈交给当局的计算机打印稿总计约100箱。我们配合得很彻底。不过这对我来说，不过又是司法部的钓鱼郊游而已，他们的调查已经花费了数以百万纳税人的钞票，他们不能空手而归。

那段时间，我开始收到一些神秘恶毒的匿名信，这些信件指控我犯了一些秘密的罪行，并将很快公之于众。数月过去后，这些信件的密度和频率都增加了。“不久会员们就会得知你就是期货界的波依斯基。”一封信这样写道，并且发誓向CFTC告发一切。我非常正式地将这些诽谤通告了CFTC和Merc的律师。CFTC也确实收到了一

些关于我的诽谤之词，媒体同样如此。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最好还是忽略掉这些嘲弄和威胁，对他们只是耸耸肩，把他们看做是一些疯子的作品，要么是某个不满的会员，要么是某个发狂的人在受到媒体报道的鼓噪后做的傻事。这么些年来，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受到威胁或是这种匿名蠢信了——我都已经习惯了。但是现在这些威胁变得越来越具威胁性，我决定把它们交给调查者，看看他们是否可以找到出处。我归结了一堆可能性，没有什么是决定性的。但是有些可能性却又不祥的预兆。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它可能特地试图将调查针对某个特殊的人，或只不过是泛泛地想让调查偏离它的正常轨道。我的调查者也积累了许多来自会员以及律师的事实和陈述，这些人都对匿名威胁的来源提出了一些有限的观点。所有这些对我或是秘密行动的进程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在我从办公室退休后这些匿名信又神秘地销声匿迹了。

我对媒体的沮丧感由于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儿有所改观，我很清楚它的影响比那些负面的媒体突袭要深远得多。每天的好几个时段，无数的收音机听众都会听到 WMAQ 的首席新闻评论员艾伦·克雷恩说“现在是来自芝加哥交易所交易大厅的最新金融新闻”。我非常肯定，多少钱都无法为我买来那种象征意义，而且多少负面报道也不可能把它带走。这段插播开始于一年多前，那是 1988 年，当时 WMAQ 的电台总经理大卫·高德堡给我打电话讨论在芝加哥建立第二个全新闻电台的事。WMAQ 所属的 W 集团（西屋电气）有意成为 WBBN 的竞争对手，后者拥有芝加哥现在的全新闻电台哥伦比亚新闻网。WMAQ 想知道是否可能播报来自 CME 的新闻，他们想知道我的想法。“Merc 的交易大厅，”高德堡说，“将给这档节目增加特别的吸引力和真实性。”他解释他来找我的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创新者你肯定可以理解。”我只用了 10 秒钟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无论对 WMAQ 还是 CME。我挫败了来自一些理事会成员的反对意见，使他们批准花费 8 万美元在第四大厅用以观看交易大厅的顶层访问间里建立一个新闻播报室。这档从 1988 年 3 月开始播报来自 CME 的消息的节目一夜出名，现在成了芝加哥的频道中一个永久性的固定节目。一开始我甚至约见了 CME 东京办事处的 Hayami Shiraishi 和 Yumi Koyama，以直接从东京播报金融新闻。后来我确保艾伦·克雷恩在交易大厅安排的是一个永久性的播报室，这样它就可以直接在事件发生现场写一些报道。值得赞扬的是，在秘密行动期间克雷恩非常谨慎地避免让他的节目伤害 Merc 的形象。

大约在 4 月中旬，我们“蓝色绶带小组”递交了报告，这甚至连伊格勒顿参议员都大体上感到满意，虽然他还有些微词。在给我的一封贺信中，他写道，“这些建议和它之前的调查标志着商品期货自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特别委员会的研究比以往任何一个商品交易所做的都要更为积极与广泛。”

更为中肯的是《芝加哥论坛报》1989 年 4 月 26 日的社论。编辑进行明显地吹捧，第一次是在他们赞同特别委员会建立的时候，第二次，则是在他们赞同委员会

的建议书时。

利奥·梅拉梅德，芝加哥金融期货市场的建筑师，是自律制度直言不讳的拥护者，很容易看出这其中的原因。有梅拉梅德作为它的政策制定者，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一直就是在新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行业领导者，同时在政府强烈的干预下仍然保持了相当大的自由度。但是梅拉梅德很清楚，如果一个组织不能负责任地行动的话，自律是一项容易迅速失去的权利。面对日益增长的全球竞争以及政府对行业交易惯例的调查，他奋力抗争以保存这项权利。

在我们提议的牵涉面很广的改革之中，包括禁止在高流动性的合约月份进行双重交易、一系列与经纪集团相关的关键性限制、使 Merc 的 10 人监管小组人数翻倍、每半小时收拣一次交易卡、在 CME 所有主要的纪律委员会中任用非交易所会员。我们甚至一度走得更远，建议安装摄像头以监视被怀疑有不当行为的交易席位中的个人会员。

它们都是很有力的建议，它们也必须有力。就像《芝加哥论坛报》描述的那样，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律机制，我们也将失去硬币的另一面——创新。“我们输不起。”我想起了当时我对记者说的话。

对双重交易的禁止是特别委员会建议中最为关键的一项改革。它代表了背离期货市场传统准则的一场革命，传统上一名会员作为交易商为自己的账户交易并同时作为经纪商为客户进行交易一直就是合法的。确实这样的双重交易在世界上各个期货交易所都是非常普遍的惯例，在大多数证券交易所（仅适用于大厅的特定会员类别）以及整个货币市场也都是如此；这也是在大多数主要的证券经纪公司广泛存在的合法惯例。诚然，这种双重功能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邪恶之处，并且大家都赞同双重交易对市场的流动性很有好处。然而，双重交易，从它的定义上来说，就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并且它也为不道德的肮脏行为提供了机会。在期货交易席位喧闹的环境下，这种交易滥用的机会也会增加。造成的结果是，双重交易总是给我们的市场带来了不良的形象，它已经成为了那些没完没了的指责的源头，这些指责针对的往往就是导致滥用客户账户的交易惯例。根据我和所有其他委员会成员的观点，禁止双重交易的收益要比在市场流动性上的损失大得多。

在 1987 年，恰是股灾发生之前，我就鼓动 Merc 在限制双重交易上进行了首次尝试。四名会员提出的禁止标准普尔合约双重交易的正式请求开始了这次尝试，这四名会员是：比尔·谢帕德、埃德·查利普、克利夫·卡布莫托和乔·斯坦德。他们和许多其他会员都担心备受指责的双重交易滥用会危及到 Merc 神圣的指数期货。他们的请求催生了所谓的“顶级台阶法规”，该法规限制 S&P 交易席位的顶级台阶仅供

大厅经纪商使用，并且禁止所有的顶层经纪商交易他们自己的账户。该法规影响到约90%的S&P公众业务，并对纠正吃点和其他一些遭受指责的交易滥用很有帮助。至今，这项法规仍然具有效力并且一直是期货行业的典范。

在交易大厅双重交易禁止法规实施之前，理事会首先成立了一个双重交易委员会，该委员会由IMM的首脑史蒂夫·瓦勒克领导，此人后来成为Merc理事长的有力竞争者。该委员会召开了交易大厅听证会并最终签署了“蓝色绶带小组”建议书。在随后的投票中，Merc的大多数会员对双重交易禁止法规投了赞成票。Merc直到今天都是唯一一家执行如此禁止法规的期货交易所。

特别委员会关于经纪商集团的建议也代表着激进的改革。委员会试图在经纪商联合会的建设性价值和他们潜在的滥用和过度影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最具影响力的建议有：禁止经纪商联合会的成员与同一联合会的其他成员进行他们个人账户的交易；对经纪商联合会的成员于同一联合会的其他经纪商交易客户合约设置25%的限制；以及对所有经纪商联合会建立登记制度以确定其成员资格。

正是最后那条法规导致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在经纪商集团登记过程中，桑德纳正式告知Merc，他在ABS合伙经纪商联合会拥有财务利益。这意味着在桑德纳为交易惯例审查特别委员会服务的同时还与经纪商集团存在关系——这与他上任之前向我做的承诺正相反。他这么做，已经使“蓝色绶带小组”的可信度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虽然他本人并没有违规行为，但是违背我的信任并置交易所于险地。我发火了。

一天下午，我们在CME中心南座19楼将RB&H与德尔舍办公区分开的电梯井旁相遇。我们都声嘶力竭。我咆哮着推开他。他跟在我后面进入我的办公室对我道歉。他非常抱歉，他说，使得整个进程面临危险但他非常担心职业前途。他说他应该什么事都交代在前，但是他没做到。

我降了降火。如果让此事公之于众就会重新点燃政府调查的火焰。更为重要的是，有可能会损害特别委员会已经做出的非常积极的成果。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在范围如此之广的举措方面提出建议的期货交易所。我认为保护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比考虑桑德纳的轻率鲁莽要好得多。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逃过新闻界的眼睛。1989年10月2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约翰·F·桑德纳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最活跃的经纪商集团那儿拿到了投资收益，而同时他为之服务的‘蓝色绶带’小组今年正在召集开会以提出将会影响到Merc大厅经纪商集团的法规修改方面的建议。”该报道补充道：“桑德纳先生的投资与他在特别小组所充任角色的明显冲突可能会激起争议。”我不得不挡开铺天盖地的媒体批评。

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伊格尔顿参议员对期货行业又开始变得清醒起来。改革的进程没能像伊格尔顿想的那样迅速和顺利。7月，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正在进行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你是真正地——有时甚至是勇敢地——竭尽全力领导在交易

规则和自律制度方面的建设性改革……但是你的队伍，总体上说，不想要任何改革。”接着，他又展示了任参议员时就著称的精致幽默，说，“利奥，你比卡斯特将军的情况更糟。他至少还有一些队伍和一堆同情他的历史学家。”他取笑了我一回，但是不用说，我对他的多愁善感是不赞同的。

整个1989年，我和盖尔德曼、布罗斯基、多诺万以及马尔曼花了无数时间向华盛顿的立法者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律会起作用，与此同时，联邦的调查开始了早就许诺要进行的起诉浪潮。8个月里，FBI发出了500多张传票，进行了500多次谈话，还审查了超过100万份档案。后来证明，这是对纳税人钞票的巨大浪费。

在晴朗闷热的8月2日，新闻媒体泰然自若地来到埃弗雷特·德克森联邦大楼，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幢大楼是以一个期货交易所的朋友的名字命名的，首轮指控于下午两点正式宣布：46人——其中45人为交易商、1人为交易商的职员，被控总计608条罪名，指控他们在CME和CBOT的非法交易行为。其中有CME的21名日元交易商和3名瑞士法郎交易商，CBOT的19名大豆交易商和3名债券交易商。其中18人被控违反RICO或RICO的串谋违反条例，处罚包括20年以上的监禁、罚没交易席位以及任何其他可能来自非法交易的财产。

瓦鲁卡斯非常尽责地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这其中包括来自日本、法国、英国与加拿大的记者，他说，“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数以百计的客户和数以千计的交易。我们不谈技术违规，可以将其描述成范围非常广的活动。”然而，《纽约时报》第二天报道说，“许多接受采访的经纪商和交易商说，他们认为这次起诉查明了一些腐败的个人，对任一行业的严格审查都可以揭露出相当程度的腐败问题。”经过长达两年、涉及CME和CBOT的6000多名经纪商和交易商的严格调查，46人被瓦鲁卡斯查出参与了“对客户订单上的客户资金进行系统性的盗窃”。

由于瓦鲁卡斯的老板、司法部长理查德·桑伯的出现，这次指控显得更加严重。他与FBI局长威廉·塞辛斯以及CFTC主席温迪·格拉姆一同从华盛顿赶到芝加哥，这宣告了这两年的调查达到了顶点。那是毫不掩饰的公众争夺战。在他对新闻界的评论中，桑伯强调这次指控既不会牵连到两家交易所也不会牵连到经纪公司。“这次调查是司法部对白领犯罪进行广泛打击的一部分，这次调查涵盖了华尔街、拉萨尔大街、中央大街以及所有中间的地方，”他说，“发生在这些世界上同类型中最大交易所中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考虑到媒体给指控赋予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的宣布所带来的公开效应，Merc的形象可能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为了将损害程度降低到最小，第二天，也就是8月3日，Merc在理事会的会议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用拳头不断地敲打着桌子，用拖长的声调说，“我们将让任何敢于违反这个交易所规章制度的人感受到对上帝的恐惧。”虽然我的声明语气如此强烈主要是做个姿态，但我的意思在那，我们准备对它进行支持。我一心一意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捍卫Merc的未来。

伊格尔顿又一次开始发起攻击。这一次是关于 GNP，前 CME 主席布莱恩 P. 莫尼森的清算公司，被 CFTC 指责监管不力，因为它的两个销售人员被指控违反客户交易法规。CFTC 终于发现了他们能够插进手的与 Merc 前任大人物有关的东西，他们肯定要穷追不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指控的违规与大厅交易做法没有关联，与秘密行动也毫不相干。让伊格尔顿爆发的原因是他得知 Merc 批准杰里·萨尔兹曼个人被莫尼森聘为辩护律师。伊格尔顿跳了起来。他公开宣称这是“最后一击”；他辞去了 Merc 的公众理事，并不断地表示“自律不过是芝加哥的海市蜃楼”，而 CFTC 则是“沉睡的侏儒”。

我对此事件当然非常沮丧和遗憾。伊格尔顿和我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布莱恩·莫尼森与我的私交非常好，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他曾一度在克莱顿·约特任 CME 总裁的时期担任过 Merc 的主席，当他要求我在他即将举行的 CFTC 听证会上充当其人格名誉见证人时，我爽快地答应了。虽然 Merc 中有些会员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我作为 CME 的官员却接受这样的邀请，我甚至不假思索就对这些批评置若罔闻。友谊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但是出乎每个人的意料，美国农业部部长克莱顿·约特也接受了莫尼森的请求。这对于洞察一个人的人格力量真是难得的机会。

以我的观点，个人的人格和精神价值在压力之下可以得到最好的检验与证明。当某人成功时，与其交朋友是很容易的，但是当情况变得很糟时却更能显现出来。正如亨利·贾勒基后来对我说的，“*Amicus certus in re incerta scernitur.*”（患难见知己）。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更加体现了这一点。约特收到一封信，来自两位很有权势的联邦参议员 J. 詹姆士·埃克森和 J. 罗伯特·凯利，这封信对他的决定进行了强烈的批评。没有绕圈子，两位参议员直接说约特代表朋友作证与他农业部部长的政府职位是冲突的。这是体现精神上坚韧不拔的最好范例，克莱顿·约特丝毫不曾退缩。在他给参议员们的回应中，约特简洁地说：“生命如此短暂，我们不可能回避或忽略我们对同仁的责任。如果这与我农业部部长的职位冲突，那么在我逃避作为一个人的责任之前，我愿意放弃这个职位。”

值得赞扬的是，《芝加哥论坛报》刊发了一篇社论做了正确的导向。“在这样的会议中为以前的朋友作证在其他行业中是一直会发生的事。而伊格尔顿从 1987 年开始就一直是其公众理事，不管怎样他说过要干到年底的。”在后来给克莱顿·约特的一封信中，我对他说，即使我们的人格证明对会议的最终结果没有什么帮助（对 GNP 和莫尼森的惩罚是很严厉的），他为布莱恩·莫尼森案子的出庭对美国行政体系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这使他比我们的会员要高出一大截。

CFTC 正值重新得到监管授权之时，除了表示强硬它没有别的选择。为了证明他们没有特别针对芝加哥，5 月份 CFTC 和联邦检察院曼哈顿分院在联邦邮政调查服务局的协助下，在对交易行为的刑事和民事调查中向一些纽约的交易商和四家纽约的期货交易所发出了传票。

虽然对纽约的调查与芝加哥的调查没有关联，但却给在负面公众舆论中踉踉跄跄的行业又一重击。甚至连 CFTC 重新授权议案的提出者——佛蒙特州的民主党人帕特里克·利海参议员都开始感到担忧了，他是我和亨利·贾勒基的好朋友，也充分认识到了期货市场的重要性。他告诉新闻界他把对纽约的调查看做一个信号，表明“对大厅交易行为的关注不仅限于芝加哥，而是整个行业”。私下里，利海参议员、亨利·贾勒基和我都对这次调查对我们行业可能造成破坏感到非常悲伤。

1989 年 10 月中旬，这两家芝加哥的交易所又来到华盛顿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对意图结束公开喊价交易的尚未通过的法案进行申辩。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艾伦·迪克森和保罗·西蒙都为 Merc 和 CBOT 做了特别演讲。这样的立法，他们说，将削弱芝加哥和该州最为重要的行业。通过引用 1987 年发表在《芝加哥商业俱乐部》上的一份研究，他们表示我们的两家期货交易所以及 CBOE 和芝加哥证券交易所，对于伊利诺伊州来说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可能更有意义的帮助来自鲁迪 E. 伯希维茨参议员，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人，他是参议院中来自私有部门的代表，是公开和竞争市场的直言不讳的拥护者。

当然，如果用股市作为指示器的话，丑闻对投资者的态度的冲击并不大。在纽约的丹尼斯·列文、伊万·波依斯基和一帮出色的银行家与经纪商被认定与内幕交易密谋有关之后，市场只是轻轻地消化了这些负面影响并在 1989 年 8 月 24 日又创出了新高。类似的反应好像在芝加哥也有可能。巴里·林德的公司，后来成为全国最大的折扣期货公司的林德—华尔多克公司，在 1989 年 4 月做了一个投资者信心调查。问卷被送到 4 353 名个人投资者手中，得到了 1 142 份反馈（26%）。只有 12 份反馈问卷表示他们受到政府调查的影响而停止交易，将近 70% 的反馈问卷相信交易所交易席位的运作高效和诚实。

1989 年 4 月 23 日，一个 CME 的会员资格售价高达 55.4 万美元，创了历史新高。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34 章

永别了，武器

即使是秘密行动的极度破坏，生活仍然继续向前。光阴荏苒，CME 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芝加哥，而是借 GLOBEX 的飞毯遍布全世界。我鼓励每个人跟上形势。“那些忽视科技进程的人很快就要成为历史了，”我忠告说，“GLOBEX 将给世界提供像期货本身一样广泛深远的交易能力。”

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就能意识到这点。两年前，当 Merc 的 GLOBEX 刚刚开始采用时，它至少还不能激起沿街的 CBOT 的热情。我们反而被贴上离经叛道者的标签，背离了无比神圣的公开喊价的概念。要不是 24 小时电子交易系统的想法如此显然的正确，要不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期货界都如此断然为 GLOBEX 欢呼，CBOT 可能还是故步自封。但当一切都已经说了做了，CBOT 不得不承认真理，也很清楚他们得做些什么。就像 CBOT 主席马尔曼所说的，“如果你自己没有氢弹，你就不能抵御原子战争。”于是他就转身弄了块制图板，搞出个 Aurora——GLOBEX 的替代电子交易系统。他声称，Aurora 会更好，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电子系统，不属于路透社，而且可以精确地复制交易席位。接下来就是 CME 和 CBOT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竞争。又一次，毫

不停留地，两家交易所都花费巨资改进它们各自的电子系统。两家交易所都意识到，赌注就是期货的未来。

那时，我已经说服了 Merc 理事会，将 GLOBEX 的概念转形成一个全球系统、一种期货市场的公用事业，这样我们就可以邀请世界上其他主要的交易所加入我们的系统。正如我看到的那样，每个交易所都希望他们的产品是全球化、全时段的，并且需要一个盘后电子系统去实现它。路透社当然对这个主意欣然接受。我们设计了一个精密的 GLOBEX 架构，包括形成一个单独的理事会；我担任其过渡时期的主席，我们还向其他交易所作展示以使他们加入我们的系统。CBOT 也打出同样的牌，声称它的系统可以做得更好也更便宜。竞争开始了，我们争相追逐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交易所。我们还雇了专业的公共关系公司进行这场战斗。斗争在 1989 年 3 月博卡莱顿的 FIA 年会上达到了高潮，当时 CME 和 CBOT 都向座无虚席的听众对它们的电子系统做了高科技展示。这是期货行业展示的表演——行业巨人的战争。

但是我们赢了。我们的战略包括表明我们最先提出这个概念，其在努力背后有我全力支持的个人信任，它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后市交易系统，而且还有路透社这个名字所提供的可信度。它证明是各个因素不可战胜的组合。杰克·桑德纳和我迅速组成 GLOBEX 两人销售小组，与众多美国和国外的交易所进行接洽，对它们来说，这个概念有巨大的吸引力。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之间竞争的转折点是在博卡莱顿宣布法国期货交易所（MATIF）已经加入了 GLOBEX。就像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往往是性格的融洽使事情有所不同。MATIF 的主席杰拉德·法华德是一个非常聪明博学的巴黎人，从我们初次见面开始，就建立了牢不可破的相互尊重、友谊与和谐的关系。他与我一样充满热情地支持期货与期权的全球后市交易系统的构想。那不仅符合他自己对明天世界的想象，也为他提供了他认为对他的交易所是必需的技术能力。法华德清楚在他的争夺欧洲期货市场主导权的战斗中——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的 LIFFE 已经领先了一步——GLOBEX 将起到关键的作用。MATIF 直到今天还是 GLOBEX 最强有力的使用者和拥护者。它有利的决定使 Merc 在与 CBOT 的竞争中略胜一筹。但最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仿效当时坚冰正在消融的“冷战”，并开始了一个我们自己的“glasnost”（公开、公平）时代。

在我心中，CME 和 CBOT 之间的斗争毫无意义，是对金钱的巨大浪费。CBOT 已经花费了 2 500 万美元用以开发 Aurora，据我的信息，它们的费用还在逐步上升。相比之下，CME 仅仅花了数百万美元用于管理费用。我们与路透社已经达成协议，他们将建立该系统不管花费多少。这就为 CME 会员带来无与伦比的好处，因为据说最终 GLOBEX 系统花费了路透社约一亿美元。我们一开始就制定好了计划，巴里·林德、布莱恩·莫尼森和我一直就此讨论不休——关键就在于 CBOT。这是理由充分、逻辑清楚的战略：在 GLOBEX 成功地吸引了一两个其他期货交易所加入之后，在 CBOT 开发 Aurora 的费用高得难以承受之后，它们会意识到与我们的系统进行合作的

价值。一旦我们与 CBOT 达成协议，我们就可以坐等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了。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交易所共享同一个全球电子后市系统所产生的吸引力最终将会成为对世界上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的——其他交易所的不可抵挡的巨大磁石，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统一全球系统的魅力和成本上的高效性太明显了，都无须争论。迟早，我们甚至可以将 GLOBEX 扩展到股票期权交易，当然最重要的，芝加哥将进一步确立其期货市场首都的地位。达成这个目标的首要因素就是将 CBOT 和 CME 整合到同一个系统之中。我的逻辑主要是，我们的竞争范围应该是全球而不仅限于美国，所以没有理由在两家芝加哥的交易所之间进行竞争。

由于 MATIF 成为了合作伙伴，我想这时候走出与 CBOT 和解的第一步真是再理想不过了。在这个自然界所有精确的事物中，我清楚时机与事物的本质一样重要。我与路透社的官员以及 CME 主席约翰·盖尔德曼详细地讨论这个战略，约翰·盖尔德曼与我的目标完全一致，但不相信我能够说服 CBOT。不过，他也同意做一下尝试，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因为根据预定的行程他就要离开了，我们同意一开始让杰克·桑德纳参加进来。然后我就打电话给 CBOT 的汤姆·多诺万，并约定他和他们的主席卡斯坦·马尔曼与桑德纳及我本人进行非正式的会谈。为了不惊动新闻界，会谈安排在我的公司——德尔舍投资公司的会议室进行。我们四人会谈了近一个小时。关键要素在于我们的邀请是要建立一个联合系统，在该系统内，两家交易所是平等的合作伙伴。我很清楚 CBOT 的自豪感以及它的金融期货交易量与 CME 不相上下的事实，这些使我们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建立在平等的条件之上。这次会谈达成了一个初步的谅解，还需我们各自理事会的批准，会谈结果是我们将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探寻将我们不同的电子系统统一起来的可能性。它代表了期货史上另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两个芝加哥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如此激进的概念上走到一起的可能性是“非常巨大的”，约翰·盖尔德曼私下里对我说。当然，我们的谅解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握手，真正的协议要等到两年之后了。

这成了我们的第一要务，使其他所有的谈判协商都暂停了，也压倒了我们所有其他的职责。我主持了总计达一年时间以及两个交易所的特别代表小组之间的一半协商。这段经历可以与哈特·斐尔德和麦考伊之间的和平使命相比了，不同的是我们成功了。在我多年的好朋友威廉·奥康纳开始执掌 CBOT 的主席之后，我们的协商开始驶上快车道。奥康纳的全球视角及对科技的信赖与我如出一辙。在此进程的早期，我们就一致认为，GLOBEX 将是一个比我们两家交易所都存在得久的实体。然而，成堆的技术问题，系统的具体规格，它的升级和优先权以及结构上的考虑，即由 CME 和 CBOT 共同拥有由路透社操作的统一的 GLOBEX 将怎样发挥功能、怎样运作，诸如以上的这些问题十分庞杂。这就需要曾经设计出最初系统的路透社的约翰·赫尔和大卫·西尔弗曼加入协商过程。在我们这边，我十分依赖领导我们技术委员会的斯科特·戈顿和巴里·林德的建议，我曾经提名进入委员会的比尔·谢帕德对我来说

也很重要。CBOT 也有他们自己经验丰富的代表，但它最强的建议者是伯特·古特曼，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他强烈要求路透社尽可能地向我们提供最好的系统。

有些人认为 CBOT 在玩弄马基雅弗利式的权谋术拖延时间，这样就可以使 GLOBEX 受挫。我从不相信这些说法。与之相反，我看到的是汤姆·多诺万和比尔·奥康纳总是奋力向前，尽可能地协助我就各项事务达成妥协。虽然整个过程比我预想的要长得多，但却达成了巨大的成果：在 CME、CBOT、MATIF 和路透社之间达成了一项长期协议。1987 年，最初的 GLOBEX 的诞生是个历史性的时刻。现在我们又一次改变了期货市场的历史进程。GLOBEX 公司成立了，我被选为首任主席，默顿·米勒和贝里尔·斯普林克尔担任它的公众理事。对期货界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而对我、汤姆·多诺万和其他一些人来说，GLOBEX 的运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两家交易所的共同目标似乎已经诞生了。

确实，它是时代的一个标志。在华盛顿，CME 和 CBOT 曾经为了我们以及整个期货行业的利益而并肩战斗；FBI 秘密行动和我们各自的交易商接受审判的阴云笼罩之时，我们在一起；若干年前在技术阵线，我们曾经共同承担开发计算机交易结构重组的任务；而在近来的联合行动中，我们曾经创造了 AUDIT，即手控电子交易卡的自动数据输入终端系统。两家交易所甚至同意开始讨论建立一个统一的清算系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安全的清算组织。“Glasnost”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

到 1990 年前期，我感到有些筋疲力尽，但还以身体为赌注。我已经领导了 Merc 金融期货合约的开发，将其地位上升至与 CBOT 平起平坐，将其国际化，而且近来又度过了 1987 年股灾的关键时期、FBI 秘密行动、GLOBEX 的引入。退休的想法又一次地浮上我的脑海，我开始认真考虑它的可能性。在任何一个组织服务 1/4 个世纪都可以称之为毕生的工作。而且我仍然年轻，充满活力，可以去做长期以来我一直忽视的事情，或许可以把我小小的德尔舍公司建成世界级的金融期货与期权机构，或许重新开始把精力集中在交易上，或许去旅行，与我的孩子们一起做些事情，和我的孙子们一起玩耍，或许写更多的书（我已经开始撰写《第 10 颗行星》的续篇，名为《表亲》），不管我做什么，我都很清楚我对我的其他一些追求都永远不会厌倦，但是我不知道我要用多久才可以正式脱离这个组织，而它已经像我的家人一样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我和家人与朋友慎重考虑了数月之后，我做了一个不可更改的决定。1989 年 12 月，我辞去了全国期货协会的主席职务，这是一个我完全松懈的明显标志。但是我从 Merc 退休的声明会让许多人措手不及。我小心翼翼地准备秘密宣布，一同进行准备的有艾利桑·波斯纳，他准备好上千份传真预备同时发出去。1990 年 3 月 5 日，在 Merc 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我宣布了这项决定：在年底退休。接下来是一个特别新闻发布会，由芝加哥所有的商业媒体公司参加。“在每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做个改变的时刻到了，”在一封寄给

会员的对我的正式宣布做出安排的信中,我这样写道,“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领导位置上待了23年之后,那样的时刻来到了。”

我的退休恰逢全球形势发生前所未料的巨大变化之时。在非常短暂的几年跨度里,地球上的那些居民有幸能亲临20世纪的尾声,享有亲眼目睹这个时代最重大事件的特权,这些事件足以与人类历史上任何值得庆祝的里程碑比肩:德国的重新统一,冷战的结束,还有种族隔离的终结。

这是民主和自由多么伟大的胜利——它是温斯顿·丘吉尔、安德烈·萨哈罗夫里奇·瓦文萨还有纳尔逊·曼德拉的纪念碑。这是市场经济秩序多么光辉的胜利——它是对托马斯·杰弗逊、亚当·斯密还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崇高祭奠。这是多么非凡神圣的时刻。

并不是说世界从此就没有战争和暴政了。乌托邦恐怕还没有降临。确实,海湾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清楚地提醒,我母亲的白氏综合征仍旧在那待得好好的。

但是对于我的父亲来说,那却代表着最后的帷幕。他似乎一直等到了他所鄙视的暴政时代最后遗迹的彻底瓦解。这个暴政时代的遗迹曾经加入与光辉的犹太语及其文化的决裂,曾充当毁灭犹太文明的帮凶,并将他和他的家人置于犹太人流离失所的行列。1990年10月14日,在健康不断恶化两年之后,艾萨克·莫伊舍·梅拉姆多维奇与世长辞了。对我来说,这就像第二次崩溃。而在我的孩子的生命中,这是第一次崩溃,艾戴尔、乔丹还有大卫,他们和他们的祖父都是极度亲近的。他的灌输使他们对于犹太语和人类平等具有同样深的感悟。

葬礼上人多得无立锥之地,芝加哥仅存的犹太文化界人士来致以他们最后的敬意。Merc和CBOT的许多期货市场的代表也来了。斯波特斯学院的纳桑尼尔·斯坦普法教授主持仪式。由于我父亲的要求,他的主持脱离了传统标准。我用犹太语诵读了一首卡尔曼·里斯的诗,名为《一棵巨大的橡树倒下了》,它表达了我的父亲在犹太文化森林中的成就,还有他的离去让周遭树木所感到的空寂。艾戴尔和戴维做了让人心痛的回忆,乔丹向墓地献了一束花。作为悼词的一部分,我父亲的朋友、抒情歌剧宣传家卡尼·纽曼宣布我父亲为芝加哥犹太文化最后的支柱之一。1990年10月31日,芝加哥城市议会做出一项正式决议,纪念伊萨克·梅拉梅德对这座城市犹太社区的贡献。

3年后,也就是1993年2月20日,我母亲,查·菲格尔·梅拉梅多维奇·内·巴拉金也追随她深爱的丈夫而去。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与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还有她的孙子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给予他们温暖、理解和悉心关怀这些她与生俱来的特质。我的孩子、贝蒂和我为她举行了一个类似于我的父亲的葬礼。乔丹献上了一首他写的诗,名为《鲍比教会我们飞翔》。确实,一个时代过去了。

或许是命运使然,为了纪念我父亲的逝世,而邀请我回到世界的一处,我们全家就来自那个地方。根据苏联政府的邀请,1990年10月的最后一周,我同意率领由

Merc 和 CBOT 的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去莫斯科。我们将与莫斯科城、莫斯科商品交易所以及苏联签署一份商品市场合作协议。来自 Merc 的有我和我们的主席约翰·盖尔德曼及其夫人简，还有比尔和琼·布罗斯基。来自 CBOT 的是主席威廉·奥康纳及其未婚妻玛丽·简·卡伦斯，还有 CBOT 总裁汤姆·多诺万及其夫人维塔。

我回到了莫斯科，这座城市在 50 年前我逃离的时候曾经是如此至关重要。那时我是乘火车从它的后门溜走的；而现在我乘着流线型的喷气式飞机从前门进来了。这个莫斯科与我小时候经历的那个已经大不相同了，但是物质上看它还是那个样。曾经唤起我知觉的少年时代的光泽现在则被阴郁的空气所取代。虽然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仍然掌握着权力，但是我们来时已可以听到振奋人心的改革像野火一样在世界的这个角落蔓延。

作为挽救苏联的一个尝试，戈尔巴乔夫总统拾起了市场经济的信条，他完全清楚需要大力进行市场改革，将国有企业转移到私人手中。早先，他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着手建立一个生机盎然的国内市场……在这方面首先建立商品交易所然后建立证券交易所是必须的。”

克格勃也不得不摆脱孤立，我们正式的官方向导可以证明，“还有谁比克格勃更了解莫斯科。”舍吉说。舍吉是分配给我个人的向导，一个机智灵敏、眼睛深蓝、举止僵硬的人。“我也了解纽约，”他吐露秘密，“我在联合国执行过 21 次任务。”

苏联的市场只有现金拍卖，或者是包括一些建材、计算机和其他消费品的物品交换市场。我被授予在莫斯科商品交易所正式开市时敲响开市钟的荣誉。第一笔交易是：一百万根万宝路香烟与一台个人电脑的交换。

然后我们去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部长利奥尼德 I. 阿巴尔金谈了一个小时。要成为一个现代经济国家，阿巴尔金同意，苏联必须将它的卢布变成可兑换货币。据我观察，这不会太快实现。在我们对著名景点的参观访问中，我感受到了空气中的绝望。每到一处我都可以看到从苹果到伏特加等各种消费品的严重短缺。我与之交谈的每个人都显得忧虑、激愤和沮丧。“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我们薪水。”这一句很有名的俗话贴切地描绘了当时苏联的经济秩序。城市基础设施也让一些东西成为奢望，这是我事先就知道的。在克里姆林宫这个一肩挑起半个世界达 70 年之久的超级大国的神经中心，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用一下电话。我想在 CME 的股指期货席位下一个订单。这将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私有者从克里姆林宫内进行纯粹资本主义的交易。但是没能成功。阿巴尔金道歉说，即使是从克里姆林宫，与芝加哥的电话联系也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要不是情况这么糟，那就滑稽了。阿巴尔金同志建议我把电话拿在手中拍张照，假装完成了一次交易。我解释说，假装的话，就会违反 CFTC 的法规。

不管怎么说，我可能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1990 年 11 月 1 日，作为主题演说者，我在克里姆林宫向 500 多名客人发表了激情洋溢的市场经济的演说，这些人都是

来听芝加哥的自由市场主义者的讲话的。让我高兴的是，在接下来回答提问时，我被问道 GLOBEX 多快可以在苏联运行。

但是我的莫斯科之行的重点发生在我们此次访问最后一夜的告别晚会上。我们作为苏联的客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有来自苏联与 CFTC 和 SEC 类似部门的 40 多个官员。在那个寒冷的 11 月的夜晚，我们在共产党的专有俱乐部，和著名的“作家联合会”聚在一起。外面下着小雪，宴会大厅里巨大明亮的火堆噼啪作响，正是约翰·勒卡尔的《俄国房子》中所描写的景象，“黑色的木材，华丽的食物，有礼貌的仆人，一派富丽堂皇的会所氛围。”

那晚兴致很高，伏特加推杯换盏。对于俄罗斯人的每次祝酒，习俗要求我们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也要回应。舍吉解释说，苏联人的祝酒辞，就是任何蹦到脑子里的东西。我担心我们这边可能会跟不上他们的节奏。幸运的是，对一些禁酒主义者还有百事可乐提供。在他们的祝酒辞中（由舍吉向我翻译），苏联人说的故事有关他们的童年、他们的祖母、他们的生活哲学等。后来，当比尔·奥康纳回敬一个苏联人的祝酒时，他的咆哮声震得宴会大厅的门铰链嘎嘎作响，我想我们麻烦了。多诺万和我交换了一下眼神——是该走的时候了。

我向舍吉寻求建议。他说，只要我要求最后的祝酒，晚会就可以结束。于是我起身享受这一荣誉。现在为止，屋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个人背景以及我从莫斯科逃往自由世界的逃跑路线。舍吉站在我身边翻译。

“正如房间里的每个人所知道的，”我举起酒杯说，“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曾在莫斯科，恰好 50 年之前。”每个人都举起了酒杯并赞同地点头。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我就暗暗地发誓，50 年后我一定要回来——现在我在这儿了。”苏联人鼓掌。

“而今晚，”我继续道，“我又发了另一个誓——再过 50 年不要再回来。”

这句话使房间内气氛骤降。俄罗斯人，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他们愤世嫉俗的程度足以使他们理解我这句祝酒辞的含义。

在我就要离开，我们站在飞机场时，舍吉向我要一本《第 10 颗行星》作为酬劳他的告别礼物。我有点吃惊他竟然知道这本书，我向他保证在我返回芝加哥后一定立即寄给他一本。

“不需要等，”他笑着指指我的行李，“你箱子里就有一本。”他是对的。我都忘了，确实，我箱子里就有一本《第 10 颗行星》。我想，一旦做过克格勃，永远都是克格勃。

按预定行程，我离开莫斯科去巴黎与贝蒂会合，我们将作为 MATIF 主席法华德的客人访问巴黎。那儿，我在埃科理工学院校友会上发表演讲，该校是法华德的母校，或许是全法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我们的巴黎之行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去拜访一下也是比亚里斯托克人的国际知名律师塞缪尔·匹撒及其夫人朱迪思。匹撒的生

活经历与我相似，然而不像我——匹撒没有逃脱纳粹的奴役。不过，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16岁就开始了艰难的人生跋涉并最终赢得了世界的名誉与欢呼。在他著名的自传《血与希望》中，他承认就像我、我的父亲，还有许多其他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一样，他最初是拒绝回到那些地方去的，在这些地方，正如他说的：“我看见我的世界、我的人们、我的家庭、我的校友、我的身份都被系统地毁灭了，而我本人仅仅是作为苏联的俘虏和第三帝国的劣等人种侥幸逃脱了肉体上的消灭。”这也正是多年来当我建议回波兰朝圣时，我父亲的伤感所在。他断然拒绝，说没有什么值得他回去的。那确实是令人痛苦的事实。但是就像所有的幸存者一样，塞缪尔·匹撒和我在共同的传统和历史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在巴黎的非正式讲话是我为随后一周在伦敦举行的 Merc 第六届年度论坛上的正式演说所做的排练。面对来自欧洲各国超过 300 名的行内人士，我对苏联做了非常悲观的评价。这不啻一记重击，以使对莫斯科新近出现的改革兴高采烈的世界猛醒。

“说这个国家破产是对绝望的现实局势的曲解。”我在伦敦和巴黎都对听众这样说，他们渴望知道多快他们就可以去苏联新经济体制中投资了。

计划经济和中央控制使得一些人习惯于服从、消极的工作。数十年的中央计划，数十年对国家的依赖，已经消磨了一些苏联人身上的斗志。如果让普通的工人在自由市场和有保障的薪水之间作选择的话，他可能会选择保障。因此，那必然是个痛苦的缓慢的进程，恐怕它要数代人的时间。在情况好转之前，恐怕会变得更糟。

但是在美国，还有芝加哥，情况却在好转。1991 年 1 月，无论是“沙漠风暴”还是“篱笆修剪器”、“酸麦芽汁”都传来好消息。在中东，美国和联合国同盟运用一系列绝对高科技的快速火力在 100 个小时里击溃了伊拉克，挫败了萨达姆·侯赛因。在芝加哥，联邦陪审团为 FBI 秘密行动所制造的期货市场的黑暗篇章画上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句号。CME 和 CBOT 约有 6 000 名会员，在两年前被起诉的 48 人中，36 人被证实或承认有罪，但多数只是轻微地违规，10 人需要就原来的指控进行重审，2 人被宣告无罪。就这样了。在 CBOT，不管联邦的所有指控有多少，只有 10 名大豆交易商被证实通过违法交易欺诈客户。在 CME，在 12 名日元交易商的案件中，陪审团于 3 月 13 日裁决没有任何罪行。陪审团就超过 100 条的商品、邮件、电报欺诈罪名进行投票裁决无罪。其中 2 名日元交易商摆脱所有指控，陪审团没能对另外 10 名交易商的 80 条罪名达成裁决。法官被迫宣布审判无效。先前在 3 名 Merc 的瑞士法郎交易商案件中，1 名交易商被证实犯有 20 项罪名，成为另一个被判有罪的人，其中 1/3 的罪名被判违反了商品交易法。

最终，所有联邦当局和媒体所暗示的在期货交易中的那些骗局，都板上钉钉被证明是虚伪空洞和无耻透顶的。在秘密行动浮出水面 18 个月后，最初爆出消息和报道最苛刻刺耳的《芝加哥论坛报》总结说：“……这次耗资数百万美元的联邦调查几乎不能做到开出它的花费清单，联合陪审团的结果可能会使其他交易商对合作不再那么渴望。”

但是在审判结束很早之前，全世界就已经裁定芝加哥的交易所是值得信赖的市场。Merc 交易量的节节攀升证明我们为世界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地重要，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经济上的价值。虽然司法部对交易大厅交易行为的调查给期货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刺激了制订更为严格的交易法规和执行条例，但是 CME 和 CBOT 的完整性自始至终就不存在任何问题。

当我离开 Merc 舵手的位置时，我非常满意。无需多言，我 20 多年来的历程摆在那儿。作为最后的贡献，通过把 GLOBEX 放在它的门槛上，我想我已经为 Merc 的会员们在迈入 21 世纪之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我的管理下，没人能够不公正地对待 Merc 的成长。在我 1969 年初次担任主席的时候，年度交易量徘徊在 380 万张合约；而在 1990 年年底，Merc 创出 1 亿张合约的高度。另一个衡量标准是会员资格价值的显著上升。或许布莱恩·莫尼森的夸张说法最好地表现了这一点，“利奥·梅拉梅德，”他说，“一手制造了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多的百万富翁。”这不是一手操纵风险极大的赌博的结果，但是确实，1972 年时的 Merc 会员，还有最初 IMM 的购买者以及其他早期的会员，他们在会员资格上的投资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事实上，到我退休的时候，可以计算出，1969 年的一个最初的 Merc 会员资格（当时值 100 000 美元）的累计价值将达到 150 万美元——如果将每年的 IMM 分红与其他席位红利的现值计算出来的话。

赞誉接踵而至。理事会给予我名誉主席的称号，由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捐赠的芝加哥大学的席位被冠名为“利奥·梅拉梅德席位”，并且还有欢送会。我的朋友汤姆·迪特默为在我家里召开了一场奢华的告别晚会，每张桌子上都摆放了一本《第 10 颗行星》。宾客们被要求对我在这个行业的服务贡献他们的一些看法。有许多令人刺激的评论值得回味。例如，克莱顿·约特说：“没有其他任何人从期货行业的领导位置上离去会留下如此巨大的壕沟需要去填。”这样的评论让人动容。

我把领导者的火炬交给了多年来的朋友与同事杰克·桑德纳。他雄辩的言词特别值得注意，尤其是考虑到了我离去之后不可预料的转折。杰克写道：

对于这个世界，你已经给出了你自己的思想，就像牛顿、伽利略、哥白尼、欧几里得以及其他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与开创者在你之前做的那样。你的思想，最终会像他们的那样，已经并将要孕育出对世界产生不可估量影响的许多其他思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因为你，我们

将目睹国际间交易的萌芽、时区界限的消失，还有那些或大或小的国家间合作的繁荣兴旺。至关重要的是，世界将会因为你、你的思想、你不屈不挠的精神、你不断的先见之明还有你永不疲惫的热情，而变得更加美好。

CME 将其年度会员晚宴舞会改成了退休欢送晚会，于 1991 年 1 月 26 日在芝加哥丽晶酒店的大宴会厅举行。这是由多年来曾经帮助我达成我的目标的家人、朋友以及同事组成的某种形式的“这就是你的生活”的乐章尾声。它吸引了美国和国际金融界的许多名人。

在近 2 000 位盛装出席的宾客中有国内外政要，市州一级的官员，学术界、商业界和工业界的高层代表，市民领袖以及期货行业及其清算会员公司的官员。前农业部部长、现任共和党主席克莱顿·约特也在其中，还有 CFTC 主席温迪·格拉姆。多年来，格拉姆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将我们俩拉得很近。确实，参议员菲尔·格拉姆于 1992 年 5 月 5 日，将我在东京做的题为“保护主义：市场灾难的根源”的演讲收录到了《国会议事录》之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默顿·米勒也到场并发表引人注目的谈话。理查德·戴利市长和他的父亲都是我的朋友，他也来到会场并宣布他已发表声明把 1991 年 1 月 26 日定名为“芝加哥梅拉梅德日”。每个主要的国外期货市场都派来了代表：巴黎是杰拉德·法华德；伦敦是大卫·伯顿；新加坡是伊丽莎白·沈和汪瑞典；澳大利亚则是莱斯利·郝斯金。我的老朋友，Merc 前总裁 E. B. 哈里斯和贝弗利·斯普雷恩也来了。来自美国市场的是不久将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主席的迪克·格拉索以及成为 CFTC 下一任主席的玛丽·夏皮罗。我最大的欣慰是我的母亲就在那里亲眼见到她移民过来的孩子得到众人的称赞，她的孩子现在已经获得了成功。比尔·布罗斯基担任仪式的主持人，杰克·桑德纳领导众人向我祝酒并称我为他的“朋友和导师”。

晚会还包括一个让人心情愉快的视频剪辑，是关于我在 Merc 职业生涯中进进出出交易席位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在那天晚上所有的发言者中，巴里·林德在对视频放映进行介绍时，捕捉到了 1954 年我作为一个稚嫩的跑单员初次来 Merc 时身上那种充满干劲的精神。

“还记得朱迪·加兰德和米基·鲁尼的那些老电影吗？”林德说，“刚刚他们还坐在印第安纳州的谷堆旁说‘我们表演个节目吧’，然后 10 分钟内，戏就在百老汇开幕了。那真是非常有趣但确实难以置信。好吧，想象一下利奥在景况不佳的黄油和鸡蛋交易所走来走去，告诉那些刚刚发现冻猪腹肉就是咸猪肉的家伙，总有一天我们经过千锤百炼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和金融产品交易所的一员。刚刚还难以置信，可是他一来就做到了。”

巴里说到点子上了，他从个人经历就可以了解这些。多年来，在我代表 Merc

时，他一直与我同一个战壕，是可信赖的人之一。那天晚上我走了，在心中我知道，在追寻目标的过程中我确实与众不同。《芝加哥论坛报》1990年3月23日的告别社论标题是，“利奥·梅拉梅德，金融期货之父。”通过把我的成就与一些伟大的美国企业家相比，它给了我最高的评价：“有些人可能会说把梅拉梅德称为金融奇才和预言家还为时过早，但毫无疑问他使自己声名远播，而它为它下赌注的就是芝加哥。”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35 章

斗 争

在我退休后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第一次交谈中，这个伟人就试图给我忠告。“你不会喜欢你走后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他说，“你是一个创造者；那是你的使命；但那不是他们的动力。”

起初，我只能猜测弗里德曼的意思。当然，我知道那会需要一些时间，我不再牵涉进去。毕竟，Merc 有身体和灵魂。我也意识到我不会总是同意 Merc，但是，我仍然发誓不成为放马后炮的人（在我离开一周年的时候，我确实还发给理事会一封信祝贺他们出色的工作）。虽然我的年龄还远没有到真正退休的状态，我还是准备依照我名誉主席的新称号，担当行业的高级领导的角色。我希望由杰克·桑德纳任主席的 Merc 层能够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威望，我不想妨碍他们。如果他们犯了错误，我发誓他们得自己承担。但愿，不会发生什么重大问题。另外，作为名誉主席，我还是会提一些建议。虽然我不再参加理事会的会议了，但是这不会改变我在接到邀请的时候就想回来的积极性。桑德纳担任主席后说得非常简略，他告诉记者，“我一直将利奥看做导师、先生和卓越的战略家，我不采纳他所倡导的许多政策和方针将是非

常愚蠢的；我如果不定期访问他，向他汇报我的想法，那也是非常愚蠢的。”是的，听上去很不错，但是过了一阵子，我明白弗里德曼的预言应验了。

有很多事可以让我忙不过来。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已经和我签约，要将我在CME任职20年来做的演讲结集出版。艾利桑·波斯纳和我专心致志地为1993年要出版的《梅拉梅德论市场》一书做准备。另外，我的大量时间都用来准备将我的公司戴尔舍投资公司和金融巨头樱花银行合并，组建一家新的全球性的期货公司——樱花戴尔舍有限公司。

同时，我还沉浸于完全不同的、我认为非常神圣的奋力尝试之中。在我父亲去世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一名理事会成员本杰明·米德，向我灌输了一个让我无法休息下来的想法：“为了表示对你父亲回忆的敬意，你应该参与到纪念馆的事务中来……作为一名幸存者，你欠这笔债。”他的话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立即着手这项任务。1992年，布什总统提名我进入理事会。我很快就成了它的执行理事会的成员，全身心地投身于相关的工作。纪念馆一开放，芝加哥市长戴利和我就率领由1000多名芝加哥知名人士组成的一支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参加一个纪念大会，并参观这个纪念馆。

没用多久我就意识到建立该大屠杀纪念馆的一个最为首要的目标还尚未实现。埃利·韦塞尔在担任卡特总统的委员会主席时，曾有一个神圣的目标，也正是这个目标催生了全国大屠杀纪念理事会，这个目标是在纪念馆内设立一个永久性的良知委员会。不幸的是，12年前，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尝试与政治纠缠在了一起以致失败。现在它成了我的使命，于是我正式地重新引入这个概念。其构想是大屠杀纪念馆必须运用其有力的声音“使国民的良知保持警醒，影响政策制定者，并激励全球范围的行动去对抗和制止种族屠杀或对人类的各种犯罪”。通过大声反对潜在的屠杀，我们将确保大屠杀中的牺牲者不会白死。接下来一年，我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主席迈尔斯·勒曼、理事会副主席鲁思·蒙代尔、曾带头进行了最初努力的前美国国会议员海曼·博克宾德还有其他一些理事会成员团结和谐地一起工作以实现我们的目标。1995年6月14日，良知委员会成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常设机构。

然而，我生活中的主旋律还是围着市场转，我退休后的第一年在高调中结束了。1991年12月11日的早晨，乔治·布什总统访问了CBOT和Merc的交易大厅。在面对数百名Merc交易商和芝加哥的知名商人的演讲中，他把我挑出来，把我称做“期货行业的巴比·鲁思”。

他前一次对CME的访问还是1979年作为国会议员的时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宣布了对Merc和CBOT的战争，也正是他的管理推动了对我们市场更为严厉的监管。而现在他来了，手中握着橄榄枝，总统大选就要来临了。《芝加哥太阳报》做了这样的总结：“在FBI渗透进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消息曝光近三年之后，布什花了一个上午称赞这两家交易所，并宣称‘芝

加哥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国家对未来最大的希望’。”

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出现是对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投的信任票。“Merc 已经成为了未来的领导者，因为它永远不会丧失它的创立者的创造精神，”布什说道，“当你开创通过交易信托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你藐视那些灾难预言家。是你建立了第一个金融期货市场和第一个国际货币市场。你放眼国际市场，并在大多数交易所还在考虑建立国内分支机构之前就建立了海外办事处。你还在十年前创立了欧洲美元期货——我知道你们昨天刚刚庆祝了它的十周年纪念，你应该为这种世界领导力感到非常、非常自豪……”

随后，总统邀请我、桑德纳、布罗斯基还有其他人和他一道去比利山羊酒馆吃奶酪三明治，这是一家位于下密歇根大街的酒馆，是芝加哥的新闻记者经常去的地方。饭后，布什用丢硬币来决定谁付账，在所有这些风险接受者中扔硬币，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要的是正面，却投了个背面。但是餐馆老板坚持要把账单拿走。

但是我大部分的努力都花在了担任 GLOBEX 的主席上了，为 CME、CBOT 和路透社之间的这个重大任务添上最后的一些细节。对于我来说，GLOBEX 代表了未来的市场，不管需要 10 年还是 50 年才能到那个地步，也不管它是叫 GLOBEX、GLOBEX 的孙子还是其他什么名字。这个电子系统是对未来完美的对冲。要么公开喊价永远长盛不衰，要么它将与电子后市交易结合起来，要么某天它会被自动系统完全取代。不管发生哪种情况，GLOBEX 都可以确保由期货交易所代表的特许权仍然安全地保留在芝加哥交易所的会员手中。

1992 年 6 月 25 日，GLOBEX 终于启动了。在制作上花了 5 年时间，迟了太多。确实，它已经错过了两年的最佳“时机”。到现在，世界上的每个交易所都可以夸耀某种形式的电子交易，要么是它们的全部的交易环境，要么就是对它们的公开喊价时段的补充。从概念提出时的第一变成了实际实施的最后，GLOBEX 已经丧失了许多魅力，并将进行一场争夺制高点的战斗以证明它的优点。

但 GLOBEX 仍然是唯一的全球交易系统，其他所有的都不过是名誉上的地区网络。它的前景不会因为它具体实施的耽搁而变得有些暗淡。我可以自豪地肯定，通过输入以 80 美分购买 10 日元的一个“高速列车”指令，我做了 GLOBEX 第一笔交易。诺贝尔奖得主默顿·米勒也来确认他在 CME 大厅举行的开市庆典的嘉宾名单之中。“IMM 开市的时候，我不在那儿，因此错过了金融期货的启动，”米勒向我吐露说，“所以我一定要确信，电子交易开始启动的时候我得在那儿。”

它的启动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但是对 GLOBEX 不满的种子已经种下，不是因为它技术上的能力或实施的推迟，而是因为一项关于其治理结构的修改。在两年前的详细讨论中，其治理结构已为相关各方所同意，并将成立一个 GLOBEX 联合企业（JV）董事会，其中各有七名来自 CME 和 CBOT 的代表，两名来自 FIA 的代表；我被当选任期两年的主席，CBOT 将在随后的两年里以轮换的方式获得主席的位子。所有

有关 GLOBEX 的决定都将由 JV 管理董事会做出。我们为新的时代做好了准备。

在成为 CME 的主席后，出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杰克·桑德纳突然对 GLOBEX 的治理有做些改变的想法。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忠告开始应验了。Merc 主席要求所有 JV 管理董事会做出的决定在实施前必须经过各自交易所理事会的批准。桑德纳说这样做代表了 Merc 理事会的意图，要对 GLOBEX 的决策保持它的控制权——这是站不住脚的借口。首先 JV 的代表都是由 CME 和 CBOT 理事会选出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各自交易所的理事；他们依照各自交易所主席的意愿服务于 JV。所以，他们的行动在实际上总是受到交易所理事会的控制的，因而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控制。

表面上，这是一个完全无害的修订。例如，《芝加哥论坛报》就仅仅把它看做是一个关于“权力与金钱，更不用说名望”的问题。但是他们忽略的一点是，这是一个关系到 GLOBEX 切实命运的问题，那可能会实际上削弱盘后系统的潜力。对于我来说，桑德纳这么做的原因非常明显：那意味着确保了他个人在控制 GLOBEX 的命运时的有利地位。虽然我可以理解其纯粹政治角度的动机，但是它破坏了 GLOBEX 系统的功能性。

不难理解我的预见。GLOBEX，《芝加哥论坛报》恰如其分地形容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网络，一些人甚至将它的复杂性和太空舱相比”，现在这个系统不得不在管理层的不断插手下争取成功甚至仅仅只是生存。GLOBEX 的运行将是不可能的事——其全球化实施的过程中要做的难以计数的决策，它与世界各交易所不断进行的谈判，还有它的全时段运行——如果在采取任何行动前都不得不得到 CME 和 CBOT 的理事会的批准的话。JV 董事会将被迫纠缠于高度技术性的事务中去，那有时需要无数时间的专家解释，然后又是 JV 董事会成员无数时间的讨论。这样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专业技巧又如何向交易所的理事会进行传递以获得批准呢？现实地说，考虑到交易所的理事会在每天的运行当中，其日程表上有许多其他要优先处理的事务，它们又能多及时地处理相关事务呢？

毫无疑问，这项修订代表了繁琐和低效的程序，它损害了 JV 董事会的权力。但是更坏的是，它给了 CME 和 CBOT 的主席（虽然比尔·奥康纳从未寻求这种权力）对 GLOBEX 命运确实的专裁权。随着这项程序的改变，他俩中任意一人，都可以对通过拖延或不及及时地将其提交董事会来阻碍任何他们个人不赞成的 JV 决定；或者他们在董事会做陈述时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对任何问题的事实交易歪曲；或者他们可以运用任何一种战术来引导董事会根据他们的喜好来作决定。简而言之，修订的程序是失败的药方。

随后，在不止一个场合，汤姆·多诺万向我承认让桑德纳侥幸成功地进行这些修订是 CBOT 犯的一个可怕的错误。但是那时已经太迟了。事态正朝我认为的那个方向发展。在现实意义上，那项修订改变了芝加哥市场的历史进程。从规则改变的那一

刻起，我就私下里决定在完成我所承担的最初一些关键性职责后，尽快从 GLOBEX 主席的职位上离开。我当然意识到了，这恰恰是桑德纳早就希望的，因为我的离去，他将根据分配给 CME 的平衡条款而获得主席的位子。但是我对这个职位所代表的名誉和薪水却不感兴趣（辞职后我将失去每年 200 000 美元的主席薪金），我拒绝成为由于治理结构的变化而可能带来的悲剧的一部分。

于是，在接下来的数月中，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扑到了我相信对 GLOBEX 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事务中去了，即它真正的启动、与路透社的合约，还有日本政府对 GLOBEX 的批准。对于最后一项任务，很多人都打赌不可能做到。日本不准备批准 GLOBEX 的显示屏将会在他们境内给予的那种形式的交易自由，但是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下我做到了。帮助首先来自国内金融事务部副部长小大卫 W. 穆林斯。我说服他 GLOBEX 是一个最好地代表了美国金融服务部门利益的交易机制。于是，他把 GLOBEX 放到美国财政部与日本进行的正式讨论的议程之中。帮助还来自我的好朋友 Makoto Utsumi，他是日本大藏相的特别顾问。

我已经将 GLOBEX 带到了三大洲和三个时区，我准备在我来到这个办公室的第一年年末卸任。许多人试图劝阻我。其中有帕特·亚柏，他从 1993 年年初就担任 CBOT 的主席。亚柏作为我的朋友可以追溯到早年 IMM 的时候。他也是 CME—CBOT 联合企业的热心支持者，并全身心投入到了它的实施当中。事实上，亚柏与具有共同目标的时代完全同步，他想把我和他的前任比尔·奥康纳已经开始的，关于我们两家交易所的清算设施合并的讨论继续下去。

同样的，汤姆·多诺万也勇敢地试图改变我的想法。多诺万向我袒露，如果没有我的存在，CBOT 与 CME 之间的相处——不论是关于 GLOBEX 还是其他方面，将会变得非常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你已经在我们的董事会和会员中赢得了其他任何人都不曾拥有的信任。”他对我说。我尊重他的观点，还有来自两家交易所的一些官员的类似观点，包括来自我的好朋友 FIA 总裁约翰·丹姆嘉德以及路透社常驻 GLOBEX 代表罗莎琳·威尔顿的个人呼吁。但是我的决定是最终决定。我只不过是不愿领导一个这样的企业，它的程序设置正在欺骗我们两个交易所的会员，这是我不可能支持的。1993 年 5 月 31 日，我从 GLOBEX 的第一任主席位置上卸任了。

没过多久，我最坏的担心开始变成现实。就像多诺万预测得那样，CBOT 和 CME 之间开始出现争吵。刚开始都是为了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哪个交易所交易量更大，哪个交易所更聪明。两个交易所都在它们的建筑物上挂上绶带以宣称其支配地位。在外部世界看来，这些幼稚可笑的举动使两家交易所都显得不怎么地。接着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了。通向联合清算系统之路被遗弃了，而这实际上是我们两家清算会员的一致目标——它成了芝加哥两家交易所领导层之间关系恶化的牺牲品。然后，形势每况愈下。GLOBEX 成了政治皮球。应该与路透社续签的 GLOBEX 协议陷入了僵局。Merc 和 CBOT 在三四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没有一家交易所准备让步。两家交易所

之间的信任已经因为严厉刻薄的行动与言辞而受到了伤害，甚至到了公开相互揭短的地步。最难处理的问题是有关 CBOT 一个理论上的权利，当 Merc 正在与 SIMEX 建立双边冲销系统的时候，CBOT 也在与另外一家交易所做同样的尝试。但是，Merc 拒绝给予 CBOT 这项权利。对我来说，它的象征意义要多于实际考虑。在 CME - SIMEX 联系建立起来后，新的双边冲销系统没有发挥什么新的功能，把这事再做一遍就很有疑问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对系统没有什么重要性。然而，两家交易所的破裂已经不可避免了，GLOBEX 很清楚将成为输家。如果 Merc 不肯让步，CBOT 像它威胁的那样离开 GLOBEX，我们前几年做的宏伟设计就将分崩离析。随之而来的就是 GLOBEX 不可衡量的逐渐缩水。我试图在当时任 CBOT 理事的亨利·贾勒基的协助下与路透社一起从幕后干预，但是完全不起作用。我尝试与所有相关首脑单独交谈，但是什么也没谈成。虽然我没有免除 CBOT 在这次争吵中所应受到的责备，但是我认为，症结在于 CME 主席确实不在乎 CBOT 是否会离开。最终，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CBOT 正式宣布脱离与 CME 之间建立的 GLOBEX 联合企业。

作为最后的努力，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我决定将此事公之于众。我将诉诸我们的最高法院：CME 和 CBOT 的会员。1994 年 4 月 22 日，我写了一篇针对所有会员的公开社论，刊发在《芝加哥论坛报》上。

随即，桑德纳和布罗斯基就要求与我再次会面。会议在布罗斯基的办公室进行，言辞与气氛都非常激烈。我将我的社论读给他们听，他们非常强硬地表示我不应该公开发表。“这会加重公众的混乱，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已经很混乱了。”布罗斯基说。我们达成妥协。我打电话给《论坛》，要求永久地撤销这篇稿子。结果是，我的这篇稿子再也没有刊发出来。作为回报，他们同意我出席 CME 的理事会为了与 CBOT 达成谅解做最后的呼吁。

我就去这么做了。我说了一个多小时。我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我的看法，并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需要解决。我用了许多我写在社论里的话。

没有什么令人舒服的话去赞扬它。最近两个交易所在 GLOBEX 上合作的崩溃不仅对系统本身是一个损害，而且对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会员、整个会员制体系以及路透社都造成了损害。甚至，它代表了芝加哥城的难以置信的损失，因为在确保芝加哥作为全球期货市场首都以及风险中心的道路上，GLOBEX 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这是两个芝加哥交易所历时十年的计划、创新以及梦想的成果。它的结果使芝加哥成为世界上所有其他城市羡慕的对象，被每个金融中心所复制和仿效。危及这个荣誉是愚蠢荒唐的。另外，具有共同目标的时代也已经实质上受到了这场争吵的影响。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会感受到其负面的结果，所有这些只会使我们的竞争者得益。

然后有提问也有讨论。但是基本上，大多数理事会成员都觉得 CBOT 才是主犯，Merc 已经做了所有它应该做的。事实上，一名官员蒂姆·兰克福特建议，我应该到

CBOT 去做同样的呼吁。我同意这么做但还是让与会者感到沮丧。

一周之后，我确实出现在了 CBOT。但是太晚了，已经于事无补。关系的破裂改变了 GLOBEX 的吸引力。正如我以前所担心的，在 CBOT 宣布脱离 GLOBEX 之后数天，LIFFE 告知 Merc 它也决定放弃加入 GLOBEX 系统。这样，CBOT 就没理由重新考虑它的决定了。破裂是彻底的。唉，早就料到了。正如我早先所预料的那样，CBOT 最终开发了它自己的电子系统 Project A，并开始与 LIFFE 进行认真的讨论，以在这两个交易所之间建立一个交易兼容系统。最终它们达成了协议。由桑德纳治理修订所播下的种子，终于结出了我所担心的果实。

尽管如此，我仍然忠实于 GLOBEX。长期地看，我依旧十分乐观。虽然它已经受到了伤害，它的潜力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挥出来，但是我坚信 GLOBEX 代表了明天市场运作的方向。对于 CME 的未来，它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在尽了全力之后，我又一次回到我其他的事务上去，几乎彻底地从 CME 的事务中抽身出来。确实，我发誓不再涉足 CME 的事务，除非十万火急，要么 CME 的领导层向我提出特别的要求。我和 Merc 主席之间的争吵，我非常清楚那不可能再发生。

但是在 1994 年秋天，Merc 中悄悄酝酿的一种事态使我最后不得不正视它，即由杰克·桑德纳提倡并且得到理事会支持的一个计划，旨在要求 CME 和 IMM 的合并，这个计划表面上是使得金融期货合约交易商享有和交易所完全会员同样的投票权。换句话说，就是撤销在 CME、IMM 和 IOM 之间比例为 6-2-1 的投票权重。我从来就吃不准这项提案的真实动机。看上去，它非常正确。毕竟，金融期货占了 CME 交易量的 95%，但是金融产品的交易商只有 CME 完全会员的 1/3 的投票权利。这些完全会员主要是农产品交易商。根据这项计划，交易所将一次性支付 60 000 美元到 80 000 美元以补偿每一名完全会员。这项支付大约可以代表一个完全 CME 席位和一个 IMM 席位之间的成本差异。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CME 分部的会员将永远地丧失对 Merc 命运的控制权。IMM 分部将并入 CME 并不复存在。新实体的每个会员在投票权上有相同的权重。这被看成一个建设性的结果，因为根据理事会的观点，“我们想要一个统一的 CME，没有分部。”

当我仔细考虑之后，我意识到整个提案都毫无意义。当 6-2-1 权重的分部投票权确立之时，它就被写入交易所的架构基础。确实，我相信这个分部架构，它的控制与平衡的投票系统，它将新会员纳入体系的能力——在 1976 年 CME 和 IMM 进行最初合并的全民公决时这就得到了通过，这是其组织设计的最重要部分，也是 CME 的力量源泉。CBOT 和其他的一些交易所也仿效了这个模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最初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投票权是平衡的，这样 CME 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金融分部来说就不能占据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如今，20 年过去了，金融期货合约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如果这项合并得到了采纳，农产品会员将失去他们在交易所的所有影响力。

我敢肯定如果我还在理事会的话，桑德纳绝对不敢提出这样的主张。但是这是否值得我奋力参与这个问题？毕竟，CME的理事会批准了它而且会员们好像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问题，我倾向于避免给出任何意见并且远离这个问题。直到乔·格林伯格以及其他一些会员求助于我。

乔·格林伯格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也是农产品市场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的意见对我的影响很大，而且他强烈的呼吁引起了我的注意。“利奥，你知道他们所提议的合并将会打破永久契约，”格林伯格说道，“当CME分部的会员得到6个投票权的时候，你忠告我们永远不要把它用来对付IMM，而仅仅是在我们的权利处于危险的时候用来保护自己的盾牌。你知道如果这项表决通过，它将埋葬CME的农产品部门。”

格林伯格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你想我做什么呢？乔。”我问道，“会员们好像并不关心。”

格林伯格看着我：“会员们没有领袖。利奥，你是唯一可以制止这场闹剧的人。别让他们这么干。”

当我问格林伯格还有多少其他人希望我干预此事，他说他将会让我知道的。在我们半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在乔·格莱塞尔、托马斯·本特利、哈维·帕封罗斯、鲍博·西拉茨以及马克·阿德里安的帮助下，我收到了一份递交给理事会的请愿书副本，上面有200多名经纪商和交易商的签名，要求我对会员们发表演说并且阐明自己的观点。

我准备了两封信给Merc的3 000名会员，并召开了几场座无虚席的会员大会。在提及这个问题时，我承认IMM是CME表面成功背后的驱动力，IMM的会员们确实应该获得理事会里相等的代表资格。但是这可以通过理事会投票来实现，不需要代价，不需要动摇CME的整个架构。确实，IMM的代表权曾经通过前述方式获得过增加。

关于投票的权重，我指出：“我们需要谨慎地对组织架构进行设计，以确保基础的CME分部——是它的思想开发了革命性的新合约，也正是基于它的组织基础和财务资源新的分部得以组建——在交易所的核心事务上仍然是控制性的因素。”甚至，我继续说道，这个有关投票的提案就是一个“红色鲱鱼”，因为投票权重在CME的管理上就从来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确实，各个分部的大多数会员总是投相同的票。考虑到CME非营利性的地位和CME是否应该用这种方式耗尽储备的问题，提案中也没有提到其税收方面的意义。毕竟，谁都应该有些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至于分部架构的问题，我对会员们说，我们需要将CME的各个分部统一起来以加强我们的组织，这样的观点我看不出有什么逻辑性。没有了它的IMM分部，CME怎么可能更强大呢——IMM的名字和形象已经全世界闻名了。为什么要对这样壮观的成功进行修补呢？这样做让人想起了当有人想要用新口味取代经典的可口可乐时，

立刻遭受了近年来市场营销上最惨重的失败。那次尝试的失败也是由于苛刻的公众。

最后，毫无疑问 CME 的农产品部门需要新鲜血液。这是不得不要说到的关键问题。但是现在手中的提案对实现这个目标不会有任何帮助；相反的是，它将急剧削弱交易所中农产品部门的声音。

杰克·桑德纳、比尔·布罗斯基还有 CME 理事会里的其他成员不喜欢我说的东西。他们竭尽全力要赢得这次提案——我的意思是“竭尽全力”。他们需要 2/3 的多数票才能赢，于是他们联系和哄骗每一位期货佣金商投他们的票。事实上每位会员也都接到了电话和游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当然，多年来，在推动会员们赞成或反对许多提案的活动中，我也都做得不错。确实，在政治方面我可不是凋谢的紫罗兰，在这次分歧中我也活动得很积极。但是在我如此长的 Merc 的投票史上，我还从没有参与过或见过，这次 Merc 管理层为赢得这次投票所产生的那样的影响力。

但是终究只是徒劳。1994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会员们投票拒绝理事会的合并提案，维持 6-2-1 的投票分配比例。也由于他们竭尽全力的活动，这次失败成了 Merc 管理层的巨大尴尬。

这本来可以避免的。在会员大会上，不止一个会员问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利奥，你是 Merc 的名誉主席，而理事会却不就此事向你征询意见，怎么会到这一步的？”

好问题。我想不出任何合理的回答。他们可能已经抱有这样的逻辑，在决定启动对 CME 关键性的重组之前，理事会应该自由使用其一切资源——尤其是 Merc 名誉主席的观点。或许我已经劝阻了他们，或者提供一些改进使他们的提案变得合乎人意。但是，他们没有来问我。

在全体投票后的第二天早晨，数十年来一直为《芝加哥太阳报》负责撰写颇具新闻价值的著名“考普专栏”的笔名为“芝加哥先生”的埃尔夫·考普西耐特做了这样的报道：“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奠基者利奥·梅拉梅德，与交易所的现任领袖杰克·桑德纳在星期二进行的一场投票中，就一项关于会员的争论激烈的提案进行了一场单打独斗。被称为“CME 之父”的梅拉梅德，击败了曾被称为他的被保护人的桑德纳。”

类似地，《芝加哥论坛报》则把故事描述成“对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主席约翰 F. 桑德纳的重大抵制”，并声称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胜利”。现在新闻界把我描绘成桑德纳强大的对手。“我想这次投票是我们机构和会员们的一个胜利，”我评论道，“这项提案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并在会员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的分裂。”

立即就有许多会员不断地要求我复出。我拒绝了，并说道：“这次投票并不意味着我重返 Merc 的政治舞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我为它服务了 25 年，把这个组织建成世界上最为领先的金融市场之后，我不可能绕开或无视一项对 Merc 有害的

提案。”

作为此事的一个注解，其后果是桑德纳要求我担任 CME 许多特殊事务的顾问。我还发现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就在借“分部不再有必要存在”的口号进行统一 CME 的失败尝试的那一年里，Merc 理事会却建立了另一个分部——即称之为 GEM 的成长及新兴市场分部。我认为它是一个好主意，并给予它支持。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就是抽出些时间，去思考，去写作，去回忆那些忙碌的岁月里，我所面对的斗争，我的收获，还有未来。我牵着贝蒂的手前往亚利桑那的斯科特斯德，在那里，我们有一处冬日隐居的幽静住所。在全面考虑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忠告后，我出发了。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第 36 章

白 宫 来 电

当飞机缓缓下降时，凤凰城闪烁的灯光开始映入我的眼帘。从芝加哥起飞的这次旅程真是弥足珍贵，在这 3 小时内，没有任何传真和电话的干扰，只有贝蒂和游戏机与我相伴。我很少在飞机上睡觉，即使是在飞往中国或日本的长途旅行中。长途飞行是工作的好时机：可以准备一些演讲、制订工作计划和研究业务发展战略；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过程中，在穿梭于不同的飞机和机场的日子里，我甚至完成了《第 10 颗行星》这本书的创作。

当我们到达时，我手头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必备的交易工具——各种数据图表、分析软件和经济预测工具，我几乎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们。正如前面所说，在我心目中，交易总是占第一位的，代表着生命中最大的挑战。它意味着每天都要接受新的冒险，解决新的问题。竞争是激烈的，回报是惊人的，但是所遭受的惩罚可能更为严重。相比之下，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值一提了，除此之外的所有职业都显得那么平庸。我不得不致力于研究全球金融系统，以回答成千上万的人每天提出的同样问题：市场会呈现繁荣发展还是萧条下跌的趋势？

很快，答案似乎变得显而易见了。当我在 60 年代开始进行交易的时候，我的竞争对手就站在交易池中、站在我的周围。我可以触摸他们、听到他们说话、看到他们的眼睛，当交易进行得热火朝天时，我甚至可以闻到一股强烈的火药味。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忍耐力有多大、他们持有的头寸规模如何、他们能承受最大的损失有多少以及他们何时会退出市场。如果我足够聪明的话，我就会先发制人。在当时，对于场内交易来说，最重要的是交易速度、策略以及体力、财富和威望。除了赚钱这一目标外，他们信奉的宗旨就是：生存。这是我早在进行交易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了。

然而斗转星移，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尽管存在场外交易，但是场内交易的激烈程度仍然是直接影响市场波动的最主要因素，那么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科技造就了许多“隐形”的竞争对手。现在仍存在场内交易商和经纪人，但更多的是匿名的交易者、场外投机者、基金经理人和金融机构利用电脑穿梭于市场内外——部分人还有着数学和物理学的背景。他们中包括机构投资者、商业保值者、公司的财务部门和投资经理人，他们可以凭借手中大量的资本影响市场，主要的金融投资工具是外币、欧洲美元、长期国债、短期国债和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期货合约。很早以前，机构投资者就成为了期货市场的主要使用者。而今天，基金的出现使期货市场的交易量更为惊人，没有人能够预料它将会带来多少业务、现金流和买卖交易量。但是比较令人担忧的是，市场是一个价值链，一个基金的波动会引发另一个的波动，继而影响其他市场成员。因此，谁都不敢阻碍市场的发展，因为大家并不清楚竞争对手的承受力到底有多大。

计算机技术孕育了一大批新的金融工具，如 OTC 衍生品，它对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难以度量的。许多新的金融工具都给交易商和市场带来了未知的风险。尽管我同意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先生所做的评价“近年来产生的一系列衍生产品提高了经济运作的效率”，但是我认为我们仍然远未了解这些衍生品产生的全部作用。正如格林斯潘先生指出的，“即使衍生品交易本身不是系统风险的来源，它却可以使一个市场受到的冲击加速传播到其他市场和机构中。”一方面，主要的衍生品交易商的失败会影响他的对家，这正是许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的“链式反应”危险；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 OTC 金融期权，因此还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另外，现在还出现了动态期权，它是一个包含多种可能性的函数。这种动态期权所产生的风险是无法完全规避的，因此要通过动态保值法来控制这种风险（动态保值法会加速价格的波动，产生未知的后果）。

新的交易商大多使用了以上介绍的新策略和新技术，而我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计算机技术使业务往来更加便捷，业务再也不仅仅局限于纽约或爱荷华州了，而是昼夜不分地来自于世界各地。世界变小了，人们 24 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交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交易商可以通过大量服务获得即时

信息：路透、耐特里德、彭博、道琼斯、德励。无论我身处何方或在做什么，都可以获得想得到的信息。成为一个交易商的好处就是，这迫使你必须获得大量的信息、随时保持与他人的联系；但是，同时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你会忙得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

但是交易对我产生的最重要影响就是，它使我与现实紧密相连。市场的魅力就在于，它是现实情况的最终决定者。埃尔默·法尔克告诉过我“市场可以揭露真相”。华盛顿的决策者、东京或柏林的部长们、其他任何政府官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世界，但是只有市场才能反映事实。道理非常简单：没人能够愚弄市场。通常，政府官员都坚持认为他们自己对于利率水平或汇率做出的评价才是对事实的正确解释，然而，除非得到市场的证实，这些评论简直是不值一提的。

前几年，我曾会见了日本银行的前任理事，那时他正在芝加哥旅行。他听说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听说了国际货币市场（IMM），于是希望能够与我碰面。我们在西尔斯大厦的大都会俱乐部共进午餐。他的英语讲得非常流利，我向他全面阐述了建立金融期货交易所的重要性。当我完成我的长篇大论时，这位年老的绅士露出了微笑并频频点头。

“你给出了许多理由说明建立这样一个市场的重要性，但是仍未给出那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顿时，我变得哑口无言，因为我已经极尽游说之势了，于是我问他我到底漏掉了什么。他的回答使我受益匪浅，以至于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引用这句话。伴着眼中闪现的一丝光芒，他问我：“当一个国会议员走出国会大厦（无论是在华盛顿、伦敦或东京），站在大楼前，周围被一群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时，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

“是的，”我点了点头，“我知道。”

“当这个议员挥舞手中的纸张，告诉记者们他在国会中的提议将使全国人民受益时，你又知道这种感觉吗？”

“我知道。”我又点了点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试想一下存在这样一个公开市场，在第二天早晨可以大声怒斥那完全是一派胡言！”

这的确是一个最好的理由，解释了我一直以来主张建立新的期货市场的原因。这并不表示市场不会由于错误信息、暗中操纵等因素的影响而扭曲，但这种情况是罕见的，而且市场可以快速地进行自我调节，有时甚至是十分剧烈的调节。如果想在今天的全球市场上获得成功，仅仅保持信息的畅通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学会如何在接收到的信息中提取事实。

揭露真相可能会带来回报，但也有可能会遭受打击。我见过太多的诽谤、恶意中伤、错误的控告、误导性的评论、半真半假的事实和彻头彻尾的谎言。这种例子真

是数不胜数。在 1972 年的食品价格动荡中，芝加哥的一群主妇走进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抗议飞涨的食品价格。5 年后，美国的农户们又开着拖拉机来到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抗议产品的价格太低。从某种程度上讲，责备期货价格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合常理的。俗话说得好，应该“防患于未然”。然而期货市场一直以来都成为了人们抱怨的对象，是替罪羊。

为什么不呢？浏览一下报纸上的大标题和新闻就能发现，总是有人可以在这些市场中一夜致富，很显然某些卑劣的行径仍将继续。看看会员、经纪商：他们强悍，吵闹，不尊严。“牛仔”，一些人由于他们的变化迅速的滑稽动作和虚张声势而赢得了这个称号。

近年来，许多嘲讽和指责都来自于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来自于那些不了解期货市场本质的人和那些有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他们总以一个鲜红的 S 来表示期货市场上的投资行为。作为 1987 年股票市场崩盘的见证人，我一直致力于与这些不符事实的言论作斗争。

突然有一天，由于我们的第一夫人希拉里·罗达姆·克林顿也投资于期货市场，她自然也成了被指责的对象。各种媒体迅速聚焦于 15 年前她投资的家畜期货市场。她在那次投资中成了大赢家，最初仅有 1 000 美元的资金在短短 10 个月内翻倍到了 100 000 美元。

不幸的是，媒体并不相信她没有使用任何诡计。所以，我突然接到了白宫的电话。他们询问我是否能够检查一下她的交易记录并提供一些意见。我是否应帮他们做出解释，一个新手是怎样以合法的手段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市场中赚到这么一大笔钱的。作为交易所的前任主席、IMM 的创始人，我的意见是可靠的、权威的。而且不必担心会引发任何政治问题，因为尽管我给两个党派的总统候选人都投了票，但我的观点似乎更接近于共和党，我们都倡导自由市场和保守的财政政策。1994 年 4 月，前任芝加哥市长助理、现任克林顿总统的政治顾问拉姆·埃曼耐尔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总统助理、白宫秘书约翰 P. 坡德斯塔即将就克林顿夫人交易的事致电于我。我是否应该接这个电话并提供帮助呢？埃曼耐尔是我的好朋友，而我早在坡德斯塔还任职于国会农业委员会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是个直爽的人，我尊敬他，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因此我同意接这个电话。大约一个小时后，坡德斯塔来电了，他的主要目的是询问我是否愿意帮助白宫，调查一下克林顿夫人在 15 年前的交易记录。他说：“白宫需要专家的意见，利奥，愿意帮助我们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要卷入此事。在 3 月底，白宫就公开了克林顿夫人的交易记录，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她得到了任何优惠待遇，但媒体仍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暗示第一夫人一定是违反了相关规定或是得到了某些人的帮助。使整件事情更令人怀疑的是，白宫一开始竟宣称克林顿夫人是读了《华尔街日报》后，才学会如何进行交易的。很难相信有人可以仅仅通过阅读此类刊物就学会如何进行交易的。

白宫迅速收回了以上解释，并提供了以下事实：克林顿夫人是接受了詹姆士·布莱尔的建议，而后者是“泰森食品公司”（巨大的阿肯色州家禽处理加工企业）的外聘顾问。在当时，华盛顿街头谈论最多的就是利益冲突、权利影响和特惠待遇。但是到了3月底，当白宫公开克林顿夫人的交易记录后，人们未发现明显的证据表明她曾从替她处理账户的经纪公司处得到任何好处。

尽管我很愿意为克林顿夫人提供帮助，但我并不希望卷入这场无休止的争论中，也不想成为舆论的焦点。我告诉约翰·坡德斯塔，CBS的莱斯利·斯塔尔曾向我提出类似的要求。她几天前就打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在一档新闻节目《60分钟》中作为嘉宾主持，解释一下期货市场的操作过程，这个节目将会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中实地拍摄，而且与克林顿夫人的事情有关，尽管她保证不会要求我作任何评论，但是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这个要求。因为我预感到这可能会成为一件政治丑闻，而交易所不应被卷进去。于是我告诉斯塔尔我要考虑一下。

与斯塔尔结束通话后，我立即找到比尔·布罗斯基商谈这件事。如果是从前，我会自己做出决定，但是现在作为名誉主席，我已不再是制定决策的主要成员了。我告诉布罗斯基我不想接受这个请求，他的观点与我相同，因为在交易所的交易场地里拍摄这样一档节目对交易所一点好处也没有。

次日，我礼貌地拒绝了莱斯利·斯塔尔的请求，表明交易所不愿卷入这样一场政治纷争中。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当我还被蒙在鼓里的时候，交易所已经改变了决定，杰克·桑德纳将成为斯塔尔节目中的嘉宾主持。无论是布罗斯基还是交易所中的其他人都没有向我做出任何解释，为何交易所发生如此迅速的转变呢？我推测最终结果的制定更看重的是由“谁”作为整档节目的主持人，而不是取决于这样做是否对交易所所有益。所以斯塔尔最终得以如愿以偿。

所以现在，面对约翰·坡德斯塔同样的请求，我心存疑虑。然而坡德斯塔十分执著。他辩解道：“白宫不是CBS！我们可以将克林顿夫人的相关记录提供给你，这样你可以进行一些分析，再告诉我们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当然，如果你在分析之后决定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也会尊重你的选择。”

面对白宫如此合理的请求，真是让人难以拒绝。这其中似乎不存在政治和派别纷争。另外，对克林顿夫人的这种指控很像多年来我们听到的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

因此，我同意检查一下克林顿夫人的交易记录，但是我事先做出了以下几点声明：我的结论是严格根据白宫所提供的记录而得出的，只涉及其中的买卖信息。至于克林顿夫人是如何制定交易决策的，我不会做任何评论，更没有兴趣去探究她和布莱尔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同时，我有权保持沉默。

正如事先约定好的那样，我第二天就收到了相关记录。我邀请了首席运营官瓦列里·特纳和市场总监艾利桑·波斯纳先生协助我的工作。我们仔细分析了克林顿夫

人从1978~1979年的买卖交易账户。当时的市场正处于一种波动非常剧烈的状态。

事实上，第一夫人开始交易后很快就盈利了。她最初的投资是1 000美元，并在第一笔交易中就获利5 300美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利润，但是由于当时的家畜市场价格波动幅度很大，因此取得这些利润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那段期间，牛肉的价格仅仅在一年内就从每磅47美分上涨到了每磅80美分。这意味着，1978年只要在一份期货合约上投资1 200美元，一年后就可以取得13 000美元的利润。而克林顿夫人显然不会在买入合约后就置之不理了，在这10个月内，她从事了许多买卖交易，不断买入和卖出头寸。

根据所提供的交易记录，我们分析后认为克林顿夫人是一个诚实的交易商。她根据标准支付保证金，在许多交易中盈利，但也会在一些交易中亏损。总的来说，她的表现是很不错的。我个人认为，她一定是接受了某些专业人士的指点。而正如报道中所说的，这些指点很可能是由詹姆士·布莱尔先生提供的，他是期货市场交易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克林顿夫人的好朋友兼法律顾问。另外，尽管我还不能肯定，但是我猜想克林顿夫人可能表面上是以她的名义进行交易，但实际上是由布莱尔先生全权操作的。

同时，我发现了一个至今为止所有报道都忽略了的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32个独立的交易中，大多数都是所谓的隔夜交易。而隔夜交易和当日交易是有很大大区别的。如果某人想更好地控制交易，那么他很有可能是进行当日交易，因为如果进行隔夜交易的话，利润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场的影响。换言之，隔夜交易的盈利和亏损是取决于第二天市场的波动情况的。而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第二天的价格波动。由于克林顿夫人的很多交易都是隔夜交易，因此她的交易带有很大的市场风险。

看完我的分析报告后，坡德斯塔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问我：“你是否能够亲自来一次华盛顿，向白宫成员公布你的意见？我们这里的确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考虑到向白宫成员公布我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并没有什么坏处，于是我同意和我的助手艾利桑·波斯纳一同前往华盛顿。

第二天我来到了华盛顿，面对我的是一群白宫官员。除了坡德斯塔之外，房间里至少还有20个白宫人员，其中包括白宫法律顾问大卫·葛尔甘、总统高级顾问乔治·斯戴普哈诺坡洛斯、克林顿夫人的新闻秘书莉萨·卡普托和她的律师大卫·肯达尔。我进行了30分钟的详细汇报，希望可以使他们了解真实情况。但很显然，我说的话对他们似乎毫无意义。

大卫·葛尔甘问道：“你是否愿意将你刚才说的内容作为一份独立的官方报道公布出来？”

“等一下，”我说道，“这并不是事先约定好的。”

大卫·葛尔甘曾是共和党执政时的主要新闻发言人，现在他在民主党内任类似的职务。他从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毕业，曾是《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的专栏作家，

他对新闻事件有着强烈的敏感性。我一直很尊敬他，他经验丰富、有聪明才智和深刻的内涵。他与那种成为政府发言人后就学会耍弄各种政治手段的新闻工作者不同，这也正是他打动我的原因。他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我同样也不是。这几年来，我学会了如何与媒体进行争辩，以及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有时我会受到重击，但另外一些时候我也会让他们尝到苦头。但是我从不会在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上退缩。

“我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民主党人士。”我声明道。

大卫·葛尔甘开怀大笑起来，“难道你认为我是吗？我只是希望你能为我们的国家做这件事。”

葛尔甘真是一语中的，他自己可能还未意识到。爱国主义是我最深的情结，我一直对我们的祖国有着强烈的感情。有许多人是把这种感情默默地藏在心里的，例如我有个好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还是个孩子，但是他至今仍倾尽全力为那些参加过战斗的老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亲眼目睹了那一代人为了世界的和平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说他永远都有愧于这些人。而我现在也有着同样的感觉，我也有愧于我的祖国。

因此，我几乎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出于爱国心的请求。我同意向公众公开报道我的发现。我要求有一个配备电脑的专用办公室，来准备我的报告。两个小时后，我们起草完成了一份报告，并由白宫在1994年4月11日对外公布。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我们未在克林顿夫人的交易记录中发现任何违法现象。

至于她委托交易的公司则另当别论。正如我在报告中指出的，克林顿夫人的交易都是在15年前进行的，当时的交易所规章和联邦法规与现在有很大不同。例如，在保证金问题上存在很多非议。期货合约的保证金额度是由交易所制定的，取决于市场波动状况和每日价格变动情况。我经过分析发现，大部分时候，克林顿夫人的账户里保证金比较少，有时甚至是在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她的第一笔交易显然就是在保证金不足的情形下进行的。但是保证金不足并不能算是客户的违约行为，而应归咎于客户账户所在的经纪公司，是他们违反了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1979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发现克林顿夫人所在的经纪公司——瑞富公司存在许多违规交易行为。尽管公司并未承认或否认这一事实，但实际上他们的违规行为涉及了公司中上百个客户。克林顿夫人的账户额度太小，与其他众多账户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我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我知道由于瑞富公司屡次违反保证金规定、没有及时进行账户审核、超出头寸限额等行为，交易所曾经对公司施加了有史以来额度最高的罚款——25万美元。

那么除了交易记录所反映的信息，克林顿夫人的交易背后是否还隐藏了些别的东西呢？我尚未发现。吉姆·布莱尔给第一夫人提供的帮助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尽管他在期货市场中赚了上百万，我们发现他仍是一个很正当的商人，因此不必对他

产生怀疑。况且，提供交易建议甚至是指导他人的交易活动都不算是违法的行为。我并不是政治分析家或心理学家。我的结论是严格根据交易本身而得出的。而根据我的分析，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公正地说，克林顿夫人并不是第一个在商品期货市场上承担风险并赚了一大笔钱的人。

在我们的市场中，从一贫如洗到腰缠万贯的例子数不胜数，这种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布鲁斯·科夫纳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位神奇的人物原来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借了3 000美元开始交易，后来却在期货市场上赚了上百万。基尼·卡西曼也同样如此，他原来是个警察，后来在大豆市场上以5 000美元的投资获得了1亿美元的利润。还有很多其他人，一开始也是以极少的资金开始交易，后来在商品期货市场上取得了巨大财富。期货市场是个机会的竞技场，而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民族。

乔治·华盛顿和他的伙伴们冒着史上最大的风险与英国人作战；那些敢于抛下一切前往西部的先锋们也是十足的冒险家；当我们的民族敞开大门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并最终取得成功时，我们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农民们每年面对着天气和其他各种变数的风险种植农作物；我们国家的金融服务在世界市场上首屈一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金融领域敢于创新并愿意承担风险。的确，敢于冒险是美国的一大特点。

市场风险还会带来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风险预示着潜在的回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种族、宗教或性别的区分。世界各地的期货市场和各会员公司就是最好的证明。过去存在的宗教歧视一去不复返；各种种族障碍日益减少；不同民族间的差别在今天也变得毫无意义。在类似于芝加哥的这种期货市场中，无论你是天主教徒还是犹太教徒，白人或黑人，男人或女人，只要你了解供求的基本经济规律，你就可以成为赢家。成功并不取决于你是什么人，而取决于你是否能预测出市场的发展方向。人们很快发现，无论自己出生于什么家庭、从事什么职业、来自何处，都会在决策正确、质量高、服务好时得到市场的奖励，而在决策失误、质量差、服务低劣时遭到市场的惩罚。期货市场并不是人们理想中的“乌托邦”，但它却是我至今为止见到的最没有偏见和歧视的地方，特别是芝加哥的交易所。也许是风险和回报成了关键的决定因素。

随着白宫将我的报告对外公布，那档新闻栏目播出以及克林顿夫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后，各种谣言逐渐平息。最后，克林顿夫人的律师大卫·肯达尔打电话告诉我，白宫将向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提出申请，公开交易所中所记录的克林顿夫人在1978年11月11日至1979年7月20日之间的所有交易数据。他说克林顿夫人希望证明自己未做任何隐瞒。于是他请求我审核全部记录，并发表另一篇报告。

再一次，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国家做点事情。于是我审核了交易所中的记录，发表了第二份报告，由白宫在5月26日对外公布。这份报告大部分是重复了第一份中

的内容：克林顿夫人本人并没有违反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几个星期后，正陪同克林顿总统在欧洲参加纪念诺曼底登陆 50 周年的克林顿夫人从罗马致电给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从我的办公室向外望去，可以看见如驼峰般的山峦正沐浴在早晨的阳光里，一群群的蜂鸟轻快地飞过草丛，湖面上波光闪烁。我觉得疲倦极了，连睡觉的力气也没有。我需要彻底底的放松，几天不做任何事情，将头脑中的一切抛到九霄云外——或许只留下一点点。我经常这样，当我想前进的时候又会有所顾及，经常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这就像一部电影，上演着现在、童年和未来。1941 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从纳粹的魔掌下逃脱并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此后我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也是一次巨大的风险，是幸存者的必然经历。



Leo Melamed

Escape to the Futures

尾声：起床号

以下是在 1995 年 11 月 9 日于纽约召开的金融工程师协会年会上的发言，并于 1995 年 12 月刊的《金融工程学杂志》上发表。

当今的金融市场正处于空前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蓦然发现自己正身处三股潮流形成的时代漩涡之中，它们掀起了滔天巨浪，然而最终结果会是怎样，我们尚不得而知。这三股潮流来势汹汹、锐不可当，而且几乎是在同时来临的。

第一股潮流：全球化。花旗集团的前任主席华尔特·莱斯顿最先感觉到了它的到来。他在 1985 年曾说过，我们正见证全球形成一个“飞速发展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这种体系不是由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或财政部长们创造出来的，而是由那些通过电信和计算机技术互相联结的男男女女建立起来的。最后，莱斯顿指出，“信息本位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了金本位制。

事实也的确如此。以前那种互相独立的金融体系已经转变为一种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全球性经济。资本流动受到地理疆域限制的年代已成为历史；而那些曾经可以令一个国家免受外部价格影响的内部机制也逐渐失去其效力。金融市

场变得没有阻碍、没有国界，任何一处的公司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寻找资源、生产制造和销售产品。

第二股潮流：政治变革。正如诺贝尔奖荣誉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丝所预测的，如果将亚当·斯密笔下的自由经济和托马斯·杰斐逊倡导的政治自由主义结合起来，那么就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以市场驱动型的经济秩序取代原来的指令型计划，以民主政体取代独裁政治。

这种政治/经济改革几乎促使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向建立市场驱动型经济秩序的模式转变。这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在过去 20 年中，如果我们谈论到全球经济，事实上我们只是在谈论 25% 的人类——他们大多来自北美、西欧和日本。但是突然之间，市场经济覆盖了全球 30 亿的人口，每个国家都成为了全球市场中的有力竞争者。

第三股浪潮：微观动态发展（microdynamism）趋势。这个词是我独创的，用来描述世界从宏观到微观的变化趋势。在物理学中，我们从广义相对论发展到量子力学；我们从研究原子发展到研究原子核，并发现了夸克和轻粒子。同样，在生物领域，科学家们从观察个体细胞到研究细胞结构，并最终进入了基因工程的时代，分子生物学诞生了。

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这种向微观发展的趋势。今天的个人电脑小得足以装进一个公文包，但其功能却比 UNIVAC 还要强大。UNIVAC 是诞生的第一台计算机，当时需要一整个房间的空间来容纳这个庞然大物；我们现在穿着用更暖和、更坚韧的轻质材料制成的衣服，再也不用往身上套一层又一层笨重的衣物了；光线电缆取代了铜制的电线；晶体管技术使收音机和其他电子设备成为人们的掌中玩物；微处理器技术使整个科技世界变得微型化，并且还在持续地变小……

我们的市场也正进行着同样的演变。当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被应用到制定投资决策中时，所产生的结果将是惊人的。正如科学领域一样，市场也经历着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接踵而来的是更精密的计算技术和更尖端的分析系统，使金融工程师可以分散金融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衍生品诞生了。投资策略也从传统战略转变为更精妙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长期套期保值策略演进为连续的在线风险管理。

这三股主要的浪潮伴随着其他因素，构成了我们今天所处的金融市场环境。我

们对这种环境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全面的了解，有时它发展平稳，我们可以对将来进行预测，但有时它又变得不可捉摸、难以预测。一方面市场会表现出稳定上升的发展势头，一方面又会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急速走低、不可挽回。人们想尽了各种方法进入市场，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跌入从未料想到的陷阱中去。当传统的控制手段过时或效力不足时，一些恶意的交易者就会精心设计出各种手法进行欺诈。此时，市场监管者也觉得力不从心。

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谴责那些制造骚乱的行为？抱怨目前的现状？对市场置之不理？限制价格波动？禁止衍生品交易？还是以上全部？

我们既不能抹杀历史，也不能阻止最终结果的到来。我们正处在一次巨大的变革中，徘徊于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广阔空间中。这就好比站在一座大桥上，桥的一端是旧政体、旧经济秩序、旧技术和旧的市场状况，而桥的另一端连接的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尽管我们对新的秩序还不甚了解，尚不能制定出全面的规则。但是如果我们犹豫不决、不及时利用这股新的浪潮，甚至于对它强烈抵制、妄加干涉，我们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如果由于害怕计算机而不使用它，担心发生类似于宝洁公司、奥兰治县、德国金属公司、巴林银行和大和银行的失败而畏缩不前，为了防止发生巨额亏损而放弃衍生品交易，那么社会将停滞不前、毫无生气。

现在正是变革的转折点，我们不能忽视转变所带来的潜在危机，但更不能在其面前表现出畏惧的心理。正如我们发现自己无法阻挡基因工程的前进势头一样，金融工程的快速发展也是势不可挡的。我们必须更加深谋远虑和谨慎小心，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标准、规章，特别是在内部控制方面。我们必须虚心接受以前的经验教训，在许可的范围内行动。同时还要积极听取广泛的建议，如 30 国集团、温莎宣言、FIA 的建议等。加强教育和培训过程，并在风险管理中纳入风险发现机制。

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更加实际。目前有两点是确定的：第一，以上我所描述的变革还未结束，无论是物理领域、生物领域还是我们所处的市场仍处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第二，在这三股浪潮中占有同样重要地位的一个因素就是科学技术。的确，科技一直是导致政治和经济领域变革的根本决定因素。在过去 10 年里，电信技术的发展引发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调整，给国家控制型经济和种族间的不平等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物理学家、生物学

家和金融工程师们可以对物质结构进行更细致的探究，并分析其构成要素。

显而易见，火种的诞生给人类历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着同样重要作用的还包括轮胎、电、印刷技术的诞生和工业革命的开始。世界在加速发展，近年来的科技革命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且这一势头在不断加剧。科技已经给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很多变化，今后必将带来更多的变化，而且有理由相信在金融市场领域的变革将是最引人注目，范围最广且最彻底的。

市场中仍存在一些忽视这种现实的人，他们盲目地信奉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克曼的观点：“人类不应相信那些不在计划范围内或与预先计划不符的事情”。很遗憾，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他们还在继续怀疑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向，那他们就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处于汹涌的科技大潮中的现实。

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科技已经并将深刻地影响金融市场中风险管理的各个方面。未来的市场将逐步实现电子化操作，人们可以通过电脑屏幕进行交易。如果有人忽视这种现实，他必将被淘汰出局。获得来自于股票、期货、期权和基金的全天候信息已经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利用在线的电子软件来即时分析、监控、处理金融数据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投资组合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帮助人们记录、控制交易，提供即时头寸信息、损益情况并随时更新数据。还有其他各种软件产品，也都提供了多个数据库之间的复杂分析计算、历史数据对比等功能。风险分析模型更可以预测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下的投资组合状况。甚至有一些交易系统还可以同时考虑到交易者的心理活动，这被称为人工智能。各种信息标准共同组成了一个信息高速公路，单是北美大陆就有上百万的互联网用户。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中，期货市场开始了这场信息化的变革。人们意识到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不得不引进新技术。全球竞争的背景、电信科技的发展，使全球市场对电子交易系统产生了迫切的需求。1987 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会员们首次认同了 GLOBEX。这也是全球首次使用基于电子屏幕的系统来进行期货交易。GLOBEX 的诞生紧接着引发了一场电子系统的革命，各种各样的系统被设计了出来，它们或是用来延长交易时间，或是用来处理整个交易过程，等等。

在随后的第二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东京股票交易所、大阪证券交易所、哥本哈根股票交易所、丹麦期权和期货交易所、瑞士期权和金融期货交易所（SOF-FEX）、东京谷物交易所都相继采用了电子自动交易系统。又过了一年，爱尔兰期

权和期货交易所、东京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TIFFE）、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和悉尼期货交易所也使用了类似的系统。到了1991年年底，又有10家交易所加入了这个行列，其中包括德国股票交易所（DTB）、伦敦期货和期权交易所、瑞典期权市场、芬兰期权市场和西班牙期货期权交易所（MEFF）。事实上，除了巴西商品与期货交易所（BM&F）和巴黎的法国期货交易所（MATIF），所有1986年后新成立的衍生品交易所都采用了自动化的电子交易系统。

但是近年来，期货市场的技术革命突然又变得步履维艰了。尽管GLOBEX的交易量在不断增长，其总额仍是很小的，只相当于交易所全年交易总量的1%；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NYMEX的ACCESS系统的情况与之类似；LIFFE的APT系统稍微好一点，占到了全年总交易量的3%；MATIF的表现则更好一点。GLOBX的交易量从1993年的5.5%上涨到了1995年的8.7%，由此证明从技术层面讲这个系统还是良好的。同样，悉尼的SYCOM系统的交易量也从1993年的5.1%上涨到了1995年8.9%。相比之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从1993年的1.6%减少到了1995年的1.1%。

虽然基于屏幕的电子系统的交易总量水平还较低，但无论你喜欢与否，这种方式必将成为会员们未来的主要交易手段。有些人觉得十分欣慰，大部分期货交易还是在场内实地进行的，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从期货交易所中的外汇交易市场，我们就可以明显地发现电子交易方式和公开喊价方式间的区别。若以美元计算的平均每日外汇交易额，1986年约为2000亿美元，而1995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增长了500%。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最近公布的数据，1992~1995年间，主要的外汇中心在市场上的交易额呈现出从30%到60%不等的大幅增长。然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外汇交易所的情况却有些例外，其1993年的交易量只上涨了9.5%，1994年又上涨了6%。尽管OTC市场上的交易额部分要归功于在交易所外交易的外国市场，但人们不得不承认，OTC市场中屏幕式的电子交易技术的确吸引了不少外汇市场的交易者。在全球，一个完整的交易日由东京和悉尼开始，24小时不间断，然后是新加坡、香港，再到欧洲，最后是美国。如果一个交易所使用公开喊价的方式，又怎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交易量呢？

尽管我不主张完全取消现存的场内交易模式，但如果现在不做好迎接新技术的准备，也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今天所取得的进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与其他充

满高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相比，交易所真的是落后了。例如，LIFFE 是唯一一家具有即时清算能力的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在进行自动交易安排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证券交易所了。没有一家期货交易所能够提供与经纪公司间的交流服务，报价能力也十分有限，而且没有开发出小额交易的自动交易系统。

尽管过去 20 年中的科技革命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标准化信息时代，但是现在看来它们也显得陈旧过时了，因为科技仍在大步向前发展。电脑和技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将世界联结起来，到了 90 年代，无线技术大放异彩，卫星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无线网络互相沟通。这种变革在最近达到了高峰，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传递信息。

今天的科技将电的魔力和电磁波结合起来，使它们的传输速度高达每秒 30 万公里，这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 3/4。如此一来，这些看不见的电波就可以承载着电脑命令、人类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市场信息传输到世界各地。这种新技术所创造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技术方面的奇迹，还会带给人们全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瞬时发现自己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住在哪里、从事的工作和交易的方式。小小的传呼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着液晶屏幕的传呼机不仅可以显示电话号码，还可以显示完整的信息，即将诞生的新一代传呼机还可以接收电子邮件。试想如果在交易中应用这种完全自动化的电子交易系统，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变化啊。

我们将不再受电话网络能力的限制，通过卫星构建的新电话网可以提供全球范围内的服务。摆脱了疆域的边界，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面对目前的状况，我们的交易所做好准备了吗？

期货市场要提高警觉，骄傲自满会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世界在飞速发展，未来的交易商很可能一出生就被科技所包围，他们收到的生日礼物是键盘，利用电脑完成作业，互联网是他们的游乐场，电脑符号是他们交流的语言。

当我们完成现在的这种变革，到达新社会的彼岸，并制定了一系列新规则后，衍生品交易仍会是主要的金融风险管理手段。所不同的是，这些交易是建立在信息高速公路之上的。明天的交易者将会利用一种互动式的无线通信系统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交易组合，这些通信技术包括电视、电话、个人电脑和各种存储设备。剩下的唯一问题将是，这些交易是否还会在期货交易所中进行？

Escape to the Futures

这是一部文笔精彩、关于一个多面奇才的有趣传记。9岁的他，逃过大屠杀，来到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他将一个弱势商品交易所转变为世界领先的期货市场。他的影响过去和将来都是世界性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只有寥寥数人曾对商业世界的历程起到了革命性的影响，如沃伦·巴菲特之于投资领域，比尔·盖茨之于软件领域。本书的作者利奥·梅拉梅德，也位列于这个阵营中。他真正地变革了美国以及世界的期货交易。

——**克莱顿·尤特**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前任总裁、美国前贸易代表

一位头发斑白的MERC老交易商有一次向我保证，相信利奥，你就永远不会吃亏。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部无比吸引人的个人历史说明了问题的一切。它显示了一个移民男孩儿在逃脱无法想象的恐怖后，是如何从他那位同样卓越的父亲身上的锐气、斗志和老辣中得到启示，并将他的所学运用到建立芝加哥商交所，而且为一个现代的、以芝加哥为基地的金融服务业奠定了基础。

——**默顿·米勒**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

利奥都讲了。没有利奥，就没有金融期货行业。这几乎算不得夸张之辞！！

——**约翰·丹姆嘉德**

美国期货业协会总裁

本书精彩地讲述了一个孩子逃离纳粹以及他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的故事。它是又一个伤感的提示符，让人想起了那些无法衡量的损失——在艺术、科学、工作和每天的生活上——大屠杀使整个人类深受其害。

——**本杰明·米德**

美国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协会总裁

客服热线：
(010) 88379210,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华章网站 <http://www.hzbook.com>

网上购书：www.china-pub.com



WILEY
Publishers Since 1807
www.wiley.com



定价：58.00元